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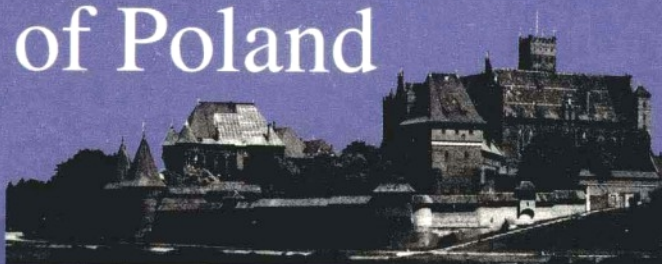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波兰史

耶日·卢克瓦斯基 赫伯特·扎瓦德斯基 著
常程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Poland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A Concise History of Poland

ISBN 978-7-5473-0288-0



9 787547 302880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定价：38.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波兰史

耶日·卢克瓦斯基 赫伯特·扎瓦德斯基 著 常程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 09 - 2009 - 265 号

A Concise History of Poland 2nd edition (ISBN:9780521618571) by Jerzy Lukowski, Hubert Zawadzki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09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兰史 / 卢克瓦斯基, 扎瓦德斯基著; 常程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1.4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 - 7 - 5473 - 0288 - 0

I. ①波… II. ①卢…②扎…③常… III. ①波兰—
历史 IV. ①K51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9238 号

责任编辑: 欧阳敏

责任印制: 尚小平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 200336

电 话: 021 - 62417400

印 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40 千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中文版序言

我们怀着极大的喜悦将这部作品呈现给中国读者。波兰是一个有着极其复杂历史的国家。这种曲折和反复常常使波兰人自己都望而兴叹。对于欧洲历史研究,这样说大致不会错:其进展和特征是由西欧学者规定的,特别是来自法国、德国、英国,进一步讲还有美国的学者。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在其富有启发性的权威著作《欧洲史》(*Europe: a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一针见血指出,这种研究态势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得出一幅关于欧洲的、非常扭曲的图景:认为欧洲真正“重要”的地域只有英格兰、法国、德国西部,以及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不过,某些德语区的国家,尤其是曾经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确实对波兰很感兴趣,这是因为他们要为18世纪晚期旧波兰的毁灭负很大责任。可是他们的历史学家并不会如实、细致地研究波兰的过去(除了某些杰出的学者)。与此相对应的是,直到18世纪末还存在的那个旧的波兰,虽然与西欧国家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但其政治重心则转向了其他地方——最主要的是其东部的俄罗斯和东南部的土耳其帝国。因此引发的后果便是,西欧历史学家普遍地、甚至是可耻地忽略了大部分波兰历史。然而,这个国家虽然有种种独特之处,但却完全可以归入欧洲历史的主流文化,尤其是其天主教信仰:自从它皈依基督教信仰后,就成为“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

一部分。波兰自己的神话认为：波兰是基督教世界的庇护所——天主教和拉丁基督教的守护者，与土耳其帝国的伊斯兰教乃至东部俄罗斯的东正教相对抗。但历史进程中的事实当然更加复杂，作者坚定地希望可以把这些史实传达给我们的新读者。

但是到今天，波兰一直被称为是“欧洲”文化、宗教、地理的十字路口。它早期的君主从来没能把波兰联合成一个强大、统一的君主国家。随着国家的扩大，其版图也因为传统、宗教和语言的相异而变得极其不同。波兰的统治者缺乏实力和资源，将这些融合为一个统一而集中的实体。结果导致君主政治与强大的地方共和力量[主要代表是波兰的什拉赫塔(*szlachta*)^①阶层]之间始终不够和谐。贵族对任何能加强君主统治的努力表示怀疑，担心这样做最终会导致他们的特权被削减，因而阻挠一切为建立一个更加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作出的努力。波兰的邻国及时发展起更有效率和侵略性的政治军事机构，在 18 世纪晚期的可怕竞争中，波兰为自己的软弱付出了代价，它被三个强大的邻国所瓜分：俄罗斯、普鲁士(诸多德意志邦国中最强大的)以及奥地利。

比较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常常是很困难的。但是也许可以对 18 世纪的波兰和 19 世纪的中国进行一个局部的比较。两个国家都想独立于世界之外。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两个国家都想尝试现代化，使它们的机制能够经得起强有力的挑战。然而，它们意识到需要实现现代化还是太晚了。尽管他们最有远见的政治家都有良好的意愿，但这两个国家最初改革的“成效”却是国家受辱，甚至连继续作为独立政治体而存在都岌岌可危。尽管如此，两个国家的文化和传统是如此强大，这足以使它们幸存下来并繁荣发展。

波兰的贵族于 1795 年丧失了他们的国家，但旧波兰的遗产也没那么容易就被瓜分势力所扫除。虽然被新疆界所分割，但是波兰贵族保留了对其民族和社会身份的强烈认同感。大多数什拉赫塔共享的上层文

① 泛指波兰的贵族阶层，但其主体不包括一些与王室联系紧密、历史悠久的权贵大家族。关于这一阶层的形成和构成状况，可参见本书 P60 - 62。——编者注

化和天主教教义,仍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数量庞大且分布广泛的什拉赫塔阶层给瓜分势力制造了很多的麻烦。19世纪,波兰的精英们对祖国的困境作出了不同反应:协作、反抗、期望得到外国支援,这些在这一时期被分割的波兰复杂的历史中均有体现,有时甚至是重叠的。人们逐渐意识到,应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民族斗争中来,这就导致了波兰民族运动的激进化。原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所辖土地上农奴的逐渐消失及拥有部分土地的农民的出现,还有部分地区的工业化,都为波兰社会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这同样也为现代政治运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的出现做出了贡献。对民族和语言的日渐重视增强了大多数讲波兰语的人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但是同时也疏离了之前波兰土地上讲其他语言的民族群体。20世纪早期,许多相互竞争的民族运动竞相影响着旧日波兰的土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血腥的混乱中确实浮现出一个波兰人的国家,而三个曾经分割旧波兰的国家被击败。虽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共和国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它国内的问题太多,地缘政治的地位极不稳定。1939年,波兰成为两个强大邻居的牺牲品:纳粹德国和苏联。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对外国入侵者的抵抗,与中国在这些年经历的苦难相比较,也许从中可以发现一些相似之处。

然而与中国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入波兰的新政治与经济体制是被外国强加的。许多波兰人对苏联充满怀疑并带有敌意,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被视为与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的舶来品。这个政体在1956年后对各方面的约束逐渐减少:私人农场的恢复、大部分民众似乎坚定不移的天主教信仰、思想和文化一定程度上的多元化,这些都使波兰成为苏维埃集团中一个与众不同的成员。然而,经济效率低下和基础物资匮乏(在与西欧的发展对比之下更加令人痛苦)仍然是其弊病,由此导致波兰再三的动乱,并在1980年兴起的“团结工会”运动中达到顶峰。1989年苏维埃政体结束后,波兰着手实施国内改革以及推行与西方政治经济结构相结合的新政策。

波兰的历史发展和传统与中国大为迥异,在某些方面尤为显著。

但是仍存在一些相似的因素：近代时期为国家独立的抗争、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在世界各地数量庞大的海外侨民的存在。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这本著作（一直将波兰的故事书写到 2005 年）能够促进汉语世界对波兰历史的认识，并有助于两国更好地相互理解。

耶日·卢克瓦斯基 (Jerzy Lukowski) 赫伯特·扎瓦德基
(Hubert Zawadzki)

大事年表

- 966 年 梅什科一世大公统治下的波兰领土开始接受基督教。 xxiii
- 约 980 年 格但斯克港建立。
- 997 年 布拉格的沃捷特克(阿达尔伯特)主教在一个去普鲁士的基督教使团中殉难。
- 1078 年 克拉科夫的斯坦尼斯瓦夫被处决。
- 1138 年 “歪嘴”鲍莱斯瓦夫大公的遗嘱打开了一条让波兰领土长期分裂的道路。
- 1227 年 条顿骑士团在维斯瓦河左岸建立。
- 1295 年 普热梅斯乌二世加冕为波兰国王。
- 1307 年 条顿骑士团占领格但斯克。
- 1309 年 条顿骑士团在马林堡(马尔博克)建立他们的总部。
- 1320 年 瓦迪斯瓦夫一世沃凯塔克在克拉科夫加冕为波兰国王。
- 1340 年 国王卡齐米日三世开始将领土扩张至位于波兰东南部的罗斯公国。
- 1343 年 卡利什条约：国王卡齐米日三世承认条顿骑

- 士团对格但斯克和波美拉尼亚的占有。
- 1348 年 《纳梅斯武夫条约》：国王卡齐米日三世承认卢森堡在西里西亚的统治。
- 1364 — 1400 年 克拉科夫大学(雅盖洛大学)的成立和再建。
- 1374 年 国王路易向波兰贵族发布科希策特权法令。
- 1385 年 《克列沃条约》为立陶宛的雅盖洛在波兰就任铺平道路。
- 1386 年 雅盖洛皈依天主教,称为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洛。
- xxiv 1387 年 立陶宛公国开始皈依拉丁天主教。
- 1410 年 7 月 15 日 波兰和立陶宛联军在格伦瓦尔德战役大胜条顿骑士团。
- 1422 — 1430 年 契尔文斯基和耶德尔尼亚特权法令：经合法程序证明其有罪。
- 1454 年 3 月 6 日 国王卡齐米日四世颁布将普鲁士土地合并到波兰王冠王国。
- 1454 年 波兰与条顿骑士团打响“十三年战争”；颁布涅沙瓦法令。
- 1466 年 10 月 19 日 “十三年战争”以《托伦和约》作为结束：王室普鲁士合并到波兰。
- 1505 年 “毫无新内容的”宪法规定特权。
- 1514 年 立陶宛将斯摩棱斯克失于莫斯科公国。
- 1525 年 路德教信仰正式在普鲁士公国确立；条顿骑士团的土地还俗。
- 1525 年 4 月 8 日 《克拉科夫条约》：霍亨索伦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接受普鲁士公国,并作为波兰统治的一个藩属国。
- 1561 年 立沃尼亚合并到波兰；库尔兰公国成立,为波兰的一个藩属国。

- 1569年7月4日 波兰-立陶宛在卢布林订立合并条约。
- 1572年7月7日 齐格蒙特二世逝世,雅盖洛王朝结束。
- 1573年 华沙联盟:正式允许不同的宗教派别在波兰共存;法国瓦卢瓦家族的亨利成为第一位由波兰贵族采取自由选王制选出的国王。
- 1578年 波兰王冠王国特等法庭创建。
- 1581年 立陶宛公国特等法庭创建。
- 1596年 布列斯特联盟: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联盟。
- 1610—1611年 波兰在“动乱时期”占领莫斯科。
- 1619—1629年 波兰-瑞典战争,期间波兰将大部分立沃尼亚失于瑞典。
- 1620—1621年 波兰-突厥战争。
- 1632—1634年 波兰和莫斯科公国之间的斯摩棱斯克战争。
- 1648年 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乌克兰民族起义。
- 1652年 瓦迪斯瓦夫·西青斯基是第一位通过自由否决权中断全国议会的个人特使。
- 1654年1月18日 乌克兰和俄国莫斯科公国建立彼列雅斯拉夫联盟。
- 1655年 莫斯科公国和瑞典入侵波兰共和国:“洪水”开始。
- 1657年9月19日 《韦拉瓦条约》:波兰放弃其对普鲁士公国的主权。 xxv
- 1660年5月8日 《奥利瓦和约》结束了波兰-瑞典战争。
- 1667年1月30日 《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结束波俄战争:波兰将东部乌克兰割让给莫斯科公国(由1686年5月6日的《莫斯科条约》确定)。
- 1672年10月18日 布恰奇条约:波兰割让波多尔和卡敏涅茨-波多利亚,给突厥人。

- 1697 年 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当选波兰国王,为奥古斯特二世。
- 1699 年 1 月 22 日 《卡尔洛维茨和约》:波兰重新获得波多尔和卡敏涅茨-波多利亚。
- 1700 年 北方战争开始(结束于 1721 年)。
- 1704 年 7 月 12 日 斯坦尼斯瓦夫·列什琴斯基当选,作为瑞典支持的非正统国王。
- 1709 年 7 月 8 日 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战役中击败查理十二世。
- 1717 年 2 月 1 日 寂静的全国议会。
- 1733 年 斯坦尼斯瓦夫·列什琴斯基与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分别被拥立为国王。
- 1733—1736 年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俄国的干涉确保波兰王位授予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成为奥古斯特三世。
- 1740 年 斯坦尼斯瓦夫·康纳斯基创立执行管理委员会。
- 1756—1763 年 七年战争:中立国波兰作为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军队的“路边旅馆”。
- 1763 年 10 月 5 日 奥古斯特三世逝世。
- 1764 年 5 月 全国议会改革。
- 1764 年 9 月 6 日 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当选国王。
- 1768 年 2 月 巴尔党人挑起波兰内战。
- 1772 年 8 月 5 日 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达成《圣彼得堡协定》:第一次瓜分波兰。
- 1773 年 10 月 14 日 建立国民教育委员会。
- 1788—1792 年 四年议会。
- 1791 年 5 月 3 日 制定一个改革宪法。
- 1793 年 1 月 23 日 《圣彼得堡条约》:俄国和普鲁士达成协议,第

- 二次瓜分波兰。
- 1794年3—10月 科希秋什科起义。
- 1795年1月3日 《圣彼得堡条约》：俄国和奥地利达成协议，第三次瓜分波兰(10月24日普鲁士接受)。
- 1795年11月25日 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退位。
- 1798年2月12日 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逝世。
- 1798—1800年 在法国保护下的波兰军团在意大利建立。
- 1803年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维尔诺重开一座波兰大学。
- 1805年 查尔托雷斯基意图联合俄国光复波兰的计划粉碎(10月)。
- 1807年 创立拿破仑一世的华沙公国(7月);在华沙公国废除农奴制度。
- 1809年 华沙公国扩大(10月)。
- 1812年 波兰参与拿破仑对莫斯科的远征。
- 1813年 俄国武装占领华沙公国。
- 1815年 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关于波兰问题谈判(5月3日);《维也纳条约》(6月9日):“会议”波兰王国建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作为国王;波森公国和克拉科夫自由市建立;亚历山大一世为波兰王国引入宪法(12月24日)。
- 1816年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建立华沙大学。
- 1818年 “会议”波兰王国的第一届议会首次召开(3月27日)。
- 1820年 “会议”波兰王国第二届议会(9月13日):亚历山大一世警告滥用特权;亚当·密茨凯维奇创作《青春颂》。

- 1821 年 亚历山大一世宣布“议会”波兰王国所有的秘密组织为非法(11 月)。
- 1823 年 查尔托雷斯基解除了作为维尔诺大学监护人的职务(10 月)。
- 1825 年 沙皇尼古拉一世继位亚历山大一世成为波兰国王(12 月 1 日)。
- 1827 — 1828 年 波兰的“十二月党人”审判。
- 1830 年 反对俄国统治的十一月起义(始于 11 月 29 日)。
- 1831 年 尼古拉一世由波兰议会免职(1 月 25 日);波俄战争;华沙沦陷(9 月);“大移民”的开始。
- 1832 年 尼古拉一世的有机条例废除了波兰《宪法》(2 月);波兰民主协会在巴黎成立(3 月)。
- 1834 年 密茨凯维奇在巴黎出版《塔杜施先生》。
- 1839 年 希腊天主教会由俄国东正教会吸收。
- 1840 年 俄国法律在帝国的西部固柏利替代立陶宛法令。
- 1846 年 克拉科夫起义(2 月);在加利西亚西部波兰贵族被农民杀害(2 — 3 月);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11 月 16 日)。
- 1848 — 1849 年 波兰参加“国家之春”;波兹南尼亚、克拉科夫和利沃夫发生起义;奥地利帝国废除农奴制度。
- 1850 年 俄国与波兰王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废除。
- 1861 年 俄国废除农奴制(2 月);华沙动荡不安;侯爵维洛普斯基受命为“会议”波兰王国的民政长官(3 月);犹太人在“会议”波兰王国得到平等的权利。
- 1863 年 在俄属波兰爆发反对俄国统治的起义(1 月

- 22日)。
- 1864年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授予波兰王国的农民慷慨的财产权(3月);处决最后起义领袖罗·特劳古特(8月5日)。
- 1869年 在奥属波兰(加利西亚)引进各省自治。
- 1872年 在普属波兰强制引入德语教学。
- 1873年 俾斯麦的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扩展到普属波兰。
- 1882年 波兰土地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由路德维克·瓦伦斯基建立。
- 1886年 俾斯麦创建了一个出钱购买波兰人在普鲁士拥有的地产,产权的基金。
- 1887年 波兰人在普鲁士成立了一个土地银行。
- 1892年 波兰社会党(PPS)在巴黎成立(11月)。
- 1893年 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DKP)由罗莎·卢森堡在华沙成立(7月);1900年改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DKPiL)。
- 1895年 波兰农民党在热舒夫成立(8月)。
- 1897年 国家民主党由罗曼·德莫夫斯基创立。
- 1905年 俄国(同样也在俄属波兰)革命;《十月宣言》承诺在俄国内推行自由主义。
- 1906年 在圣彼得堡召开第一次杜马会议;波兰社会党分裂(11月)。
- 1907年 奥地利引进男性普选权。
- 1911年 俄国西部固柏利引入地方议会。
- 1912年 海乌姆诺地区从波兰王国分离出来,合并到俄国。
- 191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毕苏茨基的军团进入俄属波兰,但战果不显(8月6—9日);俄国

- 总指挥宣告承诺建立一个在沙皇统治下再统一的波兰(8月14日)。
- 1916年 德奥两国皇帝发布宣告,许诺恢复波兰王国(11月5日)。
- 1917年 在法国成立一支波兰军队(6月);德莫夫斯基在巴黎创立波兰民族委员会(8月15日);在德占华沙建立摄政委员会(10月15日);立陶宛的苏维埃理事会(taryba)号召立陶宛独立(11月11日)。
- 1918年 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包括一个独立的、带有出海口的波兰(1月8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3月3日)签署;白俄罗斯国家委员会在明斯克宣布白俄罗斯独立(3月25日);波兰-乌克兰就对利沃夫和东加利西亚的控制权的战争打响(10月31日);在华沙宣布波兰独立(11月11日);毕苏茨基在华沙接管全国政权;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成立(12月16日);在波兹南尼亚开始成功的反德起义(12月27日)。
- 1919年 新生波兰选举第一次全国议会(1月26日);国家民主党是最大的党派;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承认波兰的独立(2月24—27日);《凡尔赛和约》将波兹南尼亚和西普鲁士(所谓的“波兰走廊”)移交给波兰(6月28日);波兰武装占领维尔诺(4月19日)和明斯克(8月8日);波兰人建立起对东加利西亚的完全控制(6—7月);由大国提出的“寇松线”作为波兰临时的东部边界(12月8日)。
- 1920年 波兰-乌克兰联盟建立(4月21日);波兰武装

- 进入基辅(5月8日);在东普鲁士南部举行公民投票(7月11日);在维托斯领导下联合成立国防政府(7月24日);布尔什维克反攻华沙(8月16—18日);“暴动的”波兰武装夺取维尔诺(10月9日)。
- 1921年 法波联盟(2月9日);《波兰-罗马尼亚防卫条约》(3月3日);新宪法实施(3月17日);在上西里西亚举行公民投票(3月20日);维托斯的中左政府垮台(6月);德波瓜分上西里西亚(10月20日)。 xxix
- 1922年 波兰合并维尔诺(3月24日)。总统纳鲁托维奇遭到暗杀(12月16日)。
- 1923年 巴黎的大使会议承认波兰的东部边界(3月15日);维托斯领导的中右联合政府(5月—12月);斯坦尼斯瓦夫·格拉布斯基领导的无党派政府(12月9日)。
- 1924年 货币改革:波兰兹罗提引入(4月)。
- 1925年 开始在格丁尼亚建造新的港口;与天主教之间达成协议(2月10日);德波关税战争打响(6月15日);在亚历山大·斯克任斯基领导下的一个重要联合政府取代格拉布斯基的管理(11月20日)。
- 1926年 斯克任斯基辞职(4月5日);维托斯的中右政府(5月10日);毕苏茨基发动军事政变(5月12日):“萨纳齐”政权开始。
- 1928年 创立“与政府合作的无党派同盟”(BBWR);议会选举(3月3日):国家民主党衰落。
- 1929年 中左诸党派形成联盟,反对“萨纳齐”政权(9月);大萧条袭击波兰。

- 1930 年 毕苏茨基担任总理(8月—12月);把毕苏茨基政权的政治对手监禁在布列斯特(9月10日—12月29日);平定加利西亚东部(9月—11月);在11月选举中“与政府合作的无党派同盟”成为最大党派。
- 1931 年 形成一个单独的波兰农民党(PSL)。
- 1932 年 《波苏互不侵犯条约》(7月25日);约瑟夫·贝克上校成为外交部长(11月2日)。
- 1933 年 波德就但泽自由市问题关系紧张(2月—3月)。
- 1934 年 《波德互不侵犯条约》;“波德关税战争”结束(1月26日);《波苏互不侵犯条约》延长十年(2月12日)。
- 1935 年 新的波兰宪法加强了总统权力(4月23日);毕苏茨基元帅逝世(5月12日)。
- 1936 年 中间派反对党政治家形成“莫尔日阵线”(2月);爱德华·里兹-斯米格利(Edward Rydz-Smigly)将军成为波兰元帅(11月10日)。
- xxx
- 1937 年 制定国家发展四年计划,建设中央工业区域(COP)(2月)。
- 1938 年 波兰对立陶宛的最后通牒(3月17日)导致确立外交关系(3月31日);斯大林解散波兰共产党(3月);波兰的最后通牒(9月30日)导致捷克斯洛伐克以切欣投降(10月1日)。
- 1939 年 波兰政府拒绝了希特勒联盟的提议(3月26日);英国担保波兰独立(3月31日);希特勒推翻1934年《波德条约》(4月28日);《法波军事协定》(5月19日);波兰拒绝允许苏联军队穿越自己国土(8月19日);苏德签订协议(8月23—24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1

- 日);苏联军队入侵波兰(9月17日);波兰政府和最高指挥部横穿进入罗马尼亚(9月17—18日);华沙向德国投降(9月27日);苏德划分国界横穿被瓜分的波兰(9月28日);波兰流亡政府在巴黎在西科尔斯基领导下成立(9月30日)。
- 1940年 波兰人开始被放逐到苏联境内(2月);西科尔斯基的政府转移到伦敦(6月);波兰的飞行员参加英国保卫战(8月—9月);建立华沙犹太隔都(10月)。
- 1941年 纳粹入侵苏联(6月22日);西科尔斯基和大使麦斯基在伦敦签订《波苏条约》(7月30日)。
- 1942年 万湖会议(1月):纳粹逐渐肃清在被占波兰的犹太隔都;共产主义波兰工人党(PPR)(1月)创立;国家军(AK)建立(2月14日)。
- 1943年 波兰爱国者联盟在苏联成立(3月);犹太人在华沙犹太隔都举行起义(4月—5月)。“卡廷大屠杀”被揭露(4月);斯大林延缓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4月25日);西科尔斯基将军飞机失事,命丧直布罗陀(7月4日);三国就波兰未来边界问题在德黑兰召开会议并作出决定(11月—12月)。
- 1944年 苏联支持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PKWN)建立(7月22日);波兰军队在卡西诺山战斗(5月),此后又在法莱斯(8月)和阿纳姆(9月);华沙起义(8月1日—10月2日);米科瓦伊契克辞去流亡政府总理职务(11月24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其为“波兰共和国临

- 时政府”(12月31日)。
- 1945年 雅尔塔会议(2月);共产党领导的波兰“临时政府”与苏联签订《波苏友好互助战后合作条约》(4月21日);英国和美国收回他们对波兰在伦敦政府的认可(7月5日);波茨坦会议确立奥得河-尼斯河作为波兰的西部边界(7月-8月);《波苏边界条约》(8月16日)。
- 1946年 实行工业国有化(1月3日);开始系统地从波兰逐出德国人(6月30日);在凯尔采的反犹太人大屠杀(7月4日);波兰在西方的武装力量解散(9月3日)。
- 1947年 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盟军在波兰赢得了非法操控的选举(1月19日);消灭反共产主义敌对派;华沙政府拒绝参与“马歇尔计划”(7月9日);米柯瓦伊契克(Mikołajczyk)逃到西方(10月21日)。
- 1948年 斯大林主义的政体被引入;波兰社会党联合共产主义者成立波兰统一工人党(PZPR)(12月15-21日)。
- 1949年 中央经济计划部创立(2月10日);前共产主义统一农民党成立(11月27-29日);实行农场集体化。
- 1950年 为快速工业化实行六年计划(7月21日)。
- 1951年 哥穆尔卡遭到逮捕(8月2日)。
- 1952年 波兰语广播第一次从慕尼黑通过“自由欧洲”传播(5月3日);引进斯大林主义的《宪法》:宣布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7月22日)。
- 1954年 约瑟夫·希文艾迪罗在“自由欧洲”广播中揭露波兰公安军的黑幕(12月)。

- 1955年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谴责斯大林主义的镇压(1月21—24日);《华沙条约》缔结(5月14日)。
- 1956年 波兹南工人起义(6月28—29日);哥穆尔卡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10月21日);斯大林主义在波兰结束;红衣主教维辛斯基从拘留中释放(10月29日)。
- 1965年 《波苏友好条约》延长20年(4月8日);波兰主教向德国罗马天主教发出和解信(11月18日)。
- 1966年 纪念波兰接受基督教1000年庆典(4月和6月)。
- 1967年 阿以战争(6月)导致共产主义者谴责在波兰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者。
- 1968年 波兰各地学生抗议(3月);统一工人党的反犹运动(3月):强迫犹太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移民出境。
- 1970年 西德承认既存的奥得-尼斯河一线作为波兰的西部边界(12月7日);格但斯克以及沿海城市发生罢工(12月14—19日);爱德华·盖莱克取代哥穆尔卡成为共产党领导人(12月20日)。
- 1971年 什切青工人举行罢工(1月22—24日)。
- 1972年 梵蒂冈承认在前德国领土上的战后波兰教会的管理(6月)。
- 1975年 赫尔辛基最终协定签订(8月1日):承认战后边界和人权。
- 1976年 在腊多姆举行工人游行(6月25日);成立保卫工人委员会(KOR)(9月23日)。
- 1978年 罗尔·沃伊蒂瓦当选为罗马教皇,称为约

翰·保罗二世。

- 1979年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6月2—10日)。
- 1980年 波兰全面罢工(7月)：“团结工会”创立,由瓦文萨领导(8月16日);米沃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月9日)。
- 1981年 农村团结工会得到当局承认(5月12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取代卡尼亚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10月18日);雅鲁泽尔斯基实行“戒严法”(12月12—13日)。
- 1983年 “戒严法”正式搁浅(7月22日);瓦文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0月5日)。
- 1985年 《华沙条约》再次延长20年(4月26日)。
- 1987年 里根总统结束针对波兰的制裁(2月19日)。
- 1988年 对“自由欧洲广播的人为干扰”结束(1月1日)。
- 1989年 共产主义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召开圆桌会议(2月6日—4月5日);半自由选举(6月4日);戈尔巴乔夫同意波兰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7月3日);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成为第一位工会集团中非共产主义总理(8月19日);波兰不再采用“人民共和国”的称号(12月29日)。
- xxxiii
- 1990年 巴尔采罗维奇的经济改革(1月);统一工人党自行解散(1月27—29日),被一个社会民主党派替代,1991年该党改名民主左翼联盟(SLD);波兰农民党重组(5月);再统一的德国承认奥得河-尼斯河边界(11月14日);瓦文萨接任雅鲁泽尔斯基成为第三共和国的总统(12月)。
- 1991年 《波德友好条约》(6月17日);经济互助会解散(6月)华沙条约组织解散(7月);自第二次

- 世界大战后第一次完全民主选举(10月);波兰承认乌克兰的独立(12月)。
- 1992年 波兰与乌克兰签署《友邻合作条约》(5月18日),之后又与俄国(5月22日)、白俄罗斯(6月23日)签署;哈·苏霍茨卡组建中右政府(7月)。
- 1993年 剩余俄罗斯军队离开波兰(9月18日);瓦·帕夫拉克组成中左政府(10月)。
- 1994年 《波兰-立陶宛条约》(4月)。
- 1995年 波兰兹罗提重新估值(1月);约·奥莱克西领导的中左联盟(3月);亚·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总统(11月)。
- 1996年 弗·齐莫舍维奇成为中左联盟总理(2月7日)。
- 1997年 新的自由《宪法》由全体公民投票认可(5月25日);中右联盟以耶·布泽克作为总理(9月)。
- 1998年 全国议会认可与梵蒂冈之间达成的宗派协约(2月)。
- 1999年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月12日)。
- 2000年 克瓦希涅夫斯基连任总统(10月8日)。
- 2001年 议会选举(9月):团结工会分裂;米莱尔组成中左政府。
- 2003年 波兰参予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3月20日);全国投票决定是否加入欧盟(6月7-8日)。
- 2004年 波兰正式加入欧盟(5月1日);马雷克·贝尔卡组成一个专家政府(6月)。
- 2005年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逝世(4月2日)。

中文版序言 / 1

大事年表 / 1

第一部分 1795 年前的波兰 / 1

第一章 波兰皮亚斯特王朝(? - 1385) / 3

第二章 雅盖洛时期的波兰(1386 - 1572) / 37

第三章 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1572 - 1795) / 82

第二部分 1795 年后的波兰 / 131

第四章 挑战瓜分的革命年代(1795 - 1864) / 133

第五章 转型时期(1864 - 1914) / 177

第六章 独立,得而复失(1914 - 1945) / 209

第七章 共产主义与“冷战”(1945 - 1989) / 268

第八章 一个新的共和国(1989 -) / 303

附录 波兰统治者谱系表 / 323

I 皮亚斯特时期 / 325

II 雅盖洛时期:波兰国王与立陶宛大公 / 326

III 波兰-立陶宛共和国自由选王名单(及其他) / 327

IV 被瓜分波兰领土的统治者 / 328

V 国家元首、总统、共产主义党派领导人

(1918 - 2005) / 329

英文参考文献 / 331

索引 / 344

插图列表

- 图 1 圣母和圣亚历克西斯教堂,坐落于波兰西部近宛兹卡的塔姆。由 the Instytut Sztuki, Polska Akademia Nauk (Institute of Arts of the Polish Academic of Sciences) 提供。照片由 Terzy Langda 所摄。 8
- 图 2 位于马尔博克(马林堡)的条顿骑士城堡及最高行政所在地。由 the Instytut Sztuki, Polska Akademia Nauk (Institute of Arts of the Polish Academic of Sciences) 提供。照片由 Teodor Hermańczyk 所摄,经 Maria Hermańczyk 许可使用。 24
- 图 3 格涅兹诺大教堂内景。由 Instytut Sztuki, Polska Akademia Nauk(Institute of Arts of the Polish Academic of Sciences) 提供。照片由 Jerzy Langda 所摄。 34
- 图 4 国王瓦迪斯瓦夫·雅盖洛的雕像。由 Instytut Sztuki, Polska Akademia Nauk (Institute of Arts of the Polish Academic of Sciences) 提供。照片由 St Kołowca 所摄。 42
- 图 5 1379 — 1380 年间的格但斯克市政厅。由 Instytut Sztuki, Polska Akademia Nauk(Institute of Arts of the Polish Academic of Sciences) 提供。照片由 Witalis Wolny 所摄。 48
- 图 6 1514 年奥尔沙之战。由 Muzeum Narodowe(National Museum),Warsaw 提供。 56
- 图 7 克拉科夫福佑圣母玛丽亚教堂。由 Instytut Sztuki, Polska Akademia Nauk (Institute of Arts of the Polish Academic of Sciences) 提供。照片由 Jerzy Langda 所摄。 64
- 图 8 纽伦堡的维特·斯特沃什(波兰语 Wit Stwosz)在克拉科夫福佑圣母玛丽亚教堂创作的伟大祭坛装饰。由 Instytut Sztuki, Polska Akademia Nauk (Institute of Arts of the Polish Academic of Sciences) 提供。 65
- 图 9 克拉科夫瓦韦尔山上皇宫的景色。由 Wawel Museum 提供。照片由 Łukasz Schuster 所摄。 69
- 图 10 克拉科夫瓦韦尔宫中齐格蒙特一世的文艺复兴庭院。由 Wawel Museum 提供。照片由乌卡兹·许斯特所摄。 70
- 图 11 克拉科夫中心广场上的纺织大厦,1555 年在一场火灾后得到重建。照片由

- Łukasz Schuster 所摄。 73
- 图 12 扎莫什奇市政厅。由 Instytut Sztuki, Polska Akademia Nauk (Institute of Arts of the Polish Academic of Sciences) 提供。照片由 E. Kozłowska 所摄, 经 Ludwik Tomczyk 许可使用。 88
- 图 13 华沙的王宫城堡。由 Royal Castle Museum, Warsaw 提供。 94
- 图 14 卡齐米日多尔尼, 圣尼古拉斯的市镇住宅和货栈。由 Instytut Sztuki, Polska Akademia Nauk (Institute of Arts of the Polish Academic of Sciences) 提供。拍摄者不详。 96
- 图 15 1655 年 11—12 月, 明山圣保罗修道院对抗瑞典的防卫战版画。由 Gabriel Bodenehr 雕刻。 98
- 图 16 一位胖胖的波兰贵族(什拉赫塔)。由 Fundacja XX Czartoryskich przy Muzeum Narodowym w Krakowie 提供。 107
- 图 17 一位瘦瘦的波兰贵族(什拉赫塔)。由 Fundacja XX Czartoryskich przy Muzeum Narodowym w Krakowie 提供。 109
- 图 18 让-皮埃尔·诺布林所画的一幅关于地方议会在教堂外开会的素描(地方集合议会)。由 Muzeum Narodowe(National Museum), Krakow 提供。 111
- 图 19 小卡纳莱托(安东尼奥·欧根尼奥·贝洛托, Antonio Eugenio Bellotto 1721—1780)所画 1764 年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选举场面。由 Royal Castle Museum, Warsaw 提供。 112
- 图 20 杨·马迪依科(1838—1893)所画在 1773 年全国议会上的雷耶坦。由 Royal Castle Museum, Warsaw 提供。 119
- 图 21 让-皮埃尔·诺布林所画关于 1791 年 5 月 3 日《宪法》宣誓场景的素描。由 Muzeum Narodowe(National Museum), Warsaw 提供。 124
- 图 22a 和 22b 消失的波兰。乌克兰的里夫涅(今罗夫诺)的两幅卢博米尔斯基宫风景画。由 Instytut Sztuki, Polska Akademia Nauk(Institute of Arts of the Polish Academic of Sciences) 提供。照片由 Witalis Wolny 和 Henryk Poddębski 所摄, 经 Krystyna Kukięła 许可使用。 128
- 图 23 拿破仑给华沙公爵授予《宪法》。由 Muzeum Narodowe(National Museum), Warsaw 提供。照片由 H. Romanowsk 拍摄。 139
- 图 24 亚历山大一世与 1816 年建立的华沙大学。由 Muzeum Narodowe(National Museum), Warsaw 提供。照片由 Piotr Ligie 拍摄。 148
- 图 25 波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画像。由 Muzeum

- Narodowe(National Museum),Warsaw 提供。照片由 H. Romanowski 拍摄。 154
- 图 26 1831 年 2 月 25 日格罗霍夫战役。由 Muzeum Wojska Polskiego 提供。 156
- 图 27 “有机工作”在运转中：在波兹南的采盖尔斯基工厂。由 Muzeum Narodowe (NationalMuseum),Poznan 提供。照片由 B. Drzewiecka 拍摄。 163
- 图 28 教堂关闭。由阿尔多尔·格罗特盖(1837—1867)于 1861 年绘制,Muzeum Narodowe(National Museum),Warsaw 提供。 171
- 图 29 位于“波兰的曼彻斯特”——罗兹的卡尔·威廉·沙伊布莱尔棉厂的纺织车间。由 Adam Zamoyski 提供。 182
- 图 30 玛丽亚·居里-斯科瓦多夫斯卡。由 Maria Skłodowska-Curie Society, Warsaw 提供。 184
- 图 31 普里佩特农民生活一景。Zawadzki family 收藏。 186
- 图 32 犹太新年。由 Muzeum Narodowe(National Museum),Warsaw 提供。 189
- 图 33 1908 年在格罗德诺举办的狩猎聚会。Protassewicz family 收藏。 200
- 图 34 斯坦尼斯瓦夫·维斯皮安斯基(1869—1907)在 1902 年的自画像。由 Muzeum Narodowe (National Museum),Warsaw 提供。照片由 Henryk Romanowski 拍摄。 202
- 图 35 位于加利西亚的利沃夫的市政剧院。由 Instytut Sztuki, Polska Akademia Nauk (Institute of Arts of the Polish Academic of Sciences) 提供。照片由 Roman Wesołowski 拍摄。 206
- 图 36 维尔诺的圣母像。由 Michał Giedroyć 提供。 207
- 图 37 1918 年波兰民族委员会在巴黎。由 Archiwum Dokumentacji Mechanicznej (Archive of Mechanical Documentation) 提供。 212
- 图 38 1919 年 8 月在白俄罗斯的斯卢茨克的波兰骑兵。由华沙的 Tomasz Kopański 收藏提供。照片由 Anna Koch 拍摄。 219
- 图 39 1920 年在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期间的一辆波兰装甲火车“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号”。由华沙的 Tomasz Kopański 收藏提供。 221
- 图 40 20 世纪 30 年代波兰新的格丁尼亚港。由 Archiwum Dokumentacji Mechanicznej (Archive of Mechanical Documentation) 提供。 229
- 图 41 1926 年政变。由 Jozef Pi 提供。 232
- 图 42 波兰电影明星雅德薇嘉·斯莫萨尔斯嘉。由华沙机械文档文件(Archiwum Dokumentacji Mechanicznej) 提供。 233

- 图 43 1936 年在波兰南部新松奇附近正在收获的农民。由华沙机械文档文件 (Archiwum Dokumentacji Mechanicznej) 提供。 240
- 图 44 波兰技术最先进的轰炸机, PZL P. 37 Łoś ('Elk')。由华沙 Tomasz Kopański 收藏提供。 243
- 图 45 反映大屠杀的艺术作品。由 Muzeum Narodowe (National Museum), Warsaw 提供, 照片由 Henryk Romanowski 拍摄。 250
- 图 46 1944 年 9 月初在诺曼底的波兰坦克。由 Polish Instituer 和 General Sikorski Museum, London 提供。 257
- 图 47 1944 年的华沙起义。由 Archiwum Dokumentacji Mechanicznej 提供。 260
- 图 48 1945 年春, 一片废墟的华沙街头排起打水的长龙。由周刊 *Polityka* (华沙) 提供。 269
- 图 49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为大众带来文化。由 Muzeum Zamoyskich, Kozłówka 提供。 275
- 图 50 1953 年 11 月, 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在英国探访一个难民营。由 Polish Instituer 和 General Sikorski Museum, London 提供。 277
- 图 51 1956 年 10 月 24 日,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对华沙人民做演讲。由 Archiwum Dokumentacji Mechanicznej 提供。 281
- 图 52 1966 年 5 月 3 日, 维辛斯基主教在琴斯托霍瓦的光明山修道院庆祝基督教传入波兰千年的庆典上。由 Archiwum Dokumentacji Mechanicznej 提供。 285
- 图 53 1974 年 9 月, 爱德华·盖莱克同志看望上西里西亚地区雷杜乌托维 (Rydułtowy) 镇的矿工们。由 Archiwum Dokumentacji Mechanicznej 提供, 照片由 Stanisław Jakubowski 拍摄。 290
- 图 54 1979 年 6 月 2 日, 克拉科夫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在其作为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回到波兰时检阅仪仗队。由 Archiwum Dokumentacji Mechanicznej, Warsaw 提供, 照片由 Damazy Kwiatkowski 拍摄, 经 Polish Press Agency, Warsaw 许可使用。 293
- 图 55 1980 年 8 月 31 日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 莱赫·瓦文萨 (手握大笔) 在签署成立团结工会的协议。由 Archiwum Dokumentacji Mechanicznej 提供, 照片由 Trybek 拍摄。 294
- 图 56 共产主义波兰认为可怕的人物。由 Wrocław 的 Wydawnictwo Dolnośląskie 出版社提供。出版于库伦 (J. Kurón) 和扎科夫斯基 (J. Żakowski) 所著的 *PLA dla początkujących*, 在 ('A to Polska Wlasnie') 丛书中 (弗罗茨瓦夫,

- 1998),第 245 页。 298
- 图 57 1999 年 2 月 26 日,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签署波兰加入北约的条约。由 Polska Agencja Prasowa (Polish Press Agency),Warsaw 提供,照片由 Leszek Wróblewski 拍摄。 306
- 图 58 漫画《波兰回归欧洲》。由 Andrzej Mleczek 提供。 320

地图列表

- 地图 1 早期的皮亚斯特波兰(约公元 1000 年) 12 - 13
- 地图 2 伟大的卡齐米日统治下的波兰(1333 - 1370) 26 - 27
- 地图 3 雅盖洛统治时期的波兰(1386 - 1572) 44 - 45
- 地图 4 16 世纪晚期和 17 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 100 - 101
- 地图 5 18 世纪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 116 - 117
- 地图 6 华沙公国(1807 - 1815) 140 - 141
- 地图 7 被瓜分的波兰(1815 - 1914) 146 - 147
- 地图 8 波兰国家的新生(1918 - 1923) 216 - 217
- 地图 9 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波兰:包括众多民族和信仰的土地 224 - 225
- 地图 1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波兰(1939 - 1944) 246 - 247
- 地图 11 波兰“向西方靠近”(1945) 262 - 263
- 地图 12 波兰和它的新“邻居”们(1989 - 2005) 308 - 309
- 地图 13 2003 年波兰加入欧盟的全民公投 317 - 318

第一部分

1795 年前的波兰



第一章 波兰皮亚斯特王朝(? — 1385)

大约在公元 1200 年时,波兰首位本土编年史作者文森特·克拉科夫大主教(Bishop Vincent Kraków)在其一本编年史著作中骄傲地声称:罗马人从来没有征服过波兰。但现代历史学家觉得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罗马既没有征服波兰,但也没有放弃波兰,这里并没有一个可以作为历史研究起点而得到广泛认可的元年。公元 966 年可以充当这个元年,因为在这一年,统治着这片开始以“波兰”之名为人所知的土地的梅什科(Mieszko)大公,接受并开始强制推行拉丁基督教。我们对于这一事件以及接下来 100 年左右时间里发生的事情皆知之甚少。只是到了 14 世纪,文本记录才开始对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事情加以猜测和假设。比文森特大主教早 80 年,一个可能来自法国的不知名牧师(人们叫他 Gall-Anonim,“无名的高卢人”)创作了一本波兰本土最早的编年史。此外,来自考古学以及地名学的证据、国外研究者以及旅行者的描述,与民间传说相比都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而此前,“无名的高卢人”主要依赖民间传说认定这个国家的建立者是一个叫做“皮亚斯特”(Piaŝt)^①的成功农

3

^① “皮亚斯特”这个称号是到了 17 世纪末期才由西里西亚的古文物研究者用来称呼那个最初的王朝的,中世纪的原始资料所用的一般是:“duces et principes Poloniac”(意为“波兰的公爵与王公”)之类的称号。

民冒险家,他于公元 9 世纪的某一年推翻了前任暴君波皮耶尔 (Popiel)(据说此人是被饿鼠啃噬致死)。当今的历史学家更倾向于认为梅什科的直系祖先齐莫维特 (Siemowit)、莱谢克 (Lestek) 和齐莫美斯乌 (Siemomysl) 是真实存在的,而不仅仅是“无名的高卢人”想象的虚构。正是他们为后来以格涅兹诺 (Gniezno) 和波兹南 (Poznań) 为商业和政治中心的波兰王国 (*Regnum Poloniae*) 奠定了早期基础。而同时代的拜占庭和日耳曼人的编年史中也有关于莱谢克的记载。

20 世纪后半期又给波兰历史添加了新的神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40 年左右,波兰史学界习惯于描述一个这样的“波兰皮亚斯特王朝” (Piast Poland): 其国家的疆界竟与 1945 年之后的波兰领土面积难以置信地吻合。这不仅反映了一个极不受欢迎的共产党政权通过溯本求源来使自身合法化的尝试,同时,这也标志着在经历了 1 000 年边界变动不居的情况之后,人们对于稳定的真实诉求: 在这 1 000 年当中,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国之边界可以收缩、扩张、扭曲甚至消失,使得一群人时而被囊括在内,时而又被排除在外,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到今天都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身份: 波兰人? 德国人? 乌克兰人? 犹太人? 白俄罗斯人? 还是立陶宛人?

“Polak”这个词 (*Polonus*、*Polanus*、*Polenus* 是中世纪拉丁语中的常用形式) 来源于“田地” (*Pole*), “平原” (*plain*) 或是“空地” (*clearing*), 意为“波兰人 (*Polanie*) 之地”。这些“波兰人”生活在今天波兰西部瓦尔特河流域的中部。尽管当时这一地区可能有些偏远,但却并不与世隔绝。即使是在罗马时代,也已经有一条完善的贸易通道将波罗的海南岸和它广受赞誉的琥珀资源与地中海周围的欧洲世界联系起来。在 9、10、11 世纪时期,首先作为堡垒要塞而存在的格洛迪 (*Grody*) 容纳了驻军和高级官员,既有统治者的行政机构,又有一些小的商业社区,甚至还有一些零星的犹太贸易中心。它逐渐发展起来,能力为贯通莱茵兰 (*Rhineland*)、德意志、波希米亚 (*Bohemia*) 与基辅 (*Kiev*)、拜占庭和东方诸国横跨大陆的、艰辛的贸易线提供服务。13 世纪的时候,西方的这些据点的重要性逐渐为人所知,并被冠以“大波兰”

(*Wielkopolska, Polonia Maior*)的名号,以区别于南部和东南部的“小波兰”(Małopolska, *Polonia Minor*)。将波兰人与他们的邻居还有欧亚大草原上众多民族连接到一起的是语言——“Słowo”。相互之间交流无碍的人群是斯洛文尼亚人(*Słowianie*)、斯洛伐克人(*Sclavinii*)、斯拉夫人(*Slavs*),与此相对的是说着波兰人、捷克人、俄罗斯人完全听不懂的语言的“哑人”(Niemcy)。“哑人”(dumb one)主要来自日耳曼语世界——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和洛林人。但“哑人”并不在意这种语言侮辱(因为占有实际优势的是他们)。无论是生活在易北河以东还是多瑙河以北的异教斯拉夫人,都可以合法地被捕为奴。正是在威尼斯这座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Sclavus”这个词首次同时成为“斯拉夫人”(Slav)和“奴隶”(slave)的同义词——很多被商人们买卖的奴隶都是南部的巴尔干斯拉夫人。

5

但是语言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团结。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中间地带的斯拉夫部落与他们东部的邻国波兰、西里西亚、捷克发生冲突的几率,并不亚于他们和西方的入侵者发生矛盾的可能性。965年,肯兹(Kenz,也就是波兰的大公)梅什科一世为阻止基督教国家捷克和西部的异教斯拉夫邻国之间结成令人头痛的联盟,与波希米亚大公鲍莱斯瓦夫一世(Boleslav I)的女儿杜布拉娃(Dobrava)联姻。紧接着第二年,梅什科皈依了基督教,这使得他可以有效地利用德意志帝国的人力、军事技术和政治资源,而如果他还是一个异教徒的话,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大部分早期来到波兰的神职人员都是德意志人;梅什科和他的接任者既愿意和德意志帝国的大家族联系,也很乐意与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匈牙利和罗斯王国(Rus' Land)的统治王朝联姻。他们与德意志帝国的边境诸侯就某些边境地区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为了让各国君主认可他们对这些边地的宗主权,他们很愿意献上贡品和战士。梅什科与杜布拉娃的婚姻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皮亚斯特王朝和波希米亚普热梅斯尔王朝(Přemyslid)之间已经存在诸多根深蒂固的利益矛盾,以至于这种家庭纽带很难发挥作用。

在梅什科继位之前,其先辈与德意志帝国当权者的政治联系已是由来已久了。梅什科的父亲齐莫美斯乌可能首次领兵越过了卢布什(Lubiąż /Lebus)附近的奥得河,从西北部攻入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这次西行不可避免地会与在易北河中东部“北马克”(Northern Mark)的统治者发生了冲突,这是一个由德意志皇帝奥托一世(Otto I)建立的、没有确定边界的政治体。其统治者肆意地使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并吞并他们的领土,这一切都以他们所好的种族屠杀方式推进。德意志基督教国家和斯拉夫异教国家之间有时因形势需要会结成联盟。梅什科非常清楚德意志帝国内部的仇恨和权力斗争。甚至早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在964年,他同意将一部分土地作为贡品献给奥托一世。从奥托一世自身的角度讲,他把像梅什科这样的统治者看做对自己的边境诸侯过度膨胀的野心的一种遏制。同样,皈依也可能巩固统治者自身的地位:波兰国内几乎没有一种确定的主要信仰,而只有许多地方化的信仰。基督教是一种集中、统一的宗教,正是它自身的这一本质必然会加强统治者的权力。

波兰与拜占庭相距太远,要皈依其“正统”基督教实在不方便基于类似的理由,在988年皈依基督教的基辅,则将“拉丁”罗马教廷视为过于遥远,影响力不大。梅什科更愿意从波希米亚获取他的新信仰,这或许是为了避免臣服于已经为“北马克”规划好的新大主教区马格德堡(Magdeburg)(在968年波兰皈依2年后成立)。此时德意志帝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需要一些灵活的策略:波希米亚当时隶属于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巴伐利亚主教区管辖。有一种推测认为,在传教士来到波兰之前,梅什科和他的侍从已于966年初在雷根斯堡皈依了基督教。梅什科与巴伐利亚过从甚密,以至于979年奥托二世因为梅什科支持其巴伐利亚敌对者而对其进行了惩罚性的征讨。这次经验使得波兰的统治者认识到凡事不要太过分。梅什科忠心地帮助年轻的奥托三世解决了动摇其早期统治的不少动乱,尤其是983年平定易北河东部斯拉夫异教徒大叛乱。980年前后,他再次成婚,迎娶了一位德意志公主:北马克的迪特里茜(Dietrich)的女儿奥得(Ode)。这次联姻意味

着,他的基督徒身份以及与德意志王国的联系都已经确立。

据阿拉伯犹太商人易卜拉欣·伊本·雅库布(Ibrahim ibn Yakub)称,梅什科有 3 000 重装骑兵和步兵团听命于他。尽管这一评价有鼓吹奉承之嫌(奥托一世皇帝统治的领土上的人口大概是他的 5 倍,也只拥有 5 000 骑兵),但梅什科的武士们的战斗力确实不可小觑,就是这些士兵使得他从自己的波希米亚亲家手中把西里西亚抢夺了过来。他的儿子“勇敢的”鲍莱斯瓦夫一世赫劳布雷(‘Valiant’ Bolesław I Chrobry, 992 - 1026),从波希米亚手中夺取了商业中心克拉科夫和南方内陆地区,把皮亚斯特王朝的领土扩展到喀尔巴阡山脉。这两位统治者将位于维斯图拉河和奥得河之间的三角洲波美拉尼亚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很可能是梅什科在大约 980 年左右建立了格但斯克(Gdańsk)这个港口城市,以此来巩固对维斯图拉河入河口地区的统治。鲍莱斯瓦夫向西劫掠,深入到了仍居住着斯拉夫人的地区,从而将自己的领土扩展到了易北河地区。在 1018 年,亨利二世勉强承认了鲍莱斯瓦夫对奥得河以西的米利兹(Militz)和劳奇兹(Lusatia)的统治。同年,鲍莱斯瓦夫帮助他的妹夫斯维亚托波尔克(Sviatopolk)争夺基辅王位。他甚至一度短暂地统治了捷克、摩拉维亚(Moravia)和今天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区。

对于早期中世纪国家的“经济”来说,几乎每年都要进行的以掠夺人口和物质财富为目的的远征至为重要。但是波兰皮亚斯特王国人口不足百万,国土密布森林、沼泽和石南林,难以连续不断地进行这样的远征。梅什科二世(1025 - 1034)、鲍莱斯瓦夫二世(1058 - 1081)和鲍莱斯瓦夫三世(1102 - 1138)富有侵略性的统治期间充斥着时而爆发的起义、外国的入侵和休养生息。甚至连赫劳布雷也在 1022 年和 1025 年遭遇了严重的叛乱。他不得不放弃波希米亚,而他的继任者也不得不放弃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波兰军队一撤出,受赫劳布雷庇护的斯维亚托波尔克就被他的兄弟——“智者”雅罗斯拉夫(Yaroslav ‘the Wise’)逐出了基辅。梅什科二世不得不放弃米利兹和劳奇兹,在国内的叛乱中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王国,也丢掉了性命。由于异教徒

反攻和波希米亚入侵的压力,波兰面临着分裂的威胁。1034—1039年期间的波兰可能根本就没有统治者(一些编年史学家试图以一个被忽略的鲍莱斯瓦夫来填补这段空缺,但这位鲍莱斯瓦夫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梅什科二世的儿子,“中兴者”卡齐米日一世(Casimir/Kazimierz ‘the Restorer’, 1039—1058)在德意志皇帝和基辅的帮助下,用了至少15年才将其领土重新统一起来。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克拉科夫开始成为波兰的首都,早期的政治中心、大都市格涅兹诺在动乱中遭到严重破坏,以至于暂时不适于居住。

8



图1 波兰现存最早的教堂之一:圣母和圣亚历克西斯教堂(collegiate church of the Blessed Virgin and St Alexis, 1150—1161),坐落于波兰西部近宛兹卡(Łęczyca)的塔姆(Tum)。

易北河东部的斯拉夫部落(如果有的话)很少有虔诚接受基督教的,一直到12世纪,他们生息的边地才逐步置于德意志帝国的有效统治之下;而在1157年,斯拉夫人的布鲁纳堡(Brunabor)才变为德意志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波兰人及与其结盟的部族的命运也是如此。为了免遭他们的西邻、更为执著的斯拉夫同胞那样的厄运,皈依基

基督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比如文德人(Wends),他们一直以异教徒的方式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因而接二连三遭到基督徒的猛烈攻击,直到失去自己的神灵、独立和身份。今天,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大约有5万索布人(Sorbs)连同他们的语言一起流存下来,这一民族和其语言表明,曾经在那些地区生活的民族不是德意志人,而是斯拉夫人。

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基督教只是加剧了业已由统治者四处征伐的军队和驻军带来的负担。而鲍莱斯瓦夫一世则淋漓尽致地扮演了一个基督徒统治者的角色,并被年轻的君主奥托三世看做是推动欧洲斯拉夫民族皈依事业中的同伴。以布拉格的沃捷特克[Vojtěch,即阿达尔伯特(Adalbert)]主教为代表,鲍莱斯瓦夫为波兰找到了首位殉道者(虽然并非本土的)——在997年,沃捷特克被普鲁士的异教徒杀害,而国王本来是派他去劝他们皈依的。两年后他被奉为圣徒。正如沃捷特克一样,早期大部分的神职人员都来自国外。他们由野蛮的国家机器征收的贡赋和什一税供养着。在梅什科一世皈依之后的至少三四代以后,一个独立的本土教士群才出现。12和13世纪修道院和修士出现之后,波兰才开始了更为深入的基督教化过程。在那之前,教会仍是一种外来的和不受欢迎的组织,是精英统治阶层为了追求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扩张野心而强加给民众的。但是这在很重要的一方面把波兰和它的东部斯拉夫邻国区别了开来。新主教们带来了主教区和宗教会议,拥有政治和经济特权,与罗马有着关联,所有这些都最终为政治权威的分化和多样性创造了条件,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垄断。而在更远的东方,东正教以及拜占庭的“国家高于教会”的传统,引导着罗斯国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

伴随着基督教而来的新君主体制的影响力并不大。波兰语中的“king”写作*król*——“Karol”(Charles, Charlemagne)的讹用——反映出它的外来词汇特征。鲍莱斯瓦夫一世、梅什科二世与鲍莱斯瓦夫二世是1296年前波兰仅有的几位加冕的君主。然而,几乎加冕礼一结束,他们都马上面临着叛乱(1025年,1026年和1076年)。反对势力不仅来自底层,梅什科二世就是被一个不满的朝臣所谋杀。鲍莱斯瓦夫



二世仿效赫劳布雷去攻打基辅、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他在权力争夺中支持主教反对德意志君主；他是教堂慷慨的捐助者——但恰恰是一位牧师，克拉科夫主教斯坦尼斯瓦夫(Stanisław)，领导着君主手下的众显要人物反抗君主苛刻的对外政策(因为这些显要人物对农民的统治权受到这项外交政策张力的威胁)。1078年，鲍莱斯瓦夫二世使斯坦尼斯瓦夫在一个服从于他的宗教会议上受到审判，并将其作为叛国者碎尸处死。根据文森特主教的编年史，国王亲自执行了这项处罚。无论这次事件的真相是什么，国王不经意地制造出了波兰首位本国殉道者(斯坦尼斯瓦夫于1253年被封为圣徒)。不到一年，鲍莱斯瓦夫被废黜，并被流放国外(他于1081年死于匈牙利)，取而代之的是他弟弟瓦迪斯瓦夫·赫尔曼(Wodzisław Herman, 1079—1102)，而实权则由帕拉蒂努什(Palatinus)，军队以及驻军城镇格洛迪组织的首领齐切克(Sieciech)控制着。

瓦迪斯瓦夫废兄为王突出反映了皮亚斯特王朝的一个主要缺陷(虽然不是其独有的)——缺乏王位传承的可靠方式。人们普遍认为(尽管证据不足)，就在他死前不久的992年，梅什科一世将波兰置于罗马教皇的直接管辖之下。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满怀着这样的希望：教会的影响或许可以保护他在第二次婚姻中和德意志公主奥德所生的儿子的权利。鲍莱斯瓦夫一世以他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要么就把他的竞争者放逐出国，要么就让他们失明。文森特主教的编年史表明，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任何形式的世袭权力，都要得到对君主个人统治基础的更广泛承认才能得以加强：直到12世纪后期波兰与基督教完全融合以后，梅什科的直系后代的政权才有了彻底的保障。其弟的参与为反抗鲍莱斯瓦夫二世的叛乱提供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瓦迪斯瓦夫的儿子们——兹比格涅夫(Zbigniew)和鲍莱斯瓦夫，在1097年和1100年，为针对他们的父亲和强权领主齐切克的叛乱提供了便利。1109年，亨利五世率兵入侵，正是为了支持兹比格涅夫(他还得到教会上层的支持)反对他年轻而残忍的同父异母弟弟。尽管形式上和解了，但鲍莱斯瓦夫三世仍弄瞎了兹比格涅夫，并于1111年将其处死。鲍莱

斯瓦夫三世的绰号“歪嘴”，更多地是意指其轻易违背诺言的行为而不是什么生理上的残疾。他在 1138 年的遗嘱中也试图解决继承的问题，这次是以一种更文明的方式，通过借鉴基辅的经验：全国的最高统治权将归属于“长王子”(princeps)——5 个儿子中最年长者。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的南部克拉科夫地区和桑多梅日地区将构成“长王子”权力的主要领土基础，并且“长王子”对皮亚斯特王朝留传下来所有主要的世俗和教会职位享有委任的权利。其弟会成为他手下不同地区的总督；(在长子去世的情况下)“长王子”之位将始终属于活着的儿子中年龄最长者。

但这个权宜之计如同在基辅一样没有成功。在 1202 年，皮亚斯特有 5 个公国；在 1250 年，有 9 个；到 1288 年，有 17 个，其中在西里西亚就至少有 10 个。几乎是在“歪嘴”鲍莱斯瓦夫刚一去世，他的第二任妻子贝格的萨洛米(Salomea of Berg)的儿子们，就被他们的母亲和一种可以理解的自我保护感所怂恿，联合起来反对已经任命的最高统治者——鲍莱斯瓦夫的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唯一的儿子——瓦迪斯瓦夫。世俗和教会的显要人物大部分都支持这群年轻人——通过这种帮助以赢得他们的让步和好感。1146 年，“放逐者”瓦迪斯瓦夫被从波兰和他的领地西里西亚逐出，这不仅在皮亚斯特血亲间造成了互不信任的巨大鸿沟，而且还鼓励了新的外部势力干预波兰的国家政务。这是因为瓦迪斯瓦夫娶了德意志君主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同父异母的妹妹；尽管这层联系并没能帮他恢复王位，但是康拉德的接任者，红胡子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 Babarossa)皇帝在 1163 年将瓦迪斯瓦夫的儿子“高个的”鲍莱斯瓦夫(Bolesław the Tall, 1163 - 1201)强行安排到西里西亚，并在这一过程中确保他得到所有皮亚斯特王公对其宗主权的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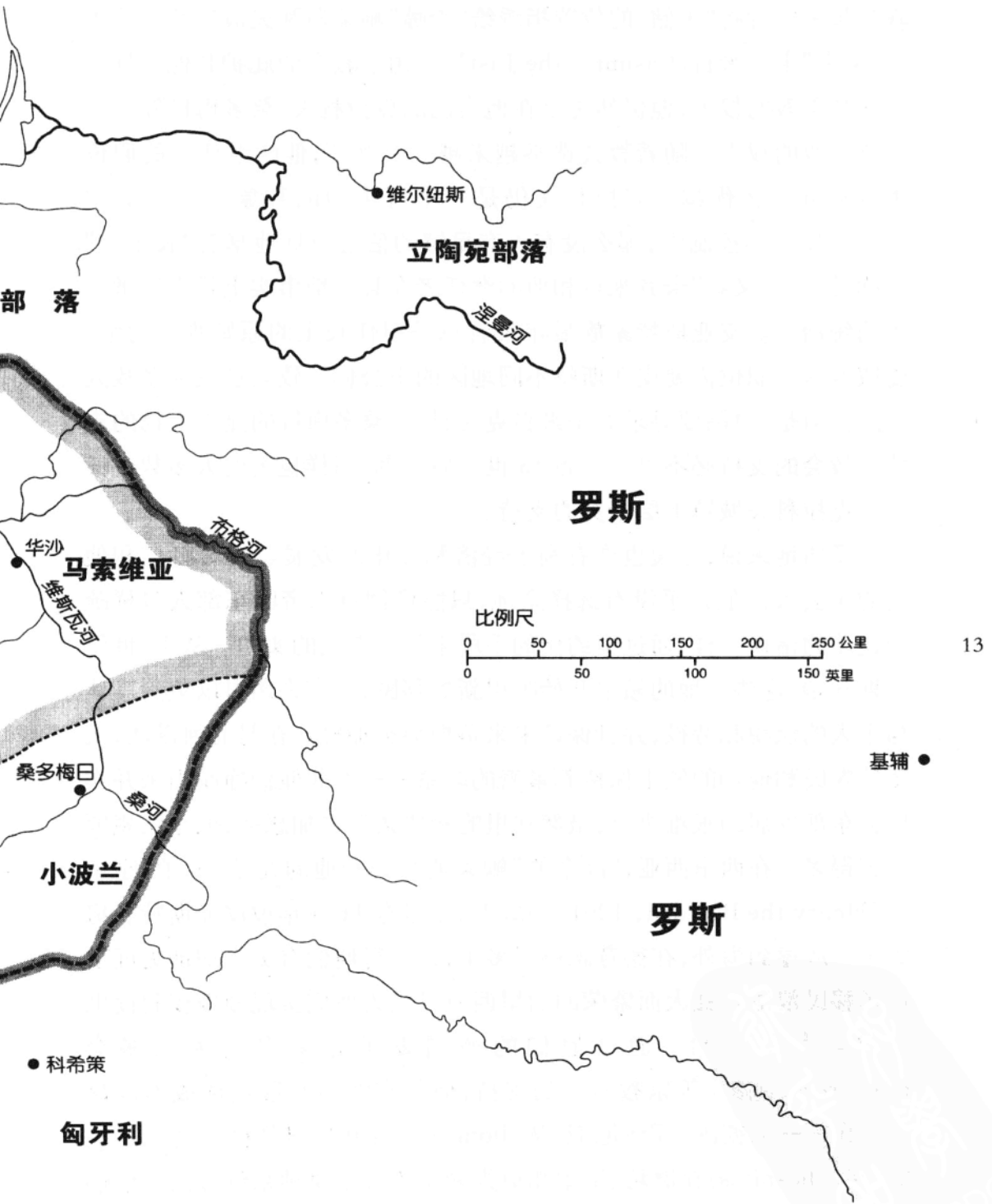
“歪嘴”鲍莱斯瓦夫的小儿子们的团结也没能维持下去。在第一代人中，这个家族最精力旺盛的梅什科三世(其统治时期是 1138 - 1202 年的 64 年，因此他的绰号是“年长者”)为加强他的独裁统治所做的努力引起了持久的反抗。1177 年，他的兄弟、侄子和他自己的儿子

 梅什科一世统治的土地
 鲍莱斯瓦夫一世统治的土地

波罗的海



地图1 早期的皮亚斯特波兰(约公元1000年)



联合起来强行将“王储”的位置指派给“歪嘴”鲍莱斯瓦夫最年幼的儿子“正义者”卡齐米日(Casimir ‘the Just’)。由于教会的庇护和他所拥有的任命主教的权力,他仍然可以在他自己的克拉科夫-桑多梅日领土外行使有效的权力。随着教会选举越来越自有规范,他的继任者的职位也就不再那么优越。克拉科夫仍是一个有声望的和象征意义的地方——如果不控制它,那么没有人有足够的信心声称他享有“长王子”的称号。“正义者”卡齐米日和他的继任者在其领地事实上是靠选举产生的统治者。皮亚斯特家族最年长者总是担任长王的原则难以为继。要取得这一职位需要皮亚斯特不同地区的王公们一致同意或大多数人同意。但是,更需要寻求的是来自克拉科夫-桑多梅日的显耀人物的支持。教会的支持必不可少。到13世纪后半期,同样也需要大多数讲德语的克拉科夫城镇上层精英的支持。

矛盾地来说,分裂也许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统治者们和他们的王公大臣们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像德意志帝国东部人口稀疏的边境的诸侯一样,通过集约化的手段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从12世纪早期开始,这些土地的领主开始吸引新的移民,他们许诺可以免除集体与个人的赋税和劳役,并且保证未来负担会更加轻。在易北河以西,大多数农民和他们的领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除非他们挣脱出来并作出去东部安居的艰难决定,虽然那里的物质条件更加恶劣,但是法规要宽容得多。在西里西亚,“高个的”鲍莱斯瓦夫和他的儿子“胡子”亨里克(Henry the Bearded, 1201—1238),都是在1146年被皮亚斯特长房的子嗣放逐到海外,在德意志待了多年,这使得他们有更真切地见证了这场移民浪潮。强大而繁荣的西里西亚可以为他们实现领地权利提供一个理想的平台。通过他们的德国妻子和来自诸如西多会(Cistercians)修士等宗教阶层的支 持,他们有能力开展这项成本高昂的工作——从德国、瓦洛尼亚(Wallonia)和莱茵兰招募移民者。这些“来客”(hospites)在磨坊、重犁和更为紧凑的农田耕种系统方面为他们带来了技术创新。1229年,“胡子”亨里克开始认识到要着手建立波兰人定居点,给他们开出的条件可能与对新来者的条件不一样,但肯定是

有不同程度的免税,以及免除按照“高贵法典”(Princely Law)他们应承担的义务——其实就是统治者任意指派的各种劳役。这些举措开启了在“德意志法”(Ius Teutonicum)之下进行移民的进程,但其实这里说的并不是德国的法律,而是多少已标准化的一揽子条目,用以指导来自德意志,以及后来也来自波兰其他地方的殖民者定居于易北河与奥得河以东。

往易北河以东地区输送移民逐步发展为一个产业,因为企业家和投机者,还有“本地人”(locatores)都指望通过向那些迫切需要劳动力的土地所有者供应劳动力来为自己赢利,因为没有人力,即使有最宽广的土地也毫无用处。其他的领主、公爵和牧师也纷纷效仿。到了14世纪中期(也可能更早),大部分的波兰农民,包括一大部分已同化的德国移民,都可自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但同化是双向的。13世纪末期,西里西亚中部和北部对新的定居者最有吸引力的较肥沃地区逐渐归入了德意志的版图而不再属于波兰。到1300年,一个靠近弗罗茨瓦夫(Wrocław)的曾属于波兰的村庄弗伦(Wlen),已经变成德意志的拉恩(Lahn);而弗罗茨瓦夫本身也由于外来定居者数量的逐渐增多,而变为布雷斯劳(Breslau)。

15

同样的影响也发生在波兰的城镇,这些城镇多数面积都不大。最大的城镇克拉科夫和弗罗茨瓦夫在1200年时各自的居民数尚不足5000人。这不足以生产出波兰统治者所想要的财富。为了寻求更多的商人和工匠,他们开始注意到德意志的领土,在那里,在整个11世纪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城镇从他们的领主那里成功争取到了真正的自治权:他们指派自己的法官、行政官和地方官员。城镇新的地位也在权利和特权宪章中找到了法律依据。马格德堡,离波兰距离最近的德意志中心城市,在1188年实现了有效的自治。他们的行政模式是:由一群选举出来作为地方官员的市政议员,协助“市长”(Vogt,波兰语中是wójt)在自己的市政法规之下进行管理。这一模式后来几乎在波兰全境盛行。1211年,“胡子”亨里克准许西里西亚小镇兹沃托雷亚(Złotoryja)施行马格德堡法。1258年,“腼腆的”鲍莱斯瓦夫授予克拉

科夫同样的权利。司法诉讼和其他细节问题通常是直接查阅马格德堡法律寻求意见和判决。在 13 世纪结束之前,大约有 100 个波兰城镇拥有马格德堡式的市政机构。

16 这些城镇的管理逐渐越来越多地由德意志人和说德语的人掌控。本土的波兰农民按规定不准居住在克拉科夫(但是这种规定大多不起作用),因为王公和领主担心在他们地产上的劳动力的流失。在中世纪末期的西里西亚,波兰语仍差不多是农民的主要语言,但即使在乡下,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也在不断减少。在更大一些的城镇,德意志人或是被同化为德意志人的波兰人占绝大多数。最有可能首先对这种德意志化过程产生怨恨的是波兰本国的神父,一旦他们基础稳固后,就开始不断地阻止德意志人进入他们的阶层。在 1285 年宛兹卡的宗教会议上,格涅兹诺的雅各布·希文卡大主教发出警告,如果对德意志人蔑视波兰的语言、习俗、牧师和平民这种现象继续视而不见,波兰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新萨克森”(New Saxony)。

德意志物质和文化的魅力使穷困的波兰的物质和文化相形见绌,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西部的当地统治者深受其影响。直到 13 世纪末期,在大主教希文卡等牧师的推广下,波兰语才逐步完善,达到能够用于布道的程度。作为文化媒介,在 16 世纪早期之前波兰语与德语无法相提并论。西里西亚的“胡子”亨里克很喜欢听波兰民间流传的炉边故事;但他的曾孙,“光荣的”亨里克四世(Henry IV Probus ‘the Honourable’, 1257—1290)却更愿意讲德语,并以能用德语创作和表演诗词歌曲而自豪,自诩为一位高贵的“吟游诗人”(Minnesänger)。再往东的城镇,镇内的德意志团体逐渐变得孤立起来。在乡下,甚至是在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德意志农民更可能被波兰当地的文化所同化。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被波兰统治者吸引而来的德意志骑士和冒险者身上。

在 12 和 13 世纪,波兰之前老皮亚斯特的军队转变为具有西欧风格的“骑士”(milites)。以前的旧式军队花销巨大,而当统治者开始认为靠皮亚斯特早期那样掠夺式的侵略来充实国家财富的方式已不再适

用时,试图去维持这些军队就变得毫无意义。相反,统治者们越来越希望那些在军队服役的人能够依靠授予他们的土地自主谋生,但是这样必然会使老式军队的规模缩小,同时也使得公爵土地补贴的受益人对吸引移民产生新的兴趣。其中,那些从他们的统治者那里获得了足够的土地和农民,于是可以拥有战马、武器和盔甲的人,或那些很容易参与“本土化”(locatio)进程中的人,便形成了西欧式的军事贵族阶层。而那些没获得这么多眷顾的人(włodycy)则逐渐转变成了农民。

17

原则上来说,骑士占有了土地,那么他们就要以提供服务作为回报(这些封建礼仪在法国和英国虽然比较普遍,但却很少实行)。但是当皮亚斯特王朝分裂时,他们的统治者不得不承认这些数量庞大的战士拥有豁免权和司法权,就像他们不得不对教会做出让步一样。那些十分放肆而且拥有充足财力的人经常将这些权利用作他途,因此在13世纪和14世纪之交,任何人,只要可以通过“军事法”(ius militare)合法地占有一块土地,即成为骑士(Rycerz),那么他就在这块土地上拥有了司法权。“Rycerz”这个术语暗示了13世纪时德意志帝国的影响——Rycerz一词来源于Ritter,德语“骑士”的意思。)公爵们充其量只保留了听取上诉的权利。当公爵们放弃他们的司法权,或者说是被迫放权之后,他们发现在施政时不得不仰赖手下权臣的协作。在1228年,“细腿”瓦迪斯瓦夫(Władysław ‘Spindleshanks’, 1202 - 1228)给克拉科夫主教和地方男爵颁布了西耶纳特权法(Privilege of Cienia),赋予他们在拥有立法和听审司法审判权利的立法机构温策克(wiece)参政议政的权利,他的这一做法使至少是自12世纪早期“歪嘴”鲍莱斯瓦夫统治时期就开始形成的局势正式化。

天主教会为波兰统一意识的保存做出了重大贡献。格涅兹诺在公元1000年成为大都市,这样它就有能力保有对老皮亚斯特另外5个教区的教会权威,并且最终能支持涌现出来的政治统一运动。毕竟,教会自身也是政治混乱的主要受害者之一。13世纪,教会各层为扩展教区和教会学校网络,并密切它们与大众的联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作为仅次于公爵的最大的土地持有者,阻止政治混乱(最终看来抵消了12

和 13 世纪实际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乎教会迫切的物质利益。

18 残破的皮亚斯特公国无望得到梅什科一世和他的直系后裔强有力的政治援助。在面对一系列的外敌入侵时, 他们发现自己不是在撤退就是在防御。玛索维亚大公康拉德(1202—1247) 发现, 自己在面对依然是异教徒的普鲁士和雅特温(Yatwingian) 部落(他们对其领土完整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的入侵时, 无法保护自己的东北边境。为了阻止这些异教徒入侵, 在 1227 年, 康拉德发布了让条顿骑士军团十字军东征维斯瓦河下游的命令。在其他地方, 波兰人面对在中东欧造成严重破坏, 并在 1214 年横扫波兰的蒙古军队的破坏性入侵束手无策。西里西亚大公“虔诚的”亨利克(Henry the Pious) 在当年 4 月 9 日同蒙古军队进行的莱格尼察(Legnica) 战役中被杀。后来只是因为蒙古大汗窝阔台(Ögödei) 的死讯传来, 才使蒙古军队于 12 月从征服波兰和匈牙利的战争中撤退。蒙古军队在 1241 年对克拉科夫造成的大规模破坏成为这座城市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甚至到今天人们依然记得。蒙古军队在克里米亚以及巴尔干半岛和黑海的草原上继续逗留, 对于在他们远征范围内的地区来说, 这将是一个新的持续的威胁。

历史学家历来将这段历史描绘得既残酷又耸人听闻。西里西亚和玛索维亚在分裂的道路上沦陷得最深。皮亚斯特王朝过去借以统治波美拉尼亚西部的当地王公摆脱了皮亚斯特的控制。只有大波兰的核心地区、克拉科夫和桑多梅日的国王直辖地区或多或少保存着些许完整性。但同样是在这一时期, 在蒙古鞑靼入侵之后, 新的移民运动达到了顶峰, 由此可获得的自由权也扩展到了当地的人民。由各个公国组成的代表会议**温策克**(王公在这里主持审判, 听取上诉和颁布法令; 贵族、官员、骑士和市民也在这里聚集), 俨然已成为政治和司法教育的学校。贵族以及城市显贵觉得自己有咨政议政的权利, 并且认为自己在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司法和行政事务方面应该有发言权。

19 对于历任德意志君主试图强迫波兰成为附庸和从属国的多次尝试, 波兰的诸侯们基本都予以抵制——而在过去, 这些统治者通常非常欢迎宗主的庇护, 以提升自己的实力。随着 1197 年亨利六世皇帝逝

世,政权瓦解,德意志帝国陷入了与波兰有几分相似的混乱。13世纪初,当克拉科夫大主教文森特把古代波兰人对抗罗马皇帝的一些神奇故事按照年代进行编年纪录时,他并不是简单地胡乱编造,他是在强调:无论那些波兰公国曾经多么弱小,它们都是独立的,并不从属于在思想上继承了罗马帝国衣钵的德意志统治者。

即使是部分统一之路,也是十分曲折的。在1289年,克拉科夫主教和贵族及骑士们一道,在玛索维亚选举波洛次克(Ptock)公爵鲍莱斯瓦夫二世任国王。鲍莱斯瓦夫将君权传给了他的侄子,“矮子”(Łokietek,“沃凯塔克”字面上是指“肘高”)瓦迪斯瓦夫(Władysław ‘the Short’),他是库雅维(Kujawy)、宛兹卡(Łęczyca)以及谢拉兹(Sieradz)这3个小公国的统治者。这个高贵的暴徒发现他对于抢掠的嗜好为他赢得了很多骑士及其扈从的支持。但是他在克拉科夫却相当不受欢迎,那里的市民拥立弗罗茨瓦夫(Wrocław,即Breslau)公爵、“光荣的”亨里克四世普罗布斯为统治者。正是亨里克四世正式迈出了对波兰的重新统一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第一步。他开始和罗马教皇及其支持者选帝侯鲁道夫(Rudolf)进行磋商,以使他们同意他的加冕礼。1290年6月,无子嗣的亨里克四世去世前不久留下遗嘱,将克拉科夫公国遗留给大波兰公爵普热梅斯乌二世(Przemysław II)。在此之前,普热梅斯乌已经是格但斯克港口和波美拉尼亚的领主。从理论上说,比起之前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任何一个前任,他都拥有更强大的领土权力基础。在更为拉丁化的波兰,加冕的观念较之于皮亚斯特王朝早期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大主教希文卡(Świnka)完全支持在1253年将克拉科夫主教斯坦尼斯瓦夫(Stanisław)追封为圣者,他被肢解的身体经历了奇迹般的再生,对于希文卡的渴望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以抗拒的隐喻。普热梅斯乌唯一一个波兰的劲敌就是沃凯塔克,后者仍然占据着桑多梅日。然而,这两个人都在一个强大的、野心勃勃的外族统治者面前黯然失色,那就是波希米亚国王瓦茨拉夫二世(Václav II)。

瓦茨拉夫是中世纪最成功的土地征服者之一。他的父亲,普热梅斯尔·奥塔卡尔二世(Přemysl Otakar II, 1253 - 1278)——他的斯拉

夫臣民称其为“普热梅斯尔”，德意志臣民则称其为“奥塔卡尔”——在布拉格建立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波希米亚的矿产、商业和农业财富足以支持他四处扩张版图的野心，直至1278年8月26日，在敦克鲁特(Durnkrutt)战役中败给他最近的一个德意志竞争者哈布斯堡的鲁道夫(Rudolf of Habsburg)，他成为德意志君主的美梦才突然结束。四分五裂的皮亚斯特国土上那些小王公们放眼国外寻求保护：最引人注目的目标之一是波希米亚的普热梅斯里尔王室；另外一个是对它的对手，匈牙利的阿尔帕王朝(Arpad)。在亨利克·普罗布斯去世之后，瓦茨拉夫想要占领克拉科夫的野心被当地的男爵和贵族煽动了起来。在安全、声望和经济前景方面，他做出的贡献要远远大于普热梅斯乌和沃凯塔克。瓦茨拉夫通过1291年的“利托米兹(Litomyšl)特权法”确保了至关重要的小波兰的支持。他向那里的神职人员、骑士、王公和城镇许诺，会对他们已有的权力、豁免权和管辖权加以保护；他许诺不会对他们增加新的税收，并且从他们的阶层中选人来填补现有的官职。沃凯塔克的地位被颠覆，他的纪律涣散的军队和骑士随从四散而去，使他日益孤立。1294年，他被迫求和，只能从瓦茨拉夫手中以封地的名义收回自己剩下的土地。这可能阻止了瓦茨拉夫几乎确定的加冕礼，大主教希文卡说服教皇同意于1295年6月26日在格涅兹诺大教堂给普热梅斯乌二世加冕。这个决定背后的阴谋就如同波兰历史上的任何事情一样隐晦；普热梅斯乌是否将自己看做是整个波兰，还是仅仅是大波兰和波美拉尼亚东部的统治者也并不明确。他活得太短，无法验证人们对他的支持是否真诚。1296年2月他被谋杀了，大致可以确定是受勃兰登堡侯爵的指使，因为他侵吞领土的野心被这位新国王所阻挠。他留给波兰一个永久的遗物——戴着王冠的鹰成为新国家的象征。

21 大波兰的贵族最初选择沃凯塔克作为继任者，但是他总是没有能力去控制自己的人，他还打算和其他小王公一起瓜分普热梅斯乌的国家。来自勃兰登堡的军事进攻彻底地击溃了他的支持者。1299年，他再次承认瓦茨拉夫为最高统治者。由于意识到克拉科夫的神职人员都

支持瓦茨拉夫,甚至连大主教希文卡也接受了这不可避免的事实。1300年9月,他加冕瓦茨拉夫为国王——尽管希文卡忍不住要抱怨在加冕礼上致加冕词的牧师实在太“狗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得以恢复,沃凯塔克被流放。他为了寻求支持远涉罗马,在那里,他赢得了对普热梅斯尔王室持敌对态度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的支持。瓦茨拉夫的最后—个劲敌格沃古夫(Głogów/Glogau)公爵亨利克(Henry, 1273 - 1309),亨利克·普罗布斯的侄子,于1303年承认了他的宗主权。然而,波兰的大部分地区仍旧在有领地的公爵的统治下。瓦茨拉夫的直辖地区主要是在克拉科夫-桑多梅日、大波兰和波美拉尼亚东部。他留下了一个世代流传的行政机构——**长老会**(*starosta*, 字面意为“年老的”),其执掌者担任着皇室地产的管理者,虽然他在这个职位上总是偏爱捷克人,激起了人民不断增加的愤恨。当然,对于瓦茨拉夫来说,波兰只是更伟大的普热梅斯尔王朝的附属部分。要是单纯为了波兰自身的统一,他对此兴趣索然。

1301年1月,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三世(Andrew III)去世,没有留下男性子嗣。瓦茨拉夫发现这是个难以抵挡的诱惑。他企图把他11岁大的儿子(另一位瓦茨拉夫)作为国王强加给匈牙利,并在这一过程中大规模地扩展普热梅斯尔家族的势力,这对于匈牙利人民、教廷、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of Habsburg),以及德意志南部的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过分的举动。1304年,匈牙利-德意志联盟形成。为了得到勃兰登堡大部分权贵的支持,瓦茨拉夫许诺要将波美拉尼亚东部和格但斯克港口交给他们。但他在大波兰的支持者已经被捷克**长老**(*Starostowie*)的残酷统治激怒了,无法再接受这个决定。1305年初的起义动摇了大波兰南部。那些不满捷克人统治的王公更愿意支持格沃古夫公爵亨利克。瓦茨拉夫的匈牙利和德国敌人宣布支持其被流放的对手沃凯塔克。匈牙利武装势力在帮助安茹家族的查尔斯·罗伯特(Charles Robert of Anjou's)取得王位的同时,帮助沃凯塔克夺取了除克拉科夫之外几乎小波兰的全部领土的控制权。瓦茨拉夫二世在1305年6月21日去世之前与这一联盟和解。他同意从匈牙利撤军,

但是为了保证勃兰登堡大部分权贵站在他这边，年轻的瓦茨拉夫三世重申了他父亲放弃格但斯克和波美拉尼亚的承诺，并准备率领军队进入波兰。如果瓦茨拉夫没有在 1306 年 8 月 4 日由对他不满的捷克领主教唆的谋杀中丧生，他和沃凯塔克两人很可能就分享了波兰的领土。相反，此时的波希米亚卷入到了接连不断的动荡当中，直到 1310 年卢森堡的约翰(John of Luxemburg)当选才停止争斗。在波兰，虽然克拉科夫的市民与沃凯塔克和解了，但大波兰的绝大多数人更倾向于承认格沃古夫公爵亨利克。

1307 年，灾难从波美拉尼亚降临到沃凯塔克身上。两个主要城镇特切夫(Tczew)和格但斯克的德意志贵族阶级倾向于勃兰登堡权贵；而波兰乡村的骑士仍效忠于沃凯塔克。1308 年 8 月，格但斯克城堡遭到边疆伯爵(margrave)奥托(Otto)和沃尔德玛(Waldemar)的军队的围困。沃凯塔克求助于条顿骑士军团。到来的条顿军团为沃凯塔克赶走了围困城堡的武装，但 11 月 14 日晚上他们为自己夺取并占领了该地，接着还残酷镇压了沃凯塔克的军队。1311 年末，大部分波兰控制的波美拉尼亚土地收入了骑士团的囊中。

条顿骑士军团做为耶路撒冷圣约翰修士团(St John)的一个分支，成立于 12 世纪末，在伊斯兰军队反攻中东的十字军城邦时被迫撤离，此后，他们将自己的军事改宗计划转向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他们试图建立独立国家的野心一经暴露，就遭到了国王安德鲁二世的驱逐。1227 年，玛索维亚大公康拉德一世让他们在维斯图拉河的海乌姆诺(Chełmno)定居，用来防御普鲁士异教徒，以保卫东部边境，康拉德则可放心地与他的皮亚斯特亲戚进行长期斗争，并对罗斯公国的政治进行干涉。在皇帝们和教皇们的支持下(事实证明，骑士很善于挑拨离间并从中获利)，以及欧洲基督教骑士阶层和统治者们的资助下(尤其是独立的皮亚斯特王公)，骑士团事实上已经赢得了独立。他们最热情的支持者包括普热梅斯尔·奥塔卡尔二世[为表示对他的敬意，他们在 1225 年将一个新港口命名为哥尼斯堡(Königsberg)]、瓦茨拉夫二世和波希米亚的约翰。在 13 世纪 70 年代

末期,骑士团征服了普鲁士部族;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开始殖民,使得这一地区在接下来的将近 700 年中都具有德意志特色。修士团(正是由于它是宗教团体,受到教规的约束,致力于传播基督教信仰和转化异教徒的更高目标)同样能够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不同于同时代中世纪的其他国家。修士团代表的是非个人的国家——是一种高于王朝或世袭国家的实体。其行政结构被认为是**骑士团国家**(*Ordensstaat*),较少屈从于君主个人的幻想和偏爱。他们的最高首领是由那些表现出能够将祈祷和野心、信仰和残忍融于一身的教会上层从久经考验的人中选举出来。骑士团和他们的北部十字军伙伴——深入波罗的海沿岸(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持剑骑士团经受了数次挫败,但是很快又因新兵和狂热的雇佣兵的加入而恢复过来,因此他们总是可以克服困难。然而实际参加作战的修士,也就是神佑德意志骑士(*German Knights of Blessed Virgin*)在数量上占少数——这是他们的弱点。对格但斯克和其内地贸易区的控制,保证了来自德意志的源源不断的移民、士兵、应征者和联军的涌入。1309 年,其大团长康拉德·冯·福伊西特万格(*Conrad von Feuchtwangen*)把总部从威尼斯搬到维斯图拉河下游的马林堡(*Marienburg*)[今马尔博克(*Malbork*)]。这是**骑士团国家**的新首都,其后很快成为欧洲中世纪最令人生畏的防御联合体之一,这同样也反映了骑士团的权力和荣耀。沃凯塔克及其继任者薄弱的实力所能做的,也就是责骂和抱怨骑士的背信和残暴——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消除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祸患。

沃凯塔克没有收复波美拉尼亚的任何希望。大波兰的大部分地区仍旧对其冷眼旁观。玛索维亚的王公也不信任他。1311 年 5 月,在匈牙利的帮助下,他才平复了克拉科夫德意志市民的一次重要起义。波兰人取代了德意志人在城镇议会中的关键位置,拉丁文也替代德文成为城镇的官方语言。事实上,没过几年德意志市民和商人就再次获得他们以往的权势,但是城镇本身却不再拥有曾经的政治力量。镇压活动对加强沃凯塔克对其他地方市民的吸引力几乎没起什么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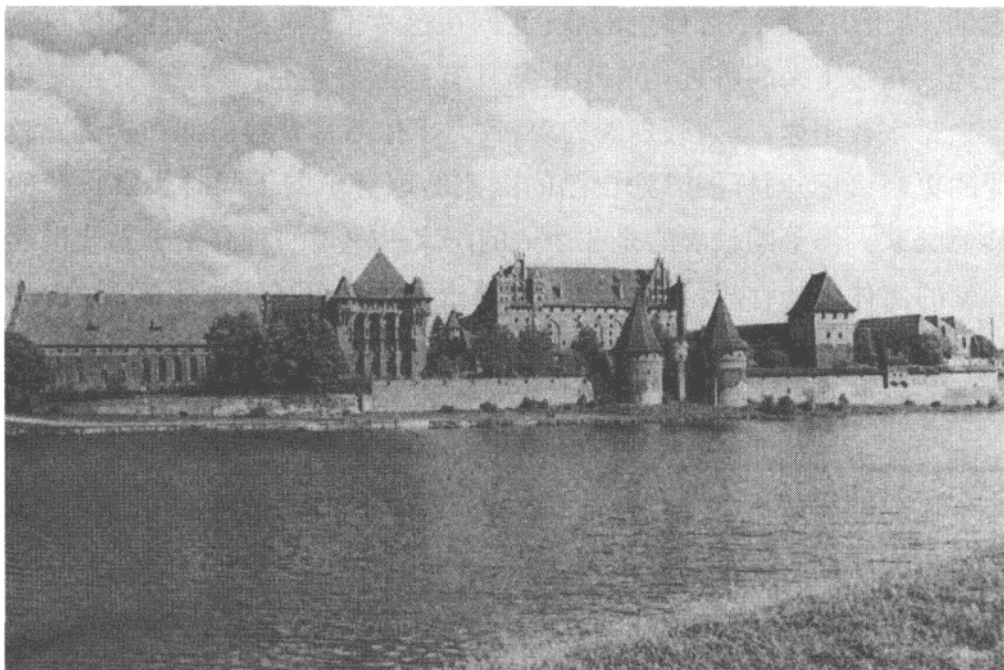


图2 14世纪条顿骑士的城堡和最高行政总部，位于马林堡。19世纪20年代普鲁士政府对城堡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并将其作为条顿骑士的（宽泛地说应该是普鲁士的）东方“历史使命”的展示品。




1309年，他在大波兰的竞争对手格沃古夫公爵亨里克逝世，留下了5个年轻的儿子，他们更像德意志人而不是波兰人。比起分裂和由德意志统治，骑士团更拥护沃凯塔克，但是直到1314年11月波兹南投降，严重的威胁才解除。由于控制着大波兰和克拉科夫，沃凯塔克期望得到王室的尊严是切合实际的——如果不是此时新任波希米亚国王卢森堡的约翰欣然继承前任的宏愿，跳出来相争的话。西里西亚和玛索维亚大部分王公也指望着约翰。勃兰登堡和条顿骑士团承认了约翰是瓦茨拉夫在波兰理所当然的继承人，以期保证自己的称号和权利。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对加冕的认可是必须的，并且在理论上讲这是在其职责范围内的，但他哪边都不愿意得罪。他含糊其辞的认可表明，他认为两个人都具有法定的王室称号。1320年1月20日，当沃凯塔克最终加冕时，地点不是选在格涅兹诺，而是第一次选在了克拉科夫。选定这个新地点，不仅是对克拉科夫在南部省份中占有较重要经济地位这一点的认可，而且是对支持沃凯塔克的领土仍旧有限这一事实的默

认。他控制的地域范围比“歪嘴”鲍莱斯瓦夫统治时期的一半还要少：西部有大波兰，南部有克拉科夫、桑多梅日，这两个地方由他位于波兰中部的两个公国宛兹卡和谢拉兹连接起来。沃凯塔克更像是克拉科夫的国王而不是波兰的。他是幸运的，因为波希米亚国王约翰还需要处理捷克贵族们带来的大堆麻烦而无暇顾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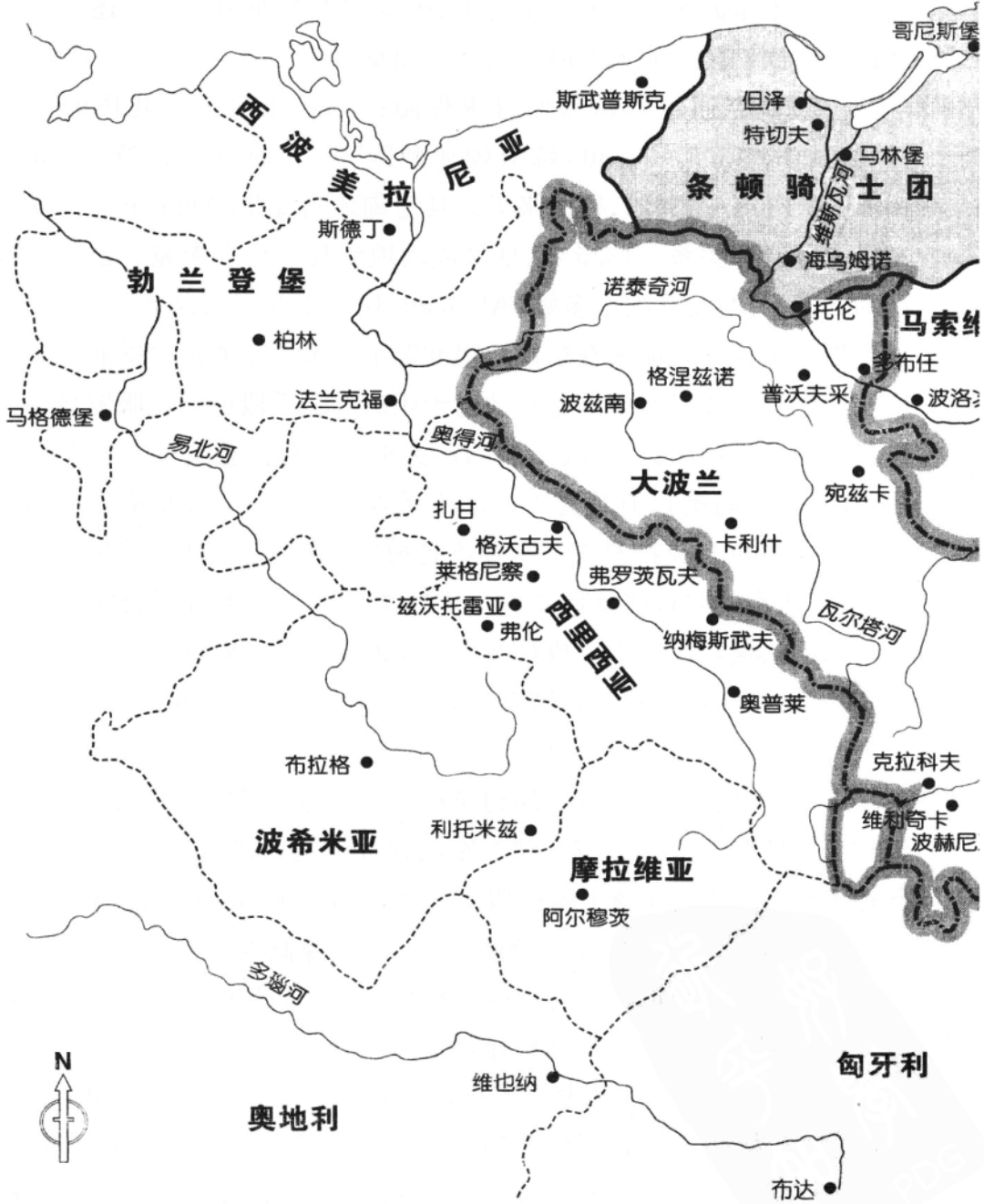
沃凯塔克通过婚姻联盟寻求保障：1320年他把女儿伊丽莎白(Elizabeth, 1305 - 1380)嫁给匈牙利国王查尔斯·罗伯特(Charles Robert, 1308 - 1342)，以此来巩固其与匈牙利安茹(Angevins)家族长期以来的联盟关系。1325年，他又成功地使其子与立陶宛大公格底敏(Gediminas)的女儿阿尔多娜(Aldonad, 死于1339年)结婚，代价便是使长期以来与立陶宛人在东部边境问题上斗争不断的玛索维亚公爵与骑士团国家形成了联盟。他对抗骑士团的唯一手段就是说服罗马教廷发表一项法律声明，命令骑士团归还波美拉尼亚。教皇确实做了这样的声明(极不明确)，但是骑士们却不予理睬。1327年，波希米亚的约翰国王准备攻打克拉科夫——要不是被匈牙利的查尔斯·罗伯特牵制住，沃凯塔克的君位将就此不保。南西里西亚的大部分王公宣称自己是约翰的诸侯。沃凯塔克攻打波洛次克的瓦茨劳(Wacław)公爵，结果却招致了瓦茨劳的盟军勃兰登堡和骑士团入侵。1329年，沃凯塔克用地处瓦尔塔河与奥得河交汇处的卢布斯卡镇收买了勃兰登堡。1328年至1329年的冬天，卢森堡的约翰和骑士团进行了针对沃凯塔克的立陶宛盟军的“十字军征讨”。波兰军队佯攻海乌姆诺城，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约翰和骑士团征服了多布任(Dobrzyń)地区的波兰北部领土，由于被认可为波兰王室的继承人，约翰慷慨地将这一地区赠予了骑士团。波洛次克的瓦茨劳公爵宣称自己成为约翰的封臣。西里西亚的其他大部分王公也同样向约翰称臣。

26

1331年7月，骑士团紧接着进攻了大波兰。他们彻底洗劫了格涅兹诺，但作为一个宗教团体，他们礼貌地放过了城中的天主教大教堂。9月27日，波兰人和条顿骑士在普沃夫采(Płowce)相遇。战斗持续了将近一整天；总而言之，如果说波兰是这场得不偿失的遭遇战的胜

-  波兰边界
-  波兰封地边界
-  条顿骑士团领土

波罗的海



28

地图 2 伟大的卡齐米日统治下的波兰(1333—1370)

立陶宛大公国



者,那么他也没得到任何好处。这也表明,沃凯塔克的军事实力有限。国王可以进攻,但是已无法再收复任何失地;毕竟,他缺少资源和组织来对付骑士团的要塞。假如卢森堡的约翰仍持续不断地入侵的话——就像他曾经向骑士团保证过的——那么普沃夫采的胜利可能就变得更微不足道了。1332年,骑士团为了弥补普沃夫采这一损失,进一步占领了沃凯塔克的世袭公国库雅维。同年8月,沃凯塔克不得不同意休战,并允许骑士团拥有所有目前占领的地区。通过几近惨烈的抵抗,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波兰的再次统一。但是当他于1333年3月2日去世时,他只剩下比在他1320年加冕时得到的更小的国土。他的继任者卡齐米日三世(Casimir III)通过与条顿骑士团重新签订休战协议开始了他的统治。

从国内的情况看,波兰需要稳定,这只能通过加强王权来实现。在国外方面,新国王不仅需要解决与骑士团公国和卢森堡的关系,他还不得不去处理波兰东南部边界上的权力真空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会给他与鞑靼蒙古人以及立陶宛之间造成麻烦。波兰仍然处于匈牙利安茹家族的控制下,首先是卡齐米日的姐夫查尔斯·罗伯特一世,然后又是他的侄子路易(1342—1382),他们两人对波兰的政权都有自己的想法。这片领土,这个“王冠”——波兰王国王冠领地(*Corona Regni Poloniae*)——是由他的法学家所设计,指卡齐米日统治的一个狭窄而不规则的菱形领土,从西北到东南的维斯瓦河两岸的范围;大概只有不到80万的居民,它只包含了实际上可以叫做“波兰”的地域内不到一半的人口和土地。在与骑士团的对抗中,卡齐米日很大程度上全凭一己之力。安茹家族想在自己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slbachs),以及卢森堡的争斗中与骑士团保持友好关系。波兰被置于一个次要的位置。1343年7月8日,卡齐米日与骑士团缔结的《卡利什(Kalisz)条约》是一种有利于骑士团的“妥协”。骑士团归还了沃凯塔克失去的、不堪一击的边地多布任和库雅维,但是留下了他们真正想要的——格但斯克和波美拉尼亚。卡齐米日同样还要面对失去西里西亚的问题。1348年,波希米亚的约翰的继任者、君主王位继承人[他将在1349年继承巴

伐利亚人路易(Louis the Bavarian)],查理四世(Charles IV),宣布将西里西亚并入波希米亚王国。他甚至企图通过宣称他是从瓦茨拉夫及他的父亲那里继承的王位,来进一步将波洛次克公国和玛索维亚公国并入王国。鉴于匈牙利国王路易摇摆不定的支持态度以及东南部正在酝酿的暴乱,卡齐米日自行退让。1348年11月22日,通过《纳梅斯武夫(Namysłów/Namslau)条约》,他放弃了对西里西亚公国的权利要求。令人安慰的是,1355年,在东北部的齐莫维特三世(Ziemowit III)大公成功地再次统一(尽管只是大体上)了玛索维亚大部分的土地,并承认了卡齐米日的宗主权。尽管如此,他明确指出,对这种关系的承认取决于卡齐米日死后要确定合法的男性继承人。

在东南部的罗斯国问题上陷入困境,有助于解释卡齐米日在西部的撤退。在“智者”雅罗斯拉夫一世(Yaroslav I, 1019 - 1054)统治之后,曾经伟大的基辅公国走向衰败。1237年到1240年之间蒙古军队的入侵,对这片土地的洗劫更甚于波兰。基辅罗斯王国之后的王国很大程度上成了建立于欧亚大草原上的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附庸国。蒙古人(或是另一个在欧洲更广为人知的名称“鞑靼人”)的持续入侵,曾一度进入到波兰的领土。1340年,罗斯国最西边的两个公国加里奇(Halych)和弗拉基米尔(Vladimir)公国的统治者,玛索维亚皮亚斯特的后代鲍莱斯瓦夫-尤里(Iurii),被他主要的波雅尔(Boyar)顾问毒死(因为尤里公然表示对他们的不屑,从而彻底疏离了这些人,对罗马天主教过于热情的支持也是尤里被毒死的原因),死后没有留下子嗣。

由于其他的罗斯王公没有人明确宣称有权占有加里奇-弗拉基米尔,卡齐米日抓住了这个最好的时机。这两个富饶的罗斯公国横跨从德意志到黑海的东西陆上商业要道,使波兰南部的贵族和克拉科夫人的致富有了乐观的前景。这里可以作为鞑靼人劫掠的缓冲地带。它们使失去的西部和北部的土地获得了一些补偿。它们同时还引起了立陶宛和匈牙利安茹家族的兴趣。如果卡齐米日没有吞并它们,其他人也会。1340年卡齐米日的入侵,很有可能是出于担心鞑靼人会以“加里

奇-弗拉基米尔王国”(regnum Galiciae et Lodomeriae)的形式对此地进行直接统治。

将近 20 年断断续续的战斗,也只能换来对波兰部分地区行使主权。立陶宛人在北部建国。卡齐米日满足于立陶宛小王公们对自己宗主权的认可。卡齐米日控制着南方,以利沃夫(L'viv/lwów/lvov/lemberg)为中心。但是即使是在这个地区,他也要依赖匈牙利的支持。波兰的罗斯国领土仍旧与王冠王国的其他部分相分离:为了回报匈牙利的路易在镇压中给予的帮助,卡齐米日于 1350 年同意在自己死后将这片土地赠予路易。立陶宛的分裂(1341 年立陶宛大公格底敏死后其 7 个儿子争吵不休)对卡齐米日大有益处。即使是黑死病也帮了他大忙:它对人口稀疏的波兰没造成什么伤害,但是 1346 年的黑死病却给予金帐汗国以毁灭性的打击。尽管如此,卡齐米日冒险的代价也十分昂贵。1352 年,为了给战争筹款,他抢劫了格涅兹诺大主教区的财富。他向所有人借款,甚至是条顿骑士团,为此他把多布任公国作为抵押,因为贫穷的多布任简直无法和罗斯潜在的富有、繁荣相提并论。

卡齐米日的主要成就是,在中世纪的君主所能掌握的狭窄范围内,在国内恢复了有力的君主统治。他资助来自波兰南部富有才华的教外人士和基督徒顾问,使他们由于为王室服务而获得职位升迁。这就造就了一批新人,为新的财政和行政制度的建立做好了准备。国王比他的前任更加重视采取更规范的行政手段。1364 年,他在克拉科夫建立了一所非全日制的大学(称为 *studium generale*),主要教授法律,还有一些医学和天文学课程(教皇不同意开设神学课程)。这所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是培养法学家和律师,这些人对于一个有自尊的君主制政府来说,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的人才。卡齐米日使司法程序和刑罚有法可循。在 14 世纪 60 年代,他开始扩展在大波兰的支持基础,但对所辖的两个最主要大省,他从没有设法去终止已有的分裂和差异,相反,他在双方统治者之间挑拨离间。一项恢复被篡夺的王室领地(一般是通过独裁的王室批准)的庞大计划,使他获得了成百上千的财产,尽管这

也导致了 1352 年的大波兰起义。卡齐米日为此做出了一些策略性的让步。1360 年,起义已偃旗息鼓,其领袖马奇科·伯克维克(Macko Borkowic)被逮捕,用链条拴在地牢里直到饿死,尽管看起来罪责是他与当地土匪的关联而非他过去的政治行动——这与其说是王室的复仇行动,不如说是对那些掌权人物自高自大的一个警告。

也许卡齐米日是希望可以建立某种新的基础,在其之上树立王权。首先,乡村农民的非骑士行政官**市长(Wójtowie)**和**村长(Sottysi)**由于自身的权力,被期望应该出现在军事行动中。他的征用计划还配套了按“德意志法”(German Law)将农民大规模安置在王室领地内。国王鼓励犹太移民,他们大部分是从德意志帝国来的阿什肯纳兹人(Ashkenazim)。虽然弥漫于基督教国家的对犹太人的偏见和误解同样出现在波兰,但这完全不足以阻止这场移民。国王有一个犹太情妇。而尽管许多城镇的商人和行会因为害怕竞争,发布禁令不准犹太人在城墙内居住,但犹太人总是能在郊区或是地方自治权限以外的特权领土上定居。无论他的基督徒臣属对这些犹太人有怎样的保留态度(时常会有一些反犹暴乱),卡齐米日却认为他们是无价之宝。1338 年,货币制度改革促使小面值银币开始流通。所有这一切,以及繁荣的南北和东西贸易、克拉科夫又占据着重要的十字路口位置,使卡齐米日成功地推行了苛刻的税收制度。他对耕种教会土地和教外土地的农民每年征收每畹(łan, 约合 18.5 公顷)12 格罗什的土地税(耕税, *poradlne*)。只有封建领主直接经营的土地是免税的。这样的征税项目,再加上于 1251 年开始开采的、位于波赫尼亚(Bochnia)和维利奇卡(Wieliczka)的、利润丰厚的皇家盐矿,使他有足够的资金进行重要的防卫和重组计划。他在整个波兰建立了大约 50 座城堡,为 27 个城镇建造了新的护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他的命令下建造的)。这些足以牵制鞑靼人的入侵和来自立陶宛的更为频繁的劫掠;但是卡齐米日新堡垒没有一个可以和条顿骑士在马林堡的防御奇迹相比。克拉科夫的贵族仍然可以从国王成功的商业政策,以及由于禁止就市政问题向马格德堡上诉(在首都设立了两个受理上诉的法庭)而获得的日渐增强的声望中获得

甜头。

虽然卡齐米日在加里奇-罗斯公国遇到很多麻烦,但正是在他统治时期,这一地区在接下来6个世纪中典型的民族多样性特征开始形成。战争摧毁了乡村,但是这个地区肥沃的土地吸引了来自波兰国内外的那些无依无靠的、贫困的、富有冒险精神的人。这个地区的波雅尔贵族要么是在无数的战争中逐渐消失,要么就是更倾向于移民到立陶宛统治下的罗斯领土。留下来的小贵族完全没有能力抵挡移民的浪潮。利沃夫这个较大的贸易中心继续吸引着大量各式各样的移民。德意志人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其次是波兰人和捷克人(尽管在15世纪末,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被波兰化了,利沃夫自身也成为罗斯国东正教领土中的一个波兰化的孤岛)。第一个犹太人定居点于1356年建立,紧靠着一个繁荣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地。在卡齐米日统治末期和接下来的10年中,波兰的中小贵族获得了这一地区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卡齐米日和他的继任者更倾向于通过一个可信赖的、外来的、非波雅尔、非正统的阶级来进行统治。这一过程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即使是加里奇-罗斯公国的留里克(Rurikid)王公们也对与拉丁教会的联盟(作为一种抵抗蒙古军队求得安全的手段)表示出相当大的兴趣。皈依东正教的波雅尔贵族承担着提供服务的义务,却得不到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补偿,他们发现波兰化和基督教化是保护他们身份和增加其财产的最简单的办法。正是在西罗斯公国的这些土地上,上层贵族和统治阶层第一次从民众中分离出来,这一过程从此便持续了下去。

33

卡齐米日最大的失败是在处理王室的家事上。他有4个妻子:第一任是立陶宛的阿尔多娜-安娜(Aldona-Anna),她生了两个女儿。第二任是黑塞的阿德莱德(Adelaide of Hesse),她很尽责,但是很无趣,而且极有可能是不孕的。卡齐米日轻视她,把她关在一个边远的城堡度过了一段痛苦的婚姻,直到约1356年,因为流言四起才不得不将她释放。国王对布拉格一个贵族的遗孀克里斯蒂娜(Krystyna)充满渴望,并最终被其征服。他甚至还没有与可怜的阿德莱德离婚就和克里

斯蒂娜结婚了,但他们并没有儿女。时间流转,他撇开克里斯蒂娜在1363年再次与扎甘的亨利公爵(Henry of Żagań)的女儿雅德薇嘉(Jadwiga)结婚,但接下来的4个孩子都是女儿。卡齐米日没有生下有法定继承资格的儿子。或许他曾经想过要让安茹家族来接管他的土地。1368年,他把他的外孙卡兹克(Kazko)立为他的继承人,卡兹克当时已是波美拉尼亚的斯武普斯克(Stupsk)公国的继承人。1370年11月5日逝世之前,他把库雅维、宛兹卡和谢拉兹留给了卡兹克,罗斯国、大波兰、克拉科夫和桑多梅日附近的领土则给了匈牙利的路易。卡齐米日显然没有摆脱这样一种观念,王权是父权制的,家族世袭的,最终只有他自己可以对其作出处理。但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律师、牧师和男爵们并不赞成他的观点。卡齐米日37年的统治让他们明白他们的政治舞台并不限于某一个地区,“王冠”,即波兰王冠王国(Corona Regni Poloniae),是一个真正应该受到保护的政治实体。刚被解体的波兰不大可能继续拥有来之不易的、潜在的罗斯国的财富。同时,这些贵族有着不可错失的重返政治舞台的机会,正如他们的前任在波兰最为分裂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在两个未来的统治者之间挑拨离间、渔翁得利,尽管现在在程度上来讲已不只限于波兰国内。桑多梅日的城市法庭宣布遗嘱无效。给予卡兹克的补偿是从骑士团国家手中赎回的、作为匈牙利的路易(继承了王冠王国)的封地的多布任公国。

34

甚至当他还在世时,卡齐米日三世就因使波兰维持着相对的和平与繁荣,以及进行的法律和行政改革而赢得了“伟大的”这样的称号(波兰的君王中唯一获此殊荣者)。然而波兰还是太弱小,以至于都不能维护其在北部和西部旧有领土的权利。也许卡齐米日已尽其所能做到了最好。无论怎样,他都为向东方的扩张铺平了道路。尽管他对于没有合法的继承王位的儿子这件事束手无策,但他恢复了强大的王权。

无论卡齐米日的政策有多古怪,他确实曾经是一位强大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统治者。贵族们有足够的理由欢迎路易继位。但人们总不太愿意要一个缺席的国王[他统治波兰主要是通过他的妈妈、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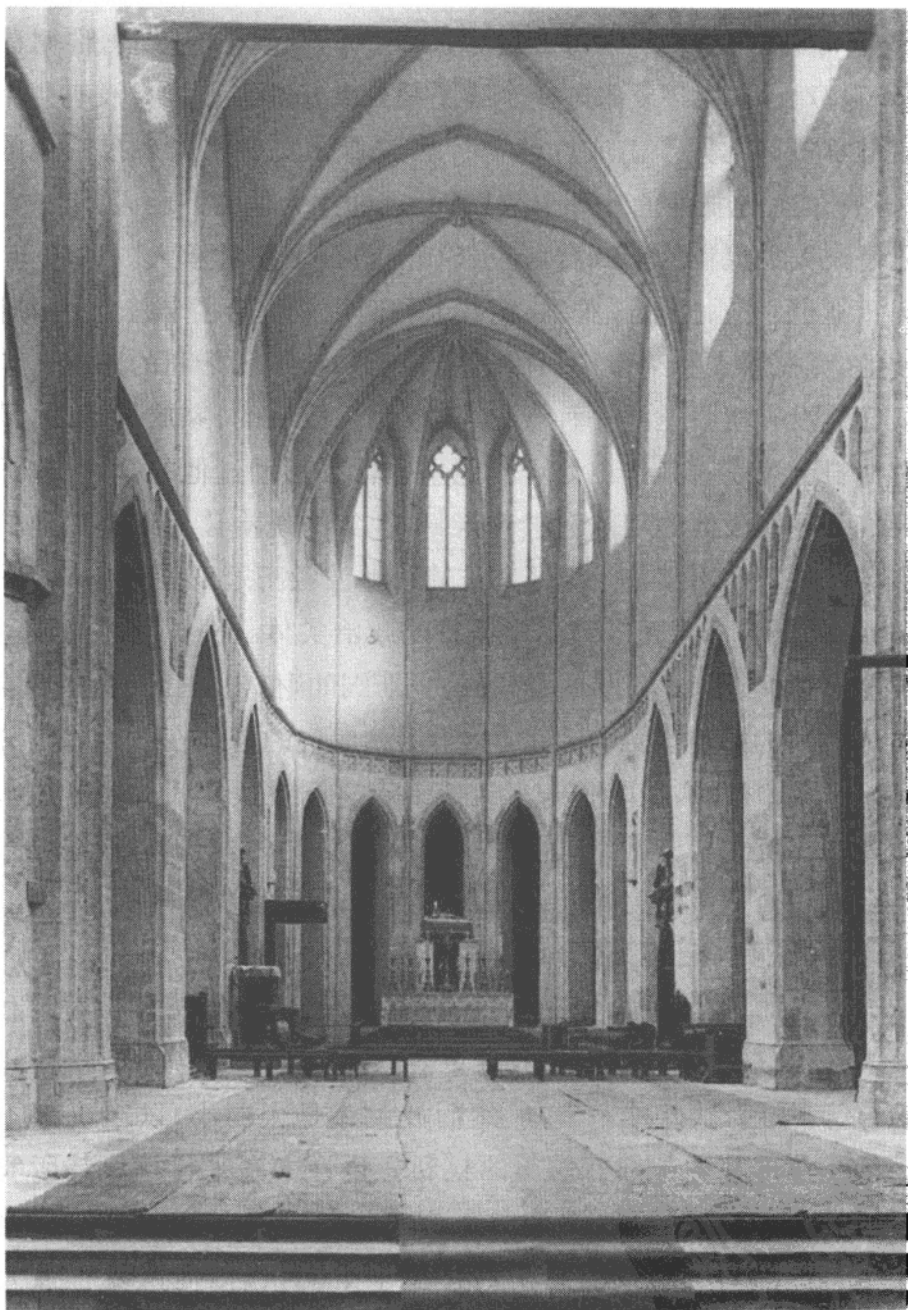


图3 格涅兹诺大教堂内景,1342年以哥特式风格重建后,改变了早前的罗马式建筑。这次重建可以看做是一个大规模革新运动(为卡齐米日三世的名誉贡献良多)的一部分。

齐米日的姐姐埃尔日别塔(Elizabeth)]。作为承认其继承王位的条件,路易做出了一些让步。1355年,通过“布达特权法令”(the privilege of Buda),路易正式宣布免除贵族和牧师以后开征的所有新税。他的身体时好时坏,和卡齐米日一样也没生下儿子,但这样似乎开创了一个更好的前景。1374年,贵族同意他可以指定他的3个女儿之一成为波兰的王位继承人。作为回报,在匈牙利北部的科希策(Košice),路易颁布了另一个特权法令,将耕种骑士和贵族土地的农民的土地税,从每晚12格罗什永久减免到2格罗什。接着他承诺波兰境外的任何军事活动他都会付酬让他的骑士出兵。1381年,他把这些特权也扩展到了牧师。

如今看来,这些让步可以看做是给予贵族在国内绝对统治地位的一系列政策的开端。但当时,它们主要还是贵族为逃避王室财政纳贡而寻求庇护的手段。“贵族”是受惠人,因为他们有近乎垄断的军事力量。但是此时的波兰“贵族”几乎都是一些拥有土地并因此而承担着军事义务的人(即使这些义务很多时候都是名义上的而不是实际的)。受惠的人包括从皇家委员会的封建领主到偏僻的森林地带几乎负担不起一匹马和军事装备的地主。当时起决定作用的是大约20个核心家族,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卡齐米日三世时崛起的,下定决心不能失去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名望。这些人是布达和科希策特权法令的主要受益人。实力较弱的骑士也是受益者,这对于那些大家族是有益的,有利于他们培养自己的随从和门客——至少是一个世纪以后,这些年轻的骑士、贵族才凭自己的实力成为一股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路易的特权法同样也适用于城镇居民——他们已有的权利得到认可——但是他们只享有地方的和特别的让步、准予和实惠。城镇居民由于商业竞争而各自为政,未能表示出共同的态度。而克拉科夫的贵族,他们甚至是在皇家委员会任职,但也只关心自己城市的利益,而不管其他的城镇;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在贵族政治核心中谋到一个合适的职位。而地位仅次于“贵族团体”的是牧师。

路易接受了现实,为了保障他女儿的王位他不得不做出让步,但就像两代之前的瓦茨拉夫二世一样,他对把波兰的领土弄得四分五裂并

没有感到良心不安。1377年，他将波兰罗斯国并入匈牙利，这是已征得卡齐米日同意的，而且由于其作为王室领地的独立地位而使得这一行动相对容易一些。他批准割让西里西亚给卢森堡。他把有争议的边界领土转让给了勃兰登堡。这些举措和匈牙利官员的行为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怨恨，最终导致在1376年克拉科夫暴乱中许多匈牙利贵族被杀害。1380年，路易把对波兰的统治权移交给小波兰统治者的决策委员会，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但这对于改善大波兰对他摇摆不定的支持态度并没有多少帮助。1382年9月他去世后，继承问题仍然十分棘手。波兰的统治者曾经许诺接受他的女儿玛利亚(Maria)作为继承人——但是当路易试图把安茹家族和卢森堡家族合为一体，并坚持认为玛利亚应该嫁给不受欢迎的卢森堡的齐格蒙特(Sigismund)时，他们拒绝承认玛利亚。路易做出了妥协，让另一个更年轻的女儿雅德薇嘉(还不到10岁)做继承人。小波兰同意了。但是大波兰想要波洛次克公国的齐莫维特四世(Ziemowit IV)当国王，而南部的安茹对雅德薇嘉的支持让他无力抵抗，亲雅德薇嘉的军队的进入迫使齐莫维特退出了王位的竞争。

如果她可以解除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威廉(Wilhelm)的婚约而与齐莫维特结婚，大波兰的领导人们就同意接受雅德薇嘉。1384年10月15日，她被加冕为“国王”(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抛弃法律和习俗的时代)。南方的领主们很少有大波兰偏狭的地方主义。他们同样可以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与卢森堡和安茹家族的人一样好。雅德薇嘉的婚约被解除——不是为了齐莫维特，而是由于她嫁给了没有受过教育的异教徒、立陶宛大公雅盖洛(Jogaila)。雅盖洛的地方代表们对于继承亡夫爵位的路易的寡妇伊丽莎白以及小波兰的领主们很感兴趣。1385年8月14日，在立陶宛的克列沃(Kreva)，雅盖洛在所签条约中明确表示，他和他的立陶宛人民会皈依天主教；他会娶雅德薇嘉，用金钱去补偿失望的哈布斯堡的威廉，而且要把自己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的庞大公国并入波兰。从此小波兰的贵族们在这样一个统一的王朝中开始大展身手，以一个12岁小女孩的感情换回来的这一局面是十分值得的。先前的波兰皮亚斯特王朝现在已站在了通往新的未知命运的路口。

第二章 雅盖洛时期的波兰 (1386 — 1572)

1386年2月15日,立陶宛的雅盖洛在克拉科夫大教堂接受天主教洗礼。他的教名为瓦迪斯瓦夫(Władysław),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完成波兰“王冠”王国再统一的沃凯塔克,同时这也足以解释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厄内斯特·冯·佐林格(Ernst Von Zöllner)拒绝受邀成为其教父的原因。在1387年秋天,摩尔达维亚大公(Hospodar of Moldavia)彼得一世·穆沙特(Peter I Mushat)为了自己的领土决定不再效忠于匈牙利统治者,转而对波兰的瓦迪斯瓦夫和雅德薇嘉纳贡称臣。穆沙特和佐林格都意识到了一个新的政权已经来临。还不到100年,不只是波兰和立陶宛,就连匈牙利和捷克都处于雅盖洛家族的统治之下。这是欧洲版图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联合王朝。

38

然而事态表面的发展却让人看不出这一趋势。1386年却是条顿骑士团对立陶宛的存在造成了威胁。仅仅在3年前,他们对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大部分地区进行洗劫,还摧毁了塔凯(Trakai)大要塞,使其长达一个世纪的不间断的血腥掠夺达到了顶峰。内战使立陶宛陷入混乱分裂。位于西部“下”立陶宛(‘lower’ Lithuanian)的日姆兹(Žemaitija),被雅盖洛的堂兄和对手维托尔德(Vytautas)作为前来援助的回报割让给条顿骑士团。雅盖洛为了逆转似乎不可避免地被

敌人征服的命运,决定冒险一搏,与波兰联合并接受拉丁基督教。

39 立陶宛是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政治实体,它的国土从北部波罗的海到南部的黑海,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上游,并在东部越过第聂伯河(Dnieper)。在蒙古军队于13世纪30年代开始入侵时,其历代统治者就一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在14世纪末期,严格意义上的立陶宛人数量不可能超过30万。他们很快将被东正教基督徒居民的数量超过,后者的数量大体上是异教徒的7倍还多。格底敏王室的许多后代都皈依于东正教,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方针使立陶宛大公可以更加便利地统治罗斯人民。政府大臣之间普遍使用的语言被语言学家称为“中古白俄罗斯语”(Middle Belarusian),虽然里面还混杂着本地立陶宛语和拉丁语。直到16世纪中期,立陶宛语才开始用于书面表达。对绝大部分国民来说,立陶宛的“大公”的称号是以波兰语“*Hospodar*”来命名的,而不是以立陶宛语“*didysis kunigaik štis*”。形式上不受限制的王室权力使得其政治和军事实力急速膨胀。于是发展出一种或多或少以通过兄弟和近亲来进行统治的联合方式,虽然血亲之间也会周期性不可避免地发生血腥对抗。雅盖洛本人在1382年就是通过谋杀他叔父凯伊斯图特(Kestutis)才得以掌权的。1387年2月,雅盖洛(Jagiłło,其名的波兰语写法)创立了维尔纽斯主教区,并命令他的武装随从(boyari sive armigeri)都皈依天主教,他的目的在于不给骑士团以任何借口对他的国家进行劫掠。与波兰的雅德薇嘉同为联合王朝的统治者,雅盖洛希望来自波兰的支持可以帮助他抵抗骑士团以及凯伊斯图特危险的儿子——维托尔德。

雅盖洛接受波兰王位的原因远不只是为了寻求一个抵抗联盟,或是获得保护从而免受骑士团的侵犯。在格底敏(1315 - 1341)以及随后他的两个儿子奥尔盖得(Algirdas, 1345 - 1377)和凯伊斯图特(1345 - 1382)的联合统治之下,立陶宛快速扩张,这为立陶宛本国带来了许多困难。在任何情况下,数量上远远处于劣势的立陶宛人在维持对罗斯国的统治上都存在着许多现实的困难。1363年,奥尔盖得在蓝水(Sine Wody)击退了蒙古金帐汗国,巩固了他对基辅的控制,也大大

地提升了立陶宛的威望。在这些空旷领土上的波雅尔贵族愿意接纳占统治地位的格底敏王朝的俄国化和信奉东正教的统治者。这个过度扩展的王室在这种勉强的容忍之下还可以维持多长时间的统治,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当然,俄国化就意味着立陶宛文化特性的丧失。然而俄国化并不能解决来自条顿骑士团的切实威胁,对于骑士团来说,异教徒和分裂者都是他们打击的对象。不仅如此,14世纪时,在东部,一个新的罗斯政权巩固、壮大起来——它就是莫斯科公国。这超出了立陶宛统治者的管辖范围。两者之间的摩擦可以追溯到14世纪30年代。1380年,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Dmitrii Donskoi)在库里科沃原野大胜蒙古鞑靼军队(这次胜利之所以可能,部分是因为立陶宛无法兑现曾允诺金帐汗国的马迈汗的支持),然而这次胜利并没有解除蒙古对莫斯科的统治:但是这次胜利的确使莫斯科与立陶宛一道成为继承基辅罗斯国的可靠人选。只要有立陶宛王公试图从维尔纽斯的统治下脱离出来(正如雅盖洛俄国化的同父异母兄弟波洛次克大公“驼背的”安德鲁[Andrew the Hunchback]在1377—1378年所做出的尝试),这些举动就会受到莫斯科公国的极大鼓励。不过,在1383—1384年间,季米特里确就自己的女儿索菲亚(Sophia)与雅盖洛的婚事与之进行了认真地磋商,但最终未果。季米特里坚持让雅盖洛皈依东正教。如果双方达成一致的话,我们可以想见,东欧的历史进程可能会变得大不相同。

选择信奉天主教意味着在将来至少要面对来自条顿骑士团的威胁,而与波兰联合则意味着组成牢固联盟来对抗骑士团。天主教化(并不是以罗斯人民的东正教徒为目标,而是立陶宛的异教徒)还在将来还可以保护立陶宛文化特性——当然是以它不被波兰化为前提。但是这场联合最初提供的也就只有这些美好的前景而已。雅盖洛的贵族们表示赞成联合,因为他们曾得到许诺能参与统治波兰,就像他们参与统治罗斯一样。在1387年2月,雅盖洛向他的波雅尔贵族承诺,他们将和波兰贵族享有同样的权利和特权。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雅盖洛发现,在波兰联合王朝中,反对他堂兄维托尔德及其支持者的阴谋的人,与对抗骑士团的人一样多。波兰的政府机构中没有立陶宛人,但是

很多立陶宛政府机构的职位却被小波兰主要的贵族所把持,并且众多的立陶宛要塞都是由波兰的军队驻守着。1387年的权利许诺是毫无意义的——立陶宛缺乏地方集会机制、司法机构,以及单凭自身就可以赋予这一措施生命力的文化传统。

对此感到最挫败的人就是维托尔德。他不仅只是一个骄傲自大、野心勃勃的青年王公,而且深深地浸透着格底敏家族的命运,他决定去保护甚至是扩展对基辅遗产的拥有权。他与雅盖洛一样,对于立陶宛诸多的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异教信仰不是长久之计,但是对于采用何种形式的天主教,他同样觉得无关紧要,只要能帮助他迷惑敌人,并维持他对自己王朝和立陶宛罗斯国土的统治就行[1383年与条顿骑士结盟的时候,他“皈依”天主教;1384年又改奉东正教,而在1386年再次皈依天主教;在其后半生,他对捷克胡斯主义(Hussitism)^①表现出不当的兴趣]。在1385—1386年间,他的政治选择是天主教——但不是以对波兰俯首称臣为代价。正是宗教选择上的左右摇摆,决定了他政策的变化无常,这也使他的敌友(这两者常常很难区别)对他充满着愤怒、绝望以及模糊的赞赏相交织的情感。对可能臣服于波兰的恐惧,同样也解释了之后几个世纪它们两国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

小波兰的男爵们决定将王座让给一个异教徒统治者,这一事件在欧洲中世纪编年史上极为引人注目。1385年8月14日的《克列沃条约》以非常概括性的条款责成雅盖洛承担起收复“所有从波兰王国……被偷走的土地”的任务,其次才是被骑士团国家吞并的领土。小波兰封建领主更加关心化解来自立陶宛本国的危险,以及确保由“伟大的”卡齐米日所征服的加里奇罗斯肥沃的领土的安全,因为不仅是立陶宛,甚至匈牙利也对这片土地提出了权利主张。大约就在1376年,雅盖洛还

^① 约翰·胡斯(1369—1415):捷克爱国主义者、宗教改革家、布拉格大学教授和校长。他反对德意志封建主和天主教会对其的压迫和剥削,他的活动受到天主教会和教皇的仇视。1414年,他被教皇关进监牢,次年,被烧死。天主教会这一罪行激起了捷克全国人民的愤怒。在胡斯党人的领导下,1419年,捷克爆发了反封建的农民战争,具有鲜明的反对天主教和德意志封建主的色彩。——译者注

亲自参与了一次野蛮袭击,使得桑河(San)和维斯瓦河之间富饶的农田成为荒地。《克列沃条约》似乎表明,他会把立陶宛合并到波兰。波兰人在长达150多年的时间里都对此深信不疑。随后陆续签订的一系列条约[1401年所谓的维尔纽斯《联盟条约》;1413年《赫罗德洛(Horodło)联合条约》;1432年《格罗德诺(Grodno)条约》;1499年《维尔纽斯条约》]不断表明着立陶宛的合作或是屈从。1385年的条款中用“applicare”一词来代替“incorporate”,到底有没有表达后者的意思,这在波兰和立陶宛历史学家之间引起了激烈地讨论,但当时的波兰人对它所包含的意思显然毫不怀疑。另一方面,雅盖洛和他的继任者其实根本没有想过去实现这些完全是策略性的承诺。

42

这两种不同的“联合”说明波兰和立陶宛根据当时不断变化的环境,一直尝试去重新定位和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信奉天主教的立陶宛上层集团越来越赞同一种完全联合的王朝的价值,同时他们也寻求最大限度地保留自己的政治权利。波兰人则极力争取对立陶宛公国最大程度的影响力和权力;而最后的结果就像这些条约中表述的一样,常常是一片混乱,甚至相互矛盾的妥协,完全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历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也是争论不休。比如1499年在维尔纽斯的联合,重申了1413年《赫罗德洛联合条约》的条款(在这个条约的“导言”中,明确地责成立陶宛合并到波兰王冠王国,但是之后又将两国视为独立的政体),以这样一种方式忽视合并议题;继而提出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的王公举行一次共同的选举,选出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但是没有任何用于选举的正式机制。这表面上令人困惑的关系正好与雅盖洛王朝的统治相适应。因为他们对能在立陶宛享有世袭地位感到很满意(尽管波兰方面在某些条款中明确或是含蓄地表示,他们并不享有这样的地位),并且他们也从中得到了保证,会继续被选为严格意义上的波兰国王。波兰的大贵族也继续垂涎着能从立陶宛广阔的地域上获得土地和官职。几乎所有相关人群——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罗斯人——都认识到这种关系带来的益处;然而最终都没有解决的争论是,这种关系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图4 克拉科夫瓦维尔宫大教堂瓦迪斯瓦夫·雅盖洛的雕像。这是留存下来最早的波兰君主的真人大小雕像。

与立陶宛联盟,波兰的地位就变得十分重要;没有立陶宛;波兰微不足道。但波兰仍旧十分脆弱。对于心存疑虑的大波兰贵族,雅盖洛地位的提升是小波兰的男爵为赢得政治统治的赌注。“伟大的”路易授予他的帮手,在西里西亚的皮亚斯特五室后裔——奥普莱(Opole)的瓦迪斯瓦夫的一条带状封地,将两个省在地域上分割开来,瓦迪斯瓦夫于1392年实施了一个计划,想让骑士团国家和匈牙利的齐格蒙特瓜分波兰王冠王国的土地。但是1396年他的土地强制性地被雅德薇嘉和她的丈夫所吞并。1387年,匈牙利的内部动乱帮助雅德薇嘉重新收复她父亲从波兰传下来的罗斯领土。随着皮亚斯特王室的较小分支消失,特别是那些与玛索维亚公国有关联的分支消失,波兰王国的狭窄土地开始慢慢地艰难地扩张。直到1526年,波兰和它的首都华沙(Warsaw)才最终合并。而西里西亚和西波莫拉尼亚甚至仍然处于掌控范围之外。波兰王国缺少吞并立陶宛的实力,即使是在雅盖洛王朝消失之后,立陶宛的主要领主们仍然对波兰的这种渴望保持警觉。1422年后波兰和立陶宛奉行不同的对外政策,但常常是互补的;波兰注意着南方和北方,而立陶宛则向东发展。它们的关系长期紧张,尤其是在关于罗斯南部领土波多尔(Podole)和沃里尼亚(Volhynia)的统治权问题上。1440年立陶宛的权贵们单方面认可大公雅盖洛的二儿子卡齐米日继位,实际地动摇了双方的联盟,直到1446年卡齐米日由波兰人选举成为国王。同样,在1492年,雅盖洛的外孙杨·奥尔布拉赫特(Jan Olbracht)和亚历山大(Alexander)分别独立继任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严格地说也造成了类似后果。直到1501年,亚历山大在波兰继承其无子嗣的兄长的王位,两个国家才再次走到了一起。

这种关系在最初几年得以保持下来,是因为雅盖洛和维托尔德可以调解他们之间的不同,有效平等地进行合作,令人回忆起从前奥尔盖得和凯伊斯图特和谐统治的光辉时日。1392年,雅盖洛承认他的堂弟为立陶宛“大公”(dux),但却为自己保留了“宗主大公”(supremus dux)的正式宗主身份。双方都对生出能正统合法继承波兰和立陶宛



地图3 雅盖洛统治时期的波兰(1386—1572)



王位的儿子抱有希望。但最终是雅盖洛胜出,在他 72 岁高龄时,在他的第四次婚姻时(雅德薇嘉死于 1399 年):1424 年瓦迪斯瓦夫^①出生,1426 年卡齐米日^②出生。后者在 1440 年得到立陶宛大家族单方面拥护成为世袭的大公(*Hospodar*),这次任命是继 1430 年 10 月维托尔德去世后,对于雅盖洛任命的、暂时的相互竞争的继任者之间长达 10 年的敌对斗争的终结。卡齐米日四世在 1447 年加冕为波兰国王,而在前一年,他已赢得了波兰权贵的拥护,这些都使得稳定的两国关系一度恢复。

帖木儿大败金帐汗国的蒙古人,维托尔德受此鼓舞想趁机从金帐汗国手中夺回旧罗斯国的土地。但是他高估了金帐汗国内部的混乱。1399 年与蒙古鞑靼在南部沃尔斯克拉河(*Vorskla*)发生的激战浇灭了他宏大的期望,他带领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他必须承认自己前几年戏弄骑士团国家是多么愚蠢,通过《萨林(*Salin*)和约》,他被迫批准骑士团占有日姆兹领土。条顿骑士和他们的联军,立沃尼亚的持剑骑士现在就有了对抗维尔纽斯的充足理由。维托尔德几乎刚一交出日姆兹,就开始计划如何将其收复。他可以依靠雅盖洛的支持。但国王和他的波兰臣民都没有正式卷入维托尔德的战争。然而很多波兰人以一己之力在为他服务:1399 年在沃尔斯克拉的起义,1401 年到 1404 年间他在日姆兹煽动的多次起义,以及 1409 年的再次起义。他们帮助驻守位于立陶宛的要塞。1402 年骑士团从卢森堡的齐格蒙特手中购买了位于大波兰西北边界的纽马克(*Neumark*),这对大波兰的贵族是一个警告。但是在 1409 年 7 月,雅盖洛说服他的波兰臣民对骑士团在立陶宛发起的任何攻击进行公然地对抗。同年 8 月,骑士团大团长乌尔里希·冯·容根(*Ulrich von Jungingen*)做出回应,开始攻打波兰北部。

一场长期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虽然波兰最后取得“胜利”,但并没

① 瓦迪斯瓦夫·雅盖洛是瓦迪斯瓦夫二世,1424 年出生的瓦迪斯瓦夫是雅盖洛的儿子,1434 年加冕后称为瓦迪斯瓦夫三世。

② 1426 年出生的卡齐米日是雅盖洛的次子,于 1447 年加冕后称为卡齐米日四世。

有真正地解决问题。直到1466年它才收复在沃凯塔克统治期间被骑士团夺去的领土。1410年7月15日,波兰-立陶宛的联合武装在格伦瓦尔德(Grunwald)村和坦能堡(Tannenberg)附近打败骑士团,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但没有攻下马林堡。躲在坚固防御后面的骑士团坚不可摧,因为他们的敌人缺乏长期围攻作战的实力。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消耗战(1409—1411年、1414年、1422年、1431—1435年),并没有使波兰王冠王国得到任何领土。在1422年9月的《梅尔诺(Melno)和约》后,立陶宛至少确保了日姆兹的无条件归还。维托尔德和他的继任者将注意力集中到罗斯上。与波兰联合对抗骑士团的协作关系也基本上终止了。

48

永无宁日的周期性战争给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的领地以及周边地区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德意志在政治和人口上的双重危机导致骑士团可征兵源的严重短缺,骑士团试图通过越来越严苛的财政税收政策加以弥补。1454年3月6日,王冠王国宣布了一个将普鲁士并入波兰的法案,这是为了应对以但泽(Danzig)、托伦(Thorn)和埃尔宾(Elbing)为首的一些城镇和骑士团内部城民不断发生的骚动和谋反。最初叛乱的范围广大,这使人们以为或许不需要战斗就可以把骑士团一扫而空。波兰鼓起勇气,但是它的国库已空。一开始,卡齐米日四世仅能负担起2000名雇佣兵的费用。在1454年9月18日的霍伊尼采(Chojnice)战役中,波兰的民团(*levée en masse/ pospolite ruszenie*)^①惨败。这场波兰和骑士团的战争一直延续了13年。虽然波兰在国内征收重税(波兹南城堡主皮欧特·希维德瓦[Piotr Świdwa]控诉“国王在这场战争中的花费比普鲁士的全部价值还要多”),但主要的经济支出还是由普鲁士自己承担。不过骑士团也遇到了财政困难。1457年6月,骑士团的捷克雇佣兵将马林堡拱手让与波兰,做为回报,波兰支付了骑士团拖欠雇佣兵的佣金。1466年10月19日的《托伦条约》,表明

^① 指所有成年男性贵族或骑士响应王室政府的召集令,拿起武器参加出征而组成的武装力量。



图 5 1379—1380 年间的但泽/格但斯克的市政厅。注意其 16 世纪佛兰德的建筑风格，这受到但泽的贸易往来对象的很大影响。1945 年后市政厅得到大面积修缮。

骑士团受到重大创伤。骑士团国家西部维斯瓦河下游沿岸的富饶领土,成为波兰享有宗主权的“王室普鲁士”(Royal Prussia)。富有的瓦尔米亚(Warmia/Ermeland)地区也从骑士团领土上分离出来,成为波兰王国统治下一块独立的领地。骑士团保留了哥尼斯堡港及周边地区,为了这块贫瘠的土地,其团长也不得不对波兰尽忠。

成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尽管 1454 年并入波兰,但“王室普鲁士”在法律上为其上层统治者赢得了足够的自治权,他们可以将自身看做是一个独特的政治单位。继任的骑士团大团长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改变他们的封臣地位,甚至企图颠覆《托伦和约》。1497 年到 1510 年,在任的骑士团大团长萨克森的腓特烈(Frederick)成功地逃避了向波兰纳贡称臣的义务,并大力支持闹分裂的瓦尔米亚主教,导致了 1478 - 1479 年间的短暂冲突,史称“教士战争”(‘the padres’ war/*wojna popia/pfaffenkrieg*)。1501 年杨·奥尔布拉赫特国王逝世,波兰没有再通过军事手段声明对骑士团的主权。萨克森的腓特烈的继任者、霍亨索伦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继续拒绝向波兰纳贡尽忠,最终导致 1519 年双方再次公开地发生冲突,并于 1521 年 4 月以一个不了了之的休战协议而结束。马丁·路德的意外介入,扭转了局面也帮助解决了困境。1525 年 3 月,阿尔布雷希特团长向国王齐格蒙特一世提议,将波兰统治的普鲁士土地上的骑士团还俗。他曾经支持至少从 1523 年就已经开始的哥尼斯堡改革。但他的计划同样也面临破产:骑士团土地的还俗将他拖入一个财政黑洞,很长时间都无法从中摆脱。骑士团少数留存成员对能分得一杯羹已经表示满足。1525 年 4 月 8 日的《克拉科夫条约》是对 1466 年《托伦和约》的重申,但是将东普鲁士(当时叫普鲁士公国[Ducal Prussia])赐予骑士团大团长做为世袭领地,并成为波兰王国的属地。两天之后,在克拉科夫的布料大厅(cloth-hall)外面,阿尔布雷希特做为其领地上第一个信奉路德宗的统治者,完成了忠诚的宣誓。当他的血系消失后,公国将会归还于波兰。同时代的人批评齐格蒙特没有着手进行彻底的合并。但无论如何,经验表明,合并的过程很可能会导致更持久的战争——波兰和立陶宛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前景,

在他们辽阔漫长的边界四处战火弥漫、硝烟四起。而一个还俗的路德教普鲁士公国将会完全依靠于波兰王国,并且还可能回到波兰的手中。

51 南方的发展似乎弥补了北方的困境。在 14、15 世纪之交,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室的权力都岌岌可危。雅盖洛王朝试图得到这些土地,因为这两国国王也正有此意,他们希望保护自己的国家免于落入充满敌意的统治者手中。卢森堡王朝过去的诡计多端,还有安茹家族和条顿骑士的勾结,这些都有助于波兰人在这片土地上拓展自己的影响。但是自 1434 年雅盖洛逝世后一直统治波兰的摄政委员会,于 1440 年做出了严重失误的决策,他们试图把年幼的瓦迪斯瓦夫三世强加给匈牙利。之后,在其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爆发的内战因为一场对抗土耳其人的误导性的十字军征讨而暂时中止。1444 年 11 月的瓦尔纳港(Varna)战役中,瓦迪斯瓦夫在战斗中阵亡。多亏亚诺什·匈雅提(John Hunyadi)优秀的指挥才干,才避免了基督教军队的彻底毁灭。

事实证明,通往匈牙利的曲折道路必须取道波希米亚。在那里,贵族与权贵之间、胡斯运动者和天主教徒之间长期争斗,他们用各种手段寻求外界的支持,这些都使得 1469 年卡齐米日四世的长子瓦迪斯瓦夫被选举为待任国王。两年后,波迭布拉迪的耶日(George of Poděbrad)去世,瓦迪斯瓦夫加冕成为国王。然而这次继位引发了他与强大的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尔温(Matthias Corvinus)之间的冲突,到 1474 年,马提亚已经从他手中成功夺取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劳奇兹。卡齐米日四世试图给他的儿子以支持,但由于资金缺乏只得作罢。

马提亚于 1490 年 4 月逝世,但没有留下一名合法继承人。瓦迪斯瓦夫是众所周知随和的“好”(fine/bene)国王(据说他对任何要求都用这个词作为回答)。经历过前国王的苛刻统治后,匈牙利大贵族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国王。于是在 1491 年 2 月,他们选举他为国王。卡齐米日四世曾经希望他们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二儿子杨·奥尔布拉赫特成为国王。他甚至为此发动了一次损失惨重的军事干涉,但是 1492 年 1 月在普雷绍夫(Eperyes),这场干涉还是以奥尔布拉赫特的失败而告终。不过也正是杨·奥尔布拉赫特,而不是瓦迪斯瓦夫,在同年 6 月卡齐米日

逝世后当选为波兰国王。另外一个年轻的兄弟亚历山大,由立陶宛的贵族推选为立陶宛的大公:部分原因是为了遵从老国王想给最小的儿子提供生活保障的愿望;另一部分是出于打消波兰的吞并野心的考虑。

雅盖洛家族获得了最大的收益,但多数显然是各国权贵请他们来参政的。杨·奥尔布拉赫特和亚历山大分别继承波兰王位和立陶宛大公,说明这是一个高度分裂的政治集团。他们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统治面临持续的国内叛乱,反对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由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所怂恿的,特别是在圆滑的政客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的鼓励下,他们都对这些领土有着自己的打算。马克西米连一世随时随地都在给波兰的雅盖洛统治者制造着麻烦:他教唆条顿骑士团拒绝遵守《托伦和约》,甚至还怂恿莫斯科公国向立陶宛宣战。

52

虽然与哈布斯堡的复杂关系令人担忧,但这还是无法与土耳其帝国崛起导致的问题相提并论。在让瓦迪斯瓦夫三世损失惨重的瓦尔纳战役中,波兰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主角是匈牙利人。随着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攻占君士坦丁堡,业已建立的土耳其帝国很明显地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上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他和他的继任者都急切地想要拓展他们在欧洲的领土,控制黑海盆地。1475年,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承认了土耳其的主权,允许土耳其人在他们的沿海城镇设立要塞。当时由于供给、地形和路途遥远而造成的不便,使土耳其人很难彻底地吞并多瑙河畔的瓦拉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公国——后者是自雅盖洛继位后波兰的属国——但很明显,他们对维持自己完整无缺的独立性不抱有什么希望。

摩尔达维亚大公在比他更具实力的邻居波兰、土耳其和匈牙利之间巧妙的周旋,才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实际上,这意味着他随时都有可能站到其中拥有最强实力的国家一边。卡齐米日四世策略性地认可了摩尔达维亚的斯特凡大公(Stephen,统治时期为1457—1504年)向苏丹每年上贡2000达克特^①做为对土耳其宗主权认可的象征——

① 从前流通于欧洲各国的钱币。——译者注

毕竟,波兰和立陶宛的统治者也同样向伏尔加河和克里米亚的鞑靼支付年贡,用于防止他们侵袭自己的土地(成功的时候较少)。在对摩尔达维亚施加影响的问题上,波兰和立陶宛是竞争对手,这样的敌对状态阻碍了它们之间的合作。凭借匈牙利的帮助,斯特凡在1475年和1476年有能力阻止土耳其吞并他位于黑海的港口科里亚(Kilia)和阿克曼(Akerman)(即贝尔格莱德),但是在1484年,他无法阻止这些地区沦陷于庞大的土耳其-鞑靼军队手中。来自波兰的帮助使他能够在1485年收复一些失地,但这两个港口依然在土耳其手中。波兰由于同意保持新现状的休战协议而激怒了斯特凡,这一新现状使他失去了两个港口,而且还必须允许他们的商人在港口进行自由买卖;而他不得不继续承认波兰的宗主权,同时向土耳其纳贡,并承受失去两个最重要商业中心所造成的损失。

为此斯特凡深感羞辱。他和他的继任者试图通过夺取波兰边界领土波库察(Pokucie/Pokutija)来发泄他们的愤怒。1497年,奥尔布拉赫特在他另一次欠妥的袭击中,发起了向摩尔达维亚进攻的大规模远征。表面上,他是想再次尝试将土耳其人从科里亚港和贝尔格莱德港赶走,但实际上是为了把他的弟弟齐格蒙特安置到公国的王座上。他对摩尔达维亚的首都苏恰瓦(Suceava)的围攻遭到了惨败,而奥尔布拉赫特撤退的部队也蒙受了重大的损失。虽然这些灾难意味着波兰已经失去了宗主权,但是摩尔达维亚仍然对波库察发起猛攻;与摩尔达维亚的关系对波兰来说一直比较棘手,直到1538年“了不起的”苏莱曼(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宣称对他的附属国(已不再属于波兰)加以更严密的控制后,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

与摩尔达维亚的纠葛,逐步被与克里米亚的鞑靼之间更加纷扰的关系所掩盖。在15世纪期间,原属金帐汗国蒙古人的领土分裂成若干各自独立的小汗国,分布在克里米亚和伏尔加河下游沿岸地区。作为立陶宛大公的雅盖洛家族总体上来说希望与这些蒙古汗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且在这些汗国内讧的时候总是试图尽可能地掌控他们,以共同对抗日益强大的莫斯科。在1475年克里米亚屈服于土耳其帝国的

统治后,土耳其的苏丹并不刻意限制鞑靼人劫掠他国。其他暂且不提,鞑靼的入侵就时刻提醒着土耳其的盟友,也同样提醒着他的敌人:土耳其帝国的疆土是何其广大。劫掠是鞑靼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主要采取抓捕俘虏,然后在卡法(kaffa)和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上卖出获利的方式敛财。比起土耳其其他肆无忌惮的封臣和巴巴里(Barbary)的海盗,鞑靼的远征掠夺在地中海和欧洲大西洋沿岸造成的伤害更加严重。在15世纪最后的25年里,鞑靼的袭击造成立陶宛的罗斯领土上大片土地荒无人烟。1482年,他们洗劫并焚毁了基辅的大部分地区。1505年,他们到达维尔纽斯的郊区。1490年,他们深入到波兰内部,距卢布林只有几十英里。10年之后,鞑靼威胁到玛索维亚的首都华沙。波兰之所以没能给摩尔达维亚提供更多的帮助,原因之一就是波兰自己的兵力受到牵制,要用来对抗这些入侵者。鞑靼的军队善于移动作战,并具有极其顽强的意志,几乎是不可能战胜的敌人。要打击他们,除非在他们做尽坏事,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和俘虏返回家乡时发动突袭。波兰和立陶宛的武装部队取得过少数胜利,但仍然无法抵抗他们闪电般的突袭。在15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立陶宛失去了对黑海北岸一直薄弱的统治。在15世纪最后几十年间,鞑靼的大肆侵略造成的破坏,使第聂伯河东岸的移民和殖民进程终止了两代。明里·格莱(Mengli Gerei)汗自己也认识到,沿着边界的这些土地,即“乌克兰”(Ukraine)已经变成空无一人的荒地。而减少袭击的唯一方式就是给克里米亚的可汗们送上“礼物”——保护费,然而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不能控制所有臣民的掠夺行为。

54

在齐格蒙特二世统治时期,如果鞑靼袭击波兰和立陶宛领土的强度有所减弱,那一定得归功于乌克兰土地上改良的要塞和防御工事,以及“哥萨克人”——逃亡者、小(中等)贵族、冒险家或是那些就是想要自由自在生活的人——开始在人口密集地区的边缘生活。“Cossack”一词来源于土耳其语,大概包含了“边卫”和“流窜的歹徒”两层意思。国王、公爵还有官员对他们进行资助,哥萨克人是可以和鞑靼人相抗衡的一类基督徒,他们受到优厚的待遇,同样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为他

55 们不仅深入鞑靼人的领土进行劫掠,而且还袭击克里米亚。他们是不稳定的、可控制的(如果想完全掌控),但只是对于那些和他们有关、受他们尊敬的人——那些出身高贵、残忍而大胆的人,这些人对于自己统治者的命令毫不关心,就像对于波兰、立陶宛、克里米亚和土耳其周期性的协商休战也毫不在意一样。哥萨克人的行动对阻止克里米亚的袭击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使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或许鞑靼军队的袭击得以缓解是因为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可汗们认识到莫斯科不断增长的实力,特别是伊凡四世(Ivan IV)在1552年和1556年成功地取得喀山(Kazan)和阿斯特拉罕(Astrakhan)之后。倘若波兰国王依然乐意为鞑靼献上慷慨的厚礼,克里米亚蒙古人则会倾向于去袭击莫斯科的领土而不是波兰和立陶宛,这两个国家再衰弱下去只会有助于莫斯科人向南扩张,侵占鞑靼的土地。

雅盖洛王朝最后几位国王,亚历山大(1501—1506)、齐格蒙特一世(Zygmunt I, 1506—1548)和齐格蒙特二世(1548—1572)都试图与土耳其保持良好关系。意识到王朝的过度扩张,他们放弃了自己对南欧的统治而让哈布斯堡接管。齐格蒙特一世对他的侄子、匈牙利的路易二世在莫哈奇(Mohacs)注定要失败的战役中没有给予什么帮助:不仅是因为波兰在最近的普鲁士征战中消耗得筋疲力尽,而且1524年土耳其也曾发出警告,禁止任何人在土耳其武装侵袭(只是针对鞑靼人)波兰时有所插手,这次侵袭曾深入到利沃夫。当瓦迪斯瓦夫的儿子和继任者——路易二世于1526年2月在莫哈奇的战役中被杀害,同时匈牙利的军队也被歼灭时,正是哈布斯堡轻松地获取了喀尔巴阡山以南雅盖洛王朝的遗产。根据1515年《布拉格条约》,路易的妹妹安娜(Anna)嫁给了查理五世(Charles V)皇帝的兄弟斐迪南(Ferdinand),如果他没有子嗣(后来他确实没有子嗣)的话,他将继承路易的土地。捷克人适时地推选斐迪南,而匈牙利人则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斐迪南,另一派支持来自本国的竞选者杨·扎波利亚(John Zápolya)。虽然齐格蒙特在匈牙利还继续持有残余利益——1529年他的女儿伊莎贝拉(Isabella)嫁给了扎波利亚——雅盖洛王朝曾经野心勃勃的计划如今

却成为不得不在扎波利亚、哈布斯堡和土耳其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正是由于土耳其的保护,而不是波兰的影响,使扎波利亚和伊莎贝拉的儿子杨·齐格蒙特在1547年后,做为受土耳其庇护者而长期逗留在特兰西瓦尼亚。

在立陶宛,接受拉丁基督教使得更倾向于天主教的本地立陶宛人和他们绝大多数的罗斯臣民之间产生了不和。波兰化的权利与特权的逐步渗透理应对罗斯的贵族们有着独特的魅力,然而,1413年的《赫罗德洛联合条约》里明确禁止由非天主教徒担任国家的主要领导。这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制定的政策中的一部分,特别是涉及维托尔德的部分,这一政策是为保证一个天主教化的立陶宛掌权人物统治整个罗斯地区。他唯一愿意委以重任的俄罗斯化东正教贵族是格底敏的近亲。在他去世后,这个亲立陶宛天主教徒的政策甚至得到了更加深入地贯彻执行。1470年,一名非王侯出身的天主教官员受命担任基辅的管理者,这在立陶宛历史上实属首次。他是被强加给这座城市及其人民的。对于东正教的贵族,特别是居住在偏远东部边界的贵族,他们为莫斯科服役通常似乎是为了给自己提供一条更有前途的发展道路,即使更多人希望获得和那些天主教徒一样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立陶宛的天主教统治,为莫斯科大公试图从维尔纽斯手中恢复罗斯土地提供了完美的借口。卡齐米日四世基本上成功地与莫斯科公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是在他统治末期,这种友好局面的实现,也只是由于对莫斯科公国再三地违背边界条约,以及莫斯科长期怂恿鞑靼进攻波兰的事实视而不见才得以实现的。1492年卡齐米日逝世后,伊凡三世便发动了战争。

56

相对来说,立陶宛松散的军队组织是由权贵与王公的随行部队、民团以及极少数的雇佣兵组成,根本无法与莫斯科人动员的更加成分单一的武装力量相抗衡。接连不断的持久战(1492—1494年;1498—1503年;1507—1508年;1512—1522年;1534—1537年)逼得立陶宛走投无路。1503年,立陶宛不得不把三分之一的领土割让给莫斯科。不可否认,这些领土都是立陶宛向来统治薄弱的地区;在随后的战斗中,漫长的战线使俄国沙皇的军事行动变得非常艰难。但这并没有使立陶宛掌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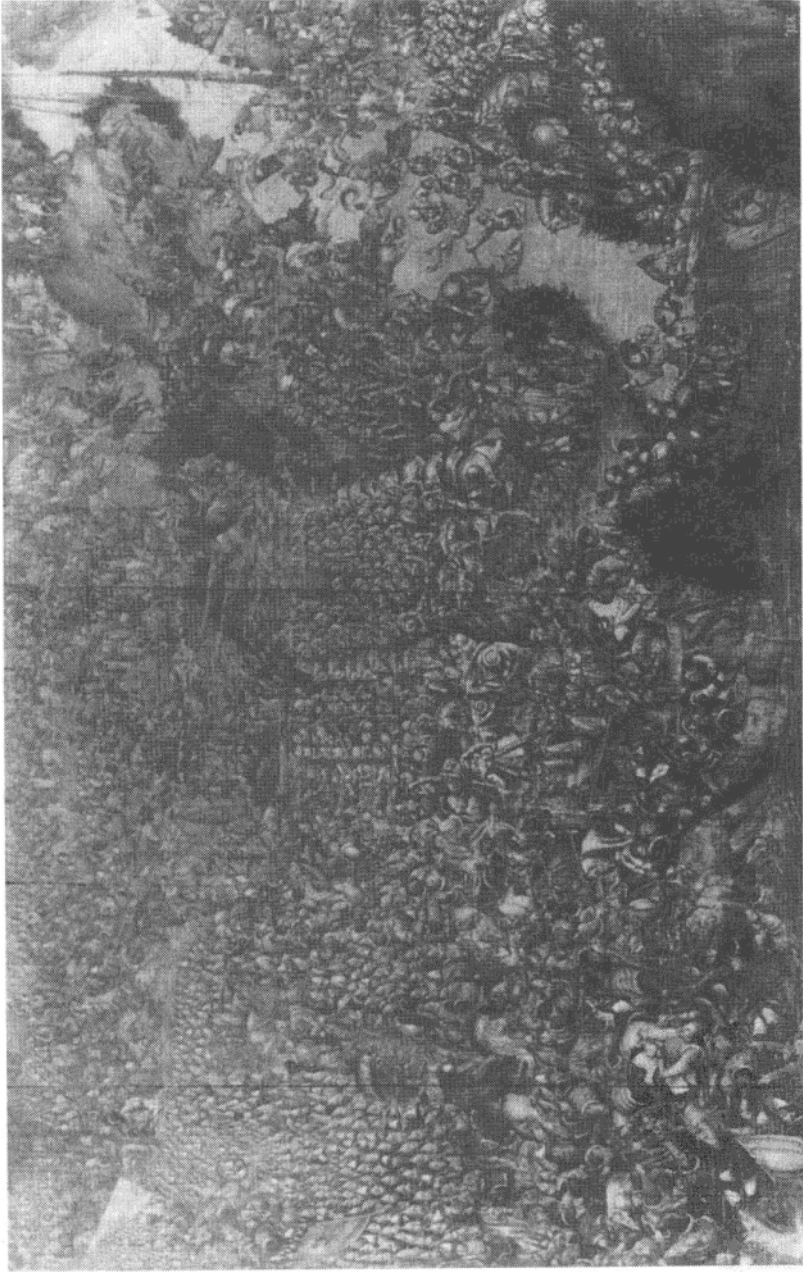


图6 1514年奥尔沙之战：一个不知名的画家所见，但几乎可以确定是立陶宛东北方战争的参与者。骑兵的佯退使俄国武装暴露波兰和立陶宛炮兵之前。然而这次胜利不足以让波兰-立陶宛从莫斯科公国手中收复已经失去长达20多年的领土（包括斯摩棱斯克城）。

人物感到丝毫安慰,尤其是因为这只是向别人暴露了他们军队的弱势状况,特别是对于鞑靼来说(就此而言也对于波兰人)。1492年,从立陶宛东部边界到莫斯科的距离还不到100英里,但到维尔纽斯则大概有400英里;而在1514年7月灾难性地失去斯摩棱斯克(Smolensk)后,边界向后退了大约一半距离。虽然波兰的志愿者和雇佣兵是为立陶宛而战,但直到1508年,齐格蒙特一世国王才说服波兰议会投票决定是否为遥远东方的战斗进行资助。来自波兰的军队与资金援助帮助立陶宛在1514年9月的奥尔沙河(Orsha)战役中获得了胜利,而且也牵制住了俄国的进一步入侵,但是斯摩棱斯克在接下来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仍处于俄国的统治下。1537年3月,莫斯科收回戈梅利(Homel)周边的土地,但比起立陶宛的损失来说,这只算是皮毛之痛。立陶宛得以喘息,很大程度是因为伊凡四世面临国内的棘手事情,以及他需要分散兵力去处理入侵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鞑靼蒙古军队。

58

正是在立陶宛北部和东部边界上,雅盖洛王朝将其最具野心、最重大的对外政策付诸实践。1525年普鲁士大公的获封,至少暂时性解决了波兰最伤脑筋的问题。立陶宛北部立沃尼亚领土处于条顿骑士团的姐妹组织持剑骑士团的控制下。到16世纪50年代,这些领土已主要属路德教会所有,而骑士团实际上已是一个非宗教组织,仅对神圣罗马帝国还保留着残余的忠诚。虽然立沃尼亚通过与立陶宛和俄国进行贸易征收关税变得富有,但是骑士团与里加(Riga)大主教无休止的争执造成了其政治上的软弱。这些对伊凡四世来说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他把立沃尼亚看做是留里克王朝遗产的一部分。如果他可以掌控立沃尼亚,那么他前往波罗的海就会畅通无阻,并且可以同时从东部和北部边界对立陶宛造成威胁。齐格蒙特·奥古斯特也对立沃尼亚表示出强烈的兴趣,不仅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因为立沃尼亚这座富有的城市或许可以为他长期经济匮乏的君主国提供新的资源。

齐格蒙特最初希望强迫其成为自己的诸侯国,这样就可以确保他所称的“波罗的海的统治权”(dominium maris Baltici)能够实现。然而他所拥有的波兰和立陶宛的领土,还没有为在这一地区进行长期大

范围作战做好准备。首先一点,波兰的军队和财政支持是非常不稳定的——波兰人只对立沃尼亚完全合并到波兰感兴趣,以此为结果他们才愿意持续提供支持。当然,立陶宛的统治者对于波兰人的这种做法也感到厌恶,因为他们把立沃尼亚纯粹看做是对立陶宛失去斯摩棱斯克的补偿。齐格蒙特想要兼用军事打击和不择手段的外交处理方式,但是真正的冲突是无法逃避的。通过大量转让王室领土和贷款、从波兰和立陶宛国会临时批准的少量税收、召集个别权贵的随从乃至民团,这些虽然使他能够为个别的战争配备一个威风的炮场,并召集到为数众多的军队,但是却绝对无法让他们在这场可能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持续作战(虽然他的敌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经过 1557 年 9 月到 1561 年 11 月间齐格蒙特与立沃尼亚大公里加大主教进行的一系列协商,最终达成双方协力将立沃尼亚完全合并到波兰王国的一致决定。骑士团彻底还俗,其最后的大团长戈塔尔德·克特莱尔(Gotthard Kettler)得到了德维纳河南岸的库尔兰(Courland)地区。这里成为附属于波兰的世袭公国。

齐格蒙特无力抗拒伊凡四世做为报复掀起的凶猛的入侵攻势。1558 年俄国占领纳尔瓦和多尔帕特(Dorpat),虽然俄国没能占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里加港,但 1560 年占领了位于中央的城镇费林(Fehlin)。此外,由于俄国还需要分心对抗克里米亚鞑靼,1563 年伊凡决定将主要战斗力转移直接进攻立陶宛,这样就避免了全面作战。同样,伊凡也警惕其他国家卷入这场战争。丹麦对立沃尼亚表示密切关注。1561 年,雷瓦尔(Reval)港出于对齐格蒙特有缺陷的军事方针的不信任,臣服于野心勃勃的瑞典国王艾立克十四世(Erik XIV),艾立克的武装力量开始扩展瑞典的统治范围,直至遍及爱沙尼亚。

伊凡转而对付立陶宛,减轻了不幸的立沃尼亚的压力,但是作为代价,使立陶宛在 1563 年 2 月失去了波洛次克要塞。1565 年在乌拉河(Ula)畔,立陶宛击败了俄国,然而这场战斗并没有带来持久的平静。更确切地说,它使鞑靼开始重操屠杀恶行(1570 年,莫斯科遭受了鞑靼四处纵火造成的大量破坏),并使伊凡在 1565 年 1 月宣布实行灾难性

的**特辖制**(*Oprichnina*),用以对抗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国内劲敌。从1566年7月开始,莫斯科和波兰-立陶宛领导者之间开始实行停战协议。齐格蒙特的拓展计划最终破产:比以往更多的立陶宛领土被俄国占领;而立沃尼亚在混乱中变得四分五裂:北部被瑞典占领、南部和西部驻守着波兰和立陶宛的要塞,而中央则聚集着俄国的武装力量。这一局势影响深远:为了向德意志帝国寻求支持,1563年3月,齐格蒙特同意假如普鲁士的阿尔布雷希特的支系断嗣,普鲁士公爵可以重获霍亨索伦王室的勃兰登堡分支的选举权,由此,1525年的《克拉科夫协议》就被雅盖洛王室自己的过度扩展所破坏。

从自然层面讲,王朝面对的问题几乎无法在拉丁基督教界的其他地方找到。1490年,波兰和立陶宛的面积涵盖广袤地域,已经达到法国的两倍,而人口数还不到800万。从克拉科夫或波兹南到立陶宛东部的维亚兹玛(*Viazma*)或布里安斯克(*Briansk*),大概有700多英里——几乎与到巴黎的距离一样远。维斯瓦河东的主要地形是森林、沼泽和大草原,所以那里的农业产量始终仅够维持生计。距离跨度大与资源匮乏,特别是在立陶宛,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总体较消极或者是防御性的对外政策。波兰的权贵把立陶宛视为雅盖洛家族的陪嫁,依照权利(众多的联合条约)立陶宛应该成为波兰人的财产。老齐格蒙特对在捷克、匈牙利和对抗土耳其帝国的任何远期计划上的放弃,都激励着他们看到立陶宛和罗斯新财富的前景。就立陶宛来说,他们担心波兰人的权力主张,不愿意承认维托尔德时期对罗斯土地的统治优势仅仅是过去的事情,一旦他们接受了来自波兰的军事援助,就总是觉得这些援助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维持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公国之间的关系其自身就是一种成就。只有土耳其宫廷和俄国面临可与之比拟的难题。他们的解决途径是实行长期不变、残忍的中央集权制,对于任何关于他们臣民的权利和特权的概念,都抱着完全不考虑的态度,但这在波兰是绝对行不通的。

雅盖洛契克·瓦迪斯瓦夫二世就任国王,不仅带来了领土,而且巩

固了“主教和贵族”(Prelates et Barones)上层集团的统治。1426年,当雅盖洛契克拒绝批准一项新提出的特权时,其大贵族在他面前把他小儿子继承王位的文件撕得粉碎。4年后,他网开一面批准了这个特权。他的继任者决不会被允许忘记他们是由选举产生的事实。他的第二个儿子卡齐米日四世,在他的大哥瓦尔纳的瓦迪斯瓦夫三世去世后,不得不又等了整整3年才被接受为国王,并且在1453年准备批准他的臣民享有特权之前,他还曾经遭受被罢黜的威胁。

“主教和贵族”(或称“教俗大封建主”[Proceres])首先是指御前会议的成员,在16世纪早期,御前会议被称为参议院,包括天主教大主教和国家官员(首相、财务大臣、法官);地方长官(省长[palatine/województwo]和大城市的市长),构成了乡村(terrae)和省级的上流阶层,他们脱离了曾经的皮亚斯特公国而结合在了一起。御前会议大约包括70名权贵,他们中间和国王一起协商、做重要决定的大概只有6人。会议成员取决于个人的才能和保护人(特别是通过王室大臣)。会议成员想当然地认为应该得到更多的王室恩惠——如果没有得到这些恩惠,他们就可以凭此制造事端。一旦指定成为御前议会成员,其任命则视为不可取消。

稍低等级的**贵族民团**参与封建征兵,大体上足以使自己被接收为一名骑士/绅士/贵族——什拉赫塔。尽管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为了使波洛次克和立沃尼亚公国于1495年和1526年合并到波兰王国这一进程顺利进行,据说奥尔布拉赫特和齐格蒙特一世将贵族的身份授予给成千上万的贫困小农——他们不识字、粗俗,急切想与另一些实际上也是农民的人区分开来。在16世纪中期,这导致了社会膨胀,持有“贵族”身份的人口占波兰王国国民总数大约500万人的6%左右——这个比例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保持到18世纪末。

扩大了**的贵族社群(communitas nobilium)**——什拉赫塔在**地方议会(Sejmiki)**上表达他们的希望和担心,这一机构源自皮亚斯特时期以来的司法和行政活动。在15世纪期间,这种做法逐渐形成了更大的地区集会,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代表者**,或者也可称为“**地方议会代表**”

(*nuntii Terrarum*)。贵族很大程度上自由地亲自参加更重要的王室会议。他们的出席使原来的封建主代表大会转变成一种“全国性的大会”(conventio Generalis),或是“全国议会”(Sejm Walny)^①。这些代表们基本上是来自不同等级议会的诉讼委托人。在15世纪90年代,这些代表们在全国议会中获得了他们自己单独的议院,这也许是奥尔布拉赫特为了监视权力过度强大的议员而精心筹划的一项举措。全国议会无法摆脱最初从御前议会派生出的众多派别,对其普遍不信任。代表们就与他们所代表者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务几乎没有信心提出见解。征税通常伴随着附文,它们的缴付取决于单独选区的最后批准。地方议会自觉有能力建议、命令甚至限制他们代表的活动。代表逐渐地增多,从1500年大约40人到这世纪中叶几乎增加到80人,这最多只是使全国议会提升了道德上的威信。鉴于诉诸王权和贵族(特别是奥尔布拉赫特和亚历山大)共同对抗过于强大的权贵,一些更长期的、合法的关系可能已经发展起来;但是齐格蒙特一世和二世明显更倾向于与他们的参议员王公合作,使这种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关系走向终结(只要它们还存在)。代表议院把自己当做是当地使者的议事场所,而不是将自身看做是主权立法机构的一部分。历任君主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去真正地把纪律和秩序强加给经常混乱的会议上,议院也觉得自身的有限作用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表决程序——法律都是通过欢呼鼓掌通过,如果不能获得充分同意,议会就可能在没有通过任何决议的情况下就散会了。

波兰王室拮据的经济除了依靠什拉赫塔阶层的支持就别无选择。1422年和1454年,贵族民团拒绝和骑士团作战,除非他们的问题得以解决。1496年,作为对贵族支持其远征立沃尼亚的回报,奥尔布拉赫特不仅重申贵族已经享有的特权,而且继续准予贵族免除所有国内产
63
品和消费日用品的进出口税。他甚至同意禁止市民购买和占有土地,并几乎使农民无法从他们封建领主的土地上离开。然而这还不仅仅是合法强取——这也是君主为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以反对他们过度强大的

① 也译作“色姆”。——译者注

臣属采取的措施——这些臣属通常是试图让自己脱离(只是徒劳之举)他们什拉赫塔同伴的御前议会的成员。1454年的“霍伊尼采-涅沙瓦(Chojnice-Nieszawa)特权法令”,约束国王必须经地方议会的同意之后才可以征税、制定新的法律,或者征召民团,这样就使卡齐米日四世不再只向势力强大的权贵请求,而是倾向于更为普遍的贵族群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让步却催生了贵族民团,他们以不和条顿骑士团作战相要挟。然而他们迅速地被打败,但是这些让步仍然保留。

一开始,贵族没想与王室分享权力,而是寻求保护,免于遭到镇压。雅盖洛在1386年就已经承诺,要废除最高法官的职位及其事实上无限的逮捕权,但最终是由奥尔布拉赫特在1496年才彻底废止。1422年契尔文斯基(Czerwińsk)的和1430年耶德尔尼亚(Jedlnia)的特权法令,据说是保护了贵族的财产权和逮捕权力免于被废除,除非是“经合法程序证明其有罪”^①。然而对于王室官员滥用职权的抱怨却逐渐增多。1454年特权法的主体处理的是什拉赫塔十分关注的御前会议议员、政府官员和王室本身的司法滥用和横行霸道。这些规定授予贵族管理自身公民司法事务的权利,这一点对于构建他们享有“自由”的现实条件至关重要:他们可以在什拉赫塔阶层中选举出城市法庭法官及助理法官,以及公民议事机构的关键职务。如此让步,使得什拉赫塔的实力不断壮大,逐渐地,甚至司法也掌握在了他们手中,从而与王室相抗衡。

64 这些什拉赫塔开拓特权的进程给波兰大贵族敲响了警钟,使他们对此深感不安,于是大贵族抓住奥尔布拉赫特去世的机会以确保他们的支配地位。1501年11月,在米耶尔尼克(Mielnik),大贵族警告奥尔布拉赫特的兄弟——在立陶宛统治的亚历山大,只有他们得到决定参议院成员和任命国家少数高级官员职位的权力,他们才会选举他成为国王。国王如果拒绝履行他们提议的这些政策,他们就不会服从于他。

^① 此处为拉丁文(*Neminem captivabimus nisi iure victum*),意为“(我们会监禁)经合法程序证明其有罪的人”,即未经法律许可,不会逮捕任何人。这串拉丁语后来一般就用来指代1422年和1430年的特权法令。

亚历山大被与莫斯科公国的战争弄得心烦意乱,他同意了大贵族的提议,但1505年在腊多姆(Radom)的地方议会上,局面却得到扭转。许多官员不愿听从由自己不信任的人组成的参议院的指挥。国王利用利己主义参议员的暴政所引发的怨恨,再次重振什拉赫塔。被称为“毫无新内容的”新宪法(Nihil Novi)宣称:“根据此宪法,国王和他的继任者以后做出的任何新的决定,必须通过参议员和地方议会代表一致同意才能生效。”议会系统中什拉赫塔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以此作为对参议院的一种制约。该《宪法》为什拉赫塔几乎近3个世纪的自由奠定了基础。“米耶尔尼克特权令”被撤销。虽然如此,但直到16世纪50年代,由大贵族和王室权贵公开提名本应由地方议会委任的议会代表制度才最终废止。

国王不得不在什拉赫塔所规定的有限范围内活动。齐格蒙特一世可以通过更谨慎的管理收回更多疏离的王室主权。他扩大了关税的收受范围,虽然需要以对什拉赫塔过度的免税为代价。在16世纪20年代晚期,他改革了货币流通制度。他的举措基于公认的王室特权范围之内,可以得到更广泛的贵族支持。否则的话,国王尝试的政策就会直接威胁到贵族的利益。齐格蒙特一世想要以常态化的、以现金交税替代供职于民团的义务被回绝了。1529—1530年,由参议院领导的全国议会选举他9岁大的儿子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成为下任国王,此举激起了什拉赫塔的强烈抗议,于是1530年2月全国议会宣布,以后的王室选举禁止在君主尚在位时举行(vivente rege)。齐格蒙特一世的第二任妻子、意大利米兰大公斯福尔扎(Gina Galeazzo Sforza)的女儿博娜(Bona),被普遍认为是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年幼当选的幕后操纵者。作为一个外国人、一名女性以及一个完全不同政治传统的代表,在她丈夫和儿子统治期间,她受到了相当大的怀疑,她明显倾向于与议会的王公共事,唯一的后果是助长了贵族们对君主专制的恐惧。1537年,对王室权威的诽谤、破坏性的公开侮辱,恰恰说明,如果君主没有对贵族的情感表示出应有的尊重(或者未能控制住故意挑拨离间的幕后参议员),那他们就会得到如此待遇!这一年,贵族民团在利沃夫附近集合,准备惩罚性地讨伐摩尔达维亚,进而打击大贵族和王室大臣,最后他们不得



图7 克拉科夫福佑圣母玛丽亚教堂(Church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建成于1397年。在1945年后的波兰国内,克拉科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筑毁坏程度很小,这在波兰的大城市中实属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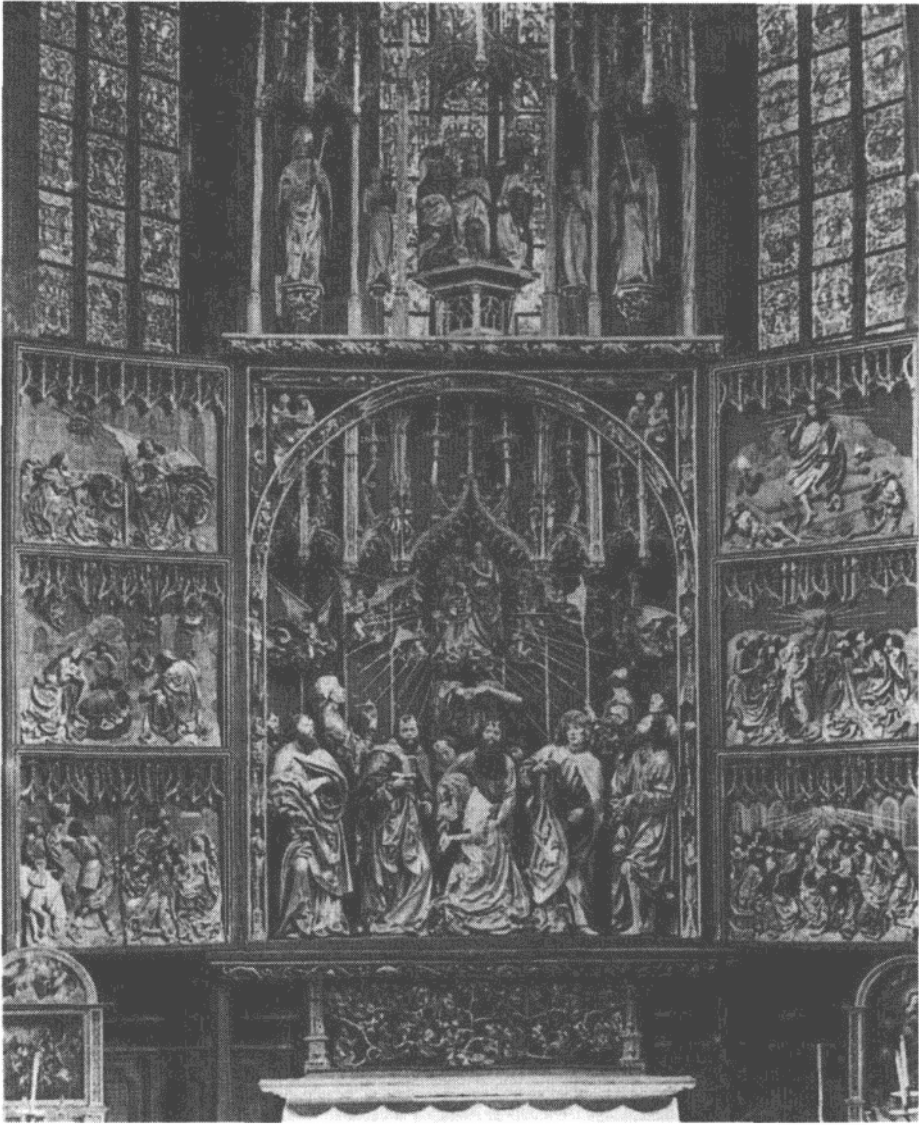


图8 纽伦堡的维特·斯特沃什(Veit Stoss of Nuremberg;波兰语 Wit Stwosz)(于1533年去世)在克拉科夫福佑圣母玛丽亚教堂(Church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创作的伟大祭坛装饰。斯特沃什在1477年和1496年之间生活在克拉科夫。在1477年到1489年间,他花费多年的时间致力于他的杰作。1484年,他在克拉科夫被授予完全公民权利。1939年,德国人将他的三幅一联作品劫到纽伦堡。1946年,祭坛经波兰人修复,但是修复工作很漫长,它直到1957年才回归原位。

不被遣送回家。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特在追寻雄心勃勃的波罗的海计划的过程中,不得不依靠制造事端的危险权宜之计,并希望全国议会投票资助战争,但议会并不会总是同意。

他们的组织和军队力量使一些较小的贵族,或者“骑士经济阶级”(Ordo equester)(正如他们中有教养的人所形容的那样),拥有了一项其他社会团体所没有的重要优势。在15世纪进程中,什拉赫塔的大多数特权又扩展到教士阶层。而教会的高级职位很大程度上是为贵族保留的。一个利益集团就此产生了,他们在什一税和司法权限的问题上争吵不休,因此地位受到动摇但是并没有完全遭到破坏。国王和什拉赫塔周期性的结盟,防止出现一类合法的、更高级的、独特的贵族(参议员的职位并不世袭,而只是来自几个特殊的部门),这反而有助于在所有贵族中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平等——但是那些更谨慎、权势强大的臣属则学会了很好地利用这种态势来为自己谋利。国王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在贵族团体之间进行周旋。

但国王并无其他真正有效的支持力量。因为主要的城镇少得可怜,克拉科夫、利沃夫或波兹南满足于他们自己的单独特权。他们的市政厅、市场和教堂[最引人入胜的是克拉科夫圣母教堂、纽伦堡的维特·斯特沃什那令人目不暇接的祭坛装饰]表明这些依赖于陆上运输贸易和原料出口的城镇有着真正的繁荣。但是没有一个制造业中心可以与莱茵河谷、佛兰德斯或是意大利北部相竞争。甚至是首都克拉科夫,在16世纪末市民人数也只有大约1.4万人——也就相当于一个法国二级省会中心的人口。皮沃特勒科夫(Piotrków)通常为全国议会的举办地,其居民人数大约只有3000人。城镇中扩张最快的群体是犹太人,到1600年的时候,他们的人数通过移民和自然增长可能已经超过了20万人。当然,他们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作用(虽然个别的犹太人可能在王室或权贵管理层身居高职),同时许多城镇合法地剥夺了他们的永久居住权。由于这个原因,贵族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从贵族那里所受到的“保护”,是通过接受对犹太人的贸易和银行的收益的剥削才购买到的。

城市财富与真正政治力量结盟的一个集中地就是在王室普鲁士。1500年但泽的人口超过了3.5万人；而托伦和埃尔宾分别超过了1万人；它们的商业财富使得它们可以支配当地的贵族。虽然1454年“合并条约”(Letters of Incorporation)宣布王室普鲁士并入波兰成为“其领域的一部分”，但它们同时又赋予该地相当广泛的自治权，使其能自视为与严格意义上的波兰王国截然不同。1569年之前，普鲁士的各阶层只派遣观察员前往全国议会，他们很少就税款问题投票表决(如果有的话)，除非是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雅盖洛家族为了获得支持和钱财而讨好个别的城镇(尽管齐格蒙特二世厌恶科拉科夫，并且1559年之后就没再到访过这里。在这一问题上他的父亲与他不同)。贯穿整个15世纪，城镇派遣代表去协助王室选举；大贵族甚至可能在御前议会占有一席之地。富有的镇民和商人获得贵族称号并不是很困难，可以通过王室恩惠或者借由法庭“批准”来确保他们的新地位。1492年，克拉科夫将这一方式发挥到极致，它确保贵族的地位和向全国议会派遣代表的权力，以此来对涉及克拉科夫利益的问题施加影响。

贵族将他们的优势扩展到经济领域。基于1423年的瓦尔卡(Warka)法令，贵族领主被允许收购玩忽职守的或“桀骜不驯”的村镇官员(通常是什拉赫塔)的丰厚的**世袭财产**(*Solectwa* 行政区划)，这是针对独立财产评估的一种做法。城镇强制实行价格控制；同业行会遭到公开废除；农民没有经过封建主的同意，不得移民到城镇。但这些条款中的大多数是无法执行的。在1496年和1520年，这些条款再次得到强调并有所发展。正是从那时起，加在农民身上的限制开始真正地起作用。由于农业繁荣，但泽的粮食出口的助力，致使货币地租转变为对农民劳役的直接剥削。自由的农民开始沦为农奴，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办法阻止这一进程，尽管在16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农业的繁荣缓冲了由于限制农民的自由而带来的最坏影响。除了波罗的海沿岸，波兰仍是农业占主要地位，即使是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较也是这样。价格革命使制造业进口要远远便宜于原料出口。如果手工业在波兰的城镇受到了损害，大部分贵族也不会关心。

此时的什拉赫塔和大贵族,他们的财富足以拥有至少一或两个位置优良、靠近港口和适于航行的河流(主要是维斯瓦河和它的支流)的乡村,这些村镇的收益大部分来自原料出口,而西欧和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日益增长的原料需求,更是使它们的收入大增。波兰全国粮食产量的2.5%以上都用于出口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粮食出口最兴盛的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也不可能。大部分粮食是在国内市场销售。但是伴随着广泛的土地领主权和他们对农民逐渐增长的控制权、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缺失、严格意义上的波兰的大部分领土都呈现出明显的和平景象(除了受到鞑靼袭击的罗斯领土之外),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种康乐福宁、繁荣向上并充满自信的氛围中。什拉赫塔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常把16世纪描述为“黄金时代”。就物质财富来说,但泽港口是主要的财富来源,波兰的大部分出口都经由此地。的确,但泽主要与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尼德兰商人打交道,可能占波罗的海全部谷物贸易总额的大约70%。城市有了代理商网络,用以买进货物,安排信贷和处理遍及大部分波兰王国的奢侈品贸易订单。然而,大多数贵族对商运和海运投机本身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们对全世界的商人都争相前往他们的农场和领地(就像他们看到一样)已经感到相当满足。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如果粮食不能出售,那么就出售木料和牲畜。

在齐格蒙特一世统治期间,贵族阶级内部的紧张局势更加明显,因为什拉赫塔提出了“执行法律”(Executio Legume),或者说完全贯彻为保护什拉赫塔利益而设计的旧法的要求。作为这一律法的附加权益,他们被允许加强自己同非贵族相比较而言的地位。这次运动在整个16世纪经久不衰,从16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一直保持兴盛的势头。起始点是1504年全国议会制定的法律,这一法律坚持认为应该终止所有王室领土的转让和抵押;应该更清楚地定义国家要职机构的权限,第一步就是反对个人占据多重职位。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国王应该从他自己的王室地产收入中支出一部分用于供养保卫领土的常备军,如果有必要,可以将转让给大贵族和王室债权人的王室土地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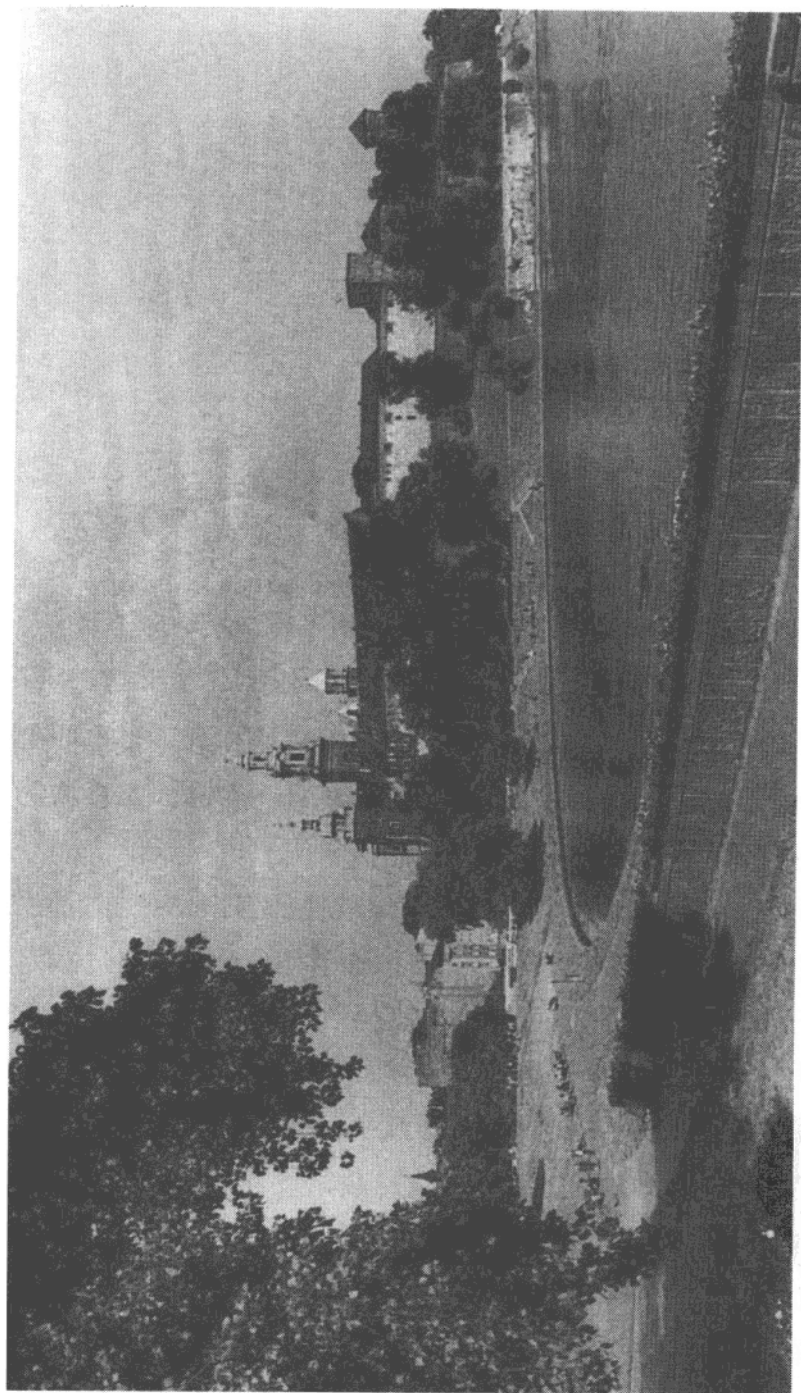


图9 克拉科夫瓦韦尔山上王宫的景色,据考证主要是在15到16世纪之间。1596年,齐格蒙特三世决定将王宫转移到华沙(这次转移在1611年最后完成),因为华沙更有利于和立陶宛以及波罗的海区域进行更好地交流联系。直到1764年,波兰的国王一直在瓦韦尔宫的小教堂完成加冕礼,波兰最后的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考虑到瓦韦尔宫的小教堂破败的情况,选择在华沙附近完成加冕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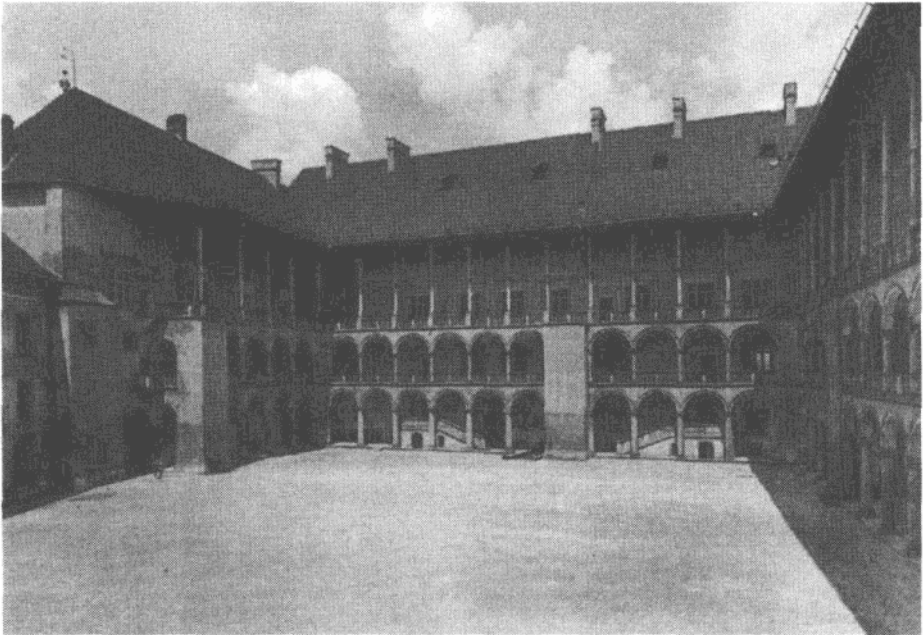


图 10 克拉科夫的瓦韦尔宫中齐格蒙特一世的文艺复兴庭院(16 世纪早期)。齐格蒙特受益于人文主义的教育。来自他的第二任妻子,米兰公主博娜·斯福尔扎的贡献深化了意大利文化在波兰的影响。

72 这就一举减轻了在税收上的负担。这些对于土地转让和身负多重职位(所谓的 *incompatibilia*)的限制条约,意图是遏制王室议员、大贵族为扩充自己经济地位和过分积累政治影响的能力。

特别是在早期阶段,“执行法律”运动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都受到大贵族彼此之间暗斗的影响——比如杨·瓦司基(Jan Łaski)主教,1503年后成为王国首相,试图通过迎合什拉赫塔,来胜过他们的对手,并确保自己实力的壮大。从理论上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差不多有1/5的土地可以算做是雅盖洛王室直属土地。几乎从雅盖洛被选为国王那一刻起,他就开始大规模的领土转让,来赢得政治支持,并为他的战争募集资金。什拉赫塔怀疑他滥用他们的钱财这一点确实是有据可循的。他们怀疑他们批准的特殊土地税(*pobór*)的税收所得,实际上不断地花费在了除军用外的其他地方(1485—1486年间仅10%税收所得用于军队;大多数的剩余资金都用作法院和管理费用),他们对此的怀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这样的资金分配也证明了王室财政的危机

境况。

16世纪的文化繁荣使得贵族们一直被压抑的才能被激发出来。发展的道路已经完全开辟。1400年,雅盖洛重建了克拉科夫大学,为了使立陶宛皈依而设立了神学院。然而,在康斯坦茨湖的宗教会议上,克拉科夫大学的法学家,特别是帕维尔·弗沃德科维兹(Paweł Włodkowiec),却以其对民族国家权利及国际关系的看法而引起了各国与会人士的关注。他们拒斥由武力强加的基督教统治的有效性,意在反对骑士团传播基督教的方式。人文主义者的出现,例如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菲利普·布奥纳科尔西(Filippo Buonaccorsi, 1437—1496)和康拉德·切尔提斯(Conrad Celtis, 1459—1508)使克拉科夫成为(尽管十分短暂)欧洲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尼古拉·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体现了发展完善的天文学传统在大学里的最高点,批判性地继承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波兰语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语言,通过像米柯瓦伊·赖伊(Mikołaj Rej, 1505—1569)、卢克兹·古尔尼茨基(Łukasz Górnicki, 1527—1603)这样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杨·科哈诺夫斯基(Jan Kochanowski, 1530—1584)得到展现。这个“黄金时代”的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是用拉丁文创作的——但是很快就翻译成波兰文,传播给各地有文化的什拉赫塔和城市的社交界。1476年,克拉科夫安装起第一台印刷机。这不仅使拉丁文化,也使“西欧”文化从中受益:最早在15世纪90年代,一个克拉科夫印刷工,斯·费奥尔(Szwajpolt Fiol)印刷出真正的第一本以古时教堂用的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或西里尔字母(Cyrillic)编写的文本,供普热梅斯尔的东正教大教堂使用。第一部旨在广泛印刷传播的波兰语作品《灵魂的天堂》(*Paradise of Souls*)于1513年出版。1506年出版的《波兰法律历年集成》,其编纂者王国首相杨·瓦司基[因而该集成俗称“瓦司基法令”(Łaski's statute)]想要以此来提高人们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对自身的法律权利的认知。为了迎合什拉赫塔的要求,全国议会法令最早的本国版本在1543年出版[同年,纽伦堡也在哥白尼逝世后出版了他的作品——伟大著作《天体

73

运行论》(*De revolutione Orbium Coelestium*)]。

与意大利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有助于什拉赫塔上层集团创建一个基于罗马共和政体的价值观的文化模式(至少他们自己认为如此)。齐格蒙特一世和博娜王后将克拉科夫瓦维尔山上的宫殿装点成一个文艺复兴的典范。在北部,哥尼斯堡继克拉科夫之后成为又一个以波兰语传授知识和人文主义的重地。路德教会制作大量用拉丁语和波兰语编写的圣经、书籍,以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培养对路德教的支持,这对哥尼斯堡的路德宗统治者是有利的。马蒂纳斯·马齐达斯(Martynas Mažvydas)的修正版的《问答集》,其以立陶宛语言出版的第一个印刷版本正是在哥尼斯堡于1547年出版的。4年后第一本《新约圣经》波兰语翻译版出版。1561年,克拉科夫出版了第一本波兰语完整翻译版《圣经》。国内外各种影响的混杂交汇在这里有效地表现了出来——贵族们穿着混合了不同风格的服装,受到来自本地的、西方和东方的影响(后者大部分通过匈牙利传来),到该世纪中叶,产生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服装——包括系腰带的长袖衣服、靴子和马裤。

在这个日渐繁荣的文化氛围里,一群富有的、野心勃勃的、有教养的贵族和王公们左右着“法律执行”运动的走向。虽说时间已是16世纪50年代,但这次运动并没有单独的领导人,因为这一时期最有名望的人物都和宗教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教会被迫交出财富和土地,此举会减少额外的税收,并巩固贵族在国内的优越性。因为立陶宛不断要求波兰王国支持自己,对抗莫斯科,“法律执行”运动为了实现完全的联盟便又提出了旧有的号召。国家政体的所有部分,包括王室普鲁士,都要致力于这个政体的防卫。这不是一场缺少积极影响的运动,但像安德烈·弗里茨·莫哲夫斯基(Andrzej Frycz Modrzewski)这样号召超越有限的局部私利去寻求更大价值的先锋实在太少了。1538年重申了1496年禁止市民购买和占有土地财产的法律;1550年,同业行会再次被禁止。这样的限制虽然无效,但也是什拉赫塔正直的祖先们曾经捍卫过的旧法律的一部分。

齐格蒙特一世和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特都表示怀疑。他们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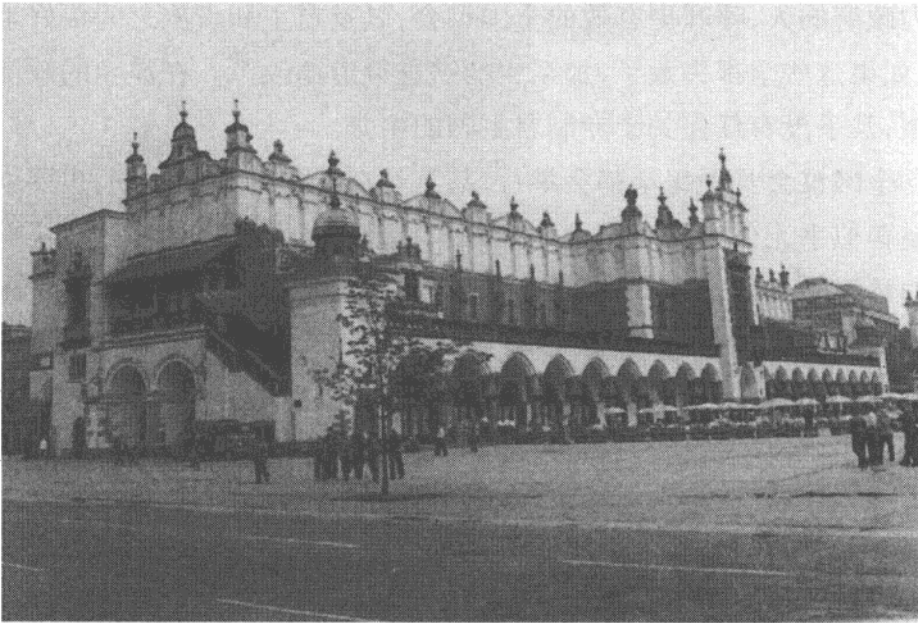


图 11 克拉科夫的主要广场上的布料大厅,1555 年在一场火灾后得到重建。其建筑师是帕多瓦的乔万尼二世(Giovanni II Mosca of Padua) [因此他的绰号是“帕多瓦诺”(Padovano)]。克拉科夫把最初的繁荣归功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两条主要贸易通道的连接处:从东到西,在黑海贸易区和德意志之间;从南到北,在波罗的海和波希米亚/匈牙利之间。克拉科夫的衰落主要是由于王宫转移到华沙,以及 17 世纪的战争和衰退。

国家的问题不是用来与“庄稼汉”(ploughmen)争论的,正如他们准备把什拉赫塔称为“煽动者”一样。毫不奇怪,他们受到了来自“法律执行”运动中的一些极端派的警告。1507 年,斯坦尼斯瓦夫·察博罗夫斯基(Stanisław Zaborowski)(其保护人是大臣瓦司基)出版了《论王室权力和财产的本性》(*Tractatus de natura iurium et bonorum regis*)一书。在书中,他为贵族阶层的社会与政治霸权而辩护。国王就此做出了答复,就像是一个管家那样就王国财产和分配情况对主人进行了汇报。支持目光短浅的乡绅的这种做法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他们对政治一无所知并且试图限制国王的权力,以此来奖赏作为忠实的奴仆的他们所应得的。在他们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围绕“执行”(Executio)展开的争论使国内政治形势恶化。贵族权利不可阻止地壮大,使现实的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局面的扭转成为不可能。那些寻求强

有力政府的人,呼吁更有效的全国议会,以及君主和贵族之间更好地合作,如果这些全都失败了,那至少能够进行道德改革。在波兰的政治文学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专制君主国的主张。

76 全国议会几乎每年都会举行,甚至是在所谓的和平时期,也要就对抗鞑靼似乎无休止的袭击商定对策。大多数全国议会都在为“全面防御力量”(obrona potoczna)筹措资金,这些防御武装驻扎在波兰王国东南部边界上的卡敏涅茨-波多利亚(Kamieniec Podolski)的要塞附近。但是筹措的资金根本不足以维持这个人数超过大约 2 000 人的武装力量。国王不得不诉诸各种权宜之计,去维持现有的军队——和当地的地方议会协商、召集当地的民团或权贵的随从、转让王室领土甚至在边界地区建立半军事化的移民地——非法的哥萨克移民,他们常常对鞑靼进行有力的反击。1508 年的全国议会首次同意对立陶宛对抗莫斯科给予财政援助。此后几个月内,波兰和立陶宛将大约 2.5 万人的军队送入战场。波兰王国的什拉赫塔为了支援边境与莫斯科公国的战争,准备投票批准持续税收(这些税收虽然不是必须要缴纳的,但到紧要关头,缴纳就成为必须的)——但除非立陶宛准备好与严格意义上的波兰进行完全联合,否则大多数的立陶宛掌权人物都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即使是最有力的、特别的努力都无法替代定期税收,只有定期税收才能解决大量军队的后勤保障问题——当然,这类措施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仍只是特例,而不是常规。

在齐格蒙特二世于 1548 年就职后不久,煽动“执行法律”运动(*Egzekucja*)的行为就处于一种亢奋的顶峰状态。其不可避免地和宗教热情融合在一起。波兰的西部边界从萨克森骑行穿越西里西亚仅仅需要一天的日程。在路德教首次抗议后,改革的观点和作品立刻开始传播,路德教的抗议在王室普鲁士的城镇上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齐格蒙特一世在 1525 年派军队进入但泽试图镇压新教,他主要是出于担心下等阶层的蛮横要求。一旦一些魁首遭到处决,城市议会的权威得到恢复,齐格蒙特就不再干涉。路德教根除了社会激进主义,赢得说德语的贵族阶级的支持。在 1557 年和 1558 年,他的儿子明确表示人们

有忏悔的自由。总而言之,此时天主教在普鲁士处于防御地位。

在什拉赫塔中,改革的观念——不仅包括路德教会,还有越来越多的加尔文教徒(Calvinist)、甚至反三位一体派(Antitrinitarian)——与教会关于什一税旷日持久的争论以及在政治上寻求支配地位的努力混杂在一起。支持改革的核心力量来自大波兰的富有家族,例如格尔卡(Górkas)、列什琴斯基(Leszczyńskis)、齐涅茨基(Sienickis)——在这个世纪中叶,他们所有人在“执行法律”运动中都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宗教改革慢慢渗透进了“执行法律”运动中,因为绝没有任何其他运动可以吸引到如此大量的政治支持。宗教的自由被视为是政治自由的一种延伸。但是1562—1563年全国议会决定,禁止王室的长老(*starostowie*)利用他们的警力去执行教会法庭的判决,这是什拉赫塔反教权主义的一次胜利,同样也是改革者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新教的代表在这次全国议会后开始减少。一旦“执行法律”运动按照常规发展,人们就会发现,波兰的宗教改革所依赖那些个别的贵族支持者的庇护和态度都极不确定。

77

事实上,改革的支持者从西里西亚的边界到乌克兰的内陆到处都可以找到。基于学说的差异,人们试图形成一种共同的政治阵线,一边是加尔文教和路德教阵营,另一边是反三位一体派,又称“阿里乌派”。雅盖洛王朝最后两位国王出于必要性和敏锐的判断,对宗教多样性宽容以待(毕竟,这种多样性正是从他们治下的领土中产生出来的)超出了必要和合理的范围。齐格蒙特二世认识到,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结果就会像法国和德意志那样导致内部分裂。虽然他对新兴教派表现出适当的人文主义者般的兴趣,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天主教的意图。

在16世纪50年代晚期,齐格蒙特二世不得不面对真正的现实——他可能成为家族血脉中的最后一个人。他结了三次婚,但无子嗣。1543年5月,与哈布斯堡的斐迪南(Ferdinand)的女儿伊丽莎白结婚,两年后她去世。1547年7月在维尔纽斯,他秘密地与一个年轻的寡妇巴尔巴拉(Barbara)结婚,她出生于拉奇维尔(Radziwiłł)一个有权势的家族,这次因爱情而结合的婚姻使得王国中的一些贵族(主要是立

陶宛人)产生了近乎妄想症的恐惧,致使他们和国王的关系数年保持紧张。巴尔巴拉于1551年5月去世。两年后,齐格蒙特勉强地娶了他第一任妻子的妹妹凯瑟琳(Catherine)。他厌恶这两个来自哈布斯堡的配偶。最后的婚姻因一次耻辱性的分居而结束,凯瑟琳在1566年返回奥地利[她于1572年2月死于林茨(Linz)]。齐格蒙特向罗马教皇发出的离婚请求被拒绝。他曾经希望仿效亨利八世,但作为波兰的国王他不能这么做。他没有留下子嗣,而且很明显,立陶宛独自难以对抗俄国,这就使保持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的各自独立没有了正当理由。“执行法律”派号召恢复王室领地,限制滥用职权,甚至还要求每年召集全国议会,为建设性的改革平台提供活动空间。他们要求立陶宛和王室普鲁士臣服于波兰王国,向它们许诺将有机会共建一个新的强大政体。1562年9月,齐格蒙特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但这是否只是他(作为一个无子嗣的君王)不得不接受的权宜之计,便不得而知了。

从1562年11月到1563年3月,在皮沃特勒科夫召开的全国议会试图通过收复转让的王室土地并加强管理的规定,来确保和平时期的国家税收。全国议会制定的审计和调查每间隔5年重复一次。国王可以赠地,但是受赠者只可获得收入的1/5,剩下的4/5将要填补宫廷和政府的花费。王室地产收益的1/4(*kwarta*)被明确指定是用于维持在东南边界对抗入侵的鞑靼蒙古人的常备军。这些款项不可以被用于对俄战争,而且也不是为对俄战争准备的。什拉赫塔投票通过了一个增收土地税的决议,这些税款主要是由他们的农民缴纳。然而,什拉赫塔也被允许从教会的什一税中补足他们所缺税款的另一半。新的土地税法因此也就间接地允许了对教会征税。

王室1/4的收入逐渐成为维持东南边界的常备军的一个有效的、定期的资金来源,但是对增加众所周知的“四分之一军队”(*kwarta army*)的数量却没做出什么贡献。1565年调查委员会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使王室土地的利润几乎提高到50万其镍(Zloty)^①——增长到16

① 波兰的一种货币。

世纪40年代的8倍。然而,调查委员会人员如此不足,而他们面对的任务又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些新增加的税收的入库率只占潜在税收的一小部分。当然,个别的大贵族家族失去了大量的财产。“执行法律”派甚至成功地将这些调查和退还土地法令强加给王室普鲁士,甚至连王室领土也包括在内。然而一旦少数什拉赫塔明白了自己也将卷入到这场退还土地的运动中时,收益就开始急剧下降。1569—1570年之后,直到1660年才有了完全的土地调查。齐格蒙特二世默许减轻一些遭到严重影响的参议员的损失。新土地税的收入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许多什拉赫塔完全不想缴纳。正如历史学家安东尼·毛察克(Antoni Maćzak)所说的那样,在所谓的“黄金时代”,如果贵族真的是由于货币短缺而不能负担起波兰所必需的国库开支,从而导致波兰王国的经济受阻,那么如今这样的国库开支依然存在。1565年全国议会不得不批准增加新的贷款,以保障王室财政的安全。

79

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特认为,只有成立一个使波兰和立陶宛两个国家都可接受的友好新联盟,才能向这两国的贵族保证一个重建的政体将出现并延续下去。“执行法律”派彻底的吞并主义却没有这样的保证。波兰与立陶宛社会的某种融合已经由来已久。波兰的书面语和口语在15世纪晚期,在立陶宛上层集团之中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创作出一种混合着白俄罗斯语、立陶宛语、拉丁语、波兰语的令人着迷的书面语和口语。16世纪60年代(可能还更早),立陶宛的各个阶层贵族中说波兰语的人占主流,而立陶宛语则逐渐成为农民的语言。立陶宛上层集团的确不反对文化波兰化:许多地方都积极地接受波兰语,把它作为接触更精深的西欧文化的一种渠道,东正教的罗斯也是如此。拉奇维尔皈依并热情地支持加尔文教派,是将大融合与保持独特性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手段。但是政治波兰化则完全不同。明显的波兰模式的法庭和地方议会的引入、在中央全国议会和地方政府引入真正的选举,这些都成为颠覆立陶宛大公议会成员世袭统治的威胁。退回大公领地的做法对他们的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威胁。但是不可抗拒的压力已经形成了。在与莫斯科作战的时期,主要由什拉赫塔组成的波兰军队

不断出现在战场上,使得他们的立陶宛盟友熟悉了波兰的观念和组织机构。1563年7月,维尔纽斯的齐格蒙特·奥古斯特特权法令,意图通过恢复东正教贵族在立陶宛大议会的职位,以赢得他们的支持。由拉奇维尔领导的立陶宛的权贵做出了让步。1565年11月到1566年3月召开的维尔纽斯全国议会,批准了引进基于波兰模式建立的本地选举法庭。在接下来的1566年,一些本地官员模仿波兰的法律制定了新法,这成为习惯法(Common Law)重新法典化的一部分,习惯法也就是所谓的“立陶宛第二法令”(Second Lithuanian Statute)。立陶宛的全国议会迄今为止很大程度上是权贵的代言人,自此开始则正式采取与波兰王国同样的立法权力和程序。从行政角度讲,两国的融合是从内部开始的。

80

1569年1月在卢布林召开的全国议会上,这种融合达到了高潮。齐格蒙特坚持立陶宛的封建领主和代表都应该参加这次议会。在齐格蒙特的推动下,波兰人宣称他们愿意接受一个由独立的立陶宛国家高级官员组成的议会——但是必须有一个全国议会;波兰人在立陶宛定居和拥有土地的权力必须得到保障。这最后一点要求使立陶宛人担心总体上更富有的波兰人会吞噬掉立陶宛。当大部分立陶宛代表在3月1日退席时,齐格蒙特愤怒地宣布,要兼并作为立陶宛的罗斯领地一部分的沃里尼亚和波德拉谢(Podlasie)。当地的波雅尔贵族,在严格意义的波兰领土上这些人的数量相对较少——他们的人数顶多是这片土地人口的3%——这些人对被兼并一事并无多少反对。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认为,听从他们大公的指令,也就是继承了旧日罗斯国统治者地位的齐格蒙特,这是他们的职责——此外,更是由于他最近解除了维尔纽斯的立陶宛天主教禁止东正教徒担任国家的高级官员的限制;合并到波兰王国后他们有望享有波兰式的权利、自由和解放。

3月16日,国王命令王室普鲁士派来作为观察员出席的参议员和代表在集会中就座——他们的独立地位也将结束。他们屈服了。6月6日,王室首相宣布将基辅的零星王公领地合并到波兰王国,得到了本地贵族绝大多数的赞成。如果立陶宛反对者坚决不同意,就有可能实

施“执行法律”派最初提倡的彻底吞并。齐格蒙特仍然相信“自愿的”联盟是最好的：他甚至许诺退回王室土地的法令将不适用于立陶宛(事实上这一法令也没有用于先前并入波兰的立陶宛的部分领土)。波兰人允许立陶宛人在波兰的土地上享受互惠的移民权利。6月28日,最后的异议被排除。新的联盟由国王在7月4日批准生效。一个新的实体,“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Rzeczpospolita Obojga Narodów, Polskiego i Litewskiego)^①诞生了。

两国联合的实现是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最大的成功和失败。艰辛的经历使得他只要有可能就会做出妥协,但是也许他做得太过头了。通过卢布林的联合,他希望建立一个基于什拉赫塔和一个未来君主之间的合作的统治。但是结果却是他必定曾常常担忧的那种。对于绝大多数什拉赫塔而言,“执行法律”运动是确保他们权利和特权的一种手段。改善全国议会运作的事情却无人问津。全国议会和地方议会之间的平衡仍然很难保持稳定,并且总体上天平是向后者倾斜的。联合或许导致了更糟糕的问题。理论上讲,大贵族和什拉赫塔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前者确实可以用他们绝对庞大的财富去支配他们“财富较少的同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的双边开放,意味着在整个新联邦共和国中,两方的大贵族都可以获得地产,以及以前伴随它们的政治影响力。“红色”米柯瓦伊·拉奇维尔(Mikołaj Radziwiłł “the red”)抱怨一个“自由的”立陶宛将“永远地”被埋葬。这样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他所谓的自由还有大好的前程。

尽管王室普鲁士、立陶宛与波兰王国实现了正式的统一和设想中的更紧密的结合,但实际上当地排他主义力量依然强大。虽然齐格蒙特于1563年为东正教贵族出任高级官员扫清了障碍,但波兰化与天主教化的结合,以及对天主教官员的彻底拒绝,使其越来越被反宗教改革

81

^① 指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公国组成的一个共和政体,两国虽各有一定独立性,但共享最重要的主权统治机构:经选举产生的国王和共同的议会(全国议会/色姆)。因其全称较长,下文将多用简称,如“两国联邦”、“联邦共和国”、“波兰-立陶宛联邦”等,请读者注意。——编者注

的热情所控制,并把东正教视为一种分裂的信仰。这意味着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关系依然如同 1386 年后的立陶宛一样不稳定。立陶宛对其在卢布林受到的待遇感到十分愤怒。尽管文化波兰化取得不小进展,但立陶宛贵族对于本民族的独特性的观念依然没有改变。而但泽感到两边不靠,自成一类。直到齐格蒙特去世,这种保持独特性的观念仍持续地破坏着他建立波罗的海海军的计划,因为这支海军被立陶宛贵族看做是对他们的地位的威胁。尽管王室普鲁士现在派代表来参加全国议会,但它仍保持了自己的地方议会,也就是所谓的普鲁士综合地方议会。

82 卢布林全国议会和 1570 年和 1572 年的全国议会,在齐格蒙特去世后拒绝讨论王室选举规范的机制问题。什拉赫塔担心齐格蒙特和大贵族之间的关系过密,以及由此而来的一个哈布斯堡继任者。身陷病痛且绝望的齐格蒙特可能认为,他那新的、内部分裂的联盟可以通过选举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milian II)的幼子——哈布斯堡的欧内斯特(Ernest)为王而得以保全。那样或许可以保证联盟得到一些更广泛的支持,抵抗那些困扰它的威胁。哈布斯堡总是可以从参议员中得到相当可观的支持,因为参议员认为哈布斯堡的统治可以巩固他们地位。但是对于人数更多的什拉赫塔而言,哈布斯堡在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统治使他们获得了一个怪异的名声,他们被认为是仅次于俄国沙皇的自由的敌人。它们之所以有这种名声,很大程度上是由哈布斯堡的对手和煽风点火的政客造成的。“执行法律”运动的领导人愿意维护 1569 年卢布林全国议会的成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国王授予了王室领地和新的职位,进而支持参议院;其他人则担心强大王权最终可能会给哈布斯堡的暴政铺平道路。什拉赫塔没有选择为对俄战争提供专门资助,而是满足于 1570 年 6 月和莫斯科公国签订 3 年休战协议。波洛次克仍然处于伊凡四世的控制下。

齐格蒙特以一系列的艳史聊以慰藉他的晚年,这对于提高他的声誉没什么作用。1571 年他的情妇巴尔巴拉生了一个女儿,这时流言四起,认为孩子的母亲是一个娼妓,这个孩子的父亲不是国王。在他统治

期内的最后一届全国议会不得不于 1572 年 5 月因为他恶劣的健康状况而放弃举行,他被痛风、胆结石、肺结核,以及沮丧、失落彻底击溃了。1572 年 7 月 7 日下午 6 点,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特,波兰雅盖洛王朝最后的国王,死于位于克内申(knyszyn)的王室用于打猎时居住的山间小屋。在这里,他曾安置过巴尔巴拉,因为他担心那些贵族会绑架她。但什拉赫塔最终确实还是绑架了她。

第三章 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 (1572 — 1795)

83

1573年5月10日在华沙附近,法国的安茹公爵亨利当选为波兰国王。他的兄长,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深知,瓦卢瓦家族(Valois)统治下与奥地利接壤的波兰将对法国很有益。至于什拉赫塔阶层,他们对本国宪政的防御力是如此自信,以至于就连新教徒都准备接受这个普遍认为应该为之前“圣巴托罗缪(St Bartholomew)大屠杀”事件承担责任的统治者。

在1573年1月“正式召集启动”的全国议会上,乡绅领袖迫使参议院的上层集团做出让步:所有贵族都有权利亲自(*viritim*)投票选举出他们的国王。全国议会设立了一个称为“华沙联盟”(Confederacy of Warsaw)的常设机构,主要负责起草《宪法》的章程。国王将不能在其生前(*vivente rege*)指定下一位继任者;他必须维持派系之间的和平;他必须和参、众两院一起联合决定宣战与媾和的政务;国王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议会,会期为6周,或按需要而定;所有特别的征税案都必须通过议会同意才能实行。贵族审判处置农民的权限不受侵犯。如果一个统治者没有遵守宣誓时的承诺,他就会失去国民的信任。以上这些原则统称为“亨利条例”(Henrician Articles),并以为此后历任国王分别制定的职责条约(*pacta conventa*)做为补充。亨利国王的职权范围,

从给提供青年贵族索邦神学院(Sorbonne)奖学金,到兑现在与莫斯科公国的战争中为波兰-立陶宛联邦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持的奢侈承诺。

1573年决议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其基础构架。王位空缺期和“自由的”选王制对匡正之前统治的弊端和危害是必不可少的。与克拉科夫相比,华沙位于中心的位置使其更适合作为选举会议的举办地(齐格蒙特三世基于相同原因,从1611年起将华沙作为他的永久居住地)。在第一次王位空缺期间形成的正式选举程序一直沿用了两个世纪。在这期间,格涅兹诺大主教曾代替国王作为**临时执政者(interrex)**。由选举出的代表组成的全国议会听取那些君王候选人的代言人的陈述(外国的候选人在选举之前不允许进入国家)。由领地和郡县组织出席会议的什拉赫塔,在大型谷仓般的房子四周扎营,在提议的候选人得到众人普遍拥护之前,参议员和贵族领袖就先在“谷仓”里进行辩论。

可能有将近4万名贵族出席了安茹的亨利公爵的选举。而在1632年大约只有4000人参与了瓦迪斯瓦夫四世的选举,因为没有人当真去质疑他将继承其父齐格蒙特三世。大多数的选举会议上还出现了几位“皮亚斯特”(波兰本国人)候选人,但是在一个想要实现贵族平等理想的国家中,没有人愿意看到身边的任一同伴攀升到高于他人的位置。当选举人像在1576年、1587年或1697年那样产生较大分歧时,他们随后就会快速采取行动,通过武力来获得选举的胜利。

在自己的加冕礼上,亨利国王拒绝最后批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条款。法国传统的君主制与波兰的律法主义不可调和。扩大的特权在大约6%的人口之间分配,给予他们如此多直接的、既定的利益,这样的情况致使做出改变非常困难。那些有钱、受过良好教育以及富有见识的贵族,或许会十分慎重地(或者激进地)评价——在强有力的君权下他们能做得很好,但即使是他们,也由于习俗和预见而倾向维护广泛的宪法控制。1574年6月18日夜晚,在得知他的哥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逝世4天后,失落的亨利三世从克拉科夫的瓦韦尔宫匆匆溜走,驱马逃往最近的边界。

这个什拉赫塔的国家于是自行管理本国事务:地方议会开展了一

85 系列广泛的工作,并给予只有少量财产的人们(甚至包括那些只在一村拥有少量土地的人,只要他们受过教育)就职于地方政府和自我提高的机会。在1578年和1581年分别创建的独立且每年重选的王国最高法院、波兰和立陶宛特等法庭,使大多数影响贵族的司法事务都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但全国议会制定法令,特别是在税收方面,仍然要求得到地方议会更进一步的批准、修改乃至否决。王室直接向选区选民提出的筹款请求通常都得到赞成回应,但这对加强议会的权威丝毫没有帮助。尽管如此,分布广泛的地方机构,是什拉赫塔为了给自己提供一个处理大部分他们认为重要的公共事务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机器——因此他们几乎毫无意愿去建立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缜密与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

行政改革运动被证明是有所欠缺的。国王觉得他们应该独自决定王室统治下土地的用途。什拉赫塔则认识到自己(或者他们的农民)将会为解决紧急事件而承担特别的税款:主要是传统上的**土地税**;他们已准备好以更高额度支付该土地税;甚至他们预备好接受全新的税种——即使是非常“贬低身份”的人头税。但每次投票决定针对的期限极少超过12个月。1620年,因为预计土耳其人会入侵,全国议会投票决定将常备军人数从1.2万人增加到6万人——按当时的标准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但是在1622年人数又缩回到1.2万人以下。这样的波动是很典型的。征兵和发饷都不可避免地因此滞后。当军队因拖欠军饷引发兵变时,那些例如1605年在基尔霍尔姆(Kircholm)打败瑞典,或是1660年在库德诺(Cudnów)击败俄军的胜利也统统被抵消掉。众多的兵匪(*soldatesca*)开始出现,为了生存去抢劫本国的纳税人。国王、权贵和官员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中大量掏钱来安抚军队,用自己私人的年金来供养他们。贵族的封建武装——贵族民团通常是一种带来灾难的负担,保持着军队全套豪华甲冑的重要特色一直踏入18世纪:但如果不看其他方面,民团至少是一个很好的摆设,可以让贵族们振振有词地宣称,在没有其他军事防卫实体之时,自己为了国家已经准备好牺牲个人的生命和财富。

比起一个统一的国家,联邦共和国更像是一个累赘的联合体。支

配着立陶宛的大权贵家族指望通过对 1569 年的卢布林合并法令的妥协来保存其独特的政治身份,即使这个时候文化和语言的区别已经日趋消融。1588 年,根据习惯法修订的法典《第三立陶宛条例》甚至违反了卢布林合并法令:将出生在大公国外的人排除在政府公职外——尽管随着大规模波兰移民进程启动,以及“立陶宛人”或“波兰人”的权贵在联邦范围内获得了土地和官职,这样的限制变得毫无意义。1673 年,立陶宛权贵确保全国议会每三届就要有一届在立陶宛的格罗德诺举行。然而在 1697 年全国议会选举时,立陶宛的乡绅们给了权贵豪强一次重重的打击,把波兰王国对不可同时担任多项公职的限制扩展到了立陶宛大公国。那一届全国议会还开始采用波兰文代替混杂的白俄罗斯文,作为立陶宛大公国的官方语言,这标志着文化统一进程的发展。双方起源于共同的祖先——“萨尔马特人”(Sarmatian),这类起源神话经过人文主义作家的殷切宣传,使得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将他们的身份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整体——倘若他们是贵族的话。让后来的民族主义者感到厌恶的是,立陶宛人和卢登尼人(*Ruteni*,或称 *Rusini*)(现今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可以将自己视为“波兰人”,因为他们也都是“萨尔马特人”。

融合过程在乌克兰成败参半。当地人为基辅罗斯公国的传统感到自豪,这样的感情无法适应联邦共和国的框架。如果这些人口稀疏的封地上的本土贵族想要有所发展,波兰化、接受“拉丁”信仰和天主教会首先为其提供了方式。对于那些希望忠于东正教的人来说,在行动上和思想上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一个像天主教的罗马和加尔文教的日内瓦那样生气勃勃的文化中心。莫斯科主教区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知识探索;17 世纪 50 年代“现代化”改革的发起人尼康(Nikon)宗主教在教会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分裂,这一状况至少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时期。在波属乌克兰城镇和教会学校里,的确发生了更广泛基础的知识复兴以应对改革的天主教和新教逐渐增长的压力,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在东正教社会精英准备皈依罗马信仰之后。康士坦丁·奥斯特罗格斯基公爵(Konstanty Ostrogski)于 1576 年在他的城镇奥斯特罗(Ostrih/Ostróg)建立了一所东正教学院,做为对两年前乌克兰雅罗斯

瓦夫(Jarosław)成立的第一座天主教耶稣派学院(Jesuit college)的回应。虽然波兰最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彼得·斯卡尔加(Piotr Skarga)诋蔑东正教无知和保守,但这所东正教学院教授人文主义、自由主义艺术课程,并采用古时教堂用斯拉夫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编写的课本作为指导。1581年,学院出版了第一版由学者编定的东正教《圣经》。在学院存在期间,对于那些处在拉丁语的影响下但并不准备放弃自身文化身份的市民、贵族和哥萨克人来说,它无疑是一块将他们吸拢在一起的磁铁。但东正教学院的缺陷(也反映出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中非天主教教派的普遍缺陷)就是它需要完全依存于一个大赞助人。奥斯特罗格斯基,这位举足轻重的贵族(但却有着消极懒散的名声),他并没有设法努力通过全国议会或是一个王室宪章的正式批准来保证东正教学院的未来。1600年,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学院失去了兴趣。他没有儿子,三个女儿都嫁给了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丈夫。在他去世后,他信奉天主教的后裔于1608年关闭了学院。东正教学院曾经是一个可以与耶稣派学院和新教文法学校相抗衡的东正教组织。但是没有另一位有相同精神境界的东正教贵族能够继续执起火炬,让其得以传承下去。

1596年在立陶宛的布列斯特(Brest),大多数东正教主教决定与罗马天主教联合,并接受罗马教皇的领导。促使产生这个决定的原因不仅基于天主教的压力,或许更多是出于对君士坦丁堡教区不断增长的敌意;或者对莫斯科新教区的恐惧。至少对于“东仪天主教会”(Uniate)的一些主教来说,重建东正教宗教传统的神性与知识的可信性,甚至是真正地保存一种独特文化身份的唯一方式,就是借鉴西方拉丁世界。东仪天主教会保留了他们自己的宗教仪式,甚至还保留了他们教区牧师可结婚的传统——但是顽固的拉丁主教区阻碍这些主教担任许诺给他们的参议员席位。东正教牧师渴望接受更高的教育,但为此他们必须被迫参加天主教学院,甚至是罗马的圣亚大纳修(St. Athanasius),在恢复他们的原本信仰之前需要假装成为东仪天主教教徒。甚至起初热心拥护东正教的米尔蒂·斯莫崔斯基(Meletii Smotritskii),也

在1627年抛出白旗,投入到东仪天主教會的怀抱。他们精神领袖中的叛国知识分子(*trahison des clercs*)无法与市民和小贵族中的叛国知识分子相比,对于他们,东正教代表了与他们基辅罗斯民族(*ethnie*)的荣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链接。这些人原本或许无关紧要,如果他们卢登尼人没有占共和国人口的一半多的话;如果他们中许多较小的贵族对他们实际上低于什拉赫塔的地位愤恨不已的话。这在他们内部以及教會联盟的普通成员之中激发起巨大的敌意。1620年,在耶路撒冷的大主教从莫斯科访问归来后,秘密地为许多的东正教主教举行了就圣职仪式。齐格蒙特三世机智地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后在1632年,瓦迪斯瓦夫四世正式承认他们复职。然而东仪天主教堂的有限存在及其通常严厉的改宗方式,使广阔的东部教区长期持续的宗教摩擦进一步达到了白热化。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在这些土地上出现了大量大庄园。联姻和王室赏赐使得像波托茨基(*Potockis*)或卢博米尔斯基(*Lubomirskis*)这样相对的新来者,能够达到可与立陶宛历史悠久的王公世家:拉奇维尔家族或维希涅夫斯基(*Wiśniowieckis*)家族相比肩的水平。这些大封建领主很快就学会如何巧妙地利用“黄金般的自由”的价值。18世纪,波兰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为对官职和王国租赁权的争夺上。国王为臣属提供的服务支付报酬——或许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他们施行惩罚的权力则越来越遭到限制。由于塞缪尔·兹博罗夫斯基(*Samuel Zborowski*)密谋造反,国王斯特凡·巴托雷(*Stefan Batory*, 1576 - 1586)于1584年5月将其处决。而他的继任者齐格蒙特三世(1587 - 1632)却宽恕了在1606年和1607年企图煽动武装革命并试图将其废黜的那些人,从而赢得了赞誉。实际上他是不敢实行太过高压的政策:甚至连在1607年7月击败了造反的“桑多梅日起义”(*rokosz of Sandomierz*)的军队,也怀疑他们的敌人反抗“君主所有制”(*absolutum dominium*)是有某些正当理由的。杨二世·卡齐米日(*John II Casimir*, 1648 - 1668)在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试图清除那些势力强劲的反对者,却以失败告终,即使当时已掌握他们与敌对权力之间交易的明确证据。



图 12 扎莫什奇(zamość)市政厅,是由波兰首相兼大统领杨·扎莫伊斯基建造的重要建筑物。扎莫伊斯基是国王斯特凡·巴托雷的首要合作者,承蒙王室的支持,得以培养了一大批受庇护人,并积聚了大量财富。1580年后他在扎莫什奇创建了一个文艺复兴风格的城镇,由意大利建筑师伯纳多·莫兰多(Bernardo Morando, 1540—1600)设计建造。

事实证明,全国议会没有能力应对宗教差异和大贵族的内斗。这些就是**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出现的背景——它是指仅凭单独一个人的权利就可以破坏国会会议。在1768年之前,不存在用于投票立法的正式国家机制:仍然保持着用鼓掌欢呼表示通过的形式。议院的执行官或发言人并没有实质的权力去惩戒、指挥或者控制会议的进程,当出现严重的派系争斗时,场面就可能演变成令人难堪的一片混乱。全国议会的首要功能根本不是审议、通过法律,而是保护贵族的自由,并在受到侵犯时加以重申并提卫。正如历史学家安娜·苏切尼-格拉博夫斯卡(Anna Sucheni-Grabowska)所言,“一旦贵族在国内已经确立其可合法享有特权,严格的立法活动总体上来说就没有必要了。”因此,即使偶尔全国议会没有制定出任何最终法规,也都不曾引起警惕——这就是联邦在政治上蹒跚前进的方式。“全国议会没取得结果……,这没什么不正常,陛下,”1606年全国议会的议长向齐格蒙特三世解释道,“……在波兰的历次会议中总是有遗传的弊病,要么以这种方式,要么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但却并不是能一直取得成功。”

直到全国议会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议案才正式成为法律:瓦迪斯瓦夫·西青斯基(Władysław Siciński)在1652年3月反对在议会6周正常结束后延长会期,终止了讨论程序。虽然这一首次因单一个人反对造成的会议中断到底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还有待商讨,但可以确定的是,保皇党人和反对党人都同意此举,因为双方都害怕延期会给他们带来政治挫折。1669年11月,全国议会首次在正常议期结束前被打断。否决权在地方层面被频频使用——地方议会已经见惯会议中断、管理不当和司法浩劫。什拉赫塔对于否决权的态度是矛盾的。虽然这是“自由的守护神”,然而使用否决权的个人(虽然没有人会这样做,除非他确保身后有强大的支持)会受到普遍地谴责。在18世纪,拖延会期致使讨论不了了之与直接中断议会一样普遍。在米哈乌·维希尼奥维斯基(Michael Wiśniowiecki)统治期间(1669—1674),5次全国议会中的3次都遭到中断;在杨三世·索别斯基统治期间(John III Sobieski, 1674—1696),11次全国议会中的5次都被中断。在1697—

1762年之间的37次全国议会,只有12次制定了法律。建立联盟——一个有共同计划的同盟,是驳回否决权唯一有效的方式。但是这样的同盟大多形成在战争或者王位中断期,并总是以保护珍贵的世袭特权为目的。虽然敢于实践否决权的个人要承担所有的责骂,但这已经变成这些自由特权之一。在1763年后召开的全国议会就更为成功一些——但是大部分议会还是在同盟强加给贵族的庇护下召开。

然而当面临入侵和叛乱时,联邦共和国显示出自身具有的惊人的爆发力和复原力。1569年“卢布林合并法令”大大推动了将立陶宛的土地向波兰的什拉赫塔开放,虽然1588年的“立陶宛法令”对此有所限制。当然,如今在与波兰合为一体的罗斯土地上寻求新财富没有任何阻碍。对俄战争不再是立陶宛一方的事情——而变为整个联邦的切身利益。在1578年到1582年间,斯特凡·巴托雷的多次战役收回了伊凡四世曾占据的领土,保护了立沃尼亚和波洛次克。巴托雷将大部分的成功归功于他与波兰王国的首相兼军事统领(hetman)杨·扎莫伊斯基(Jan Zamoyski)的紧密合作。扎莫伊斯基是全波兰最富有的权贵,由一个有高度教养的煽动家转变为一个政治家,是波兰产生的与白金汉(Buckingham)、黎塞留(Richelieu)、奥利瓦雷斯(Olivares)这些王室的人物最相似的人物。他曾是“执行法律”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也将成为齐格蒙特二世越来越亲密的合作人。同时也正是扎莫伊斯基,在第一次王位空缺时期曾动员贵族努力获取个人王室选举权,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这是排挤掉哈布斯堡势力的最可靠方式。他向什拉赫塔保证他们是波兰-立陶宛联盟的基础,甚至比罗马共和国中的贵族更为优越。他顺利地被众人所接受。扎莫伊斯基协助巴托雷进行选举,他得到的奖赏几乎是无限的王室赞助与国家最高的官职。在维护对新国王的支持方面,他庇佑的大量受庇护人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通过这些人的服务,他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与政治的管理才能一样出色。在他们之间,两位统帅察觉到一个富有经验的军事人才的出现,这个人将竭诚地服务到下一代。

齐格蒙特三世的统治时期甚至见证了更多非凡的成功。齐格蒙特

在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v)统治后期与“动乱时期”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在1606年5月将一个波兰支持的野心家暂时地送上了莫斯科公国王位。1610年,俄国波雅尔贵族选举齐格蒙特15岁的儿子瓦迪斯瓦夫为沙皇。虽然王子从未进入莫斯科,但是1610年9月一支波兰军队进驻莫斯科城。面对大范围的俄国人起义,克里姆林宫的波兰守军直到1611年10月才缴械投降。1613年3月,米哈伊尔·罗曼诺夫(Michael Romanov)当选为沙皇,俄国人在他麾下团结起来,但是将波兰军队和哥萨克海盗从俄国土地上清除出去仍耗费了他们数年时间。1618年,俄国放弃了斯摩棱斯克,将其判给波兰。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试图在1632—1634年的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将其夺回,但最终还是以蒙耻告终。1634年6月签订的《普兰诺夫(Polanovo)和约》将斯摩棱斯克留在了波兰人的手中。这比什么都更有力地说明了这个由“卢布林合并法令”建立的新国家的强大实力。

这些功绩不仅显示出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实力,同样也暴露出它的缺点。1606年联邦贸然向俄宣战。事情的起因是一些鲁莽的王公贵族试图利用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治下的混乱局面来得利。而1609年全国议会批准参与战争,是因为机会似乎好到令人无法忽视。同样在16、17世纪之交,充满野心的边境权贵的半私人行动,意图重申波兰对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潜伏的影响。但是此举招致了灾难,因为这样的举动只会破坏在雅盖洛时期与土耳其宫廷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而波兰的哥萨克人对黑海上的土耳其领地进行非官方的、破坏性的袭击,使事态更加恶化。1620年,波兰军事统领斯坦尼斯瓦夫·茹凯夫斯基(Zółkiewski)出征,为了保住一位与波兰友好的摩尔多瓦大公之位,在策佐拉(Tutora)经受了一次决定性的失利,战败于土耳其手下。波兰很幸运,土耳其的国内纠纷削弱了其发起全面反攻的能力,并致使土耳其于1621年在霍京(Khotin,在今摩尔多瓦境内)遭到了惩罚性的惨败。

即使获得胜利,什拉赫塔在这些国外冒险中仍存在分歧。全国议会拒绝批准斯特凡·巴托雷在1584年重新开始对俄战争的计划,对于

许多人来说,巴托雷在 1586 年 12 月的突然去世也是一种安慰。巴托雷在瓦萨家族的继任者——齐格蒙特三世和瓦迪斯瓦夫四世(1632—1648)指望可以得到哈布斯堡的支持,希望哈布斯堡会支持他们在波兰实行世袭统治的计划——并且/或者实现他们对战瑞典的主张。齐格蒙特三世是瑞典国王约翰三世与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强大的妹妹凯瑟琳的儿子,他是在路德教国家培养出来的一名忠诚的天主教徒。1587 年他当选为波兰国王,并于 1597 年继承世袭王位成为瑞典国王;两年后他的瑞典王位被废黜,改由他的叔叔继任,也就是后来的查理九世。瓦萨家族继巴托雷之后试图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就普鲁士公国向霍亨索伦家族做出让步,直到 1618 年齐格蒙特三世将公国归还给勃兰登堡的间接血亲。

瓦萨王朝对瑞典的优先关注给波兰-立陶宛带来一系列灾难。波兰人先前选举齐格蒙特三世作为国王,一部分是抱着“重新获得”爱沙尼亚的希望,他们认为,在与“可怕的”伊凡的战争中,爱沙尼亚被瑞典人“窃走”。齐格蒙特仅在 1600 年被瑞典议会废黜后,才同意将爱沙尼亚交还波兰。波兰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瑞典人无功而获。1626 年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率军向波兰的普鲁士进攻。1629 年在阿尔特马克(Altmark)签订了 6 年停战协定,将立沃尼亚大部分地区和里加交与瑞典人手中,波兰北部遭到了摧残。瓦迪斯瓦夫四世对军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革,但随后发现什拉赫塔不让他动用这些军事力量。1635 年他们不顾国王的阻碍,坚持将停战协定再延长了 16 年。

深受挫败的瓦迪斯瓦夫开始将希望寄托于乌克兰的哥萨克人。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曾经利用这些非法的边民作为对抗鞑靼蒙古人长期袭击的力量。巴托雷也曾利用他们纯正的步兵团。在哥萨克人位于第聂伯河下游的中心营地——谢契(Sicz),他们选举出自己的军事领袖或总指挥官(hetman),以及自己的军事委员会。他们与鞑靼蒙古人进行对抗;同时也对黑海沿海地区发动袭击。1614 年,他们攻击了特拉比松(Trebizond)和锡诺佩(Sinope);1615 年,他们纵火焚烧了君士坦

丁堡(Constantinople)的郊区。虽然他们力图安抚土耳其宫廷,但波兰的国王们简直无法控制这些不安定的好战者。为了抑制他们扰民的袭击,全国议会曾同意将他们“登记入册”,成为联邦的直属军队,并发给固定的薪酬,从而消除他们为经济目的而进行军事劫掠的需要。然而,这些登记入册的人只占那些承认自己是哥萨克人的一小部分。什拉赫塔放弃了将他们登记入册的热望,放弃了那些没有注册的人,而将登记在册的上层哥萨克人封为贵族。这驱使他们去剥削“波兰的印度群岛”——乌克兰的肥沃土壤,同时系统地接受劳役制激发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而镇压这些起义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成功镇压 1637 年的武装起义后,除了已注册的 6 000 人,哥萨克人正式被降级为“普通农民”。

对这个怀有叛意且尚武的群体的处理是欠考虑的,如果了解这个时期前后历史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对俄战争和对土耳其战争的胜利使什拉赫塔冲昏了头脑,他们不愿承认应该把此归功于哥萨克人的大力支持——1621 年在霍京,至少有 2 万哥萨克人参与了战争,他们构成了联邦武装部队的主体。一些哥萨克小贵族选择保留他们的宗教,特别是居住在基辅周围和在第聂伯河沿岸的人们,波兰化在这些地区或是更远的西部毫无进展,他们确实被当做二等公民遭人歧视。在轰轰烈烈的天主教改革中,赋予东正教的分裂者真正平等的权利似乎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当真正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已皈依天主教的情况下。在 17 世纪上半叶继续大力推进殖民事业的进程中,苏额(Sugh)大贵族倾向于给波兰的天主教贵族(通常是新来此地者)提供重要职位,而不是给他们那些“更势弱”的东正教兄弟。因此这些人遭到了双重挫败:不仅越来越多地被排除出国家官僚机构,而且也被排除出围绕着第聂伯河中游和下游的显著的私人企业。对于这个区域内的许多小贵族,罗斯王公波雅尔随从的后裔,新来者们带来了外国的统治方式——暴力地、不稳定地政治镇压,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大贵族之间长期争斗,这些人试图尽可能在这一地区夺取更多的土地,而他们的君主对此却没有能力加以控制。



图 13 华沙的王宫城堡(Zamek Królewski),建于17、18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摧毁。现在的建筑是1971年修复的。当全国议会在华沙举行时,城堡是议员们的下榻处。照片右侧是1643—1644年首次建立的圆柱碑,是瓦迪斯瓦夫四世为了纪念他的父亲齐格蒙特三世而建造。塑像佩戴一个十字架和一把出鞘的剑,是激进反改革的象征。建造雕像引起罗马教廷大使马里奥·费隆纳迪(Mario Filonardi)的反对,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荣誉应该属于宗教,而不是世俗人物所能享有。

事实上,乌克兰几个世纪都是如此,但是文化和宗教隔阂的尖锐化加深了人们对一个神话般“黄金时代”的怀念。在那个时代里,基辅的土地是由他们自己的东正教王公实行和谐的统治。对于他们来说,天主教和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将东正教视为一个不稳定且引起叛乱的因素。哥萨克人,包括成千上万的小贵族或是将要成为贵族的人都算做他们的阶级之内,在战争时期他们极具价值,但是在和平时期,无论是对于殖民化还是特权,他们都被看做是一个威胁。在哥萨克人中有许多人十分天真地寄望于君王一定会改善他们的现状,特别是瓦迪斯瓦夫四世。瓦迪斯瓦夫本人是同情哥萨克人的,并把他们当做帮助他实现增强王权梦想的有力同盟。在1645年土耳其和威尼斯之间爆发的战争中,瓦迪斯瓦夫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如果他可以策划让波兰参战,他就能让全国议会除了为作战经费投票而别无他选。如果战争取得胜利,这将加强他

的君主政治,以及他儿子的王位继承权。然而,全国议会听到他计划的风声,并且强迫他做出承诺,解散已经集结好的军队。瓦迪斯瓦夫并没有被吓住,他私下与哥萨克人达成一笔交易:只要哥萨克人帮助挑起与土耳其封臣——克里米亚鞑靼人之间的冲突,瓦迪斯瓦夫就会将他们的注册人数加倍达到 1.2 万人,并授予乌克兰近乎自治的权力。

由于王室接二连三传出噩耗,这个计划变得毫无意义而无法实施:1647 年 8 月,国王唯一的儿子齐格蒙特·卡齐米日逝世,而在第二年 5 月国王也随之而去。但是乌克兰的火药桶已经被点爆。哥萨克人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i)(他参与了与国王的私下交易)与一个波兰官员之间存在个人恩怨,他逐步增强的实力已经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1648 年 5 月,大部分波兰军队被歼灭;由私人民团凑数、仓促组成的波兰军队,听命于那些争吵不休的贵族们组成的既消沉又分裂的委员会,而在 9 月,在鞑靼-哥萨克联军面前,他们全部仓皇逃跑。

赫麦尔尼茨基不想激怒鞑靼人,而是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虽然鞑靼并不准备让他发展得过于强大。他时不时会尝试控制摩尔达维亚,这势必危及鞑靼人的利益。无论他是想要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还是想和他更加强势的邻居保持一个更为宽松的关系,仍然尚未确定。他几乎无法控制已经释放了的武装力量。在扩张军队的顶峰期,他的反抗军人数已经达到大约 15 万人,其主要组成部分是那些憎恨自己波兰雇主和像什拉赫塔的经济代理商那样支配乌克兰大部分商业的犹太农民。起初形势有利于波兰人,标志性事件是 1651 年 6 月在别列斯捷奇科(Beresteczko),瓦迪斯瓦夫的继任者、其同父异母的兄弟杨二世·卡齐米日的大获全胜;但一年后在巴托(Batoh),大部分波兰常备军遭屠杀使之失去了意义。

到此时为止一直都谨慎小心的俄国人现在终于抓住了机会。1654 年 1 月,通过《彼列雅斯拉夫(Pereiaslav)合并条约》,乌克兰将自己置于沙皇阿列克谢(Alexei)的保护下。一股不可抵抗的俄军入侵随之而来。到了 1655 年 8 月,立陶宛大部分地区已遭受残忍蹂躏,而维尔



图 14 卡齐米日多尔尼 (Kazimierz Dolny) 的圣尼古拉斯 (St. Nicholas) 的市内住宅和大商店 (kamienica pod św. Mikołajem), 由普日兹比瓦 (Przybyła) 商人家庭在 1615 年建立。卡齐米日多尔尼在维斯瓦河中游充分发展为波兰出口的一个分段运输点, 在 16 世纪晚期和 17 世纪前半叶主要涉及粮食出口。与其他波兰城镇一样, 它并没有从 1655 年瑞典人突如其来的“洪水”入侵造成的破坏性冲击中完全恢复。这张照片摄于 1900 年, 传达了 this 城镇已经繁华凋零的印象。今天这座城镇得到大规模修复, 成为艺术家们的麦加以及旅游胜地。

诺(wilno)几乎被大火全部摧毁。俄军前进的步伐被瑞典查理十世的入侵行动打乱,其对俄国加以警告,暗示其在波罗的海的地位不保。他也曾有过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波兰瓦萨家族对瑞典的主张。随着9月与查理战斗华沙失守、大量波兰贵族背叛、杨二世·卡齐米日逃往西里西亚,这些都使波兰-立陶宛国家显示出似乎将要分裂的迹象。确实如此,1656年12月6日在匈牙利的拉德诺特(Radnot),瑞典和特兰西瓦尼亚达成协议,由乌克兰和勃兰王室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勃兰登堡的统治者“大选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可以获得波兰的王室普鲁士,从而将普鲁士公国合并到勃兰登堡的中心地带。其他剩余的地方都将成为瑞典保护下的一个小公国,由查理的被保护人和选举人、立陶宛大公鲍古斯瓦夫·拉奇维尔(Bogusław Radziwiłł)统治。

波兰从“洪水”(Potop)^①的入侵中幸存下来。过度扩张的瑞典和俄国军队的残忍激起了波兰举国上下的大规模起义。1655年12月,波兰军民在琴斯托霍瓦(Częstochowa)天主教圣地明山保卫战争中获得了胜利,这被证实是一个传奇性的转折点。各方改变了袖手旁观波兰与查理十世之战的态度。查理十世似乎势不可挡的推进激发了奥地利人、丹麦人和俄国人一起向他攻击——虽然“帮助”奥地利军队使波兰人和入侵的敌军一样几乎毁灭。在1657年夏天,波兰和鞑靼的军队粉碎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入侵行动。秋天,波兰军队协助被追击的丹麦人。腓特烈·威廉倒戈,但波兰人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657年,根据《韦拉瓦(Wehlau)条约》,联邦放弃对普鲁士公国的宗主权——1701年,该公国由列奥波德一世(Leopold I)升为王国。1660年2月,查理十世的意外去世为结束“北方战争”铺平了道路。1660年5月的《奥利瓦(Oliva)和约》以“一切恢复战前原样”(status quo ante bellum)为基础做出结论——(无子嗣的)杨二世·卡齐米日放弃了其后代可世袭瑞典王位的权利主张。在波兰因瑞典入侵战争遭到严重破坏之后,他被允许保留瑞典国王的荣誉头衔。

① 这场入侵史称“洪水”。——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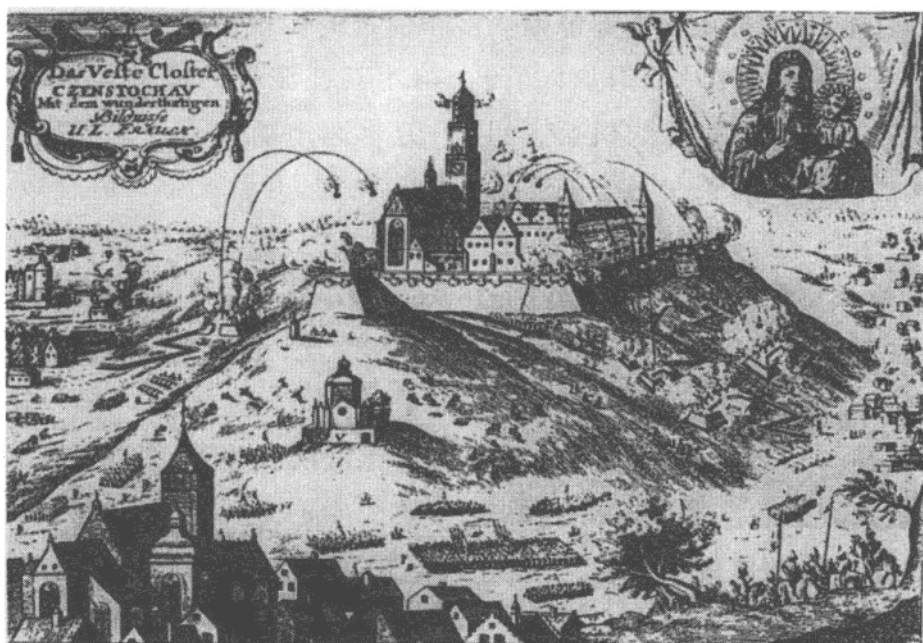


图 15 1655 年 11 月至 12 月，明山圣保罗修道院对抗瑞典的防卫战。这幅雕版画描述了圣母玛丽亚奇迹般地介入保护修道院的传说。该修道院收藏了黑色圣母像，应该是由福音传道者圣卢克(St. Luke)所画(肖像日期是 15 世纪)。这次围攻的失败是瑞典入侵中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点，帮助激发了波兰全国性的大型起义，团结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对抗入侵者。事实上，大约 450 名瑞典人是相对较小的围攻力量，而大多数战士——大约有 1 000 人——是由瑞典早期入侵阶段曾经投敌的波兰军队组成。但这丝毫没有减损传说的力量，这个传说也帮助修道院成为波兰最著名的宗教景点。

随着瑞典战争的结束，与俄国的斗争又开始了。1657 年 8 月赫麦尔尼茨基去世。他事实上的继任者——伊凡·威霍夫斯基(Ivan Vykhovskyi)出身贵族。他断定在沙皇的统治下“自由”是没有盼头的。1658 年 9 月 16 日在哈迪亚克(Hadziacz)，他与波兰签订协议，同意建立一个自治的“罗斯公国”并加入波兰。这个公国将有自己的管理层，与波兰和立陶宛平等相处。东正教将和罗马天主教持有同样的地位——当没有做出新的教会任命时，希腊天主教会也将允许自行消亡。东正教主教将会在参议院有一席之地。新公国会拥有自己 3 万名在册的哥萨克军队和自己的地区议会。但这个设想推出得太晚，罗斯上下对波兰人的普遍怨恨使其无法实行。一个包括三个国家的新联邦共和国

将不会成立。1659年5月,虽然全国议会缩小了协议中赋予新公国的广泛涉外权力,但是总体上批准了该协议——可惜并无实效。9月,在这个协议初次起草1年后,哥萨克人的代表会议集体彻底地否决了该协议,认为这是利己主义领导阶层的一次背叛。

虽然这个协议从没有得到任何机会有效执行,但是它挑战了俄国对乌克兰的控制,使对俄战争不可避免地重新打响。税收不足和国内重新动荡的局面削弱了波兰人在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后乘胜追击的能力。1667年在小乡村安德鲁索沃(Andrusovo),筋疲力尽的领导者缔结了一份为期13年的停战协议。俄国人手中仍然掌握着斯摩棱斯克和它的内地贸易区。乌克兰被一分为二:第聂伯河以东领土和基辅——这些俄国人许诺收回两年(实际上永远归了俄国)——处于俄国控制之下;“右岸”的乌克兰在名义上归波兰所有。

战争期间,杨二世·卡齐米日和他的王后路易-玛利亚·贡扎格(Louise-Marie de Gonzague)将他们试图加强王权的希望表露无遗。虽然他们也提出改革否决权的想法,但他们的注意力其实聚焦在保证继承权上。这对无子嗣的夫妇首先注意到法国的路易十四。而“伟大的康德”(Condé)、他的儿子昂吉安公爵(Enghien)、法国委托人诺伊堡公爵(Neuburg)菲利普·威廉(Philip Wilhelm)——这些人也都在慎重考虑的范围之内。一旦“洪水”导致的直接压力得以消减,国王和王后将提议在国王在世时选举王位继承人。波兰贵族和波兰的邻居们都受到了警告。王室试图摧毁自己首要的敌人耶尔齐·卢博米尔斯基(Jerzy Lubomirski),而此举煽动了叛变。1666年7月12日在蒙特维(mątwy)王室军队战败,伤亡4000人;国王也是死里逃生。直到一年后卢博米尔斯基去世,他的叛乱活动才终结,但是对他的记忆仍继续存活到联邦共和国的结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是一名反对王室专制主义、捍卫贵族特权、具有警戒性的防卫者。而四处受敌的杨·卡齐米日在1668年9月16日退位,1672年死于法国。

甚至早在杨·卡齐米日当选之时,预言者就认为他的拉丁称号“*Ioannes Casimirus Rex*”(杨·卡齐米日王)可以理解为传说中所说的“*Initium*



102

地图4 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



Calamitatum Regni”——即国家灾难的起始^①。这些战争毁坏了联邦共和国大多数的土地,与“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造成的破坏不相上下。1656年4月,什拉赫塔带着疑虑盛赞了国王做出的减轻对平民的(农民和市民在游击战争中如此勇猛地战斗)压迫的誓言。当封建领主试图重建他们被毁坏的财产时,农民身上的负担加重了;遭到毁坏的城镇其政治和经济力量变得越发薄弱。

什拉赫塔曾遭受过赫麦尔尼茨基愤怒的冲击。同样受到冲击的还有他们的被保护人——犹太人,他们紧跟着什拉赫塔的殖民计划,并支配着乌克兰殖民地的商业。虽然对具体的数字仍存在激烈争论,但是几乎有1万名犹太人可能在哥萨克叛乱期间遭到杀害;更多人并没有贵族民兵保护,也可能惨遭杀害。然而在商业和城市生活的衰退中,犹太人因没有受到中世纪行会规则的约束,更有勤勉开拓的企业家精神,并得到他们贵族赞助人的积极鼓励,巩固和扩展了自己在波兰商业圈内业已十分强大的地位,特别是在一些更小的镇区。甚至在许多禁止犹太人定居的王室城镇,犹太商人会定居在郊区或者超出地方自治权限之外的贵族所属领土,使基督教行会发现自己经常处于防御状态。甚至在波属乌克兰,犹太人也很快恢复了元气。波兰-立陶宛境内有着在欧洲来说最庞大的犹太人群(在18世纪70年代大约有100万人)。他们对商业和经济生活的主导,以及他们独特的信仰和文化也引起了怨恨。嫉妒和仇恨,这些情感在历史上从未表现得这么明显。

104 这些战争逐渐侵蚀掉波兰的忍耐度,即使它们并没有完全摧毁波兰。瑞典路德教和俄国东正教的入侵被视为一场宗教战争。新教成为理所当然的替罪羊。虽然《奥利瓦和约》维护了波兰的普鲁士公国中公众长期保有的路德教信仰,但在其他地方却是另一番景象。绝大多数大贵族早已皈依天主教——加尔文教最后的大赞助人鲍古斯瓦夫·拉

^① Initium Calamitatum Regni 简写为 ICR,而 Ioannes Casimirus Rex 的简写也是 ICR,两者似乎非常相似。因此预言家将它们关联起来加以引申,认为这预示着卡齐米日王会给国家带来灾祸。

奇维尔也在 1669 年去世。虽然主要的新教流派已经深深扎根几乎无法根除,但较小的支派还可以被剪除,毕竟 1573 年华沙联盟曾经做出妥协,以此作为勉强防止国内崩溃的安全阀门。为了维护“那些在信仰和教派上不同且存在争论的人之间”的和平,一个开放式的共识达成,这可以与对非天主教徒没有明确的承诺相提并论。对于更加宽容的忍让,大多数主教们仍然保持敌对态度;而绝大部分的什拉赫塔仍信奉天主教。1573 年的协定对防止城镇上零星的宗教暴行作用有限。当耶稣会学校的网络逐渐增多(1599 年有 11 所,1700 年有 46 所,1773 年为 66 所),当选任的国王寄望于教会将为他们提供支持,反宗教改革派开始有机会趁虚而入。早在 1638 年,波兰西部拉寇(Raków)的“反三位一体”派学校和出版机构就已经关闭,随之而来的是对其渎神的指控。忏悔的争论只给双方留下了极小的忍耐空间。1658 年,全国议会下令驱逐所有的反三位一体派信徒。

联邦共和国试图重申它对乌克兰的统治地位,以及反对瓦萨家族设想的专制主义意图,实现波兰在东欧卓越的地位,但都遭到了失败。国内政治与他们众邻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强大君主政体的敌人正是贵族特权的保卫者,对于与外国统治者密谋策划去反对建立更有效政府的任何行动,他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对。1667 年,瑞典和勃兰登堡达成《斯德哥尔摩(Stockholm)条约》,这是波兰的邻国之间旨在阻碍联邦共和国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的第一个长期协议。

在杨二世·卡齐米日继任者的统治下,外界态度的影响效果显著。支持法国或奥地利候选人的权贵家族将不会容忍米哈乌·维希尼奥维斯基的晋升,认为这完全是以空前数量聚集起来的什拉赫塔(大概有 8 万人)强迫他们接受的。因厌恶大王公们无休止的对抗举动,贵族坚持选择自己人——一个曾经显赫但已没落的大家族的子孙,其父在对抗赫麦尔尼茨基的战争中名垂青史(但比起战绩,更多是因为残忍)。然而一个以大主教尼古拉斯·柏拉兹莫夫斯基(Nicholas Prażmowski)和军事大统领杨·索别斯基为首的小集团,在维希尼奥维斯基的短暂统治期间,几乎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策划推翻其统治。在 1672 年土耳其

入侵波兰时,波兰正处于内战的边缘。当波兰要塞卡敏涅茨-波多利娅失守,同时利沃夫遭到围攻时,波兰的谈判代表除了有条件地投降而别无他选。通过《布恰奇(Buczacz)条约》,波兰完全放弃土耳其占领的卡敏涅茨和波多尔;位于第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被置于土耳其的统治下。共和国同意向土耳其交纳年贡,但1673年2月到4月的全国议会否决了该条款;全国议会同意组建一支空前人数的新军队以期再战;但是议会却无法结束国内的分裂局面。在11月,索别斯基击败霍京的土耳其军队获得辉煌胜利,但是却不能乘胜追击,因为由他的对手麦克·派克(Michael Pac)指挥的立陶宛部队拒绝与他合作;未得军饷的波兰军队也成群结队地四散逃跑。

然而胜利造成一波狂喜的浪潮席卷各地,确保了索别斯基的王位(在得胜的消息传到之前,国王米哈乌就已去世)。对于麦克·派克和绝大多数权贵家族来说,这位新国王取得的每次胜利都是索别斯基和其家族的胜利(维希尼奥维斯基至少还风度较好,表现低调),但对为联邦奠基的各种政治自由毫无推动作用。派克将不会为索别斯基提供他需要的来自立陶宛的军事支持。1676年10月,在茹拉夫诺(Zurawno),国王不得不满足于对1672年条款的重申——土耳其仅仅撤销了要求纳贡的条款。

索别斯基将普鲁士公国收复到波兰的计划(最好是作为索别斯基世袭的封地)遭到自己人的反对而流产。他本来想扶持萨别赫(Sapieha)家族在立陶宛的势力为己所用,结果萨别赫家族利用他的保护来加强其对立陶宛的控制,并随后和派克家族一样转而恶毒地反对国王。此后的国王将继续被同一股反抗势力弄得缚手缚脚,而这种反抗行为放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被当做叛国罪来处理;而在波兰-立陶宛联邦中,其所做的坏事却被真正视为是对祖传特权的一种捍卫。

106

当1683年土耳其人终于袭击奥地利并围攻维也纳时,索别斯基认识到他仅仅只需通过与哈布斯堡结盟就可以收回失去的领土。1683年9月12日在维也纳,在他的指挥之下,帝国主义武装与波兰联合赢得的胜利,对于波兰和它的国王来说,这不过是一座海市蜃楼。国内的政治使索别斯基困扰不已,他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与俄关系使情况

变得更加糟糕。在 1676 年和 1681 年之间,费尔多(Feodor)沙皇政府实际上转而加入对抗土耳其的战争中,试图将他们从乌克兰右岸赶走,并强行建立俄国的宗主地位,但最终并未成功。俄国人甚至发出警告,除非波兰人最终同意将《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转换为一个确定的和平条约,否则他们将再度与土耳其结盟。波兰人除了妥协别无他选。1686 年 5 月 6 日的《莫斯科条约》最终确认了《安德鲁索沃条约》。基辅毫无疑问地丢失了。除此之外,俄国人确保自己担任联邦东正教保护者的地位和角色——事实上就是给予沙皇权力干涉波兰的国内政务。对索别斯基而言,这是在他统治期间受到的最大侮辱之一——但是波兰的处境是如此令人担忧,他除了批准条约外也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至少该条约避免了一次俄国的入侵。然而莫斯科对抗克里米亚鞑靼的战争失败并没有给波兰带来直接的利益。在余下的战争中,波兰的军事行动在更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包括向摩尔达维亚发起不适当的强行进攻。他们的出征帮助削弱了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Balkans)的抵抗力量,但是主要还是依靠奥匈帝国的胜利,波兰人才最终靠 1699 年 1 月签订的《卡尔洛瓦茨(Carlowitz)和约》收复了卡敏涅茨、波多利亚和右岸的乌克兰,其时索别斯基已然去世。

在索别斯基的最后岁月里,他通过积累大量私人财富和装修美化宫殿来寻求安慰。1696 年 6 月 17 日,他在华沙郊外他喜欢的维兰诺夫宫(Wilanów)中逝世。他的逝世和他两位前任一样,几乎无人重视。他的儿子们相互敌对但都不受欢迎,注定了他们难以竞选到王位。来自韦丁(Wettin)家族实力雄厚的竞选人——萨克森的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他颇具讽刺意味的从路德教皈依天主教,并及时付清军队欠饷,这些都保证他能够获得王位,战胜那位犹豫的法国竞争者——波旁家族的康蒂(Bourbon-Conti)亲王。

做为神圣罗马帝国最富有国家的世袭统治者,这位新国王计划将萨克森和波兰联合,成为一股新的北部势力。他想与年轻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一起,瓦解瑞典在仍是少年的查理十二世治下的波罗的海帝国。瑞典的立沃尼亚将成为韦丁家族的一个公国。1700 年 2 月,奥古

斯特入侵立沃尼亚,利用的是驻扎在立陶宛的萨克森的军队,这支军队本是用来维持萨别赫和其对手之间的和平的。1700年11月,萨别赫家族被他们的竞争者成功击败,但是由于奥古斯特自己的军队在对军瑞典时元气大伤,以及同月在纳尔瓦查理十二世决定性地击溃俄国军队,奥古斯特夺回失地的希望遭到破灭。波兰人试图说服查理,奥古斯特的攻击与他们毫无关系,但这没有得到任何同情。查理追击奥古斯特5年,希望恐吓波兰人站到他这一边。1704年1月,查理甚至操控波兰的国家选举,通过残余的几百名什拉赫塔选出他的傀儡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列什琴斯基(Stanisław Leszczyński)。查理大部分时间都在和萨克森或俄国作战,而不是和波兰的军队,波兰军队的大多数人都在后方伺机而动,同时他们的指挥官也在等待着这场争斗的结果。敌对的联盟支持着两位不同的国王,内战再次打响。

然而,查理要到1706年才对国际形势做出正确判断,直接打击萨克森并且强迫奥古斯特放弃波兰的王位。由于彼得大帝的宽限和恩惠,奥古斯特复位,而随后1709年7月的波尔塔瓦(Poltava)战役则是瑞典的灾难。当查理在波兰即将陷入泥沼时,彼得重建了俄国军队。波尔塔瓦战役之后,彼得利用该军队将他的政权强加于波兰,而波兰将仍旧是一个沉迷特权、不思改革的联邦共和国,成为沿着俄国的西部边界而展开的一大片安全缓冲区域。彼得对1721年在《尼什塔特(Nystad)和约》中从瑞典榨取到的成果感到十分满意:他获得了卡累利阿(Karelia)、印格利亚(Ingria)、爱沙尼亚,以及所有地区之中最具有价值的、曾经属于波兰的立沃尼亚。共和国的地位无足轻重,以至于被拒绝参加和会。

战争期间额外召开的议会,力图维持某种规模的军队和提高某项税收。1710年的“全体集会”乐观地投票建立一支6.4万人的强大军队。事实上,军队补给依靠掠夺和地方议会的**特别决策**两种途径。而波兰指挥官则成为地方军阀,把军队看做自己的私人武装。来自瑞典、萨克森和俄国军队的勒索,与饥荒和瘟疫一起构成波兰的悲剧——如同“洪水”时期所遭受的一切那样糟糕。城镇的毁坏,学校和教堂的倒塌,也使波兰的文学和文化生活陷入停滞状态。



图 16 一个胖胖的波兰贵族(什拉赫塔),让-皮埃尔·诺布林(Jean-Pierre Norblin, 1745-1830)画于1776年。在1774-1804年间诺布林活跃于波兰,特别是从其保护人查尔托雷斯基家族那里获益良多。

奥古斯特允许萨克森军队进驻波兰引起什拉赫塔不满,导致1715年11月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成立塔尔诺格鲁德(Tarnogród)联盟。如果不是背后有俄国军队撑腰的俄国外交官出面调解,达成了一项对彼得有利的解决方案的话,更为训练有素的萨克森人或许会粉碎这个联盟。1716年11月的《华沙条约》赋予波兰新的宪政和财政机制,而绝大多数的萨克森军队将撤出波兰。军队固定为2.4万个领取薪水的单位(实际人数大概只有一半)。这些钱是从长期特殊的国家税

收中抽取——不再受地方议会的控制，波兰军队还被混乱地分配到各地。一个永久的预算项目就这样确立下来——用于支持一个可怜的、完全没有能力阻挡任何入侵者的小型武装力量。在1717年2月1日召开的所谓“寂静的全国议会”(Silent Sejm)，仅用一天的时间就通过了这个条约，没有任何争论。联邦共和国实际上被迫成为俄国的一个附庸国。由彼得众多在波兰的受庇护人所怂恿的俄国武装干涉，其造成的威胁阻挠了奥古斯特想要恢复他自由行动的所有尝试。他的儿子将要继承他的王位，这也不是因为国王自身的努力——而完全是俄国人的安排。

贵族的首要目标是想要保留他们的特权和自由。从瓦萨家族坐上波兰王位起，几乎每一位君主似乎都曾经密谋破坏他们的特权。最近一次最大的威胁来自奥古斯特二世，但是这个威胁已经被解决了。“北方战争”是一个具有创伤性、破坏性的事件，而且联邦共和国从中毫无所得——但它至少让波兰还保有了完全的自主权。波兰本国领土得以保全，首先归功于“上天的眷顾”(Divine Providence)。贵族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对国王保持长期警惕，因为这是对其地位唯一及真正的威胁。

奥古斯特二世于1733年2月逝世。一种反对外国统治者及其可疑企图的情绪化反应席卷整个国家。一个应该会与贵族的自由意志更加契合的“皮亚斯特”一直准备伺机而动——不是别人，正是之前查理十二世把一个将近30年的非正统王位推到他身上的斯坦尼斯瓦夫·列什琴斯基。列什琴斯基背井离乡的女儿玛丽(Marie)在1726年赢得了欧洲的结婚“彩票”，摇身一变成为法国路易十五的新娘。1733年9月，大约有1.3万名贵族狂热地推选列什琴斯基成为国王。但是俄国及其奥地利盟军已经决定继续让韦丁家族统治波兰，认为这比让法国国王的岳父当国王要好得多。俄国急于维持自己新的优势地位，不仅对于波兰，而且还有昔日笼罩在其阴影下的、易怒的瑞典。列什琴斯基与查理十二世的征讨大业联系过于紧密，以至于圣彼得堡无法接受他。一旦萨克森的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Frederick Augustus II)承诺



图 17 一个瘦瘦的波兰贵族(什拉赫塔);让-皮埃尔·诺布林于 1776 年绘制。

将保护波兰的政体,维也纳和彼得堡将代表他的利益加入战争。1733 年 12 月,受俄国军队“保护”的 4 000 名贵族选举他成为国王奥古斯特三世。俄国的武装保障了他的顺利当选。在意大利和莱茵河,法国也确保了他们想从这场波兰王位战争中获得的的好处。1735 年 10 月,维也纳初步议定将奥地利的卫星公国洛林(Lorraine)送给法国,并且允许列什琴斯基作为公国名义上的公爵进行统治,在他去世后公国将过继给法国;同时他可以保留波兰国王的头衔。而相关条款没有一人与波兰人进行过商议——因为没必要。

在政治局面恶化的过程中,奥古斯特三世的统治却让国家恢复了一点元气。在18世纪40年代末期,“北方战争”造成的大面积严重破坏都得到了修复。虽然波兰不可能恢复到16世纪作为欧洲粮食和其他日用品出口承办商的卓越地位,但其木材、牲畜、松脂制品的出口还是为大中封建土地主贡献了大量财富。基于与国际的联系,天主教会站在了文化重建的最前线。两个教会组织:皮亚斯特会(Piarists)和耶稣会,从18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相互竞争,提供他们在意大利、法国进行的那种精英教育。对于许多波兰贵族而言,德累斯顿(Dresden)是第二个家——同样也是一条新思想的渠道。“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成为时尚。用新哲学复兴旧传统最有力的代表者就是皮亚里斯特会的斯坦尼斯瓦夫·康纳斯基(Stanisław Konarski),他的执行管理委员会(Collegium Nobilium)于1740年在华沙建立,作为一所样板学校,为更追逐时尚的贵族提供服务。1733年,作为一名积极的列什琴斯基支持者,他曾经试图劝说国人:没有主权的自由是无法持续的。他在1761—1763年间撰写的《实现有效议会的方法》(*On the means to efficacious councils*)一文是对自由否决权猛烈的抨击。然而不止如此,这也是对一种波兰从未有过的事物的呼吁:一个真正强大的议会,可以制定法律和决定政策,远比一个以保护贵族特权为主要职能的守护机构更为有效。议会自身将成为一个经选举产生的、有绝对权力的统治机构,甚至比康纳斯基强烈向往的英国国会更有权力。那些将否决制视为可怕的宪政怪胎的人对康纳斯基充满溢美之辞;但那些认为否决制是“特权的卫士”的人,则难以容忍一个教士(即使出身高贵)训斥统治阶层这样一种情形的存在。文章中宣扬的新观念,尤其是它对英国《宪法》的空前赞赏,甚至迫使保守的批评家不再只关注国内盛行的口号和主义。

康纳斯基的想法得到一个强大集团的欣赏——查尔托雷斯基(Czartortyski)家族。这个家族有着古老高贵的立陶宛血统,他们的地位由于长期衰退变得低微,直到在奥古斯特二世统治下,王室保护人身份加上有利的联姻,帮助他们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力量。查尔托雷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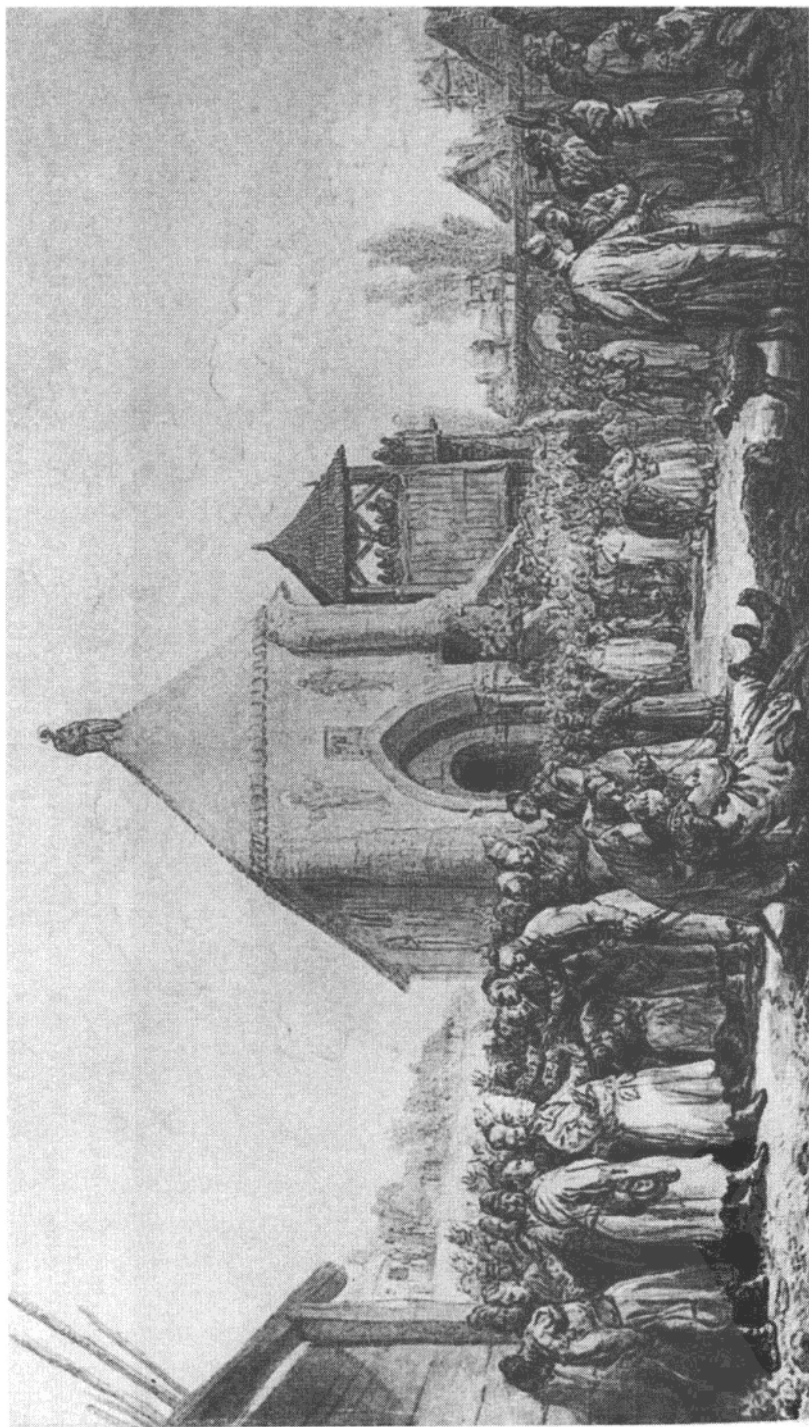


图 18 波兰政治生活风貌：让-皮埃尔·诺布林画的一幅关于地方议会于教堂外开会的情景（地方集会议会）。18 世纪英国的选举人或许会对此感到相当熟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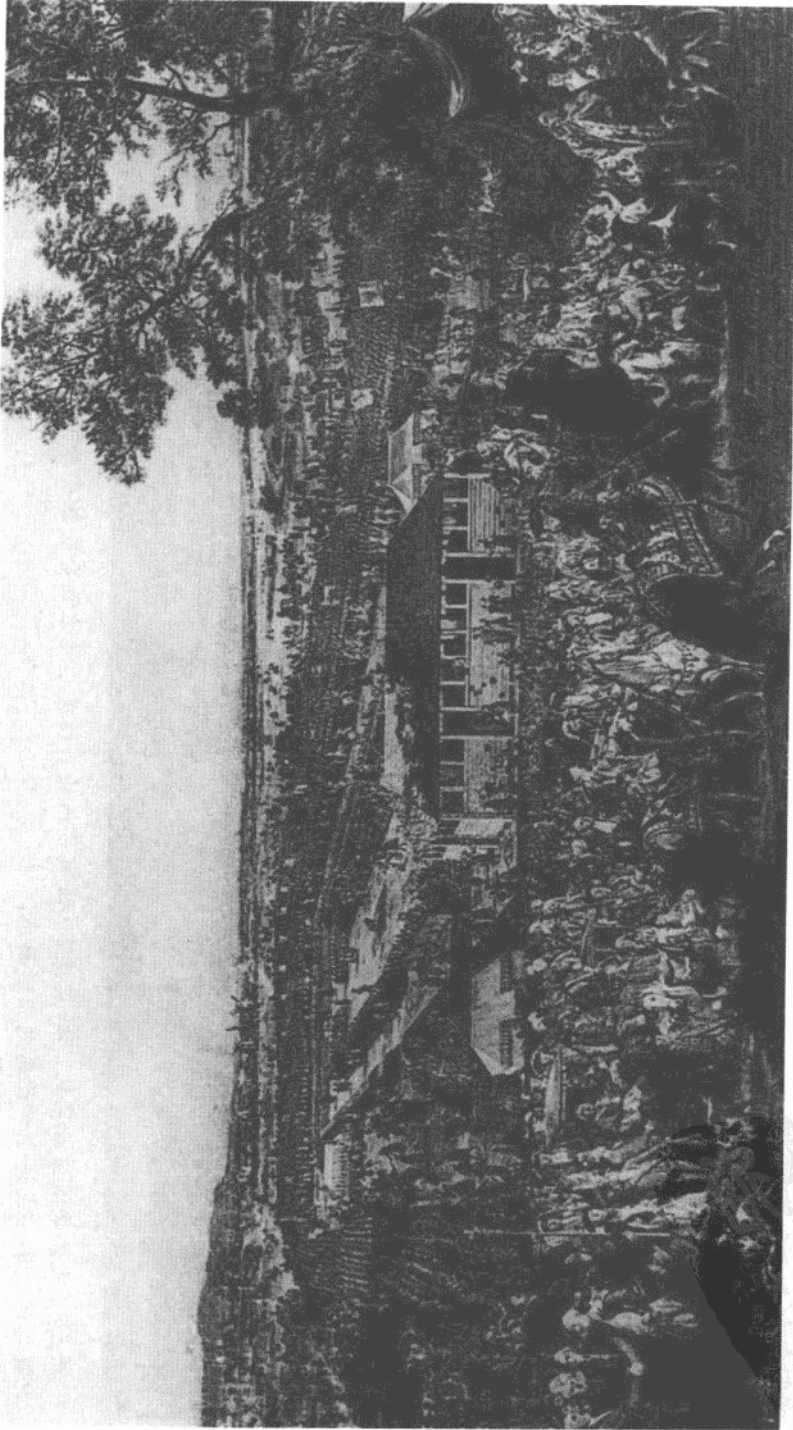


图 19 波兰政治生活的另一幅景象：由小卡纳莱托[Canaletto the Younger, 即安东尼奥·欧根尼奥·贝洛托(Antonio Eugenio Bellotto, 1721—1780)]所画,画面上是 1764 年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选举的场面。小卡纳莱托是奥古斯特三世和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宫廷画家。

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波兰要改变目前的面貌,不再是一个国际环境造成的被动受害人,那么它的整个政治形态将不得不重铸。其实在奥古斯特二世统治下,他们也慎重地提议应对“自由否决权”加以约束。他们相信他们不仅可以保存在联邦享有的特权,而且还可以自主操控它——参照他们特别钦慕的英国辉格党贵族的样式。有教养但无情的兄弟奥古斯特和米哈尔指望俄国可以打破国内政治的僵局。对于他们,最大的危险来自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他在1740年和1742年征服了哈布斯堡治下的西里西亚,挑起了霍亨索伦家族久已沉寂的对波属普鲁士的胃口。查尔托雷斯基认为,与俄国的联系将会为联邦提供一些保护。

在奥古斯特三世统治下,波兰不时成为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甚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的行军通道。但至少那悲怆的过去没有重演。苛捐杂税被地方化,有时甚至还征行得相当有序。大封建领主不曾遭受外国军队造成的额外损害,他们所得的租税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机会。波兰在1756—1763的“七年战争”期间保持中立,尽管不能完全让这些外国军队远离自己的土地。但波兰的中立是由于错误的原因。波兰的军队十分虚弱,它的议会几近瘫痪,它的领导人不能在一场斗争中阐明政策——但正如波兰的一些政治家认识到的,这场斗争对于波兰的生死存亡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最起码,如果腓特烈大帝保留西里西亚,波兰的领土肯定就是他下一个侵吞目标。在战争进行的大部分时间里,奥地利的受庇护国萨克森都被普鲁士占领了。奥古斯特三世和他的父亲一样,一直更为喜欢德累斯顿的情趣,却被迫一直延期住在华沙,直到1763年3月他才回到已经被战争毁坏的萨克森,并于同年10月逝世。俄国再次安排波兰的王位继承事宜——这次是单枪匹马独力而为的。俄国军队自1757年起就驻扎在波兰——将军队补足以确保作为新任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首选的回报,这事并不复杂。

1764年9月选举出的国王是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米哈尔和查尔托雷斯基的外甥。1754—1755年间,他在圣彼得堡做外交官时,就已经成为大公爵夫人叶卡捷琳娜的情人。他不顾一切地想要

改革波兰——他加冕的名字甚至采取“奥古斯特”作为他希望成为王朝革新者的标志,就像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所做的那样。然而叶卡捷琳娜并未把他看做一位改革家,而是当成一个顺从的、随和的傀儡。正是在彼得一世曾经失败的地方,她的野心获得成功——强行将军队推进到奥斯曼土耳其边境,并将俄国的影响衍射到神圣罗马帝国——安置一个便于管理的、不仅仅是无政府主义的波兰。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依赖于她的财政施舍(她甚至支付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的加冕礼款项),这似乎非常理想。

116 女皇试图通过扭转波兰新教徒的不利地位来加强她的控制,但 1733 年的教士会议将他们阻挡在全国议会之外。然而新教继续变得容易被人接受,在波兰本土辐射到本地官员甚至军队官员中,直到各个阶层。他们在王室普鲁士及其城镇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1724 年在托伦,一次宗教暴乱导致 10 名市民领袖被处死了,但这几乎无法削弱城镇中路德教上层集团的统治地位。绝大多数的波兰贵族毫无疑问对新教带有敌意——每当天主教贵族经常地抱怨对他们开放的公职和酬劳太少,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新教徒却继续在公众生活中扮演着比起新教处于少数派地位的英国或是尼德兰(他们将自身视为欧洲文明的先锋)都更要卓越的角色。叶卡捷琳娜依靠新教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可靠的代理人群体。在一个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天主教教会太落后的欧洲,她设想的启蒙干涉或许恰好能帮助她洗清通过谋杀夺取罗曼诺夫王朝王位的罪名。当然,她也曾有过提高波兰东正教地位的想法——但是此时有名望的东正教贵族几乎都已经消失殆尽。于是她将精力集中在新教徒身上。






波兰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人真正敢于认可大规模地突然恢复新教的往日地位。女皇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斯坦斯瓦夫·奥古斯特实现自己的改革议程发生了冲突。叶卡捷琳娜可以接受执行管理委员会对那些迄今不负责任的大臣加以桎梏,例如军事统领或财政大臣,但是她不能接受限制自由否决制,更别说是废除它——这恰好是 1766 年全国议会上国王希望确保的内容。俄国大使发出警告,除非议会完全重申否决制,否则他的军队将把华沙夷为平地。可以调动的军队力量都十分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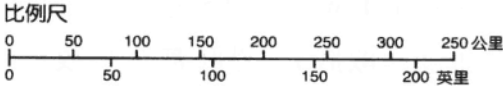
弱,根本无法采取任何形式的武装抵抗。蒙受羞辱、进退两难的全国议会最终做出让步,虽然他们完全清楚重申自由否决制会带来什么。

什拉赫塔甚至可以接受一个来自俄国的、强加的国王。他们迄今为止已经忍受了在国内穿梭横行的外国军队和偶尔发生的军事干涉。但是叶卡捷琳娜持续系统地运用武力去扭曲他们的宪法,以适应她的一些新计划。最后一根稻草是俄国在1767-1768年间对待全国议会联盟的方式。叶卡捷琳娜正是通过采取武力、恐吓甚至将敌对者放逐到俄国内地的手段来确保自己的目标:将全国议会和参议院的席位向反对派开放;将参议院的一个席位授予东正教莫西留(Mohylew)主教(一个被强加给波兰人的俄国国民);重新调整议会的程序,排除其争论的环节,但是除了最无关紧要的立法,完全保留否决权。更糟糕的是,波兰人将接受俄国对他们法律和宪法,甚至于他们的领土的担保,使他们被束缚在了这个看起来不可抵抗的邻居身上。

早在全国议会闭幕之前,1768年2月末,一群贵族在波多尔的巴尔(Bar)集结,为了建立一个目的明确、意图推翻新教殖民地的同盟。他们当时尚未阐明其长远计划,就是要求推翻波尼亚托夫斯基,并恢复萨克森韦丁家族的统治。俄国人很快镇压了最初爆发的起义;但是巴尔党人开启了此后持续4年的游击战,造成不可控制的国际影响。

1768年10月,俄国追赶巴尔党人时侵犯了土耳其边境,被激怒的奥斯曼土耳其对俄宣战。土耳其一直以来就很担心俄国会把波兰-立陶宛联邦变为其日后与土作战的供给基地。在俄土冲突中,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几乎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1774年6月的《楚库克-凯那尔吉和约》(Kuchuk Kainardji)对土耳其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耻辱,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领土,而且还被迫放弃对克里米亚的宗主权。但这一系列在西欧各国看来实在太不可思议的长途作战让俄国感到过度疲劳,并引发了“布加切夫(Pugachev)起义”。这样的俄国显然无力去击溃巴尔党人的游击队。波尼亚托夫斯基和查尔托雷斯基都不愿去协助俄国人;相反,他们希望利用巴尔党人来至少达到撤销俄国的保护,甚至彻底逃出俄国的魔爪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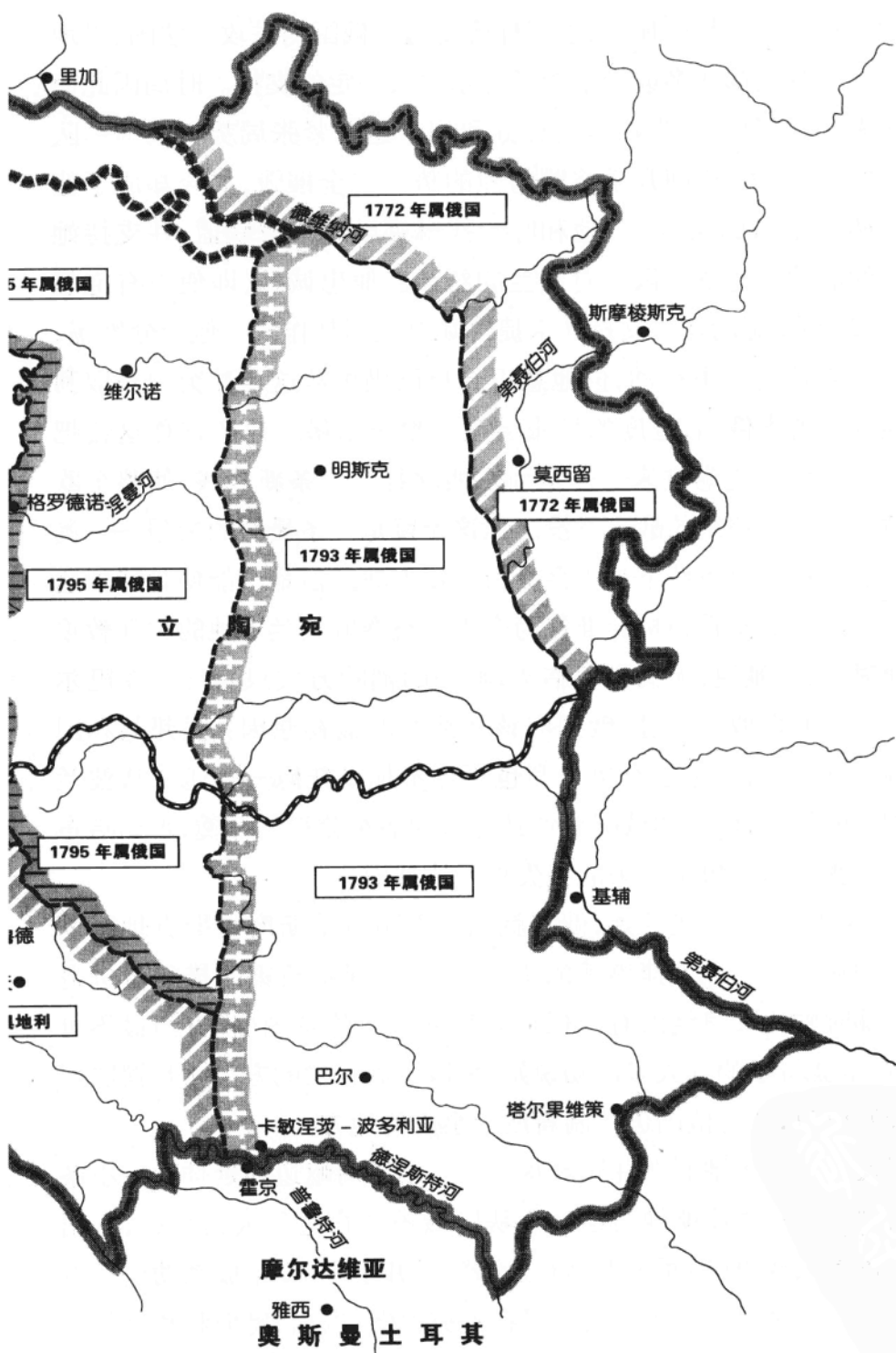
-  瓜分前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边界
-  波兰王冠王国和立陶宛公国之间的分界线
-  1772年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吞并的领土边界(第一次瓜分)
-  1793年被俄国和普鲁士吞并的领土边界(第二次瓜分)
-  1795年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吞并的领土边界(第三次瓜分)



118



地图 5 18 世纪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



俄国深入到多瑙河流域的举动为奥地利敲响了警钟。法国作为奥地利的盟军和土耳其的朋友,也同样想要遏止俄国的进攻。法国、奥地利和土耳其各国都或多或少给予了巴尔党人一定的支持。时局因此而紧张起来,而普鲁士的腓特烈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紧张局势。俄国军队曾经在“七年战争”期间几乎将腓特烈的势力完全摧毁,如今却成了他的敲门砖。在1764年4月,他和叶卡捷琳娜已经结成联盟,并支持她在波兰的活动。他承认俄国对波兰的统治。他忠诚地(即使带有抱怨地)以财政补助金的形式支持叶卡捷琳娜对土耳其作战。他十分警惕,并不参与直接的军事行动,但他意识到自己仍可从这场冲突中获取利益。他经常警告俄国,过度的扩张会激怒哈布斯堡。他还宣称这会把他们的盟军法国也卷进来——从而在西欧打开一条新战线,使整个欧陆都被一场无法控制的战火吞没。但这无疑是一条最假的情报——奥地利和法国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参与一场大战。但是这能使腓特烈达到他的目的。那些看到机会准备为个人利益夺取波兰土地的顾问教唆叶卡捷琳娜,劝她说,大祸似将临头,唯一的消除方式只有终止在巴尔干的无休止的攫取。不过,俄国应该从冲突的最初原因:联邦共和国那里寻求“赔偿”,当然还有奥地利也不得不加以抚慰——通过从波兰拿走相应的领土;而除非俄国允许其忠诚的盟军分得一杯羹,否则哈布斯堡的扩张会给普鲁士带来的损失将无法抵消。

自18世纪40年代开始,俄国就已经看中位于斯摩棱斯克地区以西的立陶宛国土。叶卡捷琳娜的1768年领土保护政策的措辞是进退自如。那时候的女皇绝没有与任何人均分波兰的意图(腓特烈最不可能)。在圣彼得堡的众人多次劝说她,采取全面赔偿的方法才是摆脱纠缠的最好出口,毕竟俄国仍控制着波兰余下的地方。

促成因素是奥地利吞并顺着喀尔巴阡山脉崎岖边界延伸的一小条波兰高地。腓特烈冷酷地对这一小块区域被盗窃进行大力渲染,发出法国准备加入战争(纯属子虚乌有)的警告,并于1772年成功劝说俄国人答应做一笔交易。同年8月5日在圣彼得堡,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签署了三个双边协定,叶卡捷琳娜占领沿着德维纳河(Dvina)和第聂



图 20 雷耶坦在 1773 年全国议会上的肖像画，扬·马迪依科(Jan Matejko 1838—1893)画于 1866 年。这幅画激怒了许多波兰贵族，他们反对在波兰历史这个令人不快的转折点上如此真切地辨认出他们的祖先。一个贵族抱怨道：“这幅画是在宣传历史上的一个丑闻，仅仅是为了实现扩大其声望的目的，绝不会成为艺术大师的作品。”另一方面，弗朗兹·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在 1867 年该画在巴黎沙龙展览之后，如愿以偿地将它以 5 万法郎买回。

伯河源头的领土；奥地利占领沿着维斯瓦河和桑河上游的广袤土地；腓特烈最终得到了波属普鲁士——除了但译。因为叶卡捷琳娜认为但译太有价值，不能交付给她实在太聪明的朋友。尽管如此，在经济方面腓特烈仍是最大的收益人，夺取到波兰最有价值的土地和经济命脉——维斯瓦地区（他将尽自己所能在剩余的统治时期内对此地进行压榨）。1772年4月，在预计最终协定将要签订时，瓜分行动开始。大多数波兰人对此表示震惊——因为瓜分传言在数年间屡屡不断出现；波兰自己的国王也曾经警告过他们可能遭受的厄运。上帝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如此长期的保护，但欧洲的平衡最终还是要按其常规发展。

122 让耻辱更为浓重的是，全国议会被迫延长，被逼批准整个瓜分计划，不得有异议。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曾幻想，作为对丧失领土的回报，国王的权力或许能够加强，或是废除自由否决权，但这些希望都破灭了。1768年宪政决定得到重申，虽然已经大幅减少了对反对派的让步——但尽管如此，大部分新教徒仍处于普鲁士的统治之下。莫西留大主教区，东正教的最后辖区已经转属俄国。

一个新的行政团体“常设委员会”(Permanent Council)出现，其设立是为了维持最起码的日常行政运作。而主要的创新是建立了国民教育委员会，旨在监督、管理中等学校与克拉科夫和维尔诺的两座“首要学校”(大学)，并使其课程现代化。由于罗马教皇在1773年废除耶稣会(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施压下)，这一切成为可能：该修会的学校及其财产成为新教育的支柱。但是委员会花了10年才把自己从初期出现的问题中解脱出来——而要让贵族消除对其新制理念的怀疑，仍需要更长的时间。

联邦共和国太过软弱以至于无法抵抗瓜分。社会和军队都变得士气低落、茫然失措、受尽羞辱并且分崩离析。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反抗行为发生在1773年4月，塔杜施·雷耶坦(Tadeusz Rejtan)堵住了通往全国议会的道路。虽然他的抗议是徒劳的，无法改变一次不可避免的瓜分，但在民间记忆中却备受推崇，犹如神话。据粗略的人口统计，波兰可能失去了1400万居民总数中的500万人，奥地利得到了其最多的

人口,超过 250 万人。波兰被剥夺了大约 1/3 的领土,包括其最富裕的省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边境推进到波兰的中心地带。俄国占领的地区最广阔,普鲁士占领的最少,但是这些地方在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上都极具价值。奥地利人后来非常后悔他们如此轻易就同意了瓜分协定,使自己憎恶的对手在实力上大为加强。三股力量都违背了自己对新宪政和领土秩序做出的承诺,漫不经心得仿佛它们一钱不值。

新的教育改革和对文化的慷慨赞助最终能产生更成熟且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国王对此抱着一线希望。在他当政时期的确出现了一个文化全盛期,这是一代人长期努力的结果;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牧师,还有许多是慕波兰纯粹的自由意志之名而来的外国移民,他们来重建其语言和文学世界在文艺复兴时的辉煌。伊格纳采·克拉西茨基(Ignacy Krasicki, 1735—1801)和斯坦尼斯瓦夫·特雷姆贝茨(Stanisław Trembecki, 1740—1812),他们的诗歌可以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作品相媲美。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评论家的作品,例如约瑟夫·维比茨基(Józef Wybicki, 1747—1822)或胡果·科翁泰(Hugon Kołłątaj, 1750—1812),都有意避免使用他们前辈使用的拉丁语式,并赋予波兰语一份新的成熟和力量。在华沙和维尔诺的皮亚斯特会的骨干以及康纳斯基的学生,都急切地想与国民教育委员会合作,试图对贵族进行再教育,让他们接受废除农奴制、复兴经济,并且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的共和国的目标。国王留意到华沙剧院是一条传播新观念的途径。和欧洲任何地方一样,首都的新闻也是自由而丰富的。然而所有这些努力仍不足够。绝大多数的贵族都对当时新兴的解放农奴的号召表示轻视,同时对他们的子孙接受改革学校的教育持有强烈的怀疑。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确信,国家幸存下来的唯一方法就是与俄国保持联系,并且希望可以说服叶卡捷琳娜赞助更长远的改革计划。但是俄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波兰任何形式的复兴。圣彼得堡批准自己成为波兰的非官方首都。大权贵们向俄国宫廷要求,将他们安排到具有利益和权势的职位上。甚至国王从前的盟友查尔托雷斯基家族,也把国王看做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俄国人,将背上被利用、被虐待、被陷害的名声。而这正是叶卡

捷琳娜想要的。在 1780 年,波兰似乎非常依赖于俄国,这使她敢于从波兰撤出绝大部分的军队。

一些人希望,欧洲的外交危机或许能带来救赎。1781 年,叶卡捷琳娜有效地利用了她的普鲁士盟军,与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再度结盟。只有哈布斯堡,而不是霍亨索伦家族,才能为她庞大的野心提供有力支持。她计划将土耳其踢出欧洲,然后让她的孙子康斯坦丁(Constantine)成为一个新希腊帝国的统治者。俄国在 1783 年将克里米亚彻底吞并,最终导致 1787 年 8 月土耳其再次宣战,新的俄土战争爆发。

124 1787—1792 年间的俄土战争为波兰重申主权提供了一段最后的喘息时间。叶卡捷琳娜确信,保障俄国利益的最佳方式是:虽然不能完全信赖,但也经得起某些考验的波尼亚托夫斯基保留在王位上,而让备受打击的反对派徒劳地去别处——普鲁士那里求援。与此同时,普鲁士的新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及其首席大臣弗里德里希·冯·赫兹伯格(Friedrich Von Hertzberg)正希望通过获取但泽、托伦和他们可以得到的其他领土,来为之前的占领扫尾: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利用波兰反抗俄国的“爱国心”来煽动波兰国内的动乱,好趁机达到他们的目的。1788 年 10 月新全国议会召开,议会在彻底的恐俄症中癫狂。被吓得胆战心惊的国王对普鲁士的“游戏”稍微有个模糊概念,但没有能力预防这股突然以自杀式血腥搏斗来疯狂抗敌的国内情绪。以《宪法》定义的政变的方式,全国议会接管了国家的运作。受普鲁士的煽动,全国议会否定了 1773—1775 年的殖民和领土保护协定。

俄土战争再加上 1788 年 7 月至 1790 年 8 月之间与瑞典的战争,使俄国大为分心。俄国的无暇顾及让波兰人得以继续开展关于国家应该如何改革的争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波兰已无法回到先前的繁荣时代或是奥古斯特三世统治时期无政府的宪政状态,虽然波兰在此之后同样也留下了一批热衷于此并具有强大实力的个人。普鲁士盟军的提议(他们企图以此举打消波兰人对普鲁士目的的怀疑),以及成功地坚持俄国人应该停止利用波兰领土作为通往巴尔干前线中继路线的主张,这些举动有助于使“四年议会”相信,那段耻辱的时代已经结束。

新议会开始废除 1773 年后推出的大部分宪政机制；议会通过了把军队从 1.8 万人增加到 10 万人的决议——但是议会却迟迟没能认真考虑军饷的问题。爱国热情而非政治考虑占据了上风。公众通过未经审查的新闻详细知悉了法国大革命的情况，它使波兰全体人民都感到振奋不已。甚至华沙许多此前一直态度消极的市民都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他们的人数在该届全国议会期间超过了 10 万。一个真正伟大的、可以跨越文化谱系自由对话和辩论的公众领域开始出现，以首都为中心。探讨任何问题的文章都有可能出版。平易近人的牧师弗朗西斯科·热兹耶斯奇(Franciszek Jezierski)在他 1791 年出版的《杂记 A - Z》(*Miscellany of words alphabetically arranged*)中，甚至驳斥了拉法乌·列什琴斯基(Rafał Leszczyński)十分喜爱的 17 世纪末的一段名言(卢梭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曾经在《社会契约论》中引用)：“Malo periculosam libertatem quam quietam servitutem”(我愿自由而有危险，但不愿安宁而受奴役)。他认为，这是一派胡言。因为一个存活下来的国家，无论它的政府受到什么程度的压迫，仍然有机会进行改革；但是一个失去了自由的国家就会失去一切。就在几年前，在这样一个看起来确实是把“自由”置于自卫本能之上的社会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发表这样的观点。

125

在 1788 - 1792 年这令人困惑的数年间，最重要的成就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议会统治。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统治已经让国家成为一座苛刻的政治学校。对于其伴生出的所有残忍野蛮的行为，1764 年、1766 年、1767 - 1768 年、1773 - 1775 年和 1766 年的全国议会以一个新法则施以重锤：就是议会有能力也应该承担制定法律的职责，并且国家的其余部分都要按此执行。近两个世纪或者更久，波兰的什拉赫塔曾经都不愿意因此吸取教训。现在，其他人对他们谆谆劝导。“四年议会”使强制政治教育进程达到了顶峰，因为一群政治精英发现议会能创造新的管理团队、制定新的税收政策、采取外交和政治主动——不仅是简单地维护旧特权，还能进行统治和管理。如果说往日对王室专制主义的恐惧症仍然还存在的话，一些政治家至少已认识到，比起长期以来致力于监控君权是否过分扩张来说，政治还有更丰富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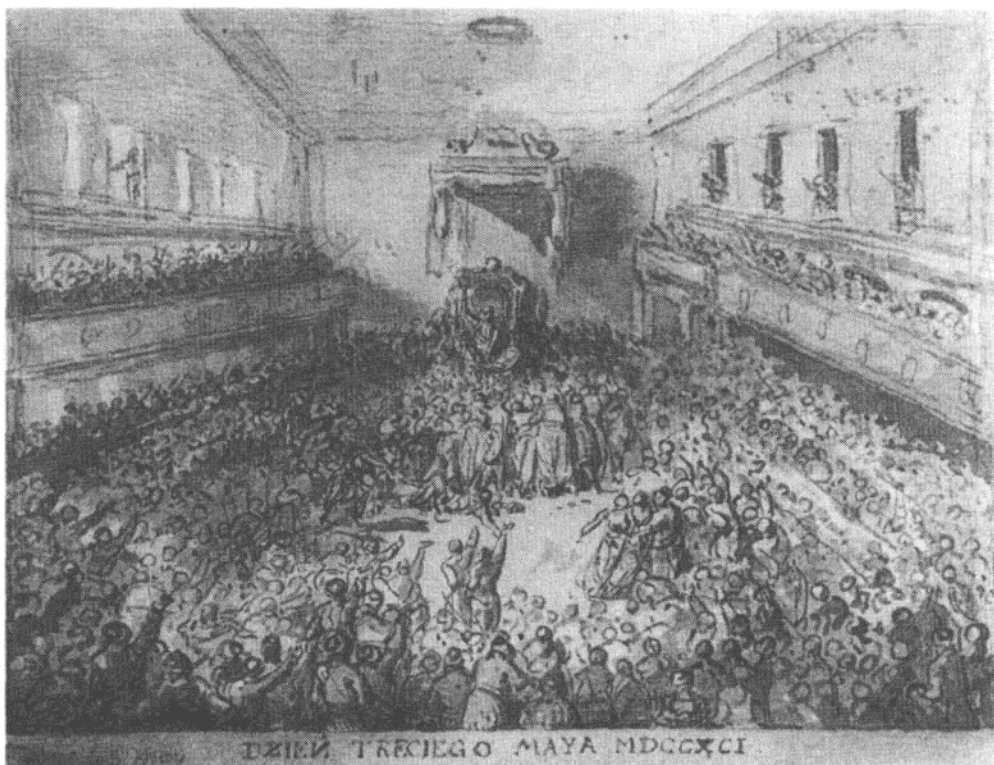


图 21 让-皮埃尔·诺布林绘制的 1791 年 5 月 3 日宪法宣誓场景的素描。

作为俄国的被保护国而暂时得到提升的自由感，一直都没有被很好地利用。在争论中，喋喋不休的人将个人认为最得意的方案大量灌输给他人，全国议会下设的各个委员会徒劳地想要囊括政治活动的全部方面。如果反对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的阵营没有分裂为真正想要改革，甚至实行开明的社会政策的人，和只想回到奥古斯特三世统治时那种状况的人这两派的话，事态也许仍会这样继续下去。正是前者修改了他们对于国王的限制，并于 1791 年 5 月 3 日在一次自上而下的“彻底政治改革”(coup d'état)中与他协作，为波兰制定了新的《宪法》：将王室所希望的更有力的君主政体与更有效的议会相结合产生的一个古怪的混合物，以期彼此之间相互制衡以遏制任何专制、暴虐的趋向。波兰共和国历史上两个神圣的事物都遭到了消灭：自由否决制被废，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自由选王制也遭到废除。这个最后的议题引起议会内外最激昂和最长久的争论。只有那些最坚决的顽固派准备维

护自由否决制。另一方面,施行了将近两个世纪的“自由地”由贵族共同选国王,这已经成为用来抑制君王个人主张的具有神性的、最有效的政治机制。在实践中,它们已经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以往几乎每次王室选举都会激发内部冲突和战争,并且为外国干涉提供了机会。逐渐地,赞同王位世袭制的声音越来越高,使得为难的贵族也被说服同意这个议案。这个王朝王位将授予奥古斯特三世的孙子萨克森的腓特烈·奥古斯特三世。英国有关内阁有责任 and 国王无责任的法则得到采纳。新的中央机构设立,反映出受到从外国传入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三权分立”学说的启发。

在全国议会上,当涉及直接影响商业的问题时,市民被授予有限的参与权。波兰政治上积极的“资产阶级”仍然非常软弱,且其影响范围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华沙。什拉赫塔中更多有思想的灵魂渴望在将来发挥自己的潜在作用。市民感激地接受给予他们的一切。全国议会从来没有对波兰数量庞大的犹太人的地位做出恰当的考虑,尽管他们在波兰有着极重要的商业作用。犹太人已经有属于自己的充满生机的文化,但他们仍被继续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议会也并没有特别关注农民问题,无非是做出了“(农民)受国家法律保护”这个含糊的承诺。尽管如此,对于被贵族封建主任意剥削近三个世纪的农奴来说,这仍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另一方面,对于移民到波兰的农民,其人身自由也得到了保证。所谓的《五·三宪法》的保守性也表现在对宗教问题的处理上,这已经成为长期制约波兰-立陶宛联邦发展的一个问题。宪法宣布天主教为国教,根据“本土法令”保证信仰自由,但是禁止“叛离”天主教。之后的法律非常勉强地允许信仰东仪天主教的大都市居民可以在参议院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实现的改变远远少于当初的承诺,但是这些已经足以激进到给俄国和普鲁士敲响警钟。只有正在奋斗的奥地利欢迎《五·三宪法》,因为其决策者希望一个复兴的波兰成为与他并肩作战对抗普鲁士的盟军。

新《宪法》在整个欧洲赢得了巨大的赞誉:在巴黎,是因为《宪法》遵守承诺,即使落后的波兰也加入了革命浪潮;在伦敦,因为《宪法》不

是法国或者波兰大臣创作出的、仔细推敲的译文,而几乎全部是用英文写就的。也正因如此,这部《宪法》锁定了波兰的命运,使其在劫难逃。萨克森那位中选的王公不敢接受王位的提议。俄国也无法忍受自己附属国作出如此挑衅的举动。1792年5月俄土战争一结束,超过9万人的俄国军队就跨过边境涌入波兰,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波兰缺乏对战经验的军队。普鲁士人以他们没有参与协商新《宪法》为由,拒绝兑现他们的防御联盟。在圣彼得堡,6个波兰叛国分子宣布他们已经在边境小城塔尔果维策(Targowica)成立一个维护波兰的自由同盟。的确如此,塔尔果维策(一种政治侮辱,其余毒甚至在21世纪仍犹在)是《五·三宪法》试图重新定义的“自由”的最后喘息。然而对于他们中许多人,《五·三宪法》实在有些过火了,除了鄙视那些祈求女皇保护的顽固分子外别无它用。

塔尔果维策的领导人开始处于澄清理由和大肆敛财的迷狂中。波尼亚托夫斯基在他的大臣鼓励下加入同盟,希望他可以抑制塔尔果维策的无节制行为,但这带给他的只有无法抹去的耻辱和骂名。这很明显,即使以俄国军队作为后盾,塔尔果维策同盟也完全无法仅在数周之内就在波兰-立陶宛进行有效统治。

解决方案很简单:再一次瓜分。叶卡捷琳娜当时的情人柏拉顿·朱波夫(Platon Zubov)及其朋友都太急切地想利用波兰的乌克兰使自己富足。女皇自己完全本土化了,并决定将再统一旧罗斯的土地作为她的历史任务,而旧罗斯的大部分地区仍在波兰共和国的边界之内。普鲁士几乎无法坐等这项交易达成:自1792年4月,它开始支援奥地利投入到对抗革命的法国的战争中,它抱着一个信念:已经接管国家的、民主的“乌合之众”将会提供更易攫取的机会。可事实却恰恰相反。9月,这些“乌合之众”在瓦尔密(Valmy)阻挡了普鲁士人。受到侮辱的腓特烈·威廉指望从波兰得到“补偿”。背着正一门心思对抗法国保卫他们在尼德兰财产的奥地利人,普鲁士和俄国于1793年1月23日在圣彼得堡签订了第二个瓜分条约。叶卡捷琳娜占领了在德维纳河北部到德涅斯特河南部间的广袤土地。腓特烈·威廉占领在西里西亚和

东普鲁士之间的一片三角形领域。一个很小的缓冲国被留下——但是它能存活多久呢？普鲁士军队在1月24日开始进入波兰，此时甚至连协定都还没有最终敲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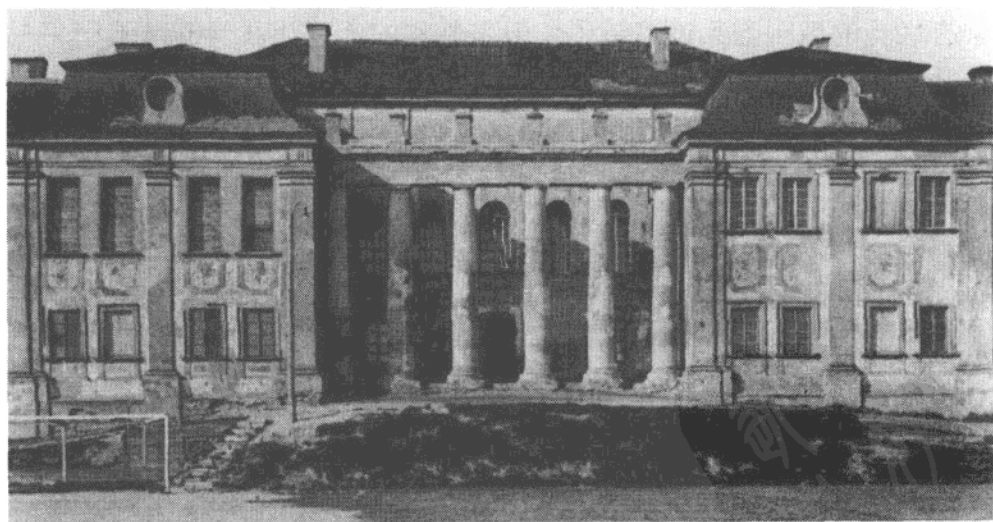
1793年6月，在立陶宛的格罗德诺(Grodno)(华沙被认为太具有革命性)城镇召集的议会上，重新上演了1773—1775年全国议会残忍的哑剧。到了9月末，议会在压迫下同意割让领土，并重订宪法，正式将波兰降到一个屈从于俄国的附属国的地位。残余的国土及其上的大约400万居民也处于俄国的占领下，无需怀疑，这只能是最终瓜分的前奏。一些在绝望中的波兰人指望革命的法国会给予帮助；一些人甚至幻想会爆发一次真正的全国起义。塔代乌什·科希秋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将军，他曾经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在殖民者一方)起过重要作用，并与法国有良好的联系，曾经参与1792年不幸的波俄战争，因此被选为起义领袖。俄国的逮捕行动和缩减波兰军队的提议使起义陷入困境——复员的军人都被安排在俄国军队服役。1794年3月25日，起义在克拉科夫爆发。甚至在4月4日科希秋什科于腊茨瓦维采(Raclawice)巧胜一小股俄国武装后，起义本来也可能会被人数更多、富有经验的俄国老兵迅速镇压。但是胜利的消息让波兰振奋不已——自从索别斯基使波兰人打赢一场与外国军队事前布置好的遭遇战后，激情就没有如此澎湃过。华沙也在血腥的革命中起义，并且开始驱逐俄国占领者。维尔诺紧随其后。腓特烈·威廉二世察觉到有轻松获胜的机会，就马上加入到俄国人阵营中。他们的联合武装6月在什切科齐(Szczekociny)击败了科希秋什科。普鲁士人继续占领克拉科夫，但是他们和俄国一起对华沙采取的围攻却以失败告终。由于缺乏重炮、普俄互不信任以及在他新吞并的波兰土地上爆发的起义，腓特烈·威廉二世在9月初突然停止了他的军事行动。

科希秋什科希望动员农民投入到独立斗争事业中，认为这或许就能说服革命的法国前来协助。但除非推翻数世纪的农奴制，否则农民决不会提供热情的支持。同样，科希秋什科也不能脱离什拉赫塔单独作战，但他们几乎没人打算推翻他们唯一熟悉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他



图 22 曾经消失过的波兰。乌克兰的里夫涅(Równe),现今的罗夫诺(Rivne)的卢博米尔斯基宫风景。

(a) 拿破仑·奥尔达(Napoleon Orda, 1807—1883)所绘制的宫殿素描,宫殿在18世纪20年代由波兰最大的贵族家族之一卢博米尔斯基家族建造。画中为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宫殿。奥尔达大约花了三年时间在被分割的共和国领土上四处游历,绘制了许多建筑物和纪念碑的素描,试图保留波兰民族精神永存的感觉。



(b) 照片表现的是同一座宫殿在1925年的外貌,其坐落于一战期间俄国和奥地利军队争夺最激烈的土地上,当时是作为奥地利的一家医院。1920年,宫殿在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中遭到毁坏,并于1927年在大火中焚毁。现已不存。

们想要一个独立的波兰,但只有极少数人可能设想过让农民自由。在腊茨瓦维采战役中,农民对起义的拥护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科希秋什科最多也只能警告、哄骗、恳求封建地主去减少农民的债务。他于1794年5月7日在波瓦涅茨颁布法令,宣布所有农民都享有人身自由,并且减轻他们的劳役。但这很大程度是形同虚设的规定。至于革命的法国,除了提供革命的优美辞令外,其他什么都没有。

科希秋什科预料到苏沃洛夫(Suvorov)将军带领的俄国援军会马上到来,于是在10月10日带领着一支与俄军人数差距悬殊的武装力量在华沙东南马切约维策(Maciejowice)攻打费尔森(Fersen)将军的军队,但科希秋什科的军队被打败,他也被俘获。11月4日,苏沃洛夫的军队从华沙跨越维斯瓦河猛攻华沙缺乏防御的布拉格区。大约有1万人惨遭杀害,华沙翌日失陷,起义就此终结。

这一次维也纳不会坐失良机了。6月,维也纳已经开始派遣军队进入波兰。叶卡捷琳娜现在也准备让奥地利加入。1795年1月3日,奥地利和俄国的外交官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一个新的瓜分协定,瓜分波兰剩余的国土,并也让普鲁士分得一杯羹。俄国再一次夺得最大的份额。奥地利分得的部分比普鲁士的少,但在经济上更有价值。普鲁士占领的地区包括华沙——它将成为一个边境城市——但是普鲁士将不得不吐还克拉科夫。叶卡捷琳娜决定让她的盟军明白,完全是出于她的慷慨和恩惠,波兰的边角地区才能扔给他们。但普鲁士人并不对此表示感激——在和奥地利联合对抗法国期间,他们与俄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濒临战争的边缘。直到10月24日,愤怒的腓特烈·威廉二世才同意接受给予他的土地,并将克拉科夫移交给奥地利人。因为此时普鲁士的军队已经消耗过度,无力顾及他。

自共和国不复存在之后,议会新近批准的行动都不再有用。1795年11月25日,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签订退位诏书。他于1789年2月12日在圣彼得堡逝世。1796年1月12日在圣彼得堡,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召开了一次三方会议,坚持“废除可以

132 让人回想起波兰的存在的一切事物”。贵族民主政治的实验走向终点,成为一次彻彻底底的失败。继续存活下去的是一个贵族国家的遗憾,尽管被撕裂、瓜分,但是它仍然感到自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并在最后的几年间,也曾感受到来自文化和政治复苏带来的一份新的自豪感。

第二部分

1795 年后的波兰



第四章 挑战瓜分的革命年代 (1795 — 1864)

在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统治期间,波兰的文化和城市复兴,事实上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但却无法把波兰这个国家从1795年的灭亡中拯救出来。由于挑战了俄国的统治地位,波兰的改革者已经陷入这场他们曾不顾一切想要避免的灾难中。人们只能猜测,一再的让步是否能使一个顺从的波兰在叶卡捷琳娜女王继任者警觉的眼下逃脱出来,并且完整无缺地进入19世纪;或者拿破仑战争是否无论如何都会把波兰拖入另一个灾难性的国际战争沼泽中。不管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都很难想象波兰人可以从拿破仑时期的剧变中毫发无伤地逃脱出来。

尽管如此,从1795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先前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广袤的土地一直维持政治分裂局面,并长期处于外国统治之下。这段漫长的分治时代,以及期间间或出现的个别为求独立但最终失败的英勇起义,并没有摧毁波兰的上层文化或什拉赫塔(波兰的现代知识阶层正是源自他们)的许多传统和价值观,也没有摧毁切实将大多数说波兰语的人与新教普鲁士人和东正教俄国人(但不包括天主教奥地利人)区别开来的罗马天主教。然而,当时从旧日波兰分裂出来的几个部分,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都不大相同,使地区间的差异进一步拉大,而几种相互排斥的种族和语言民族主义将进一步扭曲民族身份

135

136

这个复杂问题。对于回答“波兰人是谁？”或者“波兰是什么？”这些问题，1918年和18世纪最后十年给出的答案将会大相径庭。因此，1918年后，重建一个波兰主权国家绝非易事，这一点就并不令人惊讶了。

就18世纪90年代中期的现状来看，波兰的前景确实非常黯淡。对于波兰许多政治和文化精英来说，他们曾经自由和光荣的共和国，就像古代世界的伟大政体一样，已经永远地消失了。许多受过教育的波兰人起初怀疑，如果没有一个国家的形式，他们的民族是否会存活下来。1797年1月俄普奥三国达成协议，从官方用法上剔除波兰这个名称。这似乎更加巩固了上述悲观的预期。1788—1794年间重建国家民族起义运动的许多领袖不得不逃往国外，或者被囚禁在监狱：科希秋什科在圣彼得堡一直被囚禁到1796年，而科翁泰在奥地利的阿尔穆茨(Olmütz)要塞被囚禁到1803年。1796年至1798年间，波兰内部试图以武装反抗形式光复波兰的所有尝试同样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与此同时，许多有产者感到，要保护他们的财富，除了接受新政体并宣誓效忠于新主人外别无他选。两位年轻的查尔托雷斯基亲王抱着恢复家族被没收财产的希望，作为陈情代表前往俄国。柏林宫廷成功地笼络了安东尼·拉奇维尔(Antoni Radziwiłł)亲王，拉奇维尔甚至娶了霍亨索伦王室的一位公主为妻。而波兰末代国王的侄子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Józef Poniatowski)亲王则定居在普鲁士占领的华沙，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加利西亚贵族在维也纳建造了华美的宅邸。

虽然同样都欣然接受了波兰贵族的屈从之举，但三个瓜分国在1795年后对他们各自统治的、广大的前波兰领土实行了截然不同的政策。虽然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对外宣传中声称，自己是在收复古罗斯基辅公国丢失的土地，但是俄国缺乏邻居德国那样更精密复杂的官僚统治机器，所以无法在与古俄罗斯人有明显不同的地区实行彻底的俄罗斯化政策。俄罗斯帝国西部行政区**固柏利**(*gubernii*)^①与其他政区有

^① 1708年及1710年，彼得将俄罗斯全国分为八大军区，称为“固柏利”(Gubernii)，分别隶属于海、陆军，享有多方面的行政、财政、司法及治安权力。——译者注

显著不同的社会秩序将会基本保持数十年不变：当地波兰-立陶宛的有地乡绅保留了许多社会和法律特权，还有一些实行当地自治的残余权利。波兰的学校继续运转，自16世纪开始实行的立陶宛的法律体系也同样仍在原联邦共和国东部施行。俄国当局非但丝毫没有改善农奴的环境和地位，甚至不断增加对农奴的剥削。这一情况使大量地主从中受益，特别是在南方地区(乌克兰)，他们欣喜地看到诱人的前景：他们的粮食将通过黑海上新建立的俄国商业中心敖德萨(Odessa)向外出口。叶卡捷琳娜仅在宗教领域试图增强这些地区的“俄国”特性：迫使大多数信奉希腊天主教的乌克兰农民改宗成为东正教徒。针对之前的立陶宛大公国地区(其天主教的根基更加深厚)，沙皇保罗弃用了这项政策。在立陶宛-白俄罗斯北部的天主教(包括罗马和东仪天主教)与南乌克兰的东正教(那里的社会紧张局势也更严峻)之间因此产生对比，这种差异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地区对19世纪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出现的波兰民族运动形成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1793年和1795年普鲁士夺取的波兰土地上，霍亨索伦王室引入一种中央集权的，高度人员配备的管理体系，以及普鲁士法律体系(Landrecht)，贵族的许多特权得到尊重，但农奴也确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免受封建领主的过度剥削。波兰的中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废除，反之德语教育得到促进。柏林银行放宽信贷以及经由波罗的海港口出口粮食获得可观利润的前景，帮助平息了当地波兰地主的民族怨恨情绪，虽然最后许多不动产都将因为进行高额贷款抵押而落入德国人手中。在奥地利的波兰，一个在18世纪80年代传入“旧”加利西亚(Galicia)的中央集权的犹太基督教团(Josephinist)管理系统，在1795年延伸到“新”加利西亚。无组织的波兰贵族被按照奥地利模式重新安排等级，成为一个有头衔的阶层，波兰的学校体系遭到遗弃，审查机构得以引进。在克拉科夫的波兰大学被改成德国-拉丁语教学机构。另一方面，通过减轻劳役并授予农奴一些财产权，两个加利西亚地区的农民对哈布斯堡皇帝的忠诚感有所增长。虽然三个瓜分国都在他们的农奴士兵身上强加了为期20年的军事服役期(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非军事化的波兰-立陶宛共和国从未有过的负担),但奥地利的军纪则是其中最不严苛的。

三个瓜分国政府将罗马天主教会置于国家的严密监控下。同样,他们也没有免除施加于大量犹太人身上的繁重赋税和行政控制:例如在加利西亚,犹太人被迫采用德语姓氏,而在俄罗斯(那里接收了原共和国将近一半的犹太人口)他们被限制在专门的居住区——所谓的“犹太人特区”,随后又被迫服从于方向有误并最终失败的重农主义政策,这个政策强迫他们放弃手工业和旅馆生意,转而从事农业。由于国境任意变化而导致的经济混乱,使许多原属波兰的城镇因此饱受折磨;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段高速增长期内,华沙的人口达到10万,但如今它却发现自身降为一个近乎荒废的普鲁士边境城镇。

尽管最后瓜分的打击以及许多贵族和权贵向往宁静生活而选择顺从,但1795年被证明并不是波兰向往独立之路的终点。贵族共和主义的长期遗产与波兰征服者的专制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在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统治时期出现的民族觉醒意识无法轻易从波兰精英的头脑中抹去。这份精神存在于前联邦共和国的漫长的历史中,存在于成百上千小贵族的心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思想并不成熟,但对他们之前作为自由公民的地位怀有强烈的自豪感。这将成为未来自由奋斗者的储备力量——他们即将接收到浪漫民族主义令人兴奋的讯息。由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引起的长期不稳定的国际局势,为波兰的爱国者提供了挑战祖国被瓜分现状的时机。

139

最初波兰的民族事业主要由流亡的爱国者中许多有激进思想的人继续推动,这些人为了他们的事业试图从法兰西共和国寻求协助。大约2万波兰人,大多数为奥地利征召入伍后被法国俘虏,将要在法国的庇护下,在亨里克·东布罗夫斯基(Henryk Dąbrowski)将军与卡罗尔·克尼亚杰维奇(Karol Kniaźiewicz)以平等主义精神的指挥下,在意大利组建的众多波兰军团中服役。他们在1797年到1800年间攻打奥地利和俄国开创的传奇伟绩,激发鼓舞了波兰未来的几代人。当时他们

的战歌《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波兰决不灭亡》(*Poland has not perished while we live*),是由约瑟夫·维比茨基(Józef Wybicki)用民间流传的“玛祖卡”为曲调、以挑战波兰的压迫者为词谱写的战歌,并在后来最终确立为现代波兰的国歌。激进分子同样也在波兰内部发起了几个秘密组织,他们将民族独立事业与农奴解放紧紧联系起来,梦想着将法国式宪法引入光复后的波兰。

短期内,激进爱国主义事业遭遇了失败。流亡巴黎的波兰人出现分裂,国内的起义者缺乏广泛的支持,而在执委会领导下的法兰西共和国失去了最初的革命热情。波拿巴掌权使科希秋什科和其他波兰民主党人感到沮丧。当法国于1801年与奥地利和俄国缔结和约时,当波拿巴阴险地派遣5000波兰军团夺回海地时,波兰军团通过进军奥地利从而解放波兰的梦想最终破灭。自由的斗士已经转变成殖民镇压的一种工具,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活着回来再次看到欧洲。科希秋什科1800年提议在波兰发动一场以农民为后盾的游击战争,在没有任何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对抗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武装力量,但在当时的局势下,这纯粹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

法兰西共和国失去了光环,许多放逐者随之回到波兰(尽管其中没有科希秋什科),但这些回归的力量仅仅壮大了希望通过合法的文化活动来保存波兰民族特性的群体(而不是武装反抗力量)。1800年,华沙学习公谊会(The Warsaw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Learning)在华沙建立,聚集了波兰一些最主要的学者和作家,它立志于使波兰语成为主要的学术语言;其中一位重要的领军者是词典编纂家塞缪尔·博格密尔·林德(Samuel Bogumil Linde),他在1807年到1814年间出版了第一部现代波兰语字典。同时伊莎贝拉·查尔托雷斯卡(Izabela Czartoryska)公主在普拉威(Puławy)建立的博物馆则致力于赞颂波兰的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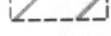
然而,波兰人当时最大的希望寄托在1801年3月登基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身上,他曾私下谴责他祖母对待波兰的方式,并公开声称秉持“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站在亚历山大一世一边的是他的密友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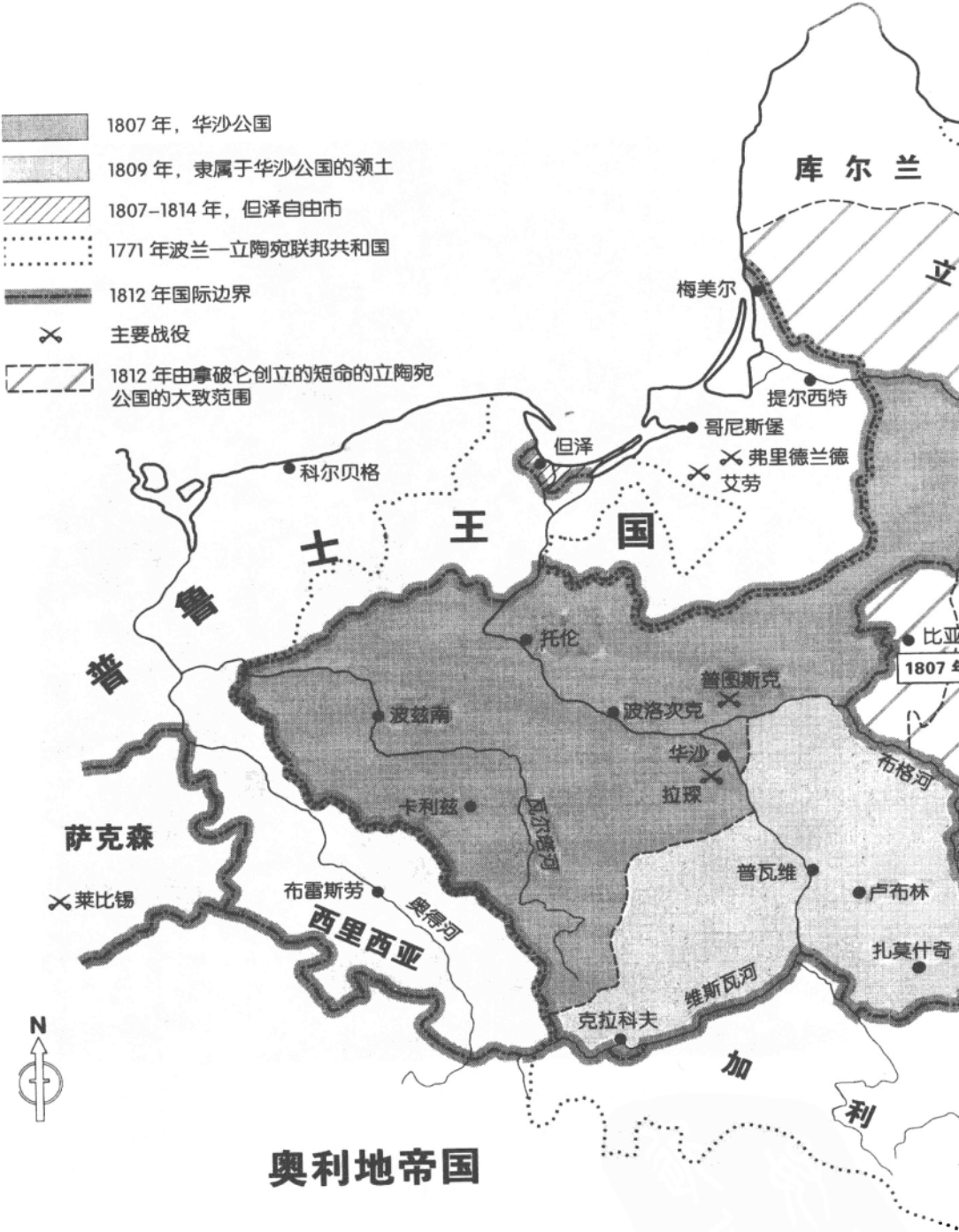
达姆·查尔托雷斯基(Adam Czartoryski),他曾经被派到俄国去收回其家族产业。因为相信在斯拉夫人大团结的意识形态推动下,俄国和波兰将有可能在亚历山大在位期间实现一次光荣的和解,查尔托雷斯基从他的皇帝朋友那里接受了一个领导职位。查尔托雷斯基从1803年开始出任维尔诺学区的督学,他主持了维尔诺大学的改革,使其成为俄占前波兰地区的波兰语学校之翘楚。沙皇亚历山大在他的西部领土承认波兰的贵族文化至上,阻止了这个区域的俄国化,当然也因此对推动当地非波兰语文学的发展毫无作为。这个任务留给了如赛摩基地亚(Samogitia)主教约瑟夫·盖德罗伊奇(Giedroyć/Giedraitis)那样的个人赞助者。他们推广使用立陶宛语进行写作。维尔诺大学成为波兰学术界的一座灯塔,也成为当时俄罗斯帝国最大的大学。波兰许多杰出的文化人物都曾在那里学习,如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和历史学家约希姆·列列韦尔(Joachim Lelewel)。因此许多波兰-立陶宛贵族当时认为俄国是三个瓜分国中最为宽容的也就毫不令人惊讶了。

更富有争议的是查尔托雷斯基从1804年到1806年担任俄国外交政策大臣期间的作为。他幻想亚历山大将成为创建一个正义和道德的欧洲新秩序的改革者,其中波兰将从与俄国的联合中得到光复。这很符合年轻沙皇的虚荣心和理想主义,但却在严厉的政治现实和沙皇自己的优柔寡断前随之破灭。1804—1805年间,俄国尝试拉拢奥地利和普鲁士加入一个反拿破仑联盟,但这很难与查尔托雷斯基企图收复这些国家的波兰大省的计划相一致。俄国和奥地利军队于1805年12月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的战败破坏了查尔托雷斯基在圣彼得堡的影响,并导致他内阁生涯的终结。在1806年末,波兰的境遇再一次被命运的车轮戏剧性地扭转:1806年拿破仑击败普鲁士军队,战争的胜利将法国军队带到了普鲁士的土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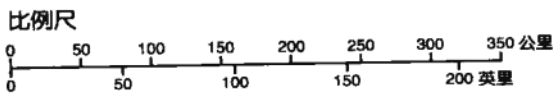


图 23 拿破仑给华沙公国授予《宪法》。这个带有讽刺寓意的作品是由马切利·巴西亚瑞里(Marceli Bacciarelli, 1731 - 1818)所画,描写1807年7月22日拿破仑皇帝在德累斯顿召集主要的波兰贵族,包括值得尊敬的斯坦尼斯瓦夫·马瓦霍夫斯基(左数第六个)(他是1788—1792年全国议会的发言人)。拿破仑无视波兰代表团的提议,径自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小时,口述自己的版本。但是《宪法》是波兰接受法国政治模式的一种有效形式。巴西亚瑞里是斯塔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宫廷画家,生前一直活跃在波兰文化圈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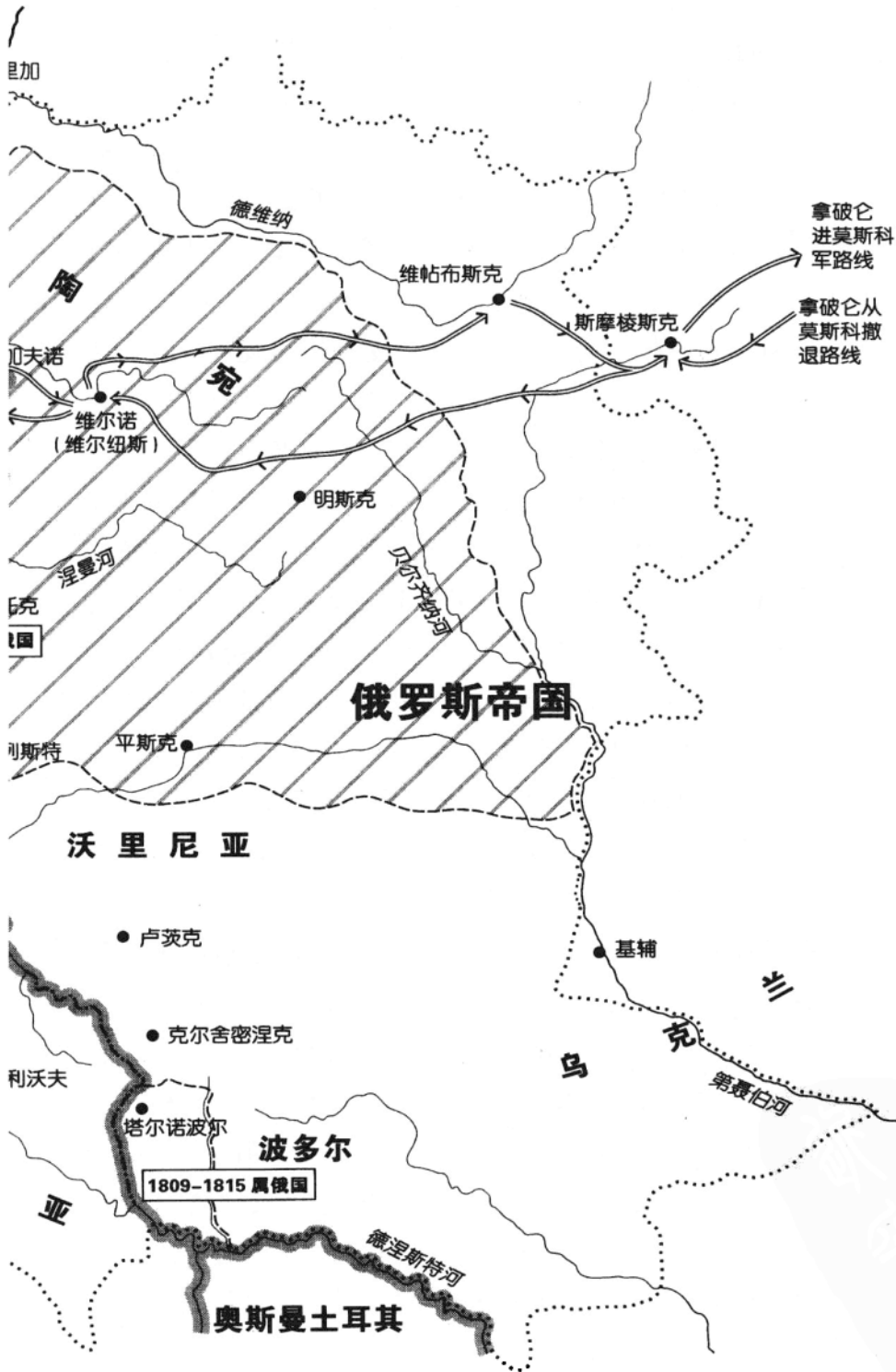
-  1807年，华沙公国
-  1809年，隶属于华沙公国的领土
-  1807-1814年，但泽自由市
-  1771年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
-  1812年国际边界
-  主要战役
-  1812年由拿破仑创立的短命的立陶宛公国的大致范围



144



地图6 华沙公国(1807-1815)



当霍亨索伦治下的国家在拿破仑的攻击下瓦解,柏林的波兰大省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先前的东布洛夫斯基和维比茨基军团一同出现,并站在了拿破仑军队的前列,使先前曾在1801年残酷破灭的、依靠法国援助复国的希望得以复苏。然而,沙皇亚历山大加入战争,并站到普鲁士一边,战事延长。拿破仑因此认可了在普占波兰成立一个由当地波兰人管理的行政部门,用于维持社会秩序,并为他提供额外的战士和补给。在进行长期的自我反省之后,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被穆拉特(Murat)说服,临危受命,领导一支重建的波兰军队与法国并肩作战。华沙的花花公子“佩皮”(Pepi)亲王,就这样迈出了转型为民族英雄和拿破仑时期波兰勇猛军队最具有侠义风度的象征的第一步。

在波兰西部创建一个拥有正规征募武装(1807年6月军队人数超过3万人)的准波兰政府,这已成为现实,但其未来的前景将完全取决于战争的结果。1807年6月14日的弗里德兰德(Friedland)战役最终确立了法国的优势,并迫使亚历山大一世妥协,在7月7日于提尔西特(Tilsit)与拿破仑签订了和约。大部分普占波兰国土转成所谓的“华沙公国”;俄国吞并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区并承诺加入大陆封锁体系对抗英国;而但泽恢复为一座自由市。1809年10月,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爆发短暂战争(波兰军队在其中表现很出色)之后,华沙公国因奥地利战败割土而得以扩大:维也纳不得不放弃其在瓜分中所得的一半,包括克拉科夫和卢布林。

143

华沙公国毫无疑问是法国的一个卫星国,被拿破仑战争机器加以利用并剥削。公国军队中有2万人参加了拿破仑对西班牙不光彩的侵略战争,并有将近10万波兰士兵在1812年跟随着拿破仑大军进入俄国。华沙公国不得不接受拿破仑规定的《宪法》:一种法国式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有专业的官僚和《拿破仑法典》。但更重要的是,公国的创立粉碎了瓜分条约,并再次唤醒了民族复兴的希望。尽管它仅仅包含旧波兰1/5的国土和30%的人口,但公国确实在其后1809年划定的边界内将波兰中心地带容纳其中:波兹南尼亚(Poznania),这是波兰中世纪国家的发源地,包括教会中心格涅兹诺,以及历史上的两个都城华沙和克拉科夫。波兰奥古斯特三世的侄子萨克森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提升为大公,两

院制全国议会和地方议会的恢复代表了波兰传统的复归。公国的大军在它的官员和士兵中逐步灌输公民道德,同时其对外参予侵略战争复兴了军事在波兰社会中的价值,还激发了对拿破仑的个人崇拜,这种情绪在波兰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公国的枪骑士,戴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查布卡**(*czapka*)^①,手执红白细长的三角旗,成为许多欧洲军队枪骑兵团的典范。尽管公国的军队在 1812 年遭受令人震惊的人员伤亡,但仍在自俄国回师时令人满意地保持了全部规格和完好无损的大炮。

拿破仑的政权得到公国的理性主义贵族阶级的支持,也将一些现代元素注入到波兰社会里。《拿破仑法典》废除农奴制,引入全体公民的法律平等和个人平等,并允许主教团极端厌恶的世俗结婚和离婚。一些非贵族如今也可以参加选举,参加全国议会并就任公职,同时伏尔泰主义者、教育大臣斯坦尼斯瓦夫·库斯特卡·波托茨基(Stanisław Kostka Potocki)大力推动初级学校教育。所有这些举措为增加专业知识阶层和缩小什拉赫塔和城市中产阶级之间的差距做出了贡献。但是仍有对波兰的“封建制度”的妥协:有地贵族得到所有庄园土地以及所有先前分配给农奴的全部财产权,而现今“自由的”农民不过是无地的承租人,仍要被迫履行强迫劳役。犹太人被禁止购买土地,他们的政治权利被剥夺 10 年,理由是他们仍未完全融入波兰社会。

146

波兰的传统主义者和共和党人都怨恨拿破仑的独裁主义,大陆体系更进一步加剧了波兰农业的结构性弱点。尽管如此,与西班牙或德国不同,波兰的民族运动不得不借力于拿破仑,至 1809 年,拿破仑已强迫两个瓜分国放弃他们占有的大部分波兰领土。沙皇亚历山大以极具诱惑的政治和领土条件去引诱在华沙的波兰领导人脱离拿破仑联盟,但这迟来的尝试没能成功;他计划重建立陶宛公国以对抗拿破仑治下的波兰,这个并不成熟的计划也没有取得更好的结果。波兰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加速了 1810 年至 1812 年间法俄关系的快速恶化。公国的领导者对 1812 年的战争表示欢迎:波兰王国在 6 月 28 日庄严地宣布光

① 波兰军队一直沿用到现代的斜盘帽,后成为这种精锐士兵的称号。——译者注

复,并认为恢复俄国占领的前波兰土地是迟早的事,虽然立陶宛对法国入侵报以谨慎而非热情的回应。

拿破仑在俄国遭遇的灾难粉碎了波兰的希望和幻想。如今轮到沙皇亚历山大变成波兰未来的仲裁者,虽然为了避免削弱新建的反拿破仑联盟的力量,最初他抑制住在公众前曝露将波兰王国置于他统治下的野心。在这不明朗的环境下,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亲王感到,他除了站在拿破仑这边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他率军在决定性的莱比锡(Leipzig)(1813年10月16日—19日)战役中掩护法国撤退,在战场上英勇阵亡。1814年4月6日拿破仑退位后,沙皇亚历山大立即公开宣称对华沙公国的权利主张,将波兰残余的军队置于他的控制下,并批准在华沙成立改革委员会,为一个波兰的罗曼诺夫王朝做准备,对此他向波兰人宣布,他很乐意在适当的时候增加西部的固柏利。虽然亲拿破仑的情感在公国仍是主流,但公国的许多贵族在查尔托雷斯基积极鼓动下,接受沙皇声称的宽宏大量作为他们国家的唯一希望。甚至连,爱国主义美德的模范人物科希秋什科,也暂时结束在瑞士的流亡生活,前去为亚历山大效力。

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最终结果远远没有达到波兰曾经的希望和期待的目标。然而,在1815年想按1772年的边境线恢复一个独立的波兰已完全不可能。波兰人的不幸在于,最终推翻拿破仑的大陆势力碰巧与曾经瓜分波兰的国家是相同的。而期盼俄国在它刚取自彼得大帝以来最大的军事胜利之后,放弃征服华沙公国,同时放弃参与瓜分波兰得到的全部果实,很明显也是不切实际的。与此同时,拿破仑在东欧的行动已经将波兰的民族复兴渴望提升到如此程度,如果不对波兰做出些许让步,将很难恢复这个区域的稳定。在调解者中,正是亚历山大沙皇最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通过拉拢忧心如焚的波兰人,俄国在西部的安全系数将会逐步增加。同样,一个在他的王权下拥护宪政的波兰,可以为他正考虑在俄罗斯帝国进行的改革提供小规模试点机会。但亚历山大坚持全权安排波兰的未来,这在会议上遭到别国的强烈反对,并引起外交争端。








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Metternich)和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都害怕俄国的权势以任何一种伪装扩展到中欧,都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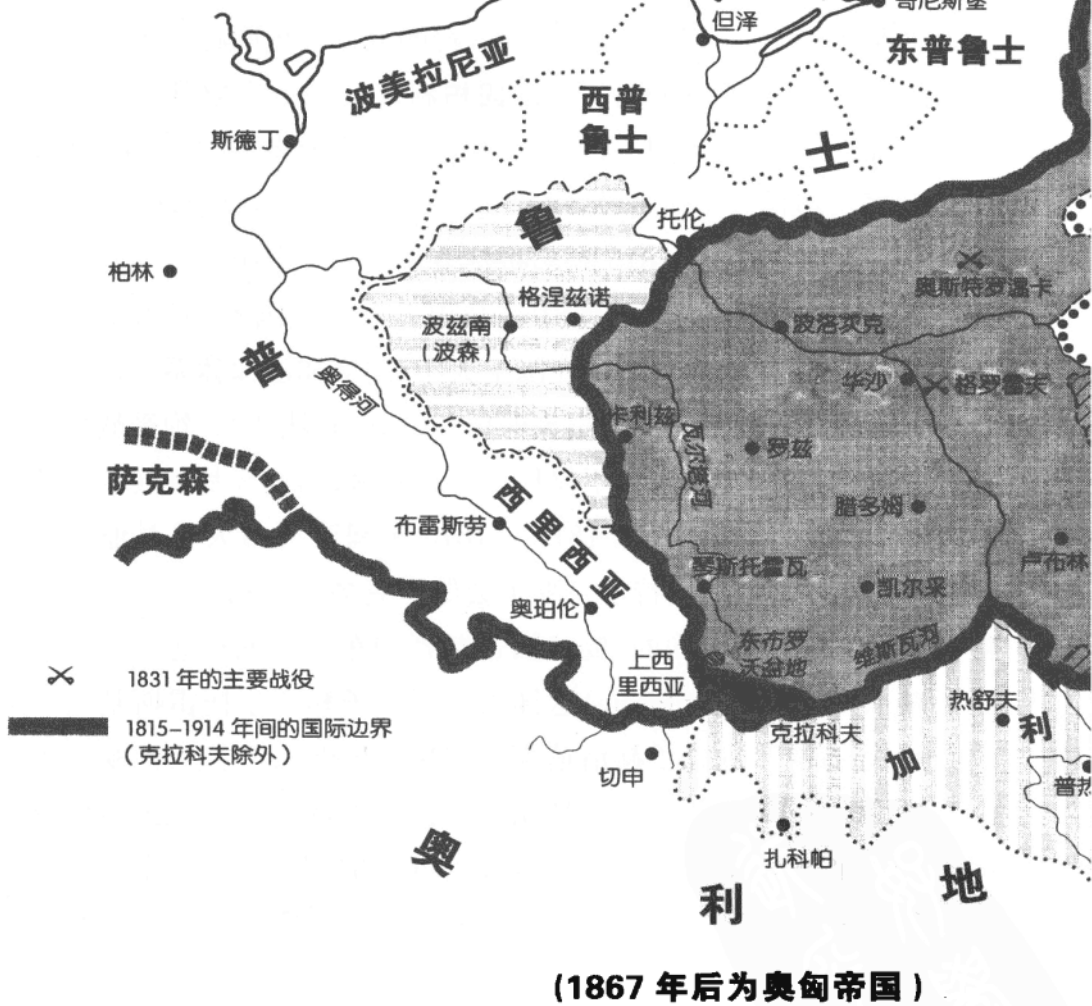
于赞成更简单的瓜分华沙公国的政策。但最终他们不得不接受亚历山大对波兰绝大多数的要求,尽管沙皇也不得不通过放弃他对波兹南、托伦和克拉科夫的权利要求作出妥协。结果这个比华沙公国还小 30% 的所谓“会议波兰王国”(Congress Kingdom of Poland)^①就这样诞生了。事实上,之前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在 1815 年后仍然是支离破碎地分为 6 个政治单位:奥地利保留“旧”加利西亚;各方争夺的克拉科夫城变为受三个东部瓜分国共同保护的克拉科夫共和国;普鲁士继续占有西普鲁士(最初在 1772 年获得),并得到波兹南尼亚作为半自治的波森公国(Posen Duchy);俄国获得的波兰土地同样由不同状况的两个地区组成,俄罗斯帝国的西部**固柏利**以及一个完整部分——如今新的自治的“会议波兰王国”。当时波兰的爱国者并没有意识到,与 1795 年国境很快就发生变动不同,这次确定的波兰边境线除了克拉科夫有少许变动之外,从 1815 年起将整整延续一个世纪。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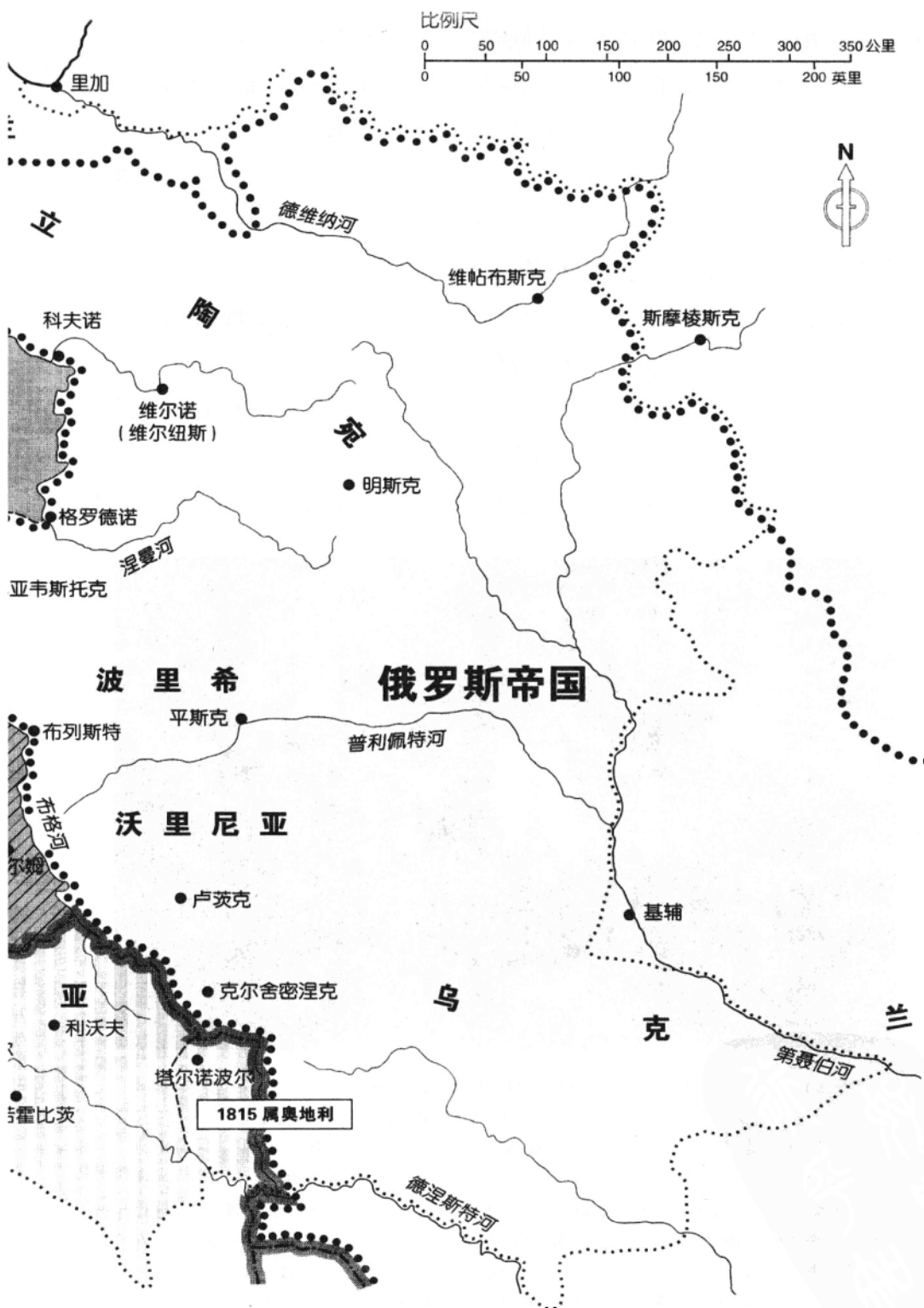
从拿破仑欧洲战场的废墟中拯救出一个波兰国家,亚历山大一世功不可没,然而他的波兰王国在国土大小、制度和法律体系上却大部分归功于拿破仑的创举。亚历山大保留了《拿破仑法典》。饱受战争折磨并对之厌烦的波兰领导者,不仅接受了新秩序,而且轻易就转变为新统治者麾下的权贵。确实,在 1814—1815 年间亚历山大曾对他们做出的种种许诺导致他们期待沙皇陛下会做出更多慷慨的表示:沙皇的独特礼物不仅保留新王国的《宪法》,还包括向东扩张的设想。像斯坦尼斯瓦夫·斯塔斯齐克(Staszic)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查尔托雷斯基这样的政治家,还有前激进分子赫洛迪斯基(Horodyski),都将俄国视为波兰民族利益的保卫者,并公开支持团结斯拉夫民族的观点。虽然仍存在诸多局限,但相较于 1795 年的条款,1815 年的解决方案有了显著的进步。在民族权利方面,受俄国支配的波兰贵族在 1815 年至 1830 年间

^① 国内学界多直接将这一王国称为“波兰王国”,但本书遵从其英文名,为强调其为维也纳会议各方博弈的产物,将其译为“会议波兰王国”。——编者注

-  1815年的会议波兰王国（1874年后为维斯瓦边区）
-  1815-1849年，波森公国（波兹南尼亚）
-  加利西亚（1846年后包括克拉科夫）
-  1815-1846年的克拉科夫自由市，之后被奥地利吞并
-  海乌姆因柏利，1912年从波兰王国分离出去，并入俄罗斯帝国
-  1771年，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
-  1791/1804-1917年，在俄罗斯帝国内的犹太定居点范围



地图 7 被瓜分的波兰(1815-1914)



的待遇比漫长的瓜分期中任何时候都好些。对拿破仑时期再多的浪漫主义怀旧也不能遮盖华沙公国的事实：在军事勒索下备受折磨，身处危险的拿破仑秩序不断下陷的流沙上。在 1815 年，众强国明确认可了前联邦共和国土地上波兰的民族性，并的确采取了若干措施给予制度上的表达，这些举措不仅针对亚历山大分得的波兰，而且也针对普鲁士的波森公国，甚至也包括奥地利的加利西亚（虽然水分比较大）。在许多地区，波兰语教育仍在继续，知识和文化生活也普遍出现繁荣。1815 年后的 15 年内同样见证了一些经济方面的发展。

在 1815 年时，沙皇亚历山大仍然是许多自由主义者和爱国人士的宠儿。11 月，他授予他的波兰王国在重建欧洲过程中出现的一部先进的、自由的《宪法》。波兰王国经选举产生的全国议会，广泛的投票权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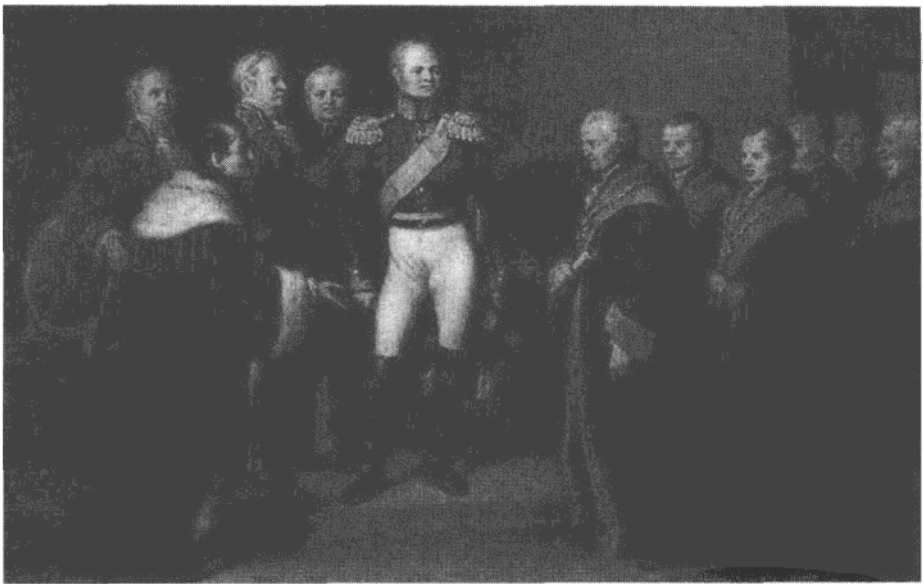


图 24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 1816 年建立的华沙大学，由一名不知名的画家(1850)创作。亚历山大一世将大学的创立宪章交与其第一任校长茨维科夫斯基(W. A. Szweykowski)。除了他的父亲沙皇保罗一世以外，亚历山大一世是近代唯一一位允许在俄罗斯帝国西部固柏利发展波兰语教育的俄国统治者，并在 1815 年后的波兰王国鼓励发展波兰语。1804 年，他捐献出 500 达克特帮助出版林德的波兰语辞典。华沙大学在 1831 年关闭，但在 1862—1869 年重新开放，从那之后它作为一个俄国机构一直运行到 1914 年。在华沙为亚历山大一世建立一座纪念碑的提议，于 1830 年 6 月在波兰全国议会通过，但却从未实施。

和公民权利,这些都与和它“永久”结盟的俄罗斯帝国的独裁统治呈现出鲜明的对比。然而新宪政制度的缺陷充分反映出亚历山大一世对“自由主义”的狭隘诠释:全国议会无权控制财政预算和军队(而它恰是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支出项),在19世纪20年代也极少召开会议。其他监督和控制沙俄的波兰王国的机构逐步建立起来。总督的职位给予顺从的前拿破仑时代的将军约瑟夫·扎容契克(Józef Zajaczek),而不是授予思想独立的查尔托雷斯基;以往信奉自由主义而如今愤世嫉俗的尼古拉·诺沃西尔采夫(Nikolai Novosiltsev),变成了沙皇逾越《宪法》的私人王国监督人,而亚历山大暴躁和残忍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则掌控着波兰军队和驻守在波兰王国的大量俄国武装。1819年引入预防性审查机构。同样令人失望的是,亚历山大吊足胃口但最终也没有履行之前将西固柏利归属于波兰王国的承诺,这是波兰上层集团与俄国保持联系的主要吸引力之一。与之相似,协议中提出的横贯波兰国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规定也证明是难以实现的;在俄国和波兰王国之间建立起关税壁垒,王国也不得不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高关税进行抗争。

152

1819年后,三个东部强权组成的所谓“神圣同盟”,将带有反动倾向的内外政策强加在各自的波兰大省身上。因此而导致的限制措施主要是政治上的,并不意图“瓦解”波兰人的“国家”。以20世纪的标准来看,这些措施确实是非常温和的。尽管如此,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他们对波兰的民族事业仍带有敌意。在波兰王国最大胆、公开表达不满情绪的是一个有魄力的自由派贵族小团体,由西部大省卡利什(Kalisz)的涅莫约夫斯基(Niemojowski)兄弟领导。他们保卫《宪法》的活动促使亚历山大在1820年警告波兰全国议会要反对“滥用”自由,并授予康斯坦丁可以采用任何方式维持波兰王国秩序的权力。直到1825年,全国议会才再次召开,会上发生的争论也未对公众公开。波兰王国的主教团及其在本土的保守派拥簇组织“祭坛和王位”都支持俄国的反动方针。残余的启蒙思想的代表人受到直接地攻击;1820年12月,反对教权者波托茨基教育大臣的职位被反启蒙主义者斯坦尼斯瓦夫·格拉博

夫斯基(Grabowski)所取代。反对秘密社团的法令导致共济会会员的集会遭到解散,亚历山大一世曾经在那里亲自鼓励促进社会文化发展和俄波调和的思想。现在同样成为非法组织的还有致力于发展教育和促进民族再统一事业的众多秘密爱国协会,它们自1817年起就在共济会形式的掩护下得以发展,吸收了很多拿破仑时代的老兵、年轻官员和大学生,其中许多人出身于贫穷的什拉赫塔。他们中的第一位烈士是爱国军官瓦莱里·乌卡辛斯基(Walery Łukasiński),他在1822年被捕,并最终在圣彼得堡附近某个要塞的地牢里度过了余下的44年光阴。不愿为俄国帝制的行政部门服务,加之面对国内有限的工作前景,大量在维尔诺的学生群体成为孕育早期浪漫主义思想尤为肥沃的土壤,但随之他们将面对的是愤怒的俄国当局。维尔诺“爱知社”(Philomats)的成员包括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他是以波兰语写作并最有前途的浪漫主义诗人),均被流放到俄国内地。1823年,诺沃西尔采夫取代查尔托雷斯基成为维尔诺学区的督学。他因为对学生残忍地审问而被称为“立陶宛的希律王”。

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最后几年,波兰大量舆论对“自由主义”的撤退抱有悲观态度。1825年,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将西部**固柏利**与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地区更进一步地结合,因此波兰王国在东部扩张的希望再次破灭,这让社会各界感到失望。1828年,俄国在华沙审判复兴的民族爱国协会的成员,因为他们与俄国的“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s)有联系,这进一步破坏了业已紧张的波俄关系。而当波兰参议院作为波兰王国最高审判机构,不仅不尽力谴责密谋者的民族再统一的思想,还宣判这些被告严重叛国罪名不成立时,沙皇尼古拉一世狂怒不已。只因俄国在1828—1829年间再次卷入新俄土战争,这才阻止残暴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推翻参议院的裁决,避免了一场严重宪政危机的发生。

为了安抚他的波兰臣民,1829年5月尼古拉一世在华沙出席了一次正式的加冕仪式,并将瓦尔纳的土耳其炮送给华沙(瓦尔纳是1444年以十字军名义出征的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雅盖洛的逝世之地),还

在1830年6月同意召开实际上已形同虚设的波兰全国议会。虽然如此,尼古拉一世发现君主立宪制完全不对他的口味;议会不得不客气地向他解释一个政府提案被否决(他们举的例子是废除世俗婚姻的提案)在议会体制下并非什么稀罕事,也不是对王权的有意冒犯。而康斯坦丁大公的品行在19世纪20年代末同样有了提高;他与他平民出身的波兰妻子在华沙过得越来越自在,甚至还支持波兰收复东部的热望。

头脑清醒的人士充分意识到,波兰王国需要的不是不负责任、哗众取宠的爱国主义者,克萨瓦里·卢贝茨基(Ksawery Lubecki)亲王尤其认识到,在圣彼得堡规定的苛刻自治限制下需要保持波兰政治稳定和经济巩固。他是维尔诺的前地方长官,并在1821年至1830年担任波兰王国积极而铁腕的财政大臣。他以严厉的赋税平衡波兰王国混乱的财政预算,开创了土地信贷协会和波兰银行,甚至还发起了一个小规模的国家鼓励工业发展计划。这个时期还见证了罗兹(Łódź)成长为波兰棉花工业的中心,而1822年与俄国缔结的优惠的关税条约为波兰王国制造业打开了广大的俄国市场。但这一时期农业仍然举步维艰,农民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他们也因此最敏锐地感受到了卢贝茨基施加的财政负担。授予农民租赁国家土地的权利几乎没有落实,更不用提落实到私人土地上。被地主逐出的农民只得到令人担忧的耕地面积,尽管也有人做出了好的表率:查尔托雷斯基在自己的康斯科沃拉(Końskowola)庄园引入慷慨的租赁条约,斯塔希茨(Staszic)则在赫鲁别舒夫附近建造了一个大型的农民合作社。波兰王国的无地农民数量到1827年时增长到80万人,农民的不满情绪开始集聚,给民族团结事业带来显著的破坏。同样,此时的波兰人也没有就提高波兰王国里30万犹太人的地位达成一致,他们继续被剥夺完整的公民权利。

另一个在1815年被授予广泛自治权的原属波兰地区就是克拉科夫小共和国,其得到一部自由主义贵族政治的《宪法》,同样也保留了拿破仑的法律体系。三个保护国于19世纪20年代出面干涉克拉科夫的自由主义运动,但是克拉科夫共和国并未因此覆灭,而是一直存活到

1846年。在这个共和国中,农民的地位在很多年里都是波兰史上最高的,与奥地利治下加利西亚的农民形成鲜明对比,选举权和租赁财产安全对鼓励乡村人口萌发政治和民族意识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一个自由贸易中心,克拉科夫同样从与西里西亚和波兰王国的商业来往中获益,并见证了其领土上的一些早期的工业活动;1817年第一台蒸汽机在这里出现,随后才开始在波兰广泛使用。

普鲁士的前波兰土地呈现出一幅更复杂的景象。与当代比利时的面积大致相等,波森公国在1815年其多民族人口总数几乎达到80万人,其中波兰人大约占2/3;在波兹南市,波兰和德意志元素大致相等。虽然普鲁士的《普通法》代替了《拿破仑法典》,但是波兰语仍被认为是行政、法庭、学校的主要语言;安东尼·拉奇维尔(Antoni Radziwiłł)亲王被指派为当地总督。波兹南尼亚的自治仍然受到限制,但是普鲁士当局充分地意识到波兰内部的张力,避免疏远波兰人,并且对违法的秘密组织爱国协会进行温和处理。在乡村财产权利方面,自1811年起在余下的普鲁士统治时期,普鲁士政府为波兹南尼亚带来了有序的土地改革运作;有地贵族保留绝大部分土地,但旨在打造有一定规模的富裕农民阶级的进程已开始启动。

不像在波兹南尼亚,西普鲁士(以前波兰的波美拉尼亚自1772年由柏林继续控制)没有对波兰的民族性在制度上或管理上做出重大意义的让步,此外还有但泽和托伦。在西普鲁士,讲波兰语的人[包括卡舒布语(kashubians)]与讲德语的人数量相等,但是城镇居民主要还是以讲德语为主,有地阶级也日益如此。1824年,东西普鲁士被合并成一个单独的省份,同时,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收回马尔博克(马林堡)的行为,有意表达了条顿骑士和德意志普鲁士的“概念”。在霍亨索伦国家东部的边城,语言、宗教地图更加复杂:东普鲁士的马祖里(Masurians)新教徒和许多上西里西亚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乡下人虽然都讲着波兰方言,然而他们的区域却从没有归属于波兰-立陶宛联邦。随着这个世纪慢慢过去,这两个族群都逐步形成了波兰民族意识,且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在这三个东部大国中,奥地利是维也纳会议后对波兰民族做出让步最少的国家。奥地利属加利西亚的面积相当于波兰王国领土的 $\frac{3}{5}$,人口数则几乎与之持平,为425万人(在1830年),一直由设在利沃夫的帝国总督和讲德语的官僚管辖。奥地利的法律继续实行,同时严格的审查机构与保皇派的教会阶层进一步巩固了政治现状。富有的地主控制着大量无能的省议会。大省不仅在经济上得不到完全发展,而且王室政府还在财政上对其进行剥削。只有当奥地利关注到1828年和1829年俄土战争中俄国的胜利后,这才促使维也纳做出一系列语言和文化的让步来拉拢加利西亚的贵族。尽管政府向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对加利西亚农奴来说,不管是西部信奉罗马天主教说波兰语的人,还是东部信奉东仪天主教说乌克兰语的人,他们的处境和地位都没有得到任何提高和改善。

侵犯波兰主权并逐步趋向一场不可避免的争斗,如果只把这些看做是从1815年到1830年间俄属波兰的发展将太过片面。尽管存在许多缺陷并且没有主权,一个以波兰王国为形式存在的波兰国家仍然相对稳定地运转了15年,是拿破仑的华沙公国存在时间的两倍。一些新古典主义风格、壮观的建筑物强化了华沙作为首都的地位,例如华沙大剧院和波兰银行,还有一些新建的宫殿、教堂、广场和大街。在1830年公之于众的托伦沃德森(Thordwaldsen)所塑的哥白尼雕像,提醒人们关注波兰对科学和全球文化的贡献。在这个时期,有三所波兰大学在运作:分别在维尔诺、华沙(1816年由亚历山大建立)和克拉科夫。华沙还有音乐学院(1821)、华沙工艺学院(1828)和其他一些专业职业培训中心。尽管在19世纪20年代各式各样的限制被强加在基础教育部门,但波兰王国和维尔诺学区的波兰语学校仍然保持着以东欧的标准来看令人印象深刻的水平。在文学和哲学思想领域,同样有许多跨越边界交汇产生的成果,尽管曾受到审查人员令人厌恶的干涉。

与此同时,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想和德国空想主义哲学影响而产生的思想潮流,鼓舞了波兰王国和西部**固柏利**较年轻的一代人去挑战旧波兰精英本质上理性主义的政治和民族价值观。密茨凯维奇在《青春



图 25 波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画像，瓦兰蒂·万科维奇(Walenty Wańkowicz, 1799—1842)在1828年所画。密茨凯维奇出生于立陶宛历史上著名的新格鲁多克(Nowogródek, 在今白俄罗斯的纳瓦胡鲁达),在维尔诺大学读书。密茨凯维奇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流亡,第一次在俄国而后是在法国。他的诗歌就像他对自由事业的毕生追求一样,深深地塑造了波兰的浪漫主义精神。他与其伙伴、浪漫主义诗人尤里什·斯沃茨基一起,紧挨着波兰的国王葬在了克拉科夫瓦韦尔大教堂。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他也同样作为国家诗人受到高度重视。密茨凯维奇的爱国主义情感(由他的史诗《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表达出来)指向先前使用多种语言的立陶宛大公国,但与1863—1864年后形成的狭义民族国家主义(不论是立陶宛人还是波兰人的)背道而驰。

颂》(*Ode to Youth*)中生动地展现出呼吁英勇之举以及挣脱一切束缚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在其诗剧《康纳德·沃利保德》(*Konrad Wallenrod*, 1828)中出现了更具颠覆性的转变。诗剧以中世纪立陶宛与条顿骑士的战争为背景,其中以爱国主义名义进行欺骗被证明是正当的。民族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它渴盼自身能够成为现实并不断得到完善,这种浪漫主义观念得到了激进文学批评家马乌雷采·莫赫纳茨基(Maurycy Mochnacki)的大力提倡。民主主义思想也由华沙大学受欢迎的历史学讲师约希姆·列列维尔进行广泛传播,他之前因激进主义而在1824年被逐出维尔诺。拿破仑军队的光荣神话和浪漫民族主义的出现,使波兰再统一的愿望与1815年后受到重重束缚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让人痛苦。思想上的波动很快将付诸行动。

1830年11月29日,一个由一些年轻官员组成的密谋团体,被波兰独立的浪漫主义梦想点燃,并受到当年西欧政治剧变的启发,发起了一场反对俄国统治的武装起义。这是一场莽撞、不成熟的起义。企图谋杀康斯坦丁大公的计划失败,只有少数部队加入到起义队伍中。然而,他们占领了军火库,并将3万支步枪分发到市民手中,这使局势发生了转变。华沙所有身居高位的波兰人都在谴责这次起义,卢贝茨基和查尔托雷斯基这两个政治气质完全不同的人,现在一起行动来拯救波兰1815年的有限所得,甚至催促康斯坦丁使用武力镇压起义者。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康斯坦丁拒绝了他们的提议,把恢复秩序的任务留给了波兰当局。当局不顾一切地想要避免与尼古拉一世关系破裂并扑灭起义的火焰,于是吸收了受尊重的查尔托雷斯基和受欢迎的拿破仑时代的老将军约瑟夫·赫沃皮茨基(Józef Chłopicki)加入。与之相对的是由激进分子列列维尔和热烈的雄辩家莫赫纳茨基领导的一个新爱国协会,致力于扩大起义的范围。华沙的情形已经失控,同时在城市外围有更多的组织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政府的进一步改组以及康斯坦丁的离去都未能使华沙恢复社会秩序,政府迫切感到有必要召集全国议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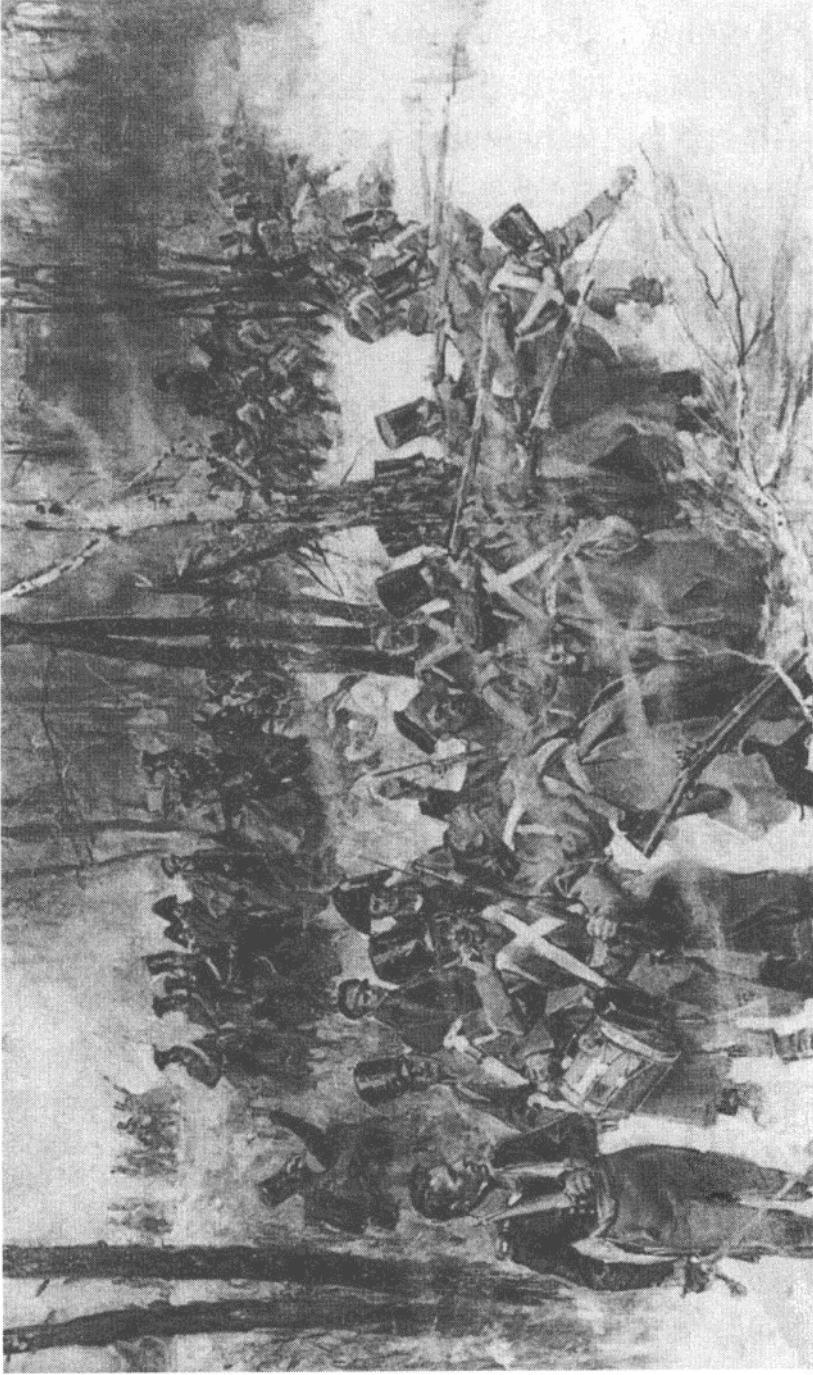


图 26 1831 年 2 月 25 日的格罗霍夫战役。1887 年由沃伊塞克·科萨克(Wojciech Kossak, 1856—1942)绘制，于 1928 年修改完成。它描绘了行进中的波兰第四军团。波兰总指挥是赫沃皮茨基将军，可以看到他坐在马背上，穿着便服。俄国一方观战的是康斯坦丁大公，他曾经在 1815—1830 年间以残酷的军规管制波兰军队。他露出了有些不合常理的愉悦表情，不过这也有几分道理，因为“他”的士兵们表现出色。

任何对于全国议会能抑制公众主张的希望都以破灭告终；受爱国主义浪潮的推动，议会认可将起义看做“一次民族行动”，并在12月20日指派不情愿的赫沃皮茨基担任“独裁者”。矛盾的是，赫沃皮茨基憎恨一切无秩序状态，并急于和沙皇达成和解，但是尼古拉一世拒绝与之协商或者做出可以平息波兰舆论的让步。12月17日，他向反政府政治犯提出特赦条件，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赫沃皮茨基无法满足尼古拉一世的所有要求，也不愿意镇压起义，于是在1831年1月18日辞去职务。当下几乎无法阻止与尼古拉一世不可避免的决裂。1月25日，全国议会在经过两个月的犹豫不决之后，通过一项决议，宣布脱离俄国独立。通过这个法案，议会合法地与俄国断绝了关系，并公然反对裁定议会波兰王国与俄国结盟的《维也纳条约》。波兰人宣称，由于沙皇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对宪政的侵害，因此波兰脱离其统治是正当之举。但这在本质上是

有瑕疵的。

接下来发生的是一场国内斗争，争论焦点是起义的性质、方法和目的。为了防止爱国协会里的极端爱国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夺取政权，像查尔托雷斯基这样的温和保守派感到他们除了掌握起义的领导权外别无他法。1月30日，全国议会选举出5人组成民族政府，列列维尔也名列其中，但是由查尔托雷斯基主持，他还对外交政策承担特别责任。不仅如此，在2月8日，议会宣告波兰将会维持世袭的君主立宪政体，而且只有现存议会拥有权力选举出新的国王。激进分子想要发动一场反抗俄国的“人民战争”，而温和派领导人则希望通过一次成功的军事运动来强迫尼古拉一世和众强国修改《维也纳条约》中涉及波兰的条款。查尔托雷斯基甚至愿意与俄国秘密地保持宽松的臣属关系。他急切地想要安抚欧洲各政权，特别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他想要让它们放心，波兰革命是民族的革命，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波兰王国的独立，决不会颠覆整个社会。然而事态的发展逐步拓展了波兰战争的目的。起义蔓延到俄国的西固柏利地区，这迫使全国议会再次做出挑衅《维也纳条约》的举动。1831年5月通过了一个议案，将这片广大的地区合并到波兰。尼古拉一世已经下定决心要减少波兰王国的自治权，而应允波兰人的

全部领土要求就相当于将俄国踢出强国之列。如今,波兰人除了与俄国作战并赢得战争外别无选择。

人数已经达到 8 万并且训练有素的波兰军队,在战斗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在 2 月 25 日的格罗霍夫(Grochów)战役中,赫沃皮茨基阻止了俄国向华沙的推进,这是在滑铁卢和克里米亚战争之间欧洲最大的陆地战争。春天,波兰接二连三的胜利向圣彼得堡发出了警告,但是 5 月 26 日优柔寡断的斯科日纳茨基(Skrzynecki)将军在奥斯特罗温卡(Ostrołęka)的战败使战争的天平倾向对波兰人不利的一面。由经验丰富的帕斯凯维奇(Paskevich)指挥的俄国军队跨越接近普鲁士边界的维斯图拉河从西部逼近华沙。战败的前景导致 8 月中旬华沙出现街头骚乱,并致使民族政府内的相互指责和攻讦。查尔托雷斯基建议波兰人应该寻求奥地利的保护激怒了列列维尔和激进分子,他们当时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平等主义的共和国。政府集体辞职,权力最终完全授给了杨·科鲁克维耶茨基(Jan Krukowiecki)将军一人。他恢复了社会秩序。但是这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意识到 1792 年塔尔果维策卖国联盟的可耻蓄谋行径,波兰文官和军队领导阶层拒绝向沙皇投降而选择流亡。

162 俄国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的波兰王国在资源上具有明显差异,这注定将最终体现在战争的结果上,然而波兰这边也存在一些具体的失误。在起义的初期阶段,波兰人缺乏政治统一,一些起义的领导者对他们是否能获得成功保持怀疑,200 人的议会保留了对战争行动的有效控制,并剥夺了民族政府的真正权力。总而言之,与帕斯凯维奇元帅相比,波兰的最高指挥部显得主动性不足。同样,起义还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当局没有设法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甚至一个可以保证波兰王国土地上的农民可以购买他们自己拥有的地产的最适度政府法案也在 4 月遭到全国议会否决。由于过于尊重保持欧洲社会秩序的需要,波兰的领导阶层没有赢得任何来自国际上的有效援助。其实在英国和德国,特别是在法国的公众中,对波兰事业的热情十分普遍。1831 年 3 月由卡齐米日·戴拉威尼(Casimir Delavigne)作词的热情洋溢的《华沙

曲》(*La Varsovienne*)在巴黎唱响,欧贝尔(d'Auber)为其配上了悲壮的音乐。这首歌很快翻译成波兰文,并成为波兰爱国歌曲中的保留曲目。在德国许多地区,到处回荡着赞扬英勇的波兰人的歌曲(所谓的**波兰歌曲**,"*Polenlieder*")。然而这些都无法打动他们的政府去采取行动。柏林和维也纳的内阁虽然保持中立,但是本质上是带有敌意的,而英国和法国为尖锐的国内问题忙得团团转,彼此之间还在比利时问题上争执不休。

波兰人战败的代价是惨重的;不仅建立一个独立的大波兰的希望化为泡影,而且就连1815年有限的所得也失去了。尼古拉一世通过保留波兰王国作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和法律单位,在形式上尊重了《维也纳条约》,但是他废除了《宪法》、全国议会和波兰军队。华沙大学遭到查封。最初的密谋起义者、全国议会和民族政府的所有成员以及所有流亡者全部被排除在大赦之外。帕斯凯维奇,新设立的“华沙亲王”,相当于全权总督,握有一支派驻的常设军队。1833年,战时管制引入并建立了一所巨大的监狱,试图威慑这座难以控制的城市。

波兰王国地位的终结鼓励普鲁士和奥地利废除一些他们曾向波兰民族做出的让步。在1833—1834年间,三个瓜分国互相担保他们各自的波兰财产,并致力于镇压所有起义运动。“神圣同盟”又开始运转,甚至连教皇也因致力于维护国际秩序而谴责了起义。西部固柏利的起义者不得不忍受俄国帝制下的艰辛劳动、奴役状态和财产损失。维尔诺大学(除了医学和神学系)和整个波兰语教学网络的关闭,对波兰文化发展无疑是一次悲剧性的打击,然而这仅仅是地区日益俄国化的开端。

随着1831年起义的瓦解,大约有1万波兰人踏上了流亡之旅,其中包括大部分波兰王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精英。他们大多数流亡到西方,主要是法国。客居他乡期间,他们向接纳了他们的主人们大力宣扬沙皇暴政下的英勇受害者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波兰形象,并对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产生恐俄症贡献良多。在西方,流亡者还可以自由地反思他们失败的原因,并就将来拯救他们的国家讨论各种计划。

的确,此后的15年见证了“大移民”(Great Emigration)期间浪漫文学创作和政治社会思想的大繁盛,这些对波兰的民族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亚当·密茨凯维奇是流亡人群中最伟大的吟游诗人。在他的《波兰民族和波兰朝圣之书》(*Books of the Polish Nation and Polish Pilgrimage*, 1832)中,他号召流亡者(“波兰民族的灵魂”)准备好开始“一场为人民自由而战的全球战争”,并表达出他将波兰作为“民族耶稣”的救世主形象,波兰的复苏将带来全人类的宗教重建。1840年到1844年,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做演讲时,密茨凯维奇展开他对欧洲现存秩序的颠覆性攻击,不可避免地为自己招来法国当局的责骂。诗人尤里什·斯沃瓦茨基(Juliusz Słowacki)将民族视为精神范畴,应该由具革命性的精神精英来领导。保守派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Zygmunt Krasinski)一方面认可民族自主的理念,另一方面受到密茨凯维奇和斯沃瓦茨基所倡导的人民主权国家主张的影响,他在《非神曲》(*Undivine Comedy*, 1835)中展现了一种启示录式的预见:旧的社会秩序将被“饥饿和贫穷者”摧毁。而密茨凯维奇的“革命末世论”受到齐普利安·诺维德(Cyprian Norwid)的攻击。诺维德是浪漫主义时期最后一位伟大的哲理诗人,他对将爱国精神提升为一种“无正当基础的宗教”的危险行为发出了警告。

把所有诗人和流亡者在情感上团结起来的是弗里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的音乐:从雄壮有力的“革命性的”练习曲《C小调钢琴练习曲》(在这首乐曲中,作曲家表达了当他听到1831年9月华沙沦陷的消息时的忧愤之情),到表达对远方家乡的怀念之情的《玛祖卡舞曲》和《克拉科夫舞曲》。比起书写的文字,音乐能抒发更多的感情,肖邦的乐曲保留了最纯洁、最普遍的可以理解的波兰浪漫主义感情。肖邦的非凡之处在于他虽然虚弱多病,而且从没有为民族事业举起一把剑或是一杆枪,但是他直至今日仍然被视为一位神圣的民族偶像。

在华沙起义期间就已爆发的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到了大流亡时代,因人们相互攻讦、指责而愈演愈烈。在众多流亡者团体中,

声望最高的是由查尔托雷斯基亲王在巴黎领导的团体,他支持以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选民作为基础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国家,这吸引了一些温和的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政治家,查尔托雷斯基培养了一些与英国、法国的非官方联系,并且在整个欧洲建立了广泛的联络点。起先他全力维护1815年的若干条约中规定的波兰的有限权利,以合法的立场,从战术上赢得国际支持。但是此举遭到许多更大胆的流亡同胞的谴责。查尔托雷斯基明智地指出,要使波兰民族起义获得成果,必须达到两个条件:其一,必须和俄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某场主要的欧洲战争结合起来;其二,必须拥有广泛的农民支持,但是只有贵族自愿地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实现这一条件。很显然,他们已经吸取了1831年的惨痛教训,但这并没有使他们离取得自主权的目标更近。1840年,查尔托雷斯基采取了一项更独立自主的政策,就是通过他的联络人去削弱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以此促进民族事业普遍发展。他还劝说罗马教廷改变最初对波兰民族主义的消极态度。

165

尽管他坚持不懈地捍卫波兰的民族大业,但绝大多数的流亡者都放弃了实行贵族政治的查尔托雷斯基,而转去寻求更激进的、即使同样无疾而终的解决方案。查尔托雷斯基认为,什拉赫塔的传统应该成为波兰民族价值的本质组成部分,而列列维尔则从其拟构出的前基督教时期波兰原始斯拉夫人公社的浪漫历史中,为他的集体主义民主政治找到理论上的支持。与他在爱国协会的同仁一道,列列维尔将希望寄托在烧炭党(Carbonari)人早日推翻大陆的独裁政权上;他参加了“青年欧洲”(Young Europe),这是一个由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领导的国际革命共和主义兄弟组织。列列维尔的使者努力在俄占波兰重新点燃起义的火焰,此举不仅遭遇失败,而且还激发沙皇当局更进一步地削弱波兰和天主教在西部固柏利的影响。1839年,希腊天主教会带着其200万绝大多数说白俄罗斯语的信徒正式被吸纳到俄国的东正教会。1840年,《立陶宛法典》作为与旧波兰-立陶宛联邦制度上相联系的最后遗存,也被俄国的法律替代,并且西南部(乌克兰

的)固柏利总督比比科夫(Bibikov)积极执行一项政策,把下层什拉赫塔的法律地位降低为“单居所农民”。

当 19 世纪 30 年代末列列维尔的“青年波兰”的秘密工作最终落败,其作为查尔托雷斯基主要左翼对手的地位被 1832 年在巴黎成立的更大也更加现实主义的“波兰民主协会”(Polish Democratic Society)所替代。波兰民主协会提倡免除所有的社会特权,号召在一个公民平等的现代民主国家内应当包容所有的社会团体。在经历一番激烈的内部争论后,大多数民主党人认识到,什拉赫塔与其传统的政治和个人自由,对于恢复独立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他们坚持农民必须享有完全财产权,并不需要支付任何赔偿金。1840 年后,波兰民主协会由设在凡尔赛的五人指导小组领导;其中最突出的战略家是维克托·海尔特曼(Wiktor Heltman),他早在 1817 年就参与了学生密谋起义。民主协会起初批评什拉赫塔但最终与之和解,并接受了以私人财产作为社会基础的原则。但其分裂出来的一个团体——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的、由流亡的未正式委任过的官员和士兵组成的“波兰人民公社”(Commune of the Polish People)并不赞同以上立场。他们折衷地吸收法国所有流派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并受到列列维尔原始斯拉夫人公社主义理论的启发,提倡推翻贵族,引进集体土地所有制,并拒绝西方的工业化进程。民粹主义者被绝大多数流亡者所孤立,同时又因为内部争斗削弱了自身力量,他们很快了解到农业社会主义在波兰是多么难以取得进展。

在 19 世纪 40 年代,非常明显,所有积极的流亡团体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一点:在民族斗争事业中吸纳农民是起义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担心各瓜分国政府会改善农民的命运并因此剥夺农民参加民族解放事业的实质性动机,吸纳农民就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与此同时,需要谨记的是,波兰的激进分子和民主党人将来会看到,在西固柏利说立陶宛语、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的农奴都会成为一个民主波兰国家的平等公民,这个国家将包括曾经在 1772 年建立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所有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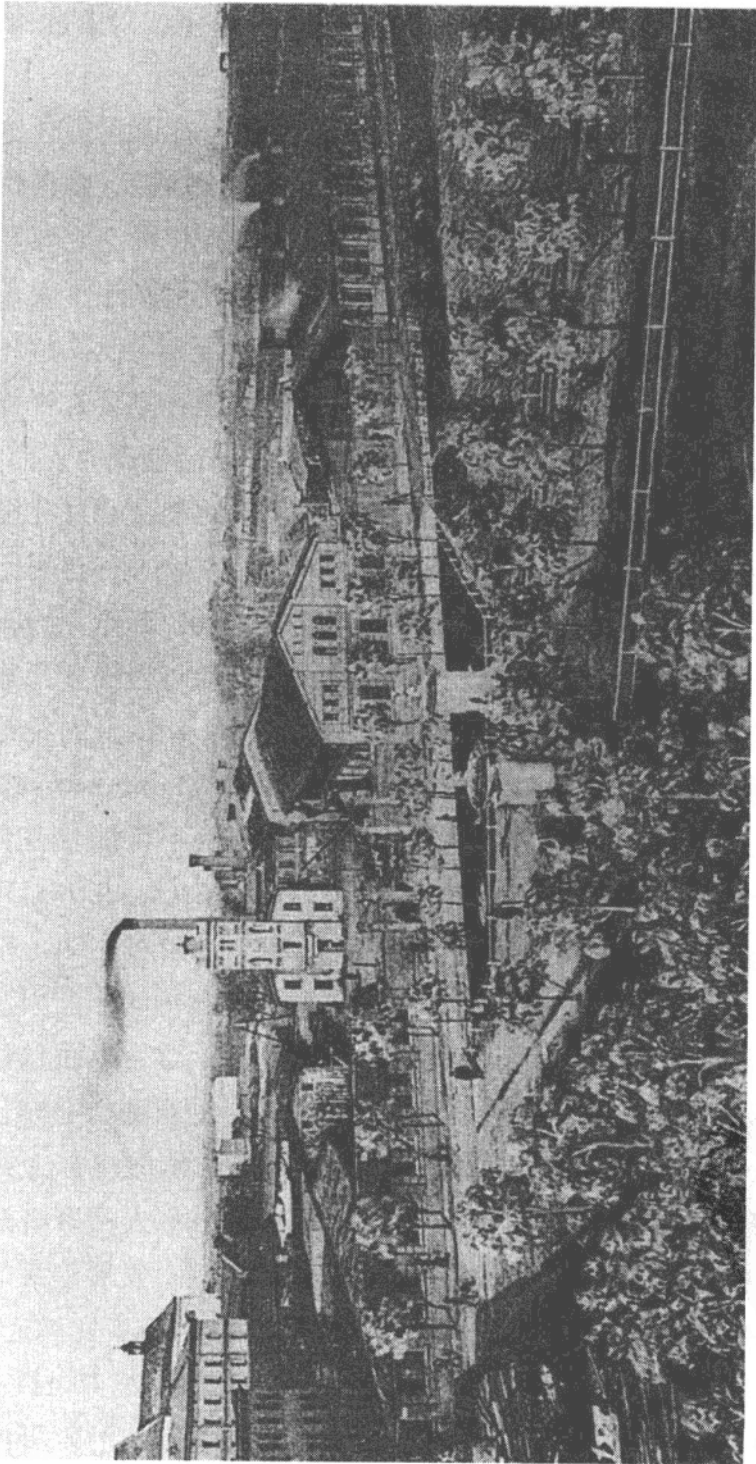


图 27 “有机工作”正在进行：波兹南的采盖尔斯基工厂由工业家希波利特·采盖尔斯基(Hipolit Cegielski, 1813 - 1868)于 1855 年建立。工厂制造农业工具和机械,并在波兹南的波兰农场的农业现代化做出了贡献。采盖尔斯基也帮助创立了一份波兰语报刊,并在普鲁士统治下促进波兰文化生活的代表。1849 年,他成为普鲁士议会的代表。照片摄于 1883 年。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要把波兰在东部的领土要求和独立事业视为一体。在这个种族、宗教越来越对抗化的复杂社会现实中,这样乐观的想象还有多少路要走,仍然有待观察。

168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一位流亡在外的波兰的有识之士在这个时期仍留在欧洲或是继续直接地参与到政治中。伊格纳采·多梅伊科(Ignacy Domeyko)是一名地质学家和铁路建造师,他对哥伦比亚和智利的经济和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保罗·埃蒙特·斯特什莱茨基(Paul Edmund Strzelecki)成为澳大利亚一名先锋探险家,他以柯希秋什科之后命名了澳大利亚的最高峰。对于那些并不是必须要选择流亡的受过教育的波兰人,以及那些避开政治煽动或者革命密谋的人而言,在由瓜分国政府制定的限制内,仍保留了一些合法的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机会。相比之下,在波兹南,在19世纪40年代,进行所有有利于社会条件改善的工作[在波兰语中被称为“有机工作”(praca organiczna)]的政治和物质条件都是最优惠的。在抱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统治下,普鲁士的统治变得成熟,也给慈善家卡罗尔·马尔钦科夫斯基(Karol Marcinkowski)在教育、商业和工艺领域开展各式各样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可能。著名的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切兹科夫斯基(August Cieszkowski)为“有机工作”提供了理念框架,他崇尚现代科学和中产阶级文明。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则提高了波兹南贵族田庄和农民农场的生产力。从西部然后再到波兰中部,土豆种植的普及使农民的主食:黑面包和蔬菜(特别是遍及四处的卷心菜)之外又增加了一种广受欢迎的补充营养源。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波兰王国,工业和商业继续取得惊人的进展,特别是纺织业和铁路建筑业;华沙-维也纳铁路由私人投资者资助建造,于1848年完工。王国内许多富裕的地主认识到对发展迟缓的乡村经济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必要性;以货币代役、交租制逐步发展起来,王国甚至引入了普鲁士模式的土地改革。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40年代早期和中期,波兰民族歌剧的创造者斯塔尼斯瓦夫·莫纽什科(Stanisław Moniuszko)正是在俄占维尔诺撰写并监制了他的部分最

早期作品。然而在加利西亚,落后的社会状况,以及缺乏具有奉献精神
的行动派对开展“有机工作”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与经济逐步发展、财富创造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背景相反的是,流亡
者和革命者的苦心筹划有时似乎只是他们的同胞们日常生活和关注点
中的一个边缘因素。虽然他们满怀热诚,但众多为波兰民族和自由而
战的运动在 1840 年无疑已经遭到失败,有利于波兰独立的契机也没有
出现:既没有发生欧洲大战,也没有欧洲人民大起义。然而这并没有
阻止更多挑战波兰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尝试:查尔托雷斯基继续着他的
宣传,而流亡的波兰民主协会也开始着手重建在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
跨越波兰的地下网络。虽然民主协会的计划与更先进的波兹南有潜在
关联,但在俄国和奥地利的波兰土地上发展现代民主主义理念的土壤
还不够肥沃。然而也正是在那里,新一代缺乏耐心的激进分子开始着
手工作。亨利克·卡敏斯基(Henryk Kamieński)及其表弟爱德华·邓
博夫斯基(Edward Dembowski),两位贵族“忏悔者”,他们认为进行一
场农民革命和“人民战争”才是应对波兰民族和社会困境的唯一解决办
法。邓博夫斯基打扮成农民的样子,试图在加利西亚的村庄鼓吹他的
革命信仰,但他最终发现,他的倾听者大多数人只对财产权感兴趣而不
是乡村社会主义。他充分认识到有必要去适当修改他的信息,但是在
民主协会领导者中对他采取行动的呼吁给出了回应。民主协会得到兴
起于 1844 年、由彼得·什切根尼(Piotr Ściegienny)领导的民粹主义计
划的鼓励,什切根尼是卢布林省的一名怀有革命思想的教区神父。

波兰王国和加利西亚村庄里长期持续的不满声音,被民主主义者
认为是为民族事业开道的革命即将爆发的迹象。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浪
费,凡尔赛的民主协会领导小组为 1846 年横贯波兰的一次民族起义调
整了计划。他们设想,瓜分国的武装将被庞大的农民军队击溃,站在军
队最前面指挥的则是 32 岁的流亡者路德维克·梅洛斯瓦夫斯基
(Ludwik Mierosławski),民主主义者认识到,他是一位其战略才能还
没有得到证明的杰出天才。甚至查尔托雷斯基在不能阻止革命运动的
情况下,为了防止发生一场互相残杀的阶级战争,他催促贵族参与其

中。但是民主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在农民中的煽动不亚于是在玩火；他们没能清楚认识到波兰广大的乡村地区存在着的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分化，这种无知很快以一种恐怖和悲惨的方式得到验证。

170 在梅洛斯瓦夫斯基及其同伴对波兹南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就已经有人向普鲁士警察告密；俄国人也极其快速地击溃了王国内的密谋。在克拉科夫共和国，条件更加有利，那里自由和有财产的农民集结起来支持在 1846 年 2 月成立的民主革命政府。查尔托雷斯基亲王出于团结爱国者的目的也承认了这个政府。然而在加利西亚西部地区，起义者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与半农奴们对压迫者的阶级仇恨之间有落差，这最终造成了一场灾难。说波兰语的天主教农民转而与起义者及其自由主义贵族支持者为敌，大肆屠杀和毁坏。邓博夫斯基参加了克拉科夫起义，当 2 月 27 日他领导一支非武装宗教队伍从克拉科夫出发，准备孤注一掷去争取加利西亚农民时，惨遭奥地利人杀害。奥地利政府利用农民的愤怒来镇压起义，然后强迫农民回到他们的村庄继续完成封建义务。克拉科夫共和国，波兰最后一个自由岛屿，被奥地利在得到俄国和普鲁士同意后不顾英国和法国的反对地吞并。民族和社会团结的梦想在加利西亚发生扎克雷(Jacquerie)事件后全部灰飞烟灭。当局一举扫荡起义的残余力量，许多地主因此得出结论：他们将不得不向政府寻求保护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同时沙皇尼古拉一世在 1846 年和 1848 年迅速采取行动，以降低他的波兰土地上农民爆发起义的危险，并削弱波兰贵族在那里的影响；他在波兰王国确保农民租约的稳定性，而在西固柏利给地主对农奴的剥削设置了一些严格的限制。

正如 1846 年起义暴露了“人民战争”的完全不现实性，在 1848 年和 1849 年席卷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革命浪潮中，各国的民族主义之间大动干戈的事实也使民族国家相互友爱的理想触礁。尼古拉一世加紧了高压控制，俄占波兰在 1848—1849 年间阴沉地保持平静。然而在其他地方，许多流亡在外或身居国内的波兰爱国者受革命浪潮的鼓动而立即行动起来，因为这股浪潮似乎预示着普鲁士和奥地利专制主

义要垮台,以及对他们的国家施加制裁的国际秩序将崩溃。密茨凯维奇全身心地投入到意大利和法国的国际主义革命事业之中。梅洛斯基从柏林的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后,就开始着手在波兹南组织一支波兰军队和行政部门,诗人斯沃瓦茨基也来到波兹南施与鼓励。得到法兰西共和国支持反对俄国,在自由主义的普鲁士新政府与波兰人之间组成联盟的诱人前景证明是短暂的幻想。最终柏林并不愿意超出波兹南的分界进入到两个种族区域,并且当波兰人对此表示拒绝时,普鲁士军队在1848年4月和5月恢复了全部控制。法兰克福的德国前议会在3月对波兰独立给予的最初支持,在7月由于有关德国未来东部边界的激烈争论而消失殆尽。仅有少数激进分子仍然忠实于德国与波兰团结友好的愿望。5月15日在巴黎,成千上万的工人呼喊“波兰万岁!”,冲入国民大会。拉马丁(Lamartine)感人地说为了波兰的利益,但是法国不敢冒险为波兰的自由发动一场大战。

对1846年的悲剧的记忆在加利西亚人的心中依然历历在目,当地波兰人对1848年3月“维也纳革命”的回应最初是谨慎的,局限于为大省自治请愿。在克拉科夫(由于民主协会,其力量得到加强)和利沃夫的波兰民族委员会都尝试争取农民参加到民族解放事业中来,他们号召有地贵族在复活节自愿地废除劳役制。但是他们均因奥地利派驻的总督斯塔迪奥恩(Stadion)先发制人而陷入被动。斯塔迪奥恩先是以皇帝的名义在复活节宣布终止劳役制,然后对克拉科夫发起轰炸,直到起义者在4月26日投降。1848年5月,从维也纳开始的民族主义起义蔓延到意大利和匈牙利,这些都鼓舞着波兰人再次恢复信心,重新集结起来。这次组建起一支拥有2万人的强大国民自卫队;甚至有人说加利西亚将成为类似皮德蒙特高原(Piedmont)的地区,从这个独立的波兰中心开始,将会陆续解放余下的波兰。

然而此时东加利西亚新兴的乌克兰民族运动与波兰民族解放事业产生了冲突,这些人主要关注东仪天主教会,他们要求哈布斯堡皇室的保护,反对波兰人并主张加利西亚依照民族分布线分割。1848年的夏

172 秋,皇室权威表现出相当可观的恢复力:他们利用各民族的矛盾,并发现从劳役制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农民,对贵族和知识阶层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有限。大省接二连三地失守于皇帝的武装力量下,最终匈牙利人在11月收回对加利西亚的全部控制。大约4000名波兰斗士跨越喀尔巴阡山成功地逃脱,并加入到仍然在抵抗哈布斯堡的匈牙利人的行列。曾在1831年对战俄国的老兵,波兰的约瑟夫·贝姆(Józef Bem)将军和亨里克·邓姆宾斯基(Henryk Dembiński)将军被任命为军队的高层指挥;贝姆则最终受命为匈牙利军队的全权统领。在这个关键时刻,哈布斯堡转而向圣彼得堡寻求帮助。怀着对于中欧正在觉醒的民族意识,以及任何激发那些不领情的波兰市民希望的行动无法和解的敌意,1849年5月,沙皇尼古拉一世欣然派遣1831年“华沙之战”的胜利者帕斯凯维奇领导俄国的远征军。不到三个月,匈牙利人被击垮。成千上万的包括波兰人在内的流亡者都不得不逃往奥斯曼帝国境内。

波兰对1848—1849年间在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起义以及解放战争的贡献,身体力行地彰显了波兰爱国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口号“为了你们和我们的自由”(For your freedom and ours),但是波兰和其他地区出现的民族敌对状态,也暴露出欧洲各国兄弟友爱的浪漫主义理想不切实际。从长远来看,1848—1849年间的事件最终对加强波兰民族意识的确做出了一定贡献。在短暂的革命时期,在普占和奥占波兰两地,挣脱了束缚的新闻业和舆论兴起。翻身的波兹南农民自发成为民族事业极为有效的新生力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增强了这个区域内坚定的波兰民族主义。甚至在西里西亚,1848—1849年间的社会剧变再度唤醒了说波兰语的农民对母语的感情。由于同样的原因,加利西亚农奴制的结束将开启让说波兰语的农民合并到一个更广泛的波兰社区的漫长进程。而在大省的东部地区,乌克兰人的民族感情开始被唤醒。

173 另一方面,1848—1849年间波兰各个分离部分截然不同的状况,只是强调了他们之间已经明确的地方性差异。瓜分的边境线似乎一如

既往地那样坚定。流亡者的影响不可避免地直线下降；许多受过教育的波兰人如今在波兰不满由流亡者来指导民族的命运。随后几年，非革命方式的鼓吹者在普鲁士和奥地利部分地区取得有利地位。保守的波兰代表参加了1851年成立的普鲁士议会，而1850年在加利西亚任命的一名波兰总督阿吉诺·戈乌霍夫斯基伯爵(Agenor Gołuchowski)则鼓励加利西亚贵族效忠于哈布斯堡。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法国和土耳其挑战了俄国对巴尔干半岛的野心。这场战争最初看起来像是上帝对沮丧的波兰流亡者冗长祈祷的回答，流亡者迅速召集多种武装部队反抗俄国。密茨凯维奇作为波兰浪漫主义反抗的具体代表，亲自到君士坦丁堡试图协助军事行动，不料竟染上霍乱病倒了。然而，通过同意1855年的和平诉求，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成功地化解了英国和法国的威胁，使冲突不致扩大到将波兰问题囊括在内。于是在1856年巴黎和平会议的日程中，波兰问题被排除在外。

但与此同时，在克里米亚战争遭遇惨败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发起的改革也不能忽视俄属波兰土地。对政治犯的特赦、募兵措施的延迟、华沙医学院的开办，以及任命和解派的哥尔查科夫(Gorchakov)亲王作为波兰王国的总督，这一切都预示着广受欢迎的政治解冻，同时还伴随着一个有力的经济成长时期。政策控制得以放松，公众活动限制也得到解除。1858年，波兰王国最大的地主安德烈·扎莫伊斯基伯爵(Andrzej Zamoyski)被允许组织农业协会。该协会吸引了那些旧有地主贵族以及新兴资产阶级地主，其中也包括犹太人。农业协会最初关心农业改革的迫切问题，后逐步发展为国内各种温和派意见争鸣的全国性论坛，成为全国议会的某种替代品。现代和平事业的进程同样也由华沙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和工业家列奥波特·克罗嫩贝格(Leopold Kronenberg)推动，他是皈依加尔文教的犹太人，与扎莫伊斯基关系密切。

在华沙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也可以听到号召组建有责任的当地政府以及进行更广泛的社会改革的声音，还包括解放犹太人和废除农民劳役制。对于沙皇当局来说，更多的威胁来自更年轻一代对激进主义

理念和波兰浪漫主义文学不断增长的接受力,在更自由的新环境下,这些理念变得更容易让人接触到。俄国官方允许讨论解放农民问题,以及1859年和1861年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相继统一,使波兰各地对变迁来临充满期待。梅洛斯瓦夫斯基在流亡中不知疲倦但仍不计后果地继续紧急号召尽早举行民族起义,通过在波兰王国提供给农民特别是西固柏利的农奴一项慷慨的土地政策,先发制人于沙皇,令其束手无策。

俄国当局面对1859—1860年间波兰王国内不断发生的动乱,发现自身处于以威权主义政权而从事自由主义改革时常遇到的尴尬处境;镇压起义只会助燃波兰的爱国主义情感,然而做出让步只会鼓励波兰人提出更多要求。华沙的游行变得越来越频繁。1860年10月,在一场沙皇亚历山大、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摄政王都出席的演出中,臭气弹在大剧院被释放。在教堂和街道上高声传唱的爱国主义歌曲也增强了普遍的民族感情。1861年初,事情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转变。作为对沙皇2月颁布“解放俄国农奴法令”的回应,华沙农业协会在2月26日正式号召向波兰王国的农民承租人授予全部的财产权。一连串的游行遭到粗暴镇压,并且在一次示威游行中俄国军队在人群中放火,烧死了5名示威者。沙皇一边注意改善与拿破仑三世的关系,一边对波兰王国做出文化和行政上的有限让步,但仍坚决镇压所有暴动,和一切政治独立运动。

175 3月27日,亚历山大·维吕波尔斯基(Aleksander Wielopolski)侯爵受命为华沙一个复兴宗教和教育事务部门的总管。维洛普斯基是一名保守的爱国者,曾经参与1831年的反俄起义,但是在1846年加利西亚“扎克雷惨剧”的冲击下,他认为应该与俄国协作。如今在1861年,他将自己视为一个上帝眷顾之人,相信自己可以恢复波兰王国部分失去的自治,同时牵制住波兰社会一切不安定和破坏性的因素。但不幸的是,他的策略意味着4月6日农业协会和“城市代表团”(City Delegation)的解散,这两个机构在城市中享有相当可观的道德权威性。4月8日,大量群众在城堡广场(Castle Square)聚集,对当局的举动



图 28 关闭教堂。阿尔多尔·格罗特盖(Artur Grottger, 1837 - 1867)于 1861 年绘制。华沙所有做礼拜的场所都被关闭,作为对俄国士兵在 1861 年 11 月 11 日逮捕了众多礼拜者的抗议。在 1863 年起义的预备阶段,爱国精神和宗教精神在俄占波兰形成了一次有力的联合。像他这一代许多波兰艺术家一样,格罗特盖的作品主要侧重于表现爱国主题,将起义作为他的主要创作内容,创作出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绘画作品。在回到克拉科夫之前,他曾经在维也纳学院学习绘画。这幅作品在弗罗茨瓦夫的国家博物馆(Muzeum Narodowe)一直留存至今。

表示抗议,表现出空前强大的爱国心和宗教感情;俄国军队在人群中纵火,100多人因此烧死时,当时出席集会的许多人仍然跪在地上祈祷。全国人民都被激怒了,他们不再信任与沙皇当局的合作,宣布进入全国默哀状态;华沙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都一直穿着黑衣表示哀悼。城市中许多犹太人受到他们首席拉比比尔·梅塞尔斯(Beer Meisels)的鼓动,也参加到抵抗运动中来。波兰众多城镇,甚至在西固柏利地区,大量群众参与到爱国宗教服务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乡间的大部分地区仍然置身于爱国主义悲痛之外,更倾向于反抗强制劳役,对此,亚历山大最终在10月以代役制(现金支付)替代了劳役制。

“大棒加胡萝卜”的威逼利诱政策仍在施行。1861年秋天,许诺已久的本地职权选举终于开始,只有2.5万人有资格参与投票。但是新总督兰伯特(Lambert)引进了戒严法并且禁止所有公民集会,其中一些集会已经成为具有高度象征性和煽动性的活动,例如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周年庆典,或者华沙受欢迎的大教主费加阔斯基(Fijałkowski)相当于王室级别的葬礼。11月11日,这一天是科希秋什科的阵亡纪念日,人群再次涌入华沙的众多教堂。这次俄国士兵闯进教堂并逮捕了成千上万名礼拜者。为了强烈抗议如此的亵渎,各宗教派别的权威人士均下令关闭城市中所有天主教和新教教堂,还有所有犹太教会堂。维吕波尔斯基辞去职务,前往圣彼得堡。

177

这一切都为激进的密谋团体谋得方便。他们现在以“红党”作为称号,已经做好起义的准备。他们在俄国帝制的军队中建立起与激进官员之间的联系,同时梅洛斯瓦夫斯基的部下受加里波第(Garibaldi)的允许在意大利受训后,也潜回了波兰王国。扎莫伊斯基、克罗嫩贝格和其他温和的“白党”领导人对这样的冒险主义仍然带有很大的敌意,并集中力量动员波兰和国外力量考虑和平扩张波兰民族主义权力。1862年年中的事件似乎有利于他们的事业。政府与天主教会的关系通过新任命的华沙大主教得到缓解,同时维洛普斯基正辞严而又合情合理的辩论,最终说服亚历山大二世恢复波兰王国已经失去的大部分自治权。沙皇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兄弟康斯坦丁被任命为总督,波兰王国

非军事的全部事宜都交与维洛普斯基领导的公民政府处理,维洛普斯基立刻着手进行一些急需的社会与教育改革。劳役制被强制性地替换成租金是迈出了前进的一步,尽管这并没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并没有填平贵族和农民之间的沟壑。犹太人最终得到了平等的法律权利。华沙大学和波兰的教育体系得到恢复。

然而,政治自由并没有得到任何扩展,维洛普斯基的不受欢迎对加强系列改革的客观吸引力毫无帮助。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由年轻的东布罗夫斯基领导的红党正在逐步完善他们的起义准备:在中央民族委员会的指挥下,一个地下政府的组织结构已经基本到位,也筹集起一支秘密的准军事武装,并且密谋暗杀总督和维洛普斯基。许多年轻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发现自己被类似于现代解放神学的激进信仰所吸引。白党既不愿意因与维洛普斯基合作而失去民心,也不想让红党在爱国事业中占据任何优势,其立场变得越来越游移。1862年9月,在一次占据爱国事业先机并边缘化红党的尝试中,扎莫伊斯基向康斯坦丁大公建议西固柏利应该与波兰王国再次结合,并且应该完全恢复1815年的《宪法》、全国议会和单独的军队。鉴于扎莫伊斯基的大胆放肆,沙皇将他流放,因此削弱了那些想要避免起义的波兰人的影响。波兰政治中处于中间立场的人很快瓦解。

178

由年仅22岁的斯蒂凡·波布洛夫斯基(Stefan Bobrowski)和28岁的齐格蒙特·帕德列夫斯基(Zygmunt Padlewski)领导的密谋起义计划在1863年春天起事。然而他们的手脚遭到束缚。1863年1月14日,维洛普斯基下令警察围捕1.2万名城市中具有激进分子倾向的青年,并把他们强制征入俄国军队。以这外科手术般的一刀,维洛普斯基希望在最不具备起义条件的隆冬时节摧毁红党。让各省众多起义追随者惊慌失措的是,红党的领导人决定采取行动。1863年1月22日,中央民族委员会宣布自己成为“临时民族政府”,并且为了解放1772年边界内的所有俄占波兰的土地对俄宣战。起义最初的部队只有6000名装备简陋的男性士兵,绝大多数还是城市工人、工匠和穷困的贵族,他们在波兰对抗俄国拥有10万名士兵的军队,而在西固柏利将对抗数量更

为庞大的俄军武装。绝大多数有财产的人惊悚地看着完全不堪重任的年轻红党。

179 自任的民族政府希望通过拉拢大量农民参与到斗争中减轻武装力量的悬殊差距,为此发布授予农民享有完全的财产权的法令,并且承诺以土地的形式给所有参加起义的无地农民奖励。2月中旬,梅洛斯瓦夫斯基怀着成为波兰的加里波第的期望,回到波兰成为“独裁者”。农民对于起义的最初反应是普遍赞成,但并不参与。起义转变成一场游击战,起义者每次只能动员不超过3万人,仅有鸟枪和镰刀之类的武器,以此对抗欧洲最庞大的俄国军队。然而,尽管俄国人具有强大的军事优势,早期曾战胜过梅洛斯瓦夫斯基的军队,但他们仍不能完全扑灭起义的火焰,起义军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在波兰和立陶宛的森林中证明十分见效。西方各国的公众对波兰表现出广泛的同情心,以及英国和法国官方对圣彼得堡提出的外交抗议,鼓励起义者幻想他国的干涉将会拯救他们的事业,因此波兰内部对起义的支持率上升,遍及之前反对武装斗争的团体。白党不能容忍梅洛斯瓦夫斯基,还有一些人对民族政府的匿名性质感到不悦,但是当温和的马里安·兰盖维奇(Marian Langiewicz)和之后的卡罗尔·马耶夫斯基(Karol Majewski)担任指挥时,他们被说服参加起义。起义席卷了立陶宛大部分地区和白俄罗斯西部,但未延及乌克兰,同时无数从波兹南和加利西亚来的志愿军跨越边界前来参加起义。

1863年4月,沙皇对政治犯提供的特赦遭到拒绝,起义进入到一个更艰苦的阶段。亚历山大二世下令让维洛普斯基离职,以陆军元帅贝尔格替代康斯坦丁大公担任总督,贝尔格仿效了维尔纳(Vilna)的总督米哈伊尔·穆拉维耶夫(Mikhail Muraviev)的一些极其残暴的方式(穆拉维耶夫在东部的无情镇压使他在波兰爱国者中获得“绞刑手”的持久恶名)。红党控制了民族政府的大权,并以他们的标志性恐怖政策作为回应,部署一支称为“匕首人”(stiletto-man)的护卫队用于对抗俄国官员和他们的波兰合作者。急切地想将斗争拖延到1864年春天的起义者,觉得到时候法国可能会出面干涉,于是在1863年10月选举

出新的领导人：罗蒙德·特劳古特(Romuald Traugutt)，他以前是沙俄军队中富有经验的职业军官，曾经在1862年辞去职务在普里佩特(Polesie)的树林和沼泽中证明了自己作为游击队指挥者的勇气和胆量。特劳古特政治上同情白党，但是他将复兴的决心注入到这个“地下国家”；他对起义军队进行重组，并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军事和行政司令部。

但是事件的发展开始不利于起义者。他们无法在俄占波兰控制一块比较大的区域，从而不能系统化地贯彻他们的土地改革。白党和红党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削弱了特劳古特的权力。俄国的激进分子赫尔岑(Herzen)和巴枯宁(Bakunin)以及俄国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Land and Will)口头上对波兰独立事业的声援，其实际效用有限。确实，俄国绝大多数的公众舆论，包括许多自由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在爱国主义热情迸发之下联合起来对抗波兰人。国际形势也再一次被证明是不利的，而这却是波兰人曾希望争取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时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丹麦问题上结成了同盟，于是也联合起来对波兰的起义采取敌对的态度；俾斯麦(Bismarck)甚至帮助俄国人对抗起义军。被欧洲其余国家孤立后，波兰的起义者很快认识到，来自巴黎、伦敦或任何地方的支持与同情都只不过是残酷的欺骗。不会有什么欧洲大会来专门讨论波兰的问题，也没有哪国的军队会为了波兰的利益采取武装干涉。

1864年3月初，沙皇当局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在争取农民全心全意支持的战斗中击败民族政府。俄国自由主义改革家米利乌汀(N. N. Miliutin)最终说服沙皇，向农民提供起义政府所许诺的财产权，这样比起任何其他措施都更能恢复俄国对波兰的控制。的确如此，在沙皇亚历山大于3月2日颁布慷慨的《土地改革敕令》之后，农民转而保护他们的新权利，波兰乡村支持起义的农民开始减少。特劳古特及其同僚在4月遭到逮捕，之后在1864年8月5日英勇就义，至此，起义残余的火焰已经基本被扑灭。最后一支由激进的牧师斯坦尼斯瓦夫·博索斯卡(Stanisław Brzóska)领导的起义军队，则在波德拉谢(Podlasie)

一直坚持到 1865 年。

181

对于成千上万免遭杀戮的起义军而言,结局也并不乐观,等待他们的是长途跋涉前往西伯利亚服劳役的命运。曾经同情或是支持起义的地主们将面临罚款或是没收财产的处罚。又一代波兰人为他们英勇但最终无果的挑战瓜分势力的尝试付出了代价。然而起义仍是一项壮举,在这样悬殊的军事力量差异之下,起义仍成功地持续了 18 个月。起义者们用行动表明,他们是难以捉摸、顽强不屈的敌人。在华沙隐匿处的民族政府,就在俄国帝制的鼻子下也能够运转,而在乡村,其秘密据点与俄国军队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在许多地区,地主和农民支付一种“国税”为起义者提供补给。而起义者们虽然时常被包围和击败,却总能随着新志愿者的不断加入而很快重振旗鼓。1863—1864 年间,这个秘密地下政权得以在俄占波兰大部分地区运转,这在 19 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历史上也是非同寻常的现象。依照贝尔格总督所说,它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穷凶极恶的阴谋”。但是它终究不能与一支在沙皇的波兰土地上泛滥的将近 40 万人的军队(俄国全部陆军力量的一半)永久对抗下去,特别是在缺乏任何外国干涉、士气受挫的状态下。报复越来越残酷,而沙皇最终对农民放低姿态则敲响了起义者的丧钟。然而,通过其对农民的关注,起义已经促使沙皇当局提供给波兰农民比维洛普斯基设想的更慷慨,或者说甚至比由沙皇提供给在严格意义上的俄国土地上的农民更慷慨的条件。

此时的悬念是,俄占波兰的农民是否会成为对圣彼得堡的皇帝充满感激和忠诚的臣民,或者是否满足了他们直接的经济要求后,他们能与他们的同胞找到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在波兰独立斗争的历史上,1864 年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代表了一个分水岭。随着俾斯麦模式的德国作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力量的兴起,法国随之而来的衰退,波兰从西欧获得帮助的所有幻想都惨遭破灭。浪漫主义起义时期已经划上句号。尽管如此,对 1863—1864 年的英雄主义和牺牲奉献的记忆,以及曾遭受极不公正待遇的感觉,都会给波兰人民留下痛苦但深具能量的遗产。

第五章 转型时期(1864 — 1914)

1863 — 1864 年起义的失败对波兰的独立事业来说是一次决定性的致命打击。新一批流亡者到西方去寻找避难所,同样作为挑战分子,但并不像他们 1831 年的前辈那样杰出。他们之中的好战激进主义者加入到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中,许多人为此而战,倒在巴黎公社的街垒上。温和派开始制定一个同样不切实际的保全民族事业计划。他们的一些理念和活动最后发展为波兰内部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但在当时,随着一年年过去,波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次要的国际议题,逐渐淡出政治视野。1877 — 1878 年间的俄土战争以及因此引起的东部危机曾让他们浮现渺茫的希望,最后却是空欢喜一场。在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俄国和普鲁士当局均再度推出举措,削弱他们各自侵占的旧波兰土地上仍然存在的波兰特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该世纪的前十年,波兰民族复兴情绪在奥地利占领区表现得最弱,但正是在那里波兰的命运出现了转机。

波兰王国特殊的行政地位大大降低了,俄语被强制推行为政府和法庭用语。做为维也纳会议产物的这个命运多舛的王国,在 1874 年甚至还正式被更名为“维斯瓦边区”(Privislansky Kray),该地总督一职也被废除。审查制度和严格的治安控制变为日常的秩序,同时,削弱贵族对波兰王国农民影响的措施逐步实施。在西固柏利,波兰人或天主教徒不得

182

183

购买土地,使用波兰语也遭到禁止。19世纪60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俄罗斯帝国其他地区进行的两次重要的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扩展到俄占波兰地区,这使得波兰人政治上软弱无力的感觉进一步加强。这两项改革之一是**郡县议会**(*zemstwa*),其为选举产生的地方参议会,承担着卫生、教育和经济基础建设的广泛责任;其二是法庭上的陪审团体系。然而也有好的方面,被招募进入沙皇军队的波兰士兵至少能从米利乌汀人道主义的军队改革中受益,这次改革结束了20年的军事劳役制。

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对最近起义的积极参与,使教会在波兰王国和西固柏利两地都受到了更严格的控制。绝大多数修道院遭到关闭,一些得以幸存的修道院也被禁止接纳新的教徒。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地区大约1/5的罗马天主教教区遭到解散;提出抗议的主教也被驱逐,结果导致在1870年除了一个主教教区外,波兰王国其余教区都无人居住。波兰王国东南部海乌(Chełm)幸存的希腊天主教教区在1875年被迫皈依东正教;军队常常鞭笞反抗的村民直到他们屈服投降。1882年,在圣彼得堡和罗马教廷之间达成的协议只为俄占波兰的教会带来有限的自由。

波兰王国的教育体系也没有幸免。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俄语成为所有中学教育的强制教学用语,随后,在1885年,小学基础教育也照例执行。1869年华沙开办了一所俄语大学,以替代关闭的“主要学校”。1878年,年轻的玛丽·斯科瓦多夫斯卡(后来的居里夫人)及其同学经历这样的耻辱:一名政府的学校巡视员命令他们用俄语背诵祷词然后凭记忆列举出所有俄国王室成员,这是那些年学校教育的一个特色。

普鲁士占领的前波兰省份的独特地位也逐渐被消蚀掉。波兹南尼亚和但泽波美拉尼亚(西普鲁士),这些地区1815年时都在德意志联盟范围之外,在1871年后则完全被并入新德国。德语最终确立为当地政府和法庭用语,1887年也成为所有学校的唯一用语;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教育成为例外。波兰早先打算在波兹南创立一所波兰大学的希望现在已荡然无存。俾斯麦不是现代风格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起初他认为说波兰语的农民可以加入皇室军队为普鲁士国家服役,但是他坚持认为波兰复国的热望与普鲁士和德国的利益从根本上是矛盾的,并且以

贵族和教士为代表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会与天主教一道成为对新德国有害的离心力。在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试图让罗马天主教会服从于德国,并对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加以限制,这场所谓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在东部呈现出明显的反波兰特性。在波兹南-格涅兹诺大主教区,绝大多数剩余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被解散,1873年到1877年间,由于警察大肆逮捕,大约30%的教区没有了神父。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莱杜霍夫斯基大主教(Ledóchowski)被囚禁两年后,被迫前往罗马。然而东部“文化斗争”的结果却无意间加强了宗教和民族特性之间的联系,最出人意料地体现在上西里西亚。作为对德国内部民族主义者越来越要求增强普鲁士东部更多的德国特性的回应,俾斯麦在1886年建立了一个用于购买波兰人拥有的地产的特别基金,其目的是为德国殖民者获得土地。除了1890年到1894年间在总理卡普里维(Caprivi)统治下对波兰人的短暂抚慰期(当政府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需要波兰代表的支持时),上述举措造成的土地争夺,使东部旷日持久的民族斗争又增加了一个层面。

19世纪下半叶奥地利政府对波兰臣民的政策与俄国和普鲁士形成了强烈对比。1859年和1866年分别大败给法国和普鲁士后,奥地利帝国的实力被削弱,维也纳被迫做出宪法上的让步。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建立起的部分实行代表制的国务院和地方议会,导致奥地利帝国在1867年彻底地转型为君主立宪制的奥匈帝国。仍然记忆犹新的1846年“扎克雷起义”的阴影和对乌克兰的民族复兴的担忧,使加利西亚比较保守的波兰领导人对于在君主立宪制的奥地利治下获得有限的自治感到满足。

做为对效忠于奥地利的回报,对加利西亚内政的控制权逐渐转移到当地波兰精英手中。直到1918年,加利西亚总督和大臣的职位在维也纳内阁里都由波兰人掌控。一项以阶级为基础的有限特权保证了有地的中产阶级在利沃夫省级议会中占支配地位,并垄断了加利西亚在奥地利中央议会的代表席位。1877年到1889年间在省级议会中没有一名农民代表,在乌克兰也只有寥寥几个。许多波兰贵族在维也纳身

居要职：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伯爵(Alfred Potocki)和卡齐米日·巴德尼伯爵(Kazimierz Badeni)分别在1870—1871年间和1895—1897年间担任奥地利的首相。老阿吉诺·戈乌霍夫斯基伯爵(Agenor Gołuchowski)从1859年到1860年间担任内政大臣和国务部长,此外他的儿子在1895年到1906年间担任外交大臣。在此期间波兰民族文化得以蓬勃发展;1870年后在行政、法庭、学校以及克拉科夫和利沃夫两所大学内恢复使用波兰语。在加利西亚,向来比较消极被动的天主教僧团获得了更显著的民族特性和更大的行动自由:1879年,爱国的阿尔宾·杜纳耶夫斯基(Albin Dunajewski)受任为克拉科夫大主教,并于1890年被提拔为红衣主教。克拉科夫逐渐成为波兰艺术世界的中心,由杨·马迪依科(Jan Matejko)主导了将近30年,他大量的历史画作描绘了波兰往昔的荣耀和生动景象。比起俄国和普鲁士占领的波兰之前曾经存在和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些是政治和文化上切实的受益;然而对于这个奥地利帝国内数十年来一直处于落后地位的省份,艺术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很快带来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86

在波兰内部和整个欧洲发生的新事实,驱使许多受过教育的波兰人以批评的眼光再次审视他们的民族困境和未来的民族前景。1869年,一群从前的自由斗士从理智上和历史上对政治空想主义和武装暴动传统做了第一次强有力的谴责,这些人如今都成为克拉科夫著名的知识分子:历史学家杨·西祖斯基(Jan Szujski)和文学史家斯坦尼斯瓦夫·塔诺夫斯基(Stanisław Tarnowski)。西祖斯基有名言认为,“**密谋的自由**”(liberum conspiro/the freedom to conspire)是等同于旧日的自由否决制的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法则。此外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有影响的历史学家米哈乌·鲍布任斯基(Michał Bobrzyński)对波兰的过去也进行了严厉批评。他们举出斯坦则克(Stańczyk,即波兰人熟知的Stańczyks)的例子,竭力试图以政治现实主义精神、辛勤工作和社会保守主义来影响波兰公众的看法。他们宣称,必须促进波兰文化的本质统一,但是波兰人在政治上除了接受“向三方效忠”(tri-loyalism)或是与三个不同的政府合作共存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比起沙皇政权在

华沙的严厉统治,就目前形势更容易接受哈布斯堡在加利西亚可容忍的统治。无论如何,对于波兰许多保守的地主来说,“向三方效忠”提供了一条与困难的政治现实条件达成妥协的谨慎道路。

起义者不计后果的英雄主义传统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同样遭到华沙实证主义者的谴责。大量借鉴西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的价值观以及“有机工作”的传统,他们号召波兰人集中精力增强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现代欧洲文明已经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实证主义的领导者,例如记者和政评作家亚历山大·希文托霍夫斯基(Aleksander Świętochowski)、小说家鲍莱斯瓦夫·普鲁斯(Bolesław Prus)、艾利莎·奥热什科娃(Eliza Orzeszkowa)和诗人亚当·阿斯努克(Adam Asnyk),在他们的作品中对社会问题提供了一条反蒙昧主义的现实主义道路,对促进国内的事业发展贡献良多。实证主义者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在 1886 年成立的一座秘密的“飞行大学”(flying university),用波兰语提供严谨的学术课程。然而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有一个事实变得日益明显,工业化和城市化特别是在俄占波兰,造成了社会分化和紧张状态,而不是他们梦想的社会和谐和民族统一。

187

后一目标在波兹南尼亚得到最为成功的促进。在那里波兰的地主、工匠、农民和神职人员协同一致,捍卫他们的信仰、土地和民族主义,反抗德国民族主义者重压。许多由神职人员领导的经济合作社和自助教育社也得到繁荣发展。1 000 多座波兰图书馆,绝大部分带有宗教和道德特性,在波兹南尼亚和西里西亚开放。波兰人拥有的农民银行在 1872 年成立,到 1910 年已有 12.5 万名成员。在 1888 年,普鲁士的波兰人甚至成立了一家土地银行,用于阻碍柏林购买波兰地主的土地的政策。波兹南尼亚农民强烈的民族情感不仅表现在对“文化斗争”的回应上,同时也反映了普占波兰土地上先进的文明水平。在普占波兰出现的现代化高产农业体系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早期普鲁士的土地改革,其曾主张建立经济可行的大、中型农场;同时也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鼓励:普鲁士政府对农产品实行贸易保护的税收政策,以及建设贯穿普鲁士的密集铁路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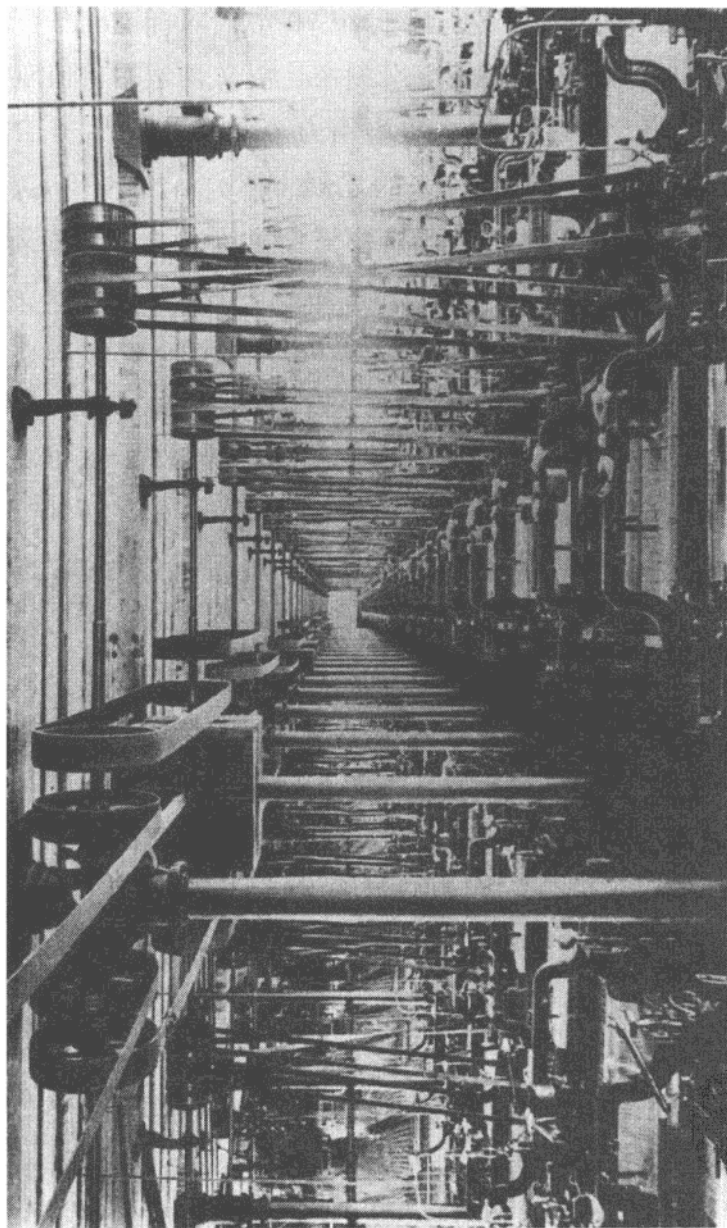


图 29 “波兰的曼彻斯特”——罗兹的卡尔·威廉·沙伊布策尔(Karl Wilhelm Scheibler)棉厂的纺织车间。从 19 世纪 20 年代起,罗兹就成为纺织中心并具有重要价值。1850 年俄国和波兰王国之间关税壁垒的废除以及 1866 年铁路的贯通,都刺激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在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出生的沙伊布策尔(1820—1881)在罗兹是最重要的工厂主,在俄罗斯帝国他的纺织生意也是最大的。罗兹充满活力、贪得无厌和社会分裂的世界与其波兰、德国和犹太的居民,在瓦迪斯瓦夫·莱蒙特(Władysław Reymont)所写的小说《福地》(*Ziemia obiecana* / *The promised land*, 1898)中得到充分展现。小说的两个电影版本分别在 1927 年和 1974 年由安杰依·瓦依达(Andrzej Wajda)制作面世。

在 19 世纪最后 40 年中,被瓜分波兰的各个地区其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步伐存在着显著差异。在前波兰王国,1864 年俄国土地改革产生了不一的影响:地主土地减少,大量少而分散的小农碎地出现。该地的农业生产力大大低于波兹南尼亚。确实如此,所有乡村地区受到 19 世纪 80 年代农业衰退的严重冲击。与更富有的贵族形成对比,许多小乡绅地主没有从危机中幸存下来,转而进入城市职业阶层和不断增长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使这一群体保留了大量的乡绅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习惯。在农民中也一样,资产殷实的扛过去了,但许多人不得不卖掉他们那些不值钱的地产(大多数土地面积小于 15 公顷),寻找新工作或者加入临时劳力的大军,在收割期辗转于欧洲各地。另一方面,工业、城镇和铁路建设方面取得了极大发展,虽然以英国或德国的标准来说还并不壮观。华沙如今成为重要冶金中心,其人口在 1864 年到 1890 年间翻倍,达到将近 50 万人,到 1910 年进一步上升至超过 76 万。而罗兹吸引了很多德国资金,并将大量的纺织品定向发往俄国和远东。其人口数量从 1860 年的 2.8 万人发展到 1910 年数目相当可观的 41 万人。近西里西亚边界的东布罗沃(Dąbrowa)盆地的煤矿业也得到发展。波兰王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在 1872 年仅占总人口的 1/5,但到 1909 年时占到大约 1/3,同时工业产品的价值也超过了农业产品。在经济方面,之前的波兰王国成为俄罗斯帝国最先进的地区。

189

但加利西亚仍是欠发达地区,当地农业地产过小且仍处在不断分割中,乡村一贫如洗,精英阶层在社会取向上又过于保守,这些都阻碍了它的发展。直到 1890 年,加利西亚省仍然负债于维也纳中央政府,并且根据 1848 年的《解放农民法令》,仍欠着应付给地主的赔偿款。其经济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切申西里西亚(Teschen Silesia)和奥地利西部的其他地区。20 世纪初,在加利西亚的 730 万人口中只有不超过 6 万名产业工人。当地最重要的工业活动就是在东南部波里斯瓦(Borysław)和杜若霍比茨(Drohobycz)周围开采石油(在 1909 年超过世界产量的 5%)。1890 年后经济发展开始加速,到 1910 年利沃夫和克拉科夫市的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分别拥有 20.7 万和 17.4 万居民。



图 30 玛丽亚·居里-斯科瓦多夫斯卡 (Maria Curie-Skłodowska): 诺贝尔奖获得者。照片在 1913 年摄于伯明翰。她在华沙工业和农业博物馆的实验室里自学了化学分析法之后,离开华沙前往巴黎学习,以物理学和数学专业从法国毕业。1895 年,她嫁给了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 (Pierre Curie)。1898 年,她发现了两种具有高放射性的新元素钋和镭,并两次获得诺贝尔奖: 1903 年因物理学方面的成就 [和他的丈夫还有安东尼·亨利·贝克勒尔 (Antoine Henri Becquerel)]; 1911 年单独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人和她的祖国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并且于 1932 年为在华沙建立镭元素学院提供了帮助。

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见证了波兰人口的大幅增长,但人口的膨胀也导致贫穷农民大批离开波兰到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或者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和巴西。据推测,大约有 250 万农民在 1870 年到 1914 年间离开了历史上属于波兰民族的土地。1914 年在美国的波兰人数量大约在 400 万左右。这些波兰人有自己的学校和教堂,是那个时期来自中欧的最大的移民团体。20 世纪前半叶,芝加哥大部分地区出现的波兰特色归因于这次早期移民浪潮。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化和教育机构(特别是在俄占波兰),许多有才能的波兰乡绅或中产阶级出身的波兰人也离开波兰前往国外发展。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即科热尼奥夫斯基(Korzeniowski)]、伊格纳西·帕德列夫斯基(Ignacy Paderewski)和玛丽亚·居里-斯科瓦多夫斯卡是最著名的三个例子。另外,人们还可以加上未来波兰两个总统的名字:水力电气方面的专家加布列尔·纳鲁托维奇(Gabriel Narutowicz)和化学家伊格纳采·莫希齐茨基(Ignacy Mościcki),他们两人都在瑞士获得了专业声誉。基于同样的原因,无数的波兰工程师到俄国内地和西伯利亚创造他们的财富,在那里,他们的波兰出身不构成不利条件。同样,民族背景也没有阻碍瓦茨瓦夫·尼金斯基(Wacław Nijyński)(更多是以 Vaslav Nijinsky 之名为人所知)作为俄国芭蕾舞界的一颗明星开创自己精彩的职业生涯。甚至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的波兰人中,也涌现出对这些边远地区的科学知识做出贡献的学者:本尼迪克特·迪波斯基(Benedykt Dybowski)对贝加尔湖(Baykal)动物群系进行了分类,以及布罗尼斯瓦夫·毕苏茨基(Bronisław Piłsudski,约瑟夫·毕苏茨基的兄弟)在库页岛(Sakhalin)上开展了人类学研究。

俄罗斯帝国的西固柏利保留了突出的乡村特性,虽然铁路的到来的确对经济活动有所刺激。然而,乡村的人口过剩也造成一定的流失;在 1864 年到 1914 年间,立陶宛民族有将近 1/4 的人口移民,绝大多数前往美国;白俄罗斯土地贫瘠,森林广大,仍然极其落后;普里佩特那些与世隔绝和自给自足的沼泽地社区继续维持着原始面貌进入 20 世纪。在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大量波兰田庄得以幸存;它们的所有者,如波托茨

基或布兰尼茨基(Branickis),拥有足够的远见和资源使他们的地产现代化,并发展了食品加工业,特别是收益不菲的提炼甜菜糖工业。直到1917年,基辅一直是一群兴盛、壮大的波兰知识分子的家园。

192 在经济上,旧日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的各个区域现在依照不同的节奏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波兹南的农业对德国市场,以及会议波兰王国的工业部门对俄国市场的依赖,把这些地区分别与德国和俄国的经济联结为一体。在19世纪建造的跨越波兰的铁路体系也生动地反映出这种结合。线路迂回的长途铁路体系把华波与波兹南、克拉科夫和利沃夫连接起来;当华沙还是一个统一波兰的首都时,这些地方几乎没有铁路,1862年才修建了第一条直通维尔诺的铁路线,还是作为华沙-圣彼得堡铁路的一部分。铁路网仍在继续发展,但迟至1914年才有3条主线路和3条二级铁路路线跨越普鲁士进入俄占波兰。粗略地看一眼今天波兰国家的铁路网地图,还能清晰地看到在1918年前曾经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区域密集的铁路网。



图31 普里佩特农民生活一景。照片摄于1938年,反映出自19世纪末以来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普里佩特的大部分地区,或许是前波兰-立陶宛联邦最落后的地区,当地的沼泽地带依靠普里佩特(Prypet)河及其支流组成供养。这个地区乡村居民绝大部分都信奉东正教并说白俄罗斯语。他们称自己为“本地人”(tutejsi)——“我们是住在这里的人”(we who live here)。1914年这里的文盲率仍然超过70%。

在这种经济和社会变革背景下,很难对说波兰语的农民的民族感情的程度做出精确的描述。一系列复杂的区域性因素在起作用。兵役制度(特别是奥地利军队的),对波兰青年产生效忠三个帝国的情感有一定影响,但普鲁士及俄国官方对天主教和波兰语怀有的敌意,尤其是沙皇错误发动的禁止波兰人穿民族服装的运动则带来了负面影响。成千上万的农民移民到城镇,这也对文化和习俗造成了更多影响。农民带来了他们虔诚的乡村传统,也受到城市工匠的爱国主义和早期社会主义者理念的影响。农奴身份的结束,以及通过教育和文学增强的对乡村社会之外更广阔世界的感知能力,毫无疑问是塑造农民个人意识的关键因素。然而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着非同寻常的对比。普占波兰强制实行初级教育,到1900年几乎消除了文盲,但是所有学校均使用德语作为教学语言;不过,还是可以观察到新兴波兰认同感出现的迹象,但泽波美拉尼亚的卡舒比人(kashubians)甚至开始向德意志帝国国会输送波兰代表。在俄占波兰,虽然俄国官方负责扶持初级教育,但是各级学校设备仍然严重匮乏,在19世纪末期,该地的文盲率仍然保持在65%上下。在普鲁士和俄国占领的波兰地区,波兰语教育主要由个人慈善家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赞助的志愿教学机构承办。在20世纪初期,这样的秘密教学大约涵盖了波兰王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贵族、富裕家庭和知识分子之中,书面语在家中由主妇或是家庭教师传授。社会各级逐渐开展针对文化德国化和俄国化冲击的有效防范措施。

在原波兰各地区中,只有加利西亚享有正式的初级教育体系,但即使如此,迟至1900年,加利西亚省也只有大约30%的儿童可以接受教育;而乌克兰年轻人的受初级教育比例甚至更低。1908年到1913年间,在总督鲍布任斯基统治下,一个主要由政府赞助开展的乡村教育扩展计划有效地使文盲率降低到50%以下。加利西亚广泛的民族和政治自由(1907年奥地利开始实施普遍的男性公民权)及其波兰语的学校和报纸,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众多机会,都有助于在乡村人口中培养一种波兰认同感。第一次由一名波兰农民杨·斯洛姆卡(Jan Słomka,

1842—1927)创作的回忆录,描写了加利西亚从农奴制到立宪政府的发展过程,为这个进程提供了生动的说明。

正如民族意识在更广泛的说波兰语人群的地域中传播蔓延一样,在前联邦共和国东部地区居住的其他民族团体中也可以观察到相似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东部地区由当地神职人员以及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新民族运动获得了政治性质;他们反对旧日多文化共和国的理念,并挑战东部波兰社会和文化的长期霸权。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的是加利西亚东部的乌克兰人,在当地受奥地利统治相对自由的环境下,他们的文化和学术社团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中,保守的宗教领袖最初赞成进一步加强与俄国的密切关系,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一个受作家伊凡·弗兰柯(Ivan Franko)启发的、更年轻的激进团体对其提出质疑,该团体支持所有乌克兰民族脱离俄国人和波兰人实现统一的理想。众多波兰和乌克兰社团在哈布斯堡的统治下和平共存,但是波兰人在加利西亚公众生活中占支配地位,以及加利西亚东部的地主大多为波兰人,这些都激化了不同种族和阶级之间的怨恨,并且最终促成双方激烈对抗。19世纪40年代,在俄罗斯帝国出现了一次乌克兰文学和文化运动;其主要思想家是米克拉·克斯托马洛夫(Mykola Kostomarov),而其领导人是吟游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一种以波尔塔瓦和基辅地区方言为基础的单一乌克兰语的标准语,最终在奥俄边境两边由乌克兰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接受并采用。

195 沙皇政府不仅顽固抵制所有波兰民族发起的分离主义活动,而且对在俄罗斯帝国西部边境地区其他本地民族的文化觉醒也持反对立场。比如1863年俄国学校禁用乌克兰语,1876年印刷业和出版业也跟进,白俄罗斯语也遭遇相似命运。俄国官方否认这些斯拉夫语言的存在;的确如此,鼓励使用这些语言被看做是削弱俄国民族性的波兰阴谋的一部分。而针对非斯拉夫语言的立陶宛语的诸多歧视限制就没有如此严格,但是直到1904年俄国当局仍坚持立陶宛语只可以用古代斯拉夫语字母印刷。然而,他们不能有效防止以拉丁字母印刷的立陶宛语



图 32 犹太新年(Feast of the Trumpet)。亚历山大·基里姆斯基(Aleksander Gierymski, 1850—1901)画于 1884 年。信仰东正教的犹太人在华沙的维斯瓦河岸上歌唱和祈祷。基里姆斯基是一名现实主义画家,善于运用强光效果,创作了许多关于犹太人生活场景的令人难忘的画作。画面上的背景是蒸汽机火车正在穿越基尔贝茨(Kierbedź)的铁路桥。

出版物从普鲁士东部秘密销售到各地,有力表达出一种基于语言产生的立陶宛民族特性。其最重要的月刊是《黎明》(*Ausra/Dawn*),由约纳斯·巴萨纳维奇乌斯(Jonas Basanavičius)和约纳斯·西律帕斯(Jonas Šliupas)编辑。在1863—1864年间,绝大多数立陶宛人同波兰人站在一起反抗沙皇专制,但是两个民族此后就开始分道扬镳。尽管新的立陶宛民族复兴运动得益于波兰浪漫主义以及数位著名的双文化的主教和作家的支持,但仍具有强大的反波兰特性,其产生于前立陶宛公国绝大多数什拉赫塔和受过教育的阶层对文化波兰化的一种怨恨。在这一时期还可以观察到白俄罗斯文学出现复兴的苗头,这种复兴很大程度是基于波兰模式,而当地波兰爱国者甚至将其当做一种抵抗俄国影响的方式加以鼓励。在西固柏利,不同种族间的关系模式通过社会、语言和宗教因素进一步复杂化。虽然罗马天主教信仰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反映出波兰的文化特性,但不是宗教而是语言上的划分,将把现代立陶宛人和波兰人或波兰化的立陶宛人区分开来。

197

前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的犹太人世界也在不断变化着。在议会波兰王国,由1862年《解放法令》开始的进程在继续展开;许多有才能、境况较好、富有事业心的犹太人超越他们传统宗教和文化社区的界限,积极地参与到非犹太教徒的世界中。的确,在大部分中心城市,犹太人进入上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的例子并不罕见,最著名的有克罗嫩贝格、布洛赫(Blochs)和波兹南斯基(Poznańskis)等银行业和工业家族。同化现象在加利西亚也可以看到,特别是在克拉科夫和利沃夫,那里的犹太人在1867年被授予平等的公民权。另一方面,大量更贫穷的加利西亚犹太人通过移居到维也纳寻求更好的生活。在波兹南尼亚,绝大多数犹太人受德国文化吸引,并且出发前往严格意义上的德国。在西固柏利,将近40%的城市人口是犹太人,世俗化的犹太人越来越被俄国文化所吸引,尽管沙皇对犹太人生活仍然实施了广泛的限制。

工业和贸易的扩张,以及波兰王国城镇中犹太人比例的上升,更强化了非犹太人与犹太人店主、小贩和所有中间阶层之间的经济敌对状

态,并且使普遍的反犹情绪上升到更深的层面。19世纪80年代,成千上万俄国化的犹太人(所谓的“Litvaks”)为了躲避俄国西部的贫困和大屠杀而逃到该地区,再加上以单个民族为基础的、排外的波兰民族主义的出现,都进一步助燃了这些矛盾。非犹太人和犹太人联合起来,为公民权利和波兰民族解放事业一起行动的希望,在1861年至1864年间曾非常强烈,但随着本世纪的推移,希望的星星之火逐步黯淡,虽然这些希望继续存在于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中。犹太人向外移民的步伐加快,特别是前往新大陆;在1870年到1914年间,有超过100万的犹太人离开前联邦共和国属地。犹太世界的大分化在19世纪90年代末通过两个长期竞争的政治运动的兴起得到进一步强调:旨在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和旨在囊括沙俄帝国大部分犹太劳动人口的社会主义组织“崩得”(Bund)。

与欧洲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一样,在波兰人的社会中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社会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和农业民粹主义。新一代的激进分子继承了1864年流亡者的衣钵,向那些曾经试图迁就于普遍的政治现实的波兰精英发起挑战。虽然这些运动最终扩展到大众以及全波兰,但是他们也同样拥有属于自己的特殊地域特性,反映出在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统治下的不同社会状况。

现代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而且吸收了浪漫主义起义传统和俄国好战的民粹主义者(Narodniks)潜在的革命观念。从一开始,运动的国内与国际目标之间就存在分歧。早期社会主义者鲍莱斯瓦夫·李曼诺夫斯基(Bolesław Limanowski)把日内瓦(Geneva)作为基地,赞成前一目标;路德维克·瓦伦斯基(Ludwik Waryński)于1882年在波兰土地上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强调后一目标的首要地位。瓦伦斯基的组织很快被俄国警察击破,同时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海外。1892年在巴黎,波兰社会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 PPS)成立,很快由约瑟夫·毕苏茨基(Józef Piłsudski)领导。

就像早前的几代激进分子希望动员农民为实现独立参与斗争一

样,毕苏茨基现在将俄占波兰正在成长的劳工阶级看做是用来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工具。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又取决于这样一个假设:只有一个独立和再统一的波兰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需要立足于波兰历史上所有民族团体的自愿基础上。这遭到那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反对,比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她抵制波兰独立事业,因为这与社会主义超越民族的本质在根本上是相互矛盾的,而且还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发展在经济上将会议波兰王国与俄国捆绑在了一起。1893年,卢森堡及其同事组成了与波兰社会党竞争的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SDKP);在1900年,很大程度上通过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ierżyński)的努力,该党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改组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and Lithuania, SDKPiL)。波兰社会党在规模上拥有超过社会民主党的显著优势,在1906年以5万名成员对比3万人;但是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很明显存在严重分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毕苏茨基和捷尔任斯基两人在他们的青年时期都经历过沙皇时代的压制,此外这两人都来自立陶宛的乡绅家族,而个人事业却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在“民族问题”上长期不能达成一致;甚至在波兰社会党内,党的社会目标和民族目标之间也常常出现矛盾。虽然罗莎·卢森堡是一名来自扎莫什奇(Zamość)的波兰世俗化犹太女性,但是1898年在俄国建立的一个独特犹太社会主义党派——“崩得”,进一步反映出在东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性之间充满疑问的关系。

无论是以德国模式还是波兰模式,社会主义都没有在普占波兰深深扎根下来。在波兹南尼亚只有少数产业工人,而波兰身份与天主教的联合却又太过坚固。在上西里西亚,直到19世纪90年代,大部分工人(在1900年人数大约达到36万)倾向于德国天主教中心党(German Catholic Centre Party)。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引入先进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了德国东部的物质匮乏和阶级紧张形势。在加利西亚,社会主义略有进展,那里的社会主义吸收了当地的激进传统。社会主义政

党在奥地利可合法运作,并且采取一个扩大工人政治和社会权利的非革命渐进计划。但是在奥地利的社会主义也不得不应对帝国复杂的民族问题,这些问题导致运动分裂为各行其是的语言—种族小团体。加利西亚最突出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就是伊格纳采·达申斯基(Ignacy Daszyński),他是一位有才能的雄辩家和未来的国会议员;而在乌克兰社会主义者中,最显著代表是伊凡·弗兰柯和米克埃罗·帕夫雷克(Mykhailo Pavlyk)。

不论社会主义的崛起在波兰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波兰社会中仍存在着更强大的民族主义暗流,能被一个现代民族主义政党开发并有利地操控。亨里克·显克微奇(Henryk Sienkiewicz)在1883年到1888年间出版了历史小说《三部曲》并大受欢迎,反映出民族主义情感潜在的吸引力。虽然显克微奇并不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但他所著的曲折惊险的史诗作品的故事背景设在17世纪波兰对抗反叛的哥萨克人和入侵的瑞典与土耳其人的艰难战争时期,展现了一幅浪漫传奇化的波兰往昔景象,在之后波兰几代人的历史意识中留下了它的印记。鲍莱斯瓦夫·普鲁斯1885年的作品《前哨》(*Placówka*)同样宣泄了强烈的反德情绪,其涉及波兰和德国的农民就土地问题的敌对状态;此外还有显克微奇描写中世纪对抗条顿骑士侵略斗争的传奇故事《十字军》(*Krzyżacy*, 1890)。

200

现代波兰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位于日内瓦的秘密波兰同盟(Polish League),其由曾经参加1863—1864年起义的老兵及流亡者齐格蒙特·米乌科夫斯基(Zygmunt Miłkowski)领导,以及由齐格蒙特·巴利茨基(Zygmunt Balicki)在克拉科夫创立的秘密青年组织乍得(Zet),这两个组织都成立于1887年。然而,米乌科夫斯基的民族主义包含太多自由主义元素,从而无法被像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这样强硬的华沙青年民族主义行动分子所接受。在1893年运动重新命名为“民族同盟”(National League),之后又于1897年改组为“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在波兰语中昵称为“Endecja”)。德莫夫斯基及其同事抨击了实证主义者的政治被

动性、保守主义者的“向三方效忠”的观点,以及浪漫主义时期“感情脆弱的爱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虚假人道主义者”所有的表现形式。如果波兰人想从帝国主义和**权力政治**(*Realpolitik*)时期的外国统治中幸存下来,那么就需要新的策略。国家民主党人并没有放弃独立的梦想,他们注重务实而有效地组织政治行动,并发展出了一种在很大程度基于社会进化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新概念。受过自然主义教育的德莫夫斯基被这个理念所吸引,他的著作《一个现代波兰人的思想》(*Thoughts of a modern Pole*)(1902)中最好地表述了这一态度,他认为:国家和民族团体之间存在着生存斗争,而冲突起到加强民族身份和韧性的重要作用。巴利茨基在其《民族利己主义和伦理道德》(*National egoism and ethics*)(1903)中则进一步指出,个人的伦理价值将不得不服从于集体民族利益。

201

通过缓和他们早期的社会激进主义,最初让许多富有的波兰人感到恐慌的国家民主党在波兰王国取得了重大进展,赢得了大量中产阶级和工匠的支持。他们在乡村娴熟的宣传手段和教育活动为他们带来了许多农民拥护者,正如他们的体操协会和青年组织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一样。通过强调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态度,国家民主党吸引了许多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虽然在波兰王国,该党派与教会的关系并非一直和谐。国家民主党人认为比起迟暮的沙皇帝国,近期刚统一并富有经济活力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对波兰人更具威胁。国家民主党的反德姿态使其得以在波兹南尼亚和上西里西亚的产业工人中扩大影响,该地的国家民主党领导人沃伊切赫·科尔凡蒂(Wojciech Korfanty)取得了突出成绩。对于东部许多非波兰民族,特别是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国家民主党采取强硬不妥协的态度:这些人必须顺从文化和语言波兰化,否则就不得不在一场与波兰人进行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悬殊的战役中来主张本民族的独立。而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反犹太主义成为国家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关键因素。犹太人不仅被描述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外来宗教文化实体,而且还成为一种经济威胁因素,并且由于他们对波兰知识界施加的影响力而更趋严重,危及建造一个高度融合、以民族为基础的

波兰民族国家的事业。这一切是对早期多元化波兰试图为其所有民族和种族群体带来自由的浪漫主义想象的绝对批判,让波兰保守主义者和左翼民主党人都惊恐不已。不过,在无数此时已获得政治意识和民族认同感的波兰人中,国家民主党人通过灌输仇外情绪而取得成功。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现代波兰民粹运动或农民运动在加利西亚逐渐出现。早期的领导人主要是斯坦尼斯瓦夫·斯托雅沃夫斯基(Stanisław Stojalowski)。他是一位很有宣传才能的神父,试图向加利西亚农民灌输自力更生、经济合作和公民爱国主义的美德。1883年,斯托雅沃夫斯基率领1.2万人之多的庞大农民群体,浩浩荡荡地在克拉科夫集会纪念索别斯基在维也纳郊外战胜土耳其200周年,任何一个对1846年“扎克雷起义”记忆犹新的人都会对此感到震惊。但是斯托雅沃夫斯基的做法很快遭到国家和教会权威的强烈反对,而他的影响也日渐衰落。事实证明,来自俄占波兰的流亡者鲍莱斯瓦夫·维斯沃乌赫(Bolesław Wysłouch)的努力具有更持久的作用,他在圣彼得堡当学生时曾经与俄国民粹主义者保持联系,并且在他移居到利沃夫后也与华沙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来往密切。在19世纪80年代末,维斯沃乌赫在其期刊中攻击了斯坦则克的保守主义,并勾勒出这样一种观点:具有充分政治性和民族意识的富足农民将会成为未来波兰民主国家的基础,未来的国家将会包罗所有属于波兰民族的土地,并会承认东部乌克兰和其他人的民族权利。维斯沃乌赫与其不懈奋斗的妻子玛利亚(Maria),以及才华出众的追随者杨·斯塔宾斯基(Jan Stapiński)一起,于1895年在热舒夫(Rzeszów)成立了自己的政治农民党派。虽然该党派的反教权主义导致其卷入与天主教教会的纷争中,但是新党派仍然成功地进入到加利西亚政治生活中,并逐步扩大其影响;1903年,该党改称波兰农民党(Polish Peasant Party, PSL)。

对于新的社会条件及随之引起的意识形态动乱,全国各地的天主教会对此做出的回应都不尽相同。如前所述,文化斗争已经在普占波兰加强了波兰身份和天主教之间的联系。在加利西亚,教会在公众生活中的特权及其对农民独立政治行动的长期敌对态度,起初阻碍了此

地实现波兹南那样的农民—教士联盟。虽然这里的神职人员已积极参与到乡村禁酒运动中,但是一直到 20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教会方面才改变了对民粹主义运动的消极态度。

尽管在 1894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即位后,帝国对波兰王国的政策出现了广受欢迎的全面缓和,但是直到 1905 年,教会在俄占波兰开展公开的社会和教育工作仍一直受到当局的阻碍。“工人修士”(worker-nun)对农村和城市贫穷人口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他们穿上日常的衣服,独居或与家人同住,以此掩盖他们被官方禁止的教士身份。教会参与社会工作受到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的“新通谕”(Rerum Novarum 1891)的激励,该通谕承认工人建立工会和得到公平报酬的权利。这是梵蒂冈面对现代工业社会问题 and 无神论社会主义带来的威胁做出的一个迟来但重要的回应。在此推动下,波兰出现了一场由教会发起的、旨在促进社会和谐和基督教政治社会运动,这场运动深深扎根于普占波兰,且毫不意外地与德莫夫斯基的国家民主党的活动找到了许多共同点。

203

1904 年 2 月俄日战争和 1905 年俄国革命的爆发,使波兰王国的政治和社会分裂明显缓解;革命就像一道 X 射线,让自 1864 年以来在俄占波兰出现的新现实一览无遗。所有政治团体都期盼俄国在远东的冲突会给波兰带来一些利益。波兰王国富有阶级中的保守分子组建了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党派,希望他们公开效忠于沙皇会得到沙皇在宗教、语言和法律上的让步做为奖励。德莫夫斯基的国家民主党则期待取得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另一方面,波兰社会党作为浪漫主义起义传统的继承人,开始准备发起新一轮起义。毕苏茨基为了寻求援助甚至远渡到日本,不料竟发现德莫夫斯基先他一步到达,并且已经劝阻日本不要对一场反俄的波兰革命提供资助。不过,毕苏茨基的确带回一些资金和武器来装备波兰社会党的战斗队。波兰内部的紧张局势在持续滋长。战争不仅中断了贸易活动,而且导致工业产量持续下降,失业人口不断上升。由于糟糕的收成和大范围地抗议俄国军队调用波兰的资源,情况在进一步地恶化。各地游行变得更加频繁,波兰社会党战斗队

开始经常与警察发生枪战。1905年1月22日,俄国军队在圣彼得堡的冬宫外屠杀非武装的工人请愿队伍,“流血星期日”(Blood Sunday)的新闻闪电般地传遍波兰王国,导致一场长达一个月之久的产业工人大罢工,致使全国很快瘫痪。各地学生联合抵制俄国学校,并且要求恢复波兰的教育机构。农民日渐意识到他们的民族性,并对政治斗争做出回应,同样鼓动在公共行政部门更为广泛地使用波兰语。

1905年4月,俄国政府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并废除了一些使用当地语言的限制。受社会主义政党鼓舞的工人抗议活动无视这些举措,仍在继续。农民也开始罢工,要求得到更高的报酬。6月的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将罗兹掌控,但结果导致数百人因此丧生。10月,一次莫斯科铁路罢工引发俄罗斯帝国的全面罢工,使其进一步陷入革命的混乱中。骚乱在波兰王国中蔓延开来,1863年恐怖分子的攻击范围开始扩展到俄国官员和警察身上。好战的波兰社会党与务实的国家民主党间的隔阂因此扩大,之后沦落到互相憎恨的地步。国家民主党谴责反对沙皇政权的不自量力的斗争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行为,同时成立自己的工人组织和战斗队与社会主义者抗争。俄占波兰的革命转变成一场内战。保守的现实主义者和由华沙大主教文森特·波皮耶尔(Wincenty Popiel)领导的天主教会高层,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寻求沙皇政府的帮助来维持受到威胁的社会秩序。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十月宣言”中承诺,将允许波兰政治自由化,并引入俄国议会[Duma,(杜马)]体制,此举使国家民主党和现实主义者信心大增,他们希望恢复波兰政府可以使王国内情绪日益冷静,并且削弱社会主义武装的力量;这个打算使人想起19世纪60年代早期小波兰的情况。但是俄国当局并不准备对波兰人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由国家民主党和现实主义者领导的代表团从圣彼得堡无功而返。11月11日,波兰王国实行戒严法。俄国内部的政治对立仍在持续,革命很可能出现。波兰社会党紧随着12月莫斯科工人起义的脚步,建立了另一支军队试图推翻波兰王国内的沙皇政权,将革命转化成为一次民族起义。但是事件慢慢转变到对当局有利的局面。

俄国军队大体上仍效忠于沙皇,继续击垮俄罗斯帝国内部残余的抵抗力量。波兰王国内的温和派像严格意义上的俄国地区里的一样,仍然愿意参与沙皇承诺的新宪政秩序。但波兰社会党内部出现分歧:年轻的左翼分子准备在俄国进行更广泛的革命,以此为波兰谋取利益;而在毕苏茨基带领下“元老派”(elders)及其秘密战斗部队,仍然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波兰国家。1906年11月,波兰社会党正式分裂成毕苏茨基领导下的“革命派”和左翼,而随后左翼转到社会民主党一边,一如既往地独立带有敌意。毕苏茨基对他的武装力量进行重组,在1907年继续进行恐怖袭击,直到波兰社会党和国家民主党认识到双方两败俱伤的杀戮是徒劳而无意义的。

在革命混乱期,波兰王国内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实现他们的全部目标。沙皇独裁政治依然留存,波兰王国的地位没有改变,戒严法也保留了下来。因革命加剧的仇恨和敌意在波兰社会留下毒害。另一方面,1905年的确也给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人民带来了重要的利益。工人的薪酬和工作环境得到改善,工会合法化,同时有力的合作化运动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得以迅速发展。关于解除众多涉及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活的限制,以及公众使用波兰语限制的举措受到波兰人的广泛欢迎,特别是西固柏利地区的波兰人,因为他们重新获得了买卖土地的权利。一个由55名代表组成的“波兰圈”(Polish Circle)(主要是国家民主党人,并由德莫夫斯基亲自领导)进入了国家杜马。德莫夫斯基已经有充分的打算,准备利用他在议会中的团队进行精明的算计来为波兰人赢得更多的利益,承担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雷德蒙(Redmond)合法的爱尔兰自治党(Irish Home Rule Party)那样的角色。毋庸置疑,1904—1907年的戏剧化事件提高了更广泛地区城乡人口的政治意识,并且给予激进分子以鼓励。另一方面,对于许多有产者和天主教神父来说,国家民主党作为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和一切革命方式的力量,其吸引力也不断增长。

维尔诺大主教爱德华·诺普(Edward Ropp)试图建立一条广泛囊

括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天主教阵线,但此举并没有获得成功,这表明新的民族忠诚在历史上的立陶宛人中也在生发。立陶宛在1904—1905年间的政治煽动已经赢得了在小学和乡村行政部门中使用立陶宛语的让步。在白俄罗斯人中也存在一些确实的迹象,表明民族主义在这个东部最落后的民族中也取得了进展:他们得到允许出版自己的第一份报纸,可用拉丁语和斯拉夫语编辑的《我们的土地》(*Nasha niva*)。在俄罗斯帝国的乌克兰激进主义分子中,只有极少数人对与波兰的联系感兴趣,绝大多数人倾向于与更大的俄国激进组织合作,特别是亲农民的俄国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和俄国社会民主党(Russian Social Democrats)。

1905年波兰王国革命产生的连锁反应对加利西亚产生了一定影响,它鼓励左翼党派攻击由保守分子支配的宪法秩序,使奥地利选举体系民主化的要求取得成功:1907年,全体男性获得选举和被选举入奥地利国会的权利。但是这引发了一系列连锁效应。1905年,国家民主党已经确立为加利西亚的一个主要党派,通过建立两个议员选区来保证加利西亚东部持续的波兰影响力。他们做出更进一步的尝试,准备废除利沃夫的加利西亚全国议会中以阶级为基础的选举团,但是直到1914年,这次尝试仍毫无进展,在复杂的政治交易中陷入困境,导致波兰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1908年,总督安德烈·波托茨基伯爵(Andrzej Potocki)遭到一名乌克兰学生刺杀,而他温和的继任者、历史学教授米哈乌·鲍布任斯基于1913年在由国家民主党领导的、为促进两个团体和解的运动中被迫辞职。在1913年,国家民主党成功地分裂了农民运动,将由文采蒂·维托斯(Wincenty Witos)领导的右翼(PSL Piast)争取过来。左翼农民团体现在转向毕苏茨基的亲独立的社会主义者。而造成这个时期波兰政治持续分裂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巴尔干半岛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以及关于欧洲全面战争的不祥预感。

波兰人应该如何应对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可能性,这不可避免地会对波兰的政治设想产生影响。一些相互有



图 33 1908 年在格罗德诺固柏利举办的一个狩猎聚会。当地波兰贵族聚集在格罗德诺东部[今天白俄罗斯的格罗德诺(Hrodna)的韦索夫斯津查(Wężowszyna),那里也是斯坦尼斯瓦夫·佐洛斯基(Stanisław Żółkowski)的家乡]。尽管 19 世纪曾受到沙皇的压制,昔日立陶宛的大约 60% 的土地在 1914 年仍然掌控在波兰人手中。该区域的波兰人、波兰化贵族政府以及贵族生活最终随着 1939 年苏联的入侵而终结。

分歧的战略方针出现了,基于不同的地缘政治考虑和意识形态偏好,还有受奥占和俄占波兰不同的生活经历的影响。加利西亚许多保守派和民主党人强烈意识到,波兰人只有在奥地利才能确实享有完整的政治和文化自由,因此青睐所谓的“奥—波方案”;在战时,之前的波兰王国将会隶属于加利西亚,成为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三位一体国家的第三个组成部分。然而,加利西亚越来越活跃的政治和思想风潮同样也鼓励更多冒险性的概念产生。在文学和艺术方面,青年波兰(The Young Poland/Młoda polska)运动[其在克拉科夫最突出的先锋是斯坦尼斯瓦夫·维斯皮安斯基(Stanisław Wyspiański)]向加利西亚上层集团传统的保守主义与安于现状发起了新浪漫主义的挑战。维斯皮安斯基创作的、混合神秘观念和民族神话的戏剧造成的影响在人群中闪电般地传播开来。他的历史剧《十一月夜晚》(*November night*)(1904)背景设

置在1830年的华沙,维斯皮安斯基借用希腊神话中德墨忒耳(Demeter)、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的故事来有力且诗意地表达了对波兰重生的信心。1905年,加利西亚当局要回了以前的瓦韦尔王宫(“波兰的卫城”)——之前一直用作奥地利军队的兵营,此后修复回以前壮观的样子——并非没有象征意义。

毕苏茨基在1908年移居加利西亚,并在奥地利军方头面人物的默许下组建了一支半正规化的步枪队。毕苏茨基发现这里有许多学生和青年人被他超凡的魅力所吸引,并且准备加入他的步枪队,考虑到上面已讲到的种种情况,这种局面就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了。此时的毕苏茨基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他现在学习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并为成为波兰的武装解放者做准备。当这支步枪队被认可为一个成立于1912年的、亲独立的大联盟的军事组织时,它的地位得到提高。这个联盟包括加利西亚大部分左翼党派以及波兰社会党在波兰王国控制的诸多团体的代表。按照设想,在战时,毕苏茨基1万人的步枪队将与奥地利人一起作战,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要在俄占波兰内部发动一次起义,并最终成为未来波兰军队的核心力量。在这样的氛围下,国际主义者左翼的影响在波兰逐渐减弱。

德莫夫斯基的主张与毕苏茨基截然相反,在1908年他提出:沙皇俄国不是关键问题,德国帝国主义才是波兰民族存亡的根本威胁。他认为一次大规模的欧洲战争并不能造就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从短期来看,最现实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新统一所有波兰的土地作为沙皇统治下的一个自治单位。德莫夫斯基呼吁俄波和解,倡导新斯拉夫主义(并且强调全体斯拉夫人的平等性),这是一个世纪前亚当·查尔托雷斯基的一些理念的回响。而且像查尔托雷斯基一样,德莫夫斯基发现,对于他的“现实”计划,无论是拉拢俄国当局还是他的同胞都绝非易事。与此同时,在斯托雷平(Stolypin)首相及其继任者管理下的俄国政府继续对西部疆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其中包括犹太人、芬兰人和波兰人。无论如何,俄国当局的行为是对德莫夫斯基的一记掌掴:1907年,国家杜马中波兰代表的比例被削减掉三分之二,并且关于波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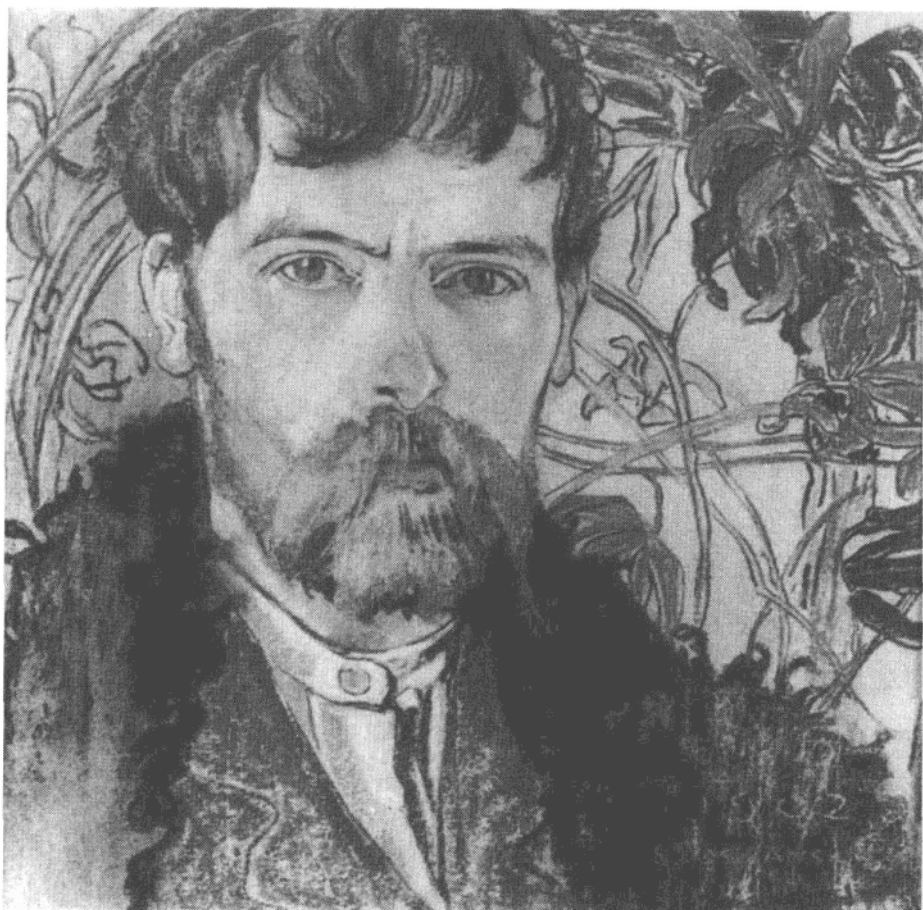


图 34 斯坦尼斯瓦夫·维斯皮安斯基(1869—1907)在 1902 年的自画像。他不仅是一位剧作家、诗人、画家、家具和纺织设计师,还是形象艺术的创新者,维斯皮安斯基是“青年波兰”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提倡新浪漫主义运动涌现出的最杰出和最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也是现代波兰戏剧的缔造者,其剧作借用了波兰历史上的悲剧故事和希腊古典神话。维斯皮安斯基的艺术生活和克拉科夫城市有着紧密的联系。

210 自治的请愿也遭到否决。1911 年,地方议会终于引入西部固柏利,但是以向俄国人倾斜的限制公民权作为基础;同样,在 1913 年引进波兰王国的地方选举委员会上,俄国官员得到了不成比例的投票权。1912 年被证明是波俄关系明显恶化的一年:海乌姆地区从波兰王国分离出去,并在行政和法律上合并到俄罗斯帝国,成为一个新的俄国**固柏利省份**;俄国政府收购了华沙-维也纳铁路并遣散了大量波兰雇员。在华沙最中心地带,新完工的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St Aleksander Nevsky)

东正教大教堂,成为俄国统治“维斯瓦边区”的不朽象征。

在这样的环境下,德莫夫斯基对地缘政治的考虑似乎已没什么意义。许多不再对他着迷的青年人和更激进的追随者正式退出国家民主党,并转到毕苏茨基一边。为了应对这次严重的人员流失,德莫夫斯基从1911年开始越来越强调宣传反犹太主义。他号召举行一次对犹太人商店的联合经济抵制,此举在波兰王国大部分较低层的中产阶级中得到了赞成的回应,虽然这导致他疏远了足够多的选民,以至于1912年在杜马选举中失去了自己的席位(代表华沙)。尽管他们遭到一系列挫败,国家民主党以其远伸的触角和声称对爱国主义的垄断,仍为波兰王国内最大的政治派别。

德莫夫斯基的反德意志精神在普占波兰找到异常肥沃的土壤,那里在1902年后德国人与波兰人关于土地和语言的争斗愈演愈烈。农民米哈乌·佐兹玛乌(Michał Drzymala)的案例生动说明了此地的土地斗争:他公然挑衅1904年限制波兰人在新购土地上建造房屋的权利法案,把一辆马戏团大篷车开进自己的土地并住在里面。佐兹玛乌虽然最终败诉,但其诉讼案持续了很多年,一直上诉到普鲁士最高法院,影响非常大。柏林在德国东部推行的移民政策并不总是如预期的那样成功,许多在东部的德国人为了在工业领域寻求更好的高薪工作更倾向于移居到德国西部。波兰人设法继续顽强地保住他们已经拥有的土地,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前景是黯淡的:在波兹南尼亚和但泽波美拉尼亚(西普鲁士)的地主和上层资产阶级中,德国因素已经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在1908年引入的一个政府法案首次批准强制购买属于波兰人的土地。

211

其他形式的行政压力也接踵而来。首先是德语替代波兰语作为小学宗教教育语言。小学生和家长从1901年直至1906年持续进行大范围的抵抗活动,最终在藤条、罚款甚至入狱手段下屈服。无数城镇和乡村都被改用新的德语名字,而1908年也开始限制在公众集会场所使用波兰语。德国额外的文职人员和老师被直接派往波兹南尼亚,使该省在德意志帝国人口规模上拥有最高比例的国家官员。这一切都是国家

民主党的福音,其对普占波兰的大多数波兰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得到扩大。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上,国家民主党主宰着“波兰圈”的议会代表,令其在1912年投票反对为德国海军计划进一步投贷。国家民主党能够在波兰所有地区以及三个占领国的议会中建立起一个积极协调的政治体,这已经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成就。

212 随着1914年逐步临近,一个事实已无法遮掩:因为不同的政治偏好、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民族忠诚性,以及由于被瓜分的状况和前波兰各地区与三个非常不同的帝国分别融合而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差异,原联邦共和国的土地已变得四分五裂。没有一个可被看做“波兰”领土的区域在民族性、宗教和语言方面拥有绝对的同质性:西部和西北部地区有无数德国人,在中部和东部有大量高度多样化的犹太人团体,当然在东部还有大量的非波兰人口。不同的历史经历强调了本地特性,并且形成了波兰身份的不同区域特点。由于其是说波兰语的人最大的集中地,以及拥有以华沙为中心进行密谋和起义的历史传统,普占波兰毫无疑问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波兰的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也正是在这里首次出现,同样,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和现代民族主义者也是在此举行大规模的运动。尽管加利西亚的社会秩序十分陈旧,但是其作为自由政治和文化表达中心的地位不容低估。在这里,来自俄占波兰的密谋者和流亡者都可以找到避难所;在这里,来自波兰所有被瓜分地区的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到波兰的大学里学习;在这里,像波兰在格伦瓦尔德战役中战胜条顿骑士500周年这样伟大的民族纪念日都可以公开地庆祝。同样在这里,波兰人得到了议会政府最广泛的经验(奥地利式的),并发展了本地的专业文职官员和教育学者群体,1918年后这些人在一个独立的波兰起了重要作用。而普鲁士的波兰人通过承受并对抗普鲁士的统治,不仅经济上变得强硬,而且处事也变得老练起来。

现代文明的标志:有轨电车、豪华饭店、电话(1883年首次在华沙和罗兹引入)或者巴黎人的流行风尚,在所有被瓜分的波兰的主要城市都可以观察到。电影也正在向各省进军。但另一方面,在中部和东部地区仍存在着大量拥挤的城市贫民窟,在那里,非犹太人和犹太人家庭

竭力维持悲惨的日常生活。乡村仍在受贫穷和疾病困扰。先前波兰王国的较大城镇中每 800 人配 1 个医生,乡村地区每 3 万人配 1 个医生的比率,仅从一个方面展示了这一地区深刻的城乡差异。事实上,在更先进的德意志帝国与奥地利和俄罗斯帝国内的那些前波兰领土上,可以追溯到一条明确的文明化断层线。在文化水平、农业和工业生产力、城市基础建设、生活总体质量方面,普占波兰都大大超过其他地区。同时,也正是在普占波兰,教会和国家民主党的影响也最强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在波兹南尼亚,犹太人口的比例是历史上属于波兰的区域内最低的。

波兰分裂的三个部分在行政管理上的不同标准和质量,同样也帮助塑造公民行为的不同文化。在俄占波兰,完全逃避政府的规定和规章制度被视为藐视沙皇政权;这是众所周知的;1918 年后在复国的波兰,这成为一种影响力极大的习惯。对此有许多相关轶事,其中一则是说有一个犹太商人住在三个帝国的交汇点附近,他抱怨德国税务官员从不受贿,俄国官员一直受贿,而奥地利则从不十分确定受不受贿。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使各区域之间产生普遍的偏见;有很多笑话是关于“加利西亚的守财奴”、“迟钝的波兹南尼亚人”,或者关于华沙臭名昭著的“骗子”的。上西里西亚(在普鲁士)和毗邻的布罗沃盆地(俄占波兰)的工业社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直到今天仍反映为两个地区的足球俱乐部间存在的强烈敌意。

然而虽然存在种种地区和社会的差异,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仍然在发挥作用。尽管没有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但是从 1864 年开始,波兰民族意识已经在城市和乡村中说波兰语的人中广泛传播。越来越强调种族语言上的民族同一性,就意味着波兰文化的影响在东部逐渐消退、在中部得到巩固,而在西部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 1 550 万说波兰语的人在维斯图拉河盆地、瓦尔塔河还有奥得河上游一块相对而言连成一片的区域内居住。另外 130 万人居住在东加利西亚,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 1/3。还有大约 200 万波兰人零星散布于俄国西固柏利的各处,在维尔诺地区则有大批集中居住。



图 35 位于加利西亚的利沃夫的市政剧院(Teatr Miejski),建于1897年至1900年间。这是欧洲当时最现代化的剧院之一,并且也是20世纪早期波兰戏剧展演的中心场所之一,虽然还没有达到与克拉科夫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这个舞台初次登台演出的较为人熟识的演员是路德维克·索尔斯基(Ludwik Solski)和海伦娜·莫德耶斯卡(Helena Modrzejewska)(在英语世界以 Modjeska 为人所知)。照片摄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即纳粹占领东部加利西亚期间。

波兰人独特的民族意识通过多条文化纽带得到发展,这些纽带跨越了边境,联接了各个社会阶层。同一种文学语言以及共同的文学传统(时间可回溯到16世纪),将所有受教育的波兰人连接起来,不论他们身居何处。在边境线的两边,诗歌、小说、戏剧以及学术成就相互交汇往来。读写能力在大众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发展。同一个波兰语阅读圈的存在下面的实例中得到生动说明:1911年显克微奇的畅销冒险小说《茫茫荒原》(*W pustyni i w puszczy*)同时在华沙、维尔诺、波兹南和利沃夫的波兰语报纸上连载。在奥占或俄占波兰的主要城市,



图 36 维尔诺(维尔纽斯)的黎明之门圣母像(Lady of Ostra Brama/Aušros Vartu Madona)。这幅肖像是一个不知名的本地艺术家大约在 1620—1630 年间绘制,很可能是以一幅 16 世纪佛兰德的印刷物为基础。对黎明之门圣母的祭祀从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盛行,自那以后蔓延至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罗马和希腊天主教以及东正教都尊崇这尊圣母像。

伟大诗人和作家的诞辰得到盛大地欢庆纪念:在 1898 年伟大的浪漫主义吟游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诞辰百年之际,华沙、克拉科夫和利沃夫都竖立起他的雕像。波兰的大学以及克拉科夫和利沃夫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吸引了波兰所有地区的学生,并把他们汇聚到一起。记者、医师、科学家和音乐家跨国参加专业集会。历史学和科学研究得到显著的发展;印刷业和剧院百花齐放;本土电影业起步;卡罗尔·希曼诺夫

斯基(Karol Szymanowski)和伊格纳采·帕德列夫斯基的音乐成就;亨里克·显克微奇(1905年获诺贝尔奖)以及斯蒂凡·热罗姆斯基(Stefan Żeromski)和瓦迪斯瓦夫·莱蒙特(Władysław Reymont)(1924年获诺贝尔奖)的文学成就,更不用说克拉科夫的波希米亚艺术环境,这一切使人真切地相信:在1914年前的20年左右时间里,波兰经历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文化活跃期。

尽管罗马天主教会对国家民主党有潜在的不和倾向,但是传统天主教在波兰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整合角色,在乡村和传统虔诚的主要地区仍然占有优势。我们这么说不是要轻视一些地区已经建立的但相对较小的说波兰语的新教、伊斯兰教和亚美尼亚社区的存在,但正是罗马天主教凸显了波兰人与主要信奉新教的普鲁士人和东正教俄国人之间的区别,更不用说对并未同化的、讲意第绪语的犹太人社区。波兰语的赞美诗、颂歌、宗教节日以及平安夜大多数波兰家庭晚餐的热烈气氛,这一切都形成了强大的民族情感纽带。一年一度,成千上万波兰各地的人们前往朝圣,在琴斯托霍瓦向黑色圣母神殿、在维尔诺向黎明之门圣母堂以及在其他没那么著名的圣母堂朝圣,又将这一纽带普及到了更广泛的层面。

波兰确实存在于文化领域中,虽然极少有普通波兰人能预料到再统一和独立会如此早到来。当1914年7月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欧洲上空时,只有极少数人能预见到大量的人员伤亡、大范围的物质破坏以及意料之外的政治变迁,而这个流散的民族将很快经历这所有的一切。

第六章 独立,得而复失 (1914 — 1945)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波兰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境遇。自往昔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破灭以来,这是首次三个瓜分国(或他们的继任国)成为互相厮杀的交战方:一边是德国和奥匈帝国(轴心国),另一边是俄国与法国和英国的联盟(协约国)。上个世纪的一些爱国主义者曾经认为,只有通过一次欧洲大战才能诞生出一个独立的波兰。然而就波兰独立而言,没有任何事是必然会发生的。虽然战争双方都对他们的波兰人民发出了全面呼吁,但是对于他们中任何一方来说,波兰独立都不是他们最初的战争目的。然而到1918年末,一个独立波兰国家的核心部分已经形成。这有赖于三个东方帝国的意外瓦解,以及波兰人已准备好利用这个有利形势。

217

战争的爆发使波兰人分裂成不同的阵营。反俄的毕苏茨基第一个采取行动,急于经奥地利当局同意在战争中建立一支独立的波兰军事力量。1914年8月,他的步枪队侵入前波兰王国,但以失败告终;当地人民对于起而反抗俄国人的呼吁无动于衷。结果,毕苏茨基的军队不得不接受奥地利更严厉的控制。但之后步枪队在加利西亚前线对抗俄军的功绩播下了传奇的种子,将毕苏茨基提升到波兰的上天眷顾之人(man of providence)的地位。但是在1914年和1915年之交,毕苏茨

218

基的事业似乎前途渺茫。国家民主党人不仅对毕苏茨基的反俄战役充满敌意,而且他们对1914年8月14日俄国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Nicolas Nicholaevich)大公发表的声明表示欢迎,虽然他只是用半宗教并且含糊的言语号召建立一个重新统一的、受俄国沙皇统治但有自治权的波兰。的确,亲俄情绪在波兰王国的人民中起初占据优势。俄国人甚至建立了一支归俄国指挥的波兰志愿兵武装力量,用来抵抗毕苏茨基的兵团。

战争的第一年并没有为波兰人带来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利益,反之造成大量的苦难和毁坏。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被招募到三个不同的阵营成为士兵,随后发现自己是在为沙皇或其他两个皇帝而自相残杀。东部前线位于昔日波兰的国土境内,当地的经济资源遭到交战双方无情地剥削。1915年8月,轴心国对前波兰王国领土的全面占领极大地改变了战争局势。俄国对华沙近百年的统治划上了句点,德莫夫斯基和国家民主党以及现实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也撤到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他们在那里继续吃力不讨好地游说沙皇政府,希望使其更明确地表明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由于缺乏进展而倍感挫败,德莫夫斯基在1915年11月离开俄国,转而前往英国和法国活动。与此同时,德国人以做出重大让步来诱骗波兰人:波兰语被允许在当地政府、法院,特别是在教学中使用,并且一所波兰大学和工艺学院也得以重新开放。哈布斯堡波兰王国的理念暂时在维也纳得到传播,但是奥地利人最终让步于柏林的提议,因为一个在德国控制下的小波兰傀儡国可以为德国战争机器充当炮灰。1916年11月5日,德国和奥地利皇帝颁布法令,宣称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波兰政权。但波兰王国仍旧没有确定的边境线和君主,同时其临时国务委员会(Provisional Council of State)仅仅被授予咨询权。尽管如此,这还是一次突破之举。毕苏茨基同意领导新波兰王国的军事部门,但其坚持要成立一支波兰常规军必须以建立一个真正的波兰国家为条件。不过当时德国人并没有打算接受这个条件。

219

虽然俄国人从他们的波兰土地被驱逐出去,但受到其西部盟军的

鼓励也对德国的先发之举做出了回应。1917年1月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将重建一个与俄国结成同盟的、自由和再统一的波兰作为战争的目的之一。当“二月革命”颠覆了罗曼诺夫王朝,波兰未来的兑现得到了新的进展。受到波兰自由主义者亚历山大·莱德尼茨基(Aleksander Lednicki)的鼓励,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政权和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宣称他们支持一个独立的波兰,但却将边境议题留给了未来的俄国制宪会议(Constitute Assembly)。临时政府不仅允许在俄国的波兰人组建自己的军事编队,并且同意在法国创建一支波兰军队与协约国并肩作战。既然俄国盟友已经公开批准波兰的独立,法国和英国在对波兰问题的态度上也不再感到拘谨,承认德莫夫斯基的波兰民族委员会(Polish National Committee)(1917年8月在巴黎成立)为“波兰官方组织”。

虽然就目前而言波兰的前景是成为协约国的一员,至少在名义上如此,但国家的本体仍是由轴心国所决定。毕苏茨基和他大多数军队拒绝以“军事兄弟”宣誓效忠于轴心国,此举毁灭了柏林筹集“波兰国防军”(Polnische Wehrmacht)的计划,并迫使德国人对波兰抬高他们的出价。毕苏茨基因为自己的无礼举动被投进监狱。但在1917年9月12日,轴心国赐予波兰相当于“地方自治”政府的政权:由三人组成的波兰王国摄政委员会(Regency Council),其具有可以任命一个全权控制教育和司法事宜的政府的权力,以及一个部分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但依旧没有国王。坐镇波兰王国摄政委员会的三位人士都具有极高的名望和身份:华沙大主教亚历山大·卡科夫斯基(Aleksander Kakowski)、兹·卢博米尔斯基公爵(Zdzisław Lubomirski)和约瑟夫·奥斯特罗夫斯基(Józef Ostrowski)伯爵。但是摄政委员会成立没多久,东欧的政治和军事前景又经历了因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夺取权力而导致的再次动荡,而且布尔什维克政权已经做好与轴心国签订一份单独和约的准备。随着先前的俄罗斯帝国分崩瓦解,德国在东部的优先权和战略也相应改变,这对其波兰傀儡王国极为不利。柏林承认乌克兰和立陶宛的建国,同时奥地利人也同意在东部加利西亚以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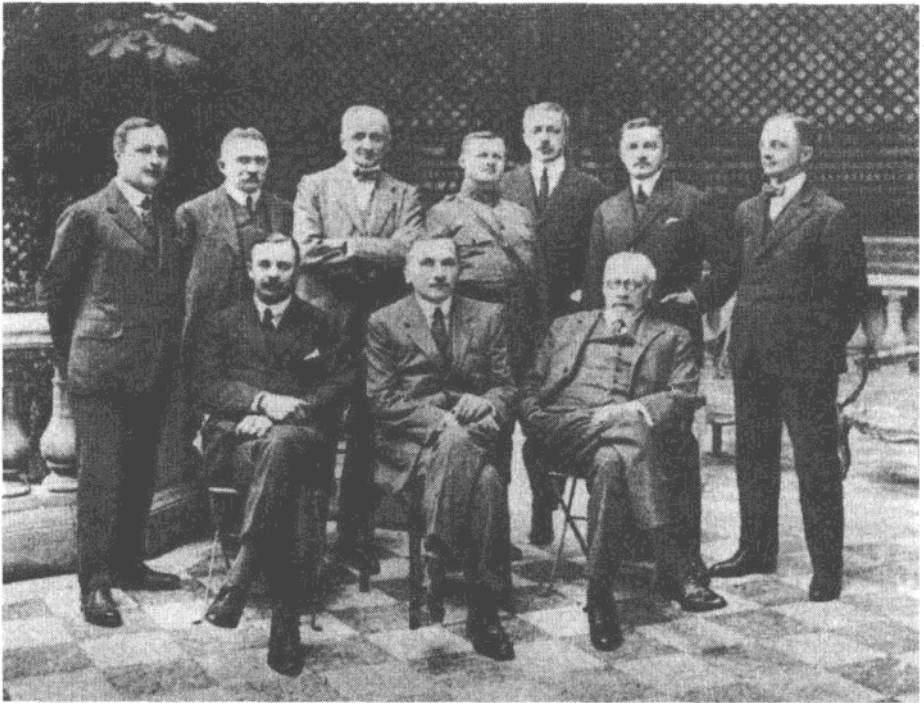


图 37 1918 年波兰民族委员会在巴黎。罗曼·德莫夫斯基就座于前排中央。其左边是波兰最大的地主莫里茨·扎莫伊斯基伯爵(Maurycy Zamoyski),右边是埃拉兹姆·皮尔茨(Erazm Piltz),他曾经在圣彼得堡生活,是一名保守政治家和批评家。在凡尔赛和会上,委员会作为一个正式的波兰代表团,于会期间迫切要求削弱在东部的德国势力。虽然德莫夫斯基是波兰最主要的政治领军人物之一,但是他仅在 1923 年担任过一次外交部长的要职。

221

君主制建立一个乌克兰王室领地。1918 年 3 月 3 日,与布尔什维克俄国签订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条约》,巩固了轴心国在东部获得的全面胜利。鉴于柏林的目标是将德国东部边境扩张到前俄占波兰的土地,波兰王国的剩余国土很明显只会成为受德国统治的中欧(Mitteleuropa)从属国。

然而,波兰的命运并未完全掌握在德国的手上。在大西洋两岸由德莫夫斯基和帕德雷夫斯基领导的、为波兰独立事业而展开的积极活动,对各国政府和舆论带来了显著的冲击和影响。1918 年 1 月,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14 点和平纲领”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纲领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并使其拥有出海口。《布列斯特-里

托夫斯克条约》使俄国退出了战争,而在1918年3月至5月间,德国在西线进攻的失利排除了协约国曾经关于波兰的任何犹豫。1918年6月3日,协约国正式将恢复波兰的独立认定为战争目标。波兰人也没有被动地等待:在俄国组建了一支拥有3万人强大阵营的波兰反德军队,而在法国,由约瑟夫·哈勒(Józef Haller)将军领导的波兰军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志愿兵,其中有许多人来自美国的波兰社群,他们在法国与西线盟军并肩作战。

随着德国和奥匈帝国明显的衰败,以及对获得独立不断增长的期望,波兰政治权力的争斗在主张独立的左翼与国家民主党之间重新打响。然而,在一次企图从摄政委员会手中夺取政权失败的尝试中,国家民主党人只给自己带来了嘲弄,摄政委员会无论如何都希望逃避德国的监护。奥匈帝国在10月末的土崩瓦解将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化。当地波兰人控制住切申西里西亚和加利西亚西部的部分地区。在卢布林,由社会主义者达申斯基领导、受毕苏茨基盟军支持、主张独立的左翼人民政府于11月6日—7日成立,宣称与华沙的摄政委员会对抗。工人委员会在东布罗沃盆地和其他工业中心出现。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柏林社会主义政府在11月9日的创建,以及德国驻军撤离华沙的重要决定,都为波兰的独立事业扫清了障碍。12月,波兹南尼亚的波兰人民拿起武器从德国人手中夺得对他们省份的控制权。

曾经在1914年统治波兰的三个帝国已经不复存在;难以置信的事已经发生。但是一个统一的波兰仍然面临着地区不和与相互冲突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而如今这些争斗已悉数公开化。11月10日,毕苏茨基结束在德国的囚禁生涯回国,为随后戏剧化的事件提供了催化剂。他的作用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他作为一名为民族自由而战的斗士的传奇事迹、他来自左翼却愿意超越党派之争,以及他被囚禁在德国的16个月,都为他在那些不顾一切地试图脱离战时贫困并对独立感到欢欣鼓舞的人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11月11日,在华沙的德国军队自行解除武装。同一天(后来成为波兰独立纪念日),摄政委员会委任毕苏茨基作为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三天后,摄政委员会将国家元首之位和

独裁大权授予毕苏茨基,随后自行解散。11月18日,卢布林的人民政府也承认毕苏茨基的权威,同时新的国家元首任命社会党人英德烈·莫拉契夫斯基(Jędrzej Moraczewski)为总理,领导一个左翼政府。毕苏茨基的地位非常牢固:他得到保守派摄政者的批准,受到主张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和各个农民党派毋庸置疑的支持。为了给再生国家赢得更受欢迎的支持,莫拉契夫斯基的政府引入一套广泛的社会改革和福利措施,以及8小时工作制;政府同样还承诺进行强制性的土地改革。但和谐并未就此到来。国家民主党对毕苏茨基的权威表示愤恨,波兹南尼亚主要由国家民主党领导的行政体系仍然拒绝承认华沙的左翼政府。“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DKPiL)及其同盟在1918年12月合并组成了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Poland),一起拒绝承认波兰独立,把希望寄托于当地工人委员会,或爆发一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世界革命。

223

战争使工业陷入瘫痪,超过4/5的产业工人被迫失业,交通通讯受到严重破坏,农业产量跌至谷底,贫困和营养不良开始侵蚀这片土地。大约有40万波兰人在为三个帝国军队服役期间献出生命。而如今,由原波兰王国和加利西亚西部组成的新国家,同样需要面对严重和棘手的边境问题。它与在东加利西亚建立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展开了激烈地争夺利沃夫的斗争。当红军紧随着撤出俄国的德国武装西进(依照1918年11月停战规定)时,当地民族运动提出对地区冲突索赔的要求时,波兰和俄国之间的边界局势开始朝着不祥的方向恶化。而波德之间边界的精确定位,则不得不等待凡尔赛和会的决定。

协约国仍然承认由国家民主党领导的、设在巴黎的波兰民族委员会作为波兰的正式官方代表,而不认可在华沙的政府。对毕苏茨基来说这再明显不过了:如果波兰想要在和会上施加任何有效的影响,民族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这只有通过与国家民主党达成妥协才能实现,并尽早举行民主议会选举才能得到巩固。受此启发,他采取了一项旨在缓解国内紧张局势的措施:让著名的钢琴家帕德列夫斯基(Paderewski,他得到国家民主党的高度尊崇)代替莫拉契夫斯基,领导

无党派专家组成的政府。1919年1月的选举以普选权和比例代表制为基础,制造出一个碎片化但是相对更平衡的全国议会。国家民主党获得其中1/3多一点的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而中间派(包括文森特·维托斯领导的波兰皮亚斯特农民党)和左翼(包括左翼的农民党派和社会主义党派)大约各占30%的席位。共产主义者联合抵制选举的呼吁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

2月20日,新议会采取了依据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制定的所谓“小”宪法:部长对全国议会负责,同时议会负责选举国家元首,而元首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力。毕苏茨基仍为元首,但有效的宪法权力不大;然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位给他带来相当可观的影响力。确实如此,在独立几个月内就创建起一支大型国家军队的确算是初期的非凡成就。在2月底,重建的波兰共和国(第二共和国)^①最终得到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承认。现在波兰共和国面临着保护自己边界这个艰巨的任务。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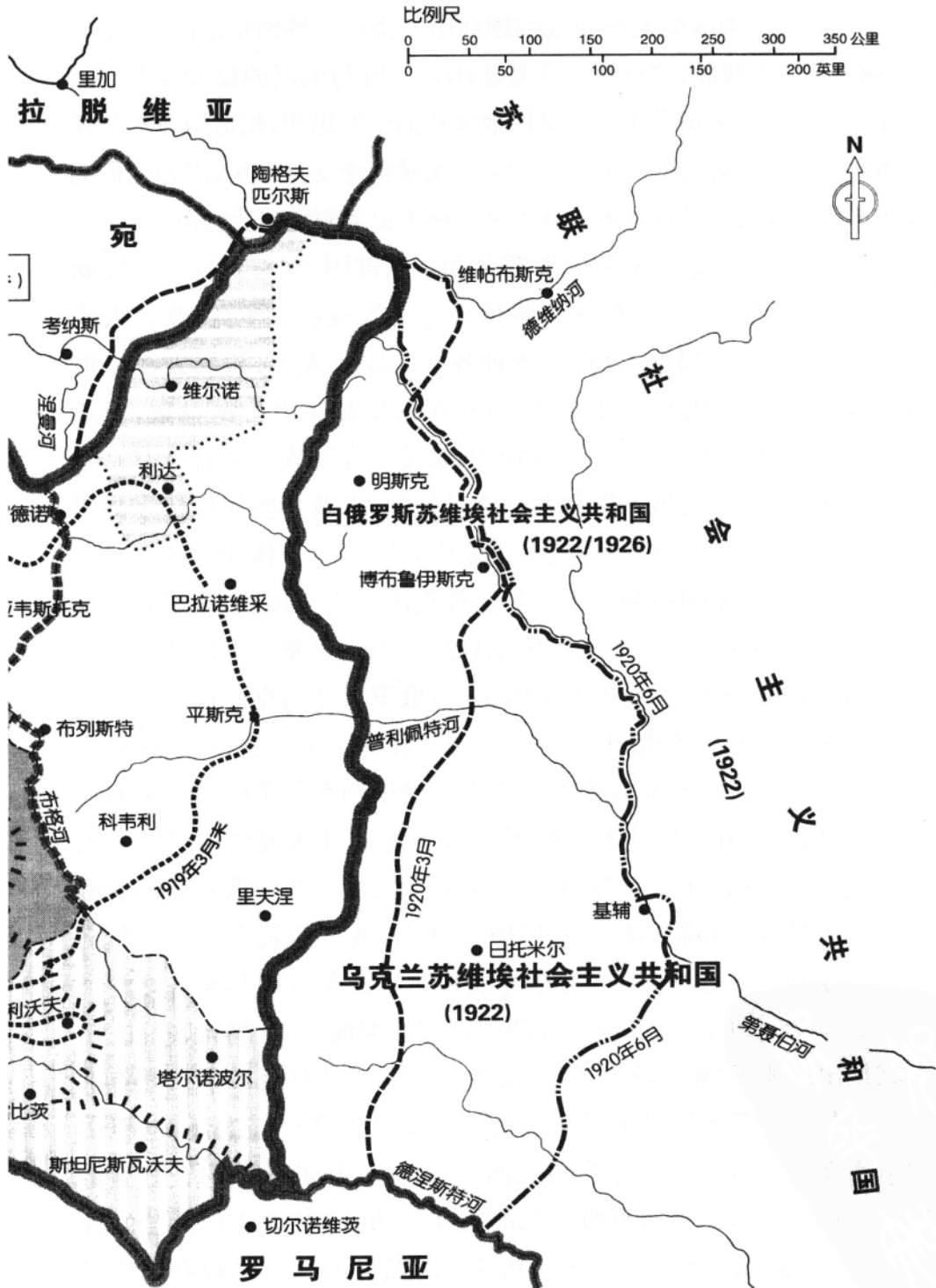
波兰的西部边界和它的出海口被证明是凡尔赛和会上最具争议的领土议题。德莫夫斯基扩大领土的要求受到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挑战而不得不做出修改。《凡尔赛和约》(1919年6月28日)将波兹南尼亚和维斯瓦河下游的大部分波美拉尼亚地区(西普鲁士)全部归还波兰,使波兰得到了直接但却狭窄的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但波兰同时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但泽(格但斯克)是波兰由来已久的天然港口,但是拥有大量的德国居民,遂成为一座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监督管理下的、在波兰海关境内的自由市;上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南方部分地区的未来命运将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

在东南部地区,波兰人灭了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占领了加利西亚东部,因此许多当地乌克兰爱国者认为波兰才是他们国家的主要敌人。由于在和会上乌克兰的事业得到一些协约国的支持,这个大省

^① 1918年11月建立的波兰共和国在历史上被称为波兰第二共和国,以表示它是1795年被俄普奥三国灭亡的波兰共和国的延续。——译者注



地图 8 波兰国家的新生(1918—1923)



的未来尚难定论。而未来俄国西部边境的问题甚至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当时这一地区尚处在内战的剧痛中。协约国特别是法国,希望白俄军队在 1919 年获胜,这样将会恢复法国较早时与俄国的反德联盟。国家民主党也同样本着德莫夫斯基早期地缘政治学的思想,相信与非布尔什维克俄国存在迁就融合的可能性。而毕苏茨基拒绝支持白军,因为他们的传统民族主义比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表现出更多的反波兰意识。

225 对于波兰在原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东部国土(有着复杂的民族和宗教多样性)上的角色,存在着两种相冲突的观点。毕竟,波兰人或者波兰化的罗马天主教徒、地主、各种各样的职业人士,和失去社会地位(*déclassé*)的小贵族和农民一样,虽然在这里数量上占据少数,但是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十分重要。狭隘的国家民主党民族主义者号召完全吞并立陶宛、大部分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以及那些他们认为依照民族特性可有效吸收到统一的波兰国家内并同化为一体的地区。另一方面,毕苏茨基的爱国精神并不是基于现代民族伦理标准,而是大部分归功于之前立陶宛公国多民族的传统思想。他觉得波兰可以领导建立一个包括多种族的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广大东欧联邦来反对复活的俄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宝贵机会,可实现更广泛的地区安全。波兰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抵制有利于民族国家的任何联邦化结构,而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土地上,主要是维尔诺地区大多数说波兰语的精英(所谓的“地方主义者”)以及一些白俄罗斯民族激进主义分子赞成联邦制的概念。1919 年 4 月,波兰武装力量从维尔诺和明斯克驱逐了布尔什维克,为毕苏茨基建立大东方联邦准备好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毕苏茨基参照中世纪晚期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辽阔疆域提出的所谓“雅盖洛理念”,很明显只能通过对战布尔什维克俄国才能达到。尽管遭到国家民主党的反对及其左翼同盟的质疑,但由于面临着布尔什维克要将革命传到西方的意图,毕苏茨基的计划赢得了批准。把仍存争议的加利西亚东部放在一边,波兰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并且同西曼·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e)领导的乌克兰政府组成了对抗红军的军事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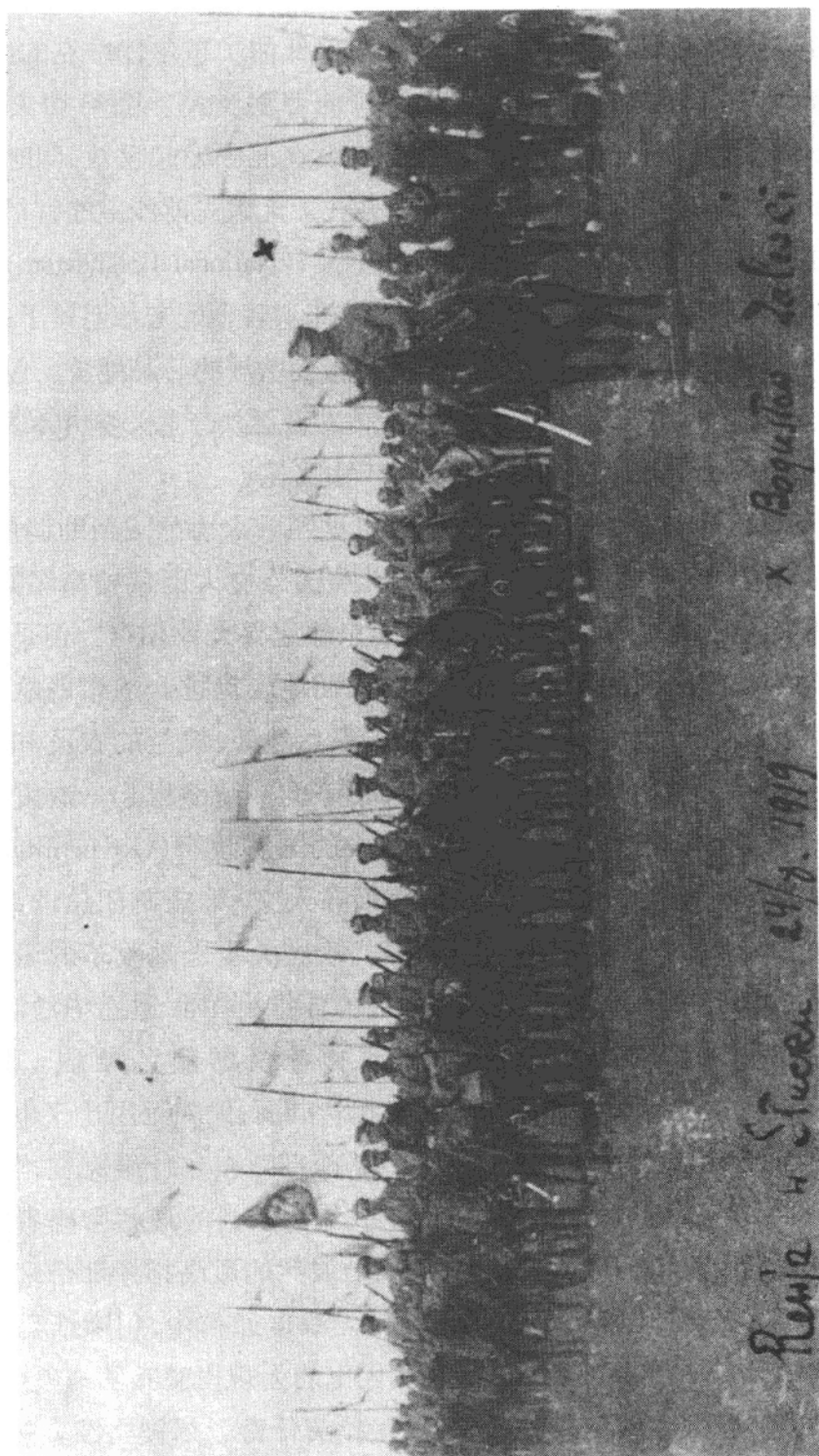


图 38 1919 年 8 月,波兰的骑兵在白俄罗斯的新卢茨克(Slutsk)。

1920年4月25日,波兰人和他们的乌克兰同盟发起了进攻;5月7日,他们攻占基辅。但好景不长,波兰人不仅低估了布尔什维克的实力,而且过高地估计了乌克兰人对彼得留拉的普遍支持。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将军指挥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在北部发起反攻,同时布琼尼(Budenny)将军领导的骑兵在南部进行攻击。无数先前沙皇的官员被波兰的攻击激怒,重新举起“民族布尔什维主义”(National Bolshevism)的火炬。波兰人不得不开始撤退。现在轮到列宁来实现他的宏伟愿景了;红军跨过“资产阶级波兰”残骸,将无产阶级革命带到欧洲的的心脏地带。包括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内的波兰共产主义委员会站在红军行进的前列,开始着手使他们的国家共产主义化。

229

面临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波兰政府试图寻求协约国帮助调停,勉强接受所谓的“寇松线”(Curzon Line,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命名)作为东部临时的分界线。其与原波兰王国的东部边界大致相符。但是布尔什维克党无视停战的提议,继续向着维斯瓦地区挺进。遍布西欧和德国的工人与工会对波兰的“侵略”表示抗议。然而,波兰的农民和工人并不欢迎红军,无神论的布尔什维主义带来的威胁激发起一次爱国主义热潮的爆发。7月24日,由各党派组成的国防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Defence)在华沙成立,农民党领导人文·维托斯任总理,富有经验的社会党人伊·达申斯基任副总理。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激进方案有利于压制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当布尔什维克军队逼近华沙时,成千上万包括学者和男学生在内的志愿者根据颜色结盟。魏刚(Weygand)将军领导下的法国军团并未扭转局面,他的无用建议也没有被采纳,但是毕苏茨基在8月16—18日从南部对布尔什维克在华沙东部过度扩张的战线进行大胆反攻改变了战局。波兰的译解密码者解读出大量红军的无线电信号,这在战斗期间给波兰的最高指挥部带来决定性的优势;他们同样也能挤进布尔什维克无线电通信中,用摩斯码广播创世纪的部分摘录内容。在最后那场现代化的大规模骑兵团战役中,双方均有2万名骑兵参战,布琼尼的军队在扎莫什奇近郊被击溃。随后9月在涅曼河(Niemen),波兰的再次胜利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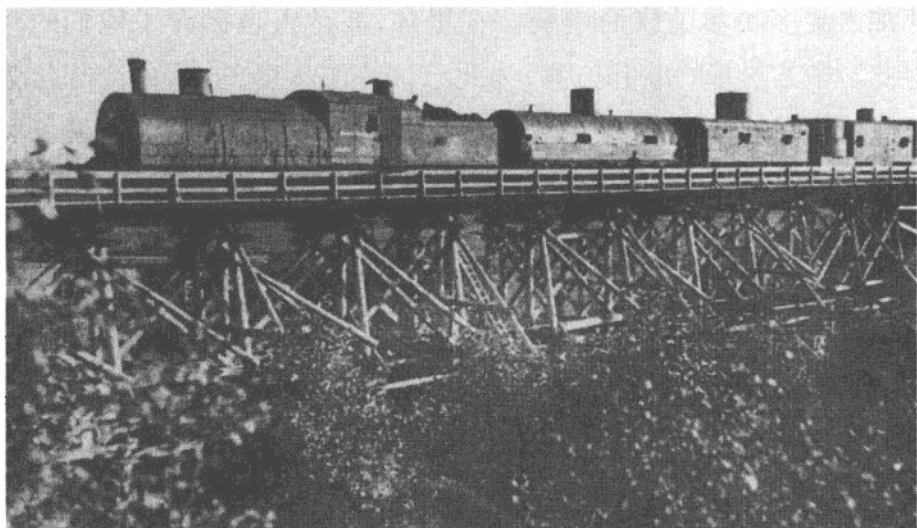


图 39 1920 年在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期间的一辆波兰装甲火车“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号(*General Sosnkowski*)。1918—1922 年间波兰边境的长期争斗见证了波兰军队的快速发展,从 1918 年 11 月的 6 000 人发展到 1919 年秋的 60 万人,并在 1920 年 7 月达到 90 万人。这支军队综合了不久前服役于不同甚至对立的军队的军官和士兵,这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部前线的堑壕战不同,再生的波兰和布尔什维克俄国之间从 1919 年到 1921 年之间的战争,是跨越东欧这个广袤区域、具有相当规模机动性的战争之一,并且大量骑兵和装甲火车也参与其中。

自从 1683 年索别斯基在维也纳郊外的胜利以来,波兰军队就再没有迎来这样的胜利;但是“维斯瓦河畔的奇迹”也只是以微弱优势取胜。1920 年如果布尔什维克俄国取胜的话,这对已经麻烦缠身的德国和西欧将施加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只能推测。波兰人喜欢这样想,在 1920 年,是他们从布尔什维克游牧部落手中拯救了西方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回报了一些协约国战胜德国对他们的帮助,这些在 1918 年为波兰独立创造了最初的可能。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以 1921 年 3 月 18 日《里加和约》作为结束。该和约将边境线确立在如今著名的“寇松线”以东一点,更靠近由主张社会同化论的国家民主党人设想的界限;参予和谈的波兰代表团受反对毕苏茨基联邦制度的国家民主党人斯坦尼斯瓦夫·格拉布斯基(*Stanisław Grabski*)的支配,他拒绝了布尔什维克割让明斯克的提议。国家民主党非常在意其选举地位会因

东部加入更多少数民族而削弱。在里加,波兰人也抛弃了他们的乌克兰盟友。毕苏茨基的联邦方案,为此已经流了太多的血,如今却化为泡影。但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欧洲革命的雄心也已经被遏制。莫斯科萌生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念,同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也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部分妥协。

1920年夏天,新生波兰为了生死存亡而与布尔什维克作战,这让羽翼未丰的波兰国家无法有效地对东普鲁士南部宣称它的领土主张。那里讲波兰语的马祖里人的民族身份仍然是不确定的,他们压倒性地投票支持继续接受德国的统治,而不是冒着风险进入到一个可能由布尔什维克治理的波兰旗下。同时,捷克人就他们占领具有争议的切申工业地区获得协约国的承认,这个举动破坏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余下的时间里波兰与捷克的关系。波兰也和德国关于中欧主要的工业区域之一的上西里西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直到1921年10月问题才得以解决:根据公民投票的结果,国际联盟分割了这一地区,波兰仅获得29%的领土以及46%的人口和大多数矿山和工厂。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将会得到相当多的地方自治权。

新的立陶宛国家宣称维尔诺市为其历史上的首都,但该市的人口以讲波兰语和意第绪语为主。1920年10月,在毕苏茨基非正式授权下,自称为当地反抗组织的波兰武装将其夺取。但是毕苏茨基关于立陶宛以两个州的建制(包括维尔诺)与波兰结成联邦的提议遭到立陶宛人的拒绝,随后又遭维尔诺地方议会否决,该议会于1922年1月投票赞成该地直接并入波兰。在一个民族主义的年代,使用多种语言的旧立陶宛公国是无法重建的。立陶宛人对维尔诺的失去并不甘心,他们在考纳斯(Kaunas)建立了临时首都,并直到1938年仍坚持与波兰处于正式的交战状态。在20世纪20年代,波兰创建一个波罗的海安全区的尝试也因此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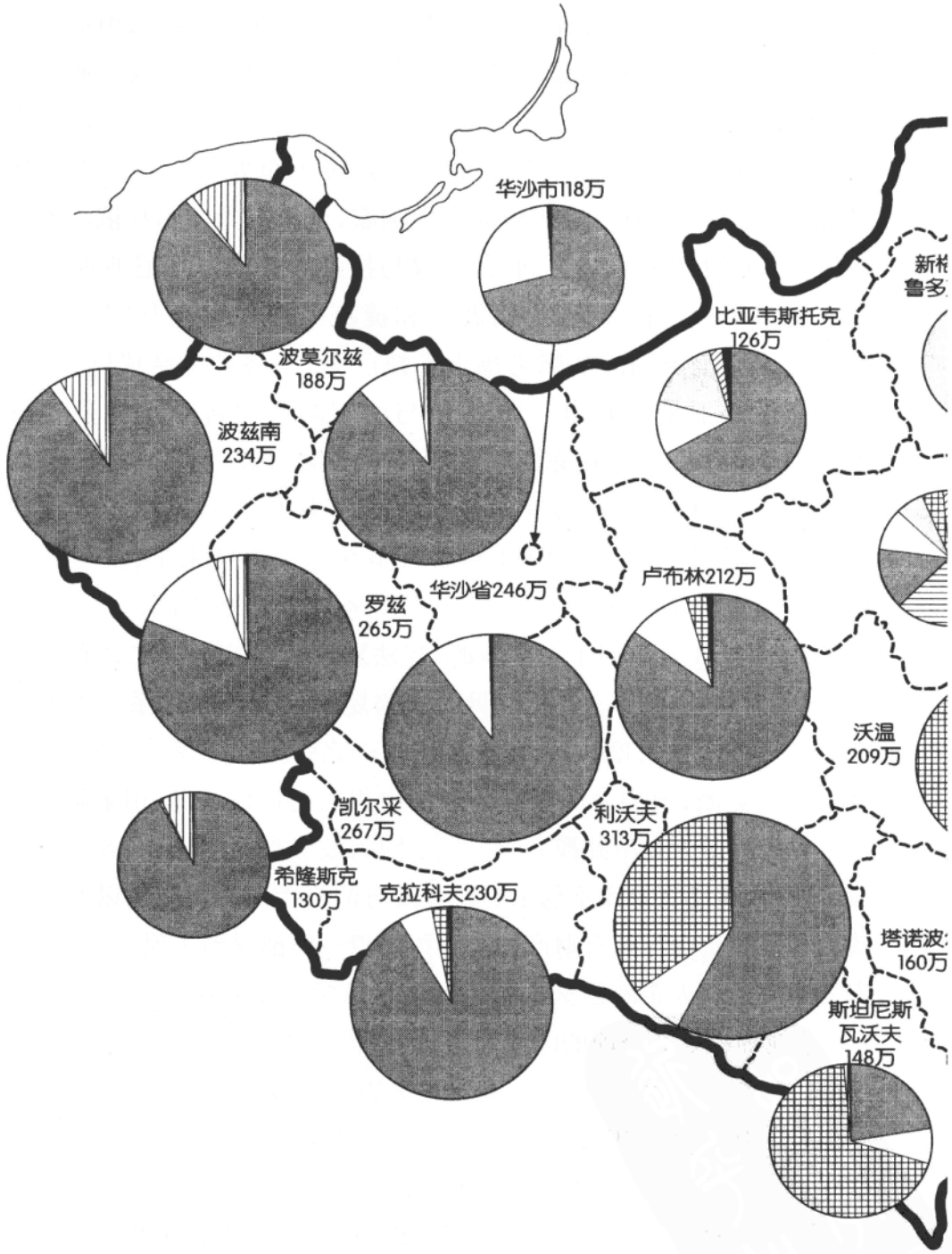
直到1923年3月,巴黎的大使会议(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同盟国的日常执行机构才最终确认了波兰的东部边境。至此,这些边界争端已持续了4年多,几乎与最终解决前奥斯曼帝国领土问题所耗时间相差无几。比起中欧和东欧其他多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重新划定

过的边界线来说,波兰的这条边境线也没公平到哪去。大多数波兰人现在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内;不过,在1921年,组成波兰国家1/3人口的少数民族已将近270万。波兰的西部边界与民族语言上的分界线大致吻合(也大致与波兰被瓜分前的边境线)吻合,但东部的情况则大不同,在那里,战略上的考虑是极为重要的。更让人担忧的是,波兰成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独立国家,仅只因为德国和俄国的暂时疲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仅与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保持了睦邻友好关系。但在今天看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当时因在切申问题及双方完全不同的战略考虑上各持己见,始终未能结成同盟,这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件好事。1921年与法国的联盟暂时提供了对抗德国的安全保护,但是在东部,没有大国承担为波兰防护的义务。另外,波兰的主权也因要遵守国际条约,顾及国内少数民族的合法律权利而受到限制。1918—1921年种种争斗的最终结果是,波兰人对自己的军事能力抱有过分的信心,却开始不相信众多强国。

1921年3月采用了一部新的《宪法》,象征着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巩固;但同时也引进了一个被证明太过繁复的议会政府体系。国家民主党担心毕苏茨基再度执政,阻止了出现一名强大的国家元首的可能性。至于左翼党派,他们力保在议会选举中引入比例代表制,用来阻止国家民主党作为最大党派独揽大权。但是因为波兰议会至少由18个党派组成,这一代表制将导致不稳定的联合政府的产生。公民权利以及广泛的政治和宗教自由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样都得到了保障;1920年还率先实施了众人企盼已久的土地改革。这项改革对于一个农民所有的1/3田地都小于2公顷的国家而言,意义非常重大。但事实证明,这次改革的力度有限。另一方面,1918年先进的社会福利系统得以保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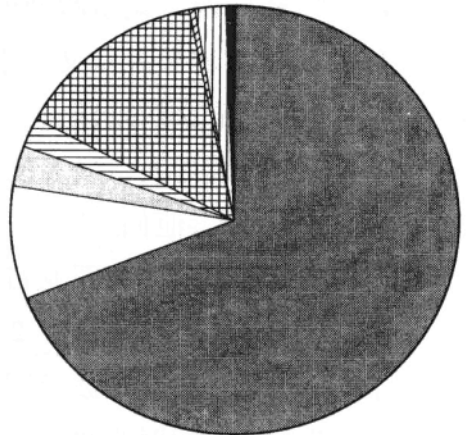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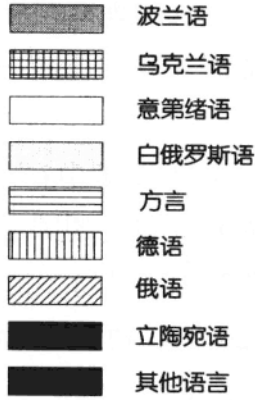
在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政治和军事剧变之后,生活开始回归到常态。1920年爱国热情的爆发和战后重建,对消除早期社会的紧张状态贡献良多。随着原先各个分治地区在经济和行政管理方面逐渐再次融合到一起,新国家的权威也开始在国家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中体现出来。得到大力扶持的国家教育体系和国家军队为超区域的民族认同的形成提

234



地图 9 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波兰：包括众多民族和信仰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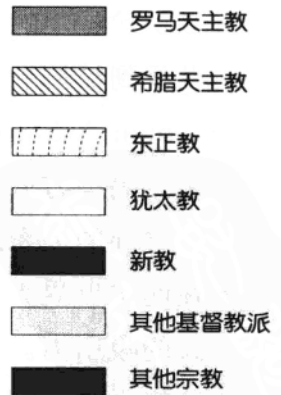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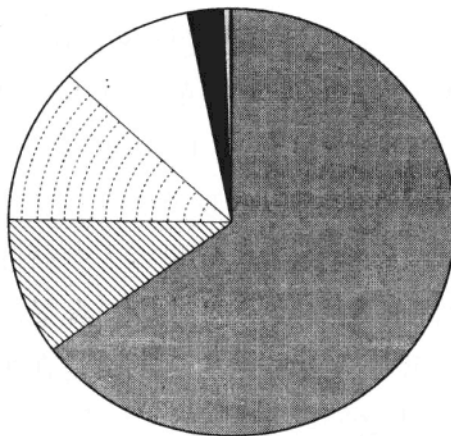
根据语言分类的民族(1931年波兰的普查):
 地图上的每一个圆形代表了一个省份及其人口数。
 华沙市做为一个单独省份。圆形中的分割代表了百分比。



注意:

- 1 乌克兰语包括鲁塞尼亚语(ruski),此种语言在普查中做为一个单独的种类。
- 2 意第绪语包括希伯来语,有7.8%的犹太人宣称使用该语言,虽然他们日常生活中并未使用。
- 3 有707 000人说白俄罗斯语的波里希人宣称“方言”是作为他们的母语。

1931年宗教信仰状况



供了两个重要的熔炉。然而,新的国家缺乏成熟稳固的宪政传统,各地区仍然实行着四种不同的法律体系,而遗留下的三种不同的铁路系统也阻碍了交通的发展。俄国市场的瓦解和丧失迫使波兰的工业重新自我定位,转向西方竞争激烈的市场。巨大的地方差异仍然存在,体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大众文化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国内少数民族的存在则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差异。

乌克兰人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并且其数量超过 400 万人,他们之中许多人仍对建立自己的国家有着强烈的渴望。从 1919 年起,东加利西亚自治的理念已经引起了诸多讨论,但事实上却毫无任何实质结果。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的确发动了一次反抗波兰国家的地下战争。乌克兰人的民族主义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波兰产生了严重动摇其政治生活的影响。在 150 万白俄罗斯人中间也有社会动荡的迹象。至于德国人,在 1921 年有数不胜数的人已经离开波兰,但是仍然有将近 100 万人留下了作为少数民族,他们居住得很分散,却在经济和社会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前德国区域的这些人对他们与德意志帝国的分离表示十分愤恨。1921 年,高度多样化的波兰犹太人口达到大约 220 万人,他们中超过 4/5 的人口使用意第绪语作为他们的母语。波兰人的民族热望与绝大多数犹太人背道而驰,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对波兰独立充满敌意,但犹太知识阶层中的许多成员是愿意与波兰国家合作的。在波兰爱国者中可以找到被同化的犹太人,例如著名的历史学家西蒙·阿什肯纳奇 (Szymon Askenazy),他是 1920 年至 1923 年间波兰派驻国际联盟的代表。另一方面,国家民主党提出的反犹太主义对毒害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影响甚大,在许多年轻犹太人中增强了共产主义(犹太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组成了波兰共产党员的 1/3)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吸引力。然而,犹太人对波兰生活无论是在医药、法律还是文学方面的贡献,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都是巨大的。诗人朱利安·杜维姆 (Julian Tuwim)和作家布鲁诺·舒尔茨 (Bruno Schulz)为波兰-犹太文化的良性融合提供了实例。

随着独立的实现,波兰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都从为民族事业而战的职责中解放出来。一些人仍然参与政治,作为毕苏茨基及其军团传说的辩护者,或者作为波兰普通劳动生活评论员,而其他人则开始探索新的表达形式。其中最具创造性的是抒情诗人组成的斯卡曼德尔(Skamander)诗社,他们抓住了异国情调、两性和超现实主义的主题。在他们之中最突出的人物是画家、剧作家和小说家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采·维特凯维奇(Stanisław Ignacy Witkiewicz),简称为“维特卡希”(Witkacy)。

由于1920—1921年国家非常时期的结束,国家民主党恢复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他们在1921年6月推翻了维托斯的中-左派政府,并且以所谓的基督教民族统一同盟(Christian Union of National Unity)来巩固右翼的力量,但是1922年11月,他们没能在议会选举中确保大多数席位。一个月后国家民主党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上的失败,以及加布列尔·纳鲁托维奇教授获得左派、中派还有少数民族议员的支持胜利当选,这些都让国家民主党恼羞成怒。12月16日,一名国家民主党狂热分子暗杀了新当选但尚未就职的总统。当时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暴行正在到处肆虐,波兰很勉强才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波兰第一任总统的谋杀事件没有给蒙羞的国家民主党带来任何直接利益,他们被迫感到有必要先收缩一下,并懦弱地接受由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ładysław Sikorski)将军领导的强大政府,并选举有经验的社会党人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霍夫斯基(Stanisław Wojciechowski)为总统。

国家民主党人不得不承认,为了建立“一个波兰多数人的政府”,他们将不得不做出妥协。1923年5月,他们与维托斯的中间派政党,即议会中的第二大党农民党-皮亚斯特(PSL-Piast)达成了协议,组成由维托斯领导的联合政府。为了回报国家民主党对一次温和土地改革的支持,农民党-皮亚斯特转向右翼,并认可国家民主党限制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通过让军队听命于战争事务部以削弱毕苏茨基影响的计划。毕苏茨基于是辞去了军队总参谋长的职务。但是3月就已经开始的经

237

济衰退对中右派的胜利造成了打击。通货膨胀爆发造成普遍的大破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农民用借自国家的资金在1919年可以买12匹马,而在1923年8月他偿还债务的钱只能买1公斤肉。社会穷困程度和罢工次数不断增长,毕苏茨基的鹰派,以及分别拥护宪政和革命的左翼势力都希望从中获益。随着紧张局势加剧和恐怖分子施加暴行,维托斯政府决定打击左翼;10月,政府用军队控制罢工的铁路工人。在11月5日一次由社会党人发起的全面罢工中,罢工者与军队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皮亚斯特党因对土地改革的提案而发生分裂后,维托斯政府失去了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并于12月正式倒台。

政治和经济灾难性的前景使得主要党派开始冷静下来理智思考。温和的非党派政府于12月在严厉的瓦迪斯瓦夫·格拉布斯基(Władysław Grabski)领导下成立,并得到全国议会的授权来稳定金融,控制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在1923年6月至12月之间,波兰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从7.1万:1狂跌至430万:1。格拉布斯基的金融紧缩政策,加上严厉的税收征纳,给通货膨胀踩了一脚刹车,恢复了国家的信心。1924年4月引入了一种新的流通货币——波兰兹罗提(złoty)。但是格拉布斯基改革的效力被1924年的一次粮食大歉收和1925年初由德国(波兰一半的外贸交易都是与德国开展的)掀起的危害严重的关税战争而变得无力。

238 德国确实居心不良,与打击波兰的经济举措一道推出的,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公开宣布,意图恢复因《凡尔赛和约》而沦陷给波兰的领土。而德军领导人冯·塞克特(von Seeckt)将军从1919年起,就将毁灭所憎恨的波兰视为他的最终目标。1922年,魏玛德国与苏联签订《拉巴洛(Rapallo)条约》就已经使波兰人警醒,如今波兰人又极度不安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在鲁尔(Luhr)危机后,法国的影响力被削弱,而德国通过成为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其国际地位大为恢复。德国西部边界的不可侵犯通过1925年10月的《洛迦诺(Locarno)条约》由西欧国家做出保证,但并没有延伸到德国的东部边境线。无论是一个与德国的仲裁条约,还是一个十分无力的法波互助条约,都无法掩盖波兰承受局势逆转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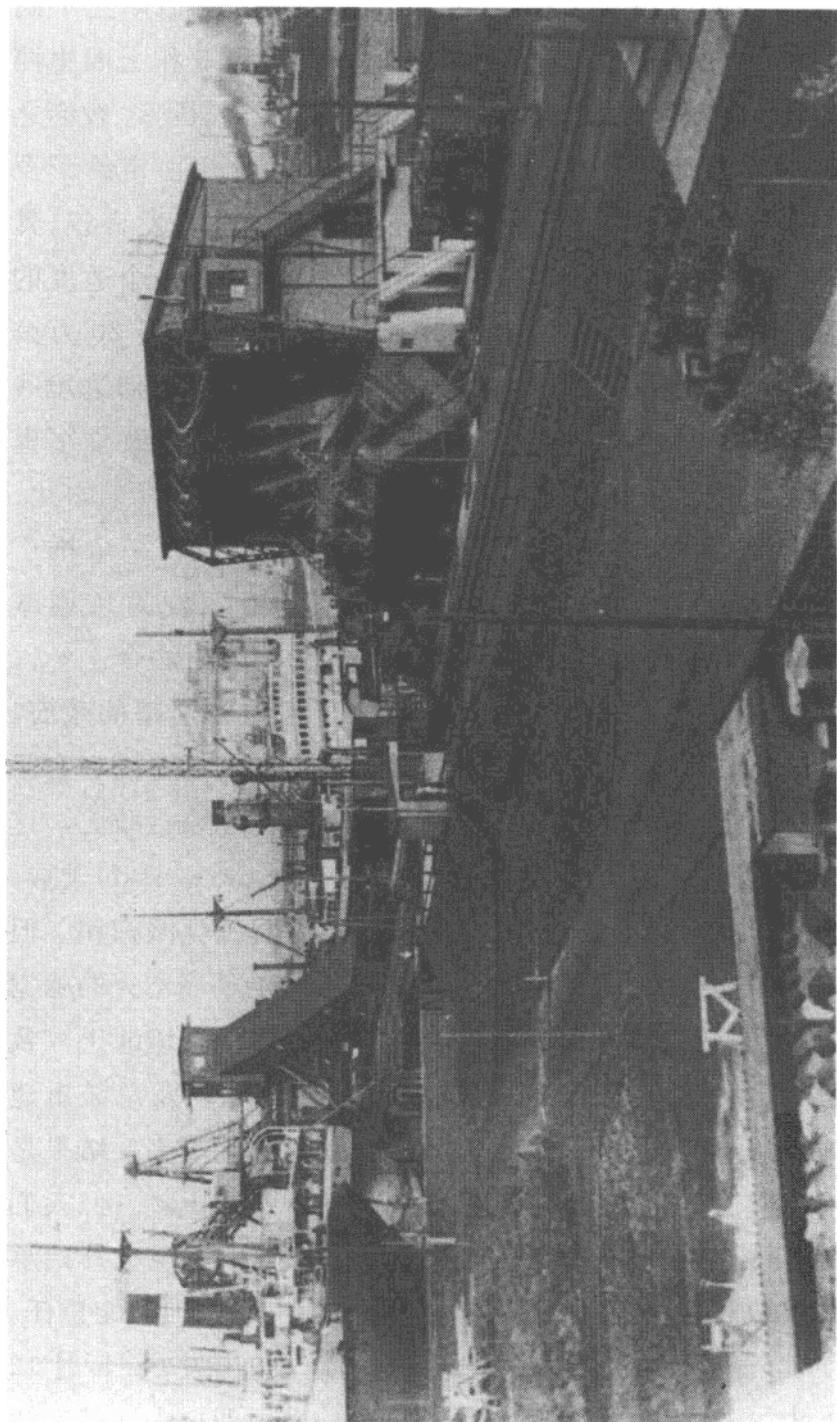


图 40 20 世纪 30 年代波兰新兴的格丁尼亚港。从 1921 年一个拥有 1 000 人的渔村,格丁尼亚在 1939 年发展成一个人有 12 万人口的城市。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它赶上格但斯克成为波兰的主要港口。1938 年,波兰贸易总额的五分之四(在吨位上)和超过五分之三(按照价值)都通过海路进行。通往波罗的海的“波兰走廊”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波兰经济的生命线。

在国内,格拉布斯基的政府在社会生活其他重要领域获得成功。1925年开始修筑新的港口城市格丁尼亚(Gdynia),与格但斯克不同的是,这个港口位于波兰的主权领土范围内,而格丁尼亚和上西里西亚之间的铁路使出口波兰的煤变得便利。1925年2月,国家-教会之间的关系因一个政教协定的签署而变得更加有序,这个协定给予罗马天主教相当多的特权,作为回报,政府在任命主教时有发言权,梵蒂冈还承认了波兰新国家的边境。1925年12月通过了一个适度的土地改革方案,规定基于自愿原则,在10年期限内,每年将20万公顷的大庄园土地分给农民所有。政府还压制住了在漫长东部边境线上苏联煽动的动乱,其方式为创建一支特殊的边境武装,并鼓励军事移民,虽然后者遭到来自当地非波兰人口深深的怨恨。确实如此,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官方政策变得更加冷酷。1924年,一个推广双语学校的法律导致在东加利西亚单一乌克兰语学校的急剧减少;同年还出台了一条禁止在政府机构使用乌克兰语的法令。

1925年11月,卷土重来的经济危机压垮了格拉布斯基的政府。受到另一次政治危机可能发生的前景和军队中毕苏茨基的追随者有骚乱迹象的警醒,主要党派暂时放下恩怨,组建了一个大型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由冷静的亚历山大·斯克任斯基(Aleksander Skrzyński)领导,他是一名著名的外交官和上届政府的外交部长,无明确党派归属。但是波兰政府年轻的议会体系已经时日无多。一种政治秩序幻灭的感觉在逐渐显现,通过财政丑闻和对于处理持续不断的经济困境缺乏一致意见而加剧恶化。1926年5月5日在斯克任斯基辞职以及总统重建格拉布斯基的无党派管理层失败之后,事件发展到紧急关头。结果是农民党领袖维托斯在5月10日再度领导一个中右内阁执政。但人们对1923年维托斯糟糕的管理的记忆仍然鲜活。毕苏茨基现在开始承担起从他视为腐败和喋喋不休的那类可鄙政客手中拯救国家的重任。他从位于华沙郊外的休养所苏莱尤夫科(Sulejówek)出发,于5月12日带领政变军队行进到首都。在跨越维斯瓦河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大桥上的一次戏剧性的会晤中,总统沃伊切霍夫斯基拒绝了毕苏茨基改选

政府的要求。在毕苏茨基的军队和政府军之间战斗三天后,总统和维托斯两人都同意辞职。一次由社会主义者煽动的铁路工人罢工阻止了支持政府的援军到达华沙。毕苏茨基的政变得来自所有非共产主义左翼派别、波兰的工业家以及包括许多犹太组织在内的广泛人群的欢迎。只有国家民主党控制的波兹南尼亚出现了大规模群众抗议。虽然毕苏茨基领导的1926年的政变具有独特的波兰式起因和鲜明的波兰特色,但是它确实提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欧洲大陆议会制度脆弱性的又一个实例。

毕苏茨基无意担任独裁者这一公众角色,更倾向于部署手下的人去实现他的最终目的——将一个强大的总统制政府引入波兰。受到威慑和羞辱的全国议会使政变合法化。毕苏茨基青睐的社会党人、著名的化学家伊格纳采·莫希齐茨基通过国民议会选举当选为总统。另一位不从属于任何党派的教授卡齐米日·巴尔泰尔(Kazimierz Bartel)间歇性地任职总理直到1930年。直到1935年去世,毕苏茨基一直作为国家的战争事务部长和总司令保持着对军队的控制。

241

毕苏茨基的政变代号“萨纳齐”(Sanacja),意指要使国家政治体制恢复“健康”,此后建立的政权也沿用此名直到1939年。^①萨纳齐政府强调纪律、反腐和对国家的忠诚,希望以此凝聚更广泛的跨区域的人民,包括少数民族。1927年政府采取了意义重大但有限的措施,来废除一些从沙皇帝制时期沿用下来的前俄占波兰地区的反犹太人的限制性法律。而在沃里尼亚(Volhynia),在地方长官亨里克·约瑟夫斯基(Henryk Józewski)的领导下,当局自1928年起做出了相当可观的努力来使乌克兰人的爱国精神与波兰国家相协调一致;这些措施虽然最终实效并不显著,但是已经足够提高斯大林对波兰、对苏维埃乌克兰

^① Sanacja 在波兰语中意为“健全化”,人们习惯上把五月政变后的毕苏茨基政府称作“萨纳齐政府”。——译者注



图 41 1926 年政变。毕苏茨基元帅(左数第 4 人)于 1926 年 5 月 12 日率部跨越波尼亚托夫斯基大桥进军华沙,在忠诚的军官的陪同下面对总统沃伊切霍夫斯基。他宣称:“对我来说,合法的道路已经封闭”。他曾经希望通过军事游行就能推翻维托斯的中右政府。但事实证明这行不通,随即发生的战争失去了 379 人的生命。

242 意图的怀疑。波兰形式上保留了一个多党派的议会制度,但是在 1926 年 8 月《宪法》被修改,增加了总统解散议会和颁布法令的权力,以及决定国家预算的权力。虽然没有政党直接受其支配,但毕苏茨基间接地通过他在中左党派中忠诚的追随者,以及陆海空三军和民政管理部门中由他提拔上来的人来施加影响。不希望禁锢在左派立场上,并且决定削弱右翼,毕苏茨基巧妙地策划了一次与波兰社会中的保守阶层的亲善之举:这些人包括贵族地主、工厂主,甚至还有曾经充满敌意的天主教会。

毕苏茨基的政权通过 1926 年至 1929 年之间波兰经济的显著发展得到进一步巩固。文化生活的发展步伐也同样加快,不论是根据新闻和期刊的数量来衡量,还是通过无线电广播的数量——从 1927 年的 12 万提高到 1930 年的 24.6 万。基础教育的发展尤为显著,而社会保障制度也得到完善。考虑到 1921 年波兰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这些都是

显而易见的进步。然而虽然对农产品的需求给农民带来了实质的财富利润,但 1925 年土地改革还是不能充分解决乡村人口过多的紧迫问题,特别是在南部地区。人口压力一直在以大规模移民到美洲的方式进行缓和,法国也是移民的重要目的地,它在 1925 年至 1930 年之间单独接受了 32 万波兰移民;大多数人前往里尔地区的矿区,那里如今仍是法国最大的波兰人聚集地。在 1930 年国内仅有 3 万辆家用小轿车,换算为千人轿车拥有率的话其占有率仅为德国的 1/9,这些数据有力地说明了波兰的相对贫困。维持波兰三军的花销在 1929 年消耗掉国家支出总额的 35%,对一个处于地缘政治敏感地带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负担。

毕苏茨基巩固他的政权的条件现在已经成熟。尽管他厌恶党派政治,但还是意识到在议会中需要一个正式的、支持政府的政治团体。于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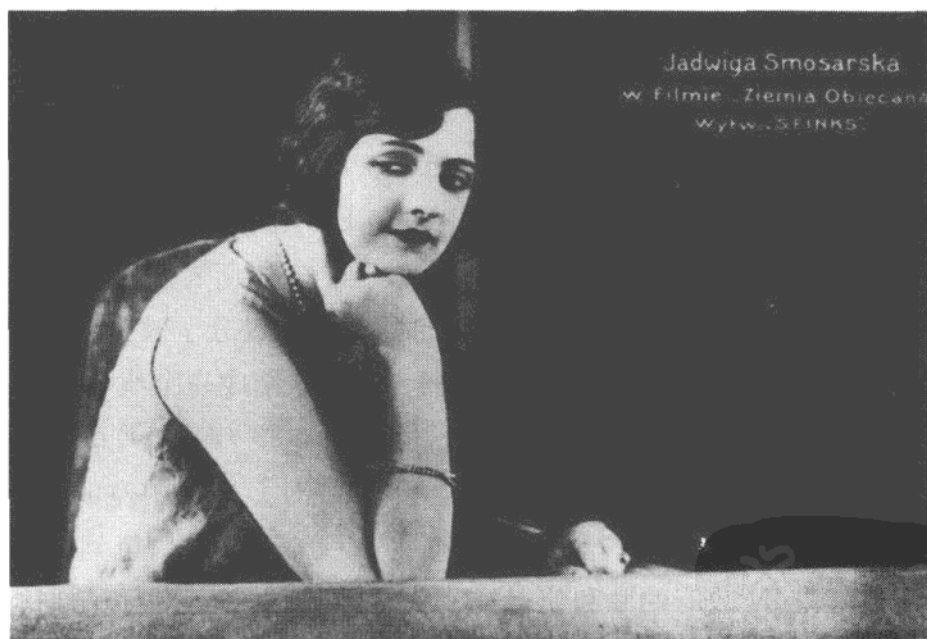


图 42 两次大战之间时期波兰电影界的伟大的明星之一:雅德薇嘉·斯莫萨尔斯嘉(Jadwiga Smosarska, 1900—1971)在 1927 年电影《福地》中的造型照(参阅图 29)。在 1919 年至 1937 年之间,她出演了 25 部电影,还常常在舞台上表演。是她这一代人的典型,和其中许多人一样,战争迫使她背井离乡前往美国。在 1958 年之后和 1970 年返回之前,她屡次重游波兰。

是在1928年初他组织了“同政府合作的无党派同盟”(BBWR),涵盖了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个人;该组织的两个指导原则是为国家服务和对元帅效忠。虽然1928年的选举看到了国家民主党和皮亚斯特党的明显衰落,但是BBWR仅赢得议会1/4的席位,还是不足以通过全国议会推行修宪运动。一场针对全国议会中的反对派的长期消耗战就此打响。

244

为了恫吓全国议会直到屈服,元帅展开了多种威胁策略,包括在他的前军团亲信之中选出铁腕的“上校”们进入政府。1929年7月,这些上校中最野心勃勃的瓦·斯瓦维克(Walery Sławek)公开声明,“与其带机枪上街,不如打碎一位代表的骨头”,体现了赤裸裸的暴力威胁本质。下定决心恢复议会的完全民主,中左党派在1929年9月组成一个联盟;大萧条的影响为他们提供了助力,1930年年中,大萧条终结了近几年相对的繁荣期。随着议会的实质性瘫痪,中左派着手举行一次群众示威活动,于1930年6月30日在克拉科夫开始。但是它低估了元帅为最终对决所作的准备。

1930年8月25日,毕苏茨基亲自接任总理一职,宣布在11月举行新的国民议会选举,而在9月9日到10日的深夜,他下令逮捕了包括维托斯在内的反对派领导人,并将其关进布列斯特(Brześć/Brest Litovsk)要塞的军事监狱。成千上万的反对派激进分子被拘捕。中左联盟没能与国家民主党、共产主义者和少数民族结成一个统一阵线,这妨碍了它发动一次反抗政权的广泛运动。1930年11月的选举使BBWR以得到55.6%的席位成为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中左联盟一起仅成功拿到21.9%的席位,而国家民主党则远远落后,只得到14%的席位。“萨纳齐”政府的胜利使得毕苏茨基可以将总理之位传给斯瓦维克,自己则出国到马德拉做一趟为期三个月的休闲旅行。

与此同时,大萧条带给波兰经济更深的伤口。1932年的工业生产下降到1929年54%的水准,而在1933年,将近1/3的产业工人已经失业。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下降给农民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政权对危机的最初回应是实施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意图稳定兹罗提的价值,并且

加紧对司法部门、地方政府和学术机构的政治控制。被逮捕的反动派领袖在1931年至1933年间在布列斯特接受审讯,最后的结果不是被监禁(如维托斯)就是被流放。1934年在贝尔扎·卡图斯卡(Bereza Kartuska)监狱建立了一个“隔离营”(camp of isolation),用来关押最好斗的政府批评家:共产主义者、右翼极端分子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毕苏茨基领导的萨纳齐政府是一个非法法西斯主义的世俗威权主义政府。虽然政府确实尝试动员群众支持政权,但是国民生活的大部分区域仍然处于它的直接控制之外:反对派政党,许多工会,一系列从合作运动到童子军等社会、文化和体育组织、大部分经济部门和传媒(虽然也有一定的审查制度),以及国内许多宗教教派和他们的慈善协会。什拉赫塔传统的个人主义和个体自由的价值观仍然在波兰文化的许多领域根深蒂固地留存着。然而,一个强大现代国家的创建确实为知识分子打开了多种职业生涯的大门:在政府部门、教育机构或是军队里。在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之中,对于新政治现实的回应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作家,如波兰政治小说之父尤里什·卡登-班德罗夫斯基(Julian Kaden-Bandrowski),认可“萨纳齐”政府;而其他人士,像维托尔德·贡布洛维奇(Witold Gombrowicz)或尤利安·杜维姆(Julian Tuwim)(特别在他的严厉的诗歌《歌剧中的舞会》),则以辛辣的讽刺作为回应。“萨纳齐”政府最大的资产当然就是毕苏茨基元帅他自己,还有他直率的行事方式、简单的生活方式和严厉的家长作风。直到1935年5月死于癌症,他一直全神贯注于军事和外交事务,把日常政府事务留给了他的追随者们。

本质上来说,波兰仍旧是一个多元社会。不过,大萧条的严重性迫使当权者越来越多地考虑让国家对经济加以干涉。一些反对党,甚至包括宣扬民主政治的党派,如今也转向主张对于波兰的问题采取更加激进的集体主义解决方案。1931年,主要的农民党派联合组成了一个单一的、有10万成员的波兰农民党(Polish Peasant Party/PSL),以无条件征收私人庄园地产作为其纲领。1934年,波兰社会党号召将主要的经济部门国有化,甚至认可“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作为一个暂时必

需的策略。共产主义者波兰共产党自然在此时获得了新的追随者。基督教民主党因被政府阵营遗弃而遭到削弱,转向天主教社团主义。国家民主党越来越依靠非犹太人的较小的资产阶级,甚至更近一步向右派靠拢;1932年,已过中年但仍然活跃的德莫夫斯基发起“更大的波兰阵营”(Camp of Greater Poland),拥有25万名成员,不料竟在第二年被政府禁止。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对激进的国家民主党青年党人最有吸引力,他们在1934年成立了“国家-激进阵营”(National Radical Camp/ONR),从中出现了在鲍莱斯瓦夫·皮亚瑟茨基(Bolesław Piasecki)领导下的、明显极权主义的国家激进阵营长枪党。来自“灾变说”首要作家维特凯茨(Witkacy)的严正警告,抨击了东部极权主义和当代文明正在创造“在社会中完美的、机械化的人”的现实,这在20世纪30年代横扫欧洲大陆的新的反民主和反自由主义的思潮下被视为是非常切题的。

另一方面,罗马天主教主教团从1926年起由冷静而坚决的红衣主教奥古斯特·哥龙德(August Hlond)领导,与它早期支持的国家民主党拉远了距离。尽管教会与国家关系良好,但哥龙德还是站出来公开批评在20世纪30年代悄悄混进政府政策内的独裁主义。确实如此,这个时期见证了波兰天主教的复兴和教会道德威信在波兰许多阶层、群体中的上升。教区系统得到改革和扩张;神学院得到改进。天主教俗世机构迅速发展,例如天主教行动(Catholic Action)和“玫瑰兄弟”(Rosary Brotherhoods),吸收了数百万的信徒,绝大多数在乡村地区;基督教工会的成员超过了社会主义工会的成员人数。在学校中引入宗教教育、在卢布林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学、官方为大学指定有能力的神父,以及教会对于减轻社会紧张局势的关心,都有助于削弱1918年前在左翼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的反教权主义,促使新的思想开明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出现。所有这些都增强了教会的韧性,让它能够面对1939年后降临在它及整个民族身上的痛苦考验。

与此同时,波兰为了保证自身安全所进行的持续努力也引发了新问题、新机会和新圈套。1932年7月,波兰同苏联签署了一份互不侵

犯条约,这使波兰能采取有力措施对希特勒的发迹做出回应。确实,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对双方之前达成的“拉帕罗会议精神”(spirit of Rapallo)产生了不利影响,并且鼓励毕苏茨基通过他的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Józef Beck)上校发展出一种对两个危险的邻国不偏不倚的“均势政策”。逐渐地,由于对法国盟军的可靠性的感到忧虑,并对法国为东部安全协定的打算表示怀疑,毕苏茨基决心要直接解决所有波兰-德国的问题。至于希特勒,他急切地想把波兰与法国分开。双方于是在1934年1月签署了《波兰-德国互不侵犯条约》,结束了关税战争,但是这又相应地唤起了法国对波兰意图的疑虑。毕苏茨基并没有对波兰依然脆弱的地位抱有任何幻想;他在1934年曾私底下预测,凭这项条约,波兰在与德国的关系上,大概可以得到四年的喘息时间。

考虑到毕苏茨基迅速恶化的健康状况和国家不断增长的政治激进主义,“萨纳齐”政府转而于1926年后的政府体系制定了一个新的法律框架。1935年4月通过了一部新的《宪法》,强调国家至高无上,并授予总统(由一个小型选举团选出)巨大的权力。出于同样的原因,全国议会的权力被削减,此后出台的一部废除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法几乎将代表的人数减半,并且给予政府当局挑选议会候选人的绝对权威。参议院的选举不再是通过普遍的直接投票产生。

毕苏茨基元帅却不够长寿,没能就任新的大权在握的总统之职(这一职位本来是为他设计的)。尽管对他的政权的本质具有高度争议,但1935年5月12日毕苏茨基去世还是让绝大多数的人感到,他对独立斗争贡献巨大。他的死使统治精英们失去了赖以团结为一体的凝聚力。总统莫希齐茨基,此前一直是毕苏茨基的意愿的忠实执行者,如今拒绝听命于斯瓦维克(被认为是毕苏茨基的接班人);拒绝上校们的建议,莫希齐茨基任命爱德华将军作为军队的统帅。1935年选举遭到了超过半数的选民的联合抵制,进一步加速了萨纳齐政府的内部分裂。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出现了:一派以总统莫希齐茨基和著名的经济学家埃乌格纽什·克维特科夫斯基(Eugeniusz Kwiatkowski)为首,在政府中强调效率和专业主义,另一派以雷茨-斯米格韦(Rydz-

Śkładkowski)为首,更带有军事化和威权主义色彩。1936年5月,两个派别达成妥协,创建了一个在有些优柔寡断的将军(前医生)斯·斯克瓦德科(Felicjan Sławoj-Składkowski)领导下的、令人惊讶地保持稳定的看守政府。这届政府一直存活到1939年战争爆发。虽然缺乏必要的政治才能,雷茨却没有放弃他接替毕苏茨基的野心。1936年11月,他被提升为元帅,而在1937年他的追随者成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新政党——民族统一阵营(Camp of National Unity/Ozon)——以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为纲。这次诉诸于右派的尝试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他不得不使自己的立场变得温和;毕苏茨基众多的追随者,包括莫希齐茨基派别在内,对这种背叛已逝元帅本质上非极端主义的行径深感惶恐。从那时起,甚至民族统一阵营也改走温和路线。

“萨纳齐”政府未能赢得更加广泛的大众,这生动地反映在国内从大萧条中缓慢涌现出的、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中。在1936年至1937年间,警察对于产业工人和农民发起的大规模罢工做出激烈的暴力回应。另一方面,众多反对党不够齐心,以至于不能组织一个对抗萨纳齐的有效统一阵线。国家民主党仍是国内的第一大党,拒绝和社会主义者和互济会会员有任何来往,并且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反犹主义暴行和就德莫夫斯基(于1939年1月去世)继承人问题而展开的党内领导阶层斗争上。结果只有一个小的(但很著名)中间派政治家团体,包括西科尔斯基、维托斯和帕德列夫斯基在内,参与创建了以帕德列夫斯基在瑞士的居所命名的“莫尔日阵线”(Morges Front)。社会主义和农民党派拒绝结成“民主阵线”合作。1935年在莫斯科,由共产国际发起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旨在联合欧洲所有左翼和民主党派一起反对法西斯主义,但收到的反响也不积极;1937年,斯大林决定了在苏联居住的大部分波兰共产党(Polish Communist Party/KPP)249 员,并在1938年以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为指控解散了整个组织。此外,在1937—1938年间,超过10万名在苏维埃境内的波兰人(他们中一半人来自苏维埃乌克兰)在他的命令下被草率地杀害。

大萧条激发的政治和民族激进主义,更激化了波兰的少数民族间

题。在杰出的领导人、大主教西普提茨基(Sheptyts'kyi)领导下的希腊天主教(东仪天主教)教会、广泛的乌克兰人合作运动以及温和派乌克兰人政党力图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乌克兰人的文化和经济利益。在苏维埃乌克兰,对斯大林集体化的恐惧使苏联模式对波兰乌克兰人的吸引力消失殆尽。然而,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波兰政府做出了一些和解的姿态,但官方歧视乌克兰人的例子却更加深了越来越主张自身权利的乌克兰人的苦难辛酸;民族主义准军事团体(一些在德国受训)转向恐怖主义,意图破坏波兰的统治。波兰的犹太人的社会和物质地位也在20世纪30年代恶化。波兰的民族主义团体鼓励农民抵制犹太人商铺,并在众多大学里组织反犹游行。一些职业限制犹太人进入,而政府甚至认可了一些将犹太人移民至境外的不切实际的计划。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促进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不过虽然在1921年至1937年间有40万犹太人离开波兰,但只有大约1/3的人口前往该地。尽管如此,在1937年间,波兰的犹太人仍构成了国际联盟委任托管的犹太人口的40%。波兰的德国少数民族中纳粹影响的扩大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民族紧张关系。由出生于立陶宛的毕苏茨基倡导的谨慎寻求与立陶宛人和解的政策,在他去世后变为波兰官方对于立陶宛共和国的强硬立场,而此时的立陶宛也仍然对维尔诺(维尔纽斯)的失去充满怨恨,仍拒绝与华沙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萨纳齐”政府在这个时期最具建设性的事业,是由自1935年以来任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的克维特夫斯基于1936年实施的干涉主义经济新政策。在他的“四年国家投资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维斯图拉河和桑河之间人口最密集、战略上的安全区域成立中央工业区域(Central Industrial Region/COP)。水电站、飞机制造厂、橡胶厂、汽车厂、化工厂,以及在斯塔洛瓦-沃拉(Stalowa Wola)的新工业中心,这些建设计划旨在使三军实现现代化,预计于1942年完成。更进一步的投资计划预计于1954年实现波兰交通、农业和教育的现代化。1938年,波兰的工业产量和实际工业收入已经远远超过1928年的量;人均国民收入与西班牙相当。



图 43 1936 年在波兰南部近新松奇(Nowy Sącz)地区的农民正在收获。当时南部地区正是土地所有权最分散的地方。1921 年,这里有 4/5 的土地仍然小于 5 公顷(12.5 英亩)。1939 年,比起法国的 3 万台拖拉机,整个波兰只有 2 000 台拖拉机。注意画面中农民拿的是镰刀和干草叉。

251

到了 1939 年,新的一代人已经培养出来,对于他们,民族独立是常态。经过漫长的瓜分时期之后,国家的各个部分已经相当成功地再度融合,政府机制和公民服务机构有效地运行,统一法律体系的进程大有进展。铁路网已经扩展,一些航海运输线和一家国家航空公司“洛特”(Lot)也已经建立起来。高等教育和中学教育仍旧有限,但是质量不错,许多波兰学者,特别是数学家,获得了国际声望;文盲仍大多集中在东部省份,但其比例已经从 33%减少到 15%;死亡率下降了一半;大多数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外观已经得到改善;而到了 1939 年,无线电设备的拥有数已经达到 100 万。然而,总体而言,生活水平仍旧不高,并且在乡村预计有 500 万人受到隐性失业的影响。民族问题仍和以前一样很难处理;波兰当局继续将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热望看做是对波兰国家完整性的威胁。

无论波兰经济中央集权(étatisme)的早期成果多么令人印象深刻,但波兰既没有方法也没有资源,更没有极权主义控制,来达到与它

的两个强大的邻国中任一个在经济或是军事上的均势。1937年,波兰的钢铁产量是150万吨,德国是1980万吨,而苏联是1780万吨。时间已经不多了。当华沙认为苏联因斯大林对红军的大清洗而暂时削弱时,波兰的国际地位却因希特勒公然推翻“凡尔赛体系”,而英国和法国为避免战争而对独裁者犹豫不决而变得越来越易受攻击。法国在1936年3月挑战希特勒在莱茵兰重新武装的失败,破坏了外交部长贝克对法国盟军的信心。然而,贝克对于集体安全的怀疑态度,以及他尝试加强波兰的地位而不过度刺激柏林,造成了令人误解的印象——波兰正在与德国的独裁者相互勾结。希特勒在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后,贝克在潜在的战争威胁下强迫立陶宛人与华沙建立外交关系。甚至更不体面的是波兰在1938年10月吞并特申的方式和时间选择。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因成为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会议上推行绥靖政策的最大牺牲品而元气大伤。无论是贝克希望加强波兰对斯洛伐克的影响,还是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一起在德国和苏联之间建立一个中欧政治集团,这些举措都毫无结果。而1938年末波兰-立陶宛关系的改善也并没有使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建立起更广泛的联系。

252

德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波兰。希特勒最初的打算是使波兰变成一个附属国,它能同时起到两方面的作用:其一,作为挤压苏联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跳板;其二,如果德国首先将要与法国开战,它可作为东部的屏障。波兰的反共履历和反俄传统,及其右翼党派的反犹太主义,甚至以“种族”的角度看,波兰人口中有大量的波罗的海和德国族裔,这些都使得波兰在希特勒的眼中成为一个可能且有用的同盟。为了确立德国对波兰的统治,柏林要求波兰归还已经由当地纳粹控制的但泽,并建立一条通过波属波美拉尼亚的域外公路和铁路(所谓的“波兰走廊”);波兰人也被邀请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

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占领布拉格并摧毁了残余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后来证明这对波兰和西方大国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希特勒胁迫波兰人屈从的尝试起了反效果,同时绥靖政策的瓦解促使英国和法国在阻止纳粹扩张上表现出更大的决心。3月26日,波兰政府客

气地但毫不含糊地拒绝了希特勒“宽宏大量”的提议。张伯伦在3月31日公开宣布支持波兰,随后在4月6日英国也做出一个正式保证,这强化了波兰抵抗希特勒的决心。希特勒做出暴怒的回应,废止了1935年《英德海军协议》和1934年《波德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德国的国防军(Wehrmacht)得到命令做好进攻波兰的准备。5月19日,法国与波兰签订了一份军事协定,但是法国将在德国进攻波兰的15天内发动“其大部分军队”攻击德国的许诺则带有政治上相当多的保留。而波兰的高层却表面地理解了法国的保证,没有体会到个中的含糊之处。

1938年和1939年国际关系的恶化以及经济恢复平息了波兰内部的紧张局势,促进了民族团结。1938年11月的选举恰逢波兰独立20周年纪念日,并在1935年《宪法》提出的限制条款下举行。结果波兰政府大胜,得到了超过80%的议会席位。政府否决了以1920年为模型,创建一个国防联合政府的所有建议。尽管如此,它保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已经有压倒性的波兰民意做为后盾。

正如波兰拒绝投入德国的怀抱一样,它也对英国和法国试图将苏联拉入东部“和平阵线”的努力表示高度怀疑。对于波兰政府,苏联的情况实在不适合参与这种合作,因为它也会让波兰失去主权。莫斯科要求在波兰东部驻扎苏联军队,解散波兰-罗马尼亚联盟,并且将英国对波兰的担保限制在西部边境。而斯大林对西方的动机表示极度不信任,特别是在《慕尼黑协定》之后,更倾向于争取时间而已。斯大林将国家的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他选择与出价比西方更高的希特勒达成密约。1939年8月23日,苏德秘密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直到1946年才曝光,但直到1989年还遭到苏联的否认),商定共同瓜分中东欧以及波兰。

希特勒现在计划派兵像楔子一样插入华沙和西方大国之间,使他的牺牲品完全孤立。然而,法英与莫斯科的谈判破裂,以及苏德条约的签订,为8月25日在英国和波兰之间缔结一个正式的联盟移除了最后的障碍。希特勒即刻气馁失常,同时西方抱着最后一分钟和谈的希望劝说波兰人推迟军事动员。希特勒并不相信西方会为波兰而战,无论如何,在这个两面悬崖的游戏中,他愿意冒一次险。



图 44 波兰当时技术水平最先进的轰炸机 PZL P. 37 Łoś(‘Elk’)。其最高时速可以达到 277 m. p. h., 射程为 932 公里以及 4 850 磅的炸弹携带量,它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国家使用的最好的中型轰炸机进行比较。但是波兰人只有太少的现代化飞机来面对 1939 年纳粹和苏联的冲击。在 1936 年至 1939 年间它只制造出 180 架这样的飞机。战后,它的设计师耶尔齐·东布罗夫斯基(Jerzy Dąbrowski)在英国和美国从事飞机制造工作。

9 月 1 日清晨,德国派遣大批武装力量发动了对波兰的战争。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

波兰将要战斗。国家荣耀和国家利益使得与英、法结盟(他们许诺进行有效的帮助,波兰对此也充满期待)远好过成为德国的卫星国。“九月战争”是一次力量悬殊的战争。动员不足的波兰武装的艰苦抵抗不能改变纳粹战争机器在人员、现代化设备、灵活性和火力方面的巨大优势。德国人应用闪电战(*Blitzkrieg*)的新战术取得了惊人的效果,而波兰人却在试图保卫他们漫长而过度暴露的边境线。然而这场战争并不是简单地走过场,数量很少的波兰空军勇敢地折磨着德国空军(*Luftwaffe*),而从 9 月 9 日至 12 日,在华沙西部的布祖拉河(*Bzura*),波兰发起反攻,重创了德军的 5 个师。德国人遭受了总共 5 万人的伤亡(超过 1940 年在法国的数量),并损失了 500 架飞机以及超过 1 000

辆的装甲车。波兰军事伤亡的数量超过 20 万人,更不用提因为德国狂轰滥炸而致死的平民受害者,或者被集体处决的波兰官员和平民。半心半意的法国承诺在西线发起总攻,这或许本可扭转战争的进程,但从未真正打响。在东南部沿着罗马尼亚边界建立一条防御线的计划最终也由于 9 月 17 日苏联军队的进入而破产,这最终决定了波兰人的命运。直到 9 月 27 日华沙才沦陷,而科里伯格(Kleeberg)将军领导的波兰军队阻击苏联和德国武装直至 10 月 5 日,那天希特勒在波兰首都主持了一次胜利阅兵。9 月 28 日苏德签署协定,沿着纳尔瓦(Narwa)河、布格河和桑河平均地瓜分波兰(最初预想的界限是维斯图拉河),虽然德国人获得了较多的人口和更多的发达地区。

波兰国家,莫洛托夫(Molotov)所说的“《凡尔赛条约》丑恶的造物”,又一次从地图上消失。但是对于波兰人,战争绝没有结束。好几万的士兵和飞行员设法成功经由匈牙利逃往法国;大多数波兰海军已经较早前离开波罗的海前往英国港口。波兰政府和统帅部拒绝投降,并试图在罗马尼亚寻求避难所,在那里令他们震惊的是发现自己被拘留了。10 月 1 日,总统莫希齐茨基迫于法国的压力,委任一个温和的“萨纳齐”政治家瓦迪斯瓦夫·拉奇凯维奇作为他的继任者,同时“萨纳齐”政府主要的反对派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成为一个位于巴黎、并得到英国和法国认可的、广泛联合的流亡政府的总理。《宪法》上的国家合法性因而得到保留。作为总司令,西科尔斯基开始在法国重建一支波兰军队,并与在被占领的波兰领土上正在萌发的抵抗组织建立联系。一个准议会组织——全国委员会在上了年纪的名誉主席帕德列夫斯基的领导下成立,包括来自所有主要政党的代表;虽然它已足够意义重大地囊括了一个犹太“崩得”成员,但是没有来自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

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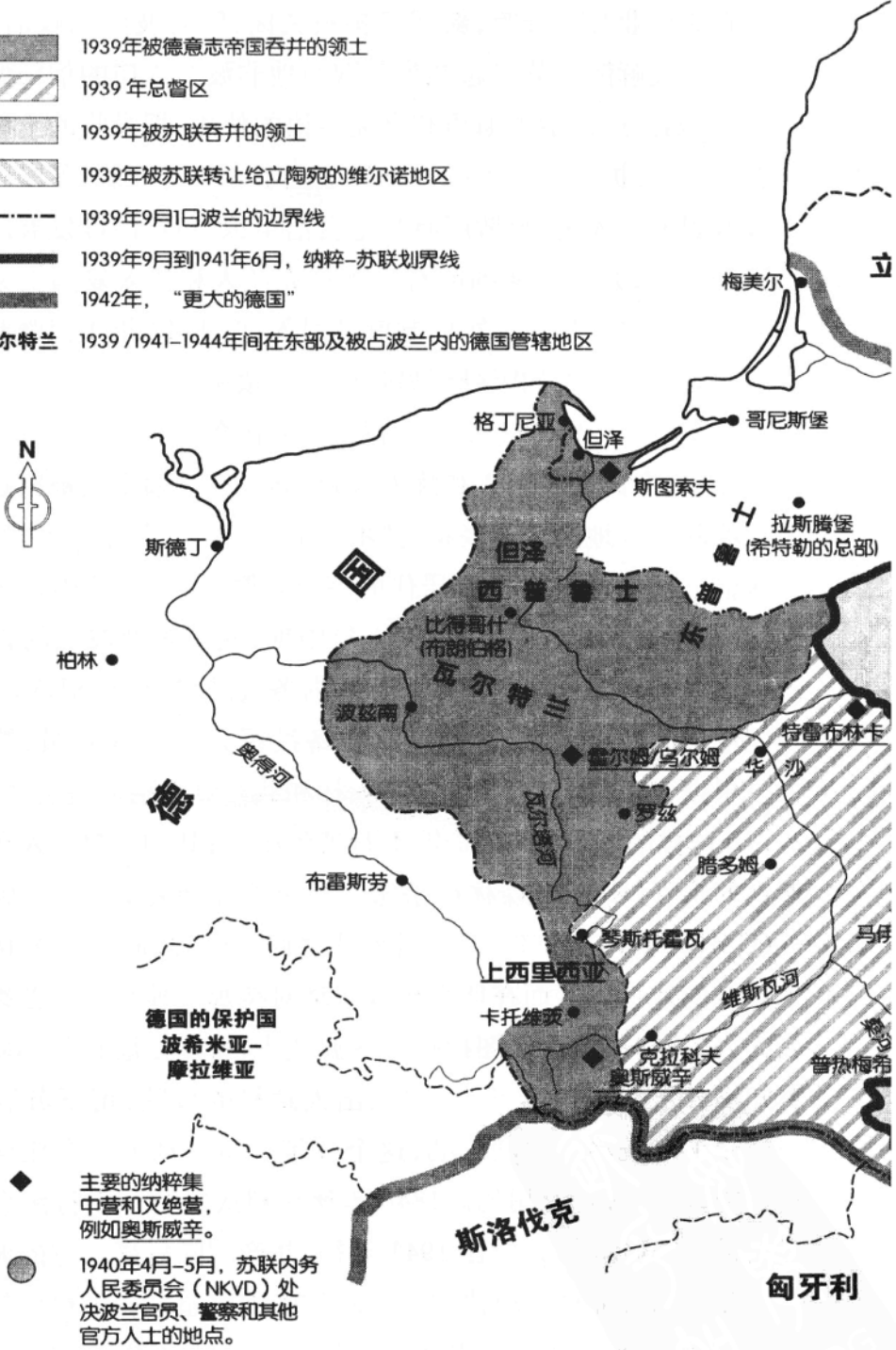
两个占领国把他们的恐怖行动聚焦在国家受教育的和统治精英身上,在纳粹的案例中,同样也施加在犹太人身上。波兰的东半边(除了维尔诺地区,该地区已由苏联移交给立陶宛人)通过伪造的当地公民投票后被苏联正式吞并。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开始进行,目标为波兰军事、

政治和经济组织中的关键人物,以及行政人员和工会领导。所有私有和公有的企业都被接管;新闻机构被关闭;所有波兰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组织都被解散。苏联起初为争取当地非波兰人口的信任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如促进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的使用、把没收的土地财产分发给农民,以及扩展福利系统。一旦建立了有效的控制,苏联就对所有的宗教派别展开攻击,解散所有当地自治组织,包括高度发展的乌克兰合作运动在内,并且还逮捕所有当地乌克兰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征召青年加入红军的制度被引入,而1940年4月强制推行了苏联式的集体化。人们因受到恐吓而变得顺从。

在1940年和1941年,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民族团体的、高达50万人(绝大多数是波兰人和犹太人)从苏占波兰领土上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地区。苏联认为“不可靠的”的人,其全家都遭到流放;由于他们的流放地是不适合居住的高寒荒野,再加上集中营里的强迫劳动,好几十万人死亡。到了1941年中期,战前东部波兰的许多小城镇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波兰特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尤其注重处理俘虏的波兰军官(正规军和预备役军人)、行政人员、警察和边防军。根据1940年3月5日由斯大林和共产党政治局签署的指令,超过2.1万这样的囚犯在1940年4月遭到枪决;其中4000人在近斯摩棱斯克的卡廷(Katyn)森林被杀害。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直到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在1990年4月承认之前,苏联政府一直否认他们犯下了这样的暴行。然而在斯大林残忍地对待那些他认为是苏维埃政权敌人的人的同时,他也试图拉拢一些波兰人,特别是愿意和苏联合作的左翼知识分子。1940年6月,法国出人意料的战败,留下苏联独自面对一个由纳粹统治的欧洲大陆,这个政策获得了动力。在任何与德国的对抗中,波兰人是有用的。1840年秋在利沃夫公开举行纪念密茨凯维奇逝世85周年活动,而在1941年初,共产国际复兴了它的波兰分部。

苏联的恐怖行动很快被与它对抗的纳粹超过。纳粹占领期持续得更久,影响了绝大多数波兰人的生活(在1941年至1944年间,纳粹控制了战前波兰的全部领土),为众多生命敲响了丧钟。西部波兰包括

-  1939年被德意志帝国吞并的领土
 -  1939年总督区
 -  1939年被苏联吞并的领土
 -  1939年被苏联转让给立陶宛的维尔诺地区
 -  1939年9月1日波兰的边界线
 -  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纳粹-苏联划界线
 -  1942年，“更大的德国”
- 瓦尔特兰** 1939 /1941-1944年间在东部及被占波兰内的德国管辖地区



258

地图 1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波兰(1939-1944)

波兹南和罗兹[改名为利茨曼恩(Litzmannstadt)]在内的广阔地域直接合并到第三帝国,并且它的人口根据粗略和不一致的“激进”标准进行分类。为了确保上西里西亚、特别是波莫美拉尼亚的德国特性,那里的2/5的人口被大规模地注册成为“德国人”(并且因此要服兵役),相比之下,在瓦尔特兰(Wartheland),这种被注册的比例则被小心地维持在2%。那些被划分为“波兰人”的人群被迫降到奴隶的地位,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仅能接受最基本的学校教育,并且遭受强迫劳动或充军放逐。在瓦尔特兰,几乎所有的波兰天主教教会、修道院和慈善机构都被关闭;在上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德语被强迫作为宗教生活的语言。爱国的波兰神父不是被驱逐、逮捕就是被枪决。波兰中部由德国人所谓的“总督区”(General Government,东加利西亚在1941年并入)进行单独管理,遭受着一个恐怖政权、半饥饿状态和残忍的经济剥削。它就是一个“垃圾堆积场”,所有来自被德国吞并土地上的多余的波兰人和犹太人都被送到了这里。大多数天主教教区被允许在“总督区”内运行,但带有许多限制。波兰的新教徒尤其成为纳粹的牺牲品。“精神绝育”(Spiritual Sterilization)的政策产生了一次对波兰高雅文化的攻击:博物馆、图书馆、大学、大多数中学和剧院都被关闭,并且禁止公开演奏肖邦的音乐。只有一些小学和受限制的专门技术训练得到允许,电影院和一份被称为《爬虫》的黄色小报提供着廉价的娱乐。

260

克拉科夫大学的职员在1939年9月被监禁在集中营里,这预示着整个波兰受教育阶层在纳粹统治下的命运。波兰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职业阶层,他们之中当然包括大多数犹太人,因集体处决或进入集中营而死亡:其中包括15%的教师、18%的天主教牧师、45%的医生、50%的工程师和57%的律师。其余的波兰人被当做奴隶劳动力(ein Arbeitvolk);从1939年到1944年,大约280万波兰人被送往德国作为强制劳工。大约20万波兰儿童因“人种上适当的特征”被从孤儿院和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为了在纳粹家庭中培养成为一个“雅利安”德国人。而每有一个德国人在德占波兰被害,就有100个波兰人被处决。公开绞刑和枪决在城镇和乡村变得司空见惯。1942年4月,纳粹的

“东方总计划”(Generalplan Ost)设想将残余的波兰人全部做为多余的、劣等人种垃圾分散送到被征服的俄国的东部荒原。整个波兰则变成德国人的定居地。

无论纳粹对待波兰非犹太人多么恶毒,相比之下,波兰的“低于人类”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命运则更为悲惨。从战争一开始,犹太人就遭到大屠杀和残忍的对待,被成群赶进 400 个密封的犹太“隔都”,在那里,疾病和饥饿夺走了他们的生命;最大的“隔都”在华沙,有 45 万人。在 1941 年德国入侵苏联之后,纳粹党人又把魔爪伸向了战前波兰东部的犹太人。1942 年 1 月,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决定消灭德占欧洲的所有犹太人。为了实行这个空前的种族灭绝方案,死亡集中营在被占波兰大规模兴建起来,最大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Birkenau / O ś więcim-Brzezinka)、马伊达内克灭绝营(Majdanek)和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来自所有被占欧洲的隔都中的以及一些零散犹太人,被火车整车整车地运到这里。1943 年 4 月和 5 月,华沙隔都的起义是犹太人向他们的压迫者发起的一次绝望但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行动。至 1944 年末,纳粹已经杀死了战前波兰土地上的 300 万犹太人中的差不多 90%,已经实质上消灭了这个在波兰土壤上存在数世纪的群体。

261

波兰非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对他们的犹太同胞的命运做出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黑暗的一面有:利用犹太人不幸的勒索者、将犹太人出卖给纳粹的告密者,甚至赞同杀害犹太人的极端右翼民族主义者。纳粹反犹宣传的险恶影响、对帮助犹太人的人实施死亡处罚、放眼皆是集体处决,以及遍布的恐怖氛围,逐渐使许多人的道德反应变得麻木,冷漠感滋生,只顾自保,甚至旧的反犹情绪开始蔓延。1939 年,一些关于波兰东部的犹太人对苏联表示欢迎的报道,同样也强化了战前曾经由右翼党派鼓吹的“犹太共产主义”的陈词滥调;这就是 1941 年在德国入侵苏联期间、在德占波兰发生波兰人在耶德瓦布内(Jedwabne)和其他地区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背景。当时的一些记录表明,大量波兰人轻易地就接受了剥削犹太人并将他们隔离在犹太



图 45 反映大屠杀的艺术作品。《上帝充满仁慈》(*El Mole-Rachmim*)，出自“石头在呐喊”(Kamienie krzyczą/*The Stones are Screaming*)系列，由布罗尼斯瓦夫·沃伊切赫·林克(Bronisław Wojciech Linke 1906—1962)创作于1946年。《上帝充满仁慈》是在犹太葬礼和赎罪日上唱的歌。除了1939—1946这段时期，林克在华沙度过了他大部分的创作生涯。他以充满力量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形式来谴责纳粹的残忍、卑鄙和伪善。

隔都的现实。在1941年都还能观察到的许多农民愿意帮助犹太人的景象,到了1942年秋天就已明显发生改变。但另一方面,也有波兰人愿意冒险为犹太人提供避难所,对此,今天在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 Institute)可以看到相当多的证词;各派教徒们也救出许多犹太儿童。被同化的中产阶级犹太人最容易在隔都之外生存,而信仰东正教的犹太人因他们独特的服装和外表最容易成为纳粹的靶子。有影响力的天主教作家索菲亚·科萨克-切兹卡(Zofia Kossak-Szczucka)毫不含糊地谴责这种种族灭绝行径。1942年8月,在波兰的地下组织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委员会(以字母缩写“Żegota”为人所知)以统筹对犹太人的援助:提供金钱、伪造身份证明和提供安全避难所。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在1942年6月和12月率先向起初还将信将疑的外界披露了纳粹暴行的详情;杨·卡爾斯基(Jan Karski)充当信使,向外界传递了大多数信息,值得人们铭记。在这样的环境下,到1944年秋天,获救的犹太人数量达到4.5万人,其中包括在华沙的1.2万人,这确实是一项功绩。

263

在纳粹占领波兰期间,文明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缺失,以及人们情绪上普遍的暴烈化不仅使人们产生对德国人的痛恨,而且也成为其他不同种族间爆发冲突的温床,特别是在战前波兰的东部地区,那里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在1939—1941年间被苏联摧毁。波兰的地下斗争者与由德国人筹建的立陶宛警察部队以及苏联赞助的游击队均发生过冲突。1943年,骇人的暴行在沃里尼亚发生,当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42年因屠杀沃里尼亚犹太人而掌握了屠杀技巧,现在开始“纯净”这个地区残余的波兰人。波兰人展开报复,一场长期的残忍的波兰人-乌克兰人内战由此开始,并蔓延到其他相邻的地区。在说白俄罗斯语的区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件,1944年初,在新格鲁多克地区的许多白俄罗斯人害怕回到苏联,甚至情愿加入波兰“国家军”(Home Army)。虽然有上述零星的例子,但很明显的是,波兰国家多民族的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大程度上被抹杀了。

纳粹在波兰政策的残忍本性和波兰民族主义的强烈程度,排除了与纳粹开展任何政治协作的前景;要波兰人当卖国贼(Pétain)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对于西科斯基将军的政府来说,除了继续采取战争行动没有其他选择。波兰军队在1940年5月盟军远征纳尔维克(Narvik)期间以及在法国战争期间(4个波兰师参与了战斗),表现得勇猛善战。法国战败之后,波兰政府带着2万名士兵撤退到英国。以1940年8月5日的《波英条约》为基础,英国保证装备残余的波兰武装,让他们在英国指挥下全面参战。为终止战前波兰的外交政策,流亡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1940年11月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两个国家在战后将建立联邦。1941年末,一个波兰旅协助保卫了托布鲁克(Tobruk)。英国最初对波兰空军能力的怀疑很快消散,而且波兰的飞行员(占飞行员总数量的10%)在不列颠之战中击落德国战机超过200架(占总数的1/7),显示出他们真正的勇气和作战能力。波兰的303空军中队驻扎在伦敦郊外的诺索特(Northolt),是1940年空战中击落敌机最多的战斗机中队。至1944年,在英国的波兰空军共有14个中队;它们的轰炸机参与了对德袭击,并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表现活跃。波兰海军获得了额外的船舰,与英国皇家海军并肩参与了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的大多数军事行动。波兰对于盟军事业一项意义尤其重大的贡献是,1939年8月波兰军事情报部门将德国“英格玛”(Enigma)机器的复制品转移到法国和英国,其译码系统被波兰的密码学家破解,从中发展出了设在布雷特彻雷公园的“X站”(Station X),那里的英国情报人员能够据此破解德国军事情报;毫无疑问,这对提前结束战争大有帮助。波兰的情报网遍布整个被占欧洲,以及北非和中东,给伦敦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军事和工业情报。据估计来自被占欧洲的超过40%的报告(许多具有极大的军事行动价值)都来自波兰的情报部门;其中包括德国对苏联入侵的准备,以及后来德国军队向东方行动的细节资料,同样还有德国V1飞行炸弹和V2火箭项目的详细资料。

波兰人秘密谋划、坚持抵抗的传统因两次大战之间成功独立这一成果的滋养而得到巩固,如今再次得到充分体现。早在1939年9月,

不同的抵抗组织就已经开始自发出现;他们的活动逐渐由斯蒂凡·罗韦茨基(Stefan Rowecki)将军进行调控,他是1940年6月由西科尔斯基将军任命的地下武装的司令官。1944年年中,当其成员最多达到40万人时,这支“国家军”(Armia Krajowa/AK)成为整个被占欧洲最大的地下组织;它吸收了各个波兰抵抗团体,除了较小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People's Army/AL)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民族武装”(National Armed Forces/NSZ)之外。虽然战前部队中没有被敌军俘虏的一批军官为其提供了大量骨干,但国家军也吸收了所有地域的波兰平民,形成了在波兰历史上之前从未有过的真正的市民武装。它的主要活动区域是“总督区”,但它也在维尔诺-新格鲁多克地区和沃里尼亚建立了大量机构。起先国家军集中精力于情报收集,组织宣传,惩治与敌合作者、强盗和勒索者,以及组织无数的罢工活动上,特别是沿着德国通往东部前线的交通路线。自1943年初起,其增加了军事活动,虽然装备严重不足;它开始准备在有利时机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起义。

国家军是一个广泛的“地下国家”的军事部门,该地下国家自1940年秋开始由伦敦流亡政府指定的一个代表团领导。波兰的地下国家得到了4个主要波兰政治党派的拥护,这4个党派仍继续秘密地运作,并在1940年2月成功克服他们的战前敌对状态,组成了一个广泛的联盟,致力于在战后创造真正的议会民主政治,它们是:波兰农民党(PSL)、波兰社会党(PPS)、作为国家民主党的继任者的国家党(National Party/SN)和天主教中间党派劳动党(Party of Labour/SP)。战前“萨纳齐”政府的支持者,因1939年的战败而受挫,绝大多数被吸收进主要抵抗运动。只有共产主义者直到1941年纳粹入侵苏联时才开始相对活跃,而右翼极端主义者则梦想着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一党制波兰,不仅没有加入广泛的民族联盟,也不承认政府代表团的权威。

在秘密活动不得不受到的限制范围之内,“地下国家”维持着波兰国家的连续性,并履行了一个正规政府应履行的许多主要职能。其拥有一个行政系统并仿建了各个部分,有一个司法系统,并且促进了教育

266 和文化活动的发展,以对抗纳粹减少人们文化生活的措施。他们在许多城镇进行秘密大学教学和中学教育,参与者冒着极大的危险确保了受教育核心人群的存续。艺术作品被隐藏起来;教科书、期刊、报纸由秘密印刷厂印制发行;被禁的波兰名著在隐蔽的剧院上映,并出现在诗歌朗诵会上。确实,许多有组织的文化、社会和运动生活,从工会到童子军,都在地下运行着。德国人允许的慈善机构,例如波兰红十字会,也为秘密活动提供掩护。嘲笑德国人的街头民谣帮助维持普遍的民心士气;同时在德军管理的军工厂,故意地以次充好的“迟缓乌龟”工作阻碍了纳粹的军事行动。用德语编写的反战黑色宣传册也在进入波兰的大量德军部队中出现。

当轴心国扩展他们对欧洲大陆的控制时,波兰会很快解放的前景变得非常黯淡。单靠英国没法解放欧洲。而当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却最终失败后,这一切戏剧性地改变了欧洲战争的特性,同样也改变了波兰的前景,虽然未必与许多波兰人希望的一致。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使这场战争变成一场全球性战争,其结果将主要由美国和苏联确定。波兰人将要做出代价高昂的尝试去恢复他们的独立,但是与1814—1815年时一样,波兰的命运再一次掌握在大国的手里。

267 紧随着1941年7月13日英-苏同盟的形成,丘吉尔施压让西科尔斯基与苏联在1941年7月30日签署一个协定[所谓的《西科尔斯基-马伊斯基(Maisky)协定》]: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瓜分波兰的《苏德条约》失效,波兰在苏联的囚犯得到释放,并且将会在苏联境内建立波兰军队。由于战前波兰的所有土地现在都被纳粹占有,斯大林可以向波兰人做出暂时的妥协。西科尔斯基希望建立一支在伦敦波兰政府的权限领导下,与红军在东部前线并肩作战的波兰军队,这将会帮助解放波兰,而且苏联也将会尊重波兰未来的主权。然而,苏联缺乏尊重战前波-苏边界的诚意使波兰的领导阶层发生分裂,并导致一次政府改组,提高了农民党领袖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契克(Stanisław Mikołajczyk)的地位。斯大林最终也不愿意培育一支在苏联中亚地区正在形成的由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指挥的独立的波兰军队。苏联

官僚政治的妨碍,莫斯科拒绝认可除了来自波兰东部种族的波兰人外的所有人为波兰公民,并且最终也没有澄清 1939 年由苏联逮捕的数千名波兰军官消失的真相,这一切都阻碍到西科尔斯基与苏联进行合作。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在 1942 年夏天安德斯的 7 万人军队撤退到伊朗,以增强英国和英联邦在中东的武装力量。跟着安德斯离开的还有 4 万名瘦弱的平民。据我个人对古拉格集中营的了解,在斯大林统治之前和期间,从没有如此多的囚犯和被拘留者获准离开苏联。然而,好几万最初的被放逐者仍然留在作家约瑟夫·恰普斯基(Józef Czapski)(他是获得自由的囚犯之一)贴切地称为“蛮荒之地”的土地上。

波苏关系继续恶化,此时正当东部前线的战事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战役之后转向对苏有利的方向之时。波兰人曾抱有的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类似的结果会再次出现的希望成为纯粹的泡影。很明显,作为纳粹攻击苏联的一个结果,斯大林已经修改了他之前对波兰建国有敌意的看法;但是他很坚决地认为,他将成为重建的波兰国家的领土和政治结构的仲裁者。因为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仍然坚定地要实现全部波兰主权和恢复 1939 年前的东部边界,双方最终毫无可能达成一次真正的妥协。为此,斯大林开始认真考虑创建与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和波兰“地下国家”对抗的机构。

为了提升他在纳粹占领的波兰内部的影响,斯大林已经在 1942 年 1 月鼓励重建了一个波兰共产主义政党,更名为波兰工人党(PPR)。1943 年秋天之后,该党由在莫斯科受训的波兰共产主义者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与前共产国际代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成员鲍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ław Bierut)领导。波兰工人党不仅拒绝服从于地下政府,而且开始与之对抗,声称代表了波兰国家的“真正”利益。1943 年初,斯大林又批准了一项波兰爱国者联盟的活动,由一群波兰共产主义者及其政治同道领导,其中最著名的是毕苏茨基元帅一个最亲密同事的女儿万达·华西列夫斯卡(Wanda Wasilewska),并批准建立一支由苏联控制的波兰军队,由曾为阶下囚但如今愿意与苏联合作的齐格蒙特·贝林格(Zygmunt Berling)上校指

挥。这支军队聚结了成千上万没能加入安德斯的军队的波兰人。1943年10月,它在白俄罗斯的列宁诺初试锋芒。1943年4月,在卡廷森林由德国人发现了一个掩埋有4000名波兰军官尸体的深坑,根据西科尔斯基的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对此展开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有理由怀疑这是苏联犯下的暴行。而这却给斯大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即在1943年4月25日“延缓”与波兰政府的外交关系。

1943年带给波兰的解放事业更深的打击:西科尔斯基将军于7月4日死于一场至今仍然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发生在直布罗陀的空难,波兰失去了一位在国际上广受尊敬的领导人。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契克精明而且有能力,但是缺乏他前任的权威性,并且与新的总司令索斯恩科夫斯基(Sosnkowski)将军关系不好,后者曾经反对签署《西科尔斯基-马伊斯基条约》。此外,波兰人当时还不知道,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德黑兰的联合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对斯大林要求寇松线应该成为波兰未来的东部边界均表示同意,这样就把维尔诺或许还有利沃夫留在了苏联人手里,而波兰应该向西扩张,从德国那里获取领土赔偿。对于西方强国来说,波兰人是一支英勇和有用的盟军,但是在1941年后盟军全球战略的冷峻现实前,在苏联红军承担着对抗纳粹德国地面战斗的重任之时,苏联这个盟友不可避免地拥有优先于波兰的利益和感受的地位。

269

为了削弱共产主义的影响,“地下国家”的联合党派在1943年8月和1944年3月宣布:将进行一次彻底的土地改革和将工业基地国有化(虽然民族主义者国家党对这部分计划最不感兴趣)、重新确立1939年前的东部边界、要求德国对在波兰土地上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进行赔偿。在眼下,区别非共产主义“地下国家”和隐秘的共产主义政党波兰工人党的(后者一直在避免宣扬任何信条,而只以爱国主义姿态出现)并不是由双方提倡的那么多激进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而是他们对国家主权、边界问题,以及未来苏波关系本质的态度。波兰工人党从农民和社会主义党派中争取过来多个分裂出的小团体,但是它暂时仍是波兰政治的一个小角色;它的武装派别人民军的规模仍远远小于国家军。但这一切都将随着红军的逼近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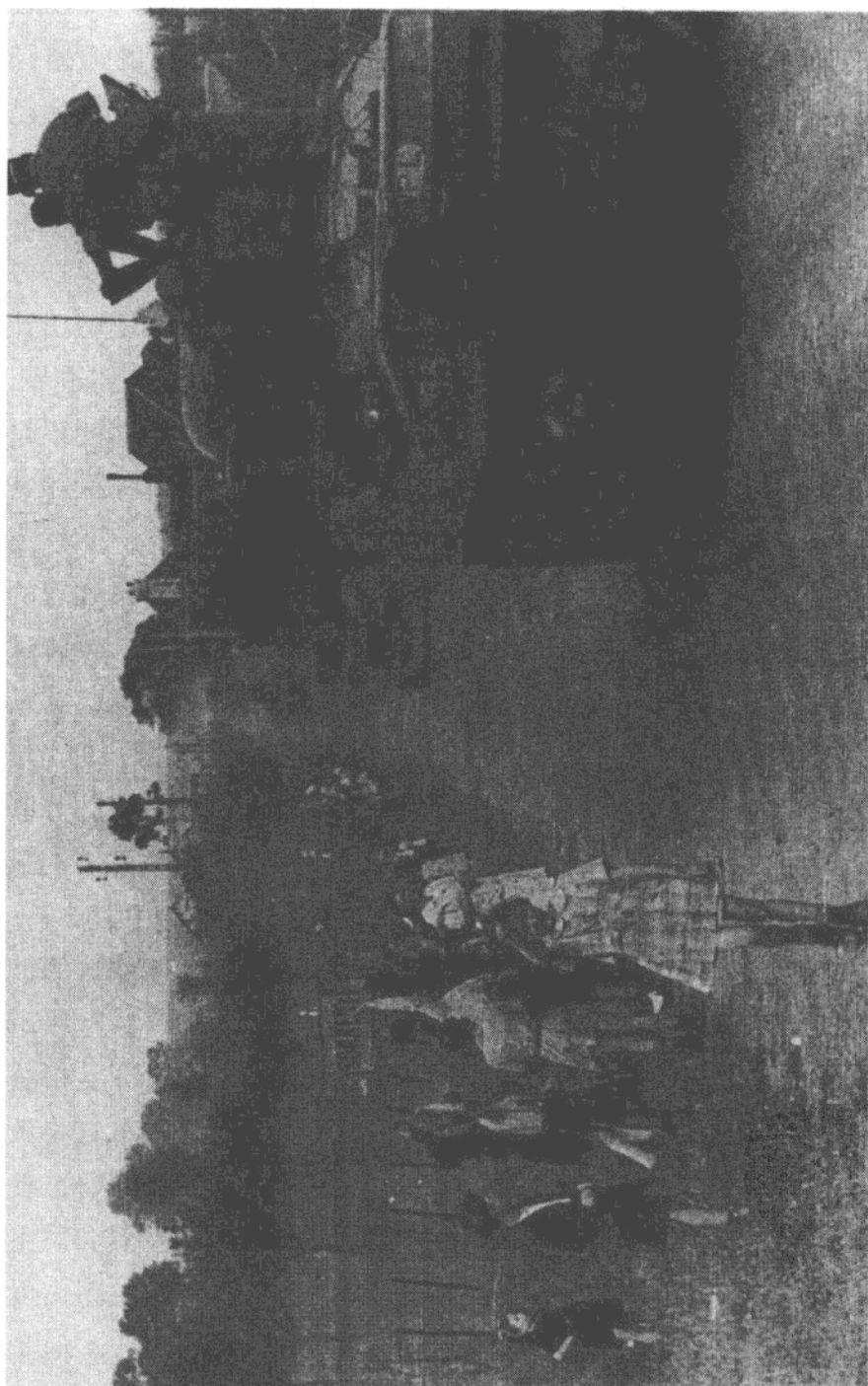


图 46 1944 年 9 月初在诺曼底的波兰坦克。毛采克 (Maczek) 将军率领的波兰第一装甲师第 24 枪骑兵队的谢尔曼 (Sherman) 坦克通过鲁昂 (Rouen) 北面的索莫瑞 (Sommery) 村, 试图击退德军。该师的战斗路线是: 占领凯恩 (Caen), 然后经过比利和荷兰, 到达德国北海岸的威廉港 (Wilhelmshaven)。

1944年,波兰武装力量在西部的一系列战绩终于为盟军的战略部署做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5月,在安德斯将军领导下的第二军团攻占严防死守的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打开了通往罗马的通路;8月,毛采克将军的第一装甲师在法莱塞(falaise)战役中表现出色,使巴黎的及早解放变得可能;9月,索斯恩科夫斯基的伞兵旅在阿纳姆(Arnhem)英勇作战。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波兰的自由而战,但是他们却将被事态发展残酷地欺骗。流亡政府领导下领土在迅速流失。一方面,丘吉尔逼迫米科瓦伊契克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并对边界问题做出让步;另一方面,斯大林现在不仅要求明确承认寇松线是波兰东部边界,而且要将波兰政府中对苏联怀有敌意的因素排除出去,这指向的不是别人,恰是总统拉奇凯维奇(Raczkievicz)、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和其他几位卓越的部长。

271

波兰“地下国家”没有能力阻止斯大林以他压倒性的权力和残忍的方式将苏联的意志强加在这片土地上。1944年夏天,波兰流亡政府试图在苏联进军前波兰东部领土的过程中确立波兰对本土的权威,却以悲剧告终。事实证明,国家军和红军之间最初的联合行动,如1944年7月解放维尔诺的战役,是成功的。但是一旦前线开始向西转移,苏联就逮捕了当地波兰领导人,并命令国家军的士兵加入到苏联赞助的贝林格的军队中;绝大多数人拒绝后发现自己被遣往古拉格集中营。

1944年7月21日,红军跨过布格河(Bug),进入斯大林承认的波兰境内。然而即使是在这里,他也没空理会波兰“地下国家”。7月22日在海乌姆,一个苏联支持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PKWN)发布公告,自称为被解放波兰的有效政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它将致力于恢复1921年的民主《宪法》,实施彻底的改革,让德国付出代价,使波兰向西扩张。它自诩为类似于“人民阵线”的基础广泛的左翼和民主组织,但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波兰政党参与其中。委员会的主席由爱德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Edward Osóbka-Morawski)担任。他是一位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社会党某小团体的成员。安全、宣传和军事事务全部都由共产党员控制。7月26日,委员会在卢布林就职,开始

在被苏联占领的区域内拓展自己的权力,以及为自己的武装力量招募士兵。

于是在1944年夏天,波兰有两个相互竞争的中央政权。其中一边有非共产主义“地下国家”和国家军,受到绝大多数波兰人的支持,并且由于效忠于伦敦合法的波兰政府,其仍然被西方盟国承认;而另一边是苏联支持的委员会,尽管其在波兰民众中根基脆弱,但在苏占波兰创建政府结构时却得到来自苏联红军和安全部队的全力支持。

红军逼近华沙预报了波兰“地下国家”的最终悲剧。8月1日,国家军在华沙发起一次对德国人的大规模起义,想抢在苏联军队到达之前在城中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政权。他们期望在几天之内能从正撤退的德国人手中夺取控制权,但装备匮乏的国家军却发现自己战斗了将近两个月。德国人将他们一些最凶恶的部队派到华沙。拼死的巷战还伴随着对市民的大规模屠杀。红军到达维斯图拉河后暂停了军事行动,同时斯大林推迟了给盟军飞机使用苏联机场为起义者运送补给的权限。他要做的只是等待,等到纳粹消灭他控制波兰最后的波兰障碍。由苏联资助的波兰军队后来曾试图在9月跨过维斯图拉河,但没从苏联那里得到太多的帮助,以失败告终。

272

巴黎在8月以有限的人员伤亡和少许物质破坏获得解放,而华沙战役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令人绝望和残忍的城市战争之一。该城遭受的深重苦难于10月2日以波兰起义军投降作为结束。双方的军事损失大约各有1.7万人被杀害,但是市民死亡人数达到20万人,剩余的人口被从华沙城中驱赶出去,并在一次野蛮的复仇行动中被全部消灭;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华沙这座城市将消失,从此以后将只变成“地图上的一个点”。虽然起义的英雄事迹或许会让斯大林对波兰民族主义的力量留下深刻印象,但此役之后,波兰“地下国家”的心脏已经被撕裂,国家军也元气大伤。为波兰的独立而协同进行的最后努力以失败告终。

在已经清除了德国人的波兰地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施展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其安全部队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残忍

地追捕“反革命”国家军残余的部队；另一方面，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灵巧地见风使舵，在满怀疑虑的人群中赢得更加广泛的支持。一支新的、很大程度上由苏联掌控的波兰军队，由贝林格麾下的部队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熔合而成，已初具一支国家军队的雏形。这支军队将扩展到 40 万人，并将参与之后苏联进攻德国和最后攻占柏林的战斗。其他的举措意在激起爱国感情。卢布林的当局赞助文化活动，在 5 年占领期后人们对此存在强大的渴望，因此吸引了许多演员和作家的协作。此外，在斯大林的敦促下，当局还采取了一项为新生政权赢得乡村穷人（虽然“地下国家”已经在准备相似的立法）支持的举措：1944 年 9 月，一场激进的土地改革开始，将大的私有地产和农场以及超过 50 公顷（125 英亩）的耕地分发给贫苦农民家庭；单 1944 年就有超过 10 万户这样的家庭以这种方式受益，虽然大多数人最终只获得低于 3 公顷的微薄地产。残留的贵族和有地乡绅被从他们的祖宅中赶了出去。



图 47 1944 年华沙起义。人们可以推测出这些年轻女孩的命运，她们和许多其他人一起充当国家军的联络员。直到今天，大多数波兰人都对 1944 年时那些斗士们的勇敢和城市的勇气怀有敬意。但是他们对于起义是否明智，以及起义到底有何目标存有争议。这次起义失败留下的创伤让波兰人更懂得了以政治现实主义和克制的态度去面对 1945 年后的共产主义统治时期。

大局倒向对斯大林有利的一边：他对波兰领土的控制每天都在增加,并且比起促使波兰流亡政府改组,他现在更想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一个新波兰政府的基础,再把伦敦政府中某些可接受的“民主元素”加入进去。虽然比起罗斯福,丘吉尔对波兰的关注更多,并且他对苏联的态度也更加现实,但他在波兰问题上还是想与苏联合作,他认为,如果能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在波兰实行真正自由的民主选举,那波兰此后在新的边界线内仍可以确保一定程度的主权自由。最终美国和英国(越来越依赖于它在大西洋彼岸的盟友)都没有准备好因波兰问题损害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相反,罗斯福急于确保对日战争中苏联的帮助和与苏联合作建立一个战后新秩序,这一秩序以1945年联合国的建立为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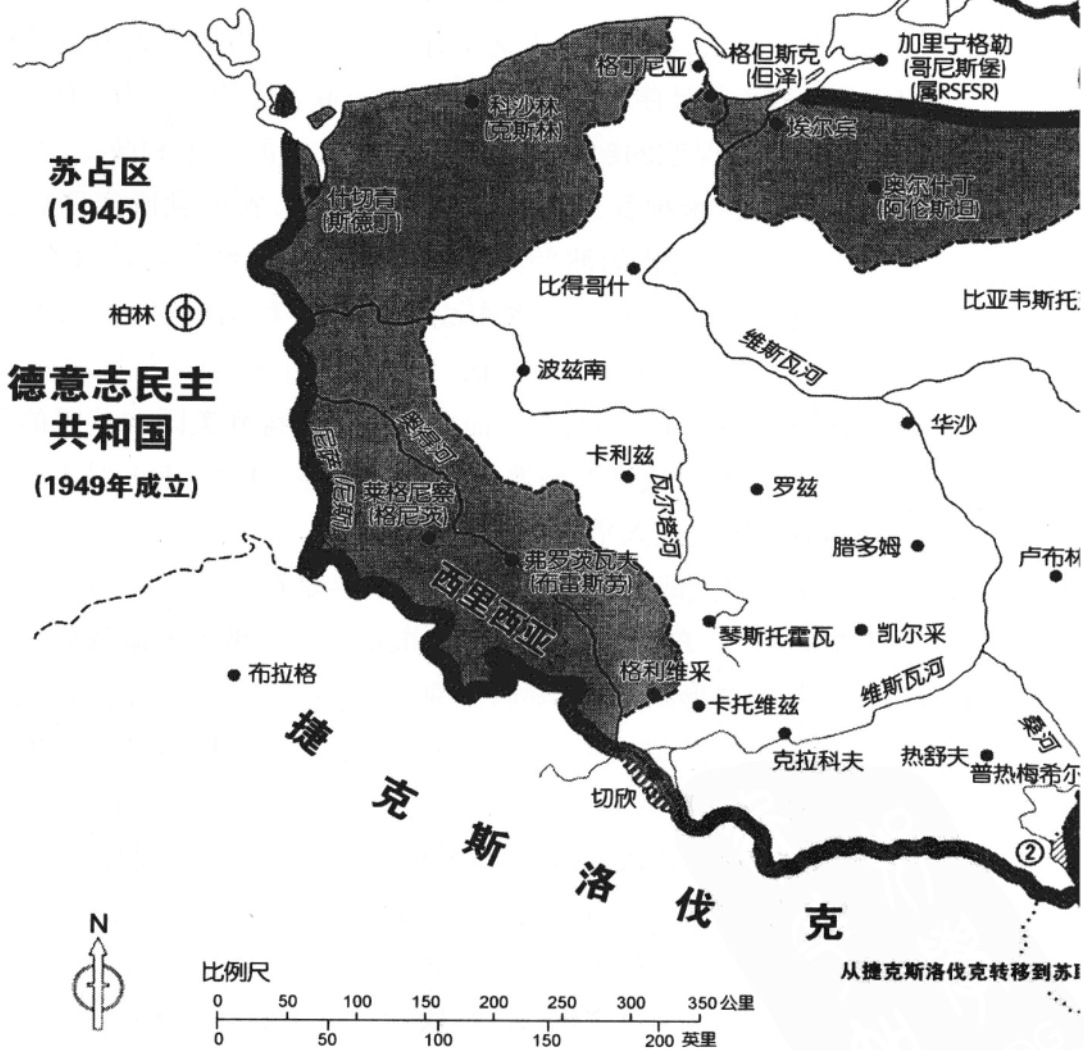
因没能成功确保他的部长同事们同意斯大林的领土和政治要求,1944年11月24日米柯瓦伊契克辞去总理职务,农民党脱离联合政府。对于斯大林,与伦敦的波兰人之间的游戏已经结束。1944年12月3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成为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并于1945年1月得到苏联的正式承认。由托玛什·阿尔齐舍夫斯基(Tomasz Arciszewski)领导的波兰流亡政府仍然得到美国和英国的承认,但是实际上它在解决波兰问题上已无足轻重。1945年1月17日,苏联赞助的波兰军队进入华沙可怕的废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波兰西部边界是在由波兰参与的凡尔赛和会上决定的,而东部边界则是在与布尔什维克俄罗斯激战后得到捍卫。1945年的情形则截然不同;如果一定要找个类比项的话,它类似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解决波兰问题的方式。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yalta)会议上,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建立“一个强大、自由、独立和民主的波兰”;它的东部边界粗略地沿着寇松线而行,同时在西部,波兰将从德国获得大量但面积仍未确定的领土。西方领导人还确保了斯大林同意扩展在华沙的临时政府,以包含“波兰本土和海外的波兰民主领导人”;这个政府将保证尽快举行自由的民主选举。在许多波兰人看来,雅尔塔会议标志着他们最终被西方盟友出卖。对于西方大国,在这个环境下,这似乎是一个解决波兰问题的实际方法,以可

- 1939年的波兰国界
- ▨ 1945年苏联再次吞并的领土
- 1945年移交给波兰的德占领土（以及但泽/格但斯克）
- ▨ 1945年重归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
- 自1945年开始的波兰国界
- ▨ 1951年做出的较小修改：①属苏联②属波兰
- 苏联内各个共和国的边界（1945）

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名称（1945）

276



地图 11 波兰“向西方靠近”(1945)



277

行的安全措施保证苏联不能全权控制波兰内政。米柯瓦伊契克表示,如果这些前提能得到保证的话他愿意返回波兰。当然这完全取决于这样自由的选举是否会发生,以及选举结果是否会得到尊重。

1945年6月21日在莫斯科发生的两次活动阐明了波兰新的权力态势。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优雅地结束了一个关于建立新的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的会议。依照《雅尔塔协定》,米柯瓦伊契克和其他5名非共产主义者加入到一个由波兰工人党及其盟友支配的20人内阁之中,由亲苏联的社会党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Osóbka-Morawski)领导。米柯瓦伊契克得到农业部长职务,并成为两位副总理之一,另一个是共产主义者哥穆尔卡。与此同时,在相距几百码远的工会总部的圆柱大厅里,装模作样的公审结束了非共产主义“地下国家”的16名军事和行政领导人,包括政府代表杨科夫斯基(Jankowski)和国家军最后的指挥官奥库里茨基(Okulicki)将军,他们全部都是于1945年3月在华沙郊外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绑架的。他们被宣告有罪,多数被囚禁入狱,罪名是组建非法组织,而最奇异的是控告他们与德国人合作。降临到他们这些人身上,甚至也降临在如今已解散的国家军的许多成员(他们曾经与德国压迫者斗争五年之久,而不久前他们公然反抗苏联阻挠他们国家独立的图谋)身上的悲剧,生动地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道德上的含糊性。在1944年至1947年间,大约5万波兰人,绝大多数是国家军的成员和“地下国家”的激进分子被关押在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中。7月5日,英国和美国最终收回他们对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承认。但这个政府将继续像幽灵一样存活到1990年,作为宪政合法性的一个象征,向全世界见证种种施加在它的国家身上的暴虐。

278

在欧洲所有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里,波兰人是与德国人斗争最久的,并且遭受了令人震惊的人员和物质损失。波兰在战争时期可估计出的全部死亡人数(包括非犹太人和犹太人)达到国家人口的1/5。波兰人也有很多理由不信任苏联人。波兰的悲剧再次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波兰直接处在苏联通往柏林的路线上,以及通往将要变成苏联在德国的占领区的路上;在这个关键意义上,比起匈牙利、罗马尼亚,甚至捷克

斯洛伐克(更不用提芬兰了)对于苏联,波兰在战略上具有更大的利害关系。比起苏联吞并超过前波兰 2/5 领土,苏联对于后三个国家的领土要求相对有限。虽然一些波兰人很担心,但斯大林在 1941 年后已经打算合并余下的波兰,让其完全成为苏联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苏联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即使已承认其名义上为独立国家,也要完全控制波兰。因此任何反抗苏联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而让米柯瓦伊契克进入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只是提供了一片无用的民主遮羞布,为了掩盖共产主义统治的现实,也是为了取得西方承认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 1945 年 7 月—8 月的波茨坦会议上,在一次最终和会前,英国和美国勉强同意了以奥得河—尼斯河(Odra-Nysa)作为波兰的西部边界,并从波兰控制的地区逐出剩余的德国人口。将广阔的前德国土地转给波兰是为了制约波兰,使它面对未来德国收回这些土地的要求时都要依赖苏联的保护。非共产主义“地下国家”也想在西部从德国那里得到一些领土,但是奋力争取获得整个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远到斯德丁(什切青)(Stettin/Szczecin)的地区,这一想法则首先是亲苏联的共产主义领导层设想出来的。其骄傲地宣称要使波兰回到 10 世纪时皮亚斯特波兰的边界。带着斯大林的祝福,并且采用战前的民族主义者——国家民主党人的语言,波兰的共产主义者宣扬在新的边界里建立同质性民族国家的理念。

279

大约 800 万西里西亚人、波美拉尼亚人和东普鲁士德国人,包括那些在红军到来之前已经逃走的人和如今被波兰人驱逐出去的人,为纳粹在东部扩大生存空间的梦想破产付出了残酷的代价。纳粹在波兰的种族清理现在以一次报仇颠倒;并由此结束了德国在奥得河以东地区超过 7 个世纪的拓殖史。在德国人离开的地方,在 1945—1946 年间迎来了大约 200 万从波兰中部来的移民,以及 150 万来自被从苏联吞并的东部大省“连根拔起”和“遣返的”波兰人。例如,利沃夫绝大多数波兰人,在几乎已夷为平地的前德国城市布雷斯劳找到了新家,这个城市也更为“弗罗茨瓦夫”(Wrocław)。维尔诺大多数波兰人也移居到新的波兰境内;这座更为“维尔纽斯”的城市已成为一座苏联辖下立

陶宛境内的城市。一个共产主义掌握的光复领土管理部拥有给新移民分配之前德国人拥有的土地的垄断权,虽然那里原属于大地主阶层的半数可耕种的土地,已被转换成新建的国家农场。在这片新波兰的“荒凉的西部”的生活最初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各种抢劫者在 1945 年至 1946 年间直接袭击前德国土地。大多数所谓的“本土的”、说波兰语的东普鲁士和前德国西里西亚的居住者仍然被允许继续居留,但是却受到不懂当地情况的外来官僚的歧视;他们在共产主义波兰的未来将不会快乐。在 1945 年到 1947 年间,超过 150 万波兰的强制劳工和囚犯从德国回来。新波兰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些年间就像一个庞大的火车站,几十万人在其中穿梭往来。

280

波兰的独立事业不仅因为西方撤销承认波兰流亡政府而削弱,而且由于英国政府让在西方的波兰军人复员;这对于那些盼望一次东-西欧大冲撞即将到来的波兰政治家们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安德斯将军拥有 11 万兵力的强大的第二军团驻扎在意大利,由很多来自战前波兰东部的士兵组成。战争最终的结果让他们已无家可归,成为最痛苦的人。对英国政府来说,波兰在西方的军队及其他武装形式,是政治上处境尴尬的存在和严重财政负担的根源之一。这些武装力量由于有被德国释放的波兰战俘,德国第三陆军征召去的波兰人得以复员,和一些在早期改变立场的波兰人而不断扩大。然而,尽管新的英国工党政府敦促所有的波兰军人回国(确实也有大约一半的军人回国了),但是它拒绝向华沙的亲苏联政府交出所有波兰西部军队的指挥权。大部分的剩余波兰军队被转移到英国;这些军队不明确的法律地位随着 1946 年“波兰安置团”的形成而解决。波兰安置团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非战时状态的单位,为退伍的男女军人日后在英国以普通老百姓身份生活做准备,其隶属于英国军方。1951 年,英国土地上有 13.6 万波兰人,其中有 4.9 万人生活在伦敦,到 50 年代中期时,这些波兰人成为当时英国的第二大少数民族。当年总共有 50 万的波兰人选择了政治流放,在西方国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主要选择的国家是英国、北美国家和澳大利亚。

在波兰,数以千计与新政府敌对的由前国家军士兵组成的游击队

和其他武装力量,继续同苏联安全部队及其波兰盟友进行绝望的抗争。但是对于数百万波兰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已经精疲力竭、贫困不堪,对于挚爱亲人的逝去痛苦万分,每天还要被迫在黑市里交换物品得以生存。战争的结束当然能带来巨大的解脱,民众对于重建和回归正常生活的强烈欲望,不断升级,势不可挡。亲苏联政府早期的实用主义政策,吸引了大批年轻的激进农民、工人和很多梦想在一个重建的新世界中大展宏图的知识阶层,也似乎迎合了群众的期盼。同时,米科瓦伊契克的出现和他领导的大型农民党的合法运动,似乎预示着在波兰被强加的国界线内,自由和民主不会被丢失。然而,在现实中,接下来的几年将证明,这只不过是两个极权主义时代间的过渡期。

第七章 共产主义与“冷战” (1945 — 1989)

281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煎熬之后,波兰就其领土范围、人口规模与构成、政治与社会秩序以及与邻国的关系方面来说,已成为一个与战前共和政体完全不同的新国家。波兰在东部地区的领土损失和在北部、西部补偿性的领土扩张,极大地改变了波兰在欧洲版图中的形状和位置。新波兰比原来小了 20%,但是却更紧凑,而且波兰获得了一条 300 英里长的波罗的海海岸线。虽然破坏严重,但是前德国占领的土地仍比割让给苏联的地区发展得更好。1946 年,新波兰的居民人口不足 2 400 万,1939 年却有 3 500 万人,但是如今波兰种族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死亡、迁徙和驱逐几乎彻底摧毁了战前波兰的政治和社会精英群体。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估计达到其生产能力的 2/5,使波兰成为当时欧洲遭到最严重毁坏的国家,只有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可以与之比拟。随之而来的是民众营养不良、住房极度短缺、结核病和性病泛滥成灾。战争还遗留下了成千上万的残疾人和孤儿。

282

新波兰仍然处于苏联严密的军事和政治控制之下。国内所有主要实权位置都握在工人党手中,同时波兰秘密警察安全部由曾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受过训练的斯坦尼斯瓦夫·拉德凯维奇



图 48 1945 年春,一片废墟的华沙街头排起打水的长龙。虽然华沙的公用设施 80% 以上都遭到毁坏,并且生活条件简陋,但是 1944 年许多以前在华沙生活的居民还是大规模地回到华沙。

(Stanisław Radkiewicz)负责指挥,而且波兰红军和恶名昭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则在幕后牢牢掌控了大局。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真正受欢迎的领导人,波兰工人党深切意识到他们需要时间去巩固其地位并发展党员人数。为了动员人民参加到艰巨的战后重建任务中去,也为了让自身的政权更具合法性,新政府必须制造广泛的爱国诉求。其重要举措之一是通过强调 1945 年后的国界,宣称最终会成立一个由纯粹波兰民族组成的新国家,代表着向最初波兰皮亚斯特时代的回归。雅尔塔与波茨坦会议形成的决议要求波兰有所动作,推动多元主义发展。因此,在严酷打击残余反共产主义势力的同时,民族统一临时政府在经济重建、文化和宗教领域推行实效和灵活的政策。

283

在 1946 年 1 月,所有雇用工人超过 50 名的工业企业都被国有化。但是大部分经济活动,特别是零售业和农业,仍处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新成立的中央计划办公室受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专家的影响,提出推行适度的中央集权,设想能继续实行混合型经济。政治出版物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但无论如何,多种多样的出版物和艺术创

作,包括电影和广播是被允许的。在快速新建的学校和匆忙筹建的大学中,当局仍未对教学实行意识形态上的监管。

虽然政府于1945年9月废除了1925年的政教协议,但是教会方面意识到需要与新政治秩序妥协。教会保有完全的信仰自由,怀着必胜的信念在所谓的“收复的土地”上逐步为数百万的波兰民众建立新的教区,接收那些离去的德国新教徒遗留下来的残破的教堂。国界和人口数量的改变,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波兰自14世纪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神职人员忍受的苦难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高尚的爱国行为,都使教会的地位在波兰社会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1939年之前相比,教会在战后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民族认同。难怪当权者在处理与教会关系上都会谨慎行事;斯大林主义者鲍·贝鲁特在他1947年的主席就职演说中甚至引用了“so help me God”(帮助我吧,上帝)这样的传统祷词。

然而,政治权力斗争仍在持续,在各地产生了一种不安与暴力的气氛,甚至有几分像内战。西方大国与苏联军队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这将会颠覆苏联对波兰的支配。这样一种假象激励着反共产主义的游击队(森林军团)一直存活到1947年。大约有3万人在这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中死去,其中大部分是新政府的反对者。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遭到迫害,这种反犹情绪(最臭名昭著的是1946年7月在凯尔采发生的排犹事件)的爆发是那个动荡时期的一个残忍特质。在新的共产主义领导层中,许多最优秀的党员拥有犹太背景,这加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反犹情绪;原属犹太人的房屋和财产如今被他人占有,这不仅引发了许多争论,也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紧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幸存的犹太人选择了移民。在波兰最东南部,当地的乌克兰人被强行驱逐,以此作为企图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背水一战,与波兰共产党和苏联武装力量展开斗争,结果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对波兰工人党来说,更具威胁的是新近重新组建的波兰农民党

(PSL),其由米柯瓦伊契克领导。到1945年底,该党人数已经达到波兰工人党的两倍多。波兰农民党在农村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而且由于战前主要中间派和右翼政党此时已消失,它也成为波兰社会中反对工人党的各阶层关注的焦点。工人党认识到了自身的弱势,不顾一切地试图避免重蹈1945年11月匈牙利共产党选举惨败的厄运,所以极力反对米柯瓦伊契克主张的、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波兰许诺的自由选举。

工人党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利用恐吓、暴力和选举欺诈的手段,将波兰农民党从公众生活中剔除。为了推迟竞选活动,工人党在1946年6月30日诉诸于全民投票的方法,提出了三个问题:是否同意废除议会;是否同意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否同意奥得河-尼斯河边界的问题。工人党希望所有选民一致同意政府的建议,从而赋予当局一定程度的合法性。波兰农民党宣称保持独立性,建议对第一个问题投否定票;地下反共产主义者要求对两个甚至三个提议都投否定票。工人党完全控制着选举委员会,声称有68%的选民投票赞成三项提议;实际上,根据后来公开的工人党机密记录看,只有27%的选民投赞成票。公投结果造假一直是工人党当政时代最严格保守的秘密之一。1947年1月19日大选终于举行,工人党最终与农民党正面对决。农民党拒绝加入工人党支持的单一竞选名单,而是要作为独立的党派参选。数千名农民党积极分子以及100多名农民党候选人遭到当局逮捕,同时投票站的数量也急剧减少;超过1/5的选民因所谓的同情右翼倾向而被剥夺了选举权。一个恶毒的宣传把农民党说成是西方的傀儡。官方公布的作弊选举结果完全在人们意料之中:工人党为首的政治集团获得了80%的选票,而农民党只获得了10%的选票。然而,近期一些零星的调查显示,即使在如此严重的胁迫下,农民党依然得到了60%—70%左右的选票。雅尔塔会议所承诺的自由选举不过成为了一场闹剧。美国和英国的抗议没有发挥作用,共产主义政党接管波兰的事实促使西方大国和苏联之间的裂痕加深。

1947年2月成立了新政府(不再是“临时的”),由支持工人党的社

会党员约瑟夫·西伦凯维兹(Józef Cyrankiewicz)领导,他是一个灵活的政治家,担任总理一直到1970年,同时国内主要部门仍然都掌握在工人党手中。1947年10月,米柯瓦伊契克逃离波兰,波兰农民党瓦解,政党残余部分由亲工人党人士接管;1949年11月,农民党正式被吸纳到支持工人党的波兰统一农民党(ZSL)中。尽管1947年颁布了表面上民主的“小宪法”,但是工人党当局还是掌握着实权,工人党的总书记则直接由斯大林任命。

那时的政治局势给工人党留下一个尴尬的问题,波兰社会党战时的领导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都不太了解苏联共产主义。尽管战后社会党在波兰以一个与工人党合作的左翼派系为主进行了重建,但是许多普通的社会党成员期望他们的政党享有完全的平等权(一直到1947年,社会党的党员人数都还多过工人党)且不被苏联化。他们希望波兰可以保留自治社会组织、工会和合作社的多样性。然而,在1947年大选期间,由于社会党参与了工人党的舞弊行为,并与工人党合作,其在性质上已和工人党没什么区别。

286

1947年和1948年,在不断恶化的“冷战”气氛中,莫斯科加强了其对卫星国的控制。这些国家不仅须摒弃参与“马歇尔计划”有关的任何项目,而且也被迫加快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方面采用苏联模式的步伐。1948年,斯大林与铁托(Tito)决裂后,苏联阵营中的众多共产主义政党,都采取措施消除所谓的“铁托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偏离。1948年9月,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因提倡走较温和的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被迫辞去副总理职务,其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之职也为鲍·贝鲁特所取代。1948年12月,在全面清洗和恐吓威逼下,波兰社会党同意与波兰工人党联合组成波兰统一工人党(PZPR),此后共产党以该党之名一直执政到1989年。

波兰所有战前的较大政党都被禁止、被迫自行解散、被共产党吸收,或者被改得乱七八糟,成为统一工人党的附庸;最后一种方式对向外国人证明波兰的政治多元化是很有用的。但实际上统一工人党已经实现了霸权。它通过利用“就业保举制”(nomenklatura),在公共部门

的每个层次建立党支部,控制了全国的所有机构,在斯大林主义波兰的“勇敢新世界”中,统一工人党没给任何独立于该党的政治社会活动留有空间。对于很多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机会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来说,加入统一工人党会为其提供光明的前途。1952年7月,斯大林亲自修改的一部新《宪法》,把工人阶级奉为“社会的领导阶层”,宣布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1952年后的选举变成了象征性的集体仪式,99%的选民投票同意由统一工人党领导的“全国统一战线”(Front of National Unity)的候选人名单。色姆(全国议会)则退化为一个不经审查就批准所有政党决议的“敲章机器”。统一工人党控制的政府系统从来没有享有以自由言论和真正民主选举授权为基础的合法性。

287

警察和安全机构(1953年时数量超过20万人,将近战前警察人数的6倍)对被紧张气氛恐吓的人民保持高度警惕的监督,并且小心翼翼地动员民众举行公开游行或是其他活动,虚伪地表达团结喜悦的心情。民众对告密者的恐惧压制了一切自由言论并且破坏了一切自然的社会关系。1945年至1956年间,有5000件政治案件的判决为死刑,其中有一半政治犯被执行了死刑。数万人都经历过或长或短的无理由监禁;波兰成年人中有三分之一被记录在案。司法系统、所有的工会、青年学生组织、出版社全都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斯大林也并不信任波兰军队。波兰本国的军官被清除,1949年11月,他任命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指挥波兰军队,此情此景让人回想起1815年至1830年间康斯坦丁大公在波兰王国那次令人侧目的任命。截至1952年底,波兰军队中3/4的现役将军都是苏联公民。同时,数百万在国家边界变动后留在苏联境内的波兰人,失去了他们的文化组织和社会组织,并逐渐失去了他们的教区神父和教堂;只有在苏联的立陶宛境内还有一些波兰语学校被允许开放。数万名波兰囚犯仍在古拉格苦力营中遭受奴役之苦。

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被强行实施。在1950年,希拉里·明兹(Hilary Minc)——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在破坏并剥夺

了私人零售业和所有合作社的自治权后,又颁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重工业的六年计划。用于示范重工业化的成功案例是位于新胡塔(Nowa Huta)的列宁钢铁厂。新胡塔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城镇,特意修建在老城克拉科夫旁边,想使这座波兰保守主义的城堡相形见绌。当朝鲜战争期间国际局势紧张加剧时,大量的工业扩张是以实际工资和消费的损失为代价的,但是随之相伴的斯达汗诺夫运动,则宣传其是为了适应军备的需要。成千上万的年轻而贫穷的农民被彻底地迁出农村,住在工业区的临时宿舍中,并得到许诺,他们将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他们真诚的热情经常被酗酒、低效率以及一种错位感所挫伤。国家提供基本的福利,尽管这覆盖了活跃在工业部门中的劳动力,但却以老年人和农村人口蒙受损失为代价。但无论如何,战前可怕的失业魔咒仿佛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数万名农民和工人在新的城市中心和在由国家制定的经济和行政机构中是社会进步的希望,这鼓励着人们对新秩序尽忠,并且成为新政权不断壮大的核心支持者。但是当工业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时,农业却相应地凋敝。在1944—1945年间,共产党把大部分耕地分给了农民,但从1949年开始逐步强行集体化,到1955年,将近1/4的耕地归属于集体或者是国家农场,尽管后者主要位于人口稀少的前德国占领地区。粮食产量不可避免地下降,导致了强制征用(尤其在1950年至1951年间)与食物定量配给制。尽管整合前德国占领地区的速度非常迅速,但是新居民仍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感受到家的感觉。

社会工程和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方法也运用于教育方针政策中,同时也用于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阶层。以“积极”的区别对待方式,来自农民和无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受到鼓励,接受高等教育,而对于“资产阶级”家庭和“反动派”家庭背景的孩子,机会却被减少了。教学大纲修改得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许多苏联的教科书被翻译成波兰语使用,并且在学校中俄语成为必修课。所有14—25岁的年轻人都被征入苏联式的先锋队和共青团组织,同时军队入伍士兵要接受两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大量资助扩大出版物的发行,扩建电影院、戏院和音乐厅,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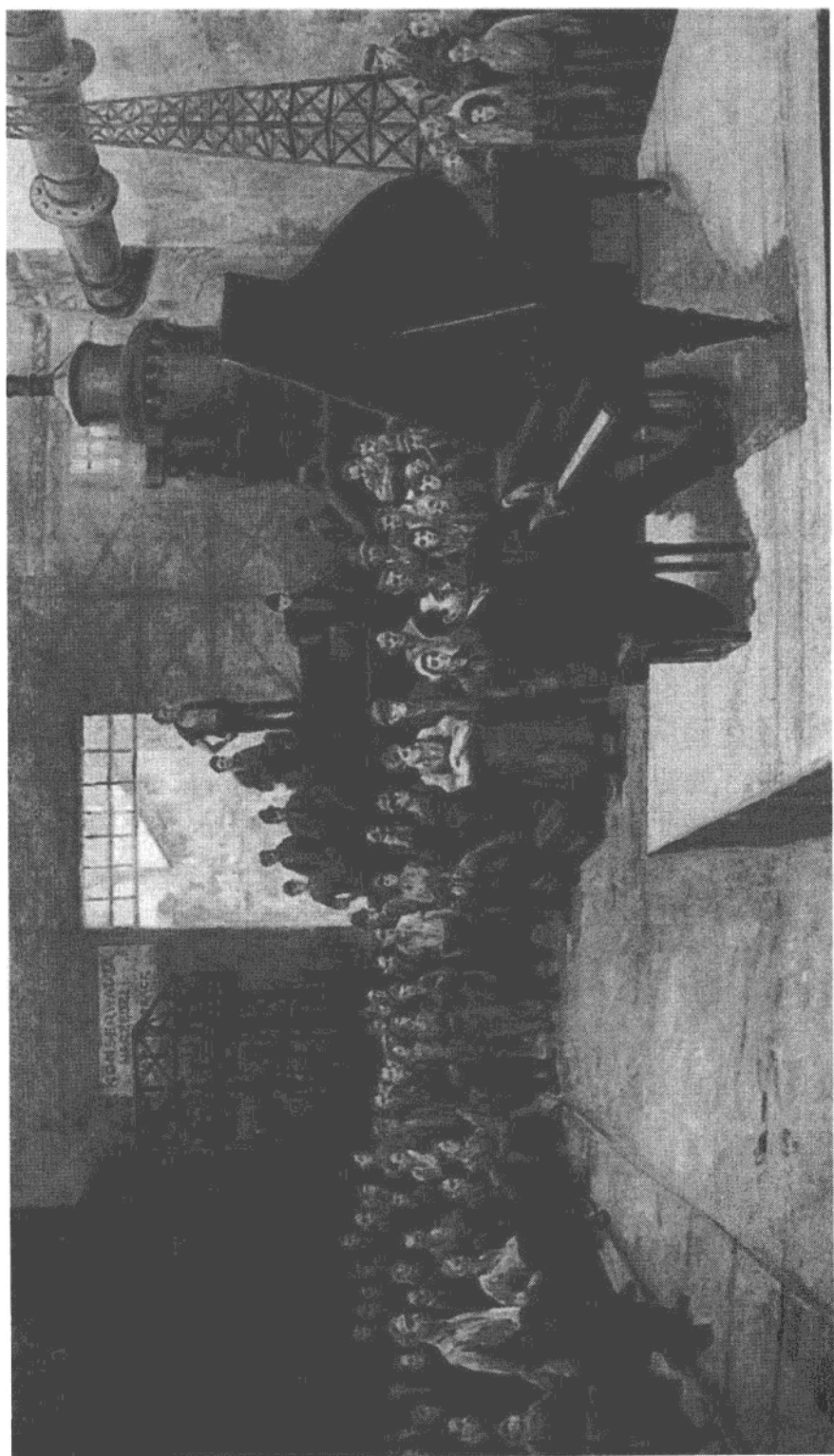


图 49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大众带来的文化。肖邦的《A 大调波兰舞曲》响彻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内霍茹夫(Chorzów)市的科什乌兹科钢铁厂。由梅谢斯瓦夫·瑟温-欧拉茨基(Mieczysław Serwin-Odracki, 1912—1977)绘于1952年。坐在钢琴前的是钢琴家瓦迪斯瓦夫·克德拉(Władysław Kędra),他像其他艺术家一样经常在工厂表演。直到新胡塔市建立之前,霍茹夫市一直拥有波兰最大的钢铁厂。

290 化在空前范围内被提供给大众。1957年,波兰以国内拥有27个交响乐团和9间大歌剧院而自豪。但是这场文化盛宴的内容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任何疑为宗教性的、反俄的或者“低俗的”内容都被排除在外。1951年,所有大学的英语系都被撤销,但华沙作为潜在的意识形态中心不在其列。

按照文化委员沃兹米尔兹·索科尔斯基(Włodzimierz Sokorski)的指示,文化政策的主要推力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许多年后被安杰依·瓦伊达——波兰最杰出的电影导演之一——定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代表的不是当下的现实,而是它应该成为的现实”。关于社会主义成就的小说,或者关于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英雄钢铁工人的小说,以及工人英雄挫败帝国主义间谍和反革命分子不轨阴谋的小说,在1949年至1953年那个时代蔚然成风。像兹比格涅夫·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和斯蒂凡·基谢莱夫斯基(Stefan Kisielewski)这样拒绝加入“斯大林主义唱诗班”的诗人和作家们受到排挤。官方允许书籍和电影表达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纳粹占领时期的恐怖。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专业研究必须屈从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要求;甚至在科学方面,研究者也必须推崇对资产阶级遗传学和相对论的斯大林主义式的批判。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在他的《被禁锢的思想》(*The captive mind*)一书中,尝试首次敏锐地分析了波兰知识阶层对斯大林主义的幻想和其脆弱性,这本书在他退党去西方后于1953年在国外出版。

292 罗马天主教会作为精神和道德价值体系的替代品提供者,也是唯一一个仍然为全国性的自治机构,不可能逃脱斯大林主义无神论的强烈抨击。事实上,1949年时,教皇庇护(Pius)七世威胁所有加入共产党的天主教徒将开除他们的教籍,梵蒂冈教廷也没有正式承认波兰的西部新边界,并且直到1956年还一直承认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这些事实都为打击教会提供了便利的武器。尽管天主教会和当局在1950年达成了相互谅解,当时教会凭借着对国家的忠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活动权利,但是许多教会经营的组织和慈善机构还是被迫解



图 50 1953 年 11 月在英国埃塞克斯(Essex)的凯尔文登(Kelvedon),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探访一个为波兰难民提供的安置营。在 1939—1941 年间安德斯被苏联监禁,之后他在中东和意大利领导波兰第二师的。能力超群的安德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 1945 年后的流亡者事业中波兰军队勇猛的一个鲜活化身。对于华沙的共产主义政权,他是一个反动的可恨象征。他于 1970 年逝世,与他的那些在卡西诺山牺牲的士兵们埋葬在一起。

散,学校、医院和军队禁止宗教活动,当局也不鼓励人们到教堂参加礼拜活动;神父和主教则不断受到打击。当局使用不同的手法从内部分裂教会;甚至在酝酿切断波兰教会与梵蒂冈之间联系的阴谋,企图创造一个国家控制的全国性教会。虽然贝鲁特试图通过切断所有教堂的塔尖来使华沙的天空重归世俗怀抱的荒唐计划所幸未能实施,但1951年在华沙市中心建起了一座波兰科学文化宫,这是斯大林送给波兰的“礼物”,也是一个代表苏联统治的高耸象征。

1953年,当国家垄断了教会的所有任免权,并且要求所有神职人员对国家宣誓效忠时,反教会运动达到高潮。新主教斯蒂凡·维辛斯基(Stefan Wyszyński)虽然最终建议人们服从政府,但是他个人却公开象征性地表示拒绝:“我们不被允许将和神有关的东西置于暴君的祭坛之前。万万不能^①!”维辛斯基因此被逮捕后,大量的主教和神职人员随即被捕,还有许多修道院和教堂被迫关闭。重要的天主教周刊,克拉科夫的《普世周刊》(*Tygodnik Powszechny/Universal Weekly*),因为拒绝在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发表颂词而被取缔。当维辛斯基仍被拘禁时,主教团在1953年7月屈服于国家的要求。

正当斯大林主义对波兰的控制日益严厉之时,流亡英国的大约15万波兰人则维持着一个名副其实的“流亡国家”。流亡总统拉奇凯维奇仍然执政,像阿尔齐舍夫斯基(Arciszewski)政府一样,仍然被罗马教廷、西班牙以及一些更小的国家所承认。大部分战前的政党和一些新的政治团体都继续在英国活动,并且保持世界各地只要有波兰人存在的国家就有分支机构。尽管流亡的生活很艰苦,在英国的流亡者们居住得也很分散,但是波兰人凭借老兵协会和大量的社会、教育、宗教组织的支持,社会文化生活仍然保持活跃。战前波兰的某种氛围在“波兰的伦敦”通过玛丽安·海马尔(Marian Hemar)的卡巴莱讽刺歌舞剧表演和类似位于展览路的波兰夜总会这样的机构得以重建。杂志、报纸、学术著作和战时回忆录由流亡出版社大量出版。这些流亡者在等待国际

293

^① 本句为拉丁文,Non possumus 意指“宣称拒绝按某种方式作为”。——译者注

形势变化到有利于他们正统主义的事业,不屑与任何因与波兰共产党合作而变污秽的人为伍;这其中包括 1947 年从波兰逃往英国的米柯瓦伊契克。他很快就去了美国,在那里,他确保了美国最大的波兰人组织——美国波兰人议会与之合作;许多在法国的波兰人也追随他的领导。

就像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大移民”警告西方沙皇的专制独裁一样,1945 年后的流亡者,被有些人看做是“第二次大移民”时代的移民,促使西方国家认识到苏联共产主义的危险以及苏联暴行的现实。这些流亡者获得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胜利:1952 年 12 月,美国众议院宣布苏联要对卡廷大屠杀负责。朝鲜战争的爆发点燃了流亡者的希望:波兰问题将会重回国际论坛上。美国政府拒绝了苏联安德斯将军在西方重建波兰军队的提议,但是美国政府吸收各式各样的流亡团体加入亲美的间谍活动中;这不可避免地危及流亡者的事业。美国对于波兰语广播“自由欧洲”的支持更有建设性,并且更加持久;其开办于 1952 年,由杨·诺瓦克·热兹欧安斯基(Jan Nowak Jeziorański)领导,他是一位杰出的记者和说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和在纳粹占领的波兰之间活动的地下情报员。“自由欧洲”广播从慕尼黑发射信号,每天播出 19 个小时;尽管受到大量干扰,但是在波兰境内却被广泛收听。“空中战争”成为“冷战”的又一个主要战场。以前共产党对外国间谍和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保持警惕,现在对流亡分子和流亡组织的活动也保持高度的警觉,并且阻碍国内的波兰人和他们出国的同胞联系。但与这种敌对状态相矛盾的是,有一件事却将这对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敌人联合了起来:因为在坚持主张波兰对战前东部边界的权力时,流亡者们也要求国际上承认奥得河-尼斯河线作为波兰的西部边界线,并且积极地参与对抗西德复仇主义分子的活动。

294

不用说,流亡者的政治世界同样充满各种斗争与分歧。前外交部长奥古斯特·扎莱斯基(August Zaleski)在拉奇凯维奇于 1947 年逝世后继任为流亡政府总统,但他疏远流亡的社会党人和民族主义者国家党人;并在 1954 年任期结束后他拒绝卸任。于是一个与之竞争的、行

使总统职责的团体建立起来,即“三人委员会”,由安德斯将军、托玛什·阿尔齐舍夫斯基[1955年他去世后由波兰前国家军司令布尔-科莫洛夫斯基(Bór Komorowski)将军接任]、爱德华·拉琴斯基(Edward Raczyński)伯爵[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外交官,前波兰驻圣詹姆士(St James)教廷大使]组成。“三人委员会”在流亡者中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逐渐被孤立的扎莱斯基的位置也受到进一步威胁——他的两个“总理”决定返回社会主义波兰。1955年,波兰共产党当局开始对散居在国外的波兰人开展宣传行动,同时采取措施决心破坏流亡者的政治影响力。

尽管带有极权主义特色,斯大林教条主义从来没有使波兰变成苏联模式的简单翻版,并且避免了一些在其他卫星国出现的极端情况,例如1949年至1952年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发生的对共产党领导成员的肃清。但是后斯大林政治的解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首先局限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第一步是1953年在波兰安全机构内部开始小心翼翼的清理整顿。公安军(UB)的高级官员约瑟夫·希文艾迪罗(Józef Światło)在1953年12月叛逃西方,并于1954年秋在“自由欧洲”广播中揭露公安军的黑幕,在党内引发了普遍的混乱。公安军非法行为的替罪羊立即就被找到了。1954年12月,公共安全部重新改组,其声名狼藉的长官拉德凯维奇被调离,以一种温和的后斯大林方式被降级到国家农场部门。自1951年8月被逮捕的哥穆尔卡被悄悄释放。1995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公开谴责斯大林时期的高压统治。但对于共产党领导者来说,容忍党内的批评似乎变得愈加困难,主要是许多和《直言》(*Po prostu*)周刊有联系的年轻共产党员,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许多讨论社。诗人亚当·瓦兹克(Adam Wazyk)在他出版的《给成年人的诗》中质疑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所付出的代价;与此同时,在文学上,马雷克·赫拉斯科(Marek Hłasko)发起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攻击,他是一个黑色现实主义的青年反叛典型。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25日的苏共十二大上对斯大林主义的谴责,成为一个清晰的信号,表明压制的旧体制已经要远去,为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

1956年3月12日,贝鲁特在莫斯科的逝世增加了四面楚歌的斯大林主义所承受的压力。它却给正处于低潮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带来了一个适时的机会,在新领导人爱德华·奥哈布(Edward Ochab)的带领下与被委婉地称为“错误与扭曲”的时代决裂,将错误归咎于贝鲁特。但是对数千政治犯的特赦并不能满足对改变日益增长的要求。举国上下恐惧气氛的蔓延,持续的低生活水平,这些都导致了1956年6月28日在波兹南市爆发的大规模群众游行。人群举着国旗,唱着宗教颂歌要求“面包和自由”;秘密警察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总部遭到袭击。虽然最终被军队和坦克镇压下去,但波兹南的反抗是一个尖厉的警报,表明共产主义体制在波兰正面临一次深度危机。超过百万名朝圣者于1956年8月25日至26日在琴斯托霍瓦的黑色圣母圣殿参加从瑞典侵略下解放300周年纪念活动,表明强大的民族情感正在集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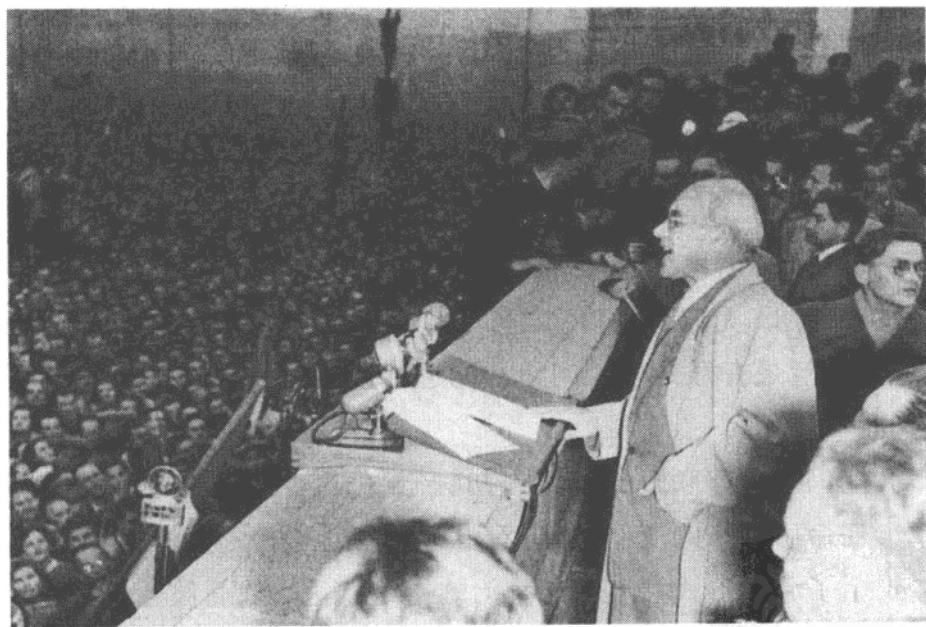


图 51 斯大林主义的结束。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他声望最鼎盛时,在1956年10月24日向成千上万华沙人演讲。他呼吁大众结束游行并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总结道,“团结工人阶级和民族,我党会领导波兰沿着一条新的道路通往社会主义。”在1956年10月,哥穆尔卡的声望或许可以和1920年5月的毕苏茨基以及1980—1981年间的瓦文萨相提并论。觉醒很快随之到来。

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日益与人民大众隔离,做为对应举措,党内提出了两种相对抗的解决危机策略。改革的鼓动者号召实行可掌控的自由主义化体制;而强硬路线者则想通过替罪羊疏导人民的不满,替罪羊包括丧失名誉的安全部门中的犹太成员。两组人都希望寻找到政治背景清白的新领导人。刚被释放的斯大林镇压下的牺牲品哥穆尔卡正是理想的人选。改革主义者成功地将许多工人、党内知识分子争取过来,并且与哥穆尔卡联合起来。党魁奥哈布也精明地表示愿意辞职。但他们并未征询莫斯科方面的意见。因此,当1956年10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全体大会以解决国内危机时,部署在波兰的苏军开始在华沙集结。国内革命的气息开始在空中弥漫,在为反抗做准备。在这个关键时刻,狂暴的赫鲁晓夫和大多数苏联领导人在波兰首都突然出现。但在富有戏剧化的夜谈后,哥穆尔卡成功地说服苏联领导人:采取的补救措施既不会破坏体系的根本原则,也不会让波兰偏离社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支持对莫斯科也有一定的影响。在10月20日的一次主要演讲中,哥穆尔卡攻击斯大林主义的非法行为、集体化政策的失误,还有对苏联的过分依赖。10月21日新的政治局出台,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急于减轻苏联的担心,同时又必须满足人民对他作为国家领袖对抗苏联控制的热切期盼。1956年11月,苏联对匈牙利革命进行的残酷镇压警醒了哥穆尔卡,这对波兰是有好处的。匈牙利的遭遇向波兰证明了苏联的容忍是有限的。

波兰仍处在苏联政治集团内,共产党仍然保持其垄断权力。而哥穆尔卡任命后带来的变化,标志着跟过去的斯大林主义的根本决裂,使波兰走上了温和形式共产主义统治的道路。这是战后波兰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罗科索夫斯基被剥夺了对波兰军队的指挥权并返回苏联,秘密警察沉寂下来,一些最恶劣的斯大林主义施暴者遭到审查,党的各级领导人都有变动。最可恶的工厂主管都被工人们赶走了,许多工厂建立起工人委员会,作为对死板的官僚作风的矫正。几乎所有的集体农场都被解散。主教维辛斯基重获自由,他的道德权威得到提高。当局

与教会之间达成谅解,作为交换,教会帮助国内恢复稳定。宗教教育回归学校,兹纳克(Znak)团体的5位天主教代理人得以占有色姆中的席位。哥穆尔卡为波兰的利益与莫斯科就军事及经济问题成功地进行了重新协商;苏联不再以极低价购买波兰的煤。应被遣返而仍被拘留在苏联的20万波兰人得到保护。国内与居住在西方的波兰人联系增多,出国旅行也放宽了限制。1960年,美国给予波兰贸易最惠国待遇。东西方之间的屏障与阻隔也在逐渐减少。

虽然流亡者仍能协同行动,例如1956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加宁访问英国期间,有2万名波兰人在伦敦举行示威,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流亡政府”或“流亡国家”的影响力在普通民众中开始消逝;日常生活以及在他们的孩子中保存波兰语言和文化成为优先于政治的首要问题。在西方生活也有舒适和引人入胜之处。先前致力于推翻共产主义政权的流亡者领导人发现已难以适应波兰的新现状。位于巴黎郊外的文学协会传递的消息被证明是更有想象力和魄力的,其由富有政治远见的、在流亡者之间被称为“糟糕的孩子”(enfant terrible)的耶日·盖德罗伊奇(Jerzy Giedroyc)建立。盖德罗伊奇和他的助手尤里什·梅洛谢夫斯基(Juliusz Mieroszewski)编辑的月刊《文化报》(Kultura)在整个“冷战”时代成为流亡者中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比起叫嚣推翻共产主义,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共产党的改革上,希望通过公开而开放的方式影响在波兰的进程。《文化报》常刊登一些流亡者中顶尖作家的文章,包括曾经为华沙政府工作的人,如米沃什,也有一些住在波兰用假名投稿的作家,以及在苏联被禁的俄国作家。《文化报》也从事着淡化波兰人与其东边邻国的历史仇恨的工作;它号召波兰人与立陶宛和乌克兰和解,接受失去维尔诺(维尔纽斯)和利沃夫的事实(这两地仍然被大多数流亡者认为是历史上不可分割的波兰领土)。《文化报》讨论犹太人议题,这个问题总是很大程度上被波兰官方批准的出版物所忽略。尽管共产党对边境加以控制,但是《文化报》及其讯息仍然送达大量的波兰学者和学生手中,对战后波兰的新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波及波兰东边的邻国。

在波兰,哥穆尔卡的政权获得大多数人民的认可,同时国内的相对稳定消除了预防性镇压的需要。1956年后,从意识形态控制下解脱出来的文化领域开始复苏。维托尔德·卢托斯瓦夫斯基(Witold Lutosławski)和克里斯托夫·潘德列茨基(Krzysztof Penderecki)的革新主义音乐作品很快获得国际性的声望,而安杰依·瓦依达史诗般的战争电影标志着战后波兰电影的突破。斯瓦博米尔·穆罗杰格(Sławomir Mrożek)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讽刺作品,斯坦尼斯瓦夫·蓝姆(Stanisław Lem)则作为波兰最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开始了他的漫长事业。新学院派卡巴莱音乐剧为艺术界吹来了一阵清风。而学术研究领域允许更大的多样性。此时适逢波兰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上取得成功,这又增强了复苏中的民族自豪感。波兰是苏联集团中最自由的国家,或者就像俗谚说的:“露营中最快乐的营房”。

但是对于那些期待进一步自由化的人们来说,这里只有失望。尽管1956年哥穆尔卡表现得很勇敢,但是他还是顽固地反对修正主义,即在共产党内部实行民主化和工人自治。1957年10月,波兰杂志《直言》被关闭;1958年,工人委员会被解散,由松散的党领导的团体取而代之。当局打击修正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并逐渐扩大成一场强制国内的所有作家和知识分子与党严守党的战线的运动;1963年,穆罗杰格离开波兰,而1956年结束流亡回国的著名作家梅尔基奥尔·万科维奇(Melchior Wańkowicz)在1964年以在私人信件中有“危害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家利益倾向”的罪名被判3年监禁。1965年由于公开表示国家的统治阶层是共产党当局而不是工人阶级,年轻的修正主义分子雅采克·库龙(Jacek Kuron)与卡罗尔·莫泽列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被开除党籍,支持他们的著名哲学教授科瓦科夫斯基(Koźakowski)第二年也被开除出党。

对经济改革的期望落空。哥穆尔卡政府继续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政策,强调重工业,且并不擅长处理经济事务,因此波兰国内的生活水平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并无多大改善。波兰的农业仍然停滞不前,原因是私人农场的现代化障碍重重,而有大量经济资助的国营农场却



图 52 1966 年 5 月 3 日，维辛斯基主教在琴斯托霍瓦的光明山(Jasna Góra)修道院庆祝基督教传入波兰千年的庆典上。与守旧的匈牙利闵真谛(Mindszenty)红衣主教不同，维辛斯基善于接受进步的社会文化思想，政治上更精明。他在波兰慢慢进行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改革。波兰共产党当局未能击败天主教会的道德领袖，教会的实力在维辛斯基主教的领导下增强。许多天主教徒认为维辛斯基是“过渡时期的统治者”(interrex)——在波兰历史上的联邦共和国时期，当旧王已逝、新王未选出前大主教代摄国政时的名号。

一直保持非常低的生产效率。粮食短缺，尤其是肉类短缺，几十年持续不断折磨着波兰人民。20 世纪 60 年代，波兰与西欧各国(甚至与较穷的西班牙相比)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之间的鸿沟开始大幅度加深。

政府放弃了对天主教会作出的妥协。1961 年，宗教教育在学校中消失，而且政府对于新教堂的建立采取严格的官方限制。政教关系在 1965 年至 1966 年达到最低点。1965 年 11 月，波兰主教给德国天主教会主教团写了一封正式信函，试图寻求两国间的和解。在回忆起德国纳粹在波兰实施种种暴行的同时，信函也承认波兰人给德国人亦带来了不少苦难。对哥穆尔卡来说，教会任外交事务方面做出这样的干涉是不可接受的，而由于共产党当局一直利用威胁报复西德作为其保卫波兰的共产主义政权，捍卫与苏联的联盟的重要手段之一，就使得这种

301 干涉更不可原谅。但是不管政府在打击教会的宣传活动中有什么成果,第二年都消失不见了。1966年,教会组织举行了纪念波兰接受基督教1000年的庆典(梅什科一世在公元966年接受洗礼),以此坚定大众对教会的忠诚。当局试图举办庆祝波兰建国1000年庆典与之对抗,却导演了一场闹剧,这么做只会削弱他们在人民中的声望。受挫的共产党放弃了任何与教会进一步的正面对抗,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通过不妥协的维辛斯基红衣主教逐渐地但毫无疑问地得到了加强和提升。60年代末,波兰教会甚至为传教工作向全世界派出800名传教神父、修士和修女;波兰传教士科兹沃维耶茨基(Kozłowiecki)大主教成为赞比亚首都卢萨卡(Lusaka)的都主教。

但不到一年时间,波兰又遭遇了另一段动荡期。虽然当时哥穆尔卡成功地让修正主义者沉默了,但一股更强大、更危险的势力——以反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团体的形式正在党内出现,他们企图骑着民族主义这头老虎夺权。以内务部副部长、名声不佳的战时共产党游击队员米切斯瓦夫·莫查尔(Mieczysław Moczar)为首,所谓的“游击派(Partisan)”支持一种反德、反乌克兰、反犹太的粗俗民族主义;他们甚至提出对前国家军士兵战后被共产党诽谤的记录作出部分恢复。“游击派(Partisan)”以党内自由化的亲改革派为目标,同时也攻击“世界主义的”作家和电影制作人。1967年至1968年间,党内莫查尔“游击派”和残余的改革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在1967年6月爆发的阿-以战争期间,苏联及其大多数东欧卫星国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被波兰的少量犹太人或是许多波兰年轻人所接受。虽然哥穆尔卡个人没有反犹太主义的记录(他妻子有犹太血统),但是他公开地谴责波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些人沉浸在以色列胜利的喜悦中,可能成为潜在的“第五纵队”(内奸),这为莫查尔和他的追随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利用反犹太主义情绪作为夺取权力的筹码。在这样的气氛下,相当于政治迫害,有犹太血统的老党员的职务被撤。年轻激进的修正主义者库龙、莫泽列夫斯基和学生积极分子亚当·米赫尼克(Adam Michnik)支持杜布切克(Dubček)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

302

这进一步地激怒了共产党当局,这些激进主义者也开始受到攻击。

1968年1月,密茨凯维奇的诗剧《先人祭》(*Forefather's eve*)在华沙国家大剧院上演,学生们为剧中所有自由的和反俄的言论欢呼,莫查尔党派分子借此机会为推翻哥穆尔卡做最后一击。或许是由于莫查尔在借机兴风作浪,哥穆尔卡不合时宜地启动了文化审查机制,下令这部戏暂停演出。1968年3月,随之而起的学生抗议活动首先在华沙爆发,紧接着蔓延到大多数大学城,警察对抗议者暴力镇压和大肆逮捕。精心策划、带有仇恨情绪的示威游行活动在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其由莫查尔控制的舆论支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学生和“斯大林主义罪犯”。对这些行为提出抗议的包括教会、波兰作家联盟和国会内小型的天主教兹纳克团体。哥穆尔卡试图抑制疯狂的反犹太主义情绪,但是伤害已经造成:多达2万人的犹太后裔(大都已完全被同化,并且几乎所有人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还有一些非犹太裔的知识分子在压力下被迫离开波兰。虽然哥穆尔卡政权在莫查尔的猛攻下幸存下来,但是波兰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国际声誉遭受了严重的损害。事实上,反犹太主义活动暴露了波兰共产党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空洞。哥穆尔卡无情地抵制所有形式的修正主义行为——无论是波兰还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多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同时他意图维持自己在莫斯科的信誉,这导致他在军事上支持(派遣2.8万名波兰士兵)苏联在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虽然共产党暂时获得胜利,但是它用其残酷的政治手段和虚假的宣传,已经将自己与整整一代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疏离开来。修正主义者深信共产党体制不能从内部进行改革,于是他们开始背离马克思主义,并且寻求与非马克思主义学生积极分子、在巴黎的盖德罗伊奇的《文化报》,以及自由主义天主教知识分子进行合作。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和长期的食物短缺也无法保持哥穆尔卡的信誉。1970年12月7日,哥穆尔卡与威利·勃兰特(Willi Brandt)执政的联邦德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承认波兰战后的西部边界——但就连这项显著的外交成就也并没有提升哥穆尔卡在国内的支持率。

无论哥穆尔卡团队对与波恩签署协议的自我感觉多么良好,都随着一周后在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造船厂爆发的工人罢工而消失殆尽。12月12日,一项适度的经济改革计划开始推行,该计划试图给工厂一些自主权并且引入工资激励机制。但计划的第一阶段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了食品价格,导致整个计划流产。食品价格的上涨对于那些食品支出占其总支出 $3/5$ 的众多工人阶级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击。而计划实施的时间是圣诞节前两周,正是许多家庭为欢度节日而大举采买之时,选在此时推出计划简直是愚蠢至极。

当局的无能以及对发生在港口地区的罢工的血腥镇压,特别是12月17日在格丁尼亚对大量在上班途中的工人进行枪击,引发了跨越波兰北部许多地区的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起义。工人们不但对经济有所要求,现在还提出创立独立工会的要求,这与列宁主义者的原则完全相悖,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工会只是将党的指令送及大众的“传送带”。面对全国上下动荡的局面,在哥穆尔卡轻微脑中风患病后,莫斯科方面同意免去他的职务,并于12月20日任命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任党的第一书记。作为上西里西亚地区的党的领袖,盖莱克因高效的管理才能赢得了很高声望,并且成为1968年以来党内冉冉升起的新星。

然而1971年1月,新的罢工爆发了,在1月23日发生的大罢工使港口城市什切青市陷入瘫痪。盖莱克亲自出面安抚什切青市和格但斯克市的工人,他承诺将进行改革,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并释放被扣押的工人,以及进行内阁与党内高层的人事调整,这些最终帮助盖莱克缓和了局势。但是在2月15日在物价飙升回落之前,在自二战以来一直被当局忽略的城市罗兹,一场更大规模的纺织工人大罢工爆发。

虽然盖莱克政府自危机中崛起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公众对其的信心,但是所有试图赋予工会更大的自主权的努力仍无果而终。即使是很清楚自己的力量增强了,工人们还是保持谨慎。曾在1968年挑战过哥穆尔卡的民族主义共产党人莫查尔,于1971年春被开除出内务部,在此之后,盖莱克又巧妙地让有野心的同僚均远离实权位置。教会受

到国家尊重,成为国内保持社会安宁的重要堡垒,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得到改善。1972年6月,教皇保罗六世终于承认前德国占领地区的战后教会管理。文化政策上明显放宽了限制,显著地表现在实验剧场和电影制作领域。镇压活动减少,政府现在强调“波兰民族道德政治的统一”。重修战时遭到纳粹破坏的、位于华沙的王室城堡的决定得到了国内外波兰人的广泛欢迎;盖莱克政府甚至还吸引了部分流亡者在商业和文化领域与其进行合作。但另一方面,许多来自马祖里人、上西里西亚人,甚至还有卡舒比人持续地移民西德,这些人由于政府的不闻不问而长期游离于波兰主流社会之外,他们选择移民是让共产主义政权蒙羞的一份沉默控诉书。

至于伦敦的流亡者,他们直到1972年扎莱斯基去世后,其主要团体才与政府达成迟来的和解。1979年爱德华·拉琴斯基继任“总统”,为流亡政府恢复了一些威望。除此之外,新的流亡者联系纽带还有国家党(民族主义者德莫夫斯基的后继者)——他们试图寻求一种更“现实的”方法接近盖莱克统治下的波兰,并且继续警告说,德国人和犹太人密谋破坏国家的稳定。在美国的波兰人的士气大振,因为1976年11月,美籍波兰教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作为苏联问题专家受任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同一时期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一位大有前途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还有克莱门特·扎布洛茨基(Klement Zabłocki),担任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职务(1977年)。

305

盖莱克执政早期保持乐观的关键是由于快速的经济的发展,这有赖于西方国家高达240亿的贷款,以及为了增强波兰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引进的现代技术。哥穆尔卡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遭到摒弃,总体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政府的政策重点放在改变长期的住房短缺问题上,批准生产的汽车数量也有增长,尤其是菲亚特125P轿车;在70年代到80年代间,汽车拥有量从45万辆增长到超过200万辆。放宽外币限制使许多波兰人更容易获得原本很稀缺的西方消费品。同时国家



图 53 1974 年 9 月,爱德华·盖莱克同志看望上西里西亚地区雷杜乌托维(Rydułtowy)镇的矿工们,盖莱克曾经也是一名矿工。1999 年 10 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尽管盖莱克政府的经济政策惨遭失败,但是在大多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即已成年的波兰人,以及第三共和国时期极少数的富人们眼中,盖莱克执政时期仍然保有“美好时代”的良好形象。2001 年 8 月在索斯诺维茨(Sosnowiec)举行的盖莱克葬礼上,有超过 1 万人前来送葬。然而,盖莱克政府所产生的债务也仍在持续上升,在 2008 年达到其峰值 43 亿美元。

继续对住房、交通、节日和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施行高额补贴,政府甚至将个体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自 1945 年以来,强制从农民手中征收农产品的行为最终在 1971 年结束。在东西方国际关系缓和的新气候下,盖莱克正式出访了许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他还作为东道主在华沙接受了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的回访。1977 年,卡特总统由布热津斯基教授陪同到访。

但是盖莱克的“经济奇迹”其基础是很成问题的。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在持有特权并且贪污的领导阶层掌控下低效运作,经济结构并没有经过改革,仍然以重工业为中心。大量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对,形成浪费。许多新生产出来打算出口的波兰商品被证明质量低劣,根本无法

赢得国外市场。此外外部因素也有所影响,例如1974年油价上涨(1973年阿以战争之后)和西方利率增长,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导致了波兰的经济困境。到了1974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食品短缺问题再度回潮;1976年,政府开始定量供给食糖。盖莱克与国家的蜜月期即将结束,但国内消费者的胃口已经被激发。而此时政治领域也突发骚乱。为了换取更多的外交自主权,波兰政府不得不满足莫斯科开出的条件:在1975年年中,政府提议在波兰《宪法》中规定党在波兰社会中占据“领导性政治地位”,同时波兰与苏联保持“永远”的盟友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联想到18世纪波兰与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关系。得到教会支持的愤慨之声和抗议运动并没有阻止政府在修订案中加入第一项条款,但却成功地淡化了第二项条款。波兰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完全集体化的理想同样也被庄严载入《宪法》。然而,整个事件却加剧了从天主教知识分子到共产党内修正主义者的反对运动,这对于未来有着深远的意义。

307

面对逐渐增加的外债以及日趋严峻的通货膨胀,政府于1976年6月25日正式宣布调高物价,这使得其公信度进一步丧失。遍布各地的罢工和抗议活动迫使当局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尽管当局没有动用武力(不像1956年和1970年那样),但他们还是对示威者进行了残忍的惩罚。1976年9月波兰保卫工人委员会(KOR)成立,这一组织对当局镇压的受害者展开了迅速而有效的实质性援助。KOR的早期成员背景各不相同,其中最为活跃的有前修正主义者雅采克·库龙和亚当·米赫尼克,以及资深社会主义者杨·约瑟夫·利浦斯基(Jan Józef Lipski)。KOR做出的极具前瞻性的举措是,为反政府的知识分子派别和对政府不满的工人派别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正是这两股势力在1968年和1970年各自单独作战时所缺乏的。1977年9月,KOR成为一个致力于保护人权和公民权的永久性机构,宣布其目标是实现“波兰社会的自我组织”,并由此扩大了其宗旨。尽管有警察不时的骚扰,KOR还是成为反对派们的一个重要聚集地,它揭露国家犯下的不法行为,并且于1978年在格但斯克成功地协助建立起一个独立工会运动(当然也是违

法的)。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团体也纷纷出现,其中有些甚至还打着要求“波兰独立”的旗号。

在盖莱克执政的波兰,官方的钳制相对宽松。在这样的环境下,超出政府审查范围的非官方文化和出版活动迅速发展,与其他苏联阵营成员国形成鲜明对比。诸如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维托尔德·贡布洛维奇(Witold Gombrowicz)和莱斯泽克·科瓦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这些流亡作家的作品,以及像奥威尔(Orwell)这样当时仍然遭禁的国外作家作品的译本得见天日。在波兰作家的违法出版物中,最为杰出的就是塔杜施·孔维茨基(Tadeusz Konwicki)的《小启示录》(*Minor apocalypse*, 1979),书中用调侃而又发人深省的讽刺手法描述了波兰人民的生活。一座被称为“飞行大学”的教育机构,在私人家中就官方严禁的历史和政治主题组织演讲,吸引了许多专业学者和政论作家来此讲学,这让人回想到在沙皇统治期间不被政府允许的地下教学。流亡者的出版物以及国外的波兰语广播电台,尤其是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波兰语频道,也为这些思想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出国旅行条件的放宽以及电视的普及(1970年有45%的波兰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使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波兰人与西方人生活条件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由于依赖西方的贷款,再加上作为1975年强调人权的《赫尔辛基条约》(Helsinki)的签约国,波兰政府不可能根除这个对政府持有异议、朝气蓬勃的多元世界。它在日益死寂的官方政治秩序背后正在繁荣发展。

天主教教会对广泛的保卫人权运动的产生贡献显著,这其中包括在反对派中非常活跃的天主教徒和神职知识分子。由于红衣主教维辛斯基灵活而又不懈地为其扩大影响,教会作为一个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的庞大组织,其势力一直在加强。1978年10月16日,克拉科夫的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ła)当选为教皇,为约翰·保罗二世,教会的声望也随之飙升至令人意想不到的高度。当局曾经强烈反对沃伊蒂瓦对宣讲福音劝人皈依活动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而其当选为教皇的消息着实让他们震惊:“天哪!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人们猜想



图 54 波兰裔教皇。1979 年 6 月 2 日,克拉科夫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成为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后,回到波兰时检阅仪仗队。左为红衣主教维辛斯基,中为国务委员会主席亨里克·雅布翁斯基(Henryk Jablonski)教授。在沃伊蒂瓦 8 天的行程期间,有 600 万波兰人前来对这位波兰裔教皇表达问候。沃伊蒂瓦当选教皇以及他对波兰的访问在这个国家起到了一个催化作用,也鼓舞了离散波兰人的士气。

盖莱克在听闻罗马传来的这一消息后定会惊叫起来。1979 年 6 月 2 日至 10 日,约翰·保罗二世前往波兰,在当时东西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当局并不敢阻碍教皇的行程。上百万的民众都出来欢迎教皇,教皇这次成功的朝圣之行不仅证实了大量波兰民众虔诚的信仰,还证实了波兰社会巨大的“自我组织”能力。约翰·保罗二世还常常提及人权和民族权力,他也呼吁人们要有勇气要做出改变,他的这些呼声都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与官方宣传的预期结果相反的是经济形势继续恶化,1980 年波兰超过 4/5 的出口收入都偿还了外债。在这样的情况下,教皇的访问对民族精神产生了渴望冲破禁锢的强烈影响。在政府让工厂食堂的肉价小幅上涨之后,1980 年 7 月罢工潮横扫波兰全国,其规模和强度令政府和反对派感到震惊。与 1970 年或 1976 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罢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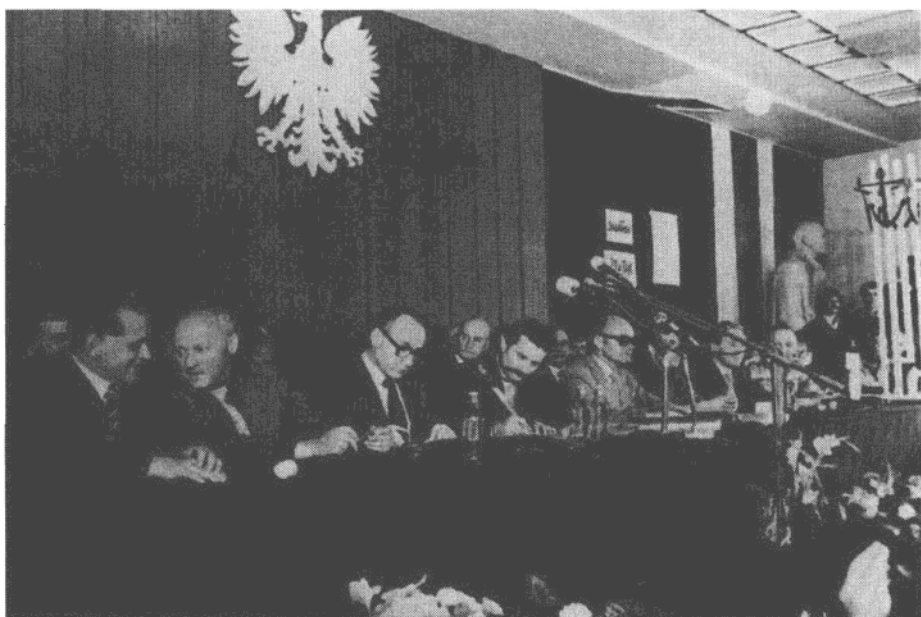


图 55 1980 年 8 月 31 日,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莱赫·瓦文萨(手握大笔)在签署成立团结工会的协议。紧靠他右边的是副部长、政治局委员米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Mieczysław Jagielski)。请注意,在右边角落出现了消失已久的列宁雕像。

他们没有涌向大街或是袭击共产党设在当地的总部,而是占领了工厂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政府尝试通过给罢工者们加薪并提供额外食物来安抚罢工者们,但这个办法未能阻止抗议的大潮。8月16日,格但斯克成立了一个厂际罢工委员会,其领导人为37岁的电工莱赫·瓦文萨。这为其他沿海城市成立相似的委员会提供了范本,同时也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8月17日,罢工委员会提出了他们的二十一条要求,其中包括组织独立工会、罢工以及言论自由的权利。政府反对派的成员为他们提供了专业的帮助;还有诸如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重要的天主教徒记者,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Bronisław Geremek)——杰出的中世纪史学家、刚强勇敢的谈判家等知名人士加入瓦文萨的团队。

然而还不止如此,随着共产党的战后工业化计划的实施而诞生的波兰工人阶级,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变成官僚统治者的反对者。8月26日,当罢工蔓延到波兰的工业重地西里西亚煤矿时,政府别无选择,只

好同罢工委员会进行协商。值得赞扬的是,盖莱克拒绝了苏联对罢工者使用武力的建议。8月30日和31日,分别在什切青市和格但斯克市,政府经过痛苦挣扎后屈服了,同意建立独立工会的要求。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抵制任何未来政府的破坏阴谋,9月17日,工会领导人投票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全国性工会,命名为“团结工会”。瓦文萨展现了他精明的政治才能、十足的干劲和庄严的使命感,在他的领导下,“团结工会”建立了内部民主结构,吸引了众多不同的反对集团加入。到11月中旬,会员数量为800万,大概是波兰成年人口的1/3;一年之后,其会员人数超过1000万人。9月6日,名誉扫地的盖莱克下台,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Stanisław Kania)接任。

波兰的局势进展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而1980年12月米沃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也吸引了全世界对波兰事务的关注。得到波兰裔教皇支持的“团结工会”,在西方赢得了相当多的同情。这在莫斯科和东柏林引起了恐慌,给它们敲起了警钟。美国总统卡特听取了布热津斯基关于波兰局势的简要分析,并且威胁要制裁苏联,这些情况都通过“热线”在1980年12月的3、4日午夜传到了克里姆林宫。这可能促使苏联领导人没有马上下令入侵波兰。波兰反抗的可能性是另一个推迟苏联入侵的原因,而入侵行动很可能导致巨大的国际危机。无论如何,莫斯科方面依然保持敌对不屈服,并且主要依靠波兰当局来镇压团结工会。因为团结工会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会;它正在逐步演变成一场大众社会运动,旨在实现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消除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实行企业自主经营。尽管团结工会的领导者出于非常现实的考虑没有夺取政权,但是实际的“二元权力”状态正在出现。团结工会成为共产党在波兰境内政治垄断的挑战者,并且最终成为苏联在东欧的挑战者。

在瓦文萨的领导下,团结工会不仅粉碎了政府试图渗入其分支组织,在内部搞分裂活动的阴谋;还不断成长壮大。1981年3月27日它领导的长达4小时的全国大罢工是最有力的证明。5月,

由农民组成的农村团结工会得到了法律承认。而波兰当局还没有做好正面交锋的准备。欢欣鼓舞、期待获得更多自由的情绪笼罩着全国,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身陷混乱之中,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迹象。在其 300 万的党员中,大约 1/3 的人放弃党员身份,更有 70 万党员加入了团结工会。改良派要求党内有更多民主的“水平结构”,而由莫斯科方面支持的强硬派则主张采取果断的行动对付“反革命”。

教会本来在协调当局和团结工会之间不断出现的危机上起了重要作用,但 1981 年 5 月发生了可能是由克格勃策划的刺杀教皇行动,以及红衣主教维辛斯基的逝世,使这种有效协调的作用暂时弱化了。新的红衣主教约瑟夫·格莱姆普(Józef Glemp)没有维辛斯基的显赫声誉,很难赶超前任。无论如何,清算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波兰这种不正常的局势不会无限期地继续发展下去。2 月,原国防部长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受命担任总理,这是共产党政府打算着手采取行动的早期征兆。虽然雅鲁泽尔斯基有贵族血统,年轻时是斯大林流放的受害者,但他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将军,拥有长久而成功的军事生涯背景。在 1981 年春夏频繁举行的会议中,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向已不耐烦的苏联政府保证,决心用自己的方式结束危机。在 7 月的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有民主选举的代表参加会议,卡尼亚成功地在党内恢复了一些秩序。随着 8 月任命原军事反间谍机关首长切斯拉夫·基什恰克(Kiszczak)将军为内政部长,当局加快了实施早先预谋采取戒严法的计划。

食物供给状况的急剧恶化激发了人们对进一步增加工资的要求,并且加深了人们的厌烦程度,而当局的强硬态度激怒了许多团结工会的激进分子。9 月,在格但斯克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团结工会压倒性地支持与东欧和苏联工人兄弟团结友爱的诉求;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态——唯一的作用只是在苏联这头公牛面前扮演红布的角色。10 月 18 日,当共产党中央任命雅鲁泽尔斯基替代卡尼亚成为第一书记时,也反映出局势的重心和此举涉及的高风险,因为国

家、党组织以及军队的控制权现在都掌握在一双手中。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格莱姆普主教和瓦文萨没能在11月4日举行的会议上确保达成各方之间的妥协,随后团结工会又宣布于12月17日在华沙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来自苏联的持续压力下,雅鲁泽尔斯基不得不动用手中的权力。

1981年12月12日到13日的夜间,一个由苏联元帅库利科夫(Kulikov)密切关注、部署周密、高效运作的军事行动开始实施,动用了大部分波兰军队和所有的安全部队,全国被强制实行军事管制(进入“战时状态”)。所有的意图和目的就是政变:一个号称由雅鲁泽尔斯基领导的救国军事委员会篡夺了政权。6000名团结工会激进分子,包括瓦文萨在内都遭到出其不意的逮捕和拘留。只有弗罗茨瓦夫市的团结工会的地方领导人对这起突发事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避免了被拘捕的命运。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被叫停,同时所有的工厂、交通和通信都被军事管制。虽然军队用于镇压国内爆发的罢工活动,但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流血杀戮;最严重的事件是卡托维兹市的武耶克煤矿有9名矿工被枪杀。这段时间,在伦敦的流亡总统拉琴斯基对在波兰的同胞广播,号召他们保持信仰和希望;这回应了他在1939年9月担任英国大使时所作的广播,具有清晰的历史寓意。

军事镇压恢复了表面上的公共秩序,驱使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上,但是丝毫没有解决波兰根本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逃脱拘捕的团结工会领导人秘密重建了工会的机构,并且在为“长征”做准备,还发动了一场反对当局的宣传战。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工会组织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印刷和通信设备,这些设备被偷运到波兰。秘密印刷机构大量印刷当局要取缔的非法“地下出版物”(samizdat),这些杂志和书籍大多是讨论历史和政治话题。幸运的是,许多激进分子想要诉诸恐怖活动和消极怠工的要求遭到了团结工会领导人的拒绝,以及来自教会的强烈反对。瓦文萨并没有被当局的威胁吓倒,他更是于1983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不仅提升了他的国际声望,也在精神上鼓舞了团结工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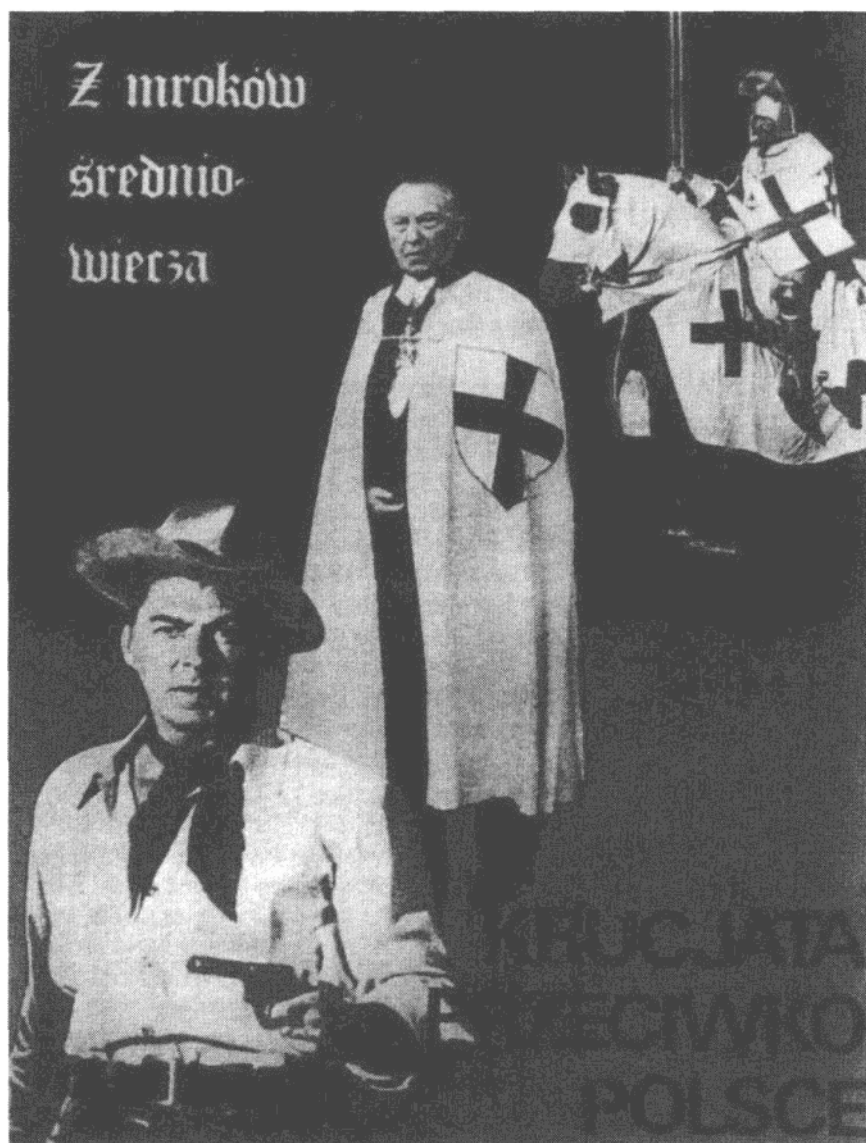


图 56 共产主义波兰认为可怕的人物。“来自中世纪的黑暗：一场反对波兰的圣战。”波兰开始实施军事管制后，里根总统宣布美国对波兰强制实施经济制裁。这是一幅回应美国经济制裁的宣传海报。海报中人物为一位中世纪条顿骑士，和“穿着得体”的前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对德国这个波兰历史上最大的敌人的强烈敌对，是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家意识形态中可能最为广泛接受的有力因素。尽管从 1970 年开始，波兰公众对德国的看法逐渐改变，但波德关系的真正发生转变却是在 1989 年和 1990 年。

虽然波兰社会对军队普遍存有敬畏感,但无论雅鲁泽尔斯基多么努力,他还是不能恢复遭到严重损害的党的威信。由于定期实行的大赦,瓦文萨于1982年11月被释放(做为普通公民),教皇于1983年6月获得准许重访他的祖国,军事管制也于1983年7月正式取消。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一个由政府赞助的新工会做为与被禁的团结工会对抗的组织开始扩张。还有恢复战前民族节日的举措,比如纪念杨三世·索别斯基国王于1683年9月在维也纳郊外战胜土耳其300周年的庆典,但即使宣扬这样的爱国情怀也收效甚微。

随着大多数社会政治组织的解体,教会作为民众生活唯一公开自治的活跃焦点,其作用也开始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着实让人联想到波兰历史上较早的混乱时期。成千上万的人们打着团结工会的旗号加入到教会的服务中,这时,主教团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反对派的活动,但是却代表着受压迫者干预政治生活。在1983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二次访问波兰期间,教皇向1000万前来欢迎他的波兰人表达了他想让团结工会再次合法化的希望,同时在与雅鲁泽尔斯基的长时间会面中,他倡议与反对派进行对话。1984年10月,内务部的特工人员刺杀了一直批评波兰政权的耶日·波皮鲁斯科(Jerzy Popiełuszko)神父,然而谋杀事件却导致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数十万人参加了这位殉道神父的葬礼,他的墓地也成为一处受人敬奉的圣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波兰政治陷入僵局。雅鲁泽尔斯基认为自己已经将波兰从内战、经济崩溃以及可能发生的苏联侵略中拯救出来,开始约束暴力方式的拥护者们,同时也为局势的缓和做进一步努力。但政府无力解决结构性经济问题,巨额外债(1988年达400亿美元)以及西方不愿再提供贷款使问题更加复杂,更不用提美国的经济制裁了,这些都继续侵蚀着国家生活的重要支柱。工业产值和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物价飞涨、商品紧缺,政府预算面临着飞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此外,在波兰的许多地区都发现了工业污染导致的令人担忧的后果。波兰似乎前景渺茫,这一时期大约有50万波兰人,大多数是年轻人和有魄力的人离开波兰,留在国外。1986年政府释放了所有剩余的政治犯;尽

管已获准公开行动,但是团结工会领导层还是拒绝参加政府支持的协商会议。来访的外国政客将瓦文萨誉为最具影响力的反对派领导人,1987年6月,教皇第三次访问波兰也使瓦文萨大受鼓舞,他因此坚持将恢复政治多元化作为全民协同行动以解决经济危机的前提条件。

共产党和雅鲁泽尔斯基政府不想交出他们的垄断权力,而是寻求其他措施来打破僵局。1987年11月29日举行了一场公民投票,为了让人民认可政府犹豫不决的经济改革,但对于当局来说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尽管如此,政府拒绝接受团结工会的要求,并以武力回应了1988年4月到5月间大肆蔓延的罢工潮。1988年8月,第二波罢工潮席卷了全国。由于害怕国家处于一触即发的失控边缘,当局又故技重施,再次实行军事管制。

317 对于波兰国内局势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苏联对于其卫星国政策的戏剧性逆转。由于受到同美国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压力,苏联经济和政治体系被迫进行激进的翻修,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准备不再干预那些尚未改革的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进行改革。由于苏联的变化,失去方向的波兰共产党政权已不再能够证明恢复戒严法要比苏联入侵更好一些(就像1981年的情况),他们现在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么通过武力维持对躁动不安的人群与衰退的经济的控制;要么与反对派协商保留一定的权力,由此得以享受广泛经济改革带来的利益,而这种合作也将为政权赢得广泛的合法性以及国际社会的尊重。

在1988年8月26日的一段电视节目中,内务部长基什恰克将军建议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展开“圆桌”会议。作为冷静的政治家而脱颖而出的瓦文萨成功地结束了使国家动荡的罢工运动。8月31日基什恰克第一次私下会见瓦文萨。由于双方阵营中的极端分子反对开展对话,致使对话耗费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才在1989年2月6日取得进展。只在两人以辞职相胁后,雅鲁泽尔斯基和基什恰克才确保了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同意让团结工会再次合法化。

“圆桌”会议于4月5日结束,会议最终达成一个折衷协议,预示着宪政秩序的巨大变革:分别于1952年和1946年撤销的总统和参议院

制重新得到恢复；前者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同选出，而后者则是在全民自由选举基础上产生。总统和参议院都可对众议院行使否决权；而在众议院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联盟占有 65% 的席位，其余 35% 的席位则由自由选举决定。团结工会和乡村团结工会分别于 4 月 17 日和 4 月 20 日得以重新合法化。

1989 年 6 月 4 日举行了全民半自由选举。尽管受到了持怀疑态度的第三选区的抵制，但选举对于波兰共产主义者来说仍是一场压倒性灾难，并且超过了“圆桌”协议构建者们所有预期。在今天看来，1989 年的波兰选举被证明是东-中欧共产主义体制解体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团结工会支持的公民委员会赢得了参议院 100 个席位中的 99 个，以及议会所有的自由席位；只有 5 位政府支持的候选人的得票数超过了占有议会中保留席位所需的 50% 选票。因此，6 月 18 日需要举行第二轮投票，以让亲政府派可以占有他们那些保留席位。7 月 3 日戈尔巴乔夫的特使做出重大通告，声明波兰能自由决定其政府的形式。另一个折衷的安排是，雅鲁泽尔斯基于 7 月 19 日当选为总统，10 天后他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另一方面，瓦文萨巧妙地恳请统一农民党(ZSL)以及民主党(SD)阻止由基什恰克将军领导的联合政府的建立，这两个党派虽然之前一直是受共产党控制的议会团体，但是如今却急切地想要声称独立。8 月 19 日，总统雅鲁泽尔斯基邀请受人尊敬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组建一个联合政府。获得议会几乎全体一致的支持，马佐维耶茨基成为这个形式上仍然是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的第一位非共产党员总理，并且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贺电。瓦文萨自己暂时避开了所有公职。尽管根据“圆桌”协议并为了打消莫斯科的疑虑，PZPR 保住了关键的内政部和国防部，但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

共产党在波兰执政的这 45 年，不能简单地评价其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或带来任何益处。而波兰做为苏联的卫星国的地位确实要好过直接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但是，将一个大多数公民都感到陌

生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他们,民主概念愤世嫉俗的滑稽化,数十年精心编织的谎言,屈辱地臣服于苏联,大量造成严重浪费的经济活动,所有这些在客观地评价波兰的共产主义遗产时全部都应重重地记上一笔。就生活水平而言,实行共产主义的波兰不但没有赶上西方,反而远远地落后了。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煤炭和钢铁产量数据并不能取代基本生活资料的长期匮乏。现在,对于禁锢已久的波兰社会来说,要如何应对自由与独立带来的突如其来的挑战,是众人拭目以待的下一步。

第八章 一个新的共和国(1989—)

虽然许多强硬派的团结工会支持者对与过去的共产党人的藕断丝连,以及没有对共产党进行清算感到遗憾,然而《宪法》的改变以及1989年的大选现在普遍地被认为是波兰“第三共和国”的诞生标志。1989年12月29日,波兰正式取消“人民共和国”的称号,恢复以戴王冠的白鹰作为国家的标志^①;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苏维埃联盟以及社会主义都已一并从宪法中除去了。使波兰1989—1990年的和平转变成为可能的是波兰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自我组织能力”,以及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自我约束和责任感,无论他们是共产党人还是共产党人的敌对者。因此危险的政治真空得以避免,社会和平得以维持。确实,20世纪下半叶,波兰人在政治方面表现出的务实态度(正如1956年和1980—1981年以及如今所体现的),与上一个世纪中灾难性的、罗曼蒂克式的起义,以及1944年的华沙起义形成了强有力的对比。

马佐维耶茨基的“伟大的联合”表现出了把波兰拉出经济衰退状态的杰出能力。1990年1月,在新任财政部长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教授的策划下,波兰引入了一项大规模的经济重

^① 1952年通过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曾去掉了国徽图案中白鹰头戴的王冠,1989年又予以恢复。——编者注

组计划,其措施在整个前共产主义欧洲地区算是最激进的。富有成效的“休克疗法”阻止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并促使波兰迅速地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而与他国就偿还国家巨额外债达成的有利的重新议定,以及西方金融机构的财政援助,更加促进了这一过程。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库龙以他直接和迷人的方式,在任劳工部长期间有效缓解了人们对于改革阵痛苦(至1990年底,造成100万人失业)的恐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解体,以及企业自由的恢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社会分化。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前共产党官员和管理者竟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中获利,而许多曾帮助推翻共产主义体系的工人如今却发现自己经济合理化的受害者。备货颇丰的商店结束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长期商品短缺,并且开始显著地改变了此前多数波兰城镇单调的面貌。新华沙股票交易所的所在地就是前共产党的中央总部,更为这一历史的讽刺剧添加了精彩的一笔。

出乎意料地摆脱了苏联的桎梏后,波兰的历史跨入了新时代。在1989年接下来的十年中,波兰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转变。具有可信赖的地方政府体系和民选总统的议会民主制建立了起来;公民权利得到恢复;死刑废止;军队非政治化。文化生活中有一种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趋向,而波兰的大众文化则受到了西方的强烈影响。在政治领域,20世纪90年代最显著的现象就是,曾做为一场广泛的社会和道德抗议运动的产物的团结工会分裂。马佐维耶茨基希望在经济转变的困难时期保持团结工会的统一和“圆桌会议”协议。另一方面,瓦文萨认为统一工人党的解散证明应该加速宪法的变革。他随后竞选总统的野心加深了工会内部的分裂。1990年7月的议会选举全面引入比例代表制,进一步促进了一些小党派的形成。到1991年,团结工会的主体已分裂为若干相互敌对的工会组织,以及一系列反共产主义的民粹党人和民族主义天主教团体。这些小党派多数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心存疑虑,而这一经济体制却由团结工会中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派大加提倡。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马佐维耶茨基和盖莱梅克(Geremek),其组织名称为“民主联盟”(UD),后改为“自由联盟”(UW),

是团结工会裂变出的支系中最为成功的党派。

共产主义时代的政党同样经历了变革。统一工人党在1990年1月自行解体,其成员中的大多数组成了由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领导的、有纪律的社会民主党(SdRP)。他是一位年轻但富有经验的的活动家,曾在前共产党政府中任体育部长。1991年,这一组织联合另外两个左翼团体组成了左翼民主联盟(SLD),这一联盟至今仍是波兰最为重要的政党之一,并且由于继承了统一工人党的党产,他们有着充足的财力和有利的组织形式可供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左翼联盟一贯尊重民主进程。先前亲共产党的农民党经历了更为元气大伤的大变动,最终在1990年5月与其他农民团体联合,采用了1947年之前的波兰农民党(PSL)的称号。但迄今为止致力于恢复历史悠久的波兰社会党(PPS)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瓦文萨赢得了1990年的总统大选,他没有选择从即将离任的雅鲁泽尔斯基处而是选择从最后一位流亡总统雷·卡乔罗夫斯基(Ryszard Kaczorowski)手中领受波兰共和国印章(雷·卡乔罗夫斯基为移交印章一事而亲自来到华沙),并且因此建立起了与始于1945年、位于伦敦的战前第二共和国的宪法上的联系。在瓦文萨当选总统之后,波兰流亡政府自行解体,其历史使命宣告完成。共产主义在波兰的终结方式,以及波兰第三共和国的领土构成并非完全符合流亡领导人的期望,但不可否认的是,波兰重新获得了自由。然而,战时的流放者并没有大量的回归,对很多人来说这已经太晚了。但是一些显要人士还是回乡了,比如毕苏茨基自战争以来一直居住在英国的两个女儿。许多在英国出生的波兰裔专家选择回到他们父母出生的国家工作。一些在早期团结工会时期的流放者也回来了。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离散在世界各地的波兰流亡者与波兰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冷战”期间曾由于意识形态相异以及相互猜疑极度恶化,也开始冰释。如今在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更多、更富有成效的联系,波兰政府支持在流散者中开展波兰语教学,特别是在前苏联地区,那些地方的波兰社群培育民族和文化认同感的可能性过去常常被剥夺。

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曾经承诺的波兰完全自由的议会选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终于在1991年10月首次得以实现。在1991年至1993年间,这些议会选举产生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全国议会,以及一系列短暂的中右联盟的联合政府。右翼日益要求在公众生活中“去共产主义化”,并“清洗”曾经与共产党安全机构合作过的政府官员,而瓦文萨越来越试图以强硬和刚愎自用的手段来增强总统权力,这些都造成了一种紧张的政治环境。

323



图 57 1999年2月26日,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签署波兰加入北约的条约。这是波兰历史上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他作为一个前共产主义者以及后共产主义左翼民主联盟领导人,带领波兰加入北约。签署仪式在总统官的大厅举行,同样也是在这里,1955年创立了由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2000年10月8日,克瓦希涅夫斯基以压倒性的胜利再次连任,继续总统的第二个五年任期。

1993年9月的议会选举基于改革后的选举体系,这一体系意在把最小的政治团体清除出全国议会(政党进入的最低门槛为5%席位),这次选举产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右翼政党虽然赢得了超过1/3的民选投票,但却为他们自相残杀的分裂行为付出了被实际上清除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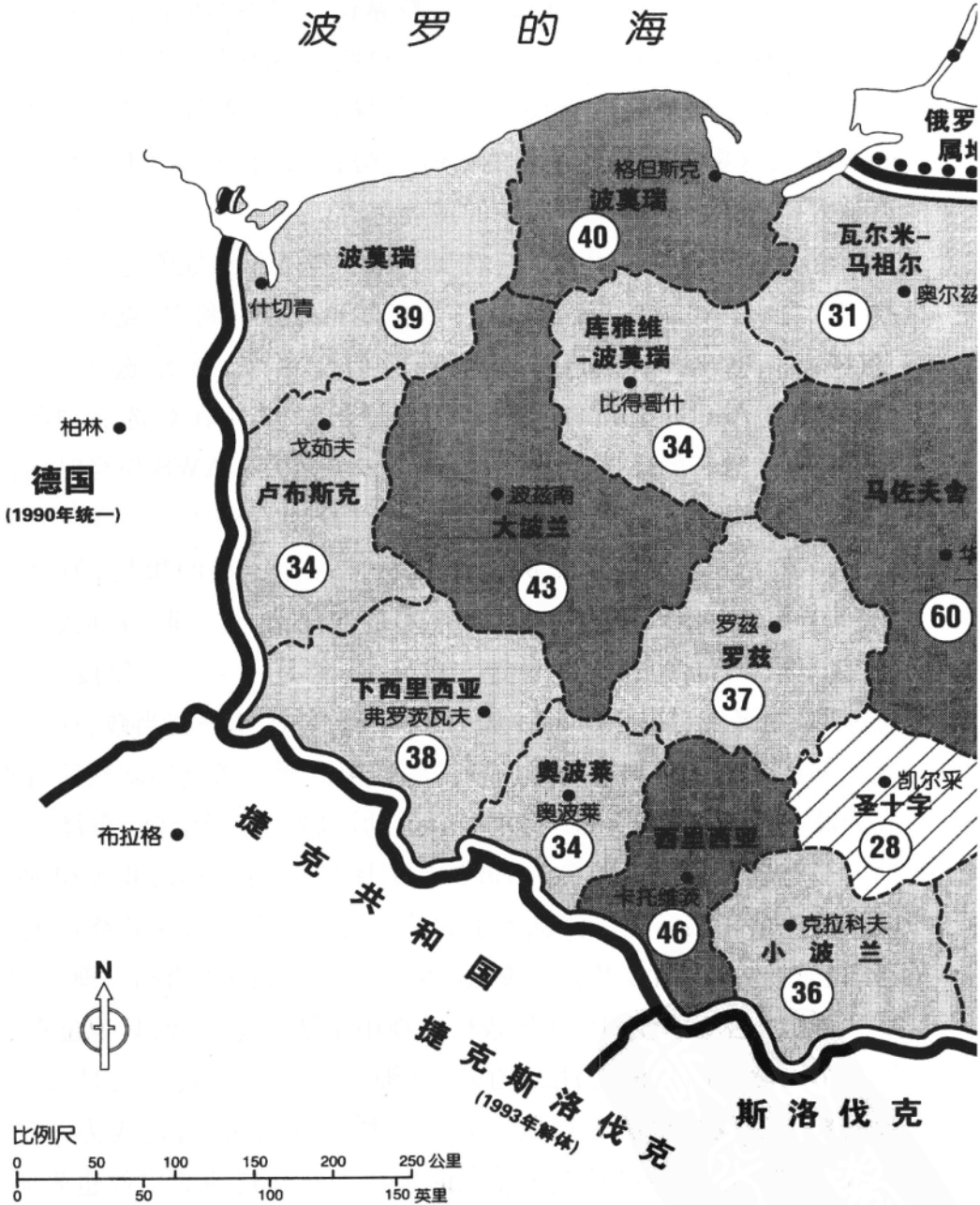
议院的代价。团结工会裂分出来的自由联盟党人表现尚可,但是原来的共产主义政党重组形成的左翼民主联盟(171个席位)与农民党派波兰农民党(132个席位)则得到了多数席位,他们组成了一个联盟一直持续到1997年。瓦文萨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惜败于另一位更为优雅得体、行事老道的左翼民主联盟领导人克瓦希涅夫斯基(Kwaśniewski),这更加保证了左翼的上升趋势;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正是人们开始感受到经济改革的益处之时。

支离破碎的各前团结工会右翼党派不得不总结他们选举中败北的教训。在一位来自西里西亚的41岁控制论专家马利安·克扎克莱夫斯基(Marian Krzaklewski)的领导下,它们合并为“团结选举行动”党(Electoral Action Solidarity, AWS),并于1997年在竞选活动取得成功,获得了34%的民选投票,在色姆中一党独大。AWS与当时由巴尔采罗维奇领导的自由联盟结盟,组成了一个中右翼政府。联合两个主要的由团结工会分裂出来的党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直到2000年5月自由联盟的各位内阁部长辞职之前,这一联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波兰议会的稳定。实际上,曾是一名化学教授的AWS总理耶·布泽克(Józef Buzek)从1997年到2001年一直当政,这是第三共和国迄今为止时间最长的一项任职纪录。而布泽克的新教徒身份更成为波兰政治体系走向开放的一个生动注脚。毫无疑问,布泽克当政期间最有意义的事情发生在1999年3月12日,这一天,波兰和匈牙利以及捷克共和国一同正式加入了北约。对几个世纪以来始终意识到自己国家软弱不堪的波兰人来说,这将是一个主要的政治和心理的突破。

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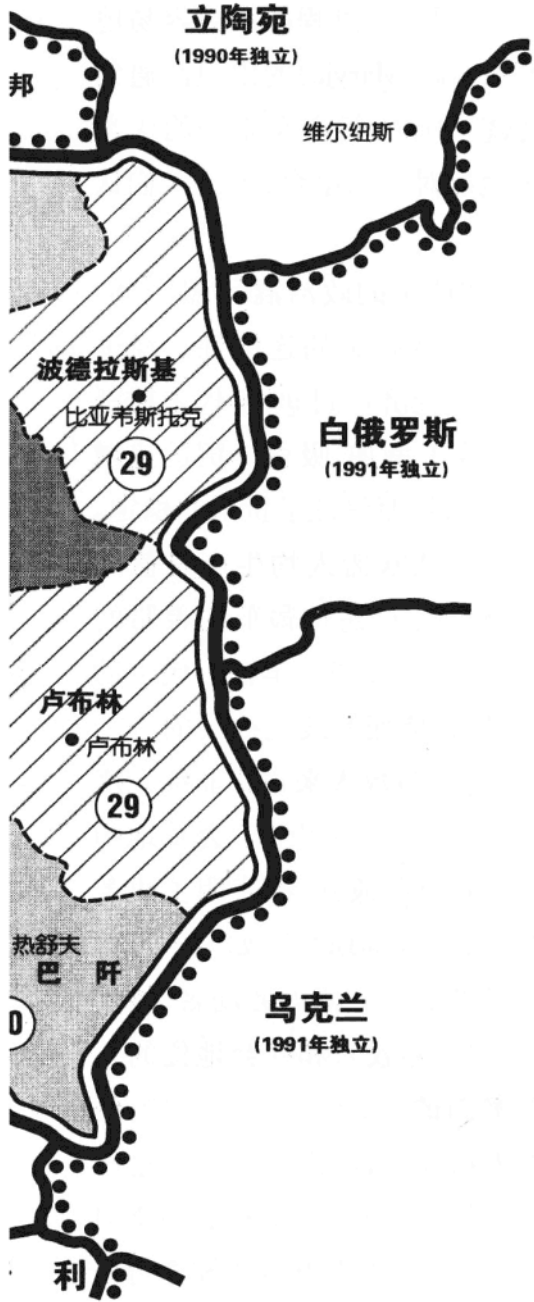
罗马天主教作为1989年政权转换中重要的协调者,其地位在波兰社会中仍然很高。值得注意的是,欧洲1/4的天主教神父是波兰人。天主教会还成功说服当局制定严格的禁止堕胎法令,这成为20世纪90年代波兰政治中最具有爆炸性的事件。然而其他的事件也表明,在一个民主和多元化的波兰,天主教的政治影响已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天主教上层以及许多神父对1991年议会选举的大肆干预让很多选民(其中包括天主教徒)心生不满,最终促成了两年后左翼政党

波罗的海



326

地图 12 波兰和它的新“邻居”们(1989—2005)



==== 自1945年波兰的边界

----- 1999年引入的新省分界线

波莫瑞 新省(Województwa)的名称,

(40) 每省的人均收入与欧盟人均收入的百分比(1999), 波兰全国平均值为37%

■ 40%及以上的省份

■ 30%-39%之间的省份

▨ 低于30%的省份

—— 自1989年新国家的边界,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及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之后。

●●●●● 2004年欧盟的东部外部边界

的胜利。主教团的禁令既未能阻止 1995 年克瓦希涅夫斯基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也没能阻止 1997 年公投通过一部新的自由主义宪法。然而随着教会日益与一个全新的波兰相适应并达成和解(1998 年对与梵蒂冈达成的政教协定进行了拖延很久的认可,使得这一进程能够更容易地进行下去),教会内部却因为“玛利亚电台”(Radio Maryja)的出现而遇到难题。这个电台作为一种大声鼓吹仇外思想的原教旨主义宗派的代言人赢得了大批追随者。主教团并没有坚决地反对这个电台,这让人们认为教会正在变得过于被动和保守。

325 尽管过往十五年存在过不少人际斗争和严重的政治混乱,但 1989 年以后的历届政府都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经过 1990—1991 年间短期而急速的下滑之后,波兰经济直到 90 年代末期都在持续增长。1994 年以后,国家财政:实际收入增加,吸引外贸迅速增长,到 1998 年时,通货膨胀率已降到 10% 以下,从而保证了货币的稳定。在 1993—1999 年间,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欧盟人均生产总值的 33% 上升到接近 40% (是当时欧盟国家中人均生产总值最低的希腊的 60%)。私有企业的产值超过波兰国民生产总值的 2/3。年轻一代主动接受教育和学习专业技能是今天以强调绩效为特征的波兰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然而自 1990 年以来的社会变革对大多数人来说并非绝无疼痛。重工业特别是采矿业的重组更是困难重重。曾为团结工会基地的格但斯克船厂的破产,以及最近其被格丁尼亚船厂兼并,都表明了改革进程的坎坷。大型城市罗兹曾经被誉为“波兰的曼彻斯特”,如今已不再是主要的纺织中心,而且不得不多元化其经济贸易。体力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在前国营农场工作的工人明显感觉到实际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下降。来自农民家庭的年轻人如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减少了。的确,经济上最主要的倒退仍然是在农业方面,因为耕地少,产出低。正是这些占波兰 1/5 劳动力的农民最担心国家加入欧盟后的前景。高失业率(2001 年占劳动力总数的 15%,2003 年占到 20%)、住房紧缺、公共卫生和教育服务经费不足,腐败和犯罪的增加,都表明了如今波兰现实中惨淡的一面。很多在共产党统治早期财产被国有化了的业主(或是他们的后代)仍在等

待着一个令其满意的补偿。虽然存在着如此多的困难,然而波兰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还是成为前苏联集团中最稳定、最有活力的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波兰还发现自己卷入了本地区地缘政治上的显著历史剧变中。“冷战”时波兰的三个邻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都在 1991—1993 年期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七个新的国家:一个统一的德国、分立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独立的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属于俄罗斯领土但嵌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在无党派人士、国际法学家克尔泽斯托夫·斯库比谢夫斯基(Krzysztof Skubiszewski)教授这位新任外交部长的指导下,波兰谨慎而系统地维护着自身作为一个新独立国家的利益。德国是波兰安全以及将来与西方国家联系的重中之重,当时正要实现重新统一。尽管 1989 年 11 月 12 日在位于下西里西亚省(Lower Silesia)克什舍瓦(Krzyżowa/Kreisau)的冯·毛奇(von Moltke)的前官邸,马佐维耶茨基与德国总理科尔的和解姿态令人感动,但波兰政府和公众依旧担心西部边境的问题。的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甚至支持《华沙条约》继续存在(如果不是暂时的),以避免在接下来的微妙的波-德关系问题上被国际社会孤立。虽然波兰早期被排除在关于德国未来的所谓的“4+2”大国会谈之外,然而美国坚持认为德国应该重新统一,不过其国土范围应该在两个德国的现存边境之内,这一建议最终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的。1990 年 11 月 14 日,波兰与统一后的德国在华沙签订条约,确立了以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作为边界。1991 年 6 月 17 日,在伯恩签订的友好条约也遵守了这一约定。在波兰大约有 30 万德国人,其存在曾经一直被共产党政权所否定,现在看来这只是短暂的忽略;如今作为少数民族,波兰的德国人已被赋予在全国议会中拥有代表以及参与当地政权的权利。

1998 年,德国议会出现了支持二战末期被从波兰驱逐出境的德国人的财产权的声音,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另一方面,德国去波兰旅游人数的不断攀升,以及一些波-德组织的各种各样促进和解的活动(其中有一项活动甚至是由俾斯麦的一位后人发起的)都有助于缓解人们深

刻感受到的历史仇恨。跨越波-德边境的合作随着欧元区的形成而进一步推进：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联合大学的创立，以及位于古宾/古本(Gubin/Guben)的欧洲学派的成立。到90年代末期，德国成为波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并且极为有效地成为波兰与西方国家一体化的倡导者。波-德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这对于之前的一两代人是难以想象的。确实，曾出任布泽克政府外交部长，并自2004年以来一直就是欧洲议会的波兰成员的盖莱梅克教授就曾毫不犹豫地就把与德国的和解描述为“20世纪末的政治奇迹之一”。

与莫斯科的关系不仅依然保持正常，而且由于在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政府承认苏联对1940年的卡廷大屠杀负有责任而发生显著的改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家风范标志着波兰-俄罗斯关系的重要转折：共产党时期的巨大谎言和不可言说的禁忌如今都已烟消云散。1991年6月和7月，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解体，《华沙公约》失效。1993年8月，叶利钦(Yeltsin)访问华沙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卡廷惨案以及苏联其他压迫波兰人民的行为道歉；并且他还移交了另外两起于1940年分别发生在斯塔罗别利斯克(Starobelsk)和奥斯塔什科夫(Ostashkov)的对波兰犯人大屠杀的详细材料。1993年，双方签署了修建一条贯穿波兰的主要天然气管道以及俄罗斯向波兰供应天然气的条约；同年秋天，最后一批俄罗斯军队撤离了波兰领土。然而，1993年双方友好关系达到顶点后却开始冷却。叶利钦生病期间俄罗斯政局的不确定性、共产党的复苏、津日诺夫斯基(Zhirinovskiy)领导的民族主义者的兴起、车臣战争，和波兰国内对车臣人民的广泛同情，以及担忧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和后来俄罗斯反对波兰加入北约，所有这些都使得波兰对于东方这位庞大的邻居产生了怀疑。2005年5月，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总统为苏联战时在东欧的行为声辩，这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对于波兰(和立陶宛)支持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的回应。不管怎样，两国对于1939年苏德之间的协定和雅尔塔会议，以及苏联

1945年“解放”中东欧的性质做出的完全相反的解释,这都导致波兰-俄罗斯政府关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的2005年仍深受困扰,这是对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深刻分歧的明显标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波兰东部边境往来的非官方贸易,以及90年代俄罗斯集市在波兰的出现(这在苏联霸权的“国际主义”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为增进波兰普通民众与俄罗斯人民和东部边境接壤的其他民族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波兰在1989—1990年间已经为苏联解体做好了充分准备:在与莫斯科的苏联政权保持政府关系的同时,波兰外交部长同样也接触了单独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政府。确实,波兰的奥得河-尼斯河边境最终得以确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很早就表示愿意承认各个东部邻国在苏联时代确认的边境线内各自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波兰近期历史上的一个讽刺性的转折是,由流亡者耶日·盖德罗伊奇(Jerzy Giedroyc)在70年代和80年代构建起来的、针对其东部直接相邻国的后共产主义波兰的外向型政策,又由其本人改变为与现在的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相和解的外交思想。共产主义政权的崩塌并没有在波兰东部边境上再次引起民族主义者的怨恨和与民族统一主义者的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9—1993年间在外交部长斯库比谢夫斯基及其专家团队支持下的盖德罗伊奇前后一致的政治追求。1989年以后波兰共产党以及前共产党人也并没有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去维持其政治影响——因此没有发生像前南斯拉夫地区以及后苏联时代的外高加索地区的悲剧性事件。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前波兰的外交部长也把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做即将出现的民族国家对待,由于相互都采用了“欧洲标准”,使得各国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都得到保护,除了边界线变更和明显干涉邻国内政之外。

1991年11月,波兰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并且是第一个表示承认的国家。没有被任何波兰复仇主义者所恐吓,借助波兰后团结工会政要的支持,乌克兰民族运动(Rukh)可以自信地宣称乌克兰已经脱离了莫斯科。波兰与乌克兰在1992年5月签订的条约中再次确认双方关

系的建设性发展,这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如果我们还记得 40 年代民族间恐怖的大屠杀以及民族驱逐的话。1997 年 5 月由乌克兰总统库奇玛(Kuchma)和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在基辅签订的关于和解的联合声明,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开辟了道路。波兰成为乌克兰宣布转向西方的主要支持者。2000 年由乌克兰和波兰组成的维和部队被北约派往科索沃(Kosovo)地区。由于十几年来都与乌克兰维持着友好的关系,使得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能够在 2004 年 11 月到 12 月的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扮演重要的调解人角色。

虽然波兰的公共舆论极力支持 1990 年立陶宛独立的请求,但波兰-立陶宛关系的正常化所耗费的时间却远远超过波兰与乌克兰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虽然波兰在寻求自身与立陶宛在中世纪以及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关系的历史连续性,但是在维尔纽斯的立陶宛新政府却对他们国家与波兰的历史联系抱以消极态度;甚至还采取了针对境内波兰人的敌对行为,正中分裂主义者的下怀。维尔纽斯要求波兰政府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对维尔诺(Wilno)的侵占道歉,作为签订国家之间条约的条件。幸运的是,人们采纳了一项较为聪明的建议,1994 年 4 月的条约集中讨论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历史怨恨;尽管如此,立陶宛议会直到 1994 年 10 月才批准了该条约。直到 90 年代晚期,双方关系才得到明显改善;在从美国归来的流亡者总统瓦尔达斯·阿达姆库斯(Valdas Adamkus)的领导下,立陶宛开始把波兰看做其加入北约的牵线搭桥者。

白俄罗斯(前苏联的另一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受到波兰的欢迎,两国在 1992 年 6 月签订了一项条约,但此后由于卢卡申科(Lukashenko)独裁统治之下的半苏维埃政权的加强,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被阻断了。考虑到白俄罗斯西部作为少数民族的大多数波兰族裔的状况,波兰并不赞同 1998 年对于白俄罗斯的国际制裁。随着 2004 年加入欧盟,波兰不得不停止自己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无签证协议,取而代之的是免费签证,乌克兰接受了这种方式,但白俄罗斯表示拒绝。

波兰与南部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其反对党与他们的波兰同仁交往甚密)的关系起初是热情而真挚的。当波兰对其在1938年占领特申(Teschen)以及针对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军事入侵表示再三道歉时,历史的幽灵就被埋葬了。另一方面,雅鲁泽尔斯基和瓦文萨都未能与先前持不同政见的捷克领导人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建立起有益的关系。紧随着1992—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捷克疏远了与波兰的关系,希望以此改善其加入西方国家行列的前景。1997年捷克被告知将与其他几个有此志向的前共产主义国家一同获准加入西方国家的行列。之后捷克与波兰的关系正常化,但也不是过分热情。随着1998年在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选出一届亲西方政府,华沙与斯洛伐克的冷淡关系开始好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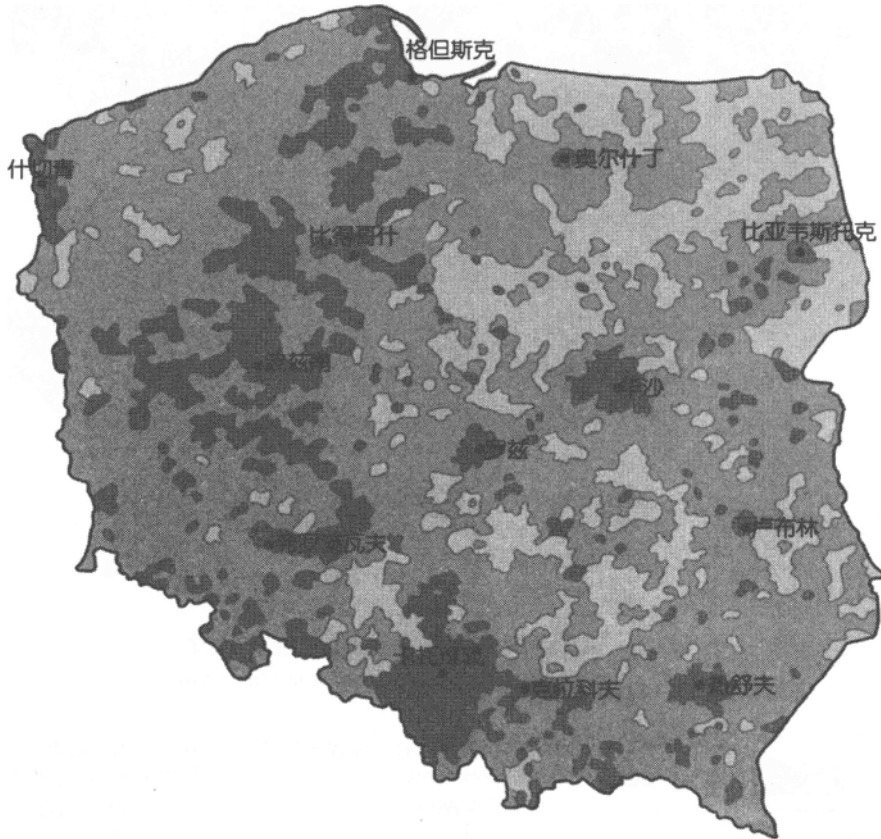
只有等到共产党的审查制度结束、1989年后政治自由回归,才有可能去面对波兰刚刚翻过的历史的灰暗一面。揭发共产党人和其他罪犯就成为国家记忆研究所(National Memory Institute, IPN)——一个非政治化的机构(但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政治机构)——的首要任务,此机构可以接触到上千份的秘密警察文件。还有人尝试去重新评估波兰各民族之间关系,以及波兰与邻国关系的艰辛历史。共产党当局故意对犹太人遭受的伤害轻描淡写,而着重于德国人和乌克兰人对波兰人的暴行。最近对1941年在耶德瓦布内和其他地方的当地波兰人杀害犹太人的公开讨论,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对旅波德国人的虐待,以及战后对旅波德国人放逐的揭露,在媒体和公众舆论中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以真诚及和解的精神对于禁忌话题进行反思,并正视历史的意愿。波兰与乌克兰已经成功达成官方的和解,虽然彼此的民众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痛苦的记忆和有敌意的成见。波兰对于2004年基辅“橙色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以及2005年6月在华沙举行的庆祝波兰与乌克兰和解的激动人心的庆典,还有在利沃夫举行的波兰军事庆典,这些也许都会带来有益的改变。前波兰国家军的士兵与他们战时的立陶宛敌人之间开始了对话,这是另一个鼓舞人心的现象。学术界在把波兰的东部邻国当做平等的民族

国家对待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步；卢布林的天主教大学以波兰语翻译出版了一系列由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均为历史上波兰-立陶宛两国联邦共和国的属地)本国的历史学家编著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项显著的成就。在克拉科夫的旧犹太居民区举行的犹太节,参与一年一度的奥斯威辛“生还者游行”,以及在华沙为波兰犹太人的历史而建的博物馆,这些可视为波兰为改善民族关系所做的进一步的积极举措。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以后,很多波兰裔以色列人都申请了波兰护照。由共产党创立的单一民族国家的神话,长期以来被标榜为他们的历史成就,如今已开始被质疑。虽然确保一支独立的西里西亚民族的尝试受阻,但一支德国少数民族的存在已得到官方认可。1945年波兰从德国那里得到的土地上的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与波兰有着共同的过去,而波兰人民也不再拘泥于强调“光复的领土”起源于“皮亚斯特”时代。然而,波兰舆论依旧为这样的提议而感到不安:以前德国的财产所有者可能会在欧洲的法律下提起诉求,要求归还如今在波兰的他们以前的私人财产;而波兰人也做好了准备,以德国战时的一系列暴行和破坏活动来驳回他们的要求。德国总理施罗德(Schroeder)在出席纪念1944年华沙起义60周年纪念活动时想让波兰人对此放宽心,但是很明显,历史的幽灵尚未完全消失。

334 21世纪的前几年波兰的政治生活一片混乱(2004年全国注册的政党有100多个),而且经济发展也止步不前。另一方面,波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则有了明显的进展,尽管还存在着对外国人(尤其是德国人)会买断波兰领土的担心,尽管有些民族主义的神父对于“无上帝的”西欧仍带有敌意。2003年的全民公投中,有76.8%波兰公民赞成加入欧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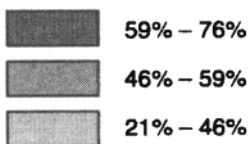
335 波兰的政治在2001年的大选中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丝毫不亚于当年作为政治联盟的团结工会的内部分裂。团结选举行动及其近期的盟友自由联盟都未能在色姆中获得席位。天平偏向了左边:后共产主义的左翼民主联盟和劳动联盟(UP)获得41%的选票,加上农民党的选票(占9%),以莱舍克·米莱尔(Leszek Miller)为首组建了新政

府。米莱尔以前是工人党政治局的一员,但现在转而支持现代欧洲民主制以及波兰加入北约和欧盟。从团结工会分裂出的党派又进一步重组出了一些新的中右政党:“公民纲领党”(PO),致力于降低收入税和简化行政程序,赢得了13%的选票;“法律和公正党”(PiS),由双胞胎



2003年波兰加入欧盟的全民公投

有资格投票的人群(各地区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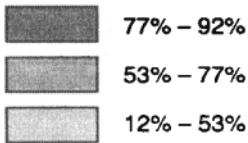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莱谢克·谢夫齐克 (Leszek Szewczyk), 原来在华沙文化研究所(1974-2002); 担任A.Wallis的Atlas Kultury Polski 1946-1980的编者 (Eco, 1994), 以及是 Wskazniki realizacji milenijnych celow rozwoju w polskich gminach(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波兰2004)的合著者。

地图 13a



2003年波兰加入欧盟的全民公投
支持成为欧盟成员国的赞成票(各地区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莱谢克·谢夫齐克 (Leszek Szewczyk)，原来在华沙文化研究所(1974-2002)；担任A.Wallis的Atlas Kultury Polski 1946-1980的编者 (Eco, 1994)，以及是Wskazniki realizacji milenijnych celow rozwoju w polskich gminach(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波兰2004)的合著者。

地图 13b

兄弟莱赫·卡钦斯基 (Lech Kaczyński) 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 (Jarosław Kaczyński) 领导，以反腐败和反有组织犯罪为纲，获得 9.5% 的选票。由于有一些基督教民主的性质，“法律和公正党”吸引了一些以前投给团结工会的反共产主义的选票。2005 年“法律和公正党”还要求对宪政秩序进行彻底清查，并要求以“道德革命”为名建立“第四共和国”(此举将导致与 1989 年“圆桌会议协议”决裂)，并对政权职位进

行更为彻底的清除前共产党员的活动,而且还重新审查了自1990年以来所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重要事件。社会很多阶层都仍深深感到与共产主义决裂得不够彻底(本应该很彻底),这遗留下来的因素需要花费好多年的时间才能消除。

另外两个重要的政党带有些许民粹主义的特色,也是以戏剧性的方式进入了政坛。“波兰家庭联盟”(LPR)是一个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政党,反对波兰加入欧盟,把欧盟视为德国统治欧洲大陆的手段。它赢得了8%的选票。其领导者中有两位分别叫马提亚(Maciej)和罗曼·盖尔蒂赫(Roman Giertych),证明波兰家庭联盟与历史上的国家民主党有着族裔关系。最出人意料的新党是“自卫党”(Samoobrona),这是一个由安杰依·莱佩尔(Andrzej Lepper)领导的激进党,获得10%的选票。由于反对那些像盗贼一样的国家政治阶层而把自身作为穷人的保护者,莱佩尔赢得了许多因为1989年后共产主义变革而落魄的波兰人的支持。2004年年初的公众舆论调查显示,自卫党享有大约1/4的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自卫党明显地置议会程序于不顾,在议会中行为放肆,且在全国发起了挑衅性的游行示威和封锁行动,从而使一些受人尊重的公众舆论机构对其敬而远之。

米莱尔试图吸引那些寻求稳定和现代化的波兰人,但是他的政府面临着难题:国家财政尚不稳固、公共开支被提议削减、外国投资的下降、持续的高失业率,以及对于加入欧盟不稳定的公众支持率。2003年3月农民党离开了执政联盟,使米莱尔政府在议会中成了少数派。总理职位缺乏合适的候选人,仅仅依靠对成功的加入欧盟民众投票的支持,米莱尔继续主持着局面去面对新的挑战。2003—2004年有两场持久而复杂的斗争:调控广播和电视的新法律和改革糟糕的国家卫生系统使严重的腐败现象暴露出来,严重地损坏了政府的形象,并且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执政的上层人物的失望程度。在外交事务上,米莱尔政府继续在北约事务中扮演活跃角色,强化与美国的防卫合作。波兰积极支持2003年3月由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行动,并被授权控制伊拉克南部的一个地区。虽然政府出兵伊拉克引起了民众越来越大的不

断的政治丑闻所困扰；2004年3月，一个小团体脱离原来的联盟组成了波兰社会民主党(SDPL)。米莱尔使波兰于2004年5月1日正式加入欧盟(许多评论家将之看做是波兰现代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之后就辞去了总理职位。他的继任者马雷克·贝尔卡(Marek Belka)是一个有左翼背景但是独立于左翼民主联盟的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他的由众多专家组成的过渡时期政府一直持续到2005年9月。经济复苏和国外投资的增加(2004年为80亿英镑)，作为欧盟新成员国之初的巨大的积极效果，特别是对迄今为止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的波兰农民来说，这些也许已经把民粹主义政党的吸引力掩盖了下去，并为支持已经提出的欧洲宪法赢得了一张赞成票。然而事情很大程度上还得取决于中右政党能否团结一致。

2005年是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第二届任期，也是最后一届任期结束的一年。直到目前，他的声望依然很高，在2004年底的乌克兰“橙色革命”中，他所扮演的建设性调解人角色强化了他代表的波兰在国际舞台上的庄严而高效的形象。2005年初仍然没有明确的总统候选人，但是根据当年7月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前左翼民主联盟总理和外交部长、议会最近的发言人弗沃齐米日·齐莫舍维奇(Włodzimierz Cimoszewicz)的支持率占据首位，居于第二位的是莱赫·卡钦斯基。齐莫舍维奇不久后退出了竞选，而生于格但斯克附近的卡舒布(Kaszub)区的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作为公民纲领党的领袖之一，成为卡钦斯基的主要竞争对手。虽然卡钦斯基和图斯克都曾加入团结工会，但前者强调保守的国家价值观和国家强大的重要性，而后者面对国家问题则倾向于更为自由的自由市场经济。

2005年4月2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去世使得波兰失去了在罗马的“保护天使”。虽然目前对于波兰裔教皇对其国家的影响做结论性的评价还为时尚早，但毫无疑问，在一些地区他的作用是很深远的。1979年他首次到波兰朝圣访问，大大推动了以团结工会为代表的自由解放运动的兴起，而他对调解和对话方式的呼吁，为共产主义的和平过渡做出了贡献。面对波兰天主教上层对于欧盟的不同看法，教皇公开

支持波兰加入欧盟的态度确实促使很多波兰人在 2003 年的全民公投中投出了赞成票。另一方面,教皇的确也批评了波兰在 1989 年以后的变革中太过自由,没有充分地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方面。波兰天主教徒们在他们的私人和公众生活中并非完全遵守教皇的教导,教皇同样也没能遏止波兰社会逐渐的世俗化。2005 年秋天,波兰的竞选活动激烈地进行着,但是同年 4 月,某种类似于团结工会的精神确实在这个普遍沉浸在悲伤中的国家有所闪现。

21 世纪伊始,波兰 3 860 万公民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国家自由和国家安全,而这一切是他们先前的几代人曾被痛苦地剥夺掉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未来仍是波兰关心的主要问题,但是波兰如今和它所有的邻国都和平共处,并且与它们中大多数都有着紧密的关系。考虑到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这些都是引人注意的。1989 年以来,波兰取得了很多成就,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大。加入欧盟标志着波兰重新回到了欧洲文明的主流,而且也为波兰重新成为欧洲政治的主要参与者——正如 17 世纪末之前以及短暂而不那么愉悦的 1919—1939 年之间提供了保障。然而今天的波兰社会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尤其是政治腐败,大多数的政治争论都是低水平的,人们对大多数国家机制缺乏信心,以及大多数民众都怀有冷漠而疏离的心态。民粹主义的危险就是对此的警告。欧盟成员国的身份能否提升公民的责任意识、更合理的经济改革与相应的社会和谐能否实现——虽然这些都还是未知的问题,但人们仍然满怀期待。

尾 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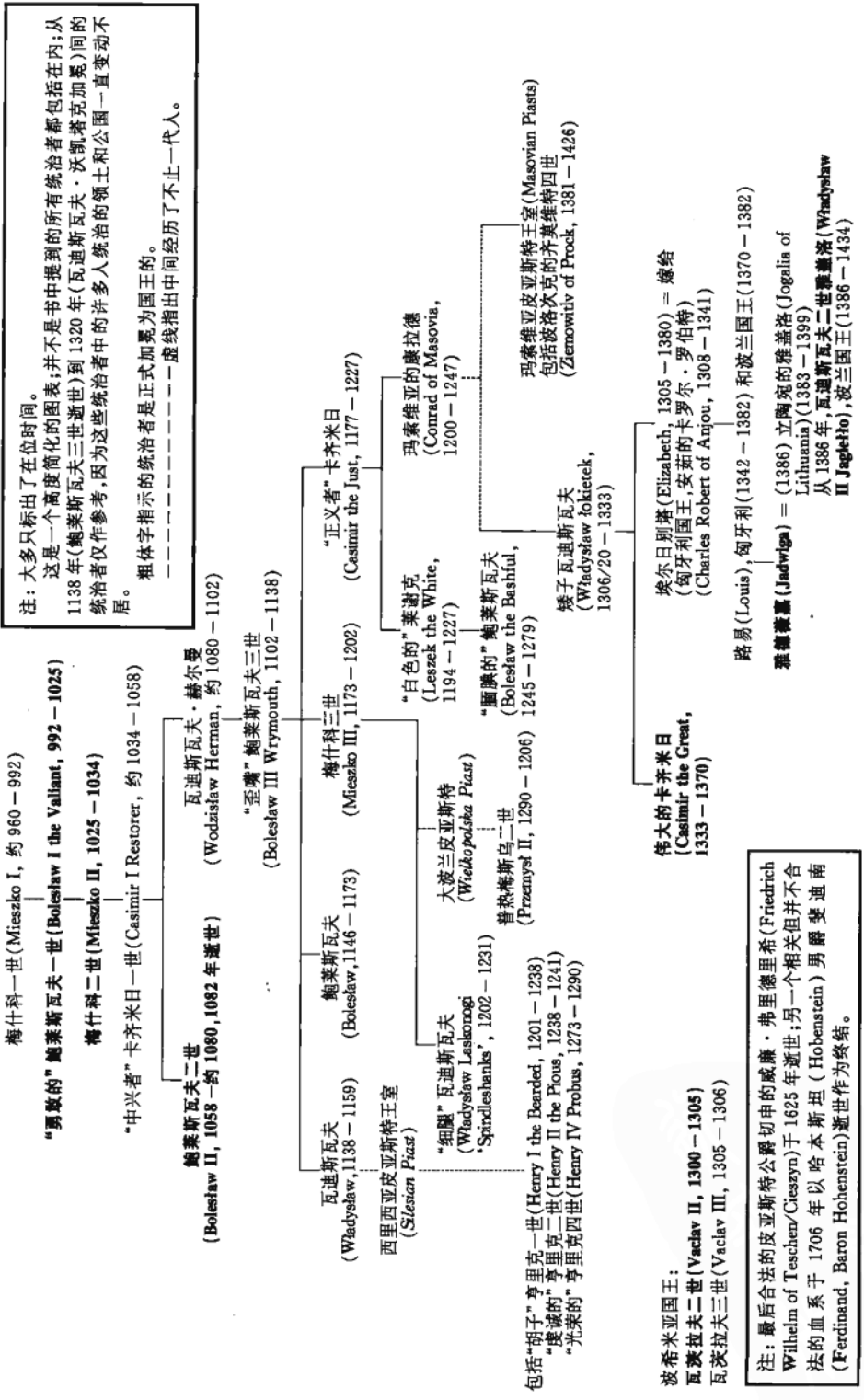
2005 年 9 月议会大选的结果是:“法律和公正党”位居首位(获得 26.8% 的民众投票),“公民纲领党”居第二位(获得 24.2% 的民众投票),“自卫党”居第三位(获得 11.7% 的民众投票),前执政党左翼民主联盟跌至第四位,仅占投票总数的 11.4%。在 2005 年 10 月的最后一轮总统选举中,莱赫·卡钦斯基获得 54% 的选票赢得大选;唐纳德·图斯克获得 46% 的选票,位居第二。

附 录

波兰统治者谱系表



I 皮亚斯特时期



注: 大多只标出了在位时间。
 这是一个高度简化的图表; 并不是书中提到的所有统治者都包括在内; 从 1138 年(鲍莱斯瓦夫三世逝世)到 1320 年(瓦迪斯瓦夫·沃凯塔克加冕)间的统治者仅作参考, 因为这些统治者中的许多人统治的领土和公国一直变动不居。
 粗体字指示的统治者是正式加冕为国王的。
 -----虚线指出中间经历了不止一代人。

波希米亚国王:
 瓦茨拉夫二世 (Václav II, 1300 - 1305)
 瓦茨拉夫三世 (Václav III, 1305 - 1306)

注: 最后合法的皮亚斯特公爵切申的威廉·弗里德里希 (Friedrich Wilhelm of Teschen/Cieszyn) 于 1625 年逝世; 另一个相关但并不合法的系于 1706 年以哈本斯坦 (Hohenstein) 男爵斐迪南 (Ferdinand, Baron Hohenstein) 逝世作为终结。

II 雅盖洛时期：波兰国王与立陶宛大公

格底敏，立陶宛大公
(Gediminas, prince of Lithuania, 约 1316 - 1342)

凯伊斯特图特 (Kestutis, 1337 - 1382)
维托尔德 (Vytautas) 立陶宛大公 (1392 - 1430)

奥尔盖得 (Algirdas, 1345 - 1377)

雅盖洛 (Jogaila);
1377 - 1434 年立陶宛大公
自 1386 年, 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洛, 波兰国王 (1386 - 1434)
= (1) 1386 年波兰的雅德维加 (1383 - 1399)
= (4) 1422 年戈沙尼的索尼亚 (Sonia of Golszany)

卡齐米日四世·雅盖洛契克 (Casimir IV); 立陶宛大公,
1440 - 1492 = 1454, 哈布斯堡的埃尔日别塔
(Elizabeth of Habsburg)
波兰国王 1446 - 1492

“瓦尔纳”的瓦迪斯瓦夫三世
(Władysław III 'of Varna')
波兰国王 1434 - 1444
匈牙利国王 1440 - 1444

瓦迪斯瓦夫
波希米亚的瓦迪斯瓦夫二世国王
(King of Vladislav II of Bohemia)
(1471 - 1516)
匈牙利国王 (King Ulászló II of Hungary 1490 - 1516)

约翰一世·奥尔布拉赫特
(John I Albert)
波兰国王 1492 - 1501

亚历山大
(Alexander)
立陶宛大公 1492 - 1506
波兰国王 1501 - 1506

老齐格蒙特一世
(Sigismund I 'the Old')
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 1506 - 1548
= (1) 1495 巴尔巴拉 (Barbara Zápolya)
= (2) 1518 博娜 (Bona Sforza)

安娜 (Anna 1503 - 1547)

路易二世 (Louis II)
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 1516 - 1526

= 1527

伊莎贝拉
(Isabella 1519 - 1559)
= 1539
匈牙利的约翰·扎波利亚
(John Zápolya of Hungary)

齐格蒙特二世
(Sigismund II Augustus)
在波兰和立陶宛统治
(1548 - 1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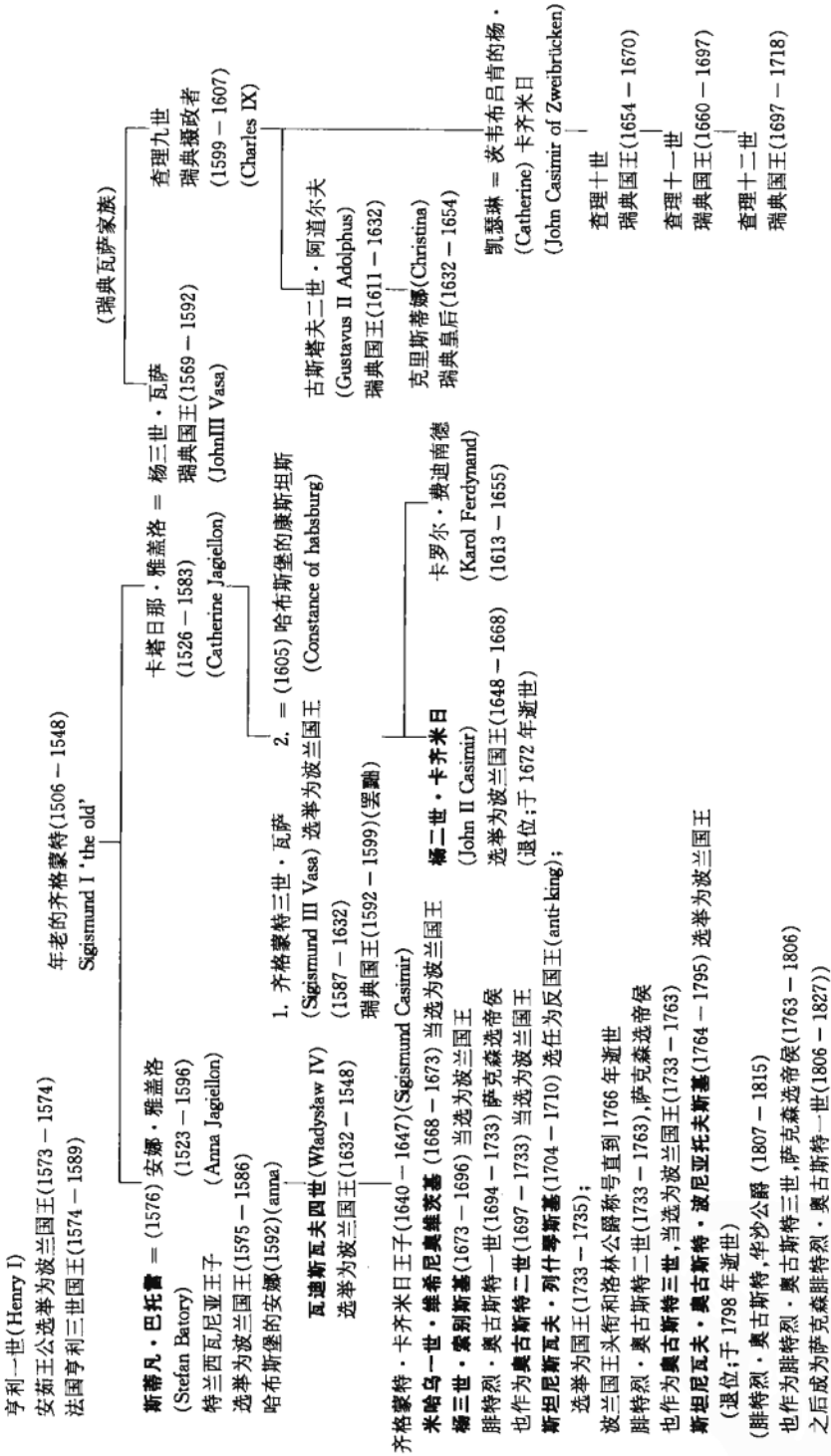
安娜 (1523 - 1596)
= 1576 斯蒂凡·巴托雷
(Stefan Batory)
选任的波兰国王 1576 - 1586

卡塔日那
= 1562 嫁给约翰
三世·瓦萨 1569 - 1592
瑞典国王, 芬兰公爵
(John III Vasa)

斐迪南
(Ferdinand I of Habsburg)
神圣罗马皇帝
1556 - 1564

齐格蒙特三世·瓦萨 波兰选任的国王 1587 - 1632 从 1592 年任瑞典国王 1599 年废位

III 波兰-立陶宛共和国自由选王名单(及其他)



IV 被瓜分波兰领土的统治者

(只显示王朝日期)

1. 俄国的罗曼诺夫(Romanov)皇帝
(1815年后享有“波兰国王”的称号)
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
保罗一世(1796—1801)
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
尼古拉一世(1825—1855)
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
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
尼古拉二世(1894—1917)(退位)
2.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
(神圣罗马皇帝
直到1806年;奥地利
皇帝1804—1918)
玛利亚·特蕾莎(1740—1780)
约瑟夫二世(1765—1790)
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
弗朗西斯(二世)一世(1792—1835)
费迪南德一世(1835—1848)
弗朗西斯·约瑟夫(1848—1916)
查尔斯一世(1916—1918)(退位)
3. 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国王
(1815年后也是
波森大公;1871
年后为德意志皇帝)
腓特烈二世大帝(1740—1786)
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1797)
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
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
威廉一世(1861—1888)
腓特烈三世(1888)
威廉二世(1888—1918)(退位)
4. 萨克森的韦丁
(直到1806年萨克森
选帝侯;1806年后为
萨克森国王)
腓特烈·奥古斯特,华沙公爵
(1807—1815)
(退位)

V 国家元首、总统、共产主义党派 领导人(1918 — 2005)

第二共和国(1918 — 1939)

国家元首

约瑟夫·毕苏茨基(1918. 11 — 1922. 12)

总 统

加布列尔·纳鲁托维奇(1922. 12)

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霍夫斯基(1922. 12 — 1926. 5)

伊格纳采·莫希齐茨基(1926. 6 — 1939. 9)

流亡政府(1939 — 1990)

保持与第二共和国在宪政上的连贯性

总 统

瓦迪斯瓦夫·拉奇凯维奇(1939. 9 — 1947. 6)

奥古斯特·扎莱斯基(1947. 6 — 1972. 4)

爱德华·拉琴斯基(1979. 4 — 1986. 4)

卡齐米日·萨巴特(1986. 4 — 1989. 7)

雷沙德·卡乔洛夫斯基(1989. 7 — 1990. 12)

波兰人民共和国 (1944 — 1989)

国家元首

共和国总统(KRN)

鲍莱斯瓦夫·贝鲁特(1944.11 — 1947.2)

国务委员会主席

鲍莱斯瓦夫·贝鲁特(1947.2 — 1952.11)

部长会议主席

亚历山大·萨瓦茨基(1952.11 — 1964.8)

爱德华·奥哈布(1964年.8 — 1968.4)

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1968.4 — 1970.12)

约瑟夫·西伦凯维兹(1970.12 — 1972.3)

亨里克·雅布翁斯基(1972.3 — 1985.11)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85.11 — 1989.7)

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PZPR)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鲍莱斯瓦夫·贝鲁特(1948.12 — 1954.3)

第一书记

鲍莱斯瓦夫·贝鲁特(1954.3 — 1956.3)

爱德华·奥哈布(1956.3 — 10)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1956.10 — 1970.12)

爱德华·盖莱克(1970.12 — 1980.9)

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1980.9 — 1981.10)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81.10 — 1989.7)

米耶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1989.7 — 1990.1)

波兰第三共和国(自 1989)

总 统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89.7 — 1990.12)

莱赫·瓦文萨(1990.12 — 1995.12)

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1995.12 — 2005.12)

英文参考文献

通论作品

- Davies, N.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2nd edn, 2005
- Davies, N. *Heart of Europe: a short history of Po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Jedruch, J. *Constitutions, elections and legislatures of Poland 1493 – 1977*, Washington, D. 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2
- Kloczowski, J. *A history of Polish Christia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Knab, S. H. *Polish customs, traditions and folklore*, New York: Hippocrene, 1999
- Kridl, M. *A survey of Po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Hague: Mouton, 1956
- Magocsi, P. R. *A history of Ukraine*,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iłosz, C. *The history of Polish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Prażmowska, A. J. *A history of Pol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Subtelny, O. *Ukraine: a history*,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1988
- Wandycz, P. *The price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Routledge, 1992
- Zamoyski, A. *The Polish way: a thousand years' history of the Poles and their culture*, London: Murray, 1989

1795 年之前的波兰

- Barker, M. (ed.) *The military orders, vol. I: Fighting for the faith and caring for the sick*, Aldershot: Variorum, 1994
- Bartlett, R. *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950 — 1350*, Princeton, N. J.: University Press, 1993
- Basarab, J. *Pereiaslav 1654: a historiographical study*, Edmonton: 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Alberta, 1982
- Bogucka, M. *The lost world of the 'Sarmatians'*, Warsaw: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History, 1996
- Butterwick, R. *Poland's last king and English culture: Stanisław August Poniatowski 1732 — 179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 Carter, F. W. *Trade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Poland: an economic geography of Cracow, from its origins to 179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Christiansen, A. *The northern crusades*, London: Macmillan, 1980
- Długosz, J. *The annals of Jan Długosz: Annales seu Cronicae incliti Regni Poloniae: an English abridgement by H. Michael with a commentary by P. Smith*, Chichester: IM Publications, 1997
- Dolukhanov, P. M. *The early Slavs: eastern Europe from the*

- initial settlement to the Kievan Rus*, London: Longman, 1996
- Fedorowicz, J. K. (ed.) *A republic of nobles: studies in Polish history to 186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Fiszman, S. (ed.) *The Polish Renaissance in its European contex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 Fiszman, S. (ed.) *Constitution and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Poland: the Constitution of 3 May 179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Fletcher, R. *The conversion of Europe: from paganism to Christianity 371 – 1386 AD*,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7
- Frick, D., *Meletij Smotryc'kyj*,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Friedrich, K. *The other Prussia: Royal Prussia, Poland and liberty, 1569 – 177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Frost, R. *After the Deluge: Poland-Lithuania and the Second Northern War 1555 – 16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Frost, R. *The Northern Wars: war, state and society in north-eastern Europe 1558 – 1721*, London: Longman, 2000
- Fuhrmann, H. *Germany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c. 1050 – 12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Geremek, B. *The common roots of Europ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 Górecki, P. *Economy, society, and lordship in medieval Poland 1100 – 1250*, New York: Holme and Meier, 1992
- Gudziak, B. A. *Crisis and reform: the Kieran metropolitanate, the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Union of Br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Hundert, G. D. *The Jews in a Polish town: the case of Opatów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Press, 1992
- Hundert, G. D. *Jews in Poland-Lithuan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genealogy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Kamiński, A. S. *Republic vs. autocracy: Poland-Lithuania and Russia, 1686 – 169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Kaplan, H. H. *The First Partition of Po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 Kirby, D. *Northern Europ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e Baltic world 1492 – 1772*, London: Longman, 1990
- Knoll, P. W. *The rise of the Polish monarchy: Piast Poland in east central Europe, 1320 – 13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 Kochanowski, J. *Jan Kochanowski: Laments*, trans. S. Heaney and S. Barańczak, London: Faber, 1995
- Levine, H. *Economic origins of antisemitism: Poland and its Jew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Lord, R. H. *The Second Partition of Poland: a study in diplomatic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5
- Lukowski, J. T. *Liberty's folly: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1
- Lukowski, J. T.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1772, 1793, 1795*, London: Longman, 1999
- Maćzak, A., Samsonowicz, H. and Burke, P. (eds.) *East-central Europe in transition: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Manteuffel, T. *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sh state: the period of ducal rule, 963 – 1194*, Detroit, Mich. :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Musteikis, A. *The Reformation in Lithuania: religious fluctuation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oulder, Colo. :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8
- Pasek, J. Ch. *Memoirs of the Polish baroque: the writings of Jan Chryzostom Pasek, a squir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Poland and Lithuania*, ed. C. S. Lee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Potonsky, A., Basista, J. and Link-Lenczowski, A. (eds.) *The Jews in Old Poland*, London: Taurus, 1993
- Rosman, M. *The Lords' Jews: magnate-Jewish relations in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Rowell, S. C. *Lithuania ascending: a pagan empire within east-central Europe, 1295 – 13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Sedlar, J. W. *East central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1000 – 150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 Segel, H. B. *Renaissance culture in Poland: the rise of humanism 1470 – 154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 Subtelny, O. *Domination of eastern Europe: native nobilities and foreign absolutism, 1500 – 1715*,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 Sysyn, F. E. *Between Poland and the Ukraine: the dilemma of Adam Kysil*,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Tazbir, J. *A state without stakes: Polish religious tolera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The Kościuszko Foundation, 1973

Zamoyski, A. *The last king of Poland*, London: Cape, 1992

Zank, W. *The German melting-pot: multicultur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Zółkiewski, S. *Expedition to Moscow: a memoir*, London: Polonica Publications, 1959

1795 年之后的波兰

Abramsky, C., Jachimczyk, M. and Polonsky, A. (eds.) *The Jews in Pol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Ascherson, N. *The Polish August: the self-limiting revolution*, London: Allen Lane, 1981

BetheU, N. *Gomułka, his Poland and his communism*, London: Longman, 1969

Brock, P. *Polish revolutionary populism: a study in agrarian socialist thought from the 1830s to the 1850s*,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1977

Bromke, A. *Poland's politics: idealism vs. re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Brown, J. F. *Surge to freedom: the end of communist rule in eastern Europe*,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Brzeziński, Z. K.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Ciechanowski, J. M. *The Warsaw Rising of 194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Cienciala, A. M. *Poland and the Western Powers 1938 – 1939: a study in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8

Cienciala, A. M. and Komarnicki, T. *From Versailles to Locarno: keys to Polish foreign policy 1919 – 25*, Lawrence, Kans.:

-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1984
- Curry, J. L. and Fajfer, L. (eds.) *Poland's permanent revolution: peoples vs. elites 1956 — 1990*, Washington, D. C. :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zaplicka, J. (ed.), *Lviv: a city in the crosscurrents of cultur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2005
- Davies, N. *White eagle, red star: the Polish — Soviet war 1919 — 1920*, London: Orbis Books, 1983
- Davies, N. *Rising '44: the Battle for Warsaw*, London: Macmillan, 2003
- Davies, N. and Moorhouse, R. *Microcosm: Portrait of a Central European Cit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2
- Dawisha, K. *Eastern Europe, Gorbachev and reform, the great challenge*, 2nd ed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Dziewanowski, M. K. *The 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 an outline of history*, 2nd edn,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Eile, 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ism in partitioned Poland, 1795 — 1918*,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 Eisenbach, A.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Jews in Poland 1780 — 187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 Fejto, F.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democraci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 Fountain, A. V. *Roman Dmowski: party, tactics, ideology 1895 — 1907*, Boulder, Colo. :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0
- Garliński, J. *Polan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Macmillan, 1985
- Garton Ash, T.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London: Penguin, 1999

- Gilbert. M. *The Holocaust: The Jewish tragedy*, London: Fontana/Collins, 1989
- Gross, J. T. *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the general gouvernement 1939 — 1944*, Princeton, N. J. : University Press, 1979
- Gross, J. T. *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Princeton, N. J. : University Press, 1988; expanded edition, 2002
- Hagen, W. W. *Germans, Poles, and Jews. The nationality conflict in the Prussian east, 1772 — 19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Hayden, J. *Poles apart: Solidarity and the new Poland*, Blackrock: Irish Academic Press, 1994
- Howard, A. E. D. (ed.) *Constitution making in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 C.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3
- Jaworski, R. and Pietrow-Ennker, B. (eds.) *Women in Polish society*, Boulder, Colo. :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92
- Jedlicki, J. *A suburb of Europe: nineteenth-century Polish approaches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Jędrzejewicz, W. *Piłsudski: a life for Poland*,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82
- Kamiński, B. *The collapse of state socialism: the case of Poland*, Princeton, N. J. : University Press, 1991
- Karski, J. *Story of a secret stat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45
- Karski, J. *The Great Powers and Poland 1919 — 1945: from Versailles to Yalta*, Lanham, Md.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 Kaset, M. C. and Radice, E.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1919 – 1975*, Oxford: Cleveland Press, 1986
- Kenney, P. *Rebuilding Poland: workers and communists 1945 – 1950*,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Kersten, K.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ule in Poland 1943 – 194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Kieniewigz, S.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olish peasant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 Kirby, D. *The Baltic world 1772 – 1993. Europe's northern periphery in an age of change*, London: Longman, 1995
- Komarnicki, T. *The rebirth of the Polish republic: a study in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1914 – 1920*, London: Heinemann, 1957
- Korbel, J. *Poland between East and West*, Princeton, N. J.: University Press, 1963
- Korboński, A. *The politics of socialist agriculture in Poland 1945 – 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 Korboński, S. *The Polish Underground State 1939 – 1945*,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78
- Kurczewski, J. *The resurrection of rights in Po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 Labeledz, L. (ed.) *Poland under Jaruzelski*, New York: Scribner, 1984
- Latawski, P. (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and 1914 – 23*, London: Macmillan, 1992
- Lepak, K. J. *Prelude to Solidarity: Po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Gierek reg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 Leslie, R. E. *Polish politics and the revolution of November 1830*,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6

- Leslie, R. F. *Reform and insurrection in Russian Poland 1856 – 1863*,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3
- Leslie, R. E (ed.) *The history of Poland since 186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Lipski, J. J. *A history of KOR: the committee for workers' self-def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Lucas, R. C. *Forgotten holocaust: the Pole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39 –1944*, New York: Hippocrene, 1990
- Markovits, A. S. and Sysyn, F. E. (eds.) *Nation building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essays on Austrian Galicia*,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Micewski, A. *Cardinal Wyszyński: a biography*, San Diego, Calif.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4
- Olczak-Roniker, J. *In the garden of memory: a family lif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4
- Olszewski, A. K. *An outline of Polish art and architecture 1890 – 1980*, Warsaw: Interpress, 1989
- Paczkowski, A. *The spring will be ours: Poland and the Poles from occupation to freedom*, trans. by Jane Cave, University Park, Pa. :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Polonsky, A. *Politics in independent Poland 1921 –1939: the crisi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 Polonsky, A. (ed.)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Polish Question 1941 –1945: a documentary study in Cold War origins*,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76
- Polonsky, A. and Michlic, J. B. *The neighbours respond: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Jedwabne massacre in Poland*, Princeton, N. J. :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orter, B. *When nationalism began to hate: imagining modern*

-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Po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Prażmowska, A. J. *Britain and Poland 1939 – 1943: the betrayed al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rażmowska, A. J.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Macmillan, 2000
- Prizel, I. and Michta, A. (eds.) *Polish foreign policy reconsidered*,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 Raina, P. *Poland 1981: towards social renewal*,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5
- Ransel, D. L. and Shallcross, B. (eds.), *Polish Encounters, Russian Identit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Rothschild, J.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Washington, D. C. : University Press, 1974
- Rothschild, J. *Return to diversit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2nd ed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enn, A. E. *Lithuania awaken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Snyder, T.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 – 1999*,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tachura, P. D. *Po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98
- Stachura, P. D. (ed.) *Poland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Macmillan, 1999
- Stehle, H. *The independent satellit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Poland since 1945*, New York: Praeger, 1965

- Stifling, T., Nałęcz, D. and Dubicki, T. (eds.),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between Poland and Great Britain during World War Two*, London and Portland: Vallentine Mitchell, 2005
- Stokes, G. (ed.) *From Stalinism to plural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ugar, P. F. and Lederel, I. J. (eds.)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 Sword, K. with Davies, N. and Ciechanowski, J. *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sh community in Great Britain, 1939 — 1950*, London: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1989
- Syrop, K. *Spring in October: the story of the Polish revolution 1956*, New York: Praeger, 1957
- Thaden, E. C. *Russia's western borderlands 1710 — 1870*, Princeton, N.J.: University Press, 1984
- Thomas, W. and Znaniecki, F.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2 vols., New York: Dover, 1958
- Torańska, T. *Oni ['Them'] : Stalin's Polish puppets*, London: Collins Harvill, 1987
- Trzeciakowski, L. *The Kulturkampf in Prussian Poland*,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90
- Walicki, A. *Philosophy and Romantic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Po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 Wandycz, P. *Soviet-Polish relations 1917 — 192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Wandycz, P. S. *The lands of partitioned Poland 1795 — 191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 Wiskemann, E. *Germany's eastern neighbours: problems relating to*

- the Oder — Neisse Line and the Czech frontier reg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 Wynot, E. *Warsaw between the world wars: profile of the capital city in a developing land 1918 — 1939*,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3
- Zamoyski, A. *Chopin: a biography*, London: Collins, 1979
- Zamoyski, A. *The forgotten few: the Polish Air For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John Murray, 1995
- Zamoyski, A. *Holy madness: Romantics, patriots and revolutionaries 1776 — 1871*,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9
- Zawadzki, W. H. *A man of honour: Adam Czartoryski as a statesman of Russia and Poland 1795 — 183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 Zawodny, J. K. *Death in the forest: the story of the Katyn Forest massacre*,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Zimmerman, J. D. *Poles, Jew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ty: the Bund and the Polish Socialist Party in late Czarist Russia 1892 — 1914*, Madison, Wisc.: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2003

索引

(索引部分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

- Adamkus, Valdas (1926 -) 瓦尔达斯·阿达姆库斯 331
- Adelaide of Hesse (d. 1371) 黑塞的阿德莱德(1371年去世) 33
- Adenauer, Konrad (1876 - 1967) 康拉德·阿登纳 315
- Albrecht of Habsburg (1248 - 1308) 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 21
- Albrecht of Hohenzollern-Ansbach, 霍亨索伦的阿尔布雷希特
Grand Master of the Teutonic 条顿骑士团总团长
Knights and first secular ruler of 骑士团首位长期统治者
Ducal Prussia (1525 - 1568) 普鲁士公国 50, 60
- Aldona, Lithuanian princess (1309 - 1339) 阿尔多娜, 立陶宛公主 25, 33
- Algirdas, Lithuanian prince (1345 - 1377) 奥尔盖得, 立陶宛大公 39, 44
- Alexander, king of Poland (1501 - 1506) 亚历山大, 波兰国王 44, 51, 55, 62, 63 - 64
- Alexander I, tsar of Russia (1801 - 1825) 亚历山大一世, 俄国沙皇
and king of Poland (1815 - 1825) 亚历山大一世, 波兰国王 140, 141, 146 - 147, 150 - 152
- Alexander II, tsar of Russia (1855 - 1881) 亚历山大二世, 俄国沙皇 174, 177, 179 - 180, 183
- Alexei Mikhailovich, tsar of Muscovy (1645 - 1676) 阿历克谢·米哈伊诺维奇, 莫斯科公国沙皇 96
- Altmark, truce of (1629) 《阿尔特马克停战协定》 93
- Anders, Władysław (1892 - 1970) 瓦迪斯瓦夫·安德斯 267, 269, 279, 293, 294
- Andrew II, king of Hungary (1290 - 1301) 安德鲁二世, 匈牙利国王 21
- Andrew the hunchback, prince of Polotsk

B

- (1342—1387) “驼背”安德鲁,波洛次克大公 40
- Andrusovo, truce of (1667) 《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100,106
- Anna, Hungarian Jagiellonian princess (1503—1547) 安娜,匈牙利雅盖洛王室公主 55
- Antitrinitarians 反三位一体派 104
- Arciszwski, Tomasz (1877—1955) 托玛什·阿尔齐舍夫斯基 274,292,294
- Armia Krajowa (AK) 国家军(AK), 参阅 Home Army (AK)
- Armia Ludowa (AL) 人民军(AL), 参阅 People's Army (AL)
- Arnhem, battle of (1944) 阿纳姆战役 269
- Askenazy, Szymon (1865—1935) 西蒙·阿什肯纳奇 236
- Asnyk, Adam (1838—1897) 亚当·阿斯尼克 186
- Astrakhan 阿斯特拉罕 58
- Augustus II, king of Poland (1697—1733) 奥古斯特二世,波兰国王 106—109,112
- Augustus III, king of Poland (1733—1763) 奥古斯特三世,波兰国王 110—111, 112,124,125,126
- Auschwitz (Oświęcim) 奥斯威辛 260,333
- Austerlitz, battle of (1805) 奥斯特里茨战役 141
- Australia 澳大利亚 166,280
- Austria (and Austria-hungary) 奥地利(奥匈帝国)83,98,104,106,109—110,112,117—122,123,127,128,131,137—138,140—141,147,156,184—186,218,220,221
- Bacciarelli, Marcellini(1731—1818) 马切利·巴西亚瑞里 142
- Badeni, Kazimierz (1846—1909) 卡齐米日·巴德尼 180
- Balcerowicz, Leszek (1947—) 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 319,323
- Balicki, Zygmunt (1858—1916) 齐格蒙特·巴利茨基 200
- Bank of Poland 波兰银行 154,156
- Bar, Confederacy of (1768—1772) 巴尔党 116,117
- Bartel, Kazimierz (1882—1914) 卡齐米日·巴尔泰尔 240
- Basanavičius, Jonas (1851—1927) 约纳斯·巴萨纳维奇乌斯 195
- Batoh, battle of (1652) 波托战役 96
- Beck, Józef (1894—1944) 约瑟夫·贝克 247,251—252
- Belarus and Belarusians (see also Rus'; western gubernii of the Russian empire) 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人(参阅罗斯;俄罗斯帝国的西固柏利) 4,39,79,86,137,158,179,191,195,205—206,224,225,233,263,281,325,330,331,333
- Belka, Marek (1952—) 马雷克·贝尔卡 337
- Belorussia see Belarus 白俄罗斯(人,语),参见白俄罗斯
- Bem, Józef (1794—1850) 约瑟夫·贝姆 172
- Beresteczko, battle of (1651) 别列斯捷奇科战役 96

- Bereza Kartuska 224
- Berg, Feodor F. (1793 - 1874) 费尔多·贝尔格 179, 181
- Berling, Zygmunt (1896 - 1980) 齐格蒙特·贝林格 268, 271, 272
- Białystok 比亚斯托克 141
- Bibikov, Dmitri G. (1792 - 1870) 季米特里·比比科夫 165
- Bierut, Bolesław (1892 - 1956) 鲍莱斯瓦夫·贝鲁特 268, 283, 292, 295
- Bismarck, Otto von (1815 - 1898) 奥托·冯·俾斯麦 180, 184, 199, 328
- Black Death 黑死病 30
- Bobrowski, Stefan (1840 - 1863) 斯蒂凡·波布洛夫斯基 178
- Bobrzyński, Michał (1849 - 1935) 米哈乌·鲍布任斯基 186, 193 - 194, 206
- Bochnia 波赫尼亚 32
- Bohemia 波希米亚 2, 3, 4, 5, 7, 19 - 20, 21, 22, 24, 25, 27, 38, 41, 51, 60, 82
- Boleslav I, prince of Bohemia (*d.* 972) 鲍莱斯瓦夫, 波希米亚大公 5
- Bolesław I 'the Valiant' ('Chrobry'), king of Poland (992 - 1026) 勇敢的鲍莱斯瓦夫一世, 波兰国王 7, 8 - 9, 10
- Bolesław II (1058 - 1081), king of Poland 鲍莱斯瓦夫二世, 波兰国王 7, 9 - 10
- Bolesław III (1102 - 1138) 'Wrymouth' ('Krzywousty'), prince of Poland "歪嘴"鲍莱斯瓦夫三世, 波兰王公 7, 10, 11, 25
- Bolesław the Tall ('Wysoki') (1163 - 1201), duke of Silesia "高个的"鲍莱斯瓦夫, 西里西亚公爵 11, 14
- Bolesław the Bashful ('Wstydlivy') (1243 - 1279) "腼腆的"鲍莱斯瓦夫 15
- Bolesław II, duke of Płock (*d.* 1313) 鲍莱斯瓦夫二世, 波洛次克公爵 19
- Bolesław-lurii, duke of Halych and Vladimir (1323 - 1340) 鲍莱斯瓦夫-尤里, 加里奇-沃伦公爵 27
- Boniface VIII, pope (1294 - 1303) 卜尼法斯八世, 教皇 21
- Bór-Komorowski, Tadeusz (1895 - 1966) 塔德乌什·布尔-科莫罗夫斯基 294
- Boris Godunov, Tsar of Muscovy (1598 - 1605) 鲍里斯·戈东诺夫, 俄国沙皇 92
- Borysław 鲍瑞斯瓦夫 189
- Bourbon-Conti, François Louis de, prince of (1664 - 1709) 弗朗索瓦·路易, 波旁家族的孔蒂王公 106
-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8, 20, 21, 22, 24, 25, 36, 60, 93, 98, 104
- Brandt, Willy (1913 - 1992) 威利·勃兰特 303
- Brazil 巴西 189
- Breslau *see* Wrocław 布雷斯劳, 参阅弗罗茨瓦夫
- Brest (Brześć, Brest'-Litovskii) 布列斯特 224
- Union of (1596) 联盟 87 - 88
- Treaty of (1918) 条约 220
- Briansk 布里安斯克 60
- Brzeziński, Zbigniew (1928 -)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304, 305, 311
- Brzóska, Stanisław (*c.* 1832 - 1865) 斯坦尼斯瓦夫·博索斯卡 180
- Buczacz, treaty of (1672) 布恰奇条约 105

Buda, Privilege of 1355 1355年布达特权法 34, 46

Budenny, Semyon (1883 - 1973) 西蒙·布琼尼 225, 229

Bug, river 布格河 271

Bund, Jewish socialist party (*see also* Jews) 犹太社会党“崩得” 197, 199, 256

Buonaccorsi, Filippo (1437 - 1496) 菲利普·布奥纳科尔西 72

Buzek, Jerzy (1940 -) 耶日·布泽克 323, 328

Bzura, battle on the (1939) 布祖腊河战役 255

C

Calvinism 加尔文教 76 - 77, 79, 86, 104 参阅新教 (*see also* Protestantism)

Camp of Greater Poland (Obóz Wielkiej Polski) 更大的波兰阵营 246

Camp of National Unity (Ozon) 民族统一阵营 248

Caprivi, George Leo von (1831 - 1899) 列昂·冯·卡普里维 184

Carlowitz, peace of (1699) 《卡尔洛瓦茨和约》 106

Carter, Jimmy, US president (1924 -) 吉米·卡特, 美国总统 304, 305, 311

Casimir I 'the Restorer' ('Odnowiciel'), prince of Poland (1039 - 1058) “中兴者”卡齐米日一世, 波兰王公 7

Casimir II 'the Just' ('Sprawiedliwy'), prince of Poland (1177 - 1194) “正义者”卡齐米日二世, 波兰王公 11

Casimir III 'the Great' king of Poland

(1333 - 1370) 波兰国王“伟大的”卡齐米日三世 26 - 34, 36, 41

Casimir IV, king of Poland (1447 - 1492) 卡齐米日四世, 波兰国王 44, 48, 51, 52, 56, 61, 63

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1769 - 1822) 罗伯特·斯图尔特·卡斯尔雷 147

Catherine II 'the Great', empress of Russia (1762 - 1797)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 115 - 116, 117, 120, 123 - 124, 128, 131, 136, 306

Catherine of Habsburg (1533 - 1572) 哈布斯堡的凯瑟琳 77

Catherine Jagiellon (1526 - 1583) 凯瑟琳·雅盖洛 93

Catholic Church in Poland 波兰天主教 3, 5, 6, 8 - 9, 10, 11, 14, 17, 22 - 23, 27, 30, 31 - 32, 33, 37, 38, 40, 42, 55 - 56, 61, 65, 76, 77, 78, 80, 81, 86 - 87, 94, 104, 106, 111, 115, 127, 135, 138, 183, 184 - 185, 195, 201, 202, 205, 216, 238, 246, 257, 283, 290, 297, 299 - 300, 304, 308, 312, 314, 324, 339, 参阅 Uniate (Greek Catholic) Church

Cecora (Tutora), battle of (1620) 策佐拉战役 92

Cegielski, Hipolit (1813 - 1868) 希波利特·采盖尔斯基 167

Celtis, Conrad (1459 - 1508) 康拉德·切尔提斯 72

Central Industrial Region (COP) 中部工业区 250

Chamberlain, Neville (1869 - 1940) 内维尔·张伯伦 252

- Charlemagne, Emperor (800 - 814) 查理曼大帝 9
- Charles I Robert of Anjou, king of Hungary (1308 - 1342) 查尔斯·罗伯特, 匈牙利国王 21, 25, 26
- Charles IV, king of Bohemia (1346 - 1378), Holy Roman Emperor (1355 - 1378) 查理四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波希米亚国王 27
- Charles V (1516 - 1556) Holy Roman Emperor emperor 查理五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55
- Charles IX (1560 - 1574) king of France 查理九世, 法国国王 83, 84
- Charles IX (1604 - 1611) king of Sweden 查理九世, 瑞典国王 93
- Charles X (1654 - 1660) king of Sweden 查理十世, 瑞典国王 98
- Charles XII (1697 - 1718) king of Sweden 查理十二世, 瑞典国王 107, 109, 110
- Chełm 海乌姆 183, 210, 271
- Chełmno (Kulm) 海乌姆诺(乌尔姆) 22, 25
- Chicago 芝加哥 189
- Chile 智利 166
- Chłopiński, Józef (1771 - 1854) 约瑟夫·赫沃皮茨基 159 - 160, 161
- Chojnice, battle of (1454) 霍伊尼采战役 48
- Chojnice, Privilege of (1454) 霍伊尼采特权法令 63
- Chopin, Fryderyk (Frédéric) (1810 - 1848) 弗里德里克·肖邦 164, 257, 289
- Christian Democrats 基督教民主党 245 - 246
- Churchill, Winston (1874 - 1963) 温斯顿·丘吉尔 266, 268, 269, 274
- Cieszkowski, August (1814 - 1894) 奥古斯特·切兹科夫斯基 168
- Cimoszewicz, Włodzimierz (1950 -) 弗沃齐米日·齐莫舍维奇 339
- cinema in poland 波兰电影 212, 260, 298 (see also Smosarska, Jadwiga and Wajda, Andrzej) 参阅雅德薇嘉·安杰依·瓦依达
- Cistercians 西多会 14
- Civic Platform (PO) 公民纲领党 336, 339, 340
-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农业) 集体化 288, 297, 306
- Colombia 哥伦比亚 166
- Comintern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共产国际 248, 257
-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Workers (KOR) 波兰保卫工人委员会 307
-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 公有农业政策 338
- Commune of Polish People 波兰人民公社 166
- 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 (KPP) 波兰共产党 222, 223, 245, 249, 265, 参阅 Polish Workers' party (PPR), 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PZPR)
- Condé, Louis II de Bourbon, 'the Great Condé' (1621 - 1686) 波旁的路易二世·孔德, 伟大的孔德 100
- 'Congress' Kingdom of Poland (under Russian rule 1815 - 1914) "会议"波兰王国(1815年至1914年受俄国统治) 147,

- 156 - 157, 168, 173 - 174, 182 - 183, 187, 189, 193, 202 - 205, 211 - 212, 219
- Conrad I, duke of Masovia (1202 - 1247) 康拉德一世, 玛索维亚公爵 18, 22
- Conrad III, king of Germany 康拉德三世, 德国国王 11
- Conrad von Feuchtwangen (1291 - 1296), Grand Master of the Teutonic Knights 康拉德·冯·福伊西特万格, 条顿骑士团长 23
- Conrad (Korzeniowski), Joseph (1857 - 1924) 约瑟夫·康拉德(科热尼奥夫斯基) 191
- Constantine Nikolaevich, grand duke (1827 - 1892)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177, 178, 179
- Constantine Pavlovich, grand duke (1779 - 1831) 康斯坦丁·巴弗洛维奇大公 123, 152, 154, 157, 159, 160, 287
-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52, 87, 93
- Constitutions 宪法
- of 3 May 1791 1791 年 5 月 3 日 125 - 128
- of 1807 1807 年 142 - 143
- of 1815 1815 年 150 - 151, 162, 178
- of 1919 1919 年 223
- of 1921 1921 年 231, 271
- of 1935 1935 年 247, 253
- of 1947 1947 年 285
- of 1952 1952 年 286
- amendments of 1975 1975 年修正案 306
- amendments of 1989 1989 年修正案 317, 319
- of 1997 1997 年 324
- Copernicus, Nicolas (1473 - 1543) 尼古拉·哥白尼 72, 73, 156
- Cossacks, of the Ukraine 乌克兰的哥萨克人 54, 87, 92, 93 - 96, 100
- Coup d'état of 1926 1926 年政变 240 - 241
- Courland, duchy of 库尔兰公国 59
- Crimea 克里米亚 18, 117, 123
- Crimean Tatars 克里米亚鞑靼 18, 52, 53 - 55, 56, 59, 69, 75, 78, 96, 106, 117
- Crimean War (1854 - 1856) 克里米亚战争 173
- Cudnów (Khudniv, Khudnov) battle of (1660) 库德诺战役(1660 年) 85
- Curzon Line 寇松线 229, 230, 268, 269, 274
- Cyrankiewicz, Józef (1911 - 1989) 约瑟夫·西凯伦维兹 285
- Czapski, Józef (1896 - 1993) 约瑟夫·恰普斯基 267
- Czartoryska, Izabela (1746 - 1835) 伊萨贝拉·查尔托雷斯卡 140
- Czartoryski, Adam Jerzy (1770 - 1861) 阿达姆·耶日·查尔托雷斯基 136, 140, 146, 150, 151, 153, 154, 157, 159, 161, 164 - 165, 168 - 169, 170, 208
- Czartoryski, August (1697 - 1782) 奥古斯特·查尔托雷斯基 115
- Czartoryski, family of 查尔托雷斯基家族 112, 117, 123
- Czartoryski, Michael (1696 - 1775) 米哈乌·查尔托雷斯基 115
-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国 323, 325, 332
-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参阅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231, 232, 252, 263 - 264, 302, 325, 331 - 332

Czechs (*see also* Bohemia) 捷克人(参阅 Bohemia) 5, 21, 22, 25, 32

Czerwiński, Privilege of (1422) 契尔文斯基特权法令 63

Częstochowa 琴斯托霍瓦 98, 99, 216, 295, 300

D

Dałbrowa basin 东布罗沃盆地 189, 221

Dałbrowski, Jan Henryk (1755 - 1818) 杨·亨利克·东布罗夫斯基 139, 141

Dałbrowski, Jarosław (1836 - 1871) 雅罗斯瓦夫·东布罗夫斯基 177

Dałbrowski, Jerzy (1899 - 1967) 耶日·东布罗夫斯基 254

Danzig 但泽, 参阅 Gdańsk 48, 68, 69, 76, 81, 120, 124, 141, 155

Free City of Danzig (1919 - 1939) 但泽自由市 224, 238 - 239, 252

Danzig Pomerania 美拉尼亚, 参阅 West Prussia

Daszyński, Ignacy (1866 - 1936) 伊格纳采·达申斯基 199, 211, 229

Decembrists (in Russia) 十二月党人(在俄国) 153

Delavigne, Casimir (1793 - 1843) 卡齐米日·戴拉威尼 162

Dembiński, Henryk (1791 - 1864) 亨利克·邓姆宾斯基 172

Dembowski, Edward (1822 - 1846) 爱德华·邓博夫斯基 169 - 170

Democratic Party (SD) 民主党 318

Democratic Union (UD) 民主联盟, 参阅 Freedom Union 321, 322

Denmark 丹麦 59, 98

Dmitrii Donskoi, Grand Prince of Moscow (1350 - 1389) 唐斯科伊·季米特里, 莫斯科大公 40

Dmowski, Roman (1864 - 1939) 罗曼·德莫夫斯基 200, 203, 205, 208, 209, 210, 218, 219, 220, 221, 224, 246, 248, 304

Dobrava, first wife to Mieszko I 杜布拉娃, 梅什科一世的第一任妻子 5

Dobrzyń 多布任 25 - 26, 27, 30, 34

Domeyko, Ignacy (1802 - 1889) 伊格纳采·多梅伊科 166

Dorpat (Tartu) 多尔帕特 59

Dresden 德累斯顿 111, 112

Drohobycz 杜若霍比茨 189

Drzymała, Michał (1857 - 1937) 米哈乌·佐兹玛乌 210

Dubček, Alexander (1921 - 1992)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302

Dunajewski, Albin (1817 - 1894) 阿尔宾·杜纳耶夫斯基 185

Durnkrütt, battle of (1278) 杜纳克鲁特 20

Dybowski, Benedykt (1833 - 1889) 本尼迪克特·迪波斯基 191

Dzerzhinsky (Dzierżyński), Felix (1877 - 1926)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198 - 199, 225

E

Elbląg (Elbing) 埃尔宾 48, 68

Electoral Action Solidarity (AWS) 团结选举行动 322, 334

Elizabeth, daughter of Władysław Łokietek (1305 - 1380) 埃尔日别塔, 瓦迪斯瓦

- 夫·沃凯塔克的女儿 25,34
- Elizabeth, widow of Louis the Great (c. 1340 – 1387) 伊丽莎白,“伟大的”路易的遗孀 37
- Elizabeth of Habsburg (1526 – 1545) 哈布斯堡的伊丽莎白 77
- emigration (economic) 移民(经济性的) 189,191,197,242, 参阅 Great Emigration' of 1831, and Polish exiles after 1945
- Enghien, Henri-Jules de Bourbonne, duke of (1646 – 1709) 波旁的亨利-朱尔斯·昂吉安公爵 100
- England 英国, 参阅 Great Britain 17, 111, 112, 127
- 'Enigma' (decoding machine) “英格玛”(译码机) 264
- Eperyes (Prešov), battle of (1492) 普雷绍夫战役 51
- Erik XIV, king of Sweden (1560 – 1569) 艾立克十四世, 瑞典国王 59
- Ernest of Habsburg, archduke (1553 – 1595) 哈布斯堡的欧内斯特大公 82
- Estonia 爱沙尼亚 23, 59, 93, 107
- European Union (EU) 欧盟 324, 325, 333, 337, 338, 339, 340
- European Union referendum (2003) 欧盟公民投票 334 – 335
- F**
- Falaise, battle of (1944) 法莱斯战役 269
- Fehlin 费林 59
- Feodor Alexeevich, tsar of Muscovy (1676 – 1682) 费尔多·阿历克斯维奇, 俄国沙皇 106
- Ferdinand I, Holy Roman Emperor (1556 – 1564) 斐迪南一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55, 77
- Fersen Ivan (1747 – 1799) 费尔森·伊凡 131
- Fijałowski (aka Fijałowski) Antoni (1797 – 1883) 费加罗夫斯基·安东尼 175
- Ford, Gerald, US president (1913 –) 杰拉尔德·福特, 美国总统 305
- France 法国 3, 17, 60, 65, 77, 83, 84, 100, 104, 106, 109 – 111, 122, 124, 127, 129, 131, 139, 162, 170 – 171, 179, 181, 218, 224, 232, 238, 247, 251, 252 – 253
- Franko, Ivan (1856 – 1916) 伊凡·弗兰柯 194 – 199
- Frederick I Barbarossa, German Emperor (1155 – 1190) 红胡子腓特烈一世, 德意志皇帝 11
- Frederick II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1740 – 1786) 腓特烈二世大帝, 普鲁士国王 12, 117 – 120
- Frederick Augustus I, elector of Saxony *see* Augustus II, king of Poland 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 参阅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
- Frederick Augustus II, elector of Saxony *see* Augustus III, king of Poland 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 参阅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
- Frederick Augustus III, elector of Saxony (1763 – 1827) (later king of Saxony and grand duke of Warsaw) 萨克森竞选人腓特烈·奥古斯特三世(萨克森最后的国王和华沙大公) 126, 127, 143

Frederick William, the 'Great Elector' of Brandenburg (1640 - 1688) 布兰登堡的腓特烈·威廉 98

Frederick William II, king of Prussia (1786 - 1797) 腓特烈·威廉二世, 普鲁士国王 124, 128, 129, 131

Frederick William IV, king of Prussia (1840 - 1861) 腓特烈·威廉四世, 普鲁士国王 168

Freedom Union (UW) 自由联盟, 参阅 Democratic Union (UD) 334, 321, 323

Friedland, battle of (1807) 弗里德兰德战役 141

G

Galicia (Austrian Poland 1772 - 1918) 加利西亚(奥占波兰) 137 - 138, 147, 155, 156, 168, 169, 179, 184 - 185, 189, 193 - 194, 199, 206, 207, 208, 212, 221, 233, 257

Galician Jacquerie (1846) 加利西亚扎克雷 170, 175, 185, 201

Gall, anonim ('the anonymous Gaul'), medieval chronicler of Poland (fl. c. 1110) 匿名的高卢人, 中世纪波兰历史记录者 3 - 4

Garibaldi, Giuseppe (1807 - 1882) 朱赛佩·加里波第 177

Gdańsk 格但斯克, 参阅 Danzig 7, 19, 22, 23, 27, 48, 68, 69, 76, 81, 120, 124, 303, 309 - 310, 325

Gdynia 格丁尼亚 238 - 239, 303

Gediminas, prince of Lithuania (c. 1316 - c. 1342) 格底敏, 立陶宛大公 25, 30, 34

'General Government' (Nazi-occupied Poland) "总督区"(纳粹占领的波兰) 257 - 261

George of Poděbrad, king of Bohemia (1458 - 1471) 波迭布拉迪的耶日, 波希米亚国王 51

Gerei, Mengli, Crimean Khan (1478 - 1515) 明里·格莱, 克里米亚汗 54

Geremek, Bronisław (1932 -) 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 310, 321, 328

Germany (and Germans) 德国(德国人), 参阅 Holy Roman Empire; and Prussia 4 - 6, 7, 8, 11, 14 - 16, 17, 19, 20 - 21, 22, 23, 24, 27, 31, 32, 48, 76, 77, 162, 170 - 171, 172, 181, 184, 187, 199 - 200, 218, 221 - 222, 233, 237 - 238, 242, 247, 249, 251 - 253, 278 - 279, 300, 303, 315, 325, 328 - 329, 332, 333

Giedroyć, Jerzy (1906 - 2000) 耶日·盖德罗伊奇 298, 302, 330

Giedroyć(Giedraitis), Józef Alnulf (1754 - 1838) 约瑟夫·盖德罗伊奇 140

Gierek, Edward (1913 - 2001) 爱德华·盖莱克 303 - 304, 305 - 306, 308, 310

Giertych, Roman (1971 -) 罗曼·盖尔蒂赫 336

Gierymski, Aleksander (1850 - 1901) 亚历山大·基里姆斯基 196

Giscard d'Estaing, Valéry (1926 -) 吉斯卡尔·德斯坦 05

Gizanka, Barbara (d. 1589) 巴尔巴拉·吉扎卡 82

Glomp Józef (1929 -) 约瑟夫·格莱姆普 312, 313

- Głogów (Glogau) 格沃古夫 21, 22, 24
- Gnieszno 格涅兹诺 4, 7, 16, 17, 20, 25, 26, 30, 42, 67, 143
- Gołuchowski, Agenor (the elder) (1812 – 1875) 阿吉诺·戈乌霍夫斯基(老) 173, 185
- Gołuchowski, Agenor (the younger) (1849 – 1921) 阿吉诺·戈乌霍夫斯基(小) 185
- Gombrowicz, Witold (1904 – 1969) 维托尔德·贡布洛维奇 245, 307
- Gomułka, Władysław (1905 – 1982)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 268, 237, 286, 295 – 297, 298 – 299, 303
- Gorbachev, Mikhail (1931 –)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256, 316, 329
- Gorchakov Mikhail D. (1793 – 1861) 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 173
- Górka, family of 格尔卡家族 76
- Górnicki, Łucasz (1527 – 1603) 卢克兹·古尔尼茨基 72
- Grabowski, Stanisław (1780 – 1845) 斯坦尼斯瓦夫·格拉博夫斯基 152
- Grabski, Stanisław (1871 – 1945) 斯坦尼斯瓦夫·格拉布斯基 230
- Grabski, Władysław (1874 – 1938) 瓦迪斯瓦夫·格拉布斯基 237, 238, 240
- Great Britain 英国 112, 115, 163, 179, 219, 252, 253 – 254, 263, 274, 275, 279 – 280, 338
- Battle of Britain (1940) 不列颠之战 224
- Great Depression (1929) 大萧条 244 – 245, 248
- 'Great Emigration' (of 1831) 大迁徙 163 – 165
- Greece 希腊 324
- Greek Catholic Church (see Uniate Church) 希腊天主教(参阅东仪天主教)
- Grochów, battle of (1831) 格罗霍夫战役 160 – 161
- Grodno (Gardinas, Hrodna) 格罗德诺 86, 128 – 129, 207
- union of (1432) 联盟 41
- Grottger, Artur (1837 – 1867) 阿尔多尔·格罗特盖 176
- Grunwald, battle of (also known as battle of Tannenberg) (1410) 格伦瓦尔德战役(也称为坦能堡战役) 45, 212
- Gulag (Soviet labour camps) 古拉格(苏联劳改营) 256, 267, 275, 287
- Gustavus Adolphus, king of Sweden (1611 – 1632) 阿道夫·古斯塔夫, 瑞典国王 93
- Gypsies 吉普赛人 260

H

- Habsburg, dynasty 哈布斯堡王朝, 参阅 Austria 51, 55, 77, 82, 91, 93, 106, 112, 117, 123
- Hadziacz (Hadiach), Accord of (1658) 《哈迪亚克协定》 99 – 100
- Haller, Józef (1873 – 1960) 约瑟夫·哈勒 221
- Halych (Halicz, Galich) 加里奇 27 – 30, 32 – 33
- Havel, Vaclav (1936 –) 瓦茨瓦夫·哈维尔 332
- Helsinki, treaty (1975) 《赫尔辛基条

- 约》308
- Heltman, Wiktor (1796 – 1874) 维克多·海尔特曼 166
- Hemar, Marian (1901 – 1972) 玛丽安·海马尔 293
- Henri, duke of Anjou, king of Poland (1573 – 1574) (king Henri III of France, 1574 – 1589) 亨利,波兰国王,安茹公爵(法国国王亨利三世) 83,84
- Henrician articles 亨利条例 83,84
- Henry, duke of Głogów (1273 – 1309) 亨利克,格沃古夫公爵 21,24
- Henry, duke of Żagań (Sagan) (1342 – 1364) 亨利克,扎甘公爵 33
- Henry II, German Emperor (1014 – 1024) 亨利二世,德意志皇帝 7
- Henry V, German Emperor (1111 – 1125) 亨利四世,德意志皇帝 10
- Henry VI, German Emperor (1190 – 1197) 亨利六世,德意志皇帝 19
-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1509 – 1547) 亨利八世,英格兰国王 77
- Henry IV, Probus (1257 – 1290) duke in Silesia 亨里克四世普罗布斯,西里西亚大公 16,19,20,21
- Henry the Bearded (1201 – 1238), duke of Silesia 大胡子亨里克,西里西亚大公 14, 15,16
- Henry the Pious, duke of Silesia (1238 – 1241) “虔诚的”亨里克,西里西亚大公 18
- Herbert, Zbigniew (1924 – 1998) 兹比格涅夫·赫伯特 290
- Hertzberg, Friedrich von (1725 – 1795), Prussian minister 弗里德里希·冯·赫兹伯格,普鲁士首席大臣 124
- Herzen, Aleksandr (1812 – 1870) 亚历山大·赫尔岑 180
- Hitler, Adolf (1889 – 1945) 阿道夫·希特勒 251 – 252,253,272
- Hłasko, Marek (1934 – 1969) 马雷克·赫拉斯科 295
- Hlond, August (1881 – 1948) 奥古斯特·赫罗德 246
- Holocaust 大屠杀(参阅犹太人) 260 – 263 (see also Jews)
- ‘Holy Alliance’ (1815) “神圣联盟” 152,163
- Holy Roman (German) Empire 神圣罗马(德意志)帝国,参阅 Germany 5,7,27,31
- Home Army (AK) 国家军 263,264 – 265, 269,271 – 273,275,280,301,303
- Homel (Gomel) 戈梅利 58
- Horodło, union of (1413) 《赫罗德洛联合条约》41 – 42,55
- Horodyski, Andrzej (1773 – 1857) 安杰依·赫洛迪斯基 150
- Hungary 匈牙利 5,9,10,18,20,21 – 22, 25,26 – 27,30,33,34,36 – 37,38,41, 44,50 – 51,52,55,60,73,82,98,171 – 172,252,295,297,323
- Hunyadi, John (1407 – 1456) 亚诺什·匈雅提 51

I

Ibrahim ibn Yakub, tenth-century Arab traveller 易卜拉欣·伊本·雅库布,10世纪阿拉伯旅行者 6

- industry and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和工业化
154, 155, 167 - 168, 187 - 189, 197,
198 - 199, 202 - 203, 213, 244, 249 -
250, 287 - 288, 305
- Ingria 印格利亚 107
- Institute of National Memory (IPN) 国家记
忆研究所 332
- Iraq 伊拉克 337
- Isabella (1519 - 1559), daughter of
Sigismund I 伊莎贝拉, 齐格蒙特一世的
女儿 55
- Israel 以色列 301, 333
- Italy 意大利 65, 73, 110 - 111, 139
- Ivan III, grand prince of Moscow (1462 -
1505) 伊凡三世, 莫斯科大公 56
- Ivan IV the Terrible, tsar of Muscovy
(1533 - 1584) 伊凡四世, 俄国沙皇 54 -
55, 58, 59, 82, 91, 93
- J**
- Jabłoński, Henryk (1909 - 2003) 亨里克·
雅布翁斯基 309
- Jadwiga, queen of Poland (1384 - 1399) 雅
德薇嘉, 波兰王后 37, 38, 39, 44
- Jadwiga of Żagań (c. 1345 - 1390) 扎甘的
雅德薇嘉 33
- Jagiello (Władysław II Jagiello, king of
Poland, grand prince of Lithuania)
(1386 - 1434) 雅盖洛(立陶宛大公, 波兰
国王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洛) 37, 38,
39, 40 - 44, 45, 50, 52, 60 - 61, 63, 72
- 'Jagiellonian Idea' (Poland's federation
with eastern neighbours) 雅盖洛理念(波
兰与东部邻居联盟) 225
- Japan 日本 203
- Jaruzelski, Wojciech (1923 -) 沃伊切
赫·雅鲁泽尔斯基 312 - 313, 318, 332
- Jedlnia, Privilege of (1430) 耶德尔尼亚特
权法令 63
- Jedwabne massacre (1941) 耶德瓦布内大屠
杀 261, 332
- Jesuits 耶稣会 4, 6, 31, 32, 65 - 68, 96, 101,
127, 138, 146, 154, 174, 175, 195 - 197,
201, 210, 212, 216, 233, 236, 241, 249,
256, 260 - 263, 284, 295, 298, 301 - 302
- Jeziński, Franciszek (1740 - 1791) 弗朗西
斯克·热兹耶斯基 124 - 125
- Jogaila, grand prince of Lithuania see
Jagiello 雅盖洛, 立陶宛大公, 参阅雅
盖洛
- John III, king of Sweden (1569 - 1592) 杨
三世, 瑞典国王 93
- John XXII, pope (1316 - 1334) 约翰二十
二世, 教皇 24 - 25
- John I Albert (Jan Olbracht) (1492 - 1501)
杨一世·奥尔布拉赫特 44, 50, 51, 53,
62 - 63
- John II Casimir (1648 - 1668) 杨一世·卡
齐米日 88, 96, 98 - 99, 100, 104
- John III Sobieski (1674 - 1696) 杨三世·索
别斯基 90 - 91, 105 - 106, 129, 201,
229, 314
- John of Luxemburg, king of Bohemia
(1310 - 1346) 卢森堡的约翰, 波希米亚
国王 22, 24, 25 - 26, 27
- John Paul II (Karol Wojtyła), pope (1978 -
2005) 约翰·保罗二世, 教皇(卡罗尔·沃
伊蒂瓦) 308 - 309, 314, 339

Joseph, Emperor (1765 - 1790) 约瑟夫皇帝 123
Józewski, Henryk (1892 - 1981) 亨里克·约瑟夫斯基 241
Jungingen, Ulrich von (1407 - 1410), Grand Master of the Teutonic knights 乌尔里希·冯·容根, 条顿骑士团长 45

K

Kaczorowski, Ryszard (1919 -) 雷扎德·卡乔罗夫斯基 321
Kaczyński, Jarosław (1949 -) 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 336
Kaczyński, Lech (1949 -) 莱赫·卡钦斯基 336, 339, 340
Kaden-Bandrowski, Juliusz (1885 - 1944) 尤里什·卡登-班德洛夫斯基 245
Kadłubek, Wincenty *see* Vincent of Kraków 文采蒂·卡德乌贝克, 参阅克拉科夫的文森特
Kakowski, Aleksander (1862 - 1938) 亚历山大·卡科夫斯基 219
Kaliningrad 加里宁格勒 325
Kalisz 卡利什 153
Treaty of (1343) 条约 27
Kamieniec Podolski (Kam'ianets-Podil'skyi) 卡敏涅茨-波多利娅 75, 105, 106
Kamieński, Henryk (1813 - 1866) 亨里克·卡敏斯基 169
Kania, Stanisław (1927 -) 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 311, 312
Karelia 卡累利阿 107
Karski (born Kozielski), Jan (1914 - 2000) 杨·卡尔斯基 (原科兹勒夫斯

基) 263
Kashubians (Kaszubi) 卡舒比人 155, 193, 304, 339
Katyn massacre (1940) 卡廷大屠杀 256, 267, 293, 329
Kaunas (Kowno) 考纳斯 231
Kazan 喀山 58
Kazimierz Dolny 卡齐米日多尔尼 97
Kaźko, duke of Słupsk (*d.* 1377) 斯武普斯克的卡兹克公爵 33, 34
Kestutis (1337 - 1382) 凯伊斯图特 39, 44
Kettler, Gotthard, last Grand Master of the Livonian Order and first duke of Courland (1561 - 1587) 戈塔尔德·克特莱尔, 立沃尼亚骑士团最后的团长, 库尔兰第一任大公 59
Khmel'nytskyi (Chemielnicki), Bohdan (1595 - 1657) 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 96, 99, 101, 105
Khotin (Chocim), battle of (1621) 霍京 (霍奇姆) 战役 92, 94; (1673) 105
Khrushchev, Nikita (1894 - 1971) 纳奇塔·鲁舒绍夫 295, 296, 297
Kiev 基辅 4, 6, 7, 10 - 11, 27, 86, 88, 95, 100, 106, 191, 225
Kircholm, battle of (1605) 基尔霍尔姆战役 85
Kisielewski, Stefan (1911 - 1991) 斯蒂凡·基谢莱夫斯基 290
Kiszczak, Czesław (1925 -) 切斯瓦夫·基什恰克 312, 317, 318
Kleeberg, Franciszek (1888 - 1941) 弗朗西兹克·科里伯格 225
Kniaziewicz, Karol (1762 - 1842) 卡罗尔·

- 克尼亚杰维奇 139
- Knyszyn 克内申 82
- Kochanowski, Jan (1530 — 1584) 杨·科哈诺夫斯基 72 — 73
- Kohl, Helmut (1930 —) 赫尔摩特·科尔 328
- Końkowski, Leszek (1927 —) 莱斯泽克·科瓦科夫斯基 299, 307
- Końtaj, Hugon 胡果·科翁泰 123, 136
- Konarski, Stanisław (1700 — 1773) 斯坦尼斯瓦夫·康纳尔斯基 111 — 112, 123
- Königsberg 哥尼斯堡 22, 48, 50, 73
- Konwicki, Tadeusz (1926 —) 塔德乌什·科恩维茨基 307
- KOR, see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Workers KOR. 参阅保卫工人委员会
- Korean War (1950 — 1953) 朝鲜战争 287
- Korfanty, Wojciech (1873 — 1939) 沃伊切赫·科尔凡蒂 201
- Kościuszko, Tadeusz (1746 — 1817) 塔德乌什·科希秋什科 129 — 131, 136, 139, 147, 166, 175
- Košice, Privilege of (1374) 科希策特权法令 34, 36
- Kossak, Wojciech (1856 — 1942) 沃伊切赫·科萨克 160
- Kossak-Szczucka, Zofia (1890 — 1968) 索菲亚·科萨克-席祖卡 261
- Kostomarov, Mykola (1817 — 1885) 米克拉·克斯托马洛夫 194
- Kozłowiecki, Adam (1911 —) 亚当·科兹沃维耶茨基 301
- Kraków 克拉科夫 7, 10, 11, 14, 15, 18, 19, 21, 22, 23 — 24, 25, 30, 31, 32, 33, 36, 37, 38, 50, 60, 65, 68, 72, 84, 122, 129, 131, 141, 143, 147, 154 — 155, 169 — 170, 171, 185 — 186, 189, 214, 260, 287, 333
- Treaty of (1525) 条约 50, 60
- Krasicki, Ignacy (1735 — 1801) 伊格纳采·克拉西茨基 123
- Krański, Zygmunt (1812 — 1859) 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 163
- Kreva (Krewo, Krevo), treaty of (1385) 《克列沃条约》 37, 41 — 42
- Kronenberg, Leopold (1812 — 1878) 列奥波特·克罗嫩贝格 174, 177
- Krukowiecki, Jan (1772 — 1850) 杨·科鲁克维耶茨基 161
- Krystyna of Prague 布拉格的克里斯蒂娜 33
- Krzaklewski, Marian (1949 —) 马里安·克扎克莱夫斯基 322
- Kuchma, Leonid (1938 —) 列奥尼德·库奇玛 330
- Kuchuk Kainardji, peace of (1774) 库斯丘克-开纳吉和约 177
- Kujawy, region of 库雅维地区 19, 26, 27, 33
- Kulikov, Viktor (1921 —) 维克多·库利科夫 313
- Kulikovo Pole, battle of (1380) 库利科夫波兰人战役 40
- Kultura (émigré journal) 《文化报》 298, 303
- Kulturkampf 《文化斗争》 184, 187, 202
- Kuroń Jacek (1934 — 2004) 雅采克·库龙 299, 302, 307, 311, 320
- Kwaśniewski, Aleksander (1954 —) 亚历

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 321, 322, 323, 331, 338 - 339
Kowiatkowski, Eugeniusz (1888 - 1974)
埃乌格纽什·克维特科夫斯基 248, 250

L

Lamartine, Alphonse de (1790 - 1869) 阿方斯·德·拉马尔提尼 71
land reform 土地改革, 参阅 peasant emancipation 222, 229, 232, 237, 238, 242, 273
Langiewicz, Marian (1827 - 1887) 马里安·兰盖维奇 179
Latvia 拉脱维亚 23, 232
Law and Justice (PiS) 法律和公正党 336, 340
League of Nation 民族联盟 231, 238
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 (LPR) 波兰家庭联盟 336
Lednicki, Aleksander (1866 - 1934) 亚历山大·莱德尼茨基 219
Ledóchowski, Mieczysław (1822 - 1902)
米切斯瓦夫·莱杜霍夫斯基 184
Left Democratic Alliance (the post-communist SLD) 左翼民主联盟(后共产主义 SLD) 321, 322, 335, 337, 340
Legnica (Liegnitz), battle of (1241) 莱格尼察(格尼茨)战役 18
Leipzig, battle (1813) 莱比锡战役 146
Lelewel, Joachim (1786 - 1861) 约希姆·列列维尔 140, 157, 159, 165 - 166
Lem, Stanisław (1921 - 2006) 斯坦尼斯瓦夫·蓝姆 298
Lenin, Vladimir Ilyich (1870 - 1924) 弗

拉基米尔·列宁 225, 230
Lenino, battle (1943) 列宁诺战役 268
Leo XIII, pope (1878 - 1903) 利奥十三世, 教皇 202
Leopold I, Holy Roman Emperor (1658 - 1705) 列奥波德一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98
Lepper, Andrzej (1954 -) 安德热依·莱佩尔 336
Lestek, 10th century pagan ruler of Polish tribes 莱谢克, 10 世纪时波兰异教部落的统治者
Leszczyńska, Marie (1703 - 1768) 玛丽·列什琴斯基 109
Leszczyński, family of 列什琴斯基家族 76
Leszczyński, Rafał (1650 - 1703) 拉法乌·列什琴斯基 125
Leszczyński, Stanisław 斯坦尼斯瓦夫·列什琴斯基, 参阅 Stanisław Leszczyński, king of Poland
Liberum veto 自由否决权 90 - 91, 100, 111 - 112, 116, 120, 126, 186
Lille 里尔 242
Limanowski, Bolesław (1835 - 1935) 鲍莱斯瓦夫·李曼诺夫斯基 198
Linde, Samuel Bogumił (1771 - 1847) 塞缪尔·博格密尔·林德 139
Linz 林茨 61
Lipski, Jan Józef (1926 - 1991) 杨·约瑟夫·利普斯基 307
Lithuania: 立陶宛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until 1795):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到 1795 年) 4, 25, 30, 32, 33, 37, 38 - 42, 44 - 48,

- 50, 51, 52, 53, 54, 55 - 60, 63 - 64, 72, 73, 75 - 76, 77, 79 - 81, 83, 85, 86, 87, 88, 91, 92, 93, 98, 99 - 100, 101, 105, 107, 112, 120, 127, 128, 129
- Russian rule (1795 - 1818) (*see also* western *gubernii* of the Russian empire): 俄国统治(参阅俄罗斯帝国的西固柏利) 173, 146, 158, 165, 179, 191, 195, 205 - 206
- Since 1918: 自 1918 年 220, 224 - 245, 231, 249, 251, 252, 287, 325, 330, 331, 333
- Litomyśl, Privilege of (1291) 利托米兹特权法令 20
- Livonia 立沃尼亚 45, 58 - 60, 91, 93, 107
- Lloyd George, David (1863 - 1945) 大卫·乔治·劳合 224
- Locarno, treaty (1925) 《洛迦诺条约》 238
- Lorraine III 洛林三世
- Louis I the Great, king of Hungary and Poland (1342 - 1382) 路易一世, 匈牙利和波兰国王 26, 27, 30, 33, 34, 36, 37, 44
- Louis II, king of Hungary (1516 - 1526) 路易二世, 匈牙利国王 55
-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1643 - 1715) 路易十四世, 法国国王 100
- Louis, King of France (1715 - 1774) 路易, 法国国王 109
- Louise-Marie de Gonzague (1611 - 1666) 路易丝-玛利亚·贡扎格 100
- Lubecki-Drucki, Ksawery (1778 - 1846) 克萨乌瑞·卢贝茨基 154, 157
- Lubiąż (Leubus) 卢布什 5
- Lublin 卢布林 53 - 54, 80, 81, 141, 221, 271, 333
- Union of (1569) 联盟 80 - 81, 86, 91, 92
- Lubomirski, family of 卢博米尔斯基家族 88
- Lubomirski, Jerzy (1616 - 1667) 耶尔齐·卢博米尔斯基 100 - 101
- Lubomirski, Zdzisław (1865 - 1943) 兹德斯瓦夫·卢博米尔斯基 219
- Lubusz (Lebus) 布鲁兹 25
- Lukashenko, Alexander (1954 -)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331
- Lusatia (Lausitz, Łużyce) 劳奇兹(鲁日茨) 7, 51
- Luther, Martin (1483 - 1546) 马丁·卢瑟 50, 76
- Lutheranism 路德教(参阅新教) 50, 58, 73, 76 - 77, 93, 104, 106, 115 (*see also* Protestantism)
- Lutosławski, Witold (1913 - 1994) 维托尔德·卢托斯瓦夫斯基 298
- Luxemburg, Rosa (Róża) (1871 - 1919) 罗莎·卢森堡 198, 199
- Lwów (L'viv/Lvov/Lemberg) 利沃夫, 32, 65, 105, 156, 171, 189, 206, 214, 223, 257, 268, 279, 298, 332
- L
- Łęczycza 宛兹卡 16, 19, 25, 33
- Łódź 罗兹 154, 188 - 189, 204, 257, 304, 325
- Łukasiński, Walerian (1786 - 1868) 瓦莱里·乌卡辛斯基 153
- M
- Maciejowice, battle of (1794) 马切约维策战役 131

- Maćko Borkowic (d. c. 1360) 马奇科·伯克
维克 31
- Maćzak, Antoni, Polish historian (1928 –
2003) 安东尼·毛察克, 波兰历史学家 78
- Maczek, Stanisław (1892 – 1994) 斯坦尼
瓦夫·毛采克 269, 270
- Magdeburg 马格德堡 6, 15, 32
- Magdeburg Law 马格德堡法律 15
- Maisky, Ivan (1884 – 1975) 伊凡·马伊斯
基 226
- Majdanek, extermination camp 马伊达内克
灭绝营 260
- Majewski, Karol (1833 – 1897) 卡罗尔·
马耶夫斯基 179
- Małachowski, Stanisław (1736 – 1809) 斯
坦尼斯瓦夫·马瓦霍夫斯基 142
- Malbork (Marienburg) 马尔博克(马林堡)
23, 32, 45, 47, 48, 155
- Mao Tse-Tung (1893 – 1976) 毛泽东 296
- Maria of Hungary (1371 – 1395) 匈牙利的
玛利亚 36
- Marienburg *see* Malbork 马尔博克, 参阅马
尔堡
- Masovia (Mazowsze) 玛索维亚(玛佐夫舍)
18, 19, 22, 23, 24, 25, 27, 44, 54, 61
- Matthias I Corvinus, king of Hungary
(1458 – 1490) 马提亚一世·科尔温, 匈
牙利国王 51
- Marcinkowski, Karol (1800 – 1846) 卡罗
尔·马尔钦科夫斯基 168
- Marshall Plan 《马歇尔计划》286
- Matejko, Jan (1838 – 1893) 杨·马迪依科
121, 185
- Małtwy, battle of (1666) 蒙特维战役
100 – 101
- Maximilian I, Holy Roman Emperor
(1564 – 1576) 马克西米伦一世, 神圣罗
马帝国皇帝 82
- Mazowiecki, Tadeusz (1927 –) 塔杜施·
马佐维耶茨基 309 – 310, 319, 320,
321, 328
- Mazurians (of East Prussia) 马祖里(东普鲁
士) 156, 231, 304
- Mažvydas, Martynas (c. 1520 – 1563) 马蒂
纳斯·马齐达斯 73
- Mehmet II, Ottoman Sultan (1451 – 1481)
穆罕默德二世, 土耳其苏丹 52
- Meisels, Beer (1798 – 1870) 比尔·梅塞尔
斯 175
- Melno, peace of (1422) 《梅尔诺和约》48
- Metternich, Klemens (1773 – 1858) 克莱
门斯·梅特涅 147
- Michael Romanov, tsar of Russia (1613 –
1645) 米哈伊尔·罗曼诺夫, 俄国沙皇 92
- Michael I Wiśniowiecki, king of Poland
(1669 – 1674) 米哈乌一世·维希尼奥维
斯基, 波兰国王 90, 104 – 105
- Michnik, Adam (1946 –) 亚当·米赫尼
克 302, 307
- Mickiewicz, Adam (1798 – 1885) 亚当·密
茨凯维奇 140, 153, 157, 158, 163, 164,
170, 173, 214, 257, 302
- Microślawski, Ludwik (1814 – 1878) 路德
维克·梅洛斯瓦夫斯基 169, 170 – 171,
174, 178 – 179
- Microszewski, Juliusz (1906 – 1986) 尤里
什·梅洛谢夫斯基 298
- Mieszko I, prince of Poland (c. 960 – 992)

- 梅什科一世, 波兰国王 3-4, 5, 6-7, 10, 18, 301
- Mieszko II, king of Poland (1025-1034)
梅什科二世, 波兰国王 7, 9
- Mieszko III 'the Old' ('Stary'), prince of Poland (1173-1202) (老)梅什科三世, 波兰王公 11
- Mikołajczyk, Stanisław (1900-1966) 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契克 267, 268, 269, 274, 275, 278, 280, 284-285, 293
- Milan 米兰 64
- Militz (Milsko) 米利兹 7
- Miliutin, Nikolai (1818-1872) 尼古拉·米利乌汀 180, 183
- Miller, Leszek (1946-) 莱舍客·米莱尔 335, 336-367
- Miłosz, Czesław (1911-2004) 切斯瓦夫·米沃什 290, 298, 307, 311
- Minc, Hilary (1905-1974) 希拉里·明兹 287
- Minsk 明斯克 225, 230
- Młeczko, Andrzej (1949-) 安德杰·梅勒思科 338
- Mochnicki, Maurycy (1804-1834) 马乌雷采·莫赫纳茨基 157, 159
- Moczar, Mieczysław (1913-1986) 米切斯瓦夫·莫查尔 301-302, 304
- Modrzejewska (Modjeska), Helena (1840-1909) 海伦娜·莫德耶斯卡 214
- Modrzewski, Andrzej Frycz (1503-1572) 安德烈·弗里茨·莫哲夫斯基 74
- Modzelewski, Karol (1937-) 卡罗尔·莫泽列夫斯基 299, 302
- Mohacs, battle of (1526) 莫哈奇战役 55
- Mohylew (Mogilev, Mahiliai, Mahiyow, Mohyliv) 莫西留 116, 122
- Moldavia 摩拉达维亚 38, 52-53, 54, 62, 65, 72, 75, 82
- Molotov, Vyacheslav (1890-1986) 米切斯拉瓦夫·莫洛托夫 255
- Mongols 蒙古人, 参阅 Crimean Tatars 18, 27-30, 32, 45
- Moniuszko, Stanisław (1819-1872) 斯坦尼斯瓦夫·莫纽什科 168
- Monte Cassino, battle of (1944) 卡西诺山战役 269
- 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r, baron (1689-1755) 孟德斯鸠男爵 127
- Moraczewski, Jędrzej (1970-1944) 英德烈·莫拉契夫斯基 222, 223
- Moravia 摩拉维亚 7, 51
- Morando, Bernardo (1540-1600) 伯纳多·莫兰多 89
- Mościcki, Ignacy (1867-1946) 伊格纳采·莫希齐茨基 191, 240, 247, 248, 255
- Moscow 莫斯科, 参阅俄国 40, 53, 54-55, 56, 59, 74, 75, 86, 87, 92, 106 (and see Russia)
- Treaty of (1686) 条约 106
- motor cars 发动机 242, 305
- Mroźek, Sławomir (1930-) 斯瓦沃米尔·莫罗兹克 298
- Muraviev, Mikhail (1794-1866) 米哈伊尔·穆拉维耶夫 179
- Muscovy 莫斯科公国, 参阅 Russia
- Muskie, Edmund (1914-1996) 埃德蒙德·姆斯克 305

N

Namysłów (Namslau) treaty of (1348) 纳

- 梅斯武夫条约 27
- Napolcon I Bonaparte (1769 - 1821), emperor of the French (1804 - 1814) 波拿巴·拿破仑一世, 法兰西皇帝 139, 141 - 143, 146
- Napoleonic Code 《拿破仑法典》 143, 150, 154
- Narutowicz, Gabriel (1865 - 1922) 加布列尔·纳鲁托维奇 191, 236
- Narva 纳尔瓦 59
- battle of (1700) 战役 107
- Narvik, battle of (1940) 纳尔维克战役 263
-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D) 国家民主党 200 - 201, 203, 204 - 205, 206, 210 - 211, 218, 221, 222, 223, 224 - 225, 230, 232, 236 - 237, 243, 246, 248, 265, 279
- National Radical Camp (ONR) 国家激进阵营 246
- Nazi occupation of Poland 纳粹占领波兰 257 - 263
- Netherlands (Austrian) 尼德兰(奥属) 128
- Netherlands (Dutch Republic) 尼德兰(荷兰共和国) 115
- Neuburg, Philip Wilhelm, duke of (1615 - 1690) 菲利普·威廉, 诺伊堡公爵 100
- Nicholas I, tsar of Russia (1825 - 1855) 尼古拉一世, 俄国沙皇
- and king of Poland (1825 - 1831) 波兰国王 153 - 154, 159, 161, 170, 172
- Nicholas II, tsar of Russia (1894 - 1917) 尼古拉二世, 俄国沙皇 202, 204, 219
- Niemojowski brothers, Wincenty (1784 - 1834) 涅莫约夫斯基兄弟, 文采蒂·涅莫约夫斯基(1787 - 1835) 152
- Niecsawa, Privilege of (1454) 涅沙瓦特权 63
- 'Nihil Novi', Statute of (1505) “毫无新内容的”宪法 64
- Nijinsky, Vaslav (Niżyński, Waclaw) (1888 - 1950) 瓦茨瓦夫·尼金斯基 191
- Nixon, Richard, US President (1913 - 1994) 理查德·尼克松, 美国前总统 305
- NKVP, Soviet security police 内务人民委员会, 苏联秘密警察 256, 275, 282
- Non-Party Block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BBWR) 同政府合作的无党派同盟 243, 244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323, 329, 331, 337
- Norwid, Cyprian (1821 - 1883) 齐普利安·诺维德 164
- Novosiltsev, Nikolay (1761 - 1836) 尼古拉·诺沃西尔采夫 152, 153
- Nowa Huta 新胡塔 287
- Nowak Jeziorański, Jan (1914 - 2005) 杨·诺瓦克·热兹欧安斯基 293
- Nuremberg 纽伦堡 65, 67, 73
- Nystad, peacc of (1721) 《尼什塔特和约》 107

O

- Ochab, Edward (1906 - 1989) 爱德华·奥哈布 295 - 296
- Ode, second wife to Mieszko I (d. 1023) 奥得, 梅什科一世的第二任妻子 6
- Oder-Neisse (Odra-Nysa) Line 奥得河-尼

- 斯河边界 278, 284, 293, 328, 330
- Odessa 敖德萨 137
- Ögödcı, Mongol Khan (1227 - 1241) 窝阔台, 蒙古可汗 18
- Okulicki, Leopold (1898 - 1946?) 列奥波德·欧库利茨基 275
- Oliva (Oliwa), peace of (1660) 《奥利瓦和约》 98 - 99, 104
- Olympic Games (Roma 1960) 奥运会(罗马 1960) 299
- Oprichnina 特辖制 59
- 'organic work' (*praca organiczna*) “有机工作” 167 - 168, 186
- Orsha, battle of the (1514) 奥尔沙战役 57, 58
- Orthodox Church 东正教 6, 9, 32 - 33, 39, 40, 41, 42, 55 - 56, 73, 79, 80, 81, 86 - 88, 94, 95, 100, 104, 106, 115 - 116, 122, 137, 165, 183
- Orzeszkow, Eliza (1841 - 1910) 艾利莎·奥热什科娃 186
- Osóbka-Morawski, Edward (1909 - 1997) 爱德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 271, 275
- Ostashkov 奥斯塔什科夫 329
- Ostróg (Ostrih), Academy of 奥斯特罗学院 87
- Ostrogski, Konstanty, prince (1526 - 608) 康士坦丁·奥斯特罗格斯公爵 87
- Ostrołęka, battle of (1831) 奥斯特罗温卡战役 161
- Ostrowski, Józef (1850 - 1923) 约瑟夫·奥斯特罗夫斯基 219
- Otto I, German Emperor (962 - 973) 奥托一世, 德意志皇帝 506
- Otto II, German Emperor (973 - 982) 奥托二世, 德意志皇帝 6
- Otto III, German Emperor (983 - 1002) 奥托三世, 德意志皇帝 6, 8 - 9
- Ottoman Empire *see* Turkey 奥斯曼帝国, 参阅土耳其

P

- Pac, Michael (1624 - 1682) 麦克·派克 105
- Padcewski, Ignacy (1860 - 1941) 伊格纳采·帕德列夫斯基 191, 215 - 216, 221, 223, 248, 255
- Padlewski, Zygmunt (1835 - 1863) 齐格蒙特·帕德列夫斯基 178
- Palestine 巴勒斯坦 249
- Papacy 罗马教皇职位 163, 183, 参阅 Vatican 和各位教皇各自的词条
- Paris Commune (1871) 巴黎公社 182
- Party of Realistic Politics 现实主义政党 203, 204
- Paskevich, Ivan (1782 - 1856) 伊凡·帕斯凯维奇 161, 162, 172
- Paul VI, pope (1963 - 1978) 保罗六世, 教皇 304
- Pavlyk, Mykhailo (1853 - 1915) 米克埃罗·帕夫雷克 199
- Paweł Włodkowic (Paulus Vladimiri) (c. 1370 - 1436) 帕维尔·弗沃德科维兹 72
- Peasant emancipation 农民解放, 参阅土地改革、波兰农民党 (*see also* land reform, and Polish Peasant Party [PSL])
- In the duchy of Warsaw 在华沙公国 143, 146

- In Galicia 在加利西亚 171,172
- In Russia and the western *gubernii* 在俄国和西固柏利 174
- Penderecki, krzysztof (1933 -) 克里斯托夫·潘德列茨基 298
- People's Army (AL) 国家军 265,269,272
- Pereiaslav, Union of (1654) 彼列雅斯拉夫联盟 96
- Peter I the 'Great', tsar of Russia (1682 - 1725) 彼得一世大帝, 俄国沙皇 107, 109,115
- Peter I Mushat, *hospodar* of Moldavia (c. 1378 - c.1393) 彼得一世穆沙特, 摩尔达维亚大公 38
- Petliura, Symon (1879 - 1926) 西曼·彼得留拉 225
- Philomats (Filomaci), society of 爱知社 153
- Piarists, religious order 皮亚斯特会, 宗教机构 111,123
- Piasacki, Bolesław (1915 - 1979) 鲍莱斯瓦夫·皮阿萨茨基 246
- Piast, legendary figure 皮亚斯特, 传说中的人物 3
- Piłsudski, Bronisław (1866 - 1918) 布罗尼斯瓦夫·毕苏茨基 191
- Piłsudski, Józef (1867 - 1935) 约瑟夫·毕苏茨基 198, 203 - 204, 205, 206, 208, 217 - 218, 219, 221 - 222, 225, 229 - 230,237,240 - 244,247
- Piltz, Erazm (1851 - 1929) 埃拉兹姆·皮尔茨 220
- Piotrków 皮沃特勒库夫 65,78
- Pius VII, pope (1939 - 1958) 庇护七世, 教皇 290
- Płock 波洛次克 19,25,26,27,37,61
- Płowce, battle of (1331) 普沃夫采战役 26
- Podlasie 波德拉谢 80,180
- Pokucie (Pokutija) 普库茨 53
- Polanovo, peace of (1634) 《普兰诺夫和约》 92
- Polesie 普里佩特 179,191 - 192
- Polish Committe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PKWN)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271 - 274
- Polish Democratic Society (founded 1832) 波兰民主党(1832年成立) 165 - 166, 169 - 170
- Polish exiles after 1945: 1945年后波兰流亡者 279 - 280,297 - 298,304,307,308
- Polish kingdom (1916 - 1918) 波兰王国 218 - 222
- Polish insurrections: 波兰起义 (1830 - 1831) 157,159 - 162 (1846) 169 - 170 (1863 - 1864) 178 - 181
- Polish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1920) 波兰情报工作 229; (1939 - 1945) 264, 292 - 294
- Polish Peasant Party (PSL) 波兰农民党 (until 1949) (至 1949) 201 - 202,206, 223,237,245,265,274,280,284 - 285 (since 1990) (自 1990年) 321,322,335
- Polish Socialist Party (PPS) 波兰社会党 198 - 199, 203 - 204, 245, 265, 285 - 286,285
- Polish Underground State (1940 - 1944) 波兰地下政府 264 - 266, 269, 271 -

- 272, 275
- 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PZPR) 波兰统一工人党 286, 295 - 297, 299, 302, 303, 321 - 313, 316 - 318, 320, 321
- Polish Workers's Party (PPR) 波兰工人党 268, 269, 275, 282, 284 - 286
- Polotsk (Połock) 波洛茨克 40, 59, 82, 91
- Poltava, battle of (1709) 波尔塔瓦战役 107
- Połaniec, Proclamation of (1794) 波瓦涅茨宣言 131
- Pomerania (Pomorze) 波美拉尼亚 (波莫瑞), 参阅 Prussia, West 5, 7, 16, 18, 19, 20, 21, 23, 25, 27, 44, 224, 257, 278, 279
- Poniatowski, Józef (1763 - 1813) 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 136, 141, 146
- Poniatowski, Stanisław August (see Stanisław August Poniatowski) 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 参阅 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
- King of Poland (1764 - 1795) 波兰国王
- Popiel, Legendary Figure 波皮耶尔, 传说人物 3
- Popiel, Wincenty (1825 - 1912) 文森特·波皮耶尔 204
- Popiełuszko, Jerzy (1947 - 1984) 耶日·波皮鲁斯科 314
- Po prostu (journal) (期刊) 295, 299
- Posen see Poznań 波兹南, 参阅波兹南
-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86 - 187
- Potocki, Alfred (1786 - 1862) 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 185
- Potocki, Andrzej (1861 - 1908) 安德烈·波托茨基 206
- Potocki, family of 波托茨基家族 88
- Potocki, Stanisław Kostka (1752 - 1821) 斯坦尼斯瓦夫·波托茨基 143, 153
-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波茨坦会议 278
- Poznań (Posen) 波兹南 4, 24, 48, 60, 65, 257, 295
- Poznań (and the duchy of Posen) 波兹南尼亚 143, 147, 155, 167 - 168, 169, 172, 179, 183 - 184, 187, 191 - 192, 193, 199, 210 - 211, 221, 224, 240
- Praga, massacre of (1794) 布拉格大屠杀 131
- Prague 布拉格 9, 20, 33
- Prague, treaty of (1515) 《布拉格条约》55
- Prażmowski, Nicholas (1617 - 1673) 尼古拉斯·柏拉兹莫夫斯基 105
- Przemysl Otakar II (1253 - 1278), king of Bohemia 普热梅斯尔·奥塔卡尔二世, 波希米亚国王 20, 22
- Protestantism in Poland 波兰的新教, 参阅 加尔文教、路德教 73, 76 - 77, 83, 87, 104, 115 - 116, 120 - 122, 216, 257 (see also Calvinism, Lutheranism)
-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1945 - 1947) 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 274, 275, 278, 282 - 283
- Prus, Bolesław (1847 - 1912) 鲍莱斯瓦夫·普鲁斯 186, 200
- Prussia: Ducal ('eastern') Prussia 普鲁士: 东普鲁士公国 48 - 50, 58, 60, 93, 98, 105
- East (after 1772) Prussia 东普鲁士(1772

- 年后) 128, 155 ~ 156, 224
- Hohenzollen kingdom (from 1701) 霍亨索伦王国 (自 1701 年) 98, 112, 120, 122, 123, 124, 127, 128, 129, 131, 137, 147, 170 - 171
- medieval 中世纪 48
- Royal ('Polish') Prussia (波兰的) 王室普鲁士 48, 55, 68, 74, 76, 77, 78, 80, 81, 93, 98, 104, 112, 115
- West (after 1772) Prussia 西普鲁士 (1772 年后) 147, 155 - 156, 183 - 184, 224
- Prussians, pagan tribe 普鲁士的异教徒部落 9, 18, 22 - 23
- Przemysł 普热梅斯尔 73
- Przemysł II, duke of Wielkopolska, king of Poland (1295 - 1296) 普热梅斯乌二世, 大波兰公爵、波兰国王 19, 20
- Pugachev revolt 布加切夫起义 117
- Puławy 普瓦维 140
- Putin, Vladimir (1952 -) 弗拉基米尔·普京 329
- R**
- Racławice, battle of (1794) 腊茨瓦维采战役 129 - 131
- Raczkiewicz, Władysław (1885 - 1947) 瓦迪斯瓦夫·拉奇凯维奇 255, 269, 292, 294
- Raczyński, Edward (1891 - 1993) 爱德华·拉琴斯基 294, 304, 313
- Radio Free Europe 自由欧洲电台 293, 294, 308
- Radio Maryja 玛利亚电台 324
- Radkiewicz, Stanisław (1903 - 1987) 斯坦尼斯瓦夫·拉德凯维奇 292, 294
- Radnot (Iernut), treaty of (1656) 《拉德诺特条约》98
- Radom 腊多姆 64
- Radziwiłł (Radvilas), Lithuanian magnate family 拉奇维尔, 立陶宛权贵家族 51, 53, 88
- Radziwiłł, Antoni (1775 - 1833) 安东尼·拉奇维尔 136, 155
- Radziwiłł, Barbara (1520 - 1551) 巴尔巴拉·拉奇维尔 51
- Radziwiłł, Bogusław (1620 - 1629) 鲍古斯瓦夫·拉奇维尔 98, 104
- Radziwiłł, Mikołaj 'the Red' (1512 - 1584) 米柯瓦伊·拉奇维尔 55
- railways 铁路 168, 188 - 189, 192, 210, 233, 238
- Raków 拉科夫 104
- Rapallo, treaty of (1922) 《拉巴洛条约》238
- Reagan, Ronald, US president (1911 - 2004) 罗纳德·里根, 美国总统 315
- Rej, Mikołaj (1505 - 1569) 米柯瓦伊·赖伊 72
- Rejtan, Tadeusz (1742 - 1780) 塔杜施·雷耶坦 121, 122
- Reval (Tallinn) 雷瓦尔(塔林) 59
- Revolutions (1848 - 1849) 革命 170 - 172; (1905) 203 - 206
- Reymont, Władysław (1867 - 1925) 瓦迪斯瓦夫·莱蒙特 188, 216
- Riga 里加 58, 59, 93
- Treaty of (1921) 条约 230
- Rokossovsky, Konstantin (1896 - 1968) 康

- 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 287, 297
- Romania 罗马尼亚 232, 252, 253, 255
- Romanticism in Poland 波兰的浪漫主义精神 138, 150, 153, 157, 158, 163 - 164, 172, 174, 199 - 200
-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US president (1882 - 1945)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美国总统 268, 274 - 275
- Ropp, Edward (1851 - 1939) 爱德华·诺普 205
- 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 - 1778) 让-雅克·卢梭 125
- Rowecki, Stefan (1895 - 1944) 斯蒂凡·罗韦茨基 264
- Rudolf I of Habsburg (1273 - 1291) 哈布斯堡的鲁道夫 19, 20
- Rus' 罗斯, 参阅 Belarus, Kiev, Ukraine 5, 9, 22, 27 - 30, 32 - 33, 36, 39 - 40, 41, 42, 45, 48, 53, 55 - 56, 60, 69, 79, 80, 128
- Russia 俄罗斯 40, 52, 55, 56, 58, 59 - 60, 64, 76, 77, 78, 79, 82, 83, 85, 91 - 93, 94, 96 - 100, 104, 106 - 110, 112 - 122, 123 - 124, 125, 127 - 132, 136, 140 - 141, 147, 150, 153, 173 - 174, 218, 219, 224, 329 - 330, 339
- Bolshevik Russia (1917 - 1922) 俄国布尔什维克, 参阅 USSR 224, 225, 229 - 330, 231
- Rydz-Śmigły, Edward (1886 - 1941) 爱德华·雷茨-斯米格韦 247 - 248
- S
- Salin, peace of (1398) 萨林和约 45
- Salomea of Berg (c 1099 - 1144) 萨洛米 11
- Sanacja (post - 1926 political regime) 萨纳齐 (1926 年后政权) 241 - 242, 247 - 248, 249 - 250
- Sandomierz 桑多梅日 10, 11, 14, 18, 19, 21, 25, 33 - 34
- 'rokosz' of 罗科兹 88
- Sapicha (Sapiega), Lithuanian family 萨别赫, 立陶宛家族 105, 107
- Saxony 萨克森 48, 50, 76, 106 - 110, 112, 116, 126, 127, 143
- Scheibler, Karl Wilhelm (1820 - 1881) 卡尔·威廉·沙伊勃莱尔 188
- Schroeder, Gerhard (1944 -) 格哈·施罗德 333
- Schulz, Bruno (1892 - 1942) 布鲁诺·舒尔茨 236
- Seeckt, Hans von (1866 - 1936) 汉斯·冯·塞克特 238
- Sejm (Polish parliament) 色姆 (波兰国会) 62, 64, 65, 68, 71, 73, 75, 76, 78, 79 - 80, 81, 83 - 85, 86, 87, 90 - 91, 93, 94, 96, 100, 104 - 105, 109, 115, 116, 120 - 122, 124 - 127, 129, 131, 143, 151, 152, 153 - 154, 159, 161, 162, 223, 237, 240, 242 - 244, 247, 286 - 287, 285 - 286
- sejmiki 地方议会 61 - 62, 63, 75, 79, 81, 84 - 85, 90, 107, 109
- Self-Defence (Samoobrona) 自我防御 336, 340
- Serwin-Oracki, Mieczysław (1912 - 1977) 梅谢斯瓦夫·瑟温-欧拉茨基 289
- Sforza, Bona (1494 - 1557) 博娜·斯福尔扎 64 - 65, 73
- Sforza, Gian Galeazzo, duke of Milan

- (1476 - 1494) 斯福尔扎, 米兰公爵 64
- Sheptyts'kyi, Andrei (Szeptycki, Roman) (1865 - 1944) 安杰依·西普提茨基 249
- Shevchenko, Taras (1814 - 1861) 塔拉斯·谢甫琴科 194
- Siberia 西伯利亚 180, 191, 256
- Siciński, Władysław (1615 - 1672) 瓦迪斯瓦夫·西青斯基 90
- Sicz (Sich) 谢契 93
- Sieciech, Palatinus (*fl. c.* 1095) 帕拉提努·齐斯尔契 10
- Siemomysł, pagan ruler of Polish tribes (*d. c.* 960) 齐莫梅斯乌, 波兰异教徒部落首领 5
- Siemowit, tenth-century pagan ruler of Polish tribes 齐莫维特, 10 世纪波兰异教徒部落首领 5
- Sienicki, family of 齐尼茨基家族 76
- Sienkiewicz, Henryk (1846 - 1916) 亨利克·显克微奇 199 - 200, 216
- Sieradz 齐拉兹 19, 25, 33
- Sigismund, King of Hungary (1387 - 1437) 匈牙利国王齐格蒙特 king of Bohemia (1419 - 1437); 波希米亚国王 Holy Roman Emperor (1411 - 1437)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36 - 37, 44, 45
- Sigismund (Zygmunt) I 'the Old', king of Poland (1506 - 48) "老"齐格蒙特一世, 波兰国王 50, 53, 55, 56 - 58, 60, 61, 62, 64 - 65, 68, 71, 73, 75
- Sigismund II, Augustus, king of Poland (1548 - 72) 奥古斯特·齐格蒙特二世, 波兰国王 54, 55, 58 - 60, 62, 65, 68, 75, 76, 77 - 82, 91, 93
- Sigismund III, Vasa, king of Poland (1587 - 1632) 瓦萨·齐格蒙特三世, 波兰国王 84, 88, 90, 92, 93
- Sigismund Casimir, prince (1640 - 1647) 卡齐米日·齐格蒙特, 王公 96
- Sikorski, Władysław (1881 - 1943) 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 236, 248, 255, 263, 264, 266 - 267, 268
- Silesia (Śląsk) 西里西亚 5, 7, 11, 14 - 16, 18, 24, 25, 27, 36, 44, 51, 76, 77, 98, 112, 128, 155, 172, 187, 278 - 279, 333; Upper Silesia 上西里西亚 156, 184, 199, 201, 224, 231, 238, 257, 303, 310
- Sinope 锡诺普 93
- Skarga, Piotr (1536 - 1612) 彼得·斯卡尔加
- Skłodowska-Curie, Maria (1867 - 1934) 玛利亚·斯科瓦多夫斯卡-居里 183, 190
- Skrzynecki, Jan (1786 - 1860) 杨·斯克日纳茨基 161
- Skrzyński, Aleksander (1882 - 1931) 亚历山大·斯克任斯基 240
- Skubiszewski, Krzysztof (1926 -) 克日什托夫·斯库比谢夫斯基 325, 330
- Sławek, Walery (1879 - 1939) 瓦莱里·斯瓦韦克 243 - 244
- Sławoj-Skłodkowski, Felicjan (1885 - 1962) 斯-斯克瓦德科·菲力克杨 248
- Słomka, Jan (1842 - 1927) 杨·斯洛姆卡 194
- Slovakia 斯洛伐克 7, 252, 332
- Słowacki, Juliusz (1809 - 1849) 尤里什·斯沃瓦茨基 158, 163, 171

-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 56 - 58, 92, 100, 120
- Smosarska, Jadwiga (1900 - 1971) 雅德薇嘉·斯莫萨斯卡 243
- Smotritskii, Meletii (c. 1577 - 1633) 米尔特·斯莫崔斯基 88
- Sobieski, Jan *see* John III Sobieski 杨·索别斯基, 参阅杨三世·索别斯基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and Lithuania (SDKPiL)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198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参阅 Polish Socialist Party (PPS) 198 - 199
- socialist realism (*socrealizm*) 社会现实主义 289 - 290, 295
- Sokorski, Włodzimierz (1908 - 99) 沃兹米尔兹·索科尔斯基 290
- Solidarity (*Solidarność*) 团结工会, 参阅 Electoral Action Solidarity (AWS) 310 - 314, 316 - 317, 320 - 321, 334
- Solski, Ludwik (1855 - 1954) 路德维克·索尔斯基 214
- Sorbs 索布人 8
- Sosabowski, Stanisław (1892 - 1967) 斯坦尼斯瓦夫·索萨波维奇 269
- Sosnkowski, Kazimierz (1895 - 1969) 卡齐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 230, 268, 269
- Spain 西班牙 122, 143, 250, 299
-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110, 115, 120, 123, 128, 131 - 132
- Conventions of (1772, First Partition) 协定(1772年第一次瓜分) 120;
(1793, Second Partition) (1793年第二次瓜分) 128;
(1795, Third Partition) (1795年第三次瓜分) 131
- Stalin, Joseph (1879 - 1953) 约瑟夫·斯大林 242, 248 - 249, 251, 253, 256, 266 - 267, 269, 271, 272, 273 - 275, 278, 286, 290, 292
- Stalowa Wola 斯塔洛瓦-沃拉 250
- Stanisław, bishop of Kraków and saint (d. 1078) 斯坦尼斯瓦夫, 克拉科夫主教和圣徒 9 - 10, 19
- Stanisław August Poniatowski, king of Poland (1764 - 1795) 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 波兰国王 115 - 116, 117, 120, 123, 124, 125 - 126, 128, 131, 142
- Stanisław Leszczyński, king of Poland (1704 - 1710, 1733 - 1735) 斯坦尼斯瓦夫·列什琴斯基, 波兰国王 107, 109 - 111
- Stapiński, Jan (1867 - 1946) 杨·斯塔宾斯基 202
- Starobelsk 斯塔罗别利斯克 329
- Staszic, Stanisław (1755 - 1826) 斯坦尼斯瓦夫·斯塔希茨 150, 154
- Stefan, Batory, king of Poland (1576 - 1586) 波兰国王斯蒂凡·巴托雷 88, 91 - 92, 93
- Stephen III 'the Great', hospodar of Moldavia (1457 - 1504) “伟大的”斯蒂芬三世, 摩尔达维亚大公 52 - 53
- Stockholm, treaty of (1667) 《斯德哥尔摩条约》104
- Stojałowski, Stanisław (1845 - 1911) 斯坦尼斯瓦夫·斯托雅沃夫斯基 201
- Stoss, Veit (Wit Stwosz), of Nuremberg

- (d. 1533) 纽伦堡的维特·斯特沃什 65,67
- Stresemann, Gustav (1878 — 1929)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238
- Strzelecki, (Sir) Paul Edmund (1797 — 1873) 保罗·埃蒙特·斯特什莱茨基 166
- Suçeava 苏恰瓦 53
-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1520 — 1566) “了不起的”苏莱曼 53
- Suvorov, Alexander (1729 — 1800)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 131
- Sviatopolk ‘the Accursed’, Grand Prince of Kiev (1015 — 1019) “被诅咒的”斯维亚托波尔克,基辅大公 7
- Sweden 瑞典 59, 60, 85, 93, 98 — 99, 104, 107 — 108, 110, 124, 338
- Sword, Knights of the 持剑骑士团 23, 45, 58, 59
- Szczecin (Stettin) 什切青(斯德丁) 278, 303
- Szczekociny, battle of (1794) 什切克斯尼战役 129
- Szujski, Józef (1835 — 1883) 约瑟夫·西祖斯基 186
- Szymanowski, Karol (1883 — 1937) 卡尔·希曼诺夫斯基 216

Ś

- Ściegienny, Piotr (1800 — 1890) 彼得·希切根尼 169
- Światło, Józef (1905 — 1975) 约瑟夫·希维阿特洛 294
- Świdwa, Piotr, castellan of Poznań (fl. c. 1460) 皮欧特·希维德瓦,波兹南城堡

主 48

- Świętochowski, Aleksander (1849 — 1938) 亚历山大·希文托霍夫斯基 186
- Świnka, Jacob, archbishop of Gniezno (d. 1314) 耶古布·希文卡,格涅兹诺大主教 16, 19, 21

Š

- Šliupas, Jonas (1861 — 1945) 约纳斯·西律帕斯 195

T

- Tamerlane (Timur i Leng, Turkic-Mongol Emperor, 1370 — 1405) 帖木儿(突厥-蒙古帝国皇帝) 45
- Tannenberg (Grunwald), battle of (1410) 坦能堡(格伦瓦尔德)战役 45, 212
- Targowica, Confederacy of (1792 — 1793) 塔尔果维策联盟 128, 161
- Tarnogród, Confederacy of (1715 — 1716) 塔尔诺格鲁德联盟 108
- Tarnowski, Stanisław (1837 — 1917) 斯坦尼斯瓦夫·塔诺夫斯基 186
- Tatars *see* Crimean Tatars 鞑靼, 参阅克里木鞑靼
- Tczew (Dirschau) 特切夫 22
- Teheran, conference of (1943) 德黑兰会议 268
- Teschen (Cieszyn, Tesin) 切申 221, 231, 232, 252, 332
- Teutonic Knights, religious military Order 条顿骑士, 宗教军事机构 18, 22 — 23, 24, 25 — 26, 27, 30, 32, 34, 38, 39, 40, 41, 44, 45 — 48, 50, 52, 58, 63, 72, 155, 315

Thorn *see* Toruń 托伦

Tilsit, treaty of (1807) 《提尔西特条约》141

Tito, Josip (1892 - 1980) 约瑟普·铁托 286

Toruń (Thorn) 托伦 48, 68, 115, 124, 147, 155

Thorn, peace of (1466) 《托伦和约》48, 50, 52

Trakai (Troki) 塔凯 38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22, 55, 98

Traugutt, Romuald (1826 - 1864) 罗德·特劳古特 179 - 180

Trebizond 特拉比松 93

Treblinka, extermination camp 特雷布林卡, 灭绝营 260

Trembecki, Stanisław (1740 - 1812) 斯坦尼斯瓦夫·特雷姆贝茨基 123

Tribunals, of the Crown and Lithuania 波兰和立陶宛特等法庭 85

'tri-loyalism' "向三方"效忠 186

Tukhachevsky, Mikhail (1893 - 1937)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 225

Turkey 土耳其 51, 52 - 53, 55, 60, 85, 92, 93 - 94, 96, 105, 106, 112, 115, 117, 123, 124, 127

Tusk, Donald (1957 -) 唐纳德·图斯克 339, 340

Tutora (Cecora), battle of (1620) 策佐拉战役 92

Tuwim, Julian (1894 - 1953) 尤利安·杜维姆 236, 245

Tygodnik powszechny (Catholic weekly) 《普世周刊》(天主教期刊) 292

U

Ukraine and Ukrainians 乌克兰和乌克兰人, 参阅 Rus'; Cossacks; western gubernii of the Russian empire 54, 77, 86 - 88, 93 - 96, 98, 99 - 100, 101, 105, 106, 128, 137, 156, 171, 172, 179, 185, 191, 193, 194, 199, 201, 206, 220, 223, 224, 225, 233, 238, 241 - 242, 259, 256, 263, 281, 284, 325, 329, 330 - 331, 332 - 333, 339

Ula, battle of the (1565) 乌拉河战役 59

Uniate (Greek Catholic) Church 东仪天主教(希腊天主教) 87 - 88, 100, 127, 137, 165, 183, 249

Union of Labour (UP) 劳动联盟 335

United Peasant Party (ZSL) 统一农民党 285, 318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 129, 189, 274, 278, 297, 304 - 305, 337

USSR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1922 - 1991; *see also* Russia) 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参阅俄国) 247, 251, 253, 256 - 257, 265 - 268, 274 - 275, 278, 295, 296, 303, 306, 311, 312, 316, 318, 325, 330

V

Vaclav II, king of Bohemia and later Poland (1300 - 1305) 瓦茨拉夫二世, 波希米亚和波兰王国后期的国王 20, 21 - 22, 24, 27, 36

Vaclav III, king of Bohemia (1305 - 1306) 瓦茨拉夫三世, 波希米亚国王 22, 24, 27

Valmy, battle of (1792) 瓦尔密战役 128

Varna, battle of (1444) 瓦尔纳战役
51, 153

Vatican 梵蒂冈, 参阅罗马教皇职位 238,
290, 324 (see also Papacy)

Venice 威尼斯 5, 23, 96

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 and treaty
(1919) 凡尔赛和会和和约 224, 238,
255, 274

Viazma 维亚兹玛 60

Vienna 维也纳
Congress and treaties (1814 - 1815) 大会
和条约 147 - 150, 161, 162, 274
Preliminaries of (1735) 初选 111
siege of (1683) 围攻 106, 201, 229, 314

Vilnius (Wilno, Vilna) 维尔纽斯(维尔诺)
38, 39, 41 - 42, 45, 53, 56, 77, 79, 80, 98,
122, 123, 129, 205, 215, 225, 231, 249,
256, 268, 279, 298, 331
Privilege of (1563) 特权 79
union of (1401, 1499) 联盟 41 - 42
Wilno university and educational district
(1803 - 1832) 维尔诺大学和教区
140, 153, 163

Vincent, bishop of Kraków, Polish
chronicler (fl. c. 1200; known as
'Kadłubek') 文森特, 克拉科夫主教, 波
兰年代记录者 3, 9 - 10, 19

Vladimir (Włodzimierz) 弗拉基米尔
27 - 30

Volhynia (Wołyń) 沃里尼亚 44, 80, 241, 263

Vorskla river, battle of (1399) 沃尔斯克拉
河战役 45

Vykhovskiy, Ivan (d. 1664) 伊凡·威霍夫
斯基 99 - 100

Vytautas (Witold), grand duke of Lithuania
(1392 - 1430) 维托尔德, 立陶宛大公
38, 39, 40 - 41, 44 - 45, 48, 55 - 56, 60

W

Wacław (1313 - 1336), duke of Płock 瓦
茨拉夫, 波洛次克公爵 26

Wajda, Andrzej (1926 -) 安杰依·瓦依
达 188, 290, 298

Wałęsa, Lech (1943 -) 莱赫·瓦文萨
309 - 311, 313 - 314, 316 - 318, 320,
321, 322, 332

Wallachia 瓦拉几亚 52, 92

Wańkiewicz, Melchior (1892 - 1974) 梅尔
基奥尔·万科维奇 299

Wańkiewicz, Walenty (1799 - 1842) 瓦兰
蒂·万科维奇 158

Warka, Statute of (1423) 《瓦尔卡法令》 68

Warmia (Ermeland) 瓦尔米亚 48 - 50

Warsaw (Warszawa) 华沙 44, 54, 83, 98,
106, 111, 112, 116, 123, 127, 129, 131,
138, 151, 157, 175 - 177, 189, 211 - 212,
255, 274, 290, 292
battle of (1920) 战役 229
Confederacy of (1573) 联盟 83, 104
duchy of (1807 - 1815) 公国 141 - 146,
150
ghetto 犹太隔都 261
Pact 公约 323, 328, 329
royal castle 皇室城堡 95, 304
Treaty of (1716) 条约 109
uprising (1944) 起义 271 - 273, 333

Wartheland 瓦尔特兰 257

Waryński, Ludwik (1856 - 1889) 路德维

- 克·瓦伦斯基 198
- Wasilewska, Wanda (1905 - 1964) 万达·华西列夫斯卡 268
- Ważyk, Adam (1905 - 1982) 亚当·瓦兹克 295
- Wehlau, treaty of (1657) 《韦拉瓦条约》98
- Wends 文德斯 8
- western *gubernii* of the Russian empire (1795 - 1918) 俄罗斯帝国的西固柏利, 参阅白俄罗斯人; 立陶宛人; 乌克兰人 136 - 137, 140, 146, 153, 161, 163, 165, 166, 170, 175, 178, 183, 191, 194 - 195, 205 - 206, 210 (*see also* Belarus; Lithuania; Ukraine)
- Weygand, Maxime (1867 - 1965) 马克西姆·魏刚 229
- Wieliczka 维利奇卡 32
- Wielopolski, Aleksander (1803 - 1877) 亚历山大·维吕波尔斯基 175, 177 - 178, 179, 204
- Wilanów, palace of 维兰诺宫 106
- Wilhelm of Habsburg (1370 - 1406) 哈布斯堡的威廉 37
- Wilno Vilnius 维尔诺, 参阅维尔纽斯
- Wilson, Woodrow, US president (1856 - 1924) 伍德罗·威尔逊, 美国总统 221
- Wiśniowiecki, family of 维希涅夫斯基家族 88
- Wiśniowiecki, Jarema (1612 - 1651) 105
- Witkiewicz, Stanisław Ignacy ('Witkacy') (1885 - 1939) 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采·维特凯维茨(维特卡希) 236, 246
- Witold *see* Vytautas 维托尔德
- Witos, Wincenty (1874 - 1945) 文采蒂·维托斯 206, 223, 229, 237, 240, 244, 248
- Wittelsbach, family of 维特斯巴契家族 26 - 27
- Wlen (Lahn) 弗伦 15
- Władysław, duke of Opole (1356 - 1401) 瓦迪斯瓦夫, 奥普莱公爵 44
- Władysław I łokietek 'the Short', king of Poland (1306 - 1333) 瓦迪斯瓦夫一世·沃凯塔克, 波兰国王 19, 20 - 22, 23 - 26, 38
- Władysław II Jagiełło *see* Jagiełło 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洛, 参阅雅盖洛
- Władysław III 'of Varna', king of Poland (1434 - 1444) 瓦尔纳的瓦迪斯瓦夫三世, 波兰国王 44, 50 - 51, 61, 153
- Władysław IV, king of Poland (1632 - 1648) 瓦迪斯瓦夫四世, 波兰国王 84, 88, 92, 93, 95 - 96
- Władysław Wygnaniec 'the Exile', duke in Poland (1138 - 1146, d. 1159) 瓦迪斯瓦夫·瓦格纳尼茨, 波兰公爵 11
- Władysław/Vladislav II/Ulászló II, king of Bohemia (1471 - 1516) and Hungary (1490 - 1516) 瓦迪斯瓦夫二世, 波希米亚与匈牙利国王 51, 55
- Włodzimierz *see*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
- Wodziszta Herman, prince of Poland (1079 - 1100) 瓦迪斯瓦夫·赫尔曼, 波兰大公 10
- Wojciechowski, Stanisław (1869 - 1953) 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霍夫斯基 236, 240, 241
- Wojtyła, Karol *see* John Paul II, pope 卡罗尔·沃伊蒂瓦, 参阅约翰·保罗二世, 罗

马教皇

Wrocław (Breslau) 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
15, 19, 279, 313

Wybicki, Józef (1747 — 1822) 约瑟夫·维
索茨基 123, 139, 141

Wyśtouch, Bolesław (1855 — 1937) and
Maria (1858 — 1905) 鲍莱斯瓦夫·维斯
沃乌赫 202

Wyspiański, Stanisław (1869 — 1907) 斯坦
尼斯瓦夫·维斯皮安斯基 207 — 208, 209

Wyszyński, Stefan (1901 — 1981) 斯蒂凡·
维申斯基 292, 297, 300, 301, 308 —
309, 312

Y

Yad Vashem Institute (in Israel) 大屠杀纪
念馆(在以色列) 261

Yalta, conference (1945) 雅尔塔会议
274 — 275, 329

Yaroslav the Wise, Grand Prince of Kiev
(1019 — 1054) “智者”雅罗斯瓦夫, 基辅
大公 7, 27

Yatwings (Jadźwingowie), pagan tribe 亚特
温, 异教部落 18

Yeltsin, Boris (1931 —) 鲍里斯·叶利
钦 329

Z

Zabłocki, Klement (1912 — 1983) 克莱门
特·扎布洛茨基 305

Zajaczek, Józef (1752 — 1826) 约瑟夫·扎
容契克 151

Zaleski, August (1883 — 1972) 奥古斯特·
扎莱斯基 294, 304

Zambia 赞比亚 301

Zamość 扎莫什奇 89, 229

Zamoyski, Andrzej (1800 — 1874) 安德烈·
扎莫伊斯基 173, 174, 177, 178

Zamoyski, Jan (1542 — 1605) 杨·扎莫伊
斯基 89, 91

Zamoyski, Maurycy (1871 — 1939) 莫里
茨·扎莫伊斯基 220

Zapolya, John (1487 — 1540) 杨·扎波利
亚 55

Zapolya, John Sigismund (1540 — 1571)
杨·齐格蒙特·扎波利亚 55

Zbigniew, son of Wodzisław Herman (d.
1112) 兹比格涅夫, 瓦迪斯瓦夫·赫曼之
子 10

Zborowski, Samuel (d. 1583) 塞缪尔·扎
博罗夫斯基 88

Ziemowit III, duke of Mazowsze (1341 —
1370) 齐莫维特三世, 玛佐夫舍公爵 27

Ziemowit IV, duke of Płock (1381 — 1426)
齐莫维特四世, 波洛次克公爵 37

Zionism 犹太复国主义, 参阅犹太人 197,
236, 249, 301 (see also Jews)

Złotoryja 佐托利加 15

Zöllner, Ernst von, Grand Master of the
Teutonic Knights (1382 — 1390) 厄内斯
特·冯·佐林格, 条顿骑士团长 38

Zubov, Platon (1767 — 1822) 柏拉顿·朱
波夫 128

Ż

Żeromski, Stefan (1864 — 1925) 斯蒂凡·
热罗姆斯基 216

Żółkiewski, Stanisław (1547 — 1620) 斯坦

尼斯瓦夫·茹凯夫斯基 92

Żórawski, Stanisław (1863 – 1935) 斯坦尼

斯瓦夫·佐洛斯基 207

Żurawno (Zhuravno), treaty of (1676) 《茹
拉夫诺条约》105

Ž

Žemaitija (Žmudž, Samogitia) 日姆兹 38,
45, 48



[General Information 本信息由OnlyDown 1.6秋意版生成]

书名=波兰史

作者=(英)卢克瓦斯基,(英)扎瓦德基著

页码=375

ISBN=

SS号=12790244

dxNumber=000008093874

出版时间=2011.04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定价:

试读地址=<http://book.szdnnet.org.cn/views/specific/2929/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093874&d=4D6AB5EBE7EBC4AB28AC6F5B289B0A65&fenlei=1106080901#ctop>

全文地址=[451ea1cda1414492f128a7ce28e2a411/img19/DE6841CCFBDE8A137AB7626B62B283B12E29E9D7FBD3A79E0B2532343C2E56A44939EFABA1164F6D3266C9B31AC86BA41A6429E5367A2A5A5EAF22A66009A154C160AF2FBDD67551982D170EDC16A4C5B57D8CF4ED98C329B6A43C25BE4AFBDAACFF4EA9D23131A03EA80E23B31095694764/b59/qw/](http://img19/DE6841CCFBDE8A137AB7626B62B283B12E29E9D7FBD3A79E0B2532343C2E56A44939EFABA1164F6D3266C9B31AC86BA41A6429E5367A2A5A5EAF22A66009A154C160AF2FBDD67551982D170EDC16A4C5B57D8CF4ED98C329B6A43C25BE4AFBDAACFF4EA9D23131A03EA80E23B31095694764/b59/qw/)